出类拔萃之辈

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出类拔萃之辈

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类拔萃之辈

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类拔萃之辈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齐沛合译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类拔萃之辈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齐沛合译

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类拔萃之辈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齐沛合译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72年版译出

出类拔萃之辈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齐 沛 合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9.625印张 707,000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40 每部(三册)3.75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直译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1972 年冬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作者戴维·哈尔伯斯坦是美国人，原系《纽约时报》记者，1962 到 1963 年在南越采访，因反对美国侵越战争曾遭到政府压迫。以后他写了《泥淖的形成》和《酷热的一天》两书。1971 年还写了一本《胡志明》，介绍胡志明主席的生平事迹。现在作者在美国史蒂文森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

本书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内容生动，文笔辛辣，富于讽刺味，是根据约五百人次的采访和大量书面材料写成的。书中主要叙述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走向失败的过程，揭示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的黑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以及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作者指出，美国政府虽然网罗了一批所谓"最有能力为国家服务的人"，即一批"出类拔萃"的人，而正是这些人使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泥淖，造成"自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惨痛的悲剧"。这本书对了解美国当代经济、政治、军事和美帝侵越战争的背景以及国务院同国防部

之间、文官与军人之间、不同财团之间勾心斗角和尖锐复杂的斗争，都提供了资料，颇有参考价值。因此，在美英出版以后，畅销一时。

但由于作者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限制，字里行间流露了一些错误和反动的见解。全书结构不够严谨，文字比较松散，有些地方且冗长拖沓，美英报刊的书评也指出了这种缺陷。

原书各章均无标题，现有标题是译者加的。人名原文常用昵称，易与他人混淆，已一律改为原名。原书中带括号的插入语太多，而且往往很长，其中有些句子前后可以连贯的，已把括号删去；有的则改为作者注。译文还删掉了原文中所引用的个别过分下流的话。书后索引中的页数均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正文边码。

1973 年 9 月

目　录

第 一 章　肯尼迪同罗维特的会见…… 1
第 二 章　肯尼迪脚踏两只船……17
第 三 章　第二流人物当国务卿……44
第 四 章　肯尼迪时代的新人……69
第 五 章　猪湾和印度支那…… 119
第 六 章　老挝——第一次亚洲危机…… 157
第 七 章　乱扣红帽子的麦卡锡…… 185
第 八 章　从朝鲜到越南…… 221
第 九 章　泰勒—罗斯托报告…… 282
第 十 章　又一条腿陷入越南泥坑…… 328
第十一章　哈金斯报喜不报忧…… 361
第十二章　麦克纳马拉其人…… 385
第十三章　国防部同国务院的矛盾…… 441
第十四章　在南越问题上的激烈争吵…… 485
第十五章　推翻吴庭艳的政变…… 511
第十六章　看风使舵的国务卿…… 546
第十七章　轰炸北越是怎样提出来的…… 632
第十八章　国务院的清洗…… 654

第十九章　策划东京湾事件……725
第二十章　得克萨斯州的无赖……777
第二十一章　侵越战争和泰勒其人……834
第二十二章　约翰逊进退两难……873
第二十三章　轰炸决定的出笼……927
第二十四章　美国是怎样陷入地面战争的……970
第二十五章　美军在南越战略的变化……1020
第二十六章　约翰逊在增兵问题上大耍花招……1064
第二十七章　战费骗局和通货膨胀……1089
结　尾……1103
补　录……1192
作者附记……1205
参考书目……1217
索　引……1231

第 一 章
肯尼迪同罗维特的会见

暗杀事件①及其引起的一切痛苦已经过去很久了。3
但是这个老年人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12月寒冷的那一天。他记得那个年轻人的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很能应酬宾客、使客人感到舒服自在。他记得那个年轻人关心天气，不让老年人受寒，也不让那些挨冻的新闻记者向那老年人不断地发问。他还记得那个年轻人不让老年人等候出租汽车而把他送到自己的司机和轿车那里。那次两个人的会见是很重要的，可是老年人对那个年轻人的彬彬有礼，几乎同对他们两人那次谈话的内容记得一样清楚。

会见后不到几个星期，那个年轻人就要成为美国的总统了。那些竚候在他的乔治敦住宅外边的新闻记者满怀激情，注视着每一个细小的举动、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每一个到他的临时总部的来客。尽管气候严寒，他们不象平日那样怨天尤人了。他们觉得自己也参与了创造历史。旧的人退出去了，新的人进来了，而新的人物似乎

① 指1963年11月肯尼迪被刺事件。——译者

是很有前途的、令人振奋的。

在即将掌握大权和担任要职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似乎拥有了一切。他漂亮、有钱、坦率、富于魅力。坦率是他的魅力的一个方面。他可以哄住一个访问者说，他承认访问者建议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合理的、适当的，可是他不能照着办，不能在这个星期、这个月、这个任期内办到。现在他正在试图组成一个政府。他的这种坦率再一次表现出来。在这个老年人面前，他很谦逊。他懊
4 恼地说，他曾经花了五年时间参加竞选活动，但是他却不认识真正的公职人员，那些管理政府的严肃认真的人。他承认他认识的只是些政客。如果这样说有点贬低他自己一类人的话，那对这个老年人来说，倒并不是完全感到不高兴的。政客的确需要人为政府效力，去管理政府。话的涵义是很清楚的。政客可以管理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如果说他们管理不了芝加哥，至少他们可以控制当地的选票。但是要他们管理世界行吗？他们对于德国人、法国人、中国人知道些什么呢？所以他需要专家，而现在他正在邀请他们。

这个老年人就是罗伯特·罗维特①，是个典型的专家，是这些人中间最优秀的代表。他经历了当时没有引起

① 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A. Lovett, 1895—)，美国银行家，曾任副国务卿、国防部部长等职，1961—1963年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译者

争论的过去年代，他是同史汀生——马歇尔——艾奇逊战时和战后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有密切联系的重要人物。他是权势集团①的化身，是一个只想到国家而不考虑政党的人。他是超然于无聊的派别之上的。所以他象这个集团中的许多人一样，在谈论他的朋友时会说，他甚至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个政党。他是一个在经历上纯洁无瑕的人。实际上，他是评论别人的经历的人：决定谁是可靠的、健全的，谁可以提升，谁不能提升。他在精神上同这个集团如此密不可分，甚至在描绘他那阶层的小说中，他已成为一个不朽的角色。这个集团的非正式桂冠诗人路易斯·奥琴克洛斯让自己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律师说这样的话："自从我同罗维特工作以来，我已经染上华盛顿热了。……"

他得到了金融界和国会的信任。他一直表现得很好。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爬上国会山②，同固执的中西部参议员们打交道，来平息事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是软弱的，这是最紧要的。没有人指责过罗伯特·罗维特软弱。他是一个机智而文雅的人。他不仅是有权势的人

---

① 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指操纵美国政治及其他方面的一小批人，包括企业家、律师、银行家、高级知识分子等。他们代表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影响和决定美国政策的集团。参阅本书第二章。——译者

② 美国国会会址在一座小山上，故称为国会山。——译者

物、政界和工业界巨头的朋友，而且也是象罗伯特·本奇利①、莉莲·赫尔曼②和约翰·奥哈拉③一类文艺家的朋友。他很机灵而且讨人喜欢。甚至在1950年的严峻时刻，他在国防部任职而麦克阿瑟正是得势的时候，罗维特在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上模仿麦克阿瑟的虚荣动作而使同僚们发笑：他表演麦克阿瑟站在朝鲜金浦飞机场螺旋桨发动机的旋风下，把很少几绺头发从一边梳向另一边，以盖住自己的秃顶。

年轻人同老年人谈得很投机，在此以前他们几乎是不相识的。当选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他的竞选运动中曾经鼓吹国家的理想主义。但是他既是理想主义者，至少也同样是怀疑论者，特别不习惯于别人公开表示的理想主义。他私下里喜欢象罗维特那样的怀疑论者对世界和人类所采取的严峻而比较悲观的看法。

除了肯尼迪自己的担心外，他的一个高级顾问还经常提醒他说，要有效地整顿国务院，就必须在那里派一

---

① 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1889—1945），美国幽默作家，自编自导自演过一些讽刺性电影短片，曾任《生活》等杂志编辑，其著作以叙述社会上的奇闻逸事而闻名，著有《潦倒十年》等。——译者

②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1905—），美国剧作家，著有《守望莱因河》、《寒风》等。——译者

③ 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美国小说家，曾当记者，著有《医生的儿子》、《热望生活》等。——译者

个强有力的人。国务院里到处都是穿着条纹裤的胆小鬼以及更坏的人。这个高级顾问就是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约瑟夫在同他的儿子谈论时，经常提到罗伯特·罗维特的名字。他觉得罗维特是那些老一代华尔街人物当中最好的一个，因为罗维特了解权力，知道权力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运用它。他一生都在运用这个权力，然而奇怪的是一般公众却很少知道他。这种默默无闻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典型的公职人员兼金融家。他对于自己的职位、它的价值以及担任这个职位的权利都是很有把握的，因此他不用出头露面，不需要自己的面貌在杂志的封面上或电视屏幕上出现，才感到放心。谨慎要好些；默默无闻要安全些。他的同僚了解他，了解他所起的作用，知道他能够把事情做好。宣扬自己有时使上司感到害怕，使国会里的对手感到恼火。罗维特在国防部的时候，国会的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从来不会在报章杂志上读到罗维特怎样干练，怎样善于对付国会；相反，他们读到的是罗维特怎样钦佩国会的报道。他是公众社会中一个典型不抛头露面的人。他无需用虚假的形象使人觉得他了不起。他懂得这一行的规矩：应该同谁谈，谈些什么，不该同谁谈，哪些新闻记者是懂行的，用不到告诉他，就会知道为了更高的利益应该发表些什么，可以提哪些问题，不可以提哪些问题。他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青年人进身的阶梯并不仅仅靠他们的

5

才干和能力，而且也要靠他们的父母是谁，要靠他们在办公室出现之前是哪位老朋友先打来了电话。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他知道，那些名字经常在报刊上、经常在无线电和电视中出现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拥有权力，而那些已经拥有权力或者接近权力的人总想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在二十世纪里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从来不参加任何竞选的人，一个典型的幕后人物。

1895年罗维特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杭茨维尔市。他是哈里曼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法律总顾问、铁路律师罗伯特·斯科特·罗维特的儿子。在那些暴力盛行的动荡日子里①，斯科特·罗维特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物，以后充当法官，成为得克萨斯州权力结构中十分重要的一员，最后担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和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儿子罗伯特做了东部统治阶层认为恰好合适的一切事情，进了恰好合适的学校，参加了恰好合适的俱乐部（希尔中学、耶鲁大学、"骷髅与骸骨"俱乐部）。他帮助建立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的耶鲁支队，而且指挥过美国海军的第一个航空中队。他娶了一门好亲，同布朗兄弟大金融公司经理詹姆斯·布朗的漂亮的女儿阿德尔·布朗结了婚。

---

① 指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向西部和南部积极扩张，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译者

由于他在大学毕业后的那些年代正碰上铁路公司不景气，罗伯特·罗维特到布朗兄弟公司工作，开始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年轻职员，年薪一千零八十美元，后来爬上了合伙人的地位，最终参与安排把布朗兄弟公司同哈里曼金融公司合并成强大的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因此自然而然地他就掌了权，主持业务，认识了许多人，而且他的婚姻也使他同大家族建立了联系。他对世界的看法是一个银行家的看法：那就是由恰好合适的人们作出恰好合适的决定，应该保持稳定；现状是好的，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 6

他在海外伦敦工作过，在外交事务方面取得了经验。他也象许多在外交事务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最有势力的美国人一样，是通过对外关系协会（这个团体是权势集团的非正式俱乐部）的赞助参加到政府里去的。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保持世界的静止符合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个世界中，生意能照常做，现存的秩序能够而且应该加以保持。他看到了希特勒的兴起，看到将来空中力量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他回美国后，在加速建立美国当时几乎不存在的空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二次大战期间，他是替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工作的一个核心小组的成员，成绩卓著。在四十年代后期，有人要罗维特回到政府中去任职，他说："只有三个人我不能对他们说'不'字，那就是史汀生上校、马歇尔将军和我的妻

子。”这个制订政策的小组由纽约和波士顿的大银行和法律事务所的人员组成。他们彼此相识，互有联系，在那个时期里掌握着国家的安全问题。这些人中有詹姆斯·福雷斯特尔①、道格拉斯·狄龙②和艾伦·杜勒斯。史汀生以及其后马歇尔都当过这个小组的杰出领导人。他们虽然在罗斯福手下工作过，却不是为他工作，而且几乎把他撇在一边。他们同史汀生的联系比同罗斯福的联系多得多。他们同艾奇逊和罗维特的联系也比同杜鲁门的联系多得多。虽然艾奇逊总是毫不迟疑地赞扬杜鲁门，可是有些人认为艾奇逊的语调无意中带有傲慢的口气，把杜鲁门说成是伟大的小人物，使人意识到，杜鲁门的伟大大部分是由于他愿意听从艾奇逊。由于他们进的学校、他们出身的社会阶级和他们自己的公司，他们这些人彼此间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家的联系更多些。甚至对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艾夫里尔·哈里曼，他们也总认为他有某些缺陷，好象他的党派观念和野心都稍稍强烈了些。艾夫里尔曾经想当总统，而他们中间其余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权力在于让总统来向他们请教。总统可以处理铁路罢工、最低工资和农产品价格，而他们则处理国家的安全问题。艾

---

① 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1892—1949），美国首任国防部长，后因神经错乱而自杀。——译者

② 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1909—)，曾任驻法大使、财政部长、副国务卿、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等职。——译者

夫里尔毕竟竞选了公职——这是无法否认的——而且取得了胜利。对他们来说，他太象一个政客和阴谋家了。他也许不象罗斯福那样差劲，但是他也不是他们中间真正的一员。

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职务后，那时的国务卿马歇尔遴选罗伯特·罗维特为艾奇逊的继任人，到1950 7
年罗维特就担任了国防部长。如果说在早先年代里，火炬传到了伊莱休·鲁特①和西奥多·罗斯福手里，而以后又传给了史汀生和马歇尔的话，那到1960年，罗维特该是下一个接火炬的人了。六十年代即将开始，他成了连接史汀生—马歇尔时代的重要人物。艾奇逊也是一个接火炬的人，但是他在麦卡锡时期有点受到伤害。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而是由于他不得不出来替自己辩护。正由于这次答辩广为传播，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报刊上出现的次数太多了，他受到麦卡锡的攻击说明他有点不够谨慎。罗维特要比较干净些，他似乎代表一种特别值得骄傲的传统，而且是成功的传统。后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幕后人物都觉得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使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发挥了潜力，战胜了日本和德国，它在战后制止了俄国人在欧洲的推进，并且按照一项计划重建了西欧，这个计划的名字本身对他们比对其他

① 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 1845—1937），美国共和党人，1905—1909年任国务卿。——译者

的人要来得更有意义。马歇尔计划已经把共产党人遏制住了，使欧洲各国从毁灭和衰退中恢复过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由于美国人自以为无所不能，他们总是容易不适当地把实际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成就归功于自己，认为这个计划是他们实现的和控制的，不承认计划只是医治经济上削弱了的欧洲的适当药方，而创造奇迹的是欧洲人自己。然而看来这一段历史好象是朝着他们指出的方向前进的：正象他们曾经预料到的，俄国人证明是不能信任的、不择手段的。到 1944 年，罗斯福和他手下主管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些人之间对于战后苏联的目标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这些人所持的看法比较接近邱吉尔的看法。俄国人试图在欧洲进行扩张，但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已把俄国人推回去了。他们对随之而来的冷战并不感到惊异。冷战的存在使得他们的作用和指导比以前更有必要了。如果没有冷战——没有冷战带来的危险、紧张和威胁，那对他们、对他们的智慧和威望的需要可能会大大减少。从慕尼黑到柏林这一段历史的教训是带有根本性的。他们认为：人们必须顶得住，要严厉、坚强。罗维特本人谈到四十年代后期的那几年，认为几乎是奇迹般的几年，那时美国的行政部门同国会行动一致，那时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①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继产生，而且

① 第四点计划，指 1949 年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侵略计划的第四点，即所谓“落后地区技术援助计划”。——译者

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那个时代的人们十分相信，他们对历史的看法经得到了证实，只有很少几个人对它有所怀疑。他们当中的一个智囊人物乔治·凯南在五十年代对于美国政策的推行越来越感到失望，认为那些人对苏联在西欧的意图言过其实，同样也夸大了在制止苏联方面他们自己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起的作用。但是凯南的知识分子气太浓了。在冷战的早期他对他们是有用的，但是随着凯南自己怀疑的增长，他的用处也就减少了。此外，他不是他们集团的核心成员，而罗维特则是核心成员。 8

因此，在12月的那个冷天同肯尼迪共进午餐的人不仅代表权势集团，不仅是代表大法律事务所和金融机构贩卖权力的掮客，而且也是同那个看来令人惊奇的伟大时代连接起来的人物。如果肯尼迪象他那个时期一直在抱怨的那样，说他不认识专家，这不成为问题。权势集团有很长的名单，它会很高兴地同这个年轻总统合作，帮他的忙。它当然是超然于政治之上的。它既害怕右翼①，也害怕左翼。它保持所谓中间派的地位。它的成员

① 1964年戈德华特参加竞选是新的没有掌权的南部和西部财团对根基雄厚的掌权的东部财团的一次进攻，而在旧金山，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为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这不是偶然的。——作者

大半是共和党人，虽然它是两面下赌注的。有少数成员是挂名的、谨慎的民主党人。有些家族善于搞这一套。邦迪家族的威廉是民主党人，麦乔治是共和党人。大家认为每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务所，至少都有一个合伙人是民主党人。事实上，在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问题上，权势集团里曾有些犹豫不决。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选举年里，权势集团好象是一个观看锦标赛的职业运动员的挑选者，它对竞赛双方都无动于衷，直到比赛结束，才走下来进入胜利一方的更衣室，雇用他，向他提供这个俱乐部的方便——在竞选问题上就是提供权势集团里受到信任和尊敬的可靠人员。

肯尼迪对权势集团的神通广大深信不疑。在六十年代初期，它的情况毕竟很少揭露。在外交事务方面过去很少有这样的政见一致，譬如认为遏制政策是好的，共产主义是危险的。当然还有要使援外法案能在国会里通过的问题；这些法案会有助于我们使第三世界不致落入共产党的手里。此外，肯尼迪年轻，而且由于他战胜尼克松的票数比他原来希望的要少些，他需要这个俱乐部的支持，需要这些熟悉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人物的支持。而且他觉得同这些人合得来。在切斯特·鲍尔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以及民主党所有其他智囊人物想把他们的得意主张强加于他以后，象罗维特那样表面上不提什么主张，也不讲什么主义的人，是令人感到轻松的。

这两个人彼此立刻有了好感。当肯尼迪问罗维特金融界对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①(他是总统最早的和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的经济见解有什么看法时，罗维特回答说，金融界认为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9肯尼迪听了觉得很有趣。当罗维特告诉肯尼迪说，他没有投肯尼迪的票时，肯尼迪只是一笑置之。不过要是肯尼迪知道罗维特没有投他的票的原因，也许他就不会这样笑了。不投他的票的原因是，罗维特对肯尼迪的父亲是有一些看法的。当然这件事在一定意义上会使罗维特对肯尼迪家族更具有吸引力；这个家族所以有这样大的往上爬的劲头，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些爱尔兰族人想使那些曾经故意冷落约瑟夫·肯尼迪的高贵人们同他的儿辈们打交道②。这次会见就是这种打交道的一部分。远在1939年，有一次约瑟夫·肯尼迪夫人罗斯驾车送约翰·肯尼迪的大学同班同学从海恩尼斯到波士顿的途中，曾问这个感到有些震惊的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说："告诉我，什么时候波士顿的名流将接纳我们爱尔兰人呢？"

会谈进行得很愉快。肯尼迪的小女儿卡罗琳手里拿

---

①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美国经济学家，曾任驻印大使等职，著有《丰裕社会》等。——译者

② 爱尔兰人移居到美国，大多是穷苦的农民，在美国社会上常被轻视。——译者

着一个足球，跳进跳出，在罗维特面前使得肯尼迪显得多么年轻，面临的任务多么艰巨。罗维特觉得他占了当选总统太多的时间，但是他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肯尼迪极力想使罗维特参加政府，担任一个职位，任何一个职位都行。（肯尼迪早先曾派克拉克·克利福德带信给罗维特，请他担任财政部长，遭到拒绝。）没有投肯尼迪的票的罗维特可以得到国务卿、国防部长或财政部长的职位。（罗维特以后说："我认为由于我曾经在国务院和国防部都任过职，他想他可以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罗维特再一次遗憾地谢绝了。他解释说，他身体不好，曾经患过严重的溃疡病，最后三次出差，每次回来都进了医院。现在他的胃已经切除了一部分，他认为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担任这些职位中的任何一个。肯尼迪再次叫苦说，他不了解有哪些合适的人。但是罗维特告诉他不必担心，他和他的朋友们愿意向他提供名单。拿财政部来说，肯尼迪希望找一个全国有声望、具有专长、闻名的和得到金融界尊敬的人物。那就有摩根银行的亨利·亚历山大、大通银行的约翰·麦克洛埃和世界银行的尤金·布莱克。还有道格拉斯·狄龙。罗维特说，他不知道他们的政治见解。他想了一想又说，他知道麦克洛埃是一个有独立主张的共和党人，狄龙曾经在共和党政府中任过职，但又补充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布莱克和亚历山大的政治见解（当然他们的真正政治见解无非是生意经）。关于国务院，肯

尼迪希望派一个能使欧洲各国政府感到放心的人。他们讨论了名单。正象迪安·艾奇逊会推荐的那样，罗维特推荐了一个很少为选民所知道的年轻人，那就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任职的迪安·腊斯克。他是马歇尔将军特别喜爱的人。罗维特说，他在基金会表现得特别好。那里的气氛好象是在大学教授的圈子里，但是腊斯克超然处之，对各个派别都处理得很好。他是一个很稳健的人。然后他在国务院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简短而温和、也许是有预言性的警告说：国务卿和他的总统的关系大部分要取决于总统。罗维特说，艾奇逊一直干得很好，因为杜鲁门给他充分的信任。 10

接着他们谈到国防部。罗维特说，它是一个臃肿的东西，是一个怪物。甚至谈到它，也要使人倒胃口。在罗维特任职的时候，只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而现在有多少人呢？有两万人。就是每一个人员后面还有十四个人。①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这个帝国也太大了。肯尼迪问到要成为一个好的国防部长需要的是什么。罗维特回答说："对事情要采取清醒怀疑的态度，要有判断好坏的能力，要能够区别轻重缓急。有了这些再加上一个好的总统，那就不会造成很大损害。不是说这样的国防部长能够做许多有益的事，而是他不会做造成很大损害的

① 这里的数字疑有误。——译者

事。”他们也谈论了有才智的人、军火商人、金融界的人物、雄心勃勃的人。罗维特说，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那个年轻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是那帮新人当中的尖子。其他人象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罗维特战时曾在政府中同麦克纳马拉共过事，他了不起，为人克制，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富有求知欲。

于是会晤结束。这个年轻人领着这个老年人通过一群等候着的记者，说他请罗维特先生来这里共进午餐，以便了解能否请他担任国务卿、国防部长或财政部长。这天晚上，罗维特的老朋友、《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打电话问罗维特：“天啊，这件事是真的吗？——它已传遍全城了。”罗维特回答说：“噢，我想他只是想使我感觉得高兴罢了。”由于天气寒冷而且也没有出租汽车，肯尼迪让罗维特使用了他的私人汽车和司机，尽管他没有能让罗维特担任国务卿、国防部长或财政部长的职位。

第 二 章
肯尼迪脚踏两只船

肯尼迪同罗维特会见的情况，传到曼哈顿南部和波 11
士顿州府大街以及奥琴克洛斯和奥哈拉有影响的其他地方以后①，人们大大消除了疑虑。这是第一次表明，白宫的主人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爱尔兰血统的民主党人，但他有自知之明，人们可以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听到会见的情况后，深深感到他一直担心的情况得到了证实。这个人并没有同肯尼迪竞选，也不反对肯尼迪当候选人，奇怪的是，这个人曾为肯尼迪的竞选十分卖力，而且从表面上看，他还是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这个人就是康涅狄格州的切斯特·鲍尔斯。他是自由派的偶像，就在一年以前，肯尼迪为了把鲍尔斯争取过来花尽了心血，当时肯尼迪似乎热烈赞同鲍尔斯对所有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现在鲍尔斯从远处注视肯尼迪上台前的事态发展；他家里电话的铃声不经

① 曼哈顿南部即纽约闹市。波士顿州府大街是商业金融中心。奥琴克洛斯和奥哈拉都是同权势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作家。参见第一章。——译者

常响了，他对肯尼迪同罗维特会见所了解的情况，大部分是从《纽约时报》上看到的。他有一种感觉：这个年轻的当选总统是在用相当大的力气向罗伯特·罗维特献媚，就象他一度对鲍尔斯本人所搞的那一套一样。

1959年的时候，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肯尼迪准备参加民主党的预选，并且以一个满过得去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参加了竞选。肯尼迪绝不是最鲜明的自由派，因为他同党的中间派比较靠近，同党内两个主要派别都挂
12 着钩。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要赢得提名，问题并不在于应付好那些职业政客，而是要同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搞好关系，这些人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同舆论界有关系，对它们有影响。这一派对肯尼迪有疑虑，但对艾德莱·史蒂文森却十分忠诚，尽管后者遭到两次英勇而激动人心的失败①。这种激动的情景使肯尼迪弟兄，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感到有些怀疑：似乎自由派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他们欣赏史蒂文森在竞选那天晚上的让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超脱的翩翩风度，而觉得胜利可以带来的权势倒是次要的。这种怀疑的感觉决不是单方面的；新共和自由派②也很清楚，在五十年

---

① 指史蒂文森1952年和1956年两次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译者

② 指《新共和》杂志所代表的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译者

代谁曾为他们战斗，谁在那里袖手旁观。

追随埃莉诺·罗斯福①和艾德莱·史蒂文森的真正自由派，对肯尼迪感到不安，至少同肯尼迪对他们感到不安一样。他们认为肯尼迪这个人太冷漠了，在外交政策上太死硬了，态度太暧昧了。对他们来说，肯尼迪太象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热中于理性而不讲信仰。就是第一个为他撰写传记的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也说过，肯尼迪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重大的道德问题而冒政治上失败的风险，这种说法激怒了肯尼迪在参议院的一些助手，特别是西奥多·索伦森。自由派觉得，肯尼迪为了适应冷战气候作了太多的让步，以致修改了自己的信条；而在肯尼迪看来，他们对当时认为确实存在的苏联威胁又未免太天真了，太不现实了。肯尼迪作为一个年轻的众议员（当时很象他父亲约瑟夫），就已经对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击败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②感到高兴，而那场竞选是以最肮脏的扣红帽子为其特征的。在马萨诸塞州，麦卡锡主义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感情冲动的问题，它使天主教徒同知识分子分裂，肯尼迪在这里小心翼翼地避免表态。1954 年 12 月参议院就麦卡锡问题

---

①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妻，民主党的妇女活动家。——译者

② 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 1900—），美国女作家，民主党人，曾连任三届众议员。——译者

进行表决的时候，肯尼迪正好住在医院里，据说他当时是倾向于赞成谴责麦卡锡的。但是，由于他避开这个问题，再加上自由派对他父亲战时的主张①以及对他本人信奉天主教有所疑虑，就使他没有得到传统自由派的好感。在他快要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决定先消除自由派的疑虑。他想要史蒂文森支持他，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肯尼迪意识到，史蒂文森虽然犹豫不决，但非常想当总统候选人，因此他就退而求其次，争取自由派左翼的主要人物切斯特·鲍尔斯的支持。

鲍尔斯似乎是一个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人物；甚至在1958年肯尼迪同朋友们谈论自己的前途，坦率地承认自己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切斯特·鲍尔斯的
13 名字。肯尼迪认为，他自己被提名的可能性很大，肯定比赛明顿、汉弗莱或者约翰逊的可能性要大些，他还列举了这些人政治上的不利条件。肯尼迪私下表示，当时形势很好，唯一成问题的是，1958年大概是民主党的好年头，也许会出现一些新的候选人，这些人可能立刻成为全国注视的人物。特别有两个人会成为他的真正威胁：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森·迪尔沃思，他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派；另一个就是鲍尔斯，他当时正在竞选康涅狄格州的参议院席位。肯尼迪说，这两个人都可以取得

① 约瑟夫·肯尼迪1937年至1940年任驻英大使期间，曾支持张伯伦政府对希特勒的缓靖政策。——译者

新共和派群众即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的支持，他们在他想争取过来的选民中拥有同样好或者更好的条件；而且同他不一样，他们都是新教徒，这一点反对肯尼迪的人会加以利用，因为许多反对他的人对他信奉天主教是感到不快的。这是一次吐露真情的谈话，说明他对如何赢得提名的看法，也说明他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有冷静而严峻的估计。

这两个人的威胁没有成为事实。鲍尔斯没有得到提名；他不善于同约翰·贝利一类职业政客打交道，贝利是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的头子，同肯尼迪的关系很深。迪尔沃思则犯了一个错误，他宣称应当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这篇讲话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迪尔沃思的直率跟肯尼迪的直率有些不同，肯尼迪往往是私下直率，并不是在公开场合下直言不讳，他私下里会毫无顾虑地承认他不敢公开承认的事。例如，大选后肯尼迪对鲍尔斯和史蒂文森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立场，他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合理的，但他当时不能这样公开说——也许要到他连任总统时才能说。

鲍尔斯虽然遭到了挫折，但他在党内自由派中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失败与其说是自由派的屈辱，不如说是自由派的一种光彩。肯尼迪争取鲍尔斯是1959年初的事，最初他先同鲍尔斯的一个主要助手哈里斯·沃福德拉关系。沃福德当时在诺特勒达姆的一所法学院里当教授，

他在鲍尔斯门下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这个年轻人极力提倡改善国内外的种族关系（竞选期间就是由于沃福德的建议，肯尼迪才打电话慰问被监禁的马丁·路德·金①的家属）。肯尼迪接近沃福德，既是由于沃福德可以争取过来，也是想使他成为争取鲍尔斯的一个桥梁。肯尼迪说，有一个重要职位留给沃福德，即仅次于索伦森的演讲稿起草人。他们之间的会晤是令人难忘的；据沃福德后来回忆，肯尼迪完全知道在哪些问题上会打动沃福德。他们在许多政治见解方面表示同感，最后沃福德同意为肯尼迪工作。肯尼迪说，民主党必须摆脱过去的冷战政策，不仅是杜勒斯的，也包括艾奇逊的。它需要新的富有朝
14 气的领导。它极其需要一个新的对华政策。它需要鼓励反殖民主义情绪。当然，所有这些看法都引起了沃福德的共鸣，这样他就帮助肯尼迪消除了鲍尔斯的某些疑虑。

肯尼迪本人对鲍尔斯也下了很大功夫，他使尽一切本领强调他们在许多地方意见都是一致的，尽管在策略上有些不同，但至少在基本思想上是一致的（策略上的分歧在当时看来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并不那么小）。最后，鲍尔斯靠拢过来了，但有很大的保留。他对肯尼迪，对这个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比较年轻的人，并不

①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美国黑人牧师，1960年和1962年曾因领导反对种族歧视游行而被捕，1968年被暗杀。——译者

是真看得惯。对休伯特·汉弗莱，鲍尔斯是一直忠心耿耿的。在那些处境孤立的年代里，在民权问题上、外援问题上、裁军问题上，他和汉弗莱一起参加过多次战斗，但是作为一个职业政客，他善于冷眼观察，断定肯尼迪也许能够坚持到底，击败尼克松，而汉弗莱倒可能半途而废。鲍尔斯向肯尼迪靠拢是民主党内互相竞争的派别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变；民主党在麦卡锡年代和被共和党指责背叛国家的二十年中，受到的损害是严重的。现在鲍尔斯，如果说还没有从史蒂文森—汉弗莱—埃莉诺·罗斯福—鲍尔斯那一派转入约翰·肯尼迪的中间派营垒，还没有真正离开他原来的集团，那末，他至少使肯尼迪营垒在思想上可以为自由派所接受，消除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疑虑，因为象新共和派那样的自由派都是把鲍尔斯列为自己的"黑马"①候选人的。现在作出了决定：切斯特·鲍尔斯将成为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主要顾问。无数自由派人士的心里会闪出一个念头，而这正是肯尼迪所希望的：鲍尔斯将担任国务卿。或者更理想一点，先由鲍尔斯掌管几个月，然后由史蒂文森出任国务卿。

切斯特·鲍尔斯的名声对肯尼迪争取自由派很有用处。在自由派的心目中，鲍尔斯是没有污点的少数人之一。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派人道主义者，然而在这

① "黑马"原指赛马中实力难测的马，这里指竞选中突然推举出来的预想不到的劲敌。——译者

个时期，正是自由和人道主义这类价值观念处于守势，被搞得幼稚可笑的时候。在人们心目中，那些在这个更加严峻的战后时期还念念不忘三十年代旧自由主义的政客，实在太迂腐太不现实了，这些人不理解当代世界的危险，不理解共产党人经常暗中利用各种好心肠的组织和意图。这种冷战的现实影响了许多自由派政客，他们替自己的过去进行辩解，但这种现实并不一定就影响到自由派选民。到1960年，鲍尔斯成了政客当中唯一敢于拒绝屈从于时代压力的人物。对他来说，好象冷战从来不曾发生过。他显然没有受到冷战的影响；他认为美国面对的问题是它自己造成的，是它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而不是苏联造成的。在当时看来，他有点落后于时代，但是好几年以后，看来他已经走在时代的前面了。

15 切斯特·鲍尔斯的出身同他这样一个响当当的自由派有些不相称。他是典型的新英格兰佬，而新英格兰人几乎全是共和党人。但是他的一些朋友们认为，他的全部政治经历反映了他的背景，他笃信共和政体的理想，对政治的概念是一种扩大了的市政厅那一套，政治领袖同本选区的选民磋商，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进行解释，同他们达成协议，这是一种老式的和不受人操纵的治理国家的方法。这样的政府的确必须反映选民的意见。这不仅是他对美国的看法，也是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他最喜爱的政治程序是，不同国家的人民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而不是遵守一个专横的领导所强加的命令。大多数政客倾向于认为，在共产主义同自由世界民主制度之间的殊死斗争中，世界分裂了；在这样一个现代世界中，鲍尔斯对政治的看法已经过时。这种看法意味着，鲍尔斯判断一个国家并非看它是不是共产党国家，而是看它的政府是不是真正反映了本国的民意。如果说他对苏联领导不以为然的话，那末他对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还是比较同情的。他不大介意政府的形式，而着重他自己对政府合法性的印象。

鲍尔斯出生于1901年，祖父是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的著名自由派主编。他的祖父在南北战争时期写的社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象家里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由派。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诺曼·托马斯①和罗伯特·拉福叶特②，而不是当时推选出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虽然到了耶鲁，并没有进入正规大学，而是在设菲尔德的耶鲁工程学校

① 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 1884—)，美国社会党领袖，曾五次参加总统竞选，著有《美国的出路：民主纲领》等。——译者

② 罗伯特·拉福叶特(Robert La Follette, 1855—1925)，美国进步党人，1906—1925年任参议员，是当时参议院中强有力的人物。——译者

读书；朋友们认为，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才能有一定的自卑感的原因。鲍尔斯自己认为，他实际上是自学出来的。他对自己有多少才学，缺乏自信。同肯尼迪一帮人的那种干脆利落的作风相反，他的风格似乎是慢吞吞的、呆板的。他在肯尼迪一帮人面前感到偏促不安，流露出一种不自在的心情，因此他讲起话来没完没了，试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缺陷，反而有点弄巧成拙。

鲍尔斯离开学校以后，在他自己家庭办的报馆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色彩太浓了。他后来差一点儿要去中国当外交官，到最后一分钟变了卦，才转入广告业。他同威廉·本顿合办了本顿—鲍尔斯公司。他们是1929年7月开始营业的，当时的资金微不足道，但是经济恐慌并没有使他们受损失，而是帮了他们的忙。鲍尔斯注意到，在经济恐慌初期，大公司都想为应付危机而有所变动，任何变动都行，于是本顿—鲍尔斯广告公司就生意兴隆起来。鲍尔斯在
16 还只有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变成了百万富翁，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百万富翁。他并不特别看重金钱，的确，他有了钱反而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不赞成富豪通常所持的政见，他对大多数美国人的窘困生活是了如指掌的。鲍尔斯不是雇用高薪的顾问和调查人员去进行市场调查，而是亲自奔走，访遍千百家中下层人家。这是他所受到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自

由主义思想，由于他在经济恐慌时期对人民生活的了解而加强了。

本顿—鲍尔斯公司的两个老板都不是真喜欢广告业，他们都很想到其他领域中去闯闯，特别是政界。先去的是本顿，不久鲍尔斯也去了。鲍尔斯此后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典型的、地道的自由派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物价管理局的自由派局长，几年以后成为康涅狄格州治理有方的自由派州长。五十年代是驻印度的自由派大使，最后成为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自由派众议员。在这个时期，自由派中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到五十年代末，他已经有点象一个英雄人物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比大多数自由派政客更为明显的是，他的全球主义似乎是他的国内政治理想的反映和扩大。其次，也许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当那么多自由派看来对自己的过去处于守势而纷纷求救于新自由派的反共主义的时候，鲍尔斯却毫不动摇；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原来的主张，也很少随波逐流。他的思想看来多少有点不那么时兴，但这一点他满不在乎。他根本不那么严重地看待俄国的威胁；在他看来，世界上真正的危险是贫困和饥饿造成的。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他使他们回想起罗斯福时代而感到欣慰；他依然在维护着他们所相信而最近却大受攻击的那些事物。

然而，也正是这种品格，会使他同他的新盟友肯尼迪

班子的关系受到损害。自由派认为鲍尔斯值得喜爱的地方是他的可靠性，而这一点正是肯尼迪一伙所不喜欢的。自由派喜欢他，是因为他坚持三十年代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经久不变的旧东西；而肯尼迪一帮人不喜欢旧口号、旧思想，他们想要做的是适应比较现代化的世界。因此，在他们的眼中，鲍尔斯是一个迟钝得出奇的人；而鲍尔斯自己也知道，他不象他们那样机敏，所以就变得更加不知所措。肯尼迪一帮人才华出众，而他却平平庸庸；他们都是有辉煌成就的人，为此感到自豪；而他对自己的成就，对自己曾当广告商，成为百万富翁，不免感到自惭形秽。他的讲话并不华丽，就连普通老百姓都能听懂，但同肯尼迪一帮人讲话的新风格似乎格格不入。鲍尔斯虽
17 然已经感觉到他同肯尼迪班子之间的差异，还是同意了进行合作——严肃呆板的切斯特·鲍尔斯，在身材瘦长、行动灵敏的年轻人们当中，习惯于长篇大论地回答简单的问题，充满好心好意，简直就象传道；在这些年轻人看来，只要你不当真，有些理想主义的看法和梦想，也还是可以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好过，从一开始就不好。甚至起初那些最好的日子里，过去使他们分开的那些猜忌也还是存在。风格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本质上的分歧，想回避也回避不了。鲍尔斯对肯尼迪的疑虑，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大。这一点到 1960 年 4 月在威斯康星州

时就明朗化了，而切斯特·鲍尔斯也是在威斯康星州开始走下坡路的。这里举行的第二次预选，在肯尼迪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道路上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肯尼迪对自由派给予他的支持还一点没有得到保证；从威斯康星州竞选运动开始以来，他仅有的一次胜利是在友好的天主教新罕布什尔州取得的。现在他是在中西部竞选，而这里是汉弗莱的据点，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汉弗莱的温和的中西部自由主义比较吃得开。在这里，肯尼迪需要得到他所能搜罗到的所有自由派的支持，他需要每个自由派都出面来支持他。在这个紧要时刻，他求助于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可是这个顾问裹足不前了。鲍尔斯说，他参加进来的时候曾特别说明，他在竞选运动中不能反对他的老朋友休伯特·汉弗莱，因此他不能到威斯康星州去反对休伯特。罗伯特·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兄弟对他拒绝协助感到很惊讶，从此就开始对他施加压力。当时索伦森被认为是同自由派有联系的，因此他们就请他去当说客。索伦森说，鲍尔斯必须来帮助他们，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他现在参加进来战斗，他就会得到许多好处。最初，劝告还是温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竞选运动越来越激烈时——毕竟一次预选失败，就会全部落空——口气就变得更加粗鲁更加严厉了。索伦森说，如果他不答应，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仅不会有好处，还可能带来坏处。如果他支持他们的话，他就应该在行动

上支持他们，他们所理解的支持就是这个意思。在他们生气的时候，鲍尔斯也生气了；他感到他的手臂给别人扭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肯尼迪兄弟是对的：他是可以既为肯尼迪竞选又不一定反对汉弗莱的。但是，鲍尔斯觉得，虽然肯尼迪可能是击败尼克松的最好人选，但他对汉弗莱的忠心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原来的疑虑也还存在：自由派反对天主教的那种感情在他身上并没有消除；过去康涅狄格州的任何一个自由派州长，都曾不得不同天主教会的保守政治力量进行斗争。因此，鲍尔斯拒绝投入竞选工作，于是他的助手哈里斯·沃福德在威斯康星州取代了他的位置。后来肯尼迪兄弟在分赃的时候认为，对鲍尔斯，对那些需要时却不来帮忙的自由派，他们无需
18 那样感恩报德了。从此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预选节节取胜，鲍尔斯除了偶尔被用来点缀一下，他的作用和价值已经减少了。他被任命为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的主席，在委员会里他非常努力地工作，虽然随着运动的进展，他越来越清楚，他同候选人的接触以及他对候选人的影响越来越少了。7月间民主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正在为一篇具有肯尼迪风格的政纲辛辛苦苦地工作着，这时他发现，对政纲最不感兴趣的人中间就有候选人本人。的确，甚至在肯尼迪接受大会提名的时候——这件事对经过这样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的鲍尔斯来说应该感到高兴——鲍尔斯已经有一种感觉，他同这一行动和决定

已没有多大关系，他同候选人的联系减弱了，而且越来越减弱。

鲍尔斯的这种感觉是再正确不过的了，因为就在那个时刻，老约瑟夫·肯尼迪正在纽约亨利·卢斯的家里作客；卢斯出版几种杂志，这些杂志长期以来专门折磨正是象切斯特·鲍尔斯这样的人，同时又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类的凶神恶煞百般吹捧，这样就使一些人怀疑，杜勒斯就是《时代》杂志的化身。自由派诗人马丽亚·曼内斯曾为此写过一首短诗："一边是福斯特·杜勒斯——一边是亨利·卢斯——直三角的斜边，老大党①就是。"约瑟夫·肯尼迪在那次作客的时候对卢斯说，他的儿子虽然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却是靠得住的。约瑟夫·肯尼迪同亨利·卢斯是相互帮忙的老朋友。卢斯曾经给老肯尼迪的儿子约翰的第一本著作《为什么英格兰沉睡》写过一篇序言，而约瑟夫·肯尼迪不甘落后，在卢斯的儿子汉克大学毕业以后，给他安排了第一个工作，当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特别助理——主席当然是约瑟夫·肯尼迪自己。

卢斯和肯尼迪那次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竞选运动中，应该做些什么来使《时代》和《生活》两家杂志保持中立。讨论变得相当激烈，因为卢斯想把问题分成国外事务和国内事务两部分，他暗示，他将不会

① 老大党（Grand Old Party），指美国共和党。——译者

因为约翰·肯尼迪在国内问题上的自由派色彩而感到不安，约瑟夫·肯尼迪听了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攻击。肯尼迪嚷了起来：我的儿子绝不会去当他妈的自由派。这时卢斯回答说，不要激动嘛，约瑟夫，当然他还得以自由派的面目去竞选。一个民主党人要赢得北部大城市的选票就必须中间偏左，所以不要因为他表现中间偏左就反对他，我们是不会反对的。我们知道他的问题，也知道他必须做些什么。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反对他。卢斯继续说，但是在对外事务方面，如果他在反共事业上表现软弱——或者象卢斯决定用更加正面一些的提法——如果他在保卫自由世界事业上表现软弱，那末，我们就会攻击他。约瑟夫·肯尼迪保证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儿子绝不会向共产主义示弱。卢斯回答说，那好，要是他真的手软，我们就非把他砸烂不可。

19 然后他们就转身去听约翰·肯尼迪接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演说。老肯尼迪，这个重要的政治家族的首领，现在自己的勃勃野心快要实现了，他感谢卢斯过去给予肯尼迪一家人的帮助，当时卢斯真心实意地接受了肯尼迪的感谢。但是，后来，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卢斯开始怀疑，《时代》和《生活》为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是不是做得过火了？是不是在报道中把他说得太好了，做得太彻底了？卢斯发现，这条线本来就很难划，而更加为难的倒不是他个人对肯尼迪家族承担了义务，而是在尼克松和

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之间很难找出真正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在秋天，《生活》杂志曾准备好刊出一篇重要社论，赞扬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卢斯的建议下，编辑部扣压了一星期，原因是尼克松在反共方面的立场没有超过肯尼迪。后来，大选结束，肯尼迪很明显只获得微弱的多数票以后，卢斯的共和党良心会使他感到不安：要是他对共和党再忠诚些，进入白宫的也许是尼克松。但是这也没有使他不安到不去参加庆祝肯尼迪就职的舞会，那天完全出于偶然，他正好同约瑟夫·肯尼迪一家人坐在一起。

这离切斯特·鲍尔斯那天晚上就座的地方很远。鲍尔斯是同他手下的一些人坐在一起，他的手下是一伙有才能的年轻人，都是他陆续发现后带入政界的，其中有些人将会在新政府中干得特别出色，如詹姆斯·汤姆森①、艾布拉姆·蔡斯②、托马斯·休斯以及哈里斯·沃福德。那天晚上同他在一起的有沃福德，他后来担任了白宫的民权事务特别助理；还有托马斯·休斯，他后来成为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司司长。休斯是这个时代的少数真正知识

---

① 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1931—)，1956年是康涅狄格州州长鲍尔斯的助手。1961—1963年曾先后担任副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和总统特别代表及顾问的特别助理。——译者

② 艾布拉姆·蔡斯(Abram Chayes, 1922—)，美国律师、副教授，曾任康涅狄格州州长的法律顾问、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译者

分子之一，他很幽默，对事物抱怀疑态度，而且几乎是玩世不恭的。他早期曾为鲍尔斯工作，后来给汉弗莱工作（汉弗莱在1959年是更吃香的政治人物），但发现汉弗莱这个人不怎么样以后，他又回到鲍尔斯那里。沃福德一直是鲍尔斯同肯尼迪一帮人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他曾竭力使鲍尔斯参加肯尼迪的竞选运动。在威斯康星州进行预选期间，沃福德代替了鲍尔斯的位置，他在自由主义的温床麦迪逊城曾说，“有一种史蒂文森—汉弗莱—鲍尔斯世界观，而约翰·肯尼迪是实现这种世界观的最好人选。”后来肯尼迪当选，他的头两项通告就是重新任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头子，这时休斯在寄给沃福德的一张明信片上说：“我要你知道，我终于投票赞成了你的史蒂文森—汉弗莱—鲍尔斯—肯尼迪—胡佛—艾伦·杜勒斯世界观……”

肯尼迪自从在洛杉矶得到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后就变了：他不再那么需要自由派；自由派也再没有别的人可以支持。肯尼迪的对手不再是汉弗莱或者史蒂文森，而是尼克松了。他转过来应付另外一些人的怀疑和顾虑。在
20 争取提名的过程中，问题在于他是否够得上一个自由派；而现在的问题是他在政治上够不够成熟、强硬和反共。他面对的总统候选人尼克松，是由于反共问题而在美国生活中崭露头角的。在以前的几次竞选运动中，这个人是一个打手，他攻击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手软，其猛烈

程度连他的顶头上司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有时也感到不安，但还没有不安到让他停止攻击；在那些讲话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有好处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感到不安，他只是担心这样一个靠反共吃饭的人继承他来担任那个崇高的职务是否合适。毫无疑问，只要民主党人稍微表现出一点软弱，尼克松就会再一次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攻击。因此肯尼迪就向右转来向美国保证，他同尼克松完全一样强硬，他要执行一种坚定的外交政策，他同尼克松一样关心金门、马祖，而且他还居然谴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古巴问题上手软。古巴在1960年成为民主党人抓住的一个问题，在南方为肯尼迪效劳的林登·约翰逊说，他懂得该做些什么。第一步，他要把卡斯特罗这个家伙捉来，把他洗洗干净（欢呼）。然后，把他剃光（欢呼）。最后，打他的屁股（狂呼）。肯尼迪在搞这个问题的时候，抛开了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和史蒂文森派的立场。凡是带有史蒂文森记号的东西，从洛杉矶大会以后在肯尼迪圈子里就变得越来越受到怀疑了。竞选运动结束以后，史蒂文森的一帮人负责起草一系列外交政策文件。芝加哥的律师乔治·鲍尔，原来是史蒂文森的人，他准备了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实在是鲍尔文件，而不是史蒂文森文件；尽管如此，鲍尔由于文件里还有史蒂文森的色彩而感到不安，只好派一个助手把文件送到棕榈海滩让肯尼迪审阅。

竞选期间，鲍尔斯的影响每况愈下。早在开始竞选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他是否应当在康涅狄格州再次竞选众议员的席位，这件事有点象阿方斯与加斯顿的故事①。肯尼迪要鲍尔斯参加竞选。鲍尔斯有些犹豫，他推托说，如果他参加竞选获选后又不干到任期届满，就对不起康涅狄格州第二选区那些好意的选民，也对不起他的部下威廉·圣翁奇，因为圣翁奇是想要这个席位的。肯尼迪争辩说，如果鲍尔斯不参加竞选，支持史蒂文森的人就会认为做成了交易：要让鲍尔斯出任国务卿；这样他们就不会象以前那样为竞选卖力了。鲍尔斯则坚持说，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不是那种人，他坚决要求肯尼迪允许他不参加竞选。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涵义是，如果鲍尔斯不参加竞选，新政府就得给他某种很高的职位，也许甚至是国务卿。肯尼迪不喜欢别人逼迫他，他对鲍尔斯的请求感到不快，因此没有批准鲍尔斯退出。鲍尔斯不喜欢众议院，还是退出了竞选。这一点使肯尼迪大为恼怒，他觉得鲍尔斯骗了他；不论鲍尔斯当国务卿有多大的机会，其实机会从来就不大，现在就更加小得多了。

21

真正的问题当然是两个人不太合得来，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鲍尔斯讲话冗长，有点传道的

---

① 阿方斯与加斯顿是美国漫画家奥珀（Frederick B. Opper）的一部连环画中的人物，二人遇事总是让来让去，谁都不肯先走一步。——译者

味道；肯尼迪一帮人讲话则简短，几乎象电码一样，字越少越好，因为尖刻和简练表明你懂得这种电码，你是圈子里的人。鲍尔斯讲话充满理想主义、世界舆论、政治道德方面的语汇，他毫不隐讳自己对人类的崇高希望；而如果肯尼迪一帮人也有这些想法的话——他们有些人这样想，有些人并没有这样想——那么，他们认为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崇高理想。鲍尔斯虽然很有钱，但他缺少人们在艾尔索普或者哈里曼举行的宴会上可以看到的那种贵族气派。在鲍尔斯的宴会上可以看到印度人、非洲人、美国黑人以及其他这样一类的人。在一个特别讲究风格的政府里（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人们记得更多的是它的风格而不是它的成就），人们有一种感觉，鲍尔斯的风格不对头；他的老婆居然喜欢穿印度妇女那种把布裹在身上的服装。所有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尽管在麦卡锡年代和冷战时期遭到压力，还是坚持不变，这样就给人以一种呆头呆脑的印象，并且很容易成为报刊上和国会里那些强硬派攻击的靶子。这一点有一部分是鲍尔斯自己的过错；他有深谋远虑的惊人才能，能够发现政策中所隐藏的危险，但是短兵相接时就不行了。他不懂得做假，不会抓住对手的要害，不善于在肉搏战中随机应变。艾夫里尔·哈里曼可能支持鲍尔斯所主张的政策，但他却不是好对付的。哈里曼是一个凶狠的、几乎从残酷的搏斗中能找到乐趣的干将，

谁要是同他过不去，那就得充分认识到，哈里曼是不会忘怀的，他将进行反击。因此，对约瑟夫·艾尔索普这样欺软怕硬的强硬派专栏作家来说，鲍尔斯就成为一个好得多的靶子。这样，鲍尔斯在政府中任职就受到了限制，因为潜在的对手知道他们可以打击他，而他不会还手。

实际上，鲍尔斯也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利用一个自由派的名声去争取知识分子是一回事，而要使金融权势集团放心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时民主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分歧很大，形成两个主要派别。一派在外交事务上奉行强硬路线，它在接受新政① 问题方面态度有点冷淡。象迪安·艾奇逊等传统主义者就是这一派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代表。艾奇逊在新政时期就在财政问题上同罗斯福闹翻了，他的追随者当中有艾尔索普兄弟这样的专栏作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包括参议院的威廉·富布赖特。这些人的根深蒂固的看法是，美国在世界上有明确无疑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这些人同东部权势集团有联系，这个集团虽然从表面看来还不太定型，但确实是工商业家、律师和金融家的集体，本世纪的美国政策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决定的。他们认为，世界遭到的最大威胁是共产

22

① 新政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危机而采取的施政纲领。这个词汇来源于罗斯福竞选时说过的一句话："使美国人民得到新政"。——译者

党，这个敌人既是极权的、反民主的，又是反企业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必须予以制止；共产党人只懂得一个东西：武力。这些人是最现实不过的。他们懂得权力；用这个时代爱用的字眼来说，他们是硬骨头。其中有些主要成员，虽然极其反共，但在麦卡锡年代也搞得焦头烂额，这些人再也不想表示软弱了。他们对冷战并没有感到吃惊，他们高兴地聚集在冷战的旗帜之下。这个派别要求增加国防开支。总的说来，在五十年代，民主党是支持这个要求的，当时该党的国会领袖当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一人主张裁军。在军费开支方面，民主党事实上比共和党承担的义务还要多。要求一再扩大国防机构的正是民主党。当时肯尼迪虽然还不是领袖人物，但他已经参与其事。1960年竞选开始的时候，肯尼迪手下有一个名叫迪尔德丽·亨德森的年轻助手，对肯尼迪在这个领域缺乏建树有点担心，她给国防部的一个知识分子打电话，请他在这个问题上帮帮忙。她说，肯尼迪需要有一种武器。别人都有一种武器："抢新闻人物"杰克逊① 有北极星潜艇，林登② 有空间武器，而赛明顿有B-52轰炸机。他

---

① 指亨利·马丁·杰克逊(Henry Martin Jackson, 1912—)，美国参议员，曾任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委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译者

② 指林登·约翰逊，他在当肯尼迪任内的副总统以前，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译者

们能给肯尼迪搞一种什么武器呢？国防部的这个名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青年知识分子说，那末，“步兵怎么样？”

前国务卿艾奇逊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在杜勒斯的年代里，他感到不安。这倒不是因为杜勒斯好唱高调，而是因为艾奇逊感到杜勒斯有弱点。艾奇逊担心那种为增强军事力量而作出牺牲、不惜花钱的意志力太少了。到五十年代后期，民主党的顾问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评论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时，象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阿瑟·施莱辛格和鲍尔斯等自由派，后来就设法使外交政策声明的口气温和一些，他们把原来的声明称之为“艾奇逊的宣战书”。

民主党的第二个派别起源于罗斯福时代，其主要倡导人是埃莉诺·罗斯福，民主党的这位贵夫人对约翰·肯尼迪一直有怀疑，尽管他一再向她表示，他也献身于同样的理想。肯尼迪当选后不久，最后一次到海德公园去看她，发现她还是对他疑虑重重。他说，您没有真正完全信任我。她回答说，对，是这样。他问道，“我怎么才能消除您的疑虑呢？”她回答说，“让史蒂文森当国务卿。”后来
23 他离开时，一面摇头一面笑着，算是第一次对她有了深刻的印象：“她真厉害，不是吗？”在五十年代，这一派以史蒂文森为其主要发言人，他擅长于写优美的散文，他谦虚而机灵。这一派认为，美国必须采取更大的主动性来结束

军备竞赛；美国如果不承认红色中国的话，至少应该开始朝这个目标前进；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不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新的力量；即使因而削弱了同北大西洋集团盟国的联系，美国也必须支持这种民族主义。他们还认为，世界的最大威胁也许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军备竞赛加上第三世界的饥饿和贫困。在艾奇逊集团看来，这一派的成员，特别是史蒂文森，似乎是软弱的；这些人是些好心肠的人，却不懂得权势和力量；他们太容易相信联合国了。史蒂文森成了一个现成的靶子——他给描绘成这样一种人：讲话飞快，行动迟缓，为人优柔寡断。在乔治敦的哈里曼一类人的大客厅里，他们谈论着关于史蒂文森的笑话（史蒂文森就要发表讲话了，人们告诉他还有五分钟时间，他就问助手，“我还来得及上厕所吗？”人们告诉他还来得及，于是他又问道，“我要去上厕所吗？”）。人们认为史蒂文森集团太热中于世界事务中某些含糊不清的道德概念，太热中于寻求世界舆论的支持，宁愿损害同实实在在的欧洲国家的真实关系，来换取不值得信任的黑人小国家的空空洞洞的诺言，这些国家也许不管怎样都会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我们。

在这种党内分歧的情况下，肯尼迪很善于脚踏两只船。由于他的风格和表现同史蒂文森集团很相象，他吸引住了史蒂文森集团的一些成员，他发表过演说，批评法国殖民主义和法国殖民战争，也批评美国支持法国的政

策。不仅如此，他在1959年还告诉哈里斯·沃福德(他完全知道这正是打动沃福德的地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摆脱杜勒斯年代，还要摆脱同样顽固并且在民主党的一派中那么占优势的艾奇逊观点；我们对中国、对不发达国家必须采取新政策；我们必须摆脱冷战时期的那种僵硬态度。

肯尼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殖民主义的讲话，首先激怒了艾奇逊，接着法国人也大为恼怒。艾奇逊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实力与外交》，书中引用了肯尼迪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讲话，说"这种迫不及待地轻视别人的举动"是不会制订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我们不能这样对待最老的盟友，它还在忍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创伤，还有一种自卑感。艾奇逊显然感到恼火的是，一个美国参议员居然随便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不管这种政策（就象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多么值得怀疑和多么不好；艾奇逊的愤怒至少反映了那种政策多么不偏不倚，真正容许批评那种政策的意见又多么少。反感一直没有完全消除，1960年艾奇逊在华盛顿一次午餐会上说，肯尼迪是一个"没有定型的年轻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评论同罗斯福夫人的评论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艾奇逊的女婿威廉·邦迪，经常反映艾奇逊式的观点，他对肯尼迪是否坚强也表示过怀疑。

24

即使肯尼迪不能算是属于艾奇逊集团，但在他身上

也有强硬路线的因素，因为当时政界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那样。他的长处是冷静、谨慎，不致于冲在事态发展或当代政治气候的前面，在几乎象冰河般的冷战中要求变革。他是处于冷静、实用时期的当代人的缩影。他钦佩权势集团里那些精明的、几乎是玩世不恭的老一代人物（肯尼迪在设法劝权势集团的另一个高级政治家约翰·麦克洛埃担任高级职务的时候，完全可能讲这样一类的话：问题在于这一代的年轻人不那么好，他们缺乏麦克洛埃这一代人所具有的那种胆识和坚韧性），而不那么钦佩象鲍尔斯那种呆板的好心肠的人，这种人说起来滔滔不绝，但也许会给你把一些国家丢掉。①由于这个时代中冷战仍然是生活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肯尼迪脚踏两只船是不足为怪的。因此，1960 年 1 月当他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朋友约瑟夫·艾尔索普，这个自由派中强硬路线的专栏作家和在新闻界兜售艾奇逊路线的记者，留心观察了他，然后充满热情地对另一个记者厄尔·梅佐说："他真了不起！一个有种的史蒂文森。"

---

① 甚至在企业界，鲍尔斯的成就在权势集团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他赚了好几百万，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是靠广告业赚来的，这个行当不是正经的职业，事实上是一种喧喧嚷嚷的行业，专门挑动人们的情绪，而不是安定情绪。对于这种行业，人们需要小心提防。——作者

第 三 章
第二流人物当国务卿

25 肯尼迪早期就决定要包揽国务卿的职务，这一决定曾得到多方赞赏，因为他显然是一个博学的人①；他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任职②；用华盛顿的惯语来说，他是一个熟悉世界上重大问题的人。

他的能力并不是一直得到信任的；说真的，在1960年竞选前，肯尼迪并不是华盛顿的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56年以来他几乎从不在华盛顿，而是奔波于外地同代表们会面，准备1960年的竞选运动。林登·约翰逊被认为是一个在华盛顿更为强有力的人物，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经常在华盛顿出头露面，他是这个

---

① 注意阅读报刊的人经常会获悉这个星期他和他的妻子杰奎琳读些什么；当杰奎琳见到英国的惊险小说家伊安·费莱明时，曾问他是否就是那个伊安·费莱明，后者作为文化界要人的地位就因而得到保证，由于不久这位年轻总统本人显然也要会见费莱明，费莱明的这种地位就加倍地得到保证。——作者

② 主要得感谢林登·约翰逊，他不是一定要把肯尼迪塞进这个委员会，而是要把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排挤出这个委员会，他需要找个在党内有追随者的人来代替，以证明排挤凯弗维尔是正当的。——作者

城市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迷恋这个城市，醉心于它的阴谋和权势。另一方面，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肯尼迪的形象是经常冲进机场，派一个助手到廉价书书亭买一些供旅行中看的读物，最好是历史读物。一位助手回忆说，1958年有过一个热中于特雷弗—罗珀①的时期；从小说中可以学到的东西太少了。但是，1960年的竞选运动改变了他在华盛顿的声望。他赢得了提名，得到了竞选总统的机会。也许总统候选人这个讲坛比总统宝座本身还要好，美国人对竞争本身和最后结局是一样喜爱的。 26

在竞选运动的中期，肯尼迪充分发挥了才能。突然在他的演讲中有了一种新的信心，甚至他的音调也似乎变了。那刺耳的新英格兰腔调，最初使人有过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当人们发现这种腔调有其特色并开始注意听它的时候，这个腔调似乎不那么难听了。他似乎了解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他知道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正在走向何处。甚至沃尔特·李普曼也感觉到这一点，李普曼要比任何其他的人更能确定华盛顿评论界喜恶的苗头。李普曼影响赖斯顿，而赖斯顿则影响报刊和电视评论员，后者又影响电视报道员。李普曼开始

① 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 1914—)，历史学家，英国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著有《历史论文》、《希特勒的末日》等。——译者

赞美这个年轻人，说是自从弗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掌握、激发和抓住美国人民的想象力。顺着这种调子的专栏天天出现，一直到最后，在竞选运动的后期，另一个受尊敬的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从他的办公室中跳出来，抽着雪茄烟说，“啊！我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也可能是老糊涂了，但我至少不会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去同年轻小伙子们讲恋爱”。然而李普曼和华盛顿各界的其他一些人密切地注视1960年的竞选运动，并表示赞同，认为这次竞选运动的气氛和本质都很好；而理查德·尼克松却至少可以说从来不是华盛顿评论界所特别宠爱的人物。在肯尼迪身上，他们发现了一个同这个城市、这个职位和未来十年相称的人物。所以当他显然想包揽国务卿职权的时候，华盛顿各界并没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坚强的、很有教养的、作好充分准备的年轻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比他的国务卿高明，这是合乎人们的心意的，不管谁是国务卿。但是，正是这个选择国务卿的过程在一个异乎寻常的程度上标志着这个政府会是什么样的政府，标志着这个政府在许多更为基本的问题上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和作出怎样的妥协。

不管国务卿可能是谁，他决不会是艾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一个在他党内享有过高声誉的发言人。史蒂文森想取得这个职位，几乎是想得过分了。他为他的党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两度充当党的总统候选人，

1952年第一次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进行竞选，那时正处于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的高潮，党已在执政二十年来的丑闻中逐渐腐朽。同一代伟大的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竞选，史蒂文森当然失败了。但他的言论在当时似乎是特殊的，是合理而动听的。他在失败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来挽救他的党，赋予党以新的活力，并且把整个新的一代的有教养的美国人带到党的怀抱中来，这些人当时是政治生活过程中的志愿人员，到1960年时有些人已经成为颇有专长的业余政治家，而被肯尼迪一家人巧妙地利用。如果说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看来象征着政治生活中的风采，那末其中有不少是直接从史蒂文森那里传下来的。在党可能处于特别低潮的时候，他努力设法使党活跃起来和具有生气，把一种新型的人物卷入政治生活。肯尼迪对于这些贡献的感激之情是有限的；肯尼迪弟兄们认为他优柔寡断，几乎是有点扭扭捏捏，还有些矫柔造作，例如他似乎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超越政治的样子，而同时却接受戴利①一帮的支持。肯尼迪兄弟认为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公民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做政治交易的政客，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自己也相信这一点，那就危险了。肯尼迪兄弟们认为他软弱无力，不够坚强，尽管他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面临巨大劣势而进行竞选，

27

① 戴利（Richard J. Daley, 1902—），芝加哥市长和该市民主党党魁。——译者

在历史上可能被看成是勇敢的行为。同样，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虽然史蒂文森一直单独顶住强硬路线的讥讽者的巨大进攻，肯尼迪仍旧认为他是软弱的。当然，史蒂文森在1956年没有提名肯尼迪为他的竞选伙伴，但更坏的是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党代表大会，这使他显得优柔寡断。

尽管如此，他在1960年仍旧有好几次可能被挑选为国务卿。主要通过史蒂文森的朋友，多次向他试探，让他知道只要他参加他们一伙，国务卿的职位就是他的。肯尼迪兄弟们仍然尊敬他，知道他对党内许多好提意见的人有着强大的控制力量，虽然预选进行得很好，但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还远没有定论。史蒂文森看来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可能在洛杉矶大会上顶住肯尼迪一帮人，而且后者知道林登·约翰逊正指望史蒂文森继续进行活动，不把门堵死，在大会提出要求时参与竞选。甚至晚到五月俄勒冈州预选以后的那一天，让史蒂文森当国务卿的想法仍然存在，肯尼迪自己在他从波特兰返回东部的途中，到伊利诺斯州的利伯提维耳拜访史蒂文森，还曾经问过史蒂文森的朋友们，要不要就在当时当地提出这个建议。助理们说不行，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建议会触怒这位州长。第二天，史蒂文森获悉这个建议后，似乎比以前更不愿意参加这一帮了；前一天的会见进行得不好。如果说肯尼迪兄弟认为他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那末他却认为肯尼迪兄弟是狂妄自大、盛气凌人（他后

来告诉肯尼迪的朋友们说，“这个年轻人，从不说个请字，从不说谢谢你，从不请求一些什么，而他要求什么，别人就非给不可”）。但是，让史蒂文森当国务卿的建议一直维持到洛杉矶大会期间，而最后在那里取消；肯尼迪兄弟发现他们已经可以用不着他了，应该还他的账在一夜之间就告吹了。从史蒂文森来说，虽然他拚命想当国务卿，但是他不能做这个交易，部分的原因是他认为对这样重要的职位进行交易是不对的，但同时也因为他仍然做着不可能实现的梦，他仍旧自己想当总统，不能够丢掉这个 28
萦回脑际的梦，而这个梦在洛杉矶大会上曾经在几个小时内几乎成为现实。

但是，尽管他没有同肯尼迪达成这笔交易，他在党代表大会过去很久以后仍然希望得到国务卿这个职位；他相信自己是最合格的。所以当肯尼迪建议他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职位时，史蒂文森大吃一惊。他私下说，他将不接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侮辱，他以前担任过这个职务。一个老朋友问他说，“要是你不参加这一帮，你将干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将做我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个朋友说，“那末让你的演讲刊登在《纽约时报》的第四十七页上面吗？”

因为史蒂文森没有立即接受这个职位，肯尼迪很恼火，他已决定让腊斯克当国务卿，他要腊斯克去拜访史蒂文森。肯尼迪在对他的朋友们叙述腊斯克如何使史蒂

文森上钩时是兴高采烈的。腊斯克说，“艾德莱，总统要我接受这个职务，这对我是一个牺牲，但我经过仔细考虑以后，尽管有牺牲的成分，我还是决定我不能拒绝。我不能说不。我感到我们大家都应当尽忠于比我们自己私利大得多的事业。我将去当一名士兵。我想这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你，这个国家需要你。我希望你将接受总统要你去担任的职务。”肯尼迪在对他的朋友们提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吃吃发笑地说，“我想老艾德莱是真感动了”。

白宫对史蒂文森有一层薄薄掩盖着的轻蔑的气氛，他是陪杰奎琳上戏院的人物。这完全是一个受辱的经历。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当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查尔斯·巴特利特①（两个人都是总统的好朋友和艾奇逊的信徒）对这个事件写了一个半官方的报导的时候，他们引证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史蒂文森想搞一次慕尼黑。这篇文章刊载在《星期六晚邮报》上面。这些特别引证的话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大多数熟悉华盛顿内幕的人怀疑这个高级官员是麦乔治·邦迪，这个尖锐、刻薄的邦迪经常对史蒂文森有意见。只是到后来，在肯尼迪去世和《星期六晚邮报》停刊后，这家刊物的编辑之一才承认这些引证的话来自肯尼迪本人，而且肯尼迪坚持要把它们刊登出来。然而，肯尼迪却慎重地要求作者删掉表明西奥多·索伦

① 查尔斯·巴特利特(Charles Bartlett, 1921—)，美国新闻工作者，曾获帕利策新闻工作者奖。——译者

森可能是个软弱的人的一段话；足见肯尼迪是照顾他自己一帮人的，而史蒂文森并不是自己人。这就毫不奇怪，在1964年年初，当史蒂文森在华盛顿出现并和一个老朋友一同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过分地赞扬起林登·约翰逊来了。他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伟大的总统。”这个老朋友听了有点惊奇，因为史蒂文森和约翰逊的友谊从来没有那么亲密过，但当史蒂文森描述他同总统会面的情况时，很快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热情洋溢：在他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时候，后者马上站起来，指着他自己的椅子说，“州长，公正地说，你完全应该坐在这张椅子上和在这个办公室里。” 29

但是，肯尼迪想要包揽国务卿的职权，最关紧要的是他不愿一个拥有的支持者足以使其当总统的人出任国务卿，相反，他想把史蒂文森在国内外的所有支持者争取过来。肯尼迪知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自己是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总统的。他以惊人的速度着手去做这件事，依靠风度和优雅的姿态更甚于依靠他的政策；然而，当史蒂文森比肯尼迪迟一年半于1965年逝世的时候，他看来象一个孤零零的和被遗忘的人物，在晚年蒙受了许多屈辱；他的支持者悲悼肯尼迪之死有甚于史蒂文森的逝世。只是在后来，当越南战争的全部悲剧显露了出来，一个名叫尤金·麦卡锡①的史蒂文森信徒起来反对约翰逊的时候，当人道主义者的价值标准似乎已经恢复并重新起而对抗

理性主义者的价值标准，自由派回顾过去究竟错在何处的时候，史蒂文森才重新获得他的支持者。但那已经是身后之事了。

因此，国务卿不是鲍尔斯或史蒂文森，也不是威廉·富布赖特。后者是肯尼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同事，曾给肯尼迪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作为坐镇国会的知识丰富的人，富有才智、眼界宽广而拥有威望。肯尼迪同富布赖特并不象他同迈克·曼斯菲尔德，甚至也不象同汉弗莱那样接近，但他们合作得很好，尽管肯尼迪并不是这个委员会中一个最勤奋的成员。他时常缺席，而在他偶尔出席的时候，似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名，分送给那些狂热的年轻崇拜者。对富布赖特有利的是他的拥护者在国会，而不是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所以，同史蒂文森的情况不一样，富布赖特的入伙有利无害。不过，也有人批评富布赖特；艾奇逊集团当时就对他抱有一些疑虑。（艾奇逊曾在 1960 年 11 月下旬一次茶会上告诉肯尼迪说，富布赖特可惜是有点象半瓶醋那样的人物，经常发表演说，号召要大胆设想并勇于发表新观点，但他自己却总是缺少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他并不完全是一个认真的人。此外，还有他的地位的问题；他是

---

① 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 1916—），美国参议员，1968 年曾反对约翰逊的侵越战争政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者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坐镇在那里就对肯尼迪及其政策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尽管这样，肯尼迪还是有意于他。肯尼迪急于要有一个民主党的国务卿，而富布赖特看来是身边最能干的人。最后，他的问题同鲍尔斯相似：演讲太多，公开表态太多，终于树立了太多的仇人。他曾在南方宣言上签名，这是南方国会议员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一项声明。他曾投票反对民权法案。（说实在的，把他提到国务卿的位置将在阿肯色州空出一个议席，岂不将使奥沃尔·福伯斯这个由于在小石城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而闻名全国的人物，成为这个空缺议席的最可能的候选人吗？一个新政府愿意有这种事吗？）他曾作过一些演讲，使得组织得很好、叫嚷得很厉害和影响很大的犹太人认为他有袒护阿拉伯人的嫌疑。事实上，当肯尼迪搜罗人才的时候，同自由派的团体进行联络的哈里斯·沃福特听说富布赖特可能当国务卿，就打电话给黑人团体和犹太人团体，请求他们打电报批评富布赖特。这些电报使罗伯特·肯尼迪得到很深刻的印象。他早就担心不发达国家对于拥有一个来自阿肯色州的国务卿的新政府会有什么看法。这样，富布赖特就被左翼所否决，正如鲍尔斯被右翼所否决一样。（后来，当富布赖特访问棕榈海滩的时候，老肯尼迪把他引到一旁对他说，他没有当上国务卿真是一大憾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自

30

由派人士曾大喊大叫反对这项任命。老肯尼迪断定，一个有那么多仇敌的人不可能完全是坏人。当富布赖特回到华盛顿时，他发现有一箱苏格兰威士忌酒等待着他，就是这个大使①送的礼物。）六年以后，那时已经有几十万美国人在越南，富布赖特已变成一个好人了。他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遇到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成员约瑟夫·劳，劳曾经反对富布赖特当国务卿并帮助纠集院外集团来反对他。富布赖特问劳说，“现在你是否承认我过去在民权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只有那样我才能留在这里和做这样的事？”劳有点被这番话楞住了，只能嘟囔着说，这是难于回答的话，“为了做好事先做坏事”。

这个职位也没有落在麦乔治·邦迪身上。沃尔特·李普曼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为他谋取高位，也许不是国务卿，但总得是一个好的职位。肯尼迪听了他们的推荐以后心里想，嗯，既然他是那么好，为什么不让他当国务卿呢？肯尼迪喜欢邦迪，邦迪批评艾森豪威尔任命刘易斯·斯特劳斯②这件事使肯尼迪印象很深，肯尼迪特别

① 指老肯尼迪，他曾在1937至1940年任驻英大使。——译者

② 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 1896—），美国金融家，曾任总统的原子能特别助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58年艾森豪威尔任命他为商务部长，在参议院未获通过。文内指的就是这件事。——译者

珍视这类出人意料的意见。邦迪的资历是无可非议的；他拥有知识界的支持，如果说不是凭他所写的文章和书籍，至少是凭他的资格。他没有犯过立场错误，他并不软弱；尽管他是一个共和党人，但这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有个时期，肯尼迪曾考虑让他当国务卿；在肯尼迪的儿子刚诞生后，肯尼迪在飞往棕榈海滩的途中告诉一批可靠的记者说，国务卿的任命还没有最后决定。他不知道他将怎么办，他倒是希望让邦迪当国务卿；现在邦迪已成为他个人的选择。一个报业联营机构的记者桑德·范诺柯尔问他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能任命邦迪呢？""因为他太年轻。坏就坏在我自己那么年轻，要是一个国务卿也那样年轻，那就不合适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共和党人，31
艾德莱是决不肯在他下面工作的。"这倒是真的。史蒂文森可能丢掉他没有能当国务卿的失望情绪，而同意在国务院里工作，但他要求至少在挑选他的上司方面有一点发言权。（这也是挑选过程中政治巧妙手法的一个典型：在肯尼迪还没有最后决定谁当国务卿之前，他先决定谁不能当，而且已经选好了国务院的若干主要助理，还选定史蒂文森去联合国，"肥皂大王"威廉斯①负责非洲事务，哈里曼为巡回大使。这似乎是已经考虑到国务卿这

① "肥皂大王"威廉斯（Soapy Williams），指门南·威廉斯（G.Mennen Williams），原是美国一家大肥皂公司的老板，因此人家替他取一绰号，叫做"肥皂大王"威廉斯。——译者

个职位不会给一个真正的民主党的积极分子，为了平衡起见，他就把许多低一级的职位留给了主要的民主党人。）因此，史蒂文森没有能得到他想当的职位，但至少得到一点象否决权那样的东西。他利用这种权力来反对麦乔治·邦迪。邦迪是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著名的自由派，在过去总统选举中他投托马斯·杜威的票而不投哈里·杜鲁门的票，两次投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票而不投艾德莱·史蒂文森的票。如果说邦迪的自由主义有某些限度的话，那么史蒂文森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最后，这个职位也没有给戴维·布鲁斯——有钱、高贵、典型的外交家、圆滑、聪明，他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妻子。二十年来，他经常出没于欧洲的高贵场所，他清楚地知道权力在哪儿并且善于同有权的人打交道，一个货真价实的大使，一个典型英国式的美国外交家。部分地由于他过去的许多慷慨捐助，他同民主党的领导阶层有着很多的关系。对布鲁斯不利的是他的年纪，六十二岁了，比他要为之服务的总统差不多大二十岁。有些人感到，要是让他经常去国会打交道，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不会乐于充当这种角色。他同史蒂文森有密切联系这一点对他也没有好处；肯尼迪听说，当他自己在洛杉矶大会上被提名时布鲁斯的妻子哭了起来。但是，如果说对布鲁斯没有太大的热诚的话，那么至少反对的意见也不多。有一个时候这还是悬而未决的：如果肯

尼迪周围有一两个人有一点热情推荐布鲁斯的话，他就可能当上国务卿。

结果是不去寻找最有才能、最有智慧的人物，而是去寻找污点最少、受到的反对最少的人物。在一个拥护崇高目的的强有力的人物总是树敌较多的时代里，肯尼迪兄弟却要找一个树敌最少的人物，一个最少惹事生非的人物。他们是为最重要的内阁职位寻找人选，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需要有无穷的聪明才智和老练的手段，需要对国内和全世界都有丰富的知识，而他们的找法，却象总统候选人寻找另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副总统的人选经常的做法一样，去找一个得罪人最少的人物——大家的第二号人选。这样，对他们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才能和智慧，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庸庸碌碌。这是总统的权力已经增长到何等程度的一个信号，而这是受到许多方面拍手叫好的。他们最后找到的那个人几乎是默默无闻的，这件事本身很说明问题，因为假如他在一生经历中真的做过什么重大的事，那么，不管是好是坏，他总会有一个记录。 32

迪安·腊斯克。他是大家的第二号人选。

在选择过程达到高潮时，肯尼迪曾对鲍尔斯说，“假如你当国务卿，你将建立什么样的国务院？”鲍尔斯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是这个基金会同左翼人士的联络

通道。他答复说，他首先将提名迪安·腊斯克为副国务卿。肯尼迪说，“迪安·腊斯克？他是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头头？”

大家都讲腊斯克的好话。优良的品质、努力工作、有忍耐性、稳重、沉着。一个好外交家。罗维特夸奖他。荣誉退职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说了一句有份量的好话：腊斯克是忠诚可靠的。富布赖特和他都是南方人，都是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也说他的好话。保罗·尼采也支持他。尼采是另一个权势集团的人物，在这个集团内很受尊重，在这个集团外却很少露面。（如果艾奇逊来挑选，他就会选择尼采当国务卿，不过最后尼采到国防部去当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在那里他的副手是威廉·邦迪，艾奇逊的女婿。）大家都说腊斯克的好话，甚至杜勒斯的一批旧人也说他的好话，因为腊斯克很少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他总是彬彬有礼、努力工作和深思熟虑的。只有一个人，麦乔治·邦迪，强烈地反对腊斯克。当邦迪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腊斯克主持洛克菲勒基金会而掌握钱口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曾经会过几次面。邦迪不喜欢腊斯克（除非受到特别厉害的挑衅，腊斯克这样的人是不表示喜欢或不喜欢的；上帝创造公职人员，不是为了让他们表示喜欢或不喜欢。），邦迪总认为腊斯克有点差劲。邦迪是一个名士派，不时闪发出他的偏见，偏爱第一流人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亲犹太人的人，因为他

认为犹太人聪明，而且还象他一样是好斗的；他的才智促使他同其他第一流的才智相抗衡，但不能容忍第二流的才智，而他感到腊斯克是属于第二流的。肯尼迪未来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对腊斯克投了一张反对票，但这无论如何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将在白宫工作，而不是在国务院。

迪安·腊斯克就这样慢慢地走上了首要的位置。腊斯克是一个具有巨大克制能力、轻易不露声色的人，他的野心掩盖得很严密。他不象邦迪或麦克纳马拉之流那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野心，但他的野心也是一样存在着。他以自己的隐蔽方式谨慎地和自觉地运动这个职位；通过权势集团的渠道，他发出几个谨慎小心的信号，表示他自己是愿意效劳的。他私下同鲍尔斯谈话，让鲍尔斯告诉肯尼迪兄弟，说腊斯克曾在斯卡斯代尔为他们出过力。虽然他在写作方面并不闻名，他却在对外关系协会的机关刊物《外交》季刊上登载过一篇文章，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很少见的行动，这个刊物是不大会拒绝刊登大基金会头头们写的文章的。这篇文章论及国务卿的任务，它在1960年春季刊出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它要求总统在对外事务方面作出种种决定，而要求国务卿减少出国旅行(没有一个国务卿象腊斯克后来旅行得那样广泛)。同样，也只是碰巧，腊斯克，一个主动关心的公民曾于1960年11月22日写信给已当选的总统，谈论选举人团的问

33

题，还谈到总统应当努力医治种族问题所造成的创伤（这封信开头就说，“作为一个诞生在乔治亚州的公民，他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裁决来得太迟了……”）。腊斯克没有签署过南方宣言，也没有一个奥沃尔·福伯斯来接替他在基金会的位置。的确，看来只不过有那么一点暗中活动，在腊斯克关于南方和选举人团的信到达的同一天，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杨德尔·埃利奥特（他同腊斯克一样和过去的共和党政府有密切关系）也来了一封信，参与推荐腊斯克：“我希望他〔指总统〕不要忽视这个可能性，就是把迪安·腊斯克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重要职务上吸引过来担任这个职位，这个职位不仅对下一届总统的成败，而且对美国在对付目前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成败，可能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迪安不仅在军事战略方面，而且在政治战略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

迪安·腊斯克就这样当上国务卿了。人们可以想象出整个过程。权势集团的贵族们团团坐着，考虑着这个职位的人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逐渐被排除掉了。大部分有名望的人年纪太老。年轻的总统似乎想要一个民主党人，这样就删掉了好多别的名字。而最后名列前茅的是迪安·腊斯克，一个名义上算是民主党的人（他当上基金会的职位与其说是得到洛克菲勒的赏识，还不如说得力于杜勒斯，是杜勒斯给他谋得这个职位的）。他熟

识军方，懂得战略，照章办事。于是，悄悄地形成了一个替腊斯克谋求职位的运动，他的条件是合适的：不太年轻，也不太老；一个民主党人，但也不太是；一个南方人，但也不太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也不太是；管过中国事务，但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事实上，关注中国事务的卢斯一伙人对他还有很好的评价。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

肯尼迪对腊斯克的审查是微乎其微的。有少数几次电话，一次是白宫班子里的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理查德·古德温打电话给一个曾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服役过的记者，当时的腊斯克上校也曾在这一广大地区里服役。腊斯克怎么样？嗯，他在那里被认为是一个好人，不象史迪威那样同英国人吵架，史迪威惹怒英国人的时候，他出来排解，但他不赞成英国人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他还有点讨女人欢喜的小名气。这位"新边疆"①人士说，"好极了，肯尼迪将会喜欢这个的。"这是有关迪安·腊斯克是个花花公子的绝无仅有的一次暗示。古德温问道，"关于中国的事怎么样，他有没有牵连进去？"这个记者回答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整到他头上。"这使古德温非常高兴。只是后来，在一个很不同的时期，他想起这件事时才恍然大悟，腊斯克能够平安度过这些年头而不为巨大事

34

① 肯尼迪上台后提出的施政纲领被称为"新边疆"政策。——译者

件所牵连，这本身就说明这里有问题。进入政府以前是一个神秘人物，在政府工作期间也是一个神秘人物（毫不足怪，论述他的最好一篇文章是在他第二次任职后期由米尔顿·维奥斯特写的，刊载在《绅士》杂志上，用的题目是《附带地说，迪安·腊斯克究竟是谁？》）。对腊斯克来说，幸亏肯尼迪一伙没有查核过他在1950年当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时的全部演讲，因为那可能使他们稍许有些震动。有一次讲话，即使是在那种特别严峻时刻的气氛中发表的，也是令人吃惊的，仿佛说中国—俄国侵略者的牙齿中正在滴下血来的样子。这篇演说可能会使冷静的肯尼迪犹豫不前，因为肯尼迪对狂热态度一向是反对的。

肯尼迪第一次召见腊斯克的时候，碰巧腊斯克正和鲍尔斯一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开会，这次会议是在威廉斯堡举行的。腊斯克递给鲍尔斯一张纸条问道，“你认为他要找我去谈什么？”

鲍尔斯写道，“他将请你去当国务卿。”

第二天，腊斯克和肯尼迪会晤后打电话给鲍尔斯。

鲍尔斯问，“事情进行得如何？”

腊斯克说，“忘了它罢。我们话不投机。要是他真的有过要我当国务卿的念头，现在是不会有了。我们两个人彼此谈不来。这件事算完了。”

鲍尔斯说，“我看不致于吧。”

他们两个人说的都对。

肯尼迪要腊斯克当国务卿以后，唯一使腊斯克对就任这个职位犹豫不决的是经济上的考虑。他不象大多数权势集团的优秀人选，自己没有多少财产，既没有得到过遗产，也没有由于在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工作而每年得到六位数字的收入。（由于在政府中任职而引起的经济负担，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有些人，如麦克纳马拉的副手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虽然在纽约的事务所并不缺少财源，但在每次任职期间都严格限制花在华盛顿的时间。在吉尔帕特里克的具体事例中，问题在于两次以前的婚姻所造成的巨额赡养费。）腊斯克刚在里弗台尔买了一所新房子，他向艾夫里尔·哈里曼提起这个问题，虽然哈里曼个人从未面临过这种情景，他嘱咐腊斯克不要发愁。他说，“老弟，看在上帝面上，当你离开国务院的时候，各种各样好差使都会找到你门上来的，你会发财的。”但是罗维特了解这个经济问题，也了解腊斯克有限的家财，他很快出来帮腊斯克的忙。他说，鉴于腊斯克由于离开基金会而放弃已有的养老金权利，他理应取得某种退职津贴。一项非常慷慨的解决办法因此得以实现，由于权势集团的关系和资助，腊斯克很快就到华盛顿赴任去了。

35

当腊斯克听说切斯特·鲍尔斯将任他的副国务卿的时候，他一再表示听到这个消息使他多么高兴。他说，他

们之间将有一个象马歇尔—罗维特一样的关系——腊斯克将是那位老人家，鲍尔斯将是罗维特。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因为，尽管切斯特·鲍尔斯今生今世有不少毛病，但是很少会有人指责他在风度上、思想上或观点上同罗维特有任何相象之处。这样，丝毫也不奇怪，腊斯克—鲍尔斯关系从未建立起来。腊斯克是在一个话不投机的总统下面工作，而在一个使总统感到不安的副国务卿上面工作，这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同另外两个人合拍。当腊斯克同鲍尔斯交换意见的时候，那也并不总是愉快的(1962年鲍尔斯从东南亚回来，建议越南中立化，腊斯克甚为惊讶，对他说，“你当然了解，你是在背诵共产党的提法。”)。结局很坏，鲍尔斯被赶出国务院，蒙受了不少耻辱。在此之前，一次要赶跑他的企图没有成功，另一次被鲍尔斯自己制止了，这使得他的死对头之一约瑟夫·艾尔索普大为恼火。艾尔索普在他的专栏中说，这证明鲍尔斯是一个没有种的人，因为他被人辞退了，自己还不知道。第二次要赶走他的企图发生在1961年末国务院改组的时候，后来以“感恩节大屠杀”著称，这次稍为有些成功，然而同样弄得很糟。腊斯克告诉鲍尔斯说，他很不愿干这件事，但肯尼迪在背后坚持，而肯尼迪则告诉鲍尔斯说，他很不愿干这件事，是腊斯克在背后坚持。鲍尔斯被调到白宫去担任一个没有意义的职务。最后第二次出任印度大使，在肯尼迪一帮人看来，这对他是一个理想的

职位，因为他能倾听印度人的话，而印度人也能听他的。他再一次工作得很出色。当他在1969年退休的时候，一些老朋友和政敌们聚集在国务院给他送别。迪安·腊斯克最后为他祝酒，发表了一篇非常优美的祝辞，谈到鲍尔斯永远朝气蓬勃，头脑清醒，一天里的主意要比大多数人一年还多。

对任何别人都是光辉灿烂的肯尼迪年代，对腊斯克却是一个相当痛苦的时期；在所有高级官员中，他同肯尼迪最不合拍。他们之间没有亲密关系；不象对其他高级官员那样，肯尼迪称呼他的姓，从不叫他的名字。华盛顿的谣言制造专家们以他们自己特有的雷达察觉到这些微小的差别，很快就以他为对象。他们宣称腊斯克将要下台，这种谣传由于肯尼迪自己表示对国务卿有所怀疑的私下谈话而更加流行。甚至在今天，那一时期的照片仍旧表现出那种不和谐的情况：肯尼迪一帮人彬彬有礼地站着，等候外宾，都那么年轻和衣着华丽，而腊斯克——令人吃惊地高大——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却显得那么寒怆、年老和劳累不堪，看起来象是前任政府的代表，或者简直就象是这一群人的陪伴。腊斯克还带着点自豪的情绪，自嘲说，他很象附近酒吧间的侍役。他知道乔治敦深深地刺痛了他，他配不上，而有时，当他远离华盛顿出去旅行而感到轻松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平民主义就会涌上心头，痛恨那乔治敦的优雅世界，痛恨那些连社论

36

版和社交版之间的差别都不懂的专栏作家、著作家和漂亮女人以及所有那些靠破坏别人名誉为职业的人们。也还有其他更为微妙的迹象：肯尼迪的妻子给吉尔帕特里克的一封亲密的、优雅的信中，感谢他送给她的一本有许多美丽诗章的书，而取笑说，这样一个具有难能可贵的深情厚意的礼物，决不可能来自"安东尼奥·塞莱布雷兹①或迪安·腊斯克"。

肯尼迪和腊斯克的关系由于更严重的原因而无法搞好。腊斯克一向通过正规途径和照章办事，他同肯尼迪的随随便便和故意杂乱无章的办法始终不能协调，他对世界的看法要比肯尼迪拘泥得多。几乎在每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罗维特警告过肯尼迪所不应该有的关系。几年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肯尼迪一帮中有许多人把腊斯克看成是一个象征性人物，看成是肯尼迪理想的背叛者，正是那些赞扬过肯尼迪选择国务卿的过程如何英明的人，现在转而攻击腊斯克。这不能责怪别人，只能责怪总统自己，而那些赞同挑选一个软弱的国务卿的人则如愿以偿和咎由自取。这些年头将表明，在美国的制度下，当政府中出现使用武力的问题时，那些主

---

① 安东尼·塞莱布雷兹（Anthony Celebrezze,1910—），1962年被肯尼迪任命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在这以前，曾四次连任克利夫兰市长。出生在意大利，故文内特将其名字"安东尼"戏称为意大利人名"安东尼奥"。——译者

张使用武力的人往往组织得比较好，看来人数比较多，似乎他们那边总是既有道理，又不必担心受到指责，而一个总统要在他自己的政府中对付这些人，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一个强有力的国务卿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自由派人士失掉了政府中这个重要职位。他们当然永远不能承认这一点。相反，这个时代的主要作品是自由派写的(施莱辛格、索伦森)，而其中并没有提到肯尼迪如何巧妙地操纵自由派人士而移向中间，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不愿承认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企图把肯尼迪政府看成他们所希望的政府，部分地也由于企图在历史上声称肯尼迪是一个自由派。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时期的自由派中最接近于承认这一点的东西可以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一部名叫《胜利》的小说里找到，这里面描写一个以迪安·腊斯克为蓝本的角色沃思·坎贝尔，作者写道：

37

当民主党人重新执政的时候，他的老朋友们提到他，说他是一个应该起用的人。他可以起一种很少为自由派政府所了解的作用。这些自由派政府需要起用自由派人士来负责国内任务——即使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人也不能当劳工部长或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然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就必须有一个能取得信任的人。这一点自由派人士是办不到的。除非他们刚就职时就在冷战中采取一种特别强硬的立场以便减少人们的怀疑，否则，他们都将被怀疑为有姑息共产党人的倾向，不管这种怀疑如何

主观。最微小的和解姿态都会证实这种不信任。因此，自由派的政府必须起用保守派人，或最好是起用无政治倾向的专家，来负责对外政策。于是，他们就需要象沃思·坎贝尔那样的人……

第 四 章
肯尼迪时代的新人

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他们几乎飞也似地登上 38
了岗位，他们有着充分的准备，充满了活力，发挥着他们的风格和他们的信心——他们将把这个国家重新推动起来。人们感到，这些人是异常聪明的人，有力的人，并不残酷，也并不苛刻，却是实干而不甘于等待的人。时不我待，时间不容虚度；如果我们再等待下去，历史就会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人人都要去华盛顿，在东海岸、在大学里、在政治俱乐部里，很快地流传说，最优秀的人都正在去华盛顿。在那里，将会有成就，也会有欢乐。任务在向他们挑战，他们也毫不怀疑自己有应付这个挑战的能力。甚至约翰·肯尼迪竞选中的引语也似乎以此为主题。肯尼迪那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市镇里奔走，在每次竞选演说的结尾，一再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①的诗句："我有许多诺言要遵守……在我睡觉之前还有许多里路要走……在我睡觉之前还有许多里路要走。"历史向他们召唤，也

①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美国诗人，四次获得帕利策诗歌奖金，著有《理性的假面剧》等。——译者

向我们召唤：不能再虚度时光了。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奥林匹克竞赛会的时代，脑力和智慧同巨大力量相结合，以便更好地确定一个共同目标。罗伯特·弗罗斯特感到了这一点；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他曾偶尔到白宫抱怨缺乏领导。在新总统就职的时候，他说，一个伟大的、新的优美文化的时代正在降临，虽然他也鼓动新总统要更多地发挥他的爱尔兰人性格而不是哈佛大学的性格（他没有体会到哈佛
39 大学能够产生优秀的、新的一代具有进取性的决策人）。现在看来仿佛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种席卷全国或至少是全国知识界的激动心情，那种认为美国将发生变化的感觉，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疲沓、软弱无能的市侩心理状态中转移到了一代人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手里。

艾森豪威尔当时的声望已经下降到无可再低的地步。全国曾在他上台之初感到安心，从他的从容不迫中感到宽慰，在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结束后更满足于这样一个以父亲姿态出现的人物，但现在却动荡不安。詹姆斯·赖斯顿在艾森豪威尔当政的最后一年，曾在《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反映了对他的不满情绪。赖斯顿在一篇算命先生访问记中问过："谁会在大选中胜利？"算命先生回答说，肯尼迪会当选，因为"本世纪每个总统的名字都有一个重复的字母。例如威廉·麦金莱总统的威廉一

字有两个 L，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名字有两个 O；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沃伦·哈定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赫伯特·胡佛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自然还有哈里·杜鲁门总统都是这样。”

“艾森豪威尔怎么样呢？他不也是总统吗？”

算命先生说：“这还要等待历史作出判断。”

高尔夫球久已用来标志艾森豪威尔年代——打球的人是一批软弱无能、大腹便便、百无聊赖的人们，在富人黑田园俱乐部的球场上，由富商作伴，由白发苍苍、恭顺的人侍候。（虽然有关约翰·肯尼迪怎样行动、构思、阅读、信仰和喜爱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已由公众详细描绘和考察；但新总统是一个卓越的高尔夫球手，球艺还远胜过下台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件事却很少为人知道，而且是故意地不让人知道的。）

与此相反，新人们都是强悍的人——“硬骨头的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往往用作对他们的称呼，这也是他们自己选定的对自己的描绘。他们有优良的作战纪录；他们喜欢指出自己是打过仗的一代，是连长级的人物，曾受过战火的考验，也体验过失去战友的苦痛。这些作战纪录为他们完成新的任务提供了特殊准备，这是连长代替将军，而即使在这方面也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其实，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神话。吹嘘战功的说法是沃尔特·罗斯托（邦迪的副手）提出来的。但是很典型的是，

他自己就没有当过连长——他干的是在欧洲选择轰炸的目标。肯尼迪政府中有些人物确实当过连长，但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并没有多少决定权。腊斯克曾在军队服务过，是个校级参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陆军部搞统计工作的半文职人员。麦乔治·邦迪是他家世交的一个海军上将的助理，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约翰·麦康，在造船业赚了百万家财。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高级人物中，只有肯尼迪总统有过出色的作战纪录。但是，他们的形象
40 是年富力强，他们打网球和手球以保持健壮的体格，他们写书并因此获奖（肯尼迪总统甚至获得帕利策奖金），他们攀登高山以舒畅心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阅读诗篇，据说有些人还能背诵诗句。

我们天天读到有关他们的报道，这些新人，一个比一个更加聪明能干。他们不仅第一套班子全由名角组成，甚至连第二套班子也全部是名角。人们计算肯尼迪政府中有多少人得过罗德斯奖学金，新政权的成员写过多少本书，甚至连邮政总长爱德华·戴伊也写过一本小说，虽然并不高明。就是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的人来说，也有一种好象自己也参加了的感觉，人们细心阅读主要报纸的社交新闻，以便了解哪些人参加哪些鸡尾酒会和晚宴。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些人并不经常出席鸡尾酒会。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参加酒会，参与那种无聊的闲谈。而且，那里局外人太多了，他们宁愿参加

自己圈子里的晚会，稍微喝些好酒，而不是过量的烈酒。在这种场合人们的聪明机灵的对话，谁对谁说过些什么，都有所报道。

肯尼迪总统本人当然是具有最大魅力的目标，人们渴望了解他读些什么书，吃什么东西，他和杰奎琳到哪里去的详细情况；所有这些都是新闻，而且决定着种种风气的开始和结束。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多少带一些不耐烦的心情写过：

他不仅仅是最漂亮的、穿着最讲究的、口齿最清楚的、象小羚羊那样优雅的人。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能够在几分钟内吞咽和消化整整一本书；他的眼睛一下子就能抓住冗长文件的要点，他有比专家更专门的知识而使专家们羞愧。他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人；没有一个想打瞌睡的属员敢于肯定他不会来电话或者突然出现；每个宴会的女主人都可以希望他会突然光临。他是一个万能的人，亲自指挥和监督整个班子进行工作；他并不需要艾森豪威尔式的参谋机构；他比狮子更勇猛，比狐狸更机灵。他简直是个超人！

麦克纳马拉，邦迪（他在哈佛大学时期对校长普西来说，是权力太大了），罗斯托，阿瑟·施莱辛格，萨金特·施赖弗①。还需要一个得克萨斯人吗？每个见过比尔·

① 萨金特·施赖弗（Sargent Shriver, 1915—），肯尼迪的妹夫，肯任总统期间，施任美国和平队队长。——译者

莫耶斯①的人都有深刻印象——这是一个肯尼迪式的得克萨斯人，在他身上也许有过多的牧师气，但是，那会改的。还需要一位将军吗？他们已经有马克斯韦尔·泰勒，这是一个好将军，一个军人政治家，一个喜欢读书甚至写过一本书的知识分子。他们说，泰勒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是因为反对古老过时的国防政策而辞职的；但他们的说法不对。泰勒并没有辞职，他做完整整四年才退休，退休后才写成他的著作。但是，这本书立论这样尖锐，以致看来他好象是辞职的。这个细微而又重要的区别当时没有引人注意。不管怎样，泰勒是肯尼迪一伙的将军。如果哈佛培养将军的话，它会培养出马克斯韦尔·泰勒。

这是一个时代同人物异乎寻常的汇合，许多知情人
41 引证过林登·约翰逊第一次出席内阁会议时对新人们的反应。约翰逊这样的局外人和我们一样，对新人们怀有某些敬畏心情，这是并不奇怪的；新人们甚至忘记请他出席会议，只是在最后一分钟，当其他的人已经来到的时候，才有人想起了这位副总统，慌忙打电话找他出席。新人都是这样有魅力和聪明的人，很难说哪个最聪明，但是，最使约翰逊有深刻印象的是“来自福特公司、头上抹着头发油的人”。来自福特公司、头上抹着头发油的人！这真

① 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 1934—)，曾任美国和平队副队长。——译者

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因为这句话本身再次描绘出约翰逊尽管是副总统，却更象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一部分，而不象是肯尼迪时代的人。约翰逊的好朋友萨姆·雷伯恩①对约翰逊如此倾倒于新人们的反应，却没有象上面那句话那样在华盛顿广为引述（这很可惜，因为雷伯恩的评论具有远为更多的预见性）。约翰逊被新人们的魅力和才智弄得晕头转向，匆忙回去告诉那伟大而狡猾的老师雷伯恩，每个新人如何聪明，既有来自哈佛的邦迪，又有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腊斯克，又有来自福特的麦克纳马拉。约翰逊滔滔不绝，一个一个地点着新人们的名字。雷伯恩回答说："是啊，林登，你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他们也许每点都象你说的那样聪明，但是，如果他们中间哪怕只有一个人参加过县长竞选的话，我也会对他们放心得多。"

新人们带来了那种美国历来重视优秀分子的令人振奋的感觉。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被召集起来，利用美国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作为动力，把一种新的坚强而有活力的精神灌输到美国在世界事务方面的历史作用中去，这倒不一定是要在国内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而是要在世界各地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确定美国的

① 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1882—1961），美国民主党人，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曾三次任众议院议长。——译者

理想并赋以新的使命，赋予原已过分注意物质生活和安于现状的美国社会一个新的和更重大的任务，这本身就是卤莽的。（这种有关美国世纪的特殊的盲目自信久已失效和破灭之后，肯尼迪一帮人中有些人仍旧把它保留下来。1968年，对战争的恐惧情绪和尤金·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获胜，终于使罗伯特·肯尼迪从犹豫不决转变到宣布充当总统候选人，当时西奥多·索伦森为他写宣布参加竞选的演说稿，其中说过："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甚至也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且也关系到我们对这个行星的道义上领导的权利。"这句话简直吓坏了罗伯特·肯尼迪的所有年轻顾问们，他们感到这种语言反映出一种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我们卷入了越南。然而，尽管年轻顾问们反对这种提法，这句话仍旧在演说稿中保留了。）美国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强大而善良的角色。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此而激动。如果说肯尼迪在初期缺乏谦逊，那末有些知识分子却对美国和它潜在的力量有着一种更为谦虚和有限的感觉。沃尔特·罗斯托后来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年代的
42 猛进的、好斗的、开明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曾在1957年美国学者的一次特别座谈会上首先提出，应该要有美国的民族利益。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罗斯托发言后，平静地提醒说，罗斯托的建议中很大一部分包含着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他看来就是外交政策中的好战主

义(罗斯托的想法是,美国对世界的看法跟不上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的力量,跟不上美国控制世界的力量)。里斯曼说,美国过去的内战"早已预示我们美国的好战与固执";他认为,需要对美国社会和它在一个多样性世界中的潜在作用采取比较谦虚的看法,要承认美国文化在美国是失败的,要承认美国生活在质的方面是失败的,要认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那些辉煌的统计数字并不足以表明全部的美国生活。他总感到美国严重地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他提到"在他看来几乎是一种麻木不仁、缺乏人性",他说:"当我看法国或意大利电影的时候,电影上的面孔似乎都比同样的美国影片的人物更有生气和更有表情。最富有的人也许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不快活的。他们的面孔通常都是阴沉、恐惧和疑虑重重。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按国际标准来说都是属于最富的人,连普通职员和很多产业工人,据我看来也好象并不快活,仿佛在天国中仍然不安。"

这次谈话并不是里斯曼最后一次预言。1961 年,当肯尼迪的班子准备就绪并对镇压叛乱的新理论具有巨大热情(罗斯托,这个 1957 年座谈会上里斯曼的对手,已经成为反游击战的巨大吹鼓手之一),而越南已被选为试验场的时候,里斯曼始终感到不安。1961 年年中,他同肯尼迪政府里的两位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共进午餐。谈到越南问题时,这两个人以标志着这个特殊时代的好斗精神

谈到有限战争，谈到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谈到美国进行有限战争的权利，谈到参加这场有限战争本身就如何令人振奋。所有这些都使人强烈地感到这个时代的傲慢和妄自尊大狂。里斯曼对这次谈话的语调和倾向越来越感到不安，最后他打断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到过犹他州。犹他州！他们说没有到过，但是为什么要提到犹他州呢，里斯曼曾经到过犹他州吗？里斯曼回答说，他也没有到过，但他读过许多有关摩门教①的书。他觉得他那两位朋友并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传教和救世的气质在美国多么根深蒂固。他说，“你们认为你们对有限战争很有办法，认为你们是同一个正在等候你们去领导的优秀分子的社会打交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越南并不是由哈佛大学和对外关系协会支配的东部优秀分子的社会。”

里斯曼午餐后同他们分手，对美国走向何处感到不
43 安。他热爱研究美国南北战争，他一向对由于美国南北战争而在这个国家里爆发的狂热感到不安；就在表面现象后面，隐藏着紧张和愤怒；社会依靠微弱的结构维持在一起，但却很容易破裂。他想，其实，这批人都是乡下佬。聪明的大西洋乡下佬。

那些对美国目的的必要性有所怀疑的知识分子，自

---

① 摩门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十九世纪曾盛行于美国犹他州。——译者

然不会从坎布里奇或纽黑文①赶来，就美国的国家政策问题表示他们对美国权力和目的的怀疑。因此，象里斯曼这样古典式的知识分子仍旧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而那些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的新人(一半属于学术界，一半属于美国的所谓思想武库和政策设计的人物）才会到华盛顿去。这些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权利和他们经验的质量。他们反映了慕尼黑以后和麦卡锡以后的时代的实用主义。极权主义必须制止，而极权主义只认得武力，因此必须准备使用武力。他们认为每次使用武力的决定都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深信共产主义者比这更坏，这也就使我们的卑鄙和粗暴手段都成为有理的了。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这个里斯曼的辩论对手，就是一个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创造了竞选中最妙的口号之一——“让我们把这个国家重新推动起来”——他现在已经安稳地坐在白宫里。肯尼迪曾经打算把他安排到国务院工作；但是，腊斯克已经接受了大部分肯尼迪派来的其他人，又安插了半数美国过去的民主党州长，这回可是断然拒绝了。腊斯克觉得罗斯托是个特别令人讨厌的人——一个说话噜苏、好谈理论而且还企图实现他的全部理论的人。因此，罗斯托被派到白宫，在麦乔治·

① 坎布里奇(Cambridge)和纽黑文(New Haven)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所在地。——译者

邦迪手下工作，当时邦迪已经占据一个比他自己原来设想的还要好的位置。

最初曾经有过一些谈论，说是邦迪将会在国务院工作，但他很快就推却了负责行政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的职位，说是他认为离开他在坎布里奇当院长的职务，而到华盛顿充当类似院长的角色，并不值得。肯尼迪于是请他当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但邦迪对这一行似乎并不十分熟悉，这个职位当时还不象麦克纳马拉年代那样会为之带来权力和威望（这部分是由于麦克纳马拉有意或无意地夺取国务卿权力的倾向，而腊斯克也让他这样做），邦迪谢绝了这个邀请。于是，他当上了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由于他的个性、他的智慧和他那巨大的、几乎残酷无情的追求权力的本能，他在六十年代末期建立了最初是与国务院竞争、后来是超过国务院影响的管辖范围。由于他最后得到了一个比
44 他曾经想得到的要好得多的职位，而他在肯尼迪竞选时并不如其他教授们那样积极，因此，尽管邦迪并不十分欣赏罗斯托，而且也象罗斯托的同事们一样对此人有某些怀疑，他还是很快地报答肯尼迪知遇之恩，而把罗斯托安插在白宫的班子里。邦迪自信能够在那里驾驭这个人。

邦迪心里毫无疑问认为自己的能力不仅能够应付罗斯托，不仅能够应付工作，而且能够应付整个世界。这个职位并不是偶然得来的，无论是从字面上讲也好，或从比

喻的意义上讲也好，他生来就适合于这个职位，如果说不担任这个职位的话，那也应该当国务卿。他是围绕着肯尼迪的闪闪发光的星座中最光辉醒目的一颗明星；如果在那些年月里有什么中心主题的话，如果那时候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些人、他们的追随者和助手们团结在一起的话，那就是相信纯粹的智慧和理性能够应付和解决一切。如果说这就是年轻总统肯尼迪的特性，那么没有一个人比邦迪更能体现这一特性，他在表面上仿佛是整整一代里最敏锐的才子，是全国智慧的宝库。甚至连肯尼迪谈到邦迪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敬畏心情：跟邦迪整天一起工作多么愉快，在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之前，他就能了解到你的需要。肯尼迪对邦迪的评价是："聪明智慧是万能的。"他既年轻又生气勃勃，除有智慧之外，还有风度。他是一个饱学之士，又是一个稳健的人。他虽然是一个共和党人，却支持肯尼迪竞选——难道还需要什么更好的保证来说明他将超越狭隘的党派观念而为国家服务，为那正确意义上的国家服务吗？他并不迷恋过去的神话，他只献身于在安定的世界里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美国。

邦迪是一个善于运用智慧的人，是不会由于狂热和感情冲动而使我们陷入困境的人。他是一个贵族，又是一个婆罗门①，但他比这些人更高明些，他并不为婆罗门

① 婆罗门（Brahmin），印度古代四大种姓中最高的一个，由僧侣们组成。——译者

世界所约束；他已经走出了这个闭塞的狭隘的圈子，以便在更大的范围中大显身手。他那镇静而清醒的头脑，久经磨练的智慧，数学家那样的卓越理解力，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那样的洞察力，都为人们钦佩。他在格罗顿学校读书时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在耶鲁大学时是一个最聪明的青年人，在早熟的年轻时代就当上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而且几乎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当内森·普西被选为校长的时候，古典学者约翰·芬利曾用拉丁文开玩笑地说："邦迪的光荣已成过去"）。邦迪在华盛顿工作的最初几年，似乎也证实了他是个传奇式人物。他处于事物的中心，经常出入于总统办公室（有人听见肯尼迪说过这样的话："该死的，麦，这件事我已经跟你整整争论了一个星期。"这就是权力——能够同总统争论整整一个星期）。他是肯尼迪喜欢的人，这是很清楚的。1962年当他被聘为耶鲁大学校长的时候（这个职位在别的时候可能对他具有诱惑力，但这次最后转给了他的密友金曼·布鲁斯特），肯尼迪简直是热情洋溢得无法形容，决不放他走。肯尼迪在一种罕有的感情流露下宣布，邦迪离开白宫的可能性根本不能考虑。

45 他是超脱个人利益的人，而其他人，包括政治家、劳工领袖和黑人领袖们却并不这样（1962年《星期六晚邮报》说过，"邦迪的责任感和他自己的教养是一致的）。同他的严肃工作作风相反，他在宴会席上被认为是有魅力、

兴致勃勃和谈笑风生的人；人们对职务上的邦迪和社交场合的邦迪之间的差异，感到十分惊讶。社交场合的邦迪几乎是无忧无虑、不着边际——如果说不够热情的话，至少也可以说是开朗的——而职务上的邦迪却完全是冷酷无情，只知道工作和督促工作；连微笑也是僵硬的，几乎是板着脸。当有些人办事不灵或者耽误了他的时间，他就不免要令人难堪，有时甚至近乎残忍，这个有钱的、聪明的小伙子叫不如他的人下不了台。邦迪曾对国务院一个高级官员挖苦地说："别那么哭哭啼啼！"这个官员回想自己的表现，发现他自己确实有点哭哭啼啼，但是这种使他难堪的作法并没有使他对邦迪有更多的好感。1961年国防部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发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一个作战计划，计划中说明他们将如何发动战争；更重要的是，他们小心地隐瞒了这个计划，不让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文职人员知道；埃尔斯伯格被上级派到白宫向邦迪汇报。埃尔斯伯格感到他发现这个计划的经过以及有关这个计划的保密几乎同计划本身一样重要，最初曾力图解释他怎么发现这个计划的。邦迪迅速地打断他的发言说："这究竟是一次汇报，还是一次坦白？"正是因为政府里许多其他人都经受过这样令人难堪的场面，几年之后当邦迪开始发生问题和威望下降的时候，许多人对此颇为高兴。他留下了大量的伤痕，远超过了他的原意。麦克纳马拉跟邦迪就不一样，他在下属

中保持着大得多的对他个人的忠诚。

然而，这些故事只是到后来才暴露出来；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被麦乔治·邦迪搞得下不了台，他自己是不会夸耀的。那会是一种处于局外的标志，因为邦迪如果说还不算是那些决定风向的人的唯一宠儿的话，至少也是宠儿之一，是一个已进入白宫并被沃尔特·李普曼推荐为国务卿的人。这就是说，他并不是国会和官僚机构的宠儿，他对它们采取一种冷淡的藐视态度；国会对他说来似乎并不存在，官僚机构对他说来好象是故意为了使人回避而存在的；他对朋友们说，他自己是一个正在站岗的交通警察，设法使人避开政府机构。然而，他在华盛顿主要是自由派的那部分人的宠儿；这些人决定华盛顿的调子，决定谁好谁坏，决定谁在圈子内谁在圈子外，决定什么合法和什么不合法，决定谁有权和谁没有权。他对新闻界的正确人物来说是可以接近的，例如与权势集团有联系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和约瑟夫·艾尔索普，或者有时仿佛是政府高级人员的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亨利·布兰登。这一小部分新闻界人物并不构成
46 新闻界本身的这一事实，并没有使邦迪感到不安，有些象代表全国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桑德·范诺柯等新来的新闻记者经常抱怨说，邦迪故意冷落象全国广播公司这样平民化机构的记者。（邦迪对新闻界的感情，对它的作用和价值的看法，也许最好用他写给皮埃尔·塞林格的

一张纸条来说明，当时皮埃尔·塞林格刚刚发表了一篇有关吴庭艳丧命的公告。这纸条上写道："皮埃尔，你算得了冠军！一篇绝妙的散文。毫无惊人之笔。公报就是应该什么也不说，既喂饱新闻界而又不欺骗他们。"后来，关于他究竟说的是"喂饱新闻界"还是"愚弄新闻界"，有过一些争论，但邦迪坚持他只想喂饱记者。）

象范诺柯和《圣路易邮报》很受人尊重的记者詹姆斯·迪金采访邦迪时，听到邦迪说："这真无聊"，他们对邦迪不会有任何好感；华盛顿许多人认为，邦迪在与人打交道中，优秀分子的神气太重了。但是，即使在这方面，邦迪也很成功，他是一个冷静的家伙，不让大部分新闻记者接近，然而在同一时候他的声望却不断上升。在邦迪处在顶峰的年代里，正在他开始倒霉之前，美国一个最好的政治问题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决定风向的人而且也是邦迪愿意与之交谈的一个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描写邦迪时说过：

我最想说的中心事实是，在战争和战后时期成熟起来而现在正在开始掌权的一代人中，邦迪是继承政治家衣钵的主要候选人，也许是唯一的候选人。他对错综复杂的难题的分析能力，对各种可能性权衡得失的能力，展开各种不同行动纲领的能力，表达和执行公众意愿的能力，使最有才能的人更加充满活力的能力，在我看来都是没有人能够比拟的。至少对我说来，他仿佛是当代人中独一无二的真正有份量的人，适合于米尔

顿①诗句的人：

他额上，镌刻着为公思虑的深纹，

面目间，也显有宏谋在方寸……

这当然是顶峰的时候。这段话写于1965年夏天，发表于同年冬天。这时候，越南战争正在加剧，权势集团的元老们已经失去控制能力。仅仅两年半以后，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后，权势集团的一些关键人物想寻找一个既为人敬重而又反对战争的人当候选人，最后把挑选范围缩小到尤金·麦卡锡或纳尔逊·洛克菲勒。他们决定把可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第一流名人列入一项重要名单，并开始把这些为人尊重的鸽派人物拿出来进行试探。最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是金曼·布鲁斯特，他是
47 邦迪最亲密的朋友，是耶鲁大学校长，是一个冷静而熟练的政客；一方面由于他同权势集团的联系，另一方面又由于权势集团的子弟也就是他的学生们的日益愤怒和反叛，他当时正处于两种相互冲突的巨大压力之下。布鲁斯特访问了麦卡锡竞选总部的一个高级人员，想了解他的想法能不能为人接受；此人告诉他说，这个想法看来可行，应该开始搞。布鲁斯特于是问起名单上应该有哪些人。那个麦卡锡竞选总部的人员说："喔，你的朋友麦乔治·邦迪如何？"

---

① 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诗人。文内所引诗句是其名著《失乐园》中的两句。——译者

布鲁斯特说："麦乔治将要用他的有生之年来为他在越南问题上的错误进行辩护。"

邦迪来自波士顿。世界上不是来自波士顿的人，都认为邦迪非常波士顿化，而且他的名字也十分波士顿化。其实，这并不正确。邦迪家族来自密执安州的大瀑布城，而邦迪这个名字本身在波士顿历史上并没有多大意义；波士顿有名的施里夫珠宝商店为此提供了佐证。1966年，当邦迪行将离开政府的时候，他的一群白宫助手决定送给他一件比传统的银烟灰盘稍许好一点的礼品，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搁在银盘上的银骰子，可以用来掷着决定外交政策。几家华盛顿的珠宝商都说做不了这个玩艺儿，但是由于他的助手大部分本来就来自坎布里奇，他们想起了施里夫珠宝店，其中一个人就被派去波士顿安排。这家珠宝店的一个庄重长者说，搁在银盘上的银骰子吗？行，他想是能够做的。但是银盘上刻什么名字呢？

白宫助手说："麦乔治·邦迪。"

"麦乔治·邦迪……麦乔治·邦迪……邦迪……哦，是的，他是不是跟玛丽·洛思罗普结婚的那个小伙子？"

就波士顿的标准来说，邦迪不算是邦迪家族中的一员，而算是洛厄尔家族的一员（邦迪的母亲来自洛厄尔家族。一个波士顿人说过，"邦迪的父亲是从密执安州的一个天晓得的地方来的"。邦迪的母亲凯瑟琳·邦迪也属于

普特南家族，按波士顿标准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家族，但她的家谱应该从洛厄尔家族方面来算，她家的那种决心和干劲也是从洛厄尔方面来的。洛厄尔家族是1639年移居美国的珀西瓦尔·洛厄尔的后裔，他繁殖了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以它的发明能力、精明、勤奋和成功著称于世，到十九世纪就控制了哈佛大学和新英格兰纺织厂。这些纺织厂的劳工问题经常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洛厄尔家族想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解决办法，就是雇用以后叫作洛厄尔纺织厂姑娘的女工。所有新英格兰的年轻美丽的乡村姑娘都来到纺织城，她们在纺织厂做工，作为受到监护、接受宗教训练和较好寓所的交换条件，这个解决办法同时满足了宗教和经济两方面的要求，真是一个加尔文
48 式改革的圆满结局。虽然这在当时被吹嘘为如何善良的一个好办法，甚至被当作外国人参观的一个橱窗，但是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而工资微薄。

巨大的财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这些财富使最初的一些大家族控制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致力于改革运动的牧师西奥多·帕克在谈到洛厄尔家族和其他大家族时写道："这个阶级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它主要制订这个州和这个国家的法律；使这些法律为他们服务……这个阶级能够象生产棉布一样容易地制造出适合于它的目的的州长、参议员和法官。这个阶级拥有社会机器……拥有轮船、工厂、商店和用水特

权。”这些家族对保护自己的地位很有办法，他们以捐赠大批款项给哈佛大学而著名，哈佛是他们的大学；但他们对公众教育很少出力，这也同样闻名。

约翰·艾默里·洛厄尔，即麦乔治·邦迪前四代的祖先，在他那个时代是波士顿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曾经挑选过不少于六个哈佛校长；他的儿子奥古斯塔斯·洛厄尔，曾把他得到的家产增加六、七倍，此外还抚养出即使按洛厄尔标准来说也是很突出的大家庭；他的大女儿艾米·洛厄尔是诗人，第二个儿子劳伦斯·洛厄尔是教育家，第三个儿子珀西瓦尔·洛厄尔是天文学家。第四个是女儿名叫伊丽莎白·洛厄尔，她与威廉·普特南结婚，生了凯瑟琳·劳伦斯·普特南，此人后来与哈维·霍利斯特·邦迪结婚。

劳伦斯·洛厄尔同他的表妹结婚，由于没有儿女，他宠爱的外甥女凯·普特南成为劳伦斯·洛厄尔家中有点象非正式的女主人。她是一个聪明活泼、专心致志和喜欢争论的女人。非常自以为是，知道自己的地位，也知道自己的家族传统由何而来以及将来往何处去；好表现为知识方面既有所继承而本身又有所成就的人；她的同时代的人认为她头脑敏锐，在谈话中善于以她自己为中心。她的女儿，邦迪的姐姐，波士顿一个律师的老婆，安德洛特·贝林夫人对记者米尔顿·维奥斯特说：“妈妈从来没有一分钟忘记了她是洛厄尔家族的一员。她是那些

相信社会有上中下三个阶级的人们中的一个，你当然会知道她属于哪个阶级。我们有时在这方面逗弄她，但在我们家里，大家都假定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去当公共汽车司机的。我妈妈采取的立场是，既然你有这样的传统，那为什么不利用它呢，我想我们也的确这样做了。”贝林夫人补充说：“我们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妈妈是我们当中吵闹得最厉害的一个人。对她说来，一切事情都黑白分明。这是直接从清教徒传下来的观点，我们都有这样的观点。但麦乔治在这方面的观点比我们其他人更加显著。”

哈维·霍利斯特·邦迪与她不同，他是一个温和的缄默的人。世纪协会，一个完全由高级绅士、主要是爱好
49 文学的白人和新教徒组成的纽约俱乐部，在一次年报上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庆祝选举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荣誉会员的情况。庆祝会进行得极为欢乐和激动人心。在会上发言的都是史汀生的朋友和同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戴维斯和哈维·邦迪。邦迪讲了一些关于这个部长战时在欧洲钓鳟鱼的故事，我们一些人听了这些故事互相交谈说，‘难道这就是被人称为“枯燥和僵硬”的邦迪吗？’”当然，在世纪协会那个兴奋的晚上，邦迪丝毫也不“枯燥和僵硬”，那天晚上头一回见到他的人认为他很和颜悦色。但是，一个长期了解他的世纪协会会员解释说，对那些想使哈维·邦迪在

原则上妥协或透露秘密的人们来说，他会表现得十分枯燥和僵硬。这个朋友说他象个“不在波士顿出生的波士顿人。他来自中西部，那些认为坚持原则是波士顿特有性格的人对他感到惊讶……”

哈维·邦迪1909年以极其优秀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取得全班第一名，这一成就使他被任命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①的法律办事员。他于1915年回到波士顿，他与洛厄尔的关系在这里对他当然没有害处。那时波士顿的一项重要行业就是为了避免缴税而把一些大家族的巨大财富转变成信托基金，哈维·邦迪成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律师。几年后，他也成为亨利·史汀生的密友和亲信；史汀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上校军衔后，喜欢别人称他为“史汀生上校”。史汀生和西奥多·罗斯福关系密切，1910年在罗斯福的鼓励下曾竞选纽约州长，但没有选上。由于塔夫特总统照顾罗斯福派，史汀生于1911年当过塔夫特的陆军部长，但在1912年两派分裂时，他继续忠于塔夫特。史汀生曾经严格地遵循西奥多·罗斯福的传统：一个掌权的贵族人物，自信不谋私利，自信超乎狭隘的党派利益，不屑追求财富。如果有人说这也意味着掌握和运用权力，

①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1902—1935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译者

他们这些人就会感到恼火，他们宁愿把自己的作用称做为人服务。其实，这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典型做法，许多巨大的富有家族从一个正在现代化的美国那种新的动荡不安的财产争夺中退了出来，他们既然已经赢得了财富，就转入政治舞台作为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他们被称为改革者，其实他们的改革是针对那些新来的财富追求者的，而不是针对已经拥有财富的人。（加里·威尔斯在《尼克松的斗争》中写过："第一代百万富翁送给了我们图书馆，第二代百万富翁把他们自己送给了我们。"）

哈维·邦迪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当史汀生担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的时候，他忠诚地当史汀生的助手。50 史汀生传记中说："想当副国务卿的并不乏人；但史汀生喜欢用的警句之一是，那些自己要求当副国务卿的人常常是些考虑'这个职务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的人，而他要找的是那些首先考虑'他们能为这个职务做些什么的人！'"史汀生的意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竞选总统时是个没有经过考验的人；公众对胡佛敌视使史汀生感到意外，他注意到"头脑清醒、有智慧和负责的人们"是站在胡佛一边的。他在那个时候写过："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种不想听取任何道理的情绪之中……他们希望来个变化，我想他们会得到变化的；但是如果他们得到变化的话，要不了一年他们就会成为地球上最虚弱的国家，除非我估计错误。"他的估计确实错误了，但是后来他见

到罗斯福，出乎意外地发现新总统是一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人。几年以后，当罗斯福做工作使美国对介入欧洲有所准备，正处于微妙过程的时候，由于史汀生是备战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罗斯福把他召回政府工作，担任陆军部长。（威廉·邦迪，即麦乔治·邦迪的哥哥，在谈到与史汀生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在我们家里，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名称是可以互相调换的。"这个评语其实不仅适用于他的一家，而且适用于整个时代。他本人在1964年由助理国防部长调任国务院与此相称的职务也证明了这一点。）

史汀生当陆军部长的时候，曾同认识二十五年以上的朋友、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一起工作过。诺克斯第一次在史汀生办公室出现时，带来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介绍信，信里写道："他正是我们这种人！"史汀生当陆军部长时，他的第一名助手是罗伯特·帕特森，继帕特森之后，他的助手是约翰·麦克洛埃、罗伯特·罗维特和哈维·邦迪。史汀生传记里说："这四个人当时都正是四五十岁的壮年时期，但他们都比史汀生年轻得多，因此对史汀生一向称姓而不叫名。这四个人在私人工作方面都很成功，其中三个人是律师，另一个是银行家，他们都因为到华盛顿工作而在经济方面作了很大牺牲。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政治上活跃过，也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强烈的政治野心。这四个人都是绝对正直的人，没有一个在工作中气量狭窄并把功劳归己。他们之中除了一个

人以外都是共和党人，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引起过党派的反对……”

史汀生对公共职务和权力的传统看法，关于备战和武力的哲学，对邦迪家族有深刻影响；直到今天，邦迪的桌子上仍然摆着史汀生的相片。战后，当史汀生决定出版他的回忆录并想找人帮忙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挑选了他的朋友哈维·邦迪的聪明而又雄心勃勃的儿子麦乔治·邦迪作为他在文字方面的助手；他们一起编写了史汀生的传记，名为《和平和战争中的积极服务》。

51 邦迪少年时代的环境同肯尼迪兄弟们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小孩成群，智力和体力竞赛很多，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进行剧烈的游戏，一种剧烈的橄球运动，由邦迪夫人带头。据他们家庭的朋友说，邦迪夫人当时似乎把希望集中在比麦乔治大两岁的威廉身上；事实上，麦的一些老朋友认为，麦正是由于童年时期与年纪较大而且多少更为被人喜爱的哥哥进行竞赛，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进取心和竞争性，他们觉得这两种性格相结合就造成了麦表面上沉着而内心却相当紧张。

麦乔治·邦迪生于1919年。他在格罗顿学校读书，这是全国最有名的预科学校，美国上层阶级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去灌输正统的价值标准，纪律、荣誉、对已有的价值标准及其正当性确信无疑。与此同时，正是在这个学校里，学生开始认识适当的人，建立起以后在华尔街或

华盛顿都有用的关系；在格罗顿学校首先要学习社会行动准则，甚至也要学习一种特殊的语言，譬如说，什么叫“要得”，什么叫“要不得”。1967年，作家约翰·马昆德（波士顿贵族编年史作者的儿子）和其他人一起，在《玛塞文尼亚日报》上登了一个广告，抗议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在国会的证词，卡曾巴赫在国会说，根据东京湾决议总统可以做他想做的事。邦迪当时正在玛塞文尼亚岛上度周末，他问马昆德说，干什么，约翰，干什么要破坏莉迪·卡曾巴赫的暑期生活呢？马昆德回答说，“哼，她的丈夫还破坏了我整整一年的生活呢。”邦迪看着他，微微笑着，说道：“要不得呀，约翰，这简直是要不得。”格罗顿学校的座右铭是：“服务就是统治”。学校的公开教导是，最美好的生活是为上帝、为你们的家庭和为你们的国家服务；但是，远为微妙和阴险隐蔽的教导就有些不同：归根到底，力量更为重要；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也存在着所谓特权，你最好还是利用它。这就是真正的世界，而且世界还会象这样继续下去，因此你最好也对此有所习惯。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反叛，但只能在已有规定的准则之下进行反叛。格罗顿是一个很少收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和美籍外国人的学校，它的真实价值标准反映了有些学生称之为“肌肉基督教”① 的信仰。

① “肌肉基督教”（“a Muscular Christianity”），指尊重人生的俗事和动物性格而不反对无害的享乐的教义。——译者

邦迪不消说是属于这种信仰的一部分，他一向接受由于他的有利条件而产生的特权，也许在里面小心谨慎地作些改变(但永远不会改变得过分，以免被人认为是一个象改革家那样的怪物)，但仍然接受这种信仰，这使一些局外人多少有些疑惑。如果他真正是那样一个平等主义者的话，他在那些俱乐部里又干些什么呢？例如，在耶鲁大学，当他的朋友金曼·布鲁斯特拒绝参加秘密组织的时候，邦迪却参加了(当然是最优秀的)“骷髅和骸骨”俱乐部；后来在华盛顿，他同样地拒绝了朋友们的要求，没有退出大都会俱乐部，1961年有关这个组织的会员问题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十年以后这个组织也不见得更加符合平等主义。

52

邦迪在格罗顿时是个传奇式人物，以后无论他到那里去，也都是这样。他除了得到每个可能得到的荣誉之外，还曾经有可能成为学校橄榄球预备队的一个很好的四分卫——他在确定球赛战略方面非常出色——但是他认为当球队队员太花时间，因而改在俱乐部玩球。他是一个卓越的辩论家——当时进行辩论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他曾三次获得以老校友富兰克林·罗斯福命名的辩论奖。在格罗顿与邦迪同时的路易斯·奥琴克洛斯说过，邦迪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当学校的教务长。学校里最好的历史教员理查德·艾恩斯说过，甚至在那个时候，阅读邦迪的作文就会令人大吃一惊，因为邦迪的作文总

是比他用作参考的书籍还要写得好。流传过一个故事：教员吩咐一群杰出的学生准备一篇有关马尔巴勒公爵①的作文。第二天，邦迪被叫出来在班里宣读他的文章。当他开始宣读的时候，同学们就开始格格地笑，一直笑到他读完了这篇十分完美的文章为止。教员因这篇文章而高兴，但又因学生们傻笑而迷惑不解，后来他问一个学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学生说，“你不知道吗？他并没有准备。他是拿着一张白纸念的。”

邦迪十六岁在格罗顿毕业后——当然是获得最高荣誉，正如威廉在他以前那样——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他拒绝回答英文作文的两个任选试题：“你怎样度过暑假？”和“我的爱物”。他另外写了一篇作文，批评试题毫无意义，批评学校招生人员在今日世界中的美国人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大问题时居然选择了这样愚蠢和不相干的题目。第一个阅卷人看了这篇作文，对他的狂妄感到不满，给他打了个不及格。由于这个英文分数和邦迪在其他各科的成绩之间有这样难以置信的差别，第二个阅卷人被请了来。他对邦迪的文章大为欣赏，自己也认为学院当局应该停止干这样无聊的事。第三个阅卷人，即英文系主任最后被请来评卷。看腻了关于爱物和度假文章

① 马尔巴勒公爵（The Duke of Marlborough，1650—1722），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十八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任英荷联军司令。——译者

的系主任，在邦迪的试卷上打了一百分。

他由格罗顿升到耶鲁大学，挑选耶鲁大学是不大符合传统的，因为波士顿人通常把他们的子弟从格罗顿送到哈佛大学；但邦迪一家决定在波士顿和格罗顿之后上耶鲁大学可能会更开阔些。大学新生到校时被召去开大会，院长在会上宣布这一班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全班有八百五十人，人数刚好适中；第二是，这一班有一个人是耶鲁大学新生入学考试以来获得三科满分的第一个人。这个人不消说正是邦迪。（邦迪三十年后提起这件事有些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这样做是很不合适的。我
53 不认为你应该这样来谈学生成绩，不管成绩好还是坏。"）他后来继续出人头地。他的格罗顿历史教员理查德·艾恩斯，考虑到邦迪和其他几个人可能出类拔萃而走在耶鲁大学普通课程的前面，为他们在耶鲁安排了一些高于一年级程度的特别课程。其中一门功课由有名的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讲授。邦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这篇创作使欧文大吃一惊，他后来对艾恩斯说，他认为耶鲁大学教员中没有两个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

邦迪是班上的演说家，同时又是《耶鲁每日新闻》的专栏作者；他拒绝象大部分青年人那样参加日报的录用考试，因为这太费时间。但是，由于他的特殊才能，他还是被允许为日报拟稿。他是法埃·贝塔·卡帕

荣誉学会①的成员。总之，他是校园里的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这么多的智慧同这么高贵的出身相结合，再加上那样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1940年耶鲁大学年刊中提到："本周内圣雄邦迪没有发表过演说。"他已经深深地卷入国际事务，是一个公开的对外干涉主义者——从他的背景、他的家庭与史汀生的关系来看，这并不奇怪。1940年，一批青年作家在一本名为《零点钟》的书里，讨论美国面临的威胁，邦迪以一种极端自信的风格——这种风格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教养以及灌注在他身上的价值标准的确信无疑——在这本书中写道："让我用一句话说明我的全部主张，我相信个人尊严、法治、尊重真理和一个好的上帝；这些信仰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这种信仰并不为阿道夫·希特勒所分享。"

邦迪从耶鲁大学转到哈佛大学，但并不是作为一个勤奋读书的研究生，而是一个精选的哈佛大学学者协会的初级会员，从而也是一个最最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个学会是他的舅公劳伦斯·洛厄尔拨资数百万元创办的。他对每个新会员说："要培养德行，谨防学者的陷阱。对前辈要彬彬有礼，他们探索到了你从而前进的起点；对后辈要尽力帮助，他们将由于你的辛劳而前进更远。你的

① 法埃·贝塔·卡帕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生荣誉学会中历史最老的组织，创立于1776年，大学优等生才能获得该会会员资格。——译者

目标应该是知识和智慧，而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名誉和声望。不要夺人之功，也不要对比你更为幸运的探索者有所妒忌……”这个学会在哈佛大学是一种特殊做法，可以使极有才华的人无需进行通常在攻读博士学位方面所必须进行的艰苦工作。除了其他意义之外，这意味着邦迪不是邦迪博士。不消说，任何人都能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很少人能当上学会的初级会员。事实上，他一生中几乎没有搞过严肃的学术工作。他参加过编写的两本重要书籍，一本是与史汀生合作写成的史汀生回忆录，另一本是他哥哥的岳父即迪安·艾奇逊的演说选集。史汀生传记是一本好的、严肃的书，也许比原意更
54 多地反映了优秀分子的观点，但这很难说是一个创作。在这个问题上，邦迪还有些敏感，最近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暗示这本有关史汀生的书并不十分了不起时，邦迪逐字逐句地引证了二十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对这本书的评论(以及邦迪所起的作用)。重要的是，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如此容易；在过去并没有什么文学成就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得到这样的工作，能够参与一位如此卓越的公仆的回忆录的写作。邦迪是一个聪明人，但他又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好的关系，因此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要比对他的同代人容易得多（象一个女孩那样，比其他聪明的女孩更漂亮，又比漂亮的女孩更聪明，这几乎是不公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学到的

智慧和受到的磨练，也要比其他人少一些。

邦迪在哈佛大学学会当初级会员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他唯一的一次竞选，他参与竞选的经历多少显示出，对于那些生来就有一定优先地位的人，人们是怎样为他们办事的。邦迪曾对一个记者说："亨利·沙特克当时是波士顿很有权势和很重要的人物，他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参加竞选他在波士顿市议会的席位。他对我说，对于有志于公职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办法。他向我保证，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因为过去除了共和党人以外，从来没有人赢得过选举；他保证能为我取得共和党选区委员会的支持。这是一个共和党很集中的地区，因此我同意参加竞选。我有一个对手，他进行了工作，而我什么也没有干，结果我被打败了，我也应该被打败。"邦迪从此不再竞选公职，也从此不再使自己接受公众的控制和监督。只是在此后很久，当他担任福特基金会领导人时，纽约学校罢课事件引起对基金会和对他本人的巨大压力，他才突然对记者和国会领袖表示友好和可予接见。

参加波士顿政治的这一经过，对邦迪政治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选举活动虽然往往是不完善的，有时是下流和堕落的，对缺乏骨气的人来说也许简直受不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发扬人性的巨大力量，特别是对强者，对那些已经取得优越条件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这些人能够设法克服选举中的陋俗和卑鄙的方面，而吸收——有时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吸收——一种对国家的感情，对国家的缺陷的一定的尊重乃至于爱好。深知约翰·肯尼迪的人感到，1960年西弗吉尼亚州预选以后，他变成了不同的人；同样，罗伯特·肯尼迪从指挥竞选运动转而自己成为候选人之后，也是一个起了变化的人。但邦迪却不干了，他转而在私人和优秀分子的意义上运用权
55 力，无视公众的压力。（意义深远的是，当他最后决定谈谈他在越南问题中的作用时，他是在对外关系协会谈的，谈话不准引用，而且也不许提问题。）

邦迪因参军而离开哈佛大学。他虽然因为视力不佳未被征兵局批准入伍，但他背诵了视力检查表，后来成为他家的朋友艾伦·柯克海军中将的助手。（邦迪1961年到白宫时，为少数几个人找了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柯克上将，柯克成为驻台湾大使；柯克的女婿彼得·索尔伯特成为威廉·邦迪在国防部的副手，柯克的儿子罗杰在威廉·邦迪手下，在国务院升了官。）在柯克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上，邦迪参加过有关大规模登陆日①的许多计划工作。邦迪的智慧和胆识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那些曾在舰上工作过的人说，他敢于在小问题上改正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的错误。轻浮无礼的态度自然有所表

① 指1944年6月6日美军在欧洲诺曼底登陆。——译者

现。1944年6月9日布雷德利离开军舰时，邦迪提醒这位将军说，当他走后，上尉邦迪将会再次成为“奥古斯塔”号军舰上最高级的陆军军官。

邦迪对陆军参谋工作感到坐不住，设法调到步兵部队，他接到命令参加入侵日本时，战争宣告结束了。复员后，有一个时期他参与了某些战后计划工作，这些计划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他还是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个政治分析员，也曾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纽约竞选参议员时为他写过演说稿，最后到哈佛大学当政府学讲师。他在哈佛时，还曾为中央情报局私下搜罗了一些工作人员。这也并不奇怪——他的哥哥威廉当时正在中央情报局，而艾伦·杜勒斯又是他家的好朋友——因为中央情报局需要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校园里找些既信奉肌肉基督教又有头脑，而又懂得社会行动准则的青年人去工作。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说的，在那些年代里，人们感到，邦迪其实并没有改换工作，而只不过是改变办公地点，仍旧为同样的人工作。

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五十年代，这段时期对他来说是一段快乐的时期。他在大学本科学生中非常得人心，很容易接近，毫不装腔作势；恰恰相反，他被认为是豪爽的和善于启发别人的人。在一个有时以专业的狭隘性著称的气氛里，邦迪却是一个见识较广，同整个世界有所接触的人，他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活力和生气。他喜欢与学生

比高低，同他们和他们的想法争辩，向他们挑战，彼此机智焕发，辩论本身几乎就是目的。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范围里，象卡尔·弗里德里克和威廉·杨德尔·埃利奥特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看来是如此遥远而不易接近，是更多地属于研究生而不属于大学本科学生的人；但邦迪却与他们不同。邦迪特别喜欢教大学一年级学生；他是政府学第一号课程的惊人的好教师；这是其他聪明的助教都很少愿意担任的工作，而他却尽可能长期担任一年级的课程。

56

邦迪主要担任大学本科政府学系一百八十号课程："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继他教这门课程的人，真是合适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名为亨利·基辛格），他以隆重的风格和极大的热情讲授这门功课。他的慕尼黑讲题在哈佛大学是传奇性的，一旦开课日期传出后，课堂里不但座无虚席，而且站满了人。他讲得有声有色，模拟参与慕尼黑会议的不同人物，在讲到小小捷克沦陷时，由于感情激动而声调嘶哑，讲到德国坦克滚滚而入时，恰好哈佛大学的纪念堂响起了钟声。结论自然是干涉主义和明智地使用武力。他当时已经开始公开主张使用武力，这在他后来自己参与其事的年代里是很重要的，这种主张当时在哈佛大学和其他东部大学的政府学系里都很时髦。人们称之为极端现实主义派。这一派的提倡者自信他们是强硬的，他们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认为必

须以武力作为外交的一项基本要素。强硬惹起强硬；既然斯大林在东欧采取强硬政策，西方就应该在一些别的地方强硬起来。共产主义者使我们的政策合理化；武力对付武力。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邦迪的朋友和同事，但更多地是史蒂文森的信徒，他后来回忆他和邦迪在哈佛和在政府工作的日子里经常就使用武力的问题进行争论，邦迪带着一些失望的口吻对加尔布雷思说："肯尼思，你总是建议不要使用武力，你认识到这一点吗？"加尔布雷思仔细想了想，认为邦迪说得对，加尔布雷思确实经常建议反对使用武力，认为使用武力而成功的机会很少。

邦迪虽然是一个好教师，但因为他没有经过学科上的专门培养，从正统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国际问题的大专家。他同读博士学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感到有点侷促不安，因为这些人可能在知识方面比他更专门。然而，他既然是政府学系的这样一个大名星，很快就决定必须酬以地位。这个想法提交到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那里，他在担任校长之前是化学系的名教授。科南特对签署这项推荐有些犹豫，因为邦迪看来从没有选读过政府学系的本科或研究生的任何课程。是不是这样？

政府学系的代表说："确实是这样。"

迷惑不解的科南特问道："你能肯定确实是这样吗？"

政府学系教授说："我敢肯定。"

57 科南特叹息说："好吧，我只能说，这种事在化学系是不可能发生的。"

邦迪在哈佛大学是一个真正深得人心的人。尽管有他那样的出身和传统，但他并不装腔作势，也不摆贵族血统的架子。如果说他并没有反叛自己的出身和传统的话，那么他也并不把它看得太重，他并没有依赖它。出身和传统为他提供了一些好处，而他确信出身和传统的可靠性和价值，并不予以夸耀。1953 年科南特离开哈佛担任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时，邦迪已三十四岁，盛传可能继任校长职务。如果在教员中有任何人可以当校长候选人的话，那当然是邦迪。但哈佛大学挑选了内森·普西当校长，因为哈佛当时正处于麦卡锡的猛烈攻击下，而选择一个来自中西部心脏地带的深信宗教的人，会使校友们比较放心。邦迪只当上院长，这件事使一个耶鲁大学同事写了一首打油诗：

漂亮小伙子麦乔治·邦迪，
耶鲁毕业是星期一。
竟然在下个星期天，
坐上了哈佛院长的交椅。

哈佛大学教职员们很快就不喜欢内森·马什·普西（当他写信给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亲爱的约

翰”为称呼时，加尔布雷思回信时就用“亲爱的马什”）。普西一到哈佛就宣布，他要办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哈佛大学神学院改建和现代化，这同世俗教职员所希望办的事，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教职员对普西的疑虑不久就象后来知识界对迪安·腊斯克的感觉一样，担心他虽有第一流的头脑，但太缺乏灵活性。普西是一个温和而小心谨慎的人，正如艾赛亚·伯林①所说的那样，好象一张修过版的相片；邦迪却是一个勇猛、聪明、急躁、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传统习惯的人。邦迪现在工作在他早期养成极端自信的场所，并生活在他非常熟习的环境里，似乎压倒了普西，普西仿佛宁愿退居邦迪把他挤到的幕后地位。但是，邦迪离开哈佛后，普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确定继任人选，有人听到他说，他想自己享受一会儿管理这个大学的乐趣。邦迪以他的独特风格，仿佛一言不发就贬低了普西的作用。许多年以后，1970年哈佛发生大动乱后，邦迪写过一篇有关哈佛大学的长文章，他在文章里七次对科南特表示敬意，而只有一次提到普西。对注意邦迪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文件；文章表明邦迪对普西的看法，正如他们一向所怀疑的一样。 58

即使根据十分苛刻的批评家的标准来看，邦迪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院长。这是一位鉴赏家的表演，目的在于

① 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英国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译者

尽可能打开大学之门，不顾官僚主义的通常限制，而为学校引进伟大人物。戴维·里斯曼（讲授社会科学）、埃里克·埃里克森（讲授精神病学）、劳德斯·怀利（讲授法国文化）都是邦迪不顾有关学系的反对而聘请来校的。例如他对罗曼斯语怀利教授的成就印象很深，因为怀利到中年时自己还努力重新学习人类文化学，接着与人合写了一本名叫《沃克卢斯一个村庄》的划时代著作。剧作家莉莲·赫尔曼，邦迪的好朋友，记起某夜在坎布里奇时邦迪忽然问她："你为什么不来这里教书？"

她说："哦，英文系不会要我的。"

邦迪说："咱们试试看。"他走了出去，大约一小时后打电话给她说："事情全定妥了。"

她表示反对地说："可是我不会教书。"

他答道："但你懂得如何写作。给他们一些实际的东西。教他们怎样从周围事物中吸取素材，用来写作。"

甚至经常是邦迪的一个标志的那种多少令人讨厌的脾气，也成为他的长处。他有能力实行不公道的办法，争取特殊的人才，给他们特殊的待遇；象里斯曼和埃里克森就不象其他教员教那么多课。贵族气较小和不那么狂妄自大的人，有较多公道感和较多危险感的人（令人想到腊斯克的名字，腊斯克绝不会破坏常规）也许不会这样做。邦迪领导了复杂的哈佛教师们——千差万别的和自负狂的人——并摆弄他们，按照一位批评家的用语是，好象猫

对老鼠那样。这种成绩，部分地归功于他的思想结构。他虽然不是一个读书不倦的人（有许多书籍人们设想他一定看过，但他并没有看过），但他极其善于在与人交谈中学习和吸收。他的思想的巨大技巧，在古典著作和数学方面的训练，使他能够看到和了解到其他人的智力活动过程是怎样进行的。人们认为他比坎布里奇的任何非科学家都能更好地了解科学家们的思想过程。他是一个机灵的、官僚机构的政客，了解自己周围的人，知道应该吹捧谁和不必吹捧谁。后来他的继承人富兰克林·福特往往对教职员作枯燥冗长、充满统计数字的报告，使教职员感到索然无味；而邦迪的报告内容虽少，却很巧妙，具有邦迪式风格。他运用一种有意少说一些的办法，以致人们感到，如果他的报告并不令人满意，那也是听讲人的毛病，而不是邦迪的过失。一个了解他的长处也了解他的弱点的朋友说："他是这样完美，当他离开哈佛时，我为哈佛而悲伤，也为国家而悲伤。为哈佛而悲伤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院长；为国家而悲伤是因为我想到这种同样的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可能非常危险。" 59

麦乔治·邦迪是一个好的忠实的共和党人（威廉是家里的民主党人），曾两次投票选举艾森豪威尔，但在五十年代，由阿瑟·施莱辛格充当主要中间人，开始与约翰·肯尼迪建立关系。邦迪和肯尼迪从一开始就相处得很好，两个人都是敏捷和聪明的人，两个人都讨厌被人厌烦

也不喜欢厌烦别人，认为厌烦别人几乎是人生最大罪恶。两个人都是理性主义者，一个是古老的波士顿婆罗门，另一个是新的爱尔兰婆罗门，双方都迫切地向对方表明，他们并不是直接反映他们的背景和政党的。一代以前，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大大超过共同点（哈维·邦迪和约瑟夫·肯尼迪意气相投的想法，用他们的用语来说，“简直要不得”），现在他们好象已经从过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对约瑟夫·肯尼迪说来，他的儿子同一个洛厄尔·邦迪家庭的儿子建立密切关系，正是他一向追求的成就。如果说肯尼迪和邦迪双方有很多共同点的话，约翰·肯尼迪仍然有某些有利之点。约翰·肯尼迪虽然是一个新式的婆罗门，但仍然是一个圈子外的人的后代，他了解社会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歧，了解历史书籍中从来没有谈到的有关美国的许多小事情。他比邦迪经历过远为更长和更艰苦的道路，他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并因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基地，而邦迪却没有个人的基地。如果邦迪要在美国的政策决定中发生作用的话，他就得投靠象肯尼迪那样的人。他必须体会肯尼迪的行动、爱好和脸色。邦迪能够不寻常地体会别人的需要和别人想些什么，这种能力后来对他很有用处。

邦迪因而参加了新政府。他踌躇满志地来到华盛顿，他是一个具有明确特点的人。一个奇特的讽刺是，在华盛顿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而在哈佛的心

目中，他是一个超级的行政人员，是个经常站在个人方面反对官僚主义的人。（虽然，最后在华盛顿，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中也有些人认识到他主要是个行政人员，是一个最高级的文件运转人。马克·拉斯金，一个曾在裁军方面一度替邦迪做过事而感到失望的人，说邦迪是“世界的文书员”。拉斯金是向极左派开门时被政府雇用的，但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他很早就离开了政府，尖锐批评政府的各种指示，写了大量批评政府的信和文件。邦迪命令他：“请勿自称前任白宫助手。”）邦迪是一个聪明而敏捷的人，但甚至这一点也使他周围的人感到不安。他们似乎感到邦迪缺乏深思熟虑，缺乏深度，倾向于从战术上、职能上和行动上观察事物，而不是象一个知识分子那样观察事物。他们认为邦迪的想法是两点之间始终有一条直线。邦迪所具有的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传统，不如说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传统，坚信自己的出身以至本人的一种自我肯定的信念，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超乎党派观念的。当艾奇逊在麦卡锡时期遭受攻击的时候，邦迪有一次说过：“在我生长的家庭里，美国国务卿不作为党派争论的题目。”权势集团的一条信念就是，它懂得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就邦迪来说，这一倾向特别强烈，仿佛他自己的才能和国家的才能整个融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公益和私利、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奇妙混合物；一方面是强烈的、有意识的道德礼仪

60

感，可以经常向人显示；另一方面却是凶猛地、几乎是赤裸裸地追求权力。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邦迪具有他的一个朋友称之为“好斗的道德观”。麦乔治·邦迪是特殊优秀分子的最完美的典型，他们是一批只在自己中间传授衣钵的人。他们相互联系而不是与国家联系，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是负责国家的，而不是对国家负责。

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并不反映全国舆论和它的变化。1964年和1965年，当马丁·路德·金开始公开发表演说批评战争的时候，整个权势集团就对他施加压力，不让他说话。他们向他担保说，他懂得民权法案，但并不了解外交政策；他不是外交政策的专家，而他们却是这方面的专家。马丁·路德·金直到去世的那天，对这种贬低他的压力还怀有怨恨，认为这事实上等于告诉他说，不管他有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金，有些事情并不是他份内的事。在政府里工作的其他一些人同样感觉到被排斥在外面。几年后，加尔布雷思回忆说：“我们这些为肯尼迪选举运动做过一些事情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在政府里是被容忍的，也有一些发言权，但外交政策仍旧是属于对外关系协会那些人的。我们知道，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什么东西，这主要是社会背景和某种教育的产物，他们并没有周游世界，他们对本国和整个世界都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一个反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但这毫无影响；他们有这种神话，这种神话还在

起作用，我们这些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古德温、施莱辛格、我自己和其他少数人，只不过是好象印第安人那样，偶尔从外边向营地射出几箭。”

邦迪身上的其他性格，从上面的第一种性格来看是不奇怪的事，那就是一种强硬路线的态度；这主要是五十年代和冷战的产物，也就是极端现实主义的看法。这种 61 态度有其好处，因为它使人比较不致于遭到右的方面的攻击，指责他对共产主义软弱，这就同时对付了国外的极权主义和国内的狂人。武力由于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而被认为合理；时代使得这些行动变得合理了，这些行动是正派人物所不屑采取的，但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却使得这些行动成为必要。这也就是邦迪的立场，既然已经接受了使用武力的原则，于是就把精力集中在具体行动的战术问题上。

邦迪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很快就成为肯尼迪政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邦迪的工作是：使文件能够流转，当决定即将作出时提醒总统考虑，偶尔安排总统接见一个能对他提出稍微不同意见的有前途的国务院的青年人，保卫着总统不致把他的时间消耗在不值得花费时间的人们身上，保证必须接见的人能够得到接见，迅速了解总统有什么爱好、需要和保留，使事情能经常运转。用他自己的字眼来说，就是一个交通警察。他干得很有风度，这种风度也表现在早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一般都表现得很出色，但这一次却由于缺乏可以公布的新闻而感到为难。有人建议，肯尼迪如果声明改变艾森豪威尔的最后决定——把海外美军眷属送回家——将会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但是，肯尼迪的这一决定还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层层通过，而象这样的事情通常要许多星期才能办成。正当其他人还在谈论这件事能不能办成的时候，邦迪打电话给财政部的道格拉斯·狄龙，然后与五角大楼通电话，再与国务院通电话，在电话里说："总统希望今天能够宣布……你有什么反对意见没有？"五分钟内他回来，这件事已经完全解决，办得十分漂亮。邦迪因而很忙，保护总统不致陷入官僚机构里面，尽他的力量减少官样文章。他超乎官僚机构的无聊的派别和意气斗争之上，当然是既不右也不左，而是超然的和现实主义的，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主要是一个维护现状的人。他所带来的变化和一些新的开端都很微小，主要是战术性的。例如，在裁军问题上他就没有起多大作用，他和腊斯克一样都靠边站了，国防部的约翰·麦克诺顿和麦克纳马拉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是非常重要的人，轻而易举地发挥作用。总统在会议中让他作总结，他仿佛心不在焉，根本没有注意，却能立刻提出最迅速最尖锐和最全面的总结。他也是个熟悉人头的人。人们经常需要找些人办事，而邦迪自然有名

单，能安排这个职务或那个委员会。邦迪知道什么人能参加工作，在左的或右的方面能走多远，什么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人是不能接受的。邦迪是撰写备忘录的了不起的能手，文笔流畅、简短和尖锐。后来公布的文件证 62
明，这些备忘录并不见得能使文学界倾倒，但在政府里善于写备忘录就是获得权力的一种很实在的形式。忽然之间每个人都在根据邦迪的备忘录而工作，他的备忘录指导着行动，也引导着总统究竟看些什么。举例来说，邦迪的朋友们认为，他扼杀了有关多边核力量的那个设想不周、命运不佳的计划；其办法是，首先收集关键性的论据，然后写个备忘录。这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决定，是按照邦迪的典型方式来完成的。邦迪从开始起就反对多边核力量，这个计划同他的清晰思想格格不入，当有关这一建议的论据到来的时候，他起初不动声色，然后派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纽斯塔特进行特别调查。他知道纽斯塔特是行动程序问题的专家，会被这计划吓坏，而纽斯塔特也确实如此。邦迪然后总结赞成和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意见，用一纸备忘录使这个计划仿佛中了一箭，就此告终。

国务院当然是既庞大又臃肿(艾奇逊喜欢对人说，国务院已经扩大了多少倍；他就任国务卿时访问了科德尔·赫尔，建议这位年高望重的绅士到国务院会见副国务卿。赫尔回答说："喔，迪安，如果我拒绝的话，你不会在意吧，

在人多的地方我从来不大习惯……”)。这种本身的周转不灵，加上腊斯克的谨小慎微，在这个官僚机构中不久就产生了问题。肯尼迪很快就对国务院不满意，邦迪感到这个真空，巧妙地予以填补。他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配备自己的优秀分子班子，建成一个由非常特殊的专家组成的小型国务院，保护总统少犯错误并向总统提出可供选择的答案。他们能够迅速地递送文件，而国务院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他们通过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非正式渠道，能够利用同情他们的朋友，从而在政府之内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内部机构。国务院毕竟经常在文件方面误时而只是回答一些事过境迁的问题。邦迪建立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班子，聪明的年轻人来自政府各部门和学术机构。他们包括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科默和切斯特·库珀，来自哈佛大学的卡尔·凯森，来自鲍尔斯班子的詹姆斯·汤姆森，以及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弗朗西斯·巴托。邦迪跟他们一起工作得很好，表现出在华盛顿少见的能力，按照汤姆森的说法是：“能够唤起蕴藏在一个人内部最优秀的东西，每次碰头都好象一次小型的哲学博士考试。”

邦迪力图隐瞒他对腊斯克的藐视，虽然这种情绪偶尔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据说腊斯克对他自己的意见保密得如此严格，以致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都无权知道。有时邦迪会谈到六个最高级的官员开会的故事。故

事说，腊斯克曾要求其他人都离开，以便他能够和总统谈话；当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总统问腊斯克究竟有什么话要说；腊斯克说："喔，如果房间里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人……"）腊斯克，这一批人中才华最少的人，尽可能地忍 63
受了这一切。他对这些有关他的故事尽可能装聋作哑，但愤怒和烦躁的情绪有时也不免流露出来。他有一次对古德温说："如果在白宫里有一个卡尔·凯森，就不值得当什么国务卿。"这里应该把邦迪的名字代替凯森的名字。

邦迪对有关他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影响的传说，当然毫不担心；他倒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传说，他知道这种传说会使名声越来越大，使他更加成为人人都要争取会见的要人。他爱好权力；他并不退缩，恰恰相反，伸长了手来抓权，有时几乎是赤裸裸地争夺权力；他知道他有这种争权的名声，这多少也使他不安，但他自己的本能促使他争夺下去。他在白宫里以顽强的内部斗士出名；在政府成立初期，施莱辛格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曾推荐邦迪的哈佛大学同事亨利·基辛格担任欧洲问题特别顾问，因为基辛格据说和德国人的关系很好，而德国人是经常需要抚慰的。有一个时期，基辛格经常从坎布里奇来到华盛顿，他当时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是不是要在白宫工作，但邦迪至少可以说并不鼓励他的访问。最后这种访问停止了。1969年当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长住华盛顿担任邦迪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时，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有

点名气的右翼分子理查德·艾伦博士将当他的助手。朋友们问他将怎样对待这位艾伦博士，艾伦当时已被认为多少是个好战分子(在那些日子里，基辛格没有被认为是好战分子)，基辛格回答说，“我将象麦乔治·邦迪对付我那样去对付他。”

对邦迪来说，早期的白宫年代是黄金年代。他在世界问题上大显身手，长期的梦想得以实现，对他有利的事就对国家有利。有些了解他的人感觉到，他虽然不是一个消极人物，但缺乏一些东西：他的想法和行动都太着重于具体事务，他没有考虑到恰当的长远的前景；他更多地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是一个不甘于等待而要求立刻行动的人。他经常对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实用主义的答案，他对哲学非常谨慎小心，几乎是过分地谨慎小心①。但是，实用主义的想法也就是短期的想法，而且往往是惊惶失措的想法。一个政府已在崩溃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把它撑住？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我们必须行动。因此，1965年，邦迪主张把美国投入多米尼加的大混乱中，因为总得要干点什么事，后来他理解到脱身已经成为问题的时候，又很巧妙地使我们从那里脱离了出来。只是在后来，他和他周围的人才学习到，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恰如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容易脱身。

---

① 1965年越南问题大辩论时，邦迪把较有哲学思想的乔治·鲍尔叫做“神学家”。——作者

第 五 章
猪湾和印度支那

对肯尼迪政府来说，1961年是困难重重的一年，尽管 64
他的新班子表现出一种新鲜气象，似乎大有希望。年轻的总统仅靠十万票的多数进入白宫，远非他所希望的那么多。大选没有反映出对他有很大的信任。从他得到的票数来说，与其说有利于他的朋友，还不如说有利于他的对手。因此他所接受的重新推动美国前进的使命就成问题了。美国可能在他的推动下前进，但是朝什么方向呢？并且他能用什么办法推动它前进呢？是制造更多和威力更大的导弹？改变不合理的对华政策？靠加速实现那些忽视已久的对美国黑人的承诺，把全国团结起来？他当上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和当选为总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现在他们都在等待，而在第一年很多人将会感到失望。他是第一个利用现代宣传工具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天天在电视屏上闪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他就成功地激发起千百万人们的希望。这完全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懂得电视，知道这是他的宣传工具并善于加以利用，但他这样做是付出代价的。千百万人注视着这个劲头十足

的、英俊的年轻人，相信他能改变情况，推动事物前进；在他当选后，他们的个人问题将会多少有些不同，会有所减轻和容易解决。作为总统，肯尼迪面临着每一个现代政治家所面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也许在当代美国最为突出，那就是现代生活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同传统政府机构的缓慢性之间的差距。这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表现在消
65 息和形象能够经过空中迅速出现在电视屏上，激起各种要求和欲望，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风俗习惯；而这个传统政府机构则是由另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法律所产生的，它被通常的官僚繁琐手续和传统的资历所束缚。总之，虽然他在竞选时曾说要重新推动美国前进，却没有提到人们必须容忍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霍华德·史密斯法官的保守主义；他只是表示他能够成功，美国将会前进。在很多方面，他比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都能跟得上时代和新事物，比任何其他著名人物要更多地运用新的竞选工具（他对参议院的传统权力斗争坦率地表示厌烦；参议院不是行动的地方，至少不是他所寻求的那种行动）。因此，当选后，他承担了对付官僚机构和议会的责任，而这个官僚机构和议会对他和他的计划抱有怀疑，这种怀疑的程度同他思想的新颖和进步是成正比的。他的第一次主要斗争，就是扩大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那个大战役，这也是两种力量的典型冲突，肯尼迪最后获胜。但他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它暴露了他在立法方面的基本弱点和党内

的分歧，正因为这样，他在国会中的敌人在反对他的时候受到了鼓舞。有一个教训在六十年代的早期阶段还不能马上察觉出来，但是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的社会的复杂性，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个教训就是用宣传工具来推动新的美国，要比对付那些反映旧秩序的既得利益和目前各种妥协的机构容易些。在这个新的、现代化、工业化和从人口组成方面来讲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中，那些来自南方小城镇的年纪很大的人控制着国会，这就是因循守旧势力的象征。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从个人方面和经济方面已经同现存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选举肯尼迪的那些人的敌人。肯尼迪就在这里被缠住了。

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肯尼迪政府上台时承担了更大的防务开支，并要结束导弹的差距；由于政府和苏联人相互试图估量对方，第一年将出现冷战的激化。从冷战的角度来看，1961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发生了4月的猪湾事件①，接着是军备竞赛的升级，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恐吓，老挝紧张局势的加剧，刚果动乱的爆发，有关柏林墙的几乎每天都有的冲突，关于越南可能发生麻烦的初步报告。所有这些使得工作的锐气遭到挫折。肯尼迪有一句话经常有人引用，他说就职时最使他吃惊的是一切果

① 指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入侵古巴的事件。——译者

真都象竞选时期所说的那样糟。肯尼迪另一句很少有人引用的话着重说明了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事件所带来的困
66 难；当肯尼迪听到白宫裁军问题专家卡尔·凯森报告说苏联人已恢复大气层核试验时，他的反应是直截了当的，表明了他当年的烦恼。他说了一句“他妈的，又上当了！”

所有的挫折同猪湾事件相比都显得次要了，猪湾事件在政府内外都是一次震动极大的事件。它将严重地扰乱肯尼迪政府头两年相对平稳的局面；迫使他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路线，以便向国内的批评者证明他的意志坚强不亚于任何人，同时也向俄国人证明，尽管有这次十分愚蠢的冒险，他不会手软，不会动摇。这个政府自信地几乎是得意洋洋地上了台，颇有一些进取性和战斗性的色彩，多少想要缓和一下世界紧张局势。现在却迫于形势，为了对内对外的原因，不得不变得好斗一些。只有在十八个月之后，肯尼迪政府已经深深地卷入越南时，它才恢复了一点它那早期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猪湾事件是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的先声。对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来说，两人都有他们的猪湾，肯尼迪的是四天，约翰逊的持续了四年。两者的组成部分都是一样的：对一个非白种民族的愿望有严重的误解；将西方白种人的反共主义带到一个不那么适用的地方；一些机构按照它们自己的惯性、想法和计划向前推进，并以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和推行这个机

构的事业；太多的机密和过多的专家，而那些专家对有关国家或本国的了解少得可怜；由政府中的幕后人物而不是前台人物作出的决定太多了；道义方面的考虑太少了。最后，太缺乏常识。看起来这样一个先进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个明显要失败的计划，同意一个情况不明就制订出来了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

当时有些人是反对这次入侵的，至少对此是感到不安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这些人后来反对对越南承担义务。其中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将军。在入侵古巴的谈论变得很时髦时，肖普将军用地图作了一次出色的说明。首先他拿一张古巴的轮廓图放在美国的地图上。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古巴并不是一个小岛，不象长岛那样。它约有八百哩长，可以从纽约一直延伸到芝加哥。然后他拿出另一张带有一个红点的轮廓纸，把它放在古巴地图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肖普说，“这个，先生们，表示塔拉瓦岛①的大小。”肖普曾因在那里作战而获得一枚勋章。他说，“我们花了三天和一万八千名海军陆战队才把它拿下来。”他最终成为肯尼迪最赏识的将军。 67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可能成为国务卿的人中间有两个知道这个计划并表示反对（第三个是史蒂文森，他不知道这个计划，但可以推断他是会反对的），他们两人都

① 塔拉瓦岛（Tarawa Is.），中太平洋吉尔伯特群岛中一小岛。——译者

是职业民主党人，对外交是懂得一些的。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都是前台人物，对公众有责任感，他们反对由那些幕后人物组织的秘密行动。这些人似乎对什么人都不负责任，只对自己的组织负责，而且就连这个责任也是如此秘密，以致要弄清它是否存在都是困难的。（在秘密组织里，一个下级人员的失败对他的上级也是不光彩的，所以他们双方都有把它掩盖起来的非常强烈的本能；只是在失败的消息公诸于世时，上级本人才承担责任。）鲍尔斯最后才知道这个计划，对此感到苦恼。他写信给腊斯克，建议他反对这项计划。鲍尔斯写道：

……对古巴行动计划最熟悉的那些人看来都认为，按照目前所计划的这个冒险，成功的机会不到三分之一。因此，它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如果失败了，卡斯特罗的威望和力量将要大大加强……我了解这次行动计划是经过好几个月才制定的。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很多人在感情上都盼望它能成功。然而，我们不应该单单因为卷了进去欲罢不能，就去进行这场冒险。

如果你同意这次行动将是一个错误，我建议你个人私下把你的观点报告总统。我想你的声音将是决定性的。

当上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是民主党人，是一个职业官员。他不同意这次入侵，但没有真正进行反对；他表示了怀疑，但不是真正强烈的反对。

回过头来看，问题的中心并不在于美国是不是应该为反卡斯特罗分子提供空军力量（空中的掩护只会延长和加深这场悲剧，并不能改变它的结果）；问题的中心是美国政府怎么会如此错误估计了古巴人民。即使古巴国内开始有了严重的反卡斯特罗情绪，没有比一次美国发起的入侵更能迅速地把普通的古巴人动员起来支持菲德尔的事业了。评论最多的是那些最小的错误，即战术方面的错误，空军力量的问题（使得美国在世界的心目中变成只关心延长这个严重政治错误，而不是痛快地立即予以了结）。正是这些最小的错误却被死扣住不放。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奉命去进行一次专门的检查，集中检查战术方面的缺点，例如在危地马拉集合的一个旅人数太少，空军驾驶员太少，准备好来替换指挥官的人太少，后备力量不足，对海洋图上没有标出的暗礁了解得太少。 68

但对于道义上有没有权利发动这次攻击却过问得太少了：反正共产党一直都是这样干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力量就是这样使用的。很多人认为失败是因为使用的力量太少（对总统来说这的确看来是个问题；在那些日子里右派嚷得很凶）。总统自己，可能在脑海深处已经开始对政府机构是否明智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教训，但是他的顾问们好象一无所获，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麦乔治·邦迪对他的朋友说，“是一块砖头扔进了窗户。”政府认为过错一部分是由于入侵的意见是来自艾

森豪威尔时期的旧人，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这样将加快这两个人的离职，意思是应该由更忠于总统的人来担任这些机构的领导，这样就可以使机构更肯尼迪化。邦迪似乎专心注意这次失败的战术方面的问题；在这次惨败后的第二天，当他同手下人员开会时，他看来很镇定。他告诉他们，猪湾事件说明格瓦拉比美国从危地马拉学到的东西更多(显然是指空军力量的重要性)。至于那个旅的成员(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分散在海滩上)，他说这些反革命分子很象哈佛大学的副教授，别人经常提醒他们有可能得不到继续任职的聘书，但是直到聘书真的不再发来以前，他们总是不会真正相信你的警告的。

事后，肯尼迪一帮人回想起来，没有比腊斯克的软弱表现更使人感到失望的了；肯尼迪和腊斯克都后悔腊斯克没有更明确地说出他的意见。但不久问题就很清楚，腊斯克的表现是同他的性格及其对工作的看法相符的；毕竟选中腊斯克并不是因为肯尼迪要一个强的人，而是因为他能成为一个低姿态的国务卿。这样，本来可望能够强烈反对这类军事冒险的声音，也就沉默了。另一方面，鲍尔斯和富布赖特的公开反对，对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好处。虽然富布赖特因此提高了他作为华盛顿国会中最主要的知识分子的声望，但这并没有使他同肯尼迪圈子里的人有所接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对目前在行政

部门中的人逐渐增长了怀疑。

鲍尔斯的情况要糟得多。不知怎么样传出说他曾经反对这次入侵。不久在华盛顿就传开了一个故事：罗伯特·肯尼迪一次散会后出来，用手指捅着鲍尔斯的肚子对他说，“你，鲍尔斯，是赞成这次入侵的，记住这点，你是赞成的，你们大家都是赞成的。”（这个故事也不是从鲍尔斯一帮人中传出来的。）猪湾的惨败看来表明鲍尔斯的无能为力并最后确定了他的下台。他很健谈，想做好事，他反对这次冒险的理由可能是错误的。他过于理想化，而肯尼迪那些人当然都是实用主义者。在政府初期的日子里，实用主义这个字眼用得很多，连戴维·布林克利在为一本早期描绘肯尼迪一帮人的书写序言时，也专门论述了这个词，并提到在一次早期的华盛顿鸡尾酒会上，有一个妇女走遍整个屋子向那里的一百来个人逐个询问，他是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69

在5月间，即猪湾事件后的一个月，各种教训可能已铭记心间的时候，这个以善于抓长远问题而不善于处理当前问题而闻名的鲍尔斯，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写下了一段对新政府最有预见性的分析：

对于这个新政府，我最关心的是究竟它对是非问题有没有真正的判断力。我知道我提出这点是提出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虽然如此，我感到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人，只要他在国内或国际政治道德的是

非方面富有判断力，在困难的时刻就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立即很清楚地知道该做些什么。缺乏这种道德信念或是非感，他不得不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思考；他权衡一个问题的利弊而得出一个结论。在正常情况下，当他不是疲劳和沮丧的时候，他的实用主义方法能够使他成功地取得问题的正确解决。

使我担心的是，这样一个人在疲劳、生气、沮丧和情绪受影响时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古巴的惨败表明，一个象肯尼迪那样聪明和用心良好的人，由于缺乏基本的道德观念会在歧途上走得多么远。

对鲍尔斯来说，事情不久就涉及他个人了。他进入政府时就有强大的仇人，有些在国会中，有些是盘踞在外交界里，还有一些在民主党的艾奇逊强硬路线一派中。在肯尼迪政府的头几个月，他的仇人并没有减少。他们中间还增加了罗伯特·肯尼迪——那些日子里他的确是一个最可怕的人，是政府的枪筒子。5月底发生了一件事，无疑促成了鲍尔斯的垮台。当总统和腊斯克都在欧洲同戴高乐一起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拉斐尔·特鲁希略将军遭暗杀而出现了危机。以罗伯特·肯尼迪为首也包括麦克纳马拉和其他几个人的一批人（由于腊斯克、肯尼迪和邦迪外出，他们就代表政府中最高级官员），要求美国立即进行干预，虽然干预是有限度的。他们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联系的对象，这些人保证可靠的多米尼加人会集合起来，挽救这个共和国。鲍尔斯，作为代理国务卿，坚

70

持反对干涉，因为他怀疑他们所要干的事的合法性。其余的人争论说，当机立断是最根本的。鲍尔斯却建议他们去多了解一下局势究竟是朝哪一个方向发展。这时候，罗伯特·肯尼迪以他在政府中的那副硬汉子、硬骨头架势对鲍尔斯进行了一连串的辱骂，说他是个没有种的王八蛋，使在场的某些人都感到吃惊。当天晚些时候，鲍尔斯同在巴黎的总统通电话，说明那些实干家想干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反对。肯尼迪同意反对的意见。

鲍尔斯说，“那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请你澄清一下谁是这里主持的人？”

总统说，“是你。”

鲍尔斯说，“好，是否可以请你把这一点向你弟弟说明一下？”

此外，国务院的工作也进行得不怎么顺利。猪湾事件后1961年春天的一次午宴上，邦迪对朋友们说，“国务院有必要作某些更动，而你又不能撤换国务卿。”他又说，“特别是如果仅仅在一次会见后你就用上了他。”这里指的是：如果你做了一个仓促的判断，你就不敢承认它是错的。到1961年7月初，腊斯克有点尴尬地向鲍尔斯提出让他担任巡回大使的工作，最好是离开华盛顿，巡回出去，并且承认这是肯尼迪的意思。几天以后，肯尼迪的亲近朋友查尔斯·巴特利特在他的供很多报纸登载的专栏文章中提到鲍尔斯就要离任了。鲍尔斯打电话给肯尼迪

要求一次会见。一场奇怪的对话发生了。肯尼迪开头说没有让鲍尔斯当国务卿恐怕是一个错误，如果让他当了，情况可能就会不同。然而腊斯克是国务卿，国务院还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政策，那就有必要作些变动。鲍尔斯是否喜欢到智利去？不，鲍尔斯不喜欢到智利去。至于谈到新的想法，他告诉肯尼迪，他花了很多时间提出过，但这些想法似乎从来没有越过腊斯克的办公桌。他们决定在几天后的7月17日会见。

这时候流言传遍华盛顿，说鲍尔斯即将离任。他已成为保守派最好的靶子，而自由派因为对肯尼迪政府的方向感到不安，也开始集合在鲍尔斯周围。肯尼迪政府的人格分裂症好象第一次表现出来。史蒂文森、沃尔特·路德①、"肥皂大王"威廉斯都动了起来，他们告诉鲍尔斯不能不进行斗争就离开。他已不由自主地成为政府中的一张反应试验纸。在7月17日会见时，他用关于古巴、中国和有关问题的备忘录武装起来，他带去的这些备忘录汇总了很多新的思想，远远超过肯尼迪政府所准备应付的。他告诉肯尼迪，他不打算去智利。那天晚一些的时候，新闻发布官皮埃尔·塞林格举行一次情况介绍会，他说，不，并没有预期鲍尔斯目前会辞职，但是他又加了一句，不供发表只供背景参考用，他预期鲍尔斯不会呆

71

① 沃尔特·路德(Walter Reuther, 1907—)，美国劳联-产联副主席。——译者

得很久了。

在肯尼迪圈子里还有其他人对政府的方向感到不安，特别是对猪湾事件中决定政策时所采用的方法。不久以后，新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①问总统，为什么他没有更广泛地征求意见，为什么他听取意见的范围如此狭窄，而且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可以预料到的。肯尼迪说，他并不是故意不客气，虽然戈德堡是一个好人，一个朋友，但是他是管劳工的，不是管外交政策的。

戈德堡回答说，“你错了，你犯了把你的内阁分隔开来的错误。这件事在内阁中有两个人你应该同他们商量，他们对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而且是忠于你和你的利益的。”

肯尼迪问，“是谁？”

“奥维尔·弗里曼和我。”

“为什么是奥维尔？”

“因为他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因为他曾作过水陆两栖的登陆，因为他知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登陆是多么艰苦。他本来是可以对你有所帮助的。”

“那为什么是你呢？”

“因为战争期间我在战略情报局，我是主管游击行动

---

① 劳工谈判人，他曾经受到肯尼迪一帮人的特别宠爱，他在许多劳工上层分子由于诈骗集团调查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而反对肯尼迪时，曾为肯尼迪一帮效劳。——作者

的，对游击队知道一些情况。有些事情他们是很厉害的。搞破坏和情报，那没有人比得上他们。但是他们对付正规部队就完全不行。我们使用他们对付正规部队，总是把所有人员丢得一干二净。他们很善于干小事，但是他们的作用有限，使用时需要审慎。你却没有想到这点——而把我仅仅看成只不过是一个劳工部长。”

“一块砖头扔进了窗户。”窗子很容易就可以修复，猪湾事件并没有改变肯尼迪政府外交的基本方向。这个政府仍然是实干的，急于要显示它的力量，恐怕比过去还要迫切。在国防部，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实干家，决心要结束一个并不存在的导弹差距；他一进入政府，本能地就想立即加强军备竞赛；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热中于武器的人。1961年初，有些白宫人物象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卡尔·凯森试图放慢军备竞赛的速度，至少是赞成在加快速度以前同苏联人进行更多的谈判。那时美国拥有四百五十枚导弹；麦克纳马拉要求增加到九百五十枚，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三千枚。白宫人员悄悄地在各处作了核对，发现从效力、从纯粹军事意义上来看，这四百五十枚同麦克纳马拉的九百五十枚是一样的。这样就有一个很罕见的机会，可以来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不是削弱军备竞赛，至少可以让它暂时冻结。

72

肯尼迪问，“你看怎么样，罗伯特？”

麦克纳马拉回答说，“嗯，他们是对的。”

肯尼迪问，“那么为什么要九百五十枚，罗伯特？”

他回答说，“因为这是我们在国会里所能提出的最小的数目，如果我们不想遭到谋害的话。”

一个白宫的助手想，要是不增加数目，我们或许可以使军备竞赛减慢而不是加快。但在1961年主张裁军的人遇上这样一个政府，它认为这个问题有些无关紧要，这不是马上就能着手进行的事，而是需要等待。在高级官员中，总统本人似乎是最能接受裁军的想法的，然而他并不急于带头。麦克纳马拉好象出乎意料地能够听取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同盟者，至少没有成见，可以争取过来。邦迪没有多大用处；早期他对这件事干脆置身事外。而腊斯克，照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就是要造成一个裁军的运动，却对这个问题看来最不感兴趣。

猪湾事件只是使肯尼迪政府尖锐地觉察到它的弱点，并且决心显示他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他不是一个软弱的对付不了苏联的年轻总统，他同苏联人一样强硬，动武时枪拔得一样快。在政府中，那些强硬的现实派增强了；那些不太倾向于使用武力的人减弱了。肯尼迪不久就要有一次机会来显示他是不是配得上人民对他的信任，这就是6月初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会谈，这次会谈在猪湾事件后这样快就安排，会谈本身是不是应当举行都令人怀疑。不过他还是参加了会

谈，其结果不是缓和而是加剧了紧张局势。总统在维也纳离开赫鲁晓夫时觉得受到了恐吓，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要向赫鲁晓夫表明，尽管他自己年轻，尽管发生了猪湾事件，他是一个不好惹的对手。他要动员后备力量，73 以各种方式显示美国的威力。

也许，仅仅是也许，事情不需要这样来处理。艾夫里尔·哈里曼早就感到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会谈是不可避免的，他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那时他是六十九岁，是民主党的一个出色的老战士。虽然哈里曼在国内政治方面算是失败者（1958 年在与纳尔逊·洛克菲勒竞选纽约州长时遭到惨败；他想成为他的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从来没有沾到边），但他是当代政治活动中最有力的一员健将，精力充沛，冷酷无情，不择手段，他是关照和开导美国总统的专家。1960 年，他在纽约竞选失败后，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时候，他的一些亲近朋友象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和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聚在一起，商量能做些什么来减轻哈里曼的痛苦和长期的屈辱，看来这将是他晚年的命运了。他失意了，同政治活动隔离了，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失败的美国政治家才会如此。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年轻记者盖伊·塔利斯，后来回忆 1960 年曾被派去报道一次哈里曼的记者招待会。这位前任州长刚从国外旅行回来，承蒙他宣布要谈一谈他对这次旅行的看法，因为那时《纽约时报》什么东西都报道，塔利斯就被派到哈里

曼在东城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那里有乔·戴维森①所作的罗斯福的巨大半身像以及作为陪衬的马蒂斯②、塞札纳③和鲁索④的画。他在这些伟大的作品中间等着，他独自在那里等了很久，因为他是到那里去的唯一记者，在大约四十分钟后，万幸，记者招待会总算取消了。

甚至在这个最不利的时候，哈里曼还是朝前看，为自己设想一个未来的角色。他意识到在秋天民主党人有可能当选总统，他想专门研究苏联问题；他利用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时代的那种个人特有的专长，写信给赫鲁晓夫，建议部长会议主席邀请他访问莫斯科（这是可以用来同一个新总统讨价还价的极妙的资本）。赫鲁晓夫当然懂得这一套，马上作出回答并邀请了他。赫鲁晓夫知道美国人所不知道的，即一个哈里曼总归是一个哈里曼，不管他在职还是不在职，其实他的职务对他是非常次要的，无足轻重。哈里曼同赫鲁晓夫一起度过了两天，谈了长达十二小时之久。开始赫鲁晓夫象往常那样，威胁，

---

① 乔·戴维森（Jo Davidson, 1883—1952），美国雕塑家，以雕塑半身像闻名。——译者

② 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以静物画、室内画、婢妾画为主。——译者

③ 塞札纳（Paul Cézanne, 1839—1906），法国画家，以立体型画为主。——译者

④ 鲁索（Theodore Rousseau, 1812—1867），法国画家，以风景画为主。——译者

跺脚，提高嗓门恐吓哈里曼：如果美国不从柏林撤出，火箭就要飞起来，坦克就要滚动起来，而他，公民赫鲁晓夫对将要发生的这一切可怕的事不能负责。哈里曼听着，然后平静地回答，火箭是有来有往的，现在双方的掩护所都不多，苏联的工业同美国一样容易受到攻击，并且是国家付出同样高的代价建立起来的。谈完了这些以后，他们就平静下来就其他题目——共处的可能性，中国人的目的——进行长时间和有益的会谈，这是一次很愉快的交谈，花了整整两天。

74

哈里曼从这次旅行回来后相信有可能同苏联人进行一场交易，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两国都有此准备的地步，苏联对中国的害怕已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他漫长的经历中的最后几年，他感到特别对一个年轻的总统来说，这是他可以做的特殊贡献。他告诉朋友们说，每个人都希望贡献他最熟悉的东西，既然研究美苏关系问题是他致力的专长，他特别相信他可以把这项对付苏联人的专门知识传给一个新的总统。哈里曼很迟才转到肯尼迪方面来，这当然是由于他对约瑟夫·肯尼迪那个人的怀疑。在总统竞选中他没有帮多大忙，但对肯尼迪一家来说，他曾经当过民主党的纽约州长，所以应该给他一点好处。他有严重的听觉不灵的毛病，这本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可是他还有严重虚荣心的毛病，这就妨碍他使用助听器。1960年11月以后他同肯尼迪第一次会见，

是他听觉最差的时候；当问到他对有关苏联企图的一个复杂问题如何看法时，他回答说，“是”。后来肯尼迪把哈里曼的助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拉到一边，问他有什么地方他们可以私下谈一谈。福雷斯特尔建议到洗澡间，他们去了，锁上了门，福雷斯特尔高兴得很，确信自己快要得到在国务院的重要职位。也许，象他父亲那样，在国防部。至少是一个助理部长级的。肯尼迪问他，“你想，你能不能使艾夫里尔带上一个助听器？”

但是哈里曼的朋友继续向肯尼迪一家为他说项，试图消除他们的疑虑。例如阿瑟·施莱辛格竭力为他说情，说他们应该让哈里曼到国务院去试一试，甚至是一个较低的职务，他们会对他的能力感到惊奇的。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你能肯定你不仅仅是感情用事？”

1961年2月哈里曼被任命为巡回大使。考虑到他过去所担任的许多显要职务，这在政府职位中是特别低的一级。但他欣然接受了；在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问他工作进行得怎样，他回答说，“哎，你知道，所有这些总统都是一样的。你得从最底层干起，靠自己努力升上去。”他在政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他的风度不成问题；他举行的宴会是华盛顿最讲究的；在同其他研究苏联问题专家一起的激烈辩论中，他的看法往往占上风。但是在维也纳会谈那段时间，他非常生气，因为准备工作没有同他商量。这些工作交给了象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和

乔治·凯南这样的人，真是一些毛孩子，是他所训练的小
75 伙子们，资历比他低得多。这样，在政府中以包揽事情和勇于任事出名的哈里曼①，就正巧在肯尼迪访问戴高乐的时候到了巴黎。哈里曼又正巧见到了肯尼迪的姐姐尤妮斯·施赖弗，告诉她他必须同总统商谈。正巧哈里曼也参加了国宴，在宴会席上他和总统的座位只隔着总统的姐姐和另一个人，他听到总统的姐姐告诉总统说，“喂，艾夫里尔在这里，他要同你谈谈赫鲁晓夫和维也纳的事情。”这时早已心中有数的肯尼迪回答说，“是呀，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一些事情。”哈里曼对总统要说的话当然早已充分准备。他曾教所有他手下的人同总统讲话要简短；总统时间很少，每个人都在告诉总统一些事情，讲话要特别简明扼要。一个思想，几个简单的句子。他决心要把他同赫鲁晓夫长时间会谈的经验和他四十年的经验合并成几句话，他讲的要点是：到维也纳去。不要太认真，要轻松愉快些，要了解一些赫鲁晓夫的性格，不要让他烦扰你，他会试图烦扰你和恐吓你，但不要理会。温和地避开他。不要企求太多。记住他同你一样害怕，以前他到欧洲西方世界的出访并不很顺利，他很意识到他的农民出身以及赫鲁晓夫太太同杰奎琳的对比，将会有紧张气氛。他

---

① 1969年，一个记者有一次问哈里曼的很年轻的助手，“什么东西使艾夫里尔与其他人不同？”助手回答，“他是我所遇到的唯一雄心勃勃的七十七岁的人。”——作者

的作风是先发动进攻，然后看是否能成功。付之一笑，不要同他冲突。超乎其上。要轻松愉快些。

以上概括了哈里曼的建议。然而相反的建议也是同样明确的。你要挺起腰杆对付他，让他知道你并不年轻，而是同他一样强硬，猪湾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并不是你的意志的反映。的确有一些人认为需要一次对抗，我们必须考验我们的意志，而且越早越好。这样，肯尼迪到了维也纳，而会谈是一场严峻和紧张的灾难；会谈之后，世界上环绕着柏林的紧张局势，看来是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赫鲁晓夫发动进攻，而肯尼迪感到吃惊，最后予以还击。维也纳，同猪湾一样，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

维也纳会谈对肯尼迪影响很大。《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该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首都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在这次会谈结束后，曾要求同总统举行一次私下会见。由于他的独特地位，准许他同总统会见。赖斯顿知道这样一次会见会触怒他的同行，那天他整天在维也纳躲避其他记者，偷偷进入大使馆的一间 76
专设的房间。房间的窗帘都放下来了，免得有人看见他，他在黑暗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肯尼迪最后到达时，由于太黑开始没有看见赖斯顿。后来他看出了赖斯顿，当这个记者站起来的时候，总统招呼他坐下，走过去坐在靠近他的一张躺椅上。总统当时戴了一顶帽子；赖斯顿记住了这一点，因为这只是他第二次见到肯尼迪戴着帽子，而第一次

是在就职典礼那一天。肯尼迪靠在躺椅上，象一个被打败的人那样，把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并且叹了一大口气。

赖斯顿问，“相当激烈吧？”

总统回答，“我一生中最激烈的了。”赖斯顿想，肯尼迪的信心真的动摇了。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他事先很仔细地研究了赫鲁晓夫，他知道这个俄国人非常看不起艾森豪威尔；每当他们会见、提出重要问题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就要请教杜勒斯。因此肯尼迪决定单独干，表示他同赫鲁晓夫不相上下，表示他事前已经准备就绪。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谈，还有翻译人员。他走进去，伸出手来说，他们两人对世界和平有特殊的责任。“我打算告诉你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是我不能做的，什么是我的问题和各种可能性，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做。”赫鲁晓夫的反应是令人吃惊的，他猛烈攻击美国，猛烈攻击美国是帝国主义，特别猛烈攻击美军留在柏林。象他以前恐吓哈里曼一样，现在他在柏林问题上恐吓肯尼迪：火箭将要飞起来，坦克将要滚动起来，决不要怀疑他的话。一周以来赫鲁晓夫不断施加压力，而肯尼迪也终于以同样的办法对付了他。因此肯尼迪告诉赖斯顿，“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弄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干，而且态度是这样敌对。第二，弄清楚我们能够采取什么对策。我想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就是因为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陷入困境的年轻而没有经

验的人是可以压倒的，认为陷入困境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勇气的。因此他真是痛打我一顿，使我面对着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除非消除他对我那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我是一个没有经验而又没有胆量的人，我们就同他谈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于是他告诉赖斯顿，他要增加军事预算（他这样做了），并且增派一个师去德国（他也这样做了）。他转向赖斯顿说，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挑战的地方是越南，"现在我们有一个要使别人认真看待我们的力量的问题，而越南看来就是这个地方。"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以后，当美国开始承担他们对越南的有限义务时，赫鲁晓夫对卢埃林·汤普森大使说，美国人正在越南犯一个重大的错误。根据汤普森打回华盛顿的电报，赫鲁晓夫说，"在南越，美国已失足跌入泥沼。它将长时间地陷在那里。" 77

回顾过去，赖斯顿深信，维也纳的恐吓对以后决定派遣一万八千名顾问和支援部队去越南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肯尼迪周围的人对这种看法有所怀疑，但是看来恐吓事件是肯尼迪第一年里代表冷战升级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环。赖斯顿特别把这些事件看成是有讽刺意味的，他认为到 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已经成功地向赫鲁晓夫显示了他的骨气，但是从东南亚方面来讲，为时已经太晚了，南越已经有一万五千名以上的美军。因为 1961 年在大西洋两岸，冷战还是一个现实，那时在华

盛顿当权的那些人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冷战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在第一年中经常有人提醒他们冷战还没有达到顶点，而他们自己的那种想要经受考验的迫切心情实际上加剧了冷战。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柏林问题。他们相信战争还是和平好象就集中在这个分割的城市以及它的出入通道上。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出入通道？苏联人会不会封锁它？美国那些掌权的人，全神贯注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好象总统是科长而国务卿是他的助手。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值得他们关心，似乎走错一小步就会触发一连串他们可能无法控制的事情。有人问，总统在柏林问题上是否花的时间太多了，他回答说，多一点比少一点好，并且要他亲自仔细检查军事护送车队问题也不在乎；毕竟他不希望，由于某个年轻上尉某天早上醉后头痛脑胀而使整个世界爆炸。1961 年初，柏林看来是中心问题，而越南还是朦胧出现在很远的地方。那时有一个熟悉情况的名叫斯坦利·卡诺的驻远东记者顺便走到司法部去同总统的弟弟谈谈。在谈话中卡诺指出越南可能是远东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最大的长期性潜在危险的问题。“越南”，罗伯特·肯尼迪说，“越南……我们这里每天就有三十个象越南这样的问题。”

三十个象越南这样的问题。开始越南就是这样，一

个被大问题掩盖了的很小的问题。它所以升到显著的地位，部分是由于它遭到忽视和遗忘。对越南的政策并不是几年前一小批西方人坐下来决定将来应该怎么办才产 78
生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对美国来说，越南开始是最无关紧要的问题，美国是一个新的西方国家，突然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面临着同共产党的长期对抗。那时候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作出重大的决策，而越南就是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它原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后来才变成大问题。谁在1945年作出决策时顾得上印度支那？在1945年的时候，欧洲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原子武器和同苏联的原子均衡，甚至中国问题还处在边缘上，越南问题则是边缘的边缘。

但是早在1945年7月，对美国来讲，越南情况就开始变坏了。那时新的没有把握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到波茨坦作他第一次重要的出国旅行，去处理那些好象扑面而来的巨大问题，对当时战争和战后的前途作出重要决定。他对于那时称作印度支那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心；但是因为有些在波茨坦要提出的问题可能涉及中国，杜鲁门带了国务院管理中国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一个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约翰·卡特·文森特作为他的国务院班子的成员。

因为后来他的前途以及他的很多同事的前途，在丢失中国以后乱扣红帽子的浪潮中毁掉了，约翰·卡特·

文森特获得了一种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和不愿意有的名声。由于这些人受到攻击，说他们是左翼同情分子，就流传了一种看法，认为约翰·卡特·文森特是一个激进分子。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有魅力、喜欢交往、愉快、公认为保守的人，在国会里有特别好的社会关系。他出身于佐治亚州的一个望族，按照文雅的南方传统，几乎每个人都叫他约翰·卡特。他的经历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亚洲度过的，他对亚洲民族主义有一种突出的切身感，并且对未来有比较现实的看法。1945年初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总统本人是相信亚洲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的，并且在朝着这个方向推动。事实上，那些日子标志着美国支持越南民族主义的高潮，罗斯福已在谈论对这个地区的托管。这种支持将随着文森特当时波茨坦之行而告终。他在波茨坦并没有怎么考虑越南，因为它不在议程上面，而且根本没有准备讨论。

然而在波茨坦，没有经过任何真正的协商，就作出了一个关于越南的决定。那是有关受降的问题；在十六度线以南的地方由英国人去接受日本的投降，在十六度线以北则由中国人去受降。当时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谁来受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决定了将由谁来
79 控制局面，由谁来确定将来的合法地位。英国人对罗斯福过去提出的有关亚洲的独立问题感到不安，担心这对缅甸和马来亚可能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急于想控制未来

的亚洲殖民地问题。总之，英国人不想看到他们的帝国瓦解。杜鲁门在其军事顾问的推动下，主张美国支持英国。这些顾问担心反殖民主义对美国在亚洲的海空军基地的前途会发生影响。美国人内部事前没有讨论过（虽然以后有证据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事前有过很多勾结）。英国人受降以后，将允许法国人回去，接着发生的事就从此而来：法国人再次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对于美国要同当地人民打交道的一切请求有礼貌地报以微笑，但不予理会，美国人毕竟已经丧失了施加影响的能力。法属印度支那战争将要开始，而越南人将以武装力量来赢得他们的自由。

当然，那时这只是一个被重大问题所掩盖的次要问题，负责的政治官员约翰·卡特·文森特并没有参与；事实上，他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知道的。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轻易地作出了。经过许多悲伤的年月之后，他才承认这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事情就开始变坏了。

到那时为止，越南只是通过《全国地理》杂志上的文章或旧新闻纪录片传到公众的眼里。那里有异国情调的顺从的土著居民，法国人正在帮助他们现代化。在华盛顿的眼里，它是一块有重要资源的土地——重要，但也不是那么重要。1941 年当美国从无线电截获消息说日本人计划向印度支那南部推进时，它的反应是温和的。军方

反对任何能引起美国同日本交战的行动，因为美国缺乏准备（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表示，“只有日本攻击或直接威胁到那些地区，而其安全对美国是极其重要的时候”，美国才参战。那些地区包括印尼和英国、美国在亚洲的属地）。随着1941年时局的进展，情况就清楚了，越南的重要性并不在它本身，而在于日本人用它作为向其他地区推进的通道。（1941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萨姆纳·韦尔斯①，“我们必须让他们〔日本人〕看到他们采取这步行动的严重性，并让他们知道这是一项不友好的行动，因为它帮助希特勒来征服英国。”）但是这个时候，资源是有限的，而需要是紧迫的，没有夸耀美国力量的念头，每一种资源都要仔细估量一下。一个名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年轻将军在1942年2月写道：“我们必须清楚和明确地区分哪些事情目前就要在世界各个战场中完成，这样对最终打败轴心国家是必需的，以及哪些事情由于它们有助于打败轴心国家而仅仅是可取的。”这样欧洲是首要的战场，亚洲居第二位。最好能够阻止日本的扩张，但这并不是那么重要。罗斯福在1942年7月写信给哈里·霍普金斯、乔治·马歇尔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说，“打败德国就意味着打败日本，可能不

80

① 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 1892—1961），美国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国务院拉丁美洲司司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副国务卿，著有《决定的时刻》等。——译者

用打一枪或死一个人。”美国战时政策就这样定了下来。首要力量用在欧洲，力量很少用在亚洲，尽可能少地在日本控制的大陆上同日本交手，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技术，这是一场反映了迷信军事技术的战争——岛屿的跳跃，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为美国空军取得针对日本的基地，而不是更艰苦地（战后在政治上更有利地）爬上大陆。

在印度支那本身，法国的垮台对于越南人的政治觉醒是新的巨大的推动，他们相信这场大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他们而打的，有些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想法，特别是他们的总统。罗斯福是一个走在他那个时代前面的人：反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全球性运动还没有表面化（虽然他所参与驾驭的这场战争本身将加速旧秩序的崩溃和殖民主义的死亡），但罗斯福对殖民主义有很强烈的看法，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妻子的——在内政方面平等思想的反映。他本能地站在弱小的人一边，而反殖民主义似乎是同他自己的国内政治风格是一致的；的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认为他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危险表现很软弱。他看到了美国作为新自由的象征的地位，他直觉地容易接受这样的思想，即世界上多数的穷人将会反对少数的富人的思想。如果说罗斯福一般地不喜欢殖民主义，那么他特别不喜欢法国殖民主义。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他对法国作为战时盟国总的感到恼火，部分地是他对夏尔·戴高乐有特殊的厌恶，罗斯福不能理解这位领

导人所选择要扮演的独特角色——一个不在国内的伟大人物。罗斯福喜欢告诉别人，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呆了五十年，而那里人民的情况比法国人刚去的时候更坏。他打定主意不让法国人自动地回去，重新控制印度支那；应该有一种国际托管制度，如果法国人真回去的话，那就是作为托管制度的某种合伙者。虽然罗斯福真有这个想法，也同几个接近的顾问谈了，但是随着战争往前发展，他一心考虑过多的更为迫切的决策问题，已是一个负担过重、精疲力尽的人了。对印度支那没有什么计划，关于战后
81 殖民政策的理论，政府机构内部没有进行什么研究。1945年1月1日，罗斯福写了一个条子给他的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说，“我仍然不愿意参与任何有关印度支那的决定。这是战后的问题。而且，我也不愿意参与任何使印度支那从日本人下面解放出来的军事行动……”

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查尔斯·波伦的笔记记载了罗斯福有一个托管制度的想法；而英国不喜欢这个想法，因为它怕牵连到缅甸。这个笔记还透露了西方领导人在那个时期谈到亚洲人时的天真看法，以及法国人想要返回印度支那的最初的迹象：

总统说印度支那人是象爪哇人、缅甸人那样矮小的，他们不是好战的……他说戴高乐将军曾要求一些船只把法国部队运往印度支那。斯大林元帅问戴高乐准备到哪里去找军队。总统回

答说，戴高乐讲，什么时候总统找到船他就会找到军队，但总统加了一句，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能够找到船。

不到一个月以后，1945年3月15日那天，罗斯福要国务院有关加勒比事务的顾问查尔斯·陶西格，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会议给他准备殖民地问题的参考意见。他们的对话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反映了罗斯福对法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想法的具体化。陶西格为国务院记下了这次谈话：

总统说他对东方的棕色人非常关心。他说棕色人有十一亿。在很多东方国家里，他们受到很少数的白种人的统治，他们对此感到愤懑。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帮助他们取得独立——十一亿潜在的敌人是危险的。他说他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也包括在内。然后他加了一句，丘吉尔不懂得这个。总统说，他想在殖民地问题上，我们同法国可能会有些麻烦。我说，我想这是很可能的，而且很可能英国要利用法国作为一种借口。我问总统有没有改变那天同斯坦利共进午餐时向我们表示的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想法〔英国殖民事务大臣奥利弗·斯坦利上校1月16日同罗斯福和陶西格共进午餐〕。他说没有，他没有改变他的想法：法属印度支那和新喀里多尼亚岛应该脱离法国而置于托管之下。总统迟疑了一会然后说——如果我们得到法国的适当保证由它承担托管的各项义务，那末我同意法国保留这些殖民地，条件是，最终目的是独立。我问总统他是否可以同意自治领的地位。他说不——必须是独立。他说，这就是今后的政策，你可以在国务院引用它。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关心纯粹反殖 82

民主义的顶点。罗斯福的关心仅仅是他个人的。他得不到他的官僚机构的支持(甚至在国务院，占统治的力量是欧洲司，它反映了现存殖民国家的观点)，得不到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的支持(他们更同情老的盟国，并且坚持军方的观点，认为广泛的反殖民主义会威胁到美国自己在太平洋属地的权利)，也得不到他的传统欧洲盟国的支持。要使官僚机构同意他的意见需要一番相当大的斗争，这是他可以做到的，但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况且还需要进行相当多的政治努力去顶住来自老的传统盟国的压力，这些盟国切望重新控制它们的殖民地，到它们自称最熟悉的地区去按老样子办事，特别困难的是共产主义的威胁正同新的亚洲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

上面讲的最后一点，在1945年3月戴高乐把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召去，讨论美国协助法国军队返回印度支那的问题时就很清楚了。法国曾要求美国协助，而得到的答复是什么都不给。现在戴高乐告诉卡弗里已经有一支远征部队准备出发，但是英国答应给的运输工具没有给，他猜想大半是由于美国的压力。戴高乐说，“这使我十分担忧，而且事情是在特别不合时宜的时候发生的。正如〔哈里·〕霍普金斯先生在这里时我就对他说过的，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政策。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要我们成为，譬如说，俄国保护下的联邦国家之一？俄国在急速向前推进，这你是很知道的。德国陷落

的时候，就要打到我们头上来了。如果我们的公众知道了你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反对我们，他们将会极大地失望，谁也不知道这将导致什么结果。我们不想做共产党人，我们也不想落到俄国人的圈子里去，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推进去。”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反应。这不仅反映了法国企图重返印度支那，而且是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的问题同越南联系起来考虑。不帮助殖民主义者就是帮助共产党人。

短短几个星期以后罗斯福死了，对越南的一个真正的官方的反殖民主义政策的希望也随之而去。他是唯一的高级决策者真心想把法国排斥在外。其他主要官员反映各自官僚机构的压力：国务院反映欧洲盟国的压力，军方反映要保持基地的压力。的确，罗斯福的去世是给国务院中欧洲派的一个信号，在他们的道路上障碍已经清除，既然这唯一可能成为真正敌人的高级官员已经不挡道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使杜鲁门在印度支那的政策问题上，面对一个既成事实。一星期内国务院的欧洲派采取了行动：他们悄悄地准备了一个有关印度支那的报告，83
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法国的立场，在这个地区要通过法国进行工作。在提交上级以前，他们还需要得到在东南亚部门的同事们的赞同。在五点钟这个报告才交给了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官员艾博特·洛·莫法特，上面还加了说明，指出这个报告明天早上九点就要送到白

宫。莫法特是非常支持亚洲民族主义事业的，马上理解了这个把戏，就把这个报告压下来了。但这件事表明了随着罗斯福的去世，事情将更加难办，从此法国科的气焰将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

对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来说，那个时候国务院组织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亚洲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区；殖民地是通过欧洲国家来处理的，政策的改变需要双方同意。这就是说，涉及一个被认为是从殖民主义下挣脱出来的地区的任何重要问题，在送到更高一级官员之前，需要欧洲司和亚洲司双方都同意。从实际上来说，这就是管法国事务的人赞同法国的重返印度支那政策，而管亚洲事务的人则激烈反对，问题就提到更高一级，那里的官员又踢下来，建议大家一起来讨论。结果当然是对保持现状和欧洲司是有利的。中立政策就是没有政策：法国人可以按照他们高兴的去做。他们是重要的，亚洲人是不重要的。法国弱了，它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要对它安抚一番。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开始并非出于反共——反共的考虑是次要的——而是出于对印度支那不那么重视。当时的远东司司长（相当于以后的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他曾经力争要有一个不同的政策，警告过这样漠不关心的态度从长期来看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乔治·凯南对他说："约翰·卡特，从传统的美国立场来说，你对亚

洲政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但眼前的问题是维护欧洲的士气和它对付共产党挑战的决心。”

美国政府知道越南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它已向欧洲盟国承担了义务，不能够也不愿意运用任何力量来改变事情的进程。政府中要求世界权力的欲望同理智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1965年整年都在缠扰着我们——在1945年6月明确地写了出来，那时史汀生上校要国务院准备一个关于亚洲前途的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反映了负责欧洲事务的人和负责亚洲事务的人之间的分歧（“美国政府可以正当地继续陈述它所经常宣布的政治原则，即未独立的民族应给予机会，如果必要的话，在一段充分准备时期之后，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但应该避免任何会严重损害主要盟国的团结的行动……”）。报告又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越南人从三十年代急速地增长起来的政治愿望和觉悟，现在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涨，必将导致越南人同法国人作战，而法国人“要压倒这种反抗和重建法国的控制，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却什么也没有做；它已经为法国在欧洲的软弱而担忧，它不会对一个虚弱而骄傲的盟国施加压力。 84

并不是只有国务院的情报工作人员才了解法国将要遇到困难。戴高乐最喜欢的将军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在越南登陆去指挥法国部队。在这个国家巡视一周后，他充分意识到面临的政治军事问题。他对他的政治

顾问保罗·米斯说，“需要五十万人来做这项工作，即使这样，也不能完成。”

在法国，没有人听勒克莱尔或米斯的话，在华盛顿，没有人听那些年轻的美国政治官员警告斗争即将来临的话。亚洲的反叛分子站起来对付一支强大的西方军队，这种想法在当时是荒唐可笑的。还没有人听到过政治性战争，还没有听到过毛关于鱼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的思想，还没有听到过亚洲的游击队把城市让给欧洲国家而用保住农村来勒死他们，还没有听到过一支军队一仗接一仗地打输，但却赢得了人民、从而赢得了战争。在华盛顿，重要的是要加强法国，而在巴黎重要的是恢复法兰西被贬低了的威望。恢复国家的威望不能采取对亚洲强盗让步的办法。恢复国家威望要靠武力。因此在1945和1946年，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法国和越盟的谈判将要失败；法国太骄傲了，不愿同这些矮小的黄种人打交道。在国务院里，那些面向亚洲的官员拚命请求上级对法国施加压力，要它进行真正的谈判，给越南人某种独立，警告说战争正在来临，而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特别对法国更是如此。这些请求在欧洲问题专家中引起不少人的藐视，他们瞧不起这种感情用事，这种惊惶失措。当莫法特警告说，在越南的怒气和愤懑在高涨，越盟有作战的愿望和能力时，他的同事和上级叫他不要这样感情冲动。他们告诉他，这些关于民族主义的谈论都是日本的宣传，他

们以前听到过这些说法，他们知道日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想把那里的人民煽动起来。这些都会过去的。越南人希望恢复老样子，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当莫法特和他的助手继续辩论和斗争时，那些人就告诉他，如果能让在亚洲呆了几个星期的某些美国人，花一点时间同那里的老前辈在一起，这倒可能是一个好主意。老前辈是些一生都在那里度过的法国人，他们了解当地人。莫法特在越南的工作人员查尔顿·奥格本也报告说，要求独立的压力在增长，需要迫使法国与之妥协；而法国科却告诉他说，他对那些赤着小小褐色脚的拍挞拍挞声听得太多了。 85

一次又一次都是同样的情况，人们告诉象莫法特和奥格本这样的人，要他们严肃对待这些事情。首要的事放在首要地位。他们应该看到世界的全局，而不能感情用事。这样一来，他们的努力很少能起作用。偶尔有一个电报拍到巴黎，要美国大使对法国施加压力，要它进行谈判。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知道卡弗里大使还会把调子搞得和缓一些。当1946年过去的时候，双方的紧张形势在加剧，他们想，事情越来越没有希望了。12月莫法特在印度支那旅行时，他感到越南人绝望了，没有看到什么人再同任何人谈判，而战争就在眼前了。他打电报给华盛顿，描述了在越南的爆炸性的情绪，并表示愿意在法国和越盟之间担任调解人，进行斡旋。法国立即拒

绝了这个建议。不到一个星期，仗就打起来了。战争在进行，美国人开始是站在边上，保持中立，一方面对越盟有些同情，一方面对欧洲又采取现实态度。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慢慢地卷入了这场冲突，开始是支持法国，最后代替了他们。但是政策是从不关心开始的，甚至在早期劳里斯顿·夏普——科内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战争时期曾在那个地区服役，后留下为国务院工作——就对美国没有进行领导以及美国促使造成了真空十分抱怨。他对奥格本说，美国发一个电报，所有这些流血就都可以避免了。1946年3月，法国同越盟签署一个初步协定，承认越盟为一个合法当局——法国很快就背弃了这个协议——如果那时美国很聪明，发一个电报祝贺巴黎的向前看的领导风度，并宣布美国就要派一个公使去河内，所有这一切就可能避免，所有的痛心事就可以不发生了。可能这样说得太过分了一点，一个电报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些关键性的年月里，尽管对自由、独立和反殖民主义作了种种承诺，美国的政策却容许一个盟国发动一场残酷而愚蠢的殖民战争。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或发出真正的电报表示反对。

第 六 章
老挝——第一次亚洲危机

在亚洲，老挝可能是第一个要进行较量的地方。肯尼迪就职前，曾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最值得艾森豪威尔自豪的是，在他两届总统任期内没有发生过战争。使肯尼迪大吃一惊的是，这位和平人物竟然说，看来我们可能要为老挝打一场战争。这是肯尼迪总统就职的前一天，两个人都有自己班子里的人员伴随着。肯尼迪在整个会见中，由克拉克·克利福德指引。克利福德同过去有联系，是在总统交接时期负责处理肯尼迪这边事务的老练的民主党人。这是一次阴郁的会见。艾森豪威尔说，最大的危机在东南亚，而老挝是危机的中心。如果让老挝失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整个东南亚地区。艾森豪威尔相当激动地说，我们决不允许共产党占领。我们应当要东南亚条约组织或者老挝问题国际监督委员会协助我们维护老挝的自由。我们应当争取盟国，也许是英国；但是如果争取不到的话，我们也要单独干，这是必要时最后采取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他的两个行将卸任的部长，国务卿赫脱和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都支持干涉老 86

挝。肯尼迪冷静地问：派军队去老挝需要多少时间？盖茨回答说，需要十二天到十七天；如果部队已经在太平洋，则需时少些。这个回答不是令人鼓舞的。肯尼迪在会见
87 结束时深受震动。象征和平的老总统现在竟然建议他的年轻继承人为老挝问题在东南亚打一场战争。当然，他也答应从葛底斯堡农场①给予支持。但是，打一场老挝战争？这个主张竟然出自这个刚被民主党人和肯尼迪称为缺乏意志和民族目的而瞎张罗的温和人物。

在当时，老挝问题到底有多大价值，似乎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如果说冷战和危机的心理创造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虚构出老挝这个问题。老挝是一个内陆国，是印度支那的一个国家。老挝人民是居住在中国边缘上的一个和平的民族。在法国进行的印度支那战争中，老挝人参与最少。人们认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中，善于打仗的是越南人，特别是北越人。但是杜勒斯决定将老挝变成他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堡垒”。这是个最难想象会有可能成为堡垒的地方。它看来象是彼得·乌斯蒂诺夫②在剧本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关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混乱情况的最好的描写，不会出现在大报的头版上，而会出现

---

① 艾森豪威尔的家所在地。——译者

② 彼得·乌斯蒂诺夫（Peter Ustinov, 1921—），美国演员、作家，著有《前面的路》等。——译者

在拉塞尔·贝克①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②的杂文里。老挝人民是恬静的，不喜欢战争，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大问题不感兴趣。然而，不管可能与否，老挝给打上了这个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印记：寻找一个讲我们喜欢听的话的亚洲领导人；建立一支仿效我们式样的军队；灌输冷战竞赛而不试图缓和紧张局势，毫不注意当地居民的正当的不满，也不支持民族主义运动，不管这个运动是多么地微弱。因为老挝既无热战又无冷战，只有一个半隐蔽的非常小的战争，所以它的问题既不归国务院管，也不归国防部管，而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事业。老挝几乎成了中央情报局的殖民地，当地民航由中央情报局经营，相当多的官职靠中央情报局给钱。

在老挝，可以称之为我们的人的，是一个名叫富米·诺萨万的将军。用那个时代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右翼铁腕人物，但是却更象连环画中的人物。肯尼迪在华盛顿初次见到他时说："如果这就是我们的铁腕人物，那我们就麻烦了。"从实际问题方面看，他发现富米个子竟这样矮小（他认为将军总比士兵高大些），于是他要求立刻检

---

① 拉塞尔·贝克(Russell W. Baker, 1925—)，美国记者、专栏作家，著有《华盛顿的一个美国人》、《我们的下一届总统》等。——译者

② 阿尔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 1925—），美国专栏作家，著有《沦陷后的巴黎》等。——译者

查老挝人携带的武器，马上发现美国步兵的基本武器M-1对老挝士兵太大了。自从1958年以来，富米象许多铁腕人物一样，靠冷战走运。而作为老挝军事领导人，他还有额外利益可图——他兼做鸦片生意，从中获利颇多。他有一支领饷可观的军队，但在战场上一文不值。有一次，美国大使温斯罗普·布朗对富米说："你的参谋长不应该带一排兵到拐角去买一张报纸。"富米回答说："我知道，但他是忠诚的。"有一次，由于对方疏忽和没有抵抗，他的部队占领了老挝首都万象。富米拒绝去万象参加政府宣誓就职典礼，因为算命先生说过，他会死于非命。

88

尽管美国的政策可能是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还要降低老挝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在杜勒斯时期，中立主义被认为多少有些罪过时，美国人蓄意破坏了老挝人在他们的统治者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下搞中立和成立各派联合政府的尝试。杜勒斯时代的后期，美国驻亚洲的大使们反共特别积极。当时驻老挝大使格雷厄姆·帕森斯后来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为了阻止成立联合政府，我奋斗了十六个月。"我们依靠金钱、中央情报局人员以及控制老挝王国军队，实际上已一步一步地破坏了梭发那的中立政府，并且最后迫使中立主义者倒向共产党的巴特寮一边，虽然1962年我们又要花费千百万美元来重建我们推翻了的中立政府。1961年，肯尼迪就职前一个月，梭发那逃往泰国。中立力

量的军事领导人贡勒(他最希望的是不受干涉)参加了巴特寮一边对富米将军的军队作战。其后的两个月里，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周期性爆发的老挝内战有如下特点：大量的新闻报道；军队迅速地开过来开过去；美国报纸头版刊登老挝地图；但是几乎从来没有伤亡。2月初，当双方终于在有战略重要性的查尔平原上对阵时，不出人们所料，装备较好、薪饷较多的富米军队溃散逃跑了。他们一跑，肯尼迪政府就遭遇到它的第一次亚洲危机。

这是肯尼迪时期决策的人们所喜欢搞的那种典型的危机。他们在处理一件事情时，往往以表示决心要加以处理的手法来渲染夸大这件事的严重性，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白宫去。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官员们夹着手提包几乎是跑步的样子，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他们以这种姿态让新闻记者照相，并且总是对他们说“无可奉告”。他们的权力加上了戏剧性的色彩，好象事情一经他们过问就变得比原来更大更重要了。权威和激动情绪降临到华盛顿。那里举行了一些气氛很紧张的会议，以便让那些参加会议的人有机会表现自己在压力之下仍能保持风度，显示自己是参加这件事的局内人。麦克纳马拉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竭力主张用百磅炸弹装备六架AT6军用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旧式战斗机)去轰炸可恶的老挝人。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主张。对方没有空军，

89 因此我们肯定会获胜。技术和威力能做到一切。(切斯特·鲍尔斯当时在笔记里写道："当一个新手进入〔对外政策〕的领域并发现自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时，他就很容易成为接受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准军事性方案的人。这些方案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腊斯克在中、缅、印战场上看到过，空中力量在丛林地区有很大局限性，他对这种想法轻轻地浇冷水。况且，查尔平原面积很大，六架小战斗轰炸机的威力终究有限。

还有别的一些主张。有些文官对用空降部队突击查尔平原感兴趣。肯尼迪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们能把部队弄到那里吗？兰尼兹尔将军回答说："我们完全能够把部队弄到那里。但使我担心的是怎样把他们弄出来。"很快就清楚了，是军方，特别是陆军，不急于在老挝打一次地面战争。陆军仍然感到被朝鲜战争的经验弄得焦头烂额。陆军在朝鲜打的战争，使指挥官们非常沮丧，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有限的政治目标而牺牲人员，这有点象是从政治考虑来配给兵力，是军官们难以同意的。加上艾森豪威尔时期对陆军的影响，几年来人力一再裁减，使战略后备兵员大大减少了。一位将军对总统说："如果我们在东南亚投入十二万五千兵力，我们就没有能力在佛罗里达州打仗。"①但是参谋长们没有反对在老挝承担义务。相反，他们说，我们不卷入则已，要卷入就得大举出

兵，武力的使用必须没有限制——这暗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他们要用二十五万人来进行这次侵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如果中国人介入，将产生什么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五万美国兵是不够的。兰尼兹尔含糊其词地回答："我们会对付这种情况的。"但当文官们继续追问时，回答就很清楚：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开进战斗部队，主要的军事应变计划将是使用核武器。

肯尼迪特别感到恼火，因为他认为参谋长们不老实；他们是想制造不利于他的记录，掩盖他们自己要出兵而把责任推在他身上。他们以核武器为盾牌，但又不明白地说出来。随着老挝危机不时冒头，这样的暧昧态度还要出现。危机一般出现在雨季，因为那时巴特寮的活动可以得到更多的掩护。一年后，发生了一次新的老挝危机。麦克纳马拉在欧洲开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后，归国途中经过西贡同美国在当地的最高级官员们会见。他依次问每个官员，美国应当怎么办。第一个说话的是美国太平洋部队总司令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我们有 90
第七舰队，我们有飞机，可以将车邦从地球表面上消灭掉。"然后，麦克纳马拉转向兰尼兹尔："哎！兰姆，你认为怎样？""我认为单靠空中力量不行。我们需要在地面上向他们挑战，固守湄公河。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第五

①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南端面对古巴的一个州，这里指抽不出兵力对付古巴。——译者

方案……调一些兵到那里去。”麦克纳马拉又转向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保罗，你是现场指挥官，你认为怎样？”“我认为局势非常严重。我们当然必须作出反应。我们必须让共产党人深刻认识，我们的意图是认真的。但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采取行动。”麦克纳马拉于是转向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大使。后者回答说：“我看我们的亚洲政策有两根支柱：南越和泰国。老挝是支撑这两根支柱的基石。如果基石倒下，支柱就垮了。”这是相当令人寒心的。比一年前了解情况多了一些的麦克纳马拉（一年前，他只知道 AT6 飞机）说：“让我扮演反面角色提出一些意见：如果我们干涉老挝，飞过北越上空，中国人会允许我们这样做吗？兰姆，你想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方案。河内会怎样做？他们会坐着不动呢还是介入？”说毕，他往后靠在椅背上。“现在让我们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吧。”他等着。他们的参谋们早已离开屋子。接着是麦克纳马拉有生以来在开会时所经历过的最长时间、最可怕的沉默。他们全都竭力要求并且愿意出兵，实际上是主张必要时就进入战争。但是他们很少或没有想到对方可能怎样行动。现在他们想不出答案，无话可说。

正是处于第一次老挝危机中的这个时刻，1961 年 4 月，哈里曼进入舞台。他经历过大部分过去执行冷战政

策的时期，参与制订了那些政策，但他没有受那些政策的束缚。首先，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崇尚权力的人，但他知道权力在经常变化。他也知道，最危险的是在不能运用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他对美国在老挝承担义务有多少价值深抱怀疑。他同其他高级官员不同之处，在于他了解共产主义世界的多元化是真实的，共产主义世界已经起了变化，而且还在不断变化。由于共产主义世界正在起变化，真正的新的机会将会出现。他下决心要本届政府利用这些机会，他要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他即使在1961年比较阴暗的那些日子里也从未忽视过的事情。他要努力使进展的机会尽可能少地受到阻碍。他曾经以巡回大使的身分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认为老挝不值得一战。（赫鲁晓夫对卢埃林·汤普森大使说："为什么要冒险？它会象烂苹果一样掉在我们怀里。"）1961年3月，哈里曼安排了同梭发那·富马会见。富马是被美国撵下台的中立派领袖。他们在新德里的一个机场上会见。两人虽然说的话不一样，但哈里曼还是和他说通了。他离开时，深信此人可以打交道，认为他代表老挝某种有生命力的力量。 91

他回到华盛顿。由于知道在政府里反复申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在华盛顿参加会议或宴会时，一有机会就象和尚念经似地不断讲梭发那·富马，梭发那·富马，梭发那·富马，最后使得亲密朋友们有些发慌，以为哈里曼

真是上了年纪，有点老糊涂了。在此以后不久，肯尼迪给了他任务，要他在5月的日内瓦会议上解决老挝问题。这个职务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因为它离开他最关心的领域很远。他不认为真有可能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这是职责。当时哈里曼是大才小用了，而他需要给那些年轻人看看，他能同他们比赛。他愿意努力谋求一项协议，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梭发那好，而且是由于他对老挝的右翼势力评价很低，他一到万象就觉察出来，右派势力是美国制造出来的，没有合法地位。当中央情报局人员向他作经过精心准备的汇报，大谈老挝人要求自由的情况时，他们发觉哈里曼干脆把助听器拿掉，没有听，使他们很恼火。他们的解决方案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的确，他从事这个自称为“搞得不错的坏交易”过程中所用的手腕，使总统得到深刻印象；因此哈里曼开始飞黄腾达。如果不是由于肯尼迪遭到暗杀，他也许会升到国务卿的职位。

哈里曼自己对这个使命并不寄予很大希望，但他顽强地去干。有一次一个朋友问他工作进行得怎样了。他回答说：“就象我们意料中那样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日内瓦接管的代表团如此庞大，无用的人如此之多，使他大为惊讶。然而，他确实喜欢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代表团里地位很低的三十八岁的官员威廉·沙利文。沙利文年轻时曾在亚洲工作过，他似乎不象代表团中多数

人那样说些陈词滥调。哈里曼立即要他当副团长。沙利文拒绝了，因为他注意到代表团中有十几个人比他资格老。几天后，哈里曼又把沙利文叫来，要他担任副团长。这时，哈里曼已将所有比沙利文资格老的人调回美国。这个做法使那些被调走的人不喜欢他。他们同国务院里的因循守旧派有联系。当哈里曼继续同苏联代表普希金谈判时，就有人嘀咕说，他把老挝这个伟大堡垒出让得太多了。某高级官员说："我看，他下一个电报将要用'普希金'的名字签署了。"哈里曼听到这句话时，反应是迅速而厉害的（他被称为"鳄鱼"，并非没有道理）。他决定，那个人要调到……他想了一会儿，然后选定——阿富汗。

他在日内瓦单枪匹马地努力谋求一个老挝中立方案。他试图说服苏联人：中立丝毫无损于他们；对他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人；中立主义对中国人比对俄国人问题更多。谈判期间，有一次，他在奥尔巴尼时期①的一个部下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到日内瓦来找他。 92

"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哈里曼。

"哦，我就是在等待。我们已经谈完了我们所能谈的。俄国人将要作出决定，我正等待他们。就这样，等着。"

最后，一个中立化协议得到所有代表团的赞成。这

① 奥尔巴尼（Albany）是纽约州首府。这里指哈里曼任纽约州州长时期。——译者

使象艾尔索普那样的强硬派生气。艾尔索普说，这使他想起《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怀特皇后，她要在吃早饭之前教自己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就这样，肯尼迪政府在老挝放弃了使用武力，但并不是没有先显示了一番武力的，如曾派海军陆战队进驻冲绳和日本，作为入侵湄公河流域之用。还搞了一次壮观的有声有色的电视演出，由肯尼迪亲自主演。他带着地图、图表，大谈什么老挝的自由和美国的自由密切不可分的陈词滥调。肯尼迪在电视上说："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的独立，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老挝的安全和我们大家的安全密切不可分。我知道，每个美国人都要求自己的国家遵守义务，使自由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自由和安全都得到实现。"但是在午餐时，他告诉阿瑟·施莱辛格，他所想的和他认为可以说的两者之间是有出入的。他的真正想法是："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明显的屈辱。"美国政府高级当局反对使用武力的立场，显然是不坚定的。总统自己虽然现在已经聪明一些(他后来会说，猪湾事件起了使我们不去老挝打仗的作用)，但仍然认为，他对老挝是不是关系到美国的安全，不能坦率地说出来。

就这样，老挝危机获得一次成功的谈判解决。而这对华盛顿的人来说，是一次可怕的、令人不安的经验，因为他们太接近于卷入这个国家了，在这个国家里，他们支持的那一派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是老挝人，而不是

猪湾事件或甚至哈里曼，使美国免除在老挝进行较量，因为巴特寮不是一支第一流的游击力量。如果说富米是个愚蠢的人，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可以说是共产党方面的愚蠢的人。他和他的部下都没有象越共在南越那样在斗争中承受那么多的牺牲和投入那么多的力量。印度支那游击运动的活力，从未真正达到老挝。象苏联那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事实上担任了搞成一项协议的掮客，但苏联在越南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越南，土生土长的共产党的力量才是决定一切的。老挝的情况导致华盛顿的 93
误解，以为俄国人只要愿意，就能够控制越南的事态，掌握谈判，就象他们在老挝所做的那样。华盛顿还错误地认为，俄国人最终将帮助我们脱身。然而，在越南，美国人将会了解到，土生土长的力量是扎实得多、强硬得多的。正是越南人民的这种好战性格吸引华盛顿在越南而不在老挝进行阻击，这种好战性格在老挝也起着不利于我们的作用。在越南，一个活跃的、激烈的游击运动在为接管和统一全国而进行着持续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入第十五个年头。对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来说，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他们将会按自己的步子一直干下去。此外，如果共产党在老挝投入的力量有限，美国投入老挝的力量比之在越南也是有限的。富米也许一度是个铁腕人物，但没有人会象称呼吴庭艳那样责骂他为“神秘的人”，原因是我们在越南陷得更深，讲过的话更多，训练了

更多的部队。在美国，援助越南院外集团已经开始形成，事实上，总统和他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其中的成员。

很幸运，美国没有卷入老挝。虽然强硬派提出抗议，但是全国大多数人迎接这个不打仗的决定时，心情却是厌烦，漠不关心，或者感到松了一口气。对日内瓦协议有一个小伏笔，当时似乎并不重要，但现在回顾起来，却是相当重要的。协议达成后，肯尼迪派出他同哈里曼联系的人、年轻的华尔街律师迈克尔·福雷斯特尔，拿这个协议去向林登·约翰逊讲一讲。约翰逊当然早已知道这个协议。福雷斯特尔到约翰逊那里后发现，他到达的时间安排在约翰逊的按摩师到达之后十分钟。福雷斯特尔讲解协议时，被按摩师一再打断。福雷斯特尔一讲话，按摩师就捶；福雷斯特尔一讲话，按摩师就揉。福雷斯特尔费了十分钟想讲解协议，仍然无法引起约翰逊的注意。福雷斯特尔当时认为，后来更加认为，这是约翰逊表示蔑视老挝协议的一种方式。

新政府的官员中，除鲍尔斯外，只有一个人曾对不发达国家表示过十分关心和有比较多的了解。此人不是麦克纳马拉，因为他认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不发达国家作为潜在的未来的市场，才会成为一个要考虑的因素；不是腊斯克，因为他虽然自认为比艾奇逊同情世界上

的有色人种，但曾发表过几次就国务院来说可算是最精彩的演说来维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也不是邦迪，因为他一贯是个大西洋派。说也奇怪，这个人就是约翰·肯尼迪。他曾于1951年和1953年两次去印度支那；一次身分是众议员，另一次是参议员。他第一次去那里时，在飞机场受到许多法国驻军的欢迎。他们准备向他介绍情况，使他相信法国一定胜利，并且向他介绍了几个穿伞兵服的越南军官，借以证明当地人如何忠于法国式的自由。他听取官方的情况介绍，而且自己也去调查。他取得西贡最好的记者的名单，并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寓所。他看起来是这么年轻和天真，以致这些记者很难相信他真是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在他们家里，他提出自己的问题，获得同官方迥然不同的情况介绍：相当悲观，越盟正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法国并不给越南人民任何形式的真正独立（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后，在完全同样的形势下，在同一国土上，肯尼迪会对写悲观报道的记者发脾气，但是他有时又对施莱辛格透露，他从这些记者的报道中了解到的情况比从将军们和大使们的报告中所获得的要多。1952年，肯尼迪对当时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霍默·比加特的工作印象特别深刻，亲自给比加特写了一封贺信。而十年后，他的西贡大使馆指出，这同一个抱着怀疑态度的、悲观的比加特——这时任《纽约时报》记者——却成了妨碍打赢这场战争的一个大问题）。最后，

94

他还同年轻的外交官、美国使馆中持不同意见者的首领、埃德蒙·古利昂长谈。他最后告诉古利昂，古利昂的意见是对的，必须对法国人施加更多压力以使他们给予越南独立。“这将失掉我的法裔天主教选民的一些选票，但这样做似乎是对的。”肯尼迪和古利昂从此开始了持续十年的友谊，古利昂后来成为肯尼迪的驻刚果大使。

这两次越南之行，开始使肯尼迪在不发达国家和殖民主义问题上受到教育。后来他两次讲话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立场（肯尼迪就越南问题发表过三次讲话，有一次是支持吴庭艳的）。接着，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又发表了一次反对法国立场的重要讲话。这并不是要抒发他的强烈感情，而是反映他那种英国式的本性和他对冷漠、鄙俗的殖民主义的厌恶。他不喜欢法国殖民官员。那些人似乎是些感觉迟钝的蠢材。他们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里仍然企图抓住某些东西不放。并且，他厌恶那种显然是由于他们那种角色带来的粗暴。他们是拙劣的政客。他们留恋过去。相比之下，肯尼迪对英国人在印度的做法有好印象，认为他们在应当退出的时候退出，根本没有发生曾经有人预言过的那种最坏的后果。

肯尼迪的助手们回忆说，肯尼迪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理解并未经过许多考虑，而是出于直觉的。他并不是那么很想接见到他的办公室来求见的那些数不清的越南流亡者。但当他辨别清楚越南的风向后，他继续保持他对

95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几乎同样的感情，他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演说成了他的最著名的演说之一。1957年6月，他偶然同他的工作人员谈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时，提到要一个专写讲稿的年轻人、前哈佛大学政治学讲师弗雷德·霍尔本写一个演讲稿提纲。霍尔本写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篇对殖民主义立场的批判。肯尼迪使霍尔本感到意外的是，他把论点改得更尖锐，而不是象他往常那样改得和缓一些。这个演讲很好，反对不管法国人做了些什么都盲目支持的传统对外政策，理由是：我们这个最老的盟国同时也是一个孱弱的最老的盟国，内部分歧很大，没有骨气，因此只要美国手指轻轻一戳，它就可能垮了。那个时候，美国的政策是如何死板和难以改变，可以从对一篇如此温和的演说所引起的强烈反应看出来。这篇演说很难说是激进的。但是它不但受到共和党内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盟友的批评，并且受到《纽约时报》的批评，受到艾德莱·史蒂文森的批评，当然也受到国务卿艾奇逊的批评。肯尼迪怎么能这样做呢？他是在伤害一个盟国。他年轻，没有经验，不老练。批评本国和盟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桩严重的事。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埃尔韦·阿尔芳去见他，正式提出不满。肯尼迪故意让阿尔芳等候，然后又故意请他吃了顿非常不愉快的午餐，一点也不让步。相反，他直截了当地提醒阿尔芳，法国内部支持这次战争的人多么少。

这是肯尼迪就国际问题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演说。一篇演说给他招来严重的批评，这也是第一次。后来，他回顾说，这也是他当总统后对他唯一有帮助的一次演说。这篇演说向全世界表明，他是支持独立运动的。但他告诉助手们说，他担心别人认为他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参议员。于是他立刻环顾四周寻找另一个国家作为发表演说的题目。这次选择了波兰。这是一个相当保险和安全的题目，因为他谈这个国家时可以赞成自由而不会冒犯选民。他对殖民主义的全部观点现在才得以清楚地阐述出来。他的观点是推理的、宿命论的。他并不喜欢阿尔及利亚人和越南人。他们使他厌烦。他们的强烈感情和狭隘的观点并不使他很感兴趣。但某些革命人物倒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同不发达国家里某些官僚分子不一样，使他发生兴趣。

似乎是殖民主义者的缺乏风格最使肯尼迪生气。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很注意风格。对他及其周围的人们来说，风格差不多就是实质问题。他
96 不喜欢那些杂乱无章和惹事生非的人，也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他自己也将对越南承担有限的义务，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消除这个问题。肯尼迪是个新型的美国人，不是空论家，并且讨厌空论家。他的1960年竞选演说中最经常被引用的话是，他不喜欢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那

些空谈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同他们在一起感到不舒服。

肯尼迪只注意理性和智力，不注意别的。符合理性的决定会受到他的欢迎。可以设想，在我们对方，苏联人也是象我们一样有理性的；尽管语言不同，制度不同，他们会有同我们一样的要求生存的观点，因而在根本上也有同我们一样的理性。他们不再愿意为了柏林通道问题的争吵而使莫斯科被核攻击摧毁，正象我们不愿意华盛顿遭到毁灭一样。

肯尼迪的风格几乎是英国式的。在压力之下态度自若，人们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肯尼迪非常欣赏的品质，而且肯尼迪也非常想用这句话来形容他自己的行为。经受很大的困难和压力而从不畏缩，从不激动，这种品质很象是英国式的。较为脆弱的、风度不那么好的地中海人在经受压力时情绪每每激动，而英国人却紧闭着嘴不动声色。英国人不愿意流露感情。约翰·肯尼迪也如此。他能原谅他的政敌理查德·尼克松在五十年代加在民主党头上的严厉攻讦，但是不能原谅尼克松的缺乏风格与风度——竟然允许他的老婆帕特在1960年大选之夜让大家看到她差不多要晕倒的样子。肯尼迪自己总是不太动感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注意到，当肯尼迪以总统身分访问爱尔兰时，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向他狂热欢呼。他的反应是忸怩地拉拉领带，把它理理直。他的风格和讲话是克制的，好象要同另一个时代的爱尔兰政

治家们，特别是他自己的外祖父霍尼·菲茨·菲茨杰拉德那种爱表现的风格相对照。

肯尼迪不喜欢那些催逼他、围拢他来向他诉说他们的事业和问题的人。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他只关心自己的问题，而不关心别人的问题。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登上总统宝座。这个时候，许多曾经造成冷战中最糟糕、最令人激动的紧张局面的势力正在很快地低落，但是美国的政治讲演尚未跟上这种变化。肯尼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感觉特别敏锐，他比大多数同时代的人对世界的变化要敏感。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很小心，几乎可以说是胆怯。既然世界在变化，冷战的紧张局势正在缓和，他就不打算为了加速这些变化而拿自己的事
97 业来冒险。他想跟上这些变化，但既不走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

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是民主党优秀分子集团最好的典型，这个集团在二十世纪中叶出了个肯尼迪。当美国领土向西扩张时，东部优秀分子集团的元老们为最具备条件的新的优秀分子创办了一些大学，肯尼迪所受的教育是头等的。因为民主党曾经是美国新来移民自然的归宿之所，所以肯尼迪和他的一家就进了这个庇护所，尽管从经济因素来看，共和党对他们会更加合适。金钱对美国的平等主义很重要。肯尼迪很富有，但同时又不显出富有或势利。他花钱很精明，很有主意。他一方面利用

金钱来使他的政治前程发展顺利，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使他花的钱不致触犯更具有平等思想的选民。无怪乎许多追随他的公民对他当选总统很放心。诺曼·梅勒①有一次用“超等市场里的超等人”来形容肯尼迪。在人们崇拜成功的一个国家里，他一直获得惊人的成功。他没有跨错过步子。他没有凭虚想去投票以致后来懊悔。他每跨一步，心里总是估量着未来。跨错步子不如不跨。他从来不走在选民们的太前面，即使在马萨诸塞州选民挣扎在麦卡锡政治迫害最猖獗的时期，他也决不走在他们前面。

电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成了候选人的主要仲裁者以后，肯尼迪的形象在荧光屏上是动人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的地位将他推出来掌握这个新的工具。他的形象被播送到几百万新教徒家庭里，看起来并不象个天主教徒。尽管他具有一切有利条件，他仍然是不满足的。他具备有钱人的一切有利条件，而没有他们那些不利条件。肯尼迪一家不是软弱的，他们仍然拚命地想获得可能得到的奖品。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个高贵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共和党人，具有同肯尼迪一样有利的条件，一样上镜头，一样富有，也许不如肯尼迪聪明，本来是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可能胜过肯尼迪的候选人之一。但

①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美国作家，著有《裸者与死者》、《为什么我们要在越南?》等。——译者

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终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他没有特别大的官瘾，缺乏钻营的劲头，也没有全心全意追求官职的欲望，所以甚至在预选之前就被理查德·尼克松唬住而退出竞选了，这不是偶然的。缺乏进取心也许是将来影响肯尼迪以后几代的问题，但是在1960年，肯尼迪家族是有锐气的。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父亲从来没有由于感到孩子们得不到社会的欢迎而不得不离开一个城市而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而约瑟夫·肯尼迪则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在他的儿子们十几岁的时候从波士顿搬到布朗克斯维尔去。

如果说许多政治家被青年时代的紧张和贫穷推向前
98 进并受到培养的话，那末，肯尼迪却又是不一样。他是爱尔兰血统，这也许是一种推动力。约翰·肯尼迪对这个问题是不介意的。他有上进心，掺杂着一种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想法。林登·约翰逊出身于美国贫苦的、受人看不起的阶层，也许经常存有对自己的得克萨斯社会背景的自卑感。理查德·尼克松年轻时贫穷、粗俗，没有社会地位，受过折磨，成为政治家中最内向的人物，总怕暴露自己。但是肯尼迪没有伤疤。他在年轻时曾受到波士顿上层社会集团的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大的自卑感。他在白宫的朋友们往往就是控制那些社会集团的人物。他显然很高兴他们到他手下工作。他是毫不难为情地自豪和自信的。象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这样的人，就能够看出他从未见过一个人象肯尼迪那样乐于自我欣赏和没有什么自卑感（这使他能忍受猪湾事件的失败，并不想推卸责任）。1960年肯尼迪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一次有人问他是否精疲力尽。肯尼迪回答说，没有，他并不精疲力尽，但他为尼克松感到难过，他肯定尼克松是疲劳了。这个朋友问他："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不必为适应环境和改变自己而操心。我每走一步都要保持我的个性。但尼克松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此他每次演说时，都不得不决定他是哪一个尼克松。这是非常使人疲劳的。"

如果约翰·肯尼迪是冷静、与世无争、超然，对自己家庭那种可怕的权力欲没有感到不合理的话，那他很有条件可以这样做，因为狂热、粗暴、全力以赴到近乎没有理性的那种性格，属于他的父亲。约翰·肯尼迪对生活的看法是宿命论的，约瑟夫·肯尼迪则不是这样。他不是听天由命而只是在命运范围内尽量把事情搞好的那种人。不，他为争取机会而猛烈斗争，他推开阻挡他前进的一切东西，相信文明的弱肉强食法则。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不满现状的、粗暴的天才，渴望着甩掉他的半移民地位，渴望着要弥补过去所受的冷落和伤害。但是，尽管他有巨大财富，却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因此，他决心最后要依靠儿子们来取得社会地位。一个儿子在白宫，一个儿子负责司法部，一个儿子在参议院，还要怎么样才能更好

地证明他的家庭已经美国化了呢?! 两个大儿子对最后那个胜利还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认为他们的家庭也许做得太过分了。但是父亲自己比他们更懂得法规——绝对不会过分。既然约瑟夫·肯尼迪把女儿们送进了最好的天主教学校，他认为最好是保持这种宗教信仰和传统，把这些信仰和传统传给他的外孙们。儿子们受的教育则恰恰相反——为的是抛弃这种传统。在他们的一生中，不会有什么圣十字大学或者福达姆大学，或者乔治敦法学院。他们被送进东部新教办的最好的学校。在这些学校
99 里，英国上层阶级的标准仍然很通行。约翰上的是乔特中学而不是格罗顿中学，或者圣保罗中学。但乔特中学也还是一所培养规规矩矩的基督教绅士的学校，使他们懂得责任和义务。然后，他上了哈佛大学。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后，终于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最初，冲劲当然是来自约瑟夫·肯尼迪而不是来自儿子。后者似乎只是不得不这样作罢了。但后来，儿子当然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野心。他成了一个出色的、典型的美国人，内心充满一个移民家庭要取得自己应得权利的强烈欲望，但表面上却小心翼翼地装得很冷静很风雅。五十年代末期，当他的事业达到最高峰，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看来并不象是一个渴望取得他应得权利的暴发户和外行人，而是一个很能对付老式的种种不幸偏见的非常优雅、很有教养的年轻人。真是完全符合约翰·奥哈拉所推崇

的总统候选人。在他执政时期，有一次，由于大都会俱乐部(华盛顿最高等的社交和政治聚会场所)不鼓励犹太人和黑人入会，引起一场风波。肯尼迪的许多朋友退会了，但麦乔治·邦迪没有退。肯尼迪觉得有趣，开始逗弄邦迪。邦迪被惹怒了，回击他一下，生气地说，肯尼迪属于那些只有很少犹太人和黑人的俱乐部，如纽约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肯尼迪笑道："犹太人和黑人？瞎扯！他们连天主教徒都不接纳呢！"

肯尼迪任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避免束缚在个别的计划、问题或者某种政治目标上。他任参议员的时候，使他绞尽脑汁的一个问题是劳动改革法。对一个民主党政治家来说，这种热情是不寻常的。他代表那整个时代——经济恐慌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及麦卡锡时期以后的美国。意识形态问题好象完结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正在衰落。代替这些的是理性、智力和分析。在解决世界问题时，杰出的人物不受意识形态、偏见和派性妨碍，可以没有限制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办事。阿瑟·施莱辛格在1960年为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

显然，肯尼迪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物。我这样说，意思是，他对事物的看法，都是在异乎寻常的程度上经过冷静、推理的分析得出来的。如果他当选，他将是伍德罗·威尔逊以后最有头

脑的总统。所谓“最有头脑”，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威尔逊的理性掩盖了深刻的激情，而肯尼迪则具有与正常人一样的同情心和偏见……

有智慧的人能够超脱自己的偏见，避免陈旧的辞藻。100 肯尼迪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官中最有头脑的人。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科查·波波维奇到华盛顿来访问并同肯尼迪会见时，使凯南得到了从来没有过那样深刻的印象。会谈中不是充满通常东西方之间常有的那种讲话和辩论。谈话是这样开始的，肯尼迪把身子向前倾向波波维奇，特别和缓地问道：“部长先生，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世界事物的发展有某些明确的看法。当你看到俄国革命以来这些年代里发生的事情时，你是否认为世界是按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的？是否有什么变化？或者，事态的发展是否离开了马克思的预言？……”

肯尼迪自己想包揽的是国务卿的职权，而不是卫生教育福利部长的、劳动部长的或司法部长的职权，这也是时代的象征。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大学里、报刊上以及知识界中，人们普遍认为真正重要的事业是决定美国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而不是改革国内政策。令人激动的是同苏联的竞争，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肯尼迪相信这点，这个时代中其他有权力和有抱负的人也相信这点。1964 年，聪明的年轻人们从东部的大学毕业后，要

到密西西比去创造一个新的美国。但是在五十年代，他们却进入中央情报局，进入国务院；甚至1961年，他们还进入和平队和国防部。肯尼迪甚至在任众议员时就问过索伦森想要内阁里的什么职位。索伦森谈到卫生教育福利部。但肯尼迪和他不同。肯尼迪作为阁员只想管国务院或国防部，这两个部是权力所在。美国财政上和智力上的真正力量、资源和精力都用在新的美利坚帝国的事业上，要证明我们的制度比别人的制度优越。肯尼迪和国内许多人物，包括新闻界，对国内改革问题都不特别感兴趣。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对国内问题一笔带过，也没有人批评他。联邦动力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威德勒曾经强烈地表示过要管制动力和公用事业方面的大公司势力。他在肯尼迪政府工作的第一年里，感到非常失望。他去华盛顿工作，是因为肯尼迪曾经向他承诺要使他的委员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大公司势力的机构。他不久发现，这个委员会不会成为那样的机构。由于美国政治的多元化，以及总统主要关心外交事务，他的要求受到阻碍。肯尼迪为了要国会通过他的重要援外法案，需要象萨姆·雷伯恩和参议员罗伯特·克尔①这样的人物的合作。他们从总统那里勒索到的代价是不顾联邦动力委

① 罗伯特·克尔(Robert Kerr 1896—1963)，美国参议员，有“参院无冕之王”的称号，曾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及俄克拉何马州州长等职务，后成为石油大资本家。——译者

员会的意见。他们需要并接受同情他们观点和大公司观点的人。这使斯威德勒很生气，感觉到自己被肯尼迪政府出卖了。后来他告诉朋友们这段故事：他曾经从办公室到白宫去，要让总统知道他多么生气，当时他脑子里闪过辞职的念头。在路上，他想到总统的一连串问题：柏林、老挝、刚果、裁军、中东、外援、赫鲁晓夫。总统肩负着所有这些重担。斯威德勒一分钟一分钟地走近总统办公室，怒火也一点一点地减少。当总统办公室的门打开时，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总统先生，要我做些什么吗？"

101

第 七 章
乱扣红帽子的麦卡锡

然而，如果说那个时期搞实用主义有过什么问题的 102
话，那就是当时外交政策问题实在太多了，危机实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都要立刻处理。而计划和考虑的时间又太少了。于是，只能对那些最急迫的问题，个别地但尽快地应付过去，至少是推迟采取行动。至于长远的解决办法，深谋远虑的改革，那就不得不等待了，至少要等到第二届任期。理性论者约翰·肯尼迪，自称最讲理性，却偏偏对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即对华政策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采取最无理性的做法，这真是对肯尼迪政府的一大讽刺。共产主义世界的变化，他是了解的，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决裂，他是了解的。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事关重大，但他要等到以后才来处理。

早先，史蒂文森和鲍尔斯曾多次向肯尼迪提到中国，说对华政策荒唐，应该赶快设法改变。肯尼迪听了一笑，表示同意，他说：的确，这个政策是愚蠢的，但是，势必要等到第二届任期再说，现在改变不了。他能办的事是有限的。当时国务院中，除了鲍尔斯之外再没有别人积极

要求向前看；腊斯克则一心以中国为魔道；一个黄种巨人正在吞噬邻国。即使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里（这是专门对外交政策问题进行长远考虑的唯一政府机构），也103看不到变化。早在本届政府执政之初，腊斯克的亲信乔治·麦吉就召集部下，讲明他不需要对中国有什么新想法。某次开会，他告诫他们：政策计划委员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场所，国会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过调查，他也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现在”，他停了一停，环顾四周，然后说：“我相信在座没有人赞成承认红色中国。好，既然意见一致，咱们就干吧……”差不多同时，在一次有国防部长、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参加的高级负责人联席会议上，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一次全面回顾。结果全场默然。他这才知道，中国问题，如果非谈不可，也只能私下谈，此外就连最机密的会上也不行，因为唯恐把政府那怕只是在考虑中国问题这个消息偶然泄露给报界，会惊动保守派。

甚至从人事问题的角度来看，当时也没有松动或重新审查的可能。早就有人促请再次调查约翰·佩顿·戴维斯案件了，他是经办中国事务的官员中被诬受害最大的一个人。新政府里不乏戴维斯的朋友和推崇者，他们认为，早就该给戴维斯官复原职了。再则，这样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纵令不大），表示新政府对过去做错了的事是要加以补救的，同时对中国和亚洲也将采取一

种新的更合理的看法。哈里曼、鲍尔斯、凯南、施莱辛格和麦乔治·邦迪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过约翰·戴维斯问题(哈里曼更是大声疾呼，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大冤案之一)。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腊斯克尽管是戴维斯的老朋友，对此也无所推动，而肯尼迪则不急于为这个毕竟可说是枝节问题的事去冒政治风险。但这不是说他不认为戴维斯是冤案的牺牲者。他倒是对白宫的助手们说过，他要在任职期间为两个人翻案，一个是罗伯特·奥本海姆①，一个是约翰·佩顿·戴维斯。他还想让查利·卓别林重返美国演出一次。结果他只办成了奥本海姆这件事，给了他一笔费米奖金②。戴维斯和卓别林就只好等了。有人向他提出戴维斯案件，他说，嗯，这是一件可怕的冤案，但只能等下一届任期来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国家和政府在1961年的一个大幻觉的组成部分，即错认麦卡锡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国家并没有付出任何真正的代价；政府和国家现在既不必同麦卡锡时期政治上和政策上的错乱行为进行挑战，

---

① 罗伯特·奥本海姆(Robert Oppenheimer, 1904—)，美国物理学家。1936至1947年任美制造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试验室主任。在麦卡锡进行迫害时期，被指控为“亲共”，后被清洗出美原子能总顾问委员会。——译者

② 费米奖金(The Fermi Award)，以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命名的奖金。费米因对核物理的研究而出名，曾为美原子能总顾问委员会成员。——译者

也不必与之进行妥协。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政府就可以设法回避，让时间而不是政治上的坦率和勇气来医治创伤。人们认为，即使那个时期留下了一些伤疤，到现在也只是一些人们看不见的伤疤了（民主党和国务院都留下了很深的疤痕）；有什么受害者的话，现在也不在眼前了，如果人们不看它们，也不再谈论它们，好歹就会消失的。然而事实的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留下的伤疤和受害者是千真万确的。麦卡锡时期已经冻结了美国对华和对亚洲的政策。肯尼迪政府全然没有正确对待这些政策的错乱行为。正如政府的拥护者所指出的，系铃人不是政府，但它也没有去解铃。他无意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肯尼迪政府时代唯一有关中国的一篇演说是由罗杰·希尔斯曼出面讲的，直到总统被刺以后才发表）而戴维斯直到约翰逊政府任职的最后几个月才被国务院恢复了名誉。

104

未能正视中国和未能正视麦卡锡时期，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政府不能现实地看待中国，就不能现实地看待东南亚。正是由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挫折，才使美国卷入越南，并在1949年改变了对越政策。临到肯尼迪当政，由于他没有正确对待中国，就很快扩大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越南的政策和承担的义务。约翰·肯尼迪从来不想修改美国的亚洲政策。甚至到了1963年10月，越南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他还对电视记者宣称：他不想取消对越南的援助，因为那样做会引起类似

当年丢失中国以前的事情在越南重演，而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这样，由于他没有能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于是1961年他就比较轻易地在越南推进了。

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国的政策是变化无常、摇摆不定的。尽管法国人被允许重返印度支那，但法国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武器和他们认为需要的运输工具以及他们所寻求的经济援助。美国在传统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当时尽管已经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但反共主义作为一个主要问题还没有出现。1944年杜威—罗斯福竞选中，共和党首次大规模使用了扣红帽子的办法。在印度支那，美国对民族主义没有表示什么同情。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害怕共产主义，而是由于一种惰性，由于忙于应付其他地区而力不从心，由于不愿出来反对一个处境不妙的老盟邦。但是，即使当时确实采取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平衡立场，显然也只是对法国人有利，因为采取一种维持现状的态度意味着重新肯定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当然，这不如有美援相助那么顺当，但毕竟是一种重新肯定。美国政策的最初失败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发生在冷战深化、铁幕垂闭之前，在罗斯福还有一些残存影响之际，而罗斯福的观点本质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它也是在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发生的。马歇尔对建立一个美国秩序的态度一向抱有怀疑。他对美国 105

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所持的看法是谦虚的，他属于较为谦虚的老一代，也就是美利坚帝国以前的一代。因此，在1947年，第一个冷战猛士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曾经这样描写马歇尔："唯有在几个方面，我对他的本事如何把握不大，一是经济背景，二是对共产主义哲学本质的了解。不过，他学得还是很快的。"马歇尔，正象在他之前的罗斯福一样，看到了一个更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但是，他们在国家安全工作方面的继承者却不那么乐于容忍世界按其本能走自己的路。冷战已经来到，美利坚帝国当然要积极参加。

然而，即使在马歇尔当国务卿的年代，对越政策也是特别令人不满的。1946年他用电报向巴黎发的指示中，既说到了殖民制度的不义，也说到了胡志明同共产党的关系。电报结尾写道："坦率地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提不出解决办法。"国务院对法国施加了压力，但没有具体措施，因为深知自己处境的局限性。如果说，国务院没有施加足够压力使法国谈判，那末，它也没有接受法国人的论点，即法国政府念念不忘的论点，认为这是一场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虽然当时美国报界没有能以深刻的洞察力探讨越盟同法国之间的斗争，可是，它也没有接受法国人的说法，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反对共产主义掠夺者的一次伟大的十字军远征。事实上，这场战争当时被认为是一场殖民战争。

但是，随后两件大事终于改变了美国的看法。在此，同等重要的是那种力求做到见微知著的意向。（很多事情毕竟是可以认识的，如果人们想去认识。但是，认识的过程不免要带一点与时俱增的风险。因此结果往往宁可不去注意那些细微的差别为妙，譬如这样一个事实：胡志明，尽管是一个共产党人，但也许首先是一个越南人，而且他并不听命于莫斯科。）回过来先说第一件大事：由于欧洲紧张局势的发展，冷战深化了；第二件事是丢失了中国，它向美国政治结构的心灵深处发射了震波。这些事件，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参议员麦卡锡的上台，大大改变了美国对国际共产主义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美国高级政治人物那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洞察细微的意向。美国政治态度的视野于是为之大大缩小。反对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两党一致的共同事业，唯一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如何付诸实施而已。一个中间派主张运用巧妙的办法来反对共产主义，以经济援助、民族主义为武器；另一派则更相信单纯依靠武力。一个大政党由于把一个 106
大国输给了共产党而受到谴责，处于守势。而其间最突出的莫过于迪安·艾奇逊作为一代军事反共主义的主要缔造者，竟沦为全国政治运动的物议中心，谴责的不是他反共太莽撞，倒是说他一向过于软弱了。

这是一个虚妄的时代。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战后共产党同西方国家划界而守，各成系统，这也许都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个举棋不定的大国正开始在打交道。这个任务，由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各自相信关于自己和敌方的神话）和原子武器这种额外的威胁因素，变得更加困难了。从长远的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那些年代里，它们好象两条瞎眼的恐龙，挤在一个狭小的泥坑里进行搏斗。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防御性的，对方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新的紧张局势和对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大国的恐惧感由此产生。而尤其容易引起感情用事的中国问题，加上朝鲜战争，使得这种边缘观点进一步合法化了；它限制了合理的讨论和采取合理的政治行动。中国局势又促进了美国冻结对待共产主义的政策。把世界的这一广泛地区看作是一种魔鬼世界的想法，竟被人们奉为纶音圣旨。对于这一切，一个大政党吓得要命，不敢有所怀疑，另一大党则欣然坐收渔利。这一切无不对印度支那产生影响。

1947 年和 1948 年是划时代的两年。一个艰苦的和平时代的轮廓越来越明显了。外交部长会议已告失败。捷克在一次政变中倒向了共产党，外长简·马萨里克跳楼自杀，一说是被推下楼的。几个月后，柏林封锁开始了。

1947 年，马歇尔宣布了马歇尔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苏联认为这个举动是一种打经济战的架势。1947 年 5 月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至此，美国执行的是一种围堵

政策，这已经很清楚了。苏联早已成为美国的敌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订者正专心致志于考虑一场全面持久的冲突。《福雷斯特尔日记》一书对于这个缔造那一时期的顽强雄辩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提供了深刻的揭示。这本日记引述甚丰，其间多次提到的，首先是美国公众和报界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和弱点，其次是民主主义者在同极权主义独裁者竞争中往往会产生的那种慕尼黑协定以来长期存在的传统恐惧症。（1947 年 10 月某天，福雷斯特尔在同罗伯特·罗维特、沃尔特·比得尔·史密斯①、罗伯特·墨菲②和卢修斯·克莱③将军共进午餐，他问驻苏大使史密斯，俄国人想不想打仗。史密斯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俄国人并不想打仗。“但是美国人比我们更其不想打仗。这就使我们的地位较为有利了。”）正是由于害怕美国公众会表现软弱，再加上需要在这种最困 107

① 沃尔特·比得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1895—），美国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战后历任驻苏大使、第一军军长、中央情报局长、副国务卿等职。——译者

② 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 1894—），美国外交官。二次大战后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驻比利时及驻日本大使、副国务卿等职。——译者

③ 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 1897—），美国将军。1946—1949 年先后任欧洲美军总司令、西德美国军政府代表等职，后退休。1961 至 1962 年任肯尼迪的驻柏林私人代表。——译者

难最复杂的斗争中勇于决策，所以下述观点就成了整个这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计划者的一种基本信条，即认为从本质上说，这种竞争根本不公平。这里颇有讽刺意味：似乎1947年在福雷斯特尔和艾奇逊领导下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人煞费苦心搞起来一场反共运动，只是为了事隔十八年后让他们的嫡系后代无法摆脱他们亲手参与制定的调子。一旦跨上虎背，他们现在感到骑虎难下了。

但是他们更多关切的还是如何促使美国对付这种预感的威胁，而不是如何下虎背。这些人全都来自大的投资和金融企业，或者是这些企业聘用的律师；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一向对共产主义怀有根深蒂固的疑惧（也对俄国有疑惧，但主要是对共产主义）。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和定义来看待正在增长的美苏冲突的，在他们看来，这是主义之争，而不仅仅是两个新的大国在为取得双方平衡而进行的斗争。因此，这些制定战后美国政策的人的着眼点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从国家关系来考虑问题的。福雷斯特尔（此人对共产党的意图尤为疑惧）满心高兴地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里发现了一位精明的年轻知识分子外交家，名叫乔治·凯南。凯南对苏联意图所提出的警讯马上被福雷斯特尔看中了，认为对这场面临的大斗争提供了一种别具眼光的历史论证。福雷斯特尔把凯南的报告传给了华盛顿的朋友们，而凯南也就在一夜之间发迹了。他的报告随后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用

笔名 X）并出了书①。该书成为一本战后美国外交的基础读物，几乎被每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所诵读。它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而凯南从此以围堵政策的创议人而著称。但是他一向谈俄国比谈共产党为多。他后来发现他的想法被上司利用了来为美国外交政策不断增长的黩武化作借口，于是同外交政策的其他设计者分道扬镳，因为凯南认为，他们在政策上太偏重意识形态，太偏重军事了。他感到，共产主义世界从根子说是民族主义的，不是单纯体制的，而我们只是自立妄说罢了。五十年代初期，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已经形成一种大体一致的看法，凯南的见解则代表了这个范围内最早提出的真正重要的异议。

而凯南的体验又何只限于一人。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负责人惯于利用他们自己专家提供的情报，断章取义，民族主义问题则轻描淡写，共产主义问题则恣意为用。朝 108
鲜战争期间，同样的事也发生过。当时，中国问题专家曾准确地预见中国将要干什么。这些意见不是基于一般共产党的意图，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得来的。最近的事例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专家们再一次准确地预见河内对美国的战争升级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对这些不同意见，二十年前很少有人感兴趣；当时需要的只是举国

① 指发表在 1947 年《外交》季刊上的《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该文鼓吹“遏制”（一译“围堵”）政策。——译者

一致的反共，别的什么都不中用。

这是一场有关意识形态和两党一致的运动。它得到了报界、教会和好莱坞的支持。令人震惊的是，对于这场反共运动的水平竟然没有什么争论，也没有什么提高。人们都抱着一种彻头彻尾的中间派立场，这样，政治上很保险。不这样，政治上就会有危险。艾奇逊描写过一段1947年杜鲁门同国会领袖们讨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议案时的情况：

他强调，对这些国家的进攻和压力，并非如表面现象所见，仅仅是由于同他们邻国的边界争议，它们是苏联一系列行动的组成部分，这些行动包括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加紧共产党的活动。我注意到参议员范登堡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沙发上，这时突然全身前倾，说："如果你把这个意见对全国讲出来，我就支持你。"这番话就是这么说的，它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惊讶和不满。

在感到惊讶的人当中，有艾奇逊的上司乔治·马歇尔。他认为这个发言未免有点轻率，涉及的面也太宽了。他不了解，由于冷战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对某些次要事情略而不问。这就是希腊和土耳其这头几张多米诺骨牌①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党政府竟会提出一些非常非常接近共和党少数派需要的东西作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而这些东西正是反映了那些

① 多米诺骨牌（Domino）的意思是，一张牌倒了，其他牌也随之撂倒。这里指政治上的连锁反应。——译者

最有势力的银行家和律师们的利益和偏见的。为了把事情办妥，政府乐于以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概念来看待这个冲突。民主党人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弱点的（民主党的自由派往往同受到国内共产党影响的改革事业有联系），因此越来越愿意调转航向，回过头来听命于较为保守的国内敌手。

国内的反共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初见端倪。1946年当选的参议员，作为一个集团来说，比他们所击败的人显然更加保守，更加反共。理查德·尼克松在竞选中就是通过把竞选对手的竞选纪录同纽约左翼众议员维托·马坎托尼奥相对照而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议席的。反共的气味至此已经甚嚣尘上了。1947年，总统一方面宣布外交方面的杜鲁门主义，同时发布行政命令，制定了一个忠诚安全规划，为若干年内大搞所谓安全案件杀出了第一刀。根据杜鲁门法令，司法部长开列了一个搞颠覆的组织和外国组织的名单。当有些对这个方向和这道命令感到不安的朋友问起杜鲁门时，杜鲁门回答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个活动从帕内尔·托马斯手里揽过来，托马斯是当时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当杜鲁门的朋友克利福德·杜尔（联邦交通委员会的成员）问总统这件事时，杜鲁门回答说，如果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他可以修订或者撤消这个命令。

109

杜鲁门政府认为要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于是它不是

去同指责人们对共产主义和颠覆表现软弱的那种无理性的行动进行斗争，而是进而把事情接过来自己干。（在外交上它已经更巧妙地这样干起来了。）这样一来，反共问题变得合法化了。它不再是极右派的禁脔（共和党的中间派为了明显的政治利益加以容忍），却被当权的民主党捡起来据为己有。第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案件——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案件①，就是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发生的。然而同后来的案子相比，做的还算是相当客气的。

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通常的国内问题左右着竞选活动；外交政策没有成为主要问题，因为共和党人完全有理由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同现行政策也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不必求助于这个问题。十六年在野之后，他们现在对取胜充满了信心，实际上是过于自信了。他们自认为掌握了民主党大量的丑闻，他们过高估计了国内的不满情绪。他们低估了杜鲁门这个与罗斯福大异其趣的政治人物。罗斯福美仪多姿，有贵族风度，在这个无线电时代里，他善于以其绝妙的嗓音通过电波表达惊人的自信，极富政治感染力，使一人的信心扩而为全国的信心。在四次败于罗斯福之后，共和党

①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1909—），美国外交官，在麦卡锡进行迫害时期，被指控为“亲共”，后被赶出国务院。文内所指的就是这件事。——译者

人对罗斯福同杜鲁门之间的差异窃以为喜。他们低估了杜鲁门在政治上吸引人的地方，他精神抖擞，平易谦和而又行事果断。他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的，但共和党人未能认识到这些缺点都是普通人的缺点，选民对杜鲁门的缺点和美德是具有全面的认识的。这的的确确是一场普通人针对大资本家利益的竞选运动。杜鲁门是普通美国人的绝妙象征，小人物。这位彻头彻尾的政客把反共问题多少视为己任，巧妙地抓住了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孤立了亨利·华莱士①和斯特罗姆·瑟蒙德②的南方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竞选运动，实质上是一次"我也跟着来"的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从中汲取了教训，下一次就不那么谨小慎微了。到1952年，外交政策和对国务院软弱的指责就成了竞选中的主要问题。 110

所有这些都还没有影响到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当时几乎不存在什么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日益增长的国内反共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是不利的，然而也还没有到很坏的程度。接着，在1949年，发生了一

①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 1888—1966)，1941至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1946年任《新共和》主编。1948年是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译者

② 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 1902—)，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美国参议员等职，并曾被南部民主党人推选为总统候选人。——译者

件大事，它预示法国在印支取胜决无可能了。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这个事件也意味着美国支持法国已属势在必行，而美国最终参战也是很可能的了。这件大事就是丢失了中国，是又一次不受我们控制的伟大的历史力量所造成的事件。巴巴拉·塔切曼在一本关于约瑟夫·史迪威在中国的经历的书中写道："到头来，中国会走自己的路，就好象美国人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一样。"

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卷了进去，最后毁灭了它，引出了共产党，日本的侵华（以后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役）对中国干了同样的事。一个半民主政府刚刚从黑暗的封建旧时代中艰难地诞生，还处于支离破碎的局面。正当蒋介石可能会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日本人困住了他，威逼他倒退，使他的弱点暴露无遗。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刚刚萌芽就夭折了，新的中国不是蒋介石和西方列强的中国了，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中国。这是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反封建力量，它唤起了农民和世代相传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愤怒，它使蕴藏在这个伟大国度里的强烈的潜在感情获得了解放。美国的政策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想方设法把他作为抗日力量来用。后来，当蒋介石的军队开始崩溃而共产党成为一支更具有生命力的力量时，我们曾试图尽可能在不可调解的局面中进行调解，促使他们合作。当时一些驻在中国的年轻美国外交官曾提出警告说，我

们必须正视蒋介石垮台的这一前景。这个故事，日后又在越南重演：蒋介石如此，吴庭艳多年间亦复如此，那就是：说强，只能勉强维持统治，说弱，毕竟一时难于推翻。吴庭艳的军队腐败，他的将军只靠裙带关系和个人效忠而取得地位，他的精兵从不打仗。于是在日益增涨的可怕压力之下，他转而听信亲属和小人的阿谀谄媚。这正是一个垂死政权的症象。

如果说蒋介石军队的溃败是历史力量的作用，那么新中国的兴起也是如此。新中国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恶势力斗争中诞生的，它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宏图，要来发挥这块辽阔的大地上的一切潜力。共产党人在旧中国的废墟上站起来了。他们同过去的事物大不相同。他们胸怀壮志，对世界，对腐朽的事物抱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极端严峻的态度。当时在大陆上的一群精明能干的年轻国务院官员，曾以深刻的洞察力报道了这种局势，对蒋介石的行将崩溃发出了警告。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想用“勇敢的”这个词汇来形容他们的工作，可是这个形容词对当时的情况来说并不切合。他们当时只不过是在执行任务，进行报道，力求准确地作出预测，如此而已。然而这些报道和预测是何等的准确啊。 111

到1944年末、1945年初，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和少数在中国工作的人员已经很清楚，一场大搏斗即

将来临。当时有一位《时代》杂志的年轻记者白修德①(他对美国政治和中国事务都很熟悉)，开始对未来感到了一种险恶的预兆(他这种预感是有道理的；他写的对中国的出色报道使他终于离开卢斯的刊物完事。白修德有他心目中的中国，而卢斯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他不接受白修德的观点)。到 1945 年，白修德知道真正的内战已经不可避免，而内战一旦爆发，蒋介石必垮，共产党必胜。白修德意识到，如果他的一些有远见的外交界朋友如实报告事态发展，他们的前程恐怕就不免受到影响。他跟当时最干练的年轻外交官之一雷蒙德·拉登谈了这种看法(这些年轻外交官确实出色，以至史迪威干脆把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从使馆挑出来作为他自己的部下)。白修德说："你知道，情况如此，可能要出点什么事。国内有不少人是不喜欢这样的发展的啊。"拉登回答说："一个外交官的职责在于如实报告他所看到的情况，而不应该去迎合美国国内的想法。"白修德当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回答。一片忠诚感动了他，但也使他惴惴不安；这里是否有点天真幼稚的味道呢？(确乎如此：拉登的事业从此被上司认为有了污点，往后便在亚洲以外的不同工作岗位

---

① 白修德(Theodore White, 1915—)，美国作家、记者，二次大战期间任《时代》杂志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曾获帕利策新闻工作者奖，为对外关系协会会员，著有《中国惊雷》(与贾安娜合著)等书。——译者

上调来调去，度其岁月。）

白修德在1945年开始预见的一切很快成为现实。随着中国悲剧的展开，断送了很多外交官的前程，约翰·佩顿·戴维斯和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当然不能不落到最悲惨的下场。年轻一些的、比他们低一两级的人也许还能悄悄地离开亚洲司到别处去，他们的事业尽管受到影响，但不至于完全毁掉。就戴维斯和谢伟思来说，他们的灿烂前程却从此结束了。这对于他们为之服务的国家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是这一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的外交部门什么时候出过这样一些难能可贵的人材呢。他们是在亚洲事务方面堪与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相媲美的人物。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也许会留下来，到肯尼迪政府上任时，也许会成为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们也许能够对政府作出那种最难能可贵的贡献，即在高级工作水平上提出真知灼见。 112

到1945年和1946年，中国问题很明显已成为某种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了；支持蒋介石的右翼势力作为一种国内政治威胁开始露头。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们，由于已经辞去驻华大使职务的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指控（说这些官员有意识有计划地破坏他的工作，说他们同情共产党），现在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了。赫尔利此人对出使辱命、调解无计（对不可调解的事务进行调解）心怀不满，

却回头来整自己手下的人——不用说，他是对共和党右翼极有影响的人。于是现在好象是找到了反对国务院官员的最得力的证人了。这时年轻官员受的压力尤其大，这是因为军人中的一派相信，当时如果动用空军，中国本来可以很容易挽救过来，并不需要美国付出任何重大代价（这种分歧意见同日后越南的情况又何其相似乃尔）。克莱尔·陈纳德将军是一直鼓吹空军论的，为他在政府内层敲边鼓颇为得力的是一个叫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年轻参谋人员，他在华盛顿同哈里·霍普金斯很有交情，又是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远房表兄弟。艾尔索普上尉一向醉心于中国以及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他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幕僚政客，曾在1944年决定召回史迪威的事件中起过关键作用。（谢伟思几年后回忆说，艾尔索普常常跑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来议论史迪威："应该把他揪出来，关禁闭，抽鞭子。"谢伟思深有所感地说，真是怪事啊，你想想，史迪威是四星上将，而艾尔索普不过是个上尉。尽管史迪威有使馆人员为他做工作，艾尔索普还是用阴谋整垮了他。）于是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替代了史迪威。魏德迈伙同陈纳德在亚洲组织了一个支持蒋介石的集团，同国内的共和党人关系极密。那时，史迪威因为公开批评蒋介石无能而被召回。魏德迈则采取同蒋介石周旋的政策。这个政策好是好，就是毫无结果，一切毫无进展，毫无作为。关系是不错，就只是魏德迈一味迁就蒋介

石。很快，魏德迈也开始向马歇尔抱怨中国人不同他合作了。

到1947年，在中国问题上的压力增加了。国务卿马歇尔屈服于愈益增长的反对意见，终于在5月份解除了不许运军火到中国的禁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中国撤退时把军火移交给了国民党人。7月，派出了以魏德迈将军为首的调查团，这是向反对派作出的一种小小的姿态。9月，约翰·卡特·文森特被解除远东事务司 113
司长职务，以讨好共和党人，同时也使他本人少受共和党人日益加剧的批评浪潮的冲击。迫害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文森特是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们在政府中主要的保护者，也是国务院中殖民地人民的最高代言人，经常热心地为他们说话。(四十年代末，在一次宴会上，他发现荷兰大使夫人这样介绍他："这是文森特先生——你知道，亲爱的，就是使我们丢了印尼的那一位。")文森特尽管是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还是被派到海外了，而且不是当大使，因为那需要征得参议院的同意。沃尔顿·巴特沃思代替了他。①这个人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他同亚洲事务没有任何牵连。他在战争期间负责处理美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利益，因此一般可以信得过会处理微妙的政治问题。马歇尔很信任这样一个稳健负责而且看来可以

① 沃尔顿·巴特沃思(Walton Butterworth, 1903—)，美国外交官，曾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驻瑞典大使等职。——译者

免受右派攻击的人，因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那段工作使他同那里的法西斯国家打过交道，一度成为左派咒骂的目标。巴特沃思是清白的，并打算守之如恒。他清楚马歇尔给他的命令是什么：美国不要卷入中国的战争。马歇尔曾对他说："巴特沃思，我们可不要陷进去啊。如果陷进去，我就需要五十万人，这还只是开头。"巴特沃思后来回忆说，马歇尔当时的脸部表情活象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商标——那只咆哮的雄狮。马歇尔还补充说："我又怎么救出这些人来呢？"

巴特沃思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是直率和保守的。但是此刻污染了的不是人而是事。和善而略近保守的文森特，临到任期结束已经几乎无法安排工作了，和善而保守的巴特沃思的命运也是如此。到1950年，他就不能担任需要参议院批准的任何职务了。（那时，文森特内定派到哥斯达黎加当大使。这看上去是一个安全点，但是他的敌人仍然暗中作梗，说这样做还是太冒险了。他最后落到丹吉尔去了，那里的职务不需要批准手续。）当巴特沃思接管工作之际，文森特正因为忠诚问题受到传讯。他只是靠同两个有权势的参议员的亲戚关系（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和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内特·梅班克）才得救的。艾奇逊和他也是熟人，替他说了话。"我了解约翰·卡特·文森特。对他的控告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艾奇逊当时这么说。（几年之后，麦卡锡又以忠诚问题指控

文森特，当时他在瑞士。他的辩护律师在让文森特准备出席答讯的过程中颇感为难。文森特的律师伯纳德·芬斯特瓦尔德回忆说："他当时是这样的态度：如果事情真的到了这步田地，如果就连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人，那简直是活见鬼，世界的末日到了，还讲什么呢？他只想一走了之，玩高尔夫球去。"）

如果艾奇逊对文森特感到有必要为他说项，杜勒斯就不是那么热中了。毫无疑问，这些搞中国问题的人毕竟是在给他制造难题，他们真是太天真了。有一次杜勒斯和文森特在一起，杜勒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问文森特读过没有。文森特说没读过。"如果你早读过，你就不会主张象你在中国的时候主张的那种政策了，"杜勒斯说。杜勒斯刚一上台，就决心非把文森特从外交工作中撵出去不可。其时，杜鲁门组织了一个由勒尼德·汉德法官领导的专案审查组，正在审查文森特的忠诚案件，杜勒斯告诉汉德法官说，他不需要汉德办这件事了，并且亲自裁定：虽然文森特"在忠诚问题上"没有什么"合理的疑点"，但是他的表现"未能满足具有象他这样经验和责任的外交官在那种关键时刻所应该达到的水平。我认为他已不能继续作为一个外交官很好地为美国服务"。杜勒斯让文森特选择撤职或退休，文森特要求退休。

114

谢伟思可不象文森特那样走运，如果可以用走运这

个字眼的话。他没有什么后台，同艾奇逊也没有个人关系，而这对决定国务卿采取什么态度是很重要的。这样，当一个安全小组以含糊其词的指控(后经法庭驳回)提出要搞谢伟思时，艾奇逊不等天黑就把谢伟思解除了职务。这是杜鲁门政府作出的决定，然而在艾奇逊所著《创建战后新世界亲历记》一书长篇叙述麦卡锡时期的那部分里边，竟没有提起这件事。

在丢失中国之前，迫害的气氛早已浓厚起来了。但直到1949年蒋介石完全垮台共产党接管政府时，才真正感觉到迫害的影响。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如果是失去印度或者某一个非洲国家，反应就不会一样。这是因为美国的传教士热爱中国；总的说来，中国比皮欧里亚①更具有吸引力。中国有一个较好的生活方式，那里不乏值得加以归化的异教徒。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品质，伟大的文化，精美的烹调，动人的魅力，这样就铸成了这种特殊关系。中国人严肃、正直、勤奋、谦恭、爽快，这些都是美国人最推崇的美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并无多少事实根据的关于非常特殊的美中关系的神话。我们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反过来，他们热爱我们。这个神话是用数以百万计的零钱建立起来

① 皮欧里亚（Peoria）是靠近美国中部伊利诺斯州和衣阿华州的一个印地安人聚居的地方。——译者

的，孩子们把零钱投在成千上万个教堂的捐款盘子里来支持传教士在这向往基督的异国大地上进行工作。中国是美好的；中国人和我们很不同，却又和我们很相象。还有什么比这更罗曼蒂克，更安全的呢？日本人不好，疑心重，不堪信任。中国人好，可以信任。 115

这样，在一场充满强烈宣传的战争之后（电影里只见日本人蹂躏中国；美国部队拯救中国人；中国护士拯救受伤的美国飞行员，当然也爱上了他们，如此等等）丢失中国真好比是当头霹雳。那些热爱我们的中国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丢失中国意味着战后的局面更难应付，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魔鬼观（也就是从战争时期的俄国人好而德国人坏，中国人好而日本人坏，转到战后的德国人好而俄国人坏，日本人好而中国人坏的观点）。我们国家对此是毫无精神准备的。一个思想混乱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去找替罪羊和诿罪于人，这比承认有些事并不受我们控制、世界并不尽善尽美要容易些。

国务院知道致命的打击正在到来，于是在1949年8月发表了对华白皮书。这个文件目的在于说明丢失中国是蒋介石的过错，美国作为盟国已经尽其所能。事后看来，白皮书最突出的是它的内容是颇有见地的。那是由一批极其聪明有为的年轻人起草的，他们提出了他们对局势的估计，就这一点来说，堪称国务院文件的最高水

平。从此以后，年轻外交官都学乖了，谈意见则模棱两可，写报告则敷衍一气。

1950年初，对国务院的攻击开始了，先由共和党的《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一组文章，随之而来的共和党对国务院和民主党的攻击便以此为根据。象《邮报》这样一个重要的舆论喉舌竟也不坚持对事物进行清醒多思的评价，而钻到阴谋秘闻中去寻找答案了。它恰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作者，前上尉约瑟夫·艾尔索普，此人现已回到美国，他对我们未能支持蒋介石和蒋介石的全部路线十分不满，急于要采取报复行动。这个包括三部分的一组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我们丢失了中国》。这不是一篇严肃的新闻文字，提出对一个没落的封建社会的看法，而只是陈纳德—蒋介石路线的借尸还魂。它给那种认为只因有人搞阴谋才丢失中国的说法定了调子（虽然比往后一些人略为高尚），把责任全部推到国务院身上。这个标题大堪回味：《为什么我们丢失了中国》。这里俨然认为中国是我们的，是一件可失可得的东西。这是一个其后多年外交政策制定人为之梦寐难安的妄说。有好些国家是属于我们所有的，我们可能丢失它们；于是一个总统从此面临由于丢掉一个国家而受到讹诈的危险。

那时，《邮报》是影响大、受尊重的刊物，纵然有点保守。艾尔索普的文章够不上严肃性的标准，这些文章不成熟、不深刻，这正是他的风格。文章并没有一口咬定说

116

有人搞阴谋，只是有所暗示，这也是他的风格。（文中说："这件冒险事业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时史迪威是驻华武官，他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是副领事。惠特克·钱伯斯①有名的南瓜秘藏文件里也有一份史迪威在这个阶段的情报。这份情报说明，甚至在三十年代，史迪威已对中国国民党人深怀偏见，而同情中国共产党人。戴维斯所持的观点大体相同。史迪威和戴维斯主要是中了自由派观点的流毒，这种观点把共产党人天真地描绘成'民主的土地改革者'……"）艾尔索普的文章强调了这些事件的阴谋性质，但还没有直截了当提出叛国的罪名。如果没有人追下去，事情原来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但有些人硬是要追。艾尔索普的文章既出，这个案件逐步合法化了。二十年后，不管是戴维斯还是谢伟思，都认定这些文章对于形势的急转直下起了决定性作用。《邮报》的文章把这个问题从那些激进分子的手中接了过来，赋以一种庄重的色彩，这在正愁找不到把柄的共和党，自然如获至宝。它不但对共和党人深具价值，也为麦卡锡主义这个美国世纪中最黑暗的一页，提供了重要材料。麦卡锡滥用这种指控竟达到连艾尔索普都感到吃惊的程度。

---

① 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1901—1961），原为《时代》杂志编辑，1948年自称当过苏联特务，并诬控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曾向他提供国务院秘密文件，即所谓"南瓜秘藏文件"。——译者

打击报复国务院里一些傻瓜年轻人也罢了，麦卡锡竟搞到了迪安·艾奇逊这样上了岁数的老朋友的头上，那怎么行。在威斯康星州有过一个这样令人难忘的时刻：有一次，麦卡锡象通常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国务院的一些头头，在场的艾尔索普（他是记者团一员）站了起来，忿怒地反驳他，大声疾呼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艾尔索普当然可以为艾奇逊这样的人打保票，因为他们是熟人。但当对主办中国事务的官员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艾尔索普同样义愤填膺，表现得很不错，为他们的案子出席作证，为他们找律师。可是，二十年后，当越南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之际，他的表现却不甚高明了，他又大施故技，向华盛顿的人散布说，鸽派记者都是卖国贼。（当然同时他又要让人们知道他过去表现不错，譬如对记者大谈麦卡锡时期受打击最厉害的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事。他说："拉铁摩尔的确是个十足的傻瓜。为傻瓜、混蛋辩护是一件难堪的事，可是有时你不得不这样做……毕竟，做蠢事同叛国是有区别的。"）再过几年，他又可以在西贡的酒吧间里跟那里的记者们说，他们都是傻瓜，他们将因为所犯的错误受到国会委员会的调查，但是他愿意为他们出席作证。

不是每个人都能对做蠢事和叛国加以区别的。那时
117 并不是讲究区别对待的有利时刻，即使对于象这样一清二楚的区别也是如此。因为这时正赶上1950年，我们已

丢失了中国，共和党其势汹汹，民主党招架为难。他们过去对共产党人太软弱了吗？太糊涂了吗？他们现在要重整旗鼓。为了确保民主党做到这一点，为了把日益僵硬的外交政策中那最后一点灵活性也搞掉，于是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乔·麦卡锡登台了，人称“机尾射击手乔”，一个应运而生的政治煽动家。他上来得如此之猛，消失得如此之快，留下的影响又如此之大！他是1946年选进参议院的，靠了狂吹自己的战功为资本，在共和党预选会上击败了过于自由主义、过于自信的罗伯特·拉福叶特。“他和其他千百万美国士兵使你们能幸免于讲日本话过日子……国会需要机尾射击手，美国需要战士……这些曾在外国土地上拯救过美国的战士赢得了在和平时期为美国服务的权利……”他赢得了正式选举。他是一个很够味的候选人，作风顽强，身体健壮，是平民党根子很深的州里的一名铁杆平民党。他秉性精明狡猾，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但缺乏严肃感，目光短浅得很。他有天赋的充沛精力并富于某种感染力。虽然他是以横扫一切恶势力、打倒东部佬的猛将面目出现的，但人们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他实际上最渴望厕身于那些人物之中，被昵称为老乔，被延作入幕之宾。

麦卡锡当选四年后，一心想找一个题目，他毕竟不能老是反对日本人啊。1950年1月，他找到了。这个月7号那天，他和一些天主教朋友一起吃饭。他们当中有自

由主义者德鲁·皮尔逊的顾问前海军陆战队成员、威廉·罗伯茨、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教员查尔斯·克劳斯教授（也是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及埃德蒙·沃尔什神父(他是乔治敦大学副校长，极为保守的外交学院的评议员，反共历史长达三十余年，最近刚写了一本关于共产党的书，名为《极权》)。当下，麦卡锡在这家名叫“殖民饭店”的餐桌上提纲挈领地讲了他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引人注意和激发选民的题目。罗伯茨建议：圣劳伦斯航道①如何？麦卡锡说，这个没有性感吸引力。接着麦卡锡谈到了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月支百元的国家养老金计划。过于空想了，其他的人不赞成。(行文至此，我心不禁为之一动：假使此人当时选中的题目竟是养老金而不是共产党，历史会不会因此改观呢？)饭后，他们从饭店挪到了罗伯茨的办公室。沃尔什神父开始谈论他最拿手的题目，共产主义。他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越来越重要。沃尔什一边说着，麦卡锡一边竖起耳朵听。这看起来很有道理，
118 他自己也曾有一两次谈过这个题目，反应挺好。麦卡锡心里盘算这个问题，不胜激动。的确，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题目，是一个大可利用的题目啊。他说，政府里尽是

① 圣劳伦斯航道(St. Lawrence Seaway)，指由美国和加拿大在圣劳伦斯河联合修建的一项工程，以使圣劳伦斯湾和安大略湖之间通航远洋轮船。该工程在美国引起长期争论，直到1954年国会才批准美国参加修建。——译者

共产党，“硬是要整整他们”。在场有些人劝他要力求慎重，要做准备工作，要搞得非常准（后来他们都否认同他有关连）。但是，已经晚了。麦卡锡已经踏上征途了。

1950年2月9日，他飞到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打响了大规模指控共党阴谋、乱扣红帽子的第一炮，他说：“我没有时间把国务院里的共党分子和间谍网成员一一点名，但我手头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名单。国务卿明知他们是共产党，可是这些人现在还在国务院里工作，参与制订政策……”他选择的这个时机再好没有了。四个月后开始了朝鲜战争。当时，中国事务专家们早已被搞臭了，因此他们虽然事先提出警告说，美国的行动可能会使中国介入战争，但国务院置若罔闻。警告无效，中国进入了朝鲜，而针对中国事务专家的反共情绪又来劲了。真是莫名其妙的事。

事情正式开始了。问题已经摊开，当然都是一些莫须有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战后的恐怖和不稳情绪。麦卡锡坐飞机周游全国，大放厥词，非常嚣张。他每到一地，停留时间不长，匆匆忙忙提一些新指控，亮一份新名单，在飞机场举行一个富有新闻价值的记者招待会，跟记者们厮混一通，然后又飞赴下一站。他是张咀胡诌，拔腿便走。他利用了美国报界虚伪的客观性（如果一位高级人士说了什么，即使不是事实，也是新闻，记者的职责就在于把它原原本本印出来，不加评论，不必去索疑求

真；此之所谓客观性）。这一切好象是在演马戏，他不停地在转动，他说的数字前后不符，他做的工作杂乱无章。他似乎对国家安全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有时，他似乎也对整个事情感到惊讶：一切多容易啊！反抗多微弱啊！于是他进而抛出了更大更新的指控。如果说这些新指控实际上没有能站得住，其为害则一：起到了毒化气氛的作用。无火不冒烟嘛。如果这件事没有几分影子，人家能说那么些吗？因此事实（或缺乏事实）气化之后，污染依然存在，细迹消失之后，涂色长留不褪。不仅一般人，就是艾奇逊，甚至马歇尔，也在所不免。以马歇尔一代最杰出的军人政治家之尊，他的形象也并非白璧无瑕。民主党，国务院，无不如此。麦卡锡简直闹到了无边无际的地步——他竟攻击起那些自认有权决定反共范围和限度的政府官员来了。

119

对于这一切，共和党真是喜出望外。麦卡锡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他个人有什么本事或才华，而在于他得到那么多应该更为高明一些的人们的默许。在那个期间表现好的人为数极少。报界甘心情愿被他利用，很少人起来进行斗争（甚至事前大吹大擂的爱德华·默罗① 所拍的关于麦卡锡的记录影片也只是在 1954 年 3 月才公演，时在麦

① 爱德华·默罗（Edward Murrow，1908—1965），1935 至 1961 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职。1961 年后任美国新闻署负责人。——译者

卡锡惠林演说过了四年又进而攻击了军方之后)。好象报界也是往事在心，自觉有罪似的。民主党并没有对麦卡锡或对他指控的根据进行斗争。国会里有几个人进行了斗争，但国会的领导并没有同麦卡锡对垒，而是等他自我消耗，跑完全程了事。如果他走得实在太远，再来整他也不迟。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说走得太远，当然是指他开始攻击共和党自己人了。所以麦卡锡指控的受害者民主党并没有作为一个组织与之进行斗争，也没有把自己真正力量使出来。至于共和党人，就更差了，他们欢迎他，他越是攻击民主党，对他们就越有利。民主党人迫处守势，共和党人则身受其惠。用一个观察家的话来说，麦卡锡"就象一头替共和党滚地雷阵的猪"。共和党内传统保守派、1944年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约翰·布里克这样对麦卡锡说过："乔，你真是个婊子养的。有时就得有这么几个婊子养的去干肮脏事啊。"

布里克并不是唯一默许这一切的人。道貌岸然的罗伯特·塔夫脱①，人称"全德先生"，竟也同流合污，因而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写下了最不光采的一页。他告诉麦卡锡，如果一个案子搞不成，放下它去搞另一个便是。塔夫脱和麦卡锡之间的奇特关系，一部分是由于私人拉扯，麦

① 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 1889—1953)，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1947年与哈特莱共同提出反动的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案。麦卡锡时期，也很嚣张。——译者

卡锡对塔夫脱长期卧床的妻子曲献殷勤，常去探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那个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年轻有野心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则在麦卡锡和体面的共和党中间派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塔夫脱那时尽管已是过时人物，但为了急于整民主党人，也曾对一些在效忠国家方面无懈可击的人提出过十分轻率的政治指控，这是他自愿干的。如果当时他能顶住麦卡锡的鲁莽轻率，整个共和党本来是会同他站在一起的。在他的墓志铭有关他生平的这一段里应该这样写一句：明知道不对，却经不住强烈的诱惑。

上升者必有顶点；上升快的，垮下来就更快。艾森豪威尔是让麦卡锡自生自灭。1954年，麦卡锡完蛋了，他闹得也太不象话了。他早就被参加那次“殖民饭店”会餐的初期顾问们否定了，他使自己脱离了那些主张谨慎从事的人。他受到了参议院的检举，从此开始纵酒，1957年死去；但是他留下的恐怖气氛还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为英语提供了一个新词“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利用他在这个国家发现并加以利用的恐惧心理，损害了两个主要政治机构——国务院和民主党。他也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当时而且随后，变得更加僵硬。美国为此，特别在越南，付出了代价。它的余毒至深且广。

120

丢失中国、麦卡锡的出现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三件事的汇聚和交织，给美国国内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同样也必然对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民主党政府大为被动；丢掉一个国家怎能不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呢！于是每一届新政府都越来越容易受到任何一个自称反共的小小的寡头政府的讹诈。杜鲁门的反共论调在1947年很容易就出笼了，这时就更加容易。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成了这种论调的俘虏。于是产生这么一种倾向（这是颇为微妙的事），即用多少不同于从前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对印度支那尤其如此。很少有人倾向于认为法国的对越战争是一场殖民战争，而更多地认为它是一场西方的反共战争，一场目的在于给越南以自由的战争。1940年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保大皇帝，到1949年下半年竟一变而为体面人物。国务院文件中有关胡志明信仰民族主义的部分开始减少了。由于朝鲜战争，记者的新闻文字也同样如此。甚至有一种更大的倾向，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世界性的势力，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说成是一个整体。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就职典礼上宣称：法国士兵在印度支那和美国士兵在朝鲜，都是为同样的目的而战。艾奇逊在关于麦克阿瑟的意见听取会上出席作证，想制止共和党对我们盟邦的批评，也是归结到这一点。当时经过事先安排的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故意问艾奇逊："国务卿先生，有些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我们的盟邦，说它们

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帮助我们。国务卿先生，你能否在这里评论一下，我们的盟邦是否在别的什么地方帮助过我们？我是指印度支那。”

“这话问得好，”艾奇逊回答说，“法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那里打这场仗啊！”这同他较早时候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他原来认为这是一场愚蠢的殖民战争，但又别无出路。五十年代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就这样被糟踏了。

第 八 章
从朝鲜到越南

好的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常不断地加以审 121
查。世界在变化。国内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本国的政治趋向的认识都在变化。五十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法国印度支那战争也正处于高潮，共产主义当时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铁板一块，麦卡锡紧张气氛正浓厚地笼罩着美国。在那个时候，把在东南亚的政策放在全面反共的基础上，这是一码事。但是在1961年（虽然麦卡锡已经下台，制订这些政策的气氛也已改变，但这些政策却差不多仍是老样子），世界和美国的情况都已很不同了，这时还如此漫不经心地接受那些政策，那就是另一码事了。1961年，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已经十分明显：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他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自从美国参议院谴责麦卡锡以来，已经七年了。不仅麦卡锡已死了，他同时代的许多同事凯姆①、诺兰②、詹

① 凯姆（James P. Kem, 1890—1965），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译者

② 诺兰（William F. Knowland, 1908—），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国会中院外援蒋集团的头头。——译者

纳①、麦卡伦②——都是他的同路人，——也都不在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进入参议院的新共和党人，大多是温和得多的现代人。但是肯尼迪政府对艾森豪威尔的亚洲概念一点也没有重新估价（这些亚洲概念是杜勒斯谨慎小心地专门为了适应参议院里麦卡锡集团的意向而
122 创造的）。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那倒是肯尼迪的人马着手把执行这些政策的手段提升一级，并使之现代化。后来，当他们的政策在越南陷入窘境时，他们就气急败坏地对他们驻在越南的人员、对记者、对受援国政府的无能大骂一通。他们并不理解的是，问题不仅仅在于常常不称职的美国人员，也不在于极不诚实的政府报道，或受援国政府（这个政府正如它最严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坏），真正的问题是没有重行审查这个时代的各种看法，特别是对东南亚的各种看法。新政府上台后，没有真正试图对胡志明在越南人民和较大的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地位进行分析，也没有真正试图确定吴庭艳究竟代表什么，或是判断多米诺骨牌理论事实上是否成立。每当多米诺骨牌理论送给情报专家去评价时，他们的回答总是反映了对这种理论是否成立有所怀疑，但是政府的最高层却始终不

---

① 詹纳（William E. Jenner, 1908—），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译者

② 麦卡伦(Patrick A. McCarran, 1876—1954)，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译者

敢触动这个理论。仿佛是担心，只要提出问题，他们就可能发现这种理论的空洞无益，于是就会被迫根据他们的新发现采取行动。事实上，总统发表的关于老挝和越南的公开言论，一直到他被刺的时候为止，都反映了如果他不是赞同多米诺骨牌理论，那么就是他认为还不能向这一理论提出挑战，而由于不能提出挑战，就必须遵循这种理论。

因此，肯尼迪政府对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对越南，依然采取积极的、进攻的、强硬的反共态度，也就不足为怪。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的反共路线是依靠核威胁和夸夸其谈、虚张声势，那么自由派的、现代的、特别缺少自我怀疑并有相当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肯尼迪政府，它所执行的反共路线则是重实效和果断的。差不多就在肯尼迪政府上台的同时，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提出民族解放战争是合法的。肯尼迪政府马上把它看作是一个挑战（数年之后，很高级的苏联官员告诉肯尼迪政府中类似地位的人，说这完全是个错误，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不是针对美国人的，而是针对中国人的），阻止游击战突然变成一时风行的概念。高级官员被鞭策去研究毛泽东。总统个人对于同游击队作战的兴趣得到广泛宣传，阅读和撰写有关反游击战的书籍受到鼓励（总统在为一部非常平凡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选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要求海军陆战队的全体官兵都来阅读并好好领会这

部上好的作品……”)。

对游击战的着迷反映了人和时代：这些进取的、自信的人，随时准备起他们的作用，相信他们自己，相信他们123的事业，相信他们在这里和海外作出决定的权利，极度地自信他们代表着全国的精华。国家仍然卷在同共产党作无休止的斗争中；欧洲已经稳定下来，朝鲜战争以后不再会有超越国境的战争，因此新的活动舞台只能是游击战。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罗伯特·肯尼迪担心美国日益软弱，担心我们拿不出能抓住世界年轻一代想象力的观点，他是这种风行一时的概念的领袖人物之一，其他的人也都同样地赶时髦。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经常参加反叛乱小组的会议，每当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有点望而生畏，因为他历史上曾有一次通过空投进入法国。罗杰·希尔斯曼在缅甸后方的战斗受到了不少的注意；众所周知，肯尼迪曾经详细地询问过他作为游击队员的经历(他们俩都忘记了希尔斯曼是个突击兵，而不是游击队员。他没有参加当地的任何政治组织)。

一种明显的盲目自信感贯串了这整个时期。早在九年前，丹尼斯·布罗根就写道：“唯一具有历史必胜感的民族可能就是美国人。”这种说法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那样确切。肯尼迪一帮人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人马在他们遇到的挑战面前退缩了。邦迪的副手沃尔特·罗斯托认为旧政府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可能发生的事，发生冲突的巨大

可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取得胜利的巨大可能。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艾森豪威尔的人马都是些过时的人物，在思想方面从来不是太强的。人们不能想象谢尔曼·亚当斯①会鼓舞印度尼西亚的青年，甚或去关心他们。但是这届新政府懂得意识形态，理解我国的传统和不发达国家的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我们也是一场伟大革命的继承者，我们也曾经同一个殖民强国打过仗。我们不是比他们富有得多吗？不是更加有技术吗？没有问题，在看法上并没有什么差距，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为他们服务的。通过半导体可以促进共同的事业（在所有这些方面包含有这种想法：即我们给他们的技术愈多，他们就愈少注意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特别是罗斯托，他对在世界各地的草舍茅屋里安装电视机的可能性简直着了迷，他相信这件事总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了解敌人方面坚强而有害的领导核心，也不是说我们太软弱太民主以致不能战胜它。罗斯托把胡志明这些游击队领导人叫做“革命中拣破烂的人”，罗斯托是不赞成这些人的。

所有这些推动了肯尼迪政府进入反游击战活动和讨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潮。肯尼迪一帮人没有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准备一场新的更为巧妙的冲突。罗斯托称之

① 谢尔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 1899—），1953—1958年任美国总统助理。——译者

124 为革命中拣破烂的另一方，很快就会遇到美国新培养出来的美军特种部队，这个部队真是一批罗曼蒂克的人物。他们全是不平凡的人，既是身强体壮的标准汉子，又是知识渊博的哲学博士，他们能攀着树藤在树上来回飞腾，他们既会讲俄文又会讲中文，晚间吃蛇肉和其它的动物，还会对无防备的亚洲伏击兵进行反伏击战。这些亚洲人只读过毛泽东和武元甲的著作，而没有读过希尔斯曼和罗斯托的书。一切都将令人振奋，而且更好的是，代价小而效果大 。

1961年10月，白宫的新闻记者团，被送到布莱格堡去观看肯尼迪最得意的特种部队所进行的一次特种演习①，这是一次真刀真枪的实弹演习。有伏击，也有反伏击，还有吃蛇肉的表演，最后的压台戏是一场巴克·罗杰斯式的表演：一个士兵背着一枚火箭飞过水面在对岸登陆。这真是一次精采表演。只是在他们要离开布莱格堡的时候，曾经报道过印度支那战争的法新社记者弗朗西斯·拉勒，挨近他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托姆·威克，对他说："这一切看起来给人的印象都非常深刻，是不是？"威克认为是这样。拉勒说："奇怪。1951年我们就试过这一套，可是一点也没有用。"

---

① 肯尼迪死后，这所特种战争学校就改名为约翰·肯尼迪特种战争学校了。——作者

1961年1月对越南问题发出第一声警告的是美国政府一位很不寻常的人物。陆军准将爱德华·兰斯代尔这个人仿佛是专门为肯尼迪政府创造出来的。兰斯代尔以前是个广告商，当过空军军官，当时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是个对在亚洲如何正确地用现代方法办事深感兴趣的人。他在政府里作为一个不同凡响的反官僚政治的人物而著称，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到处都有他的敌人。五十年代初，他在菲律宾帮助拉蒙·麦格赛赛①击败民抗军的叛乱，因此，同坏的美国人相比，在海外他成了好的美国人的典型。他反对由那些麻木不仁、吹牛夸口、搞官僚政治、利欲熏心的种族主义者去实施那种庞大而杂乱的美国政府计划；他赞同由那些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和文化语言、平易近人、朴实谦虚的美国乡村出身的年轻人去实施适合当地情况的小型计划。他之所以是好的美国人的典型，部分地是由于他自己的经历使他深信，美国人事实上是好的；美国人的经历和美国人的理想在其它各地也是有效的。他对他在菲律宾的早期经历写道：

一天，我驱车行驶在潘潘加省一条偏僻的公路上，在一个城镇的广场上碰到一次政治集会。民抗军的一个政治官员正在大声疾呼地向群众发表演说，历数他们在收成、债务和分配方面的种种困难，他把这些邪恶都归咎于"美帝国主义"。我鲁莽地从停 125

① 拉蒙·麦格赛赛（Ramón Magsaysay，1907—1957），1953—1957年任菲律宾总统。——译者

在他们旁边的吉普车上跳了下来，爬上车盖，在演说人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就大声叫喊："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朋友吗？"群众楞住了，都转过头来，看到了一个身穿军装的美国人站立在吉普车上。我脑子里一闪，下一步应该冷静下来。我暗暗埋怨自己，怎么可以在成千上百个生活在敌对领土上的居民面前这样冲动。但是这些人马上使我定下心来，他们笑着向我打招呼。这位演说者和许多人把我围了起来，提出他们所知道的和喜欢的美国人的名字，问我是否认识他们。我同他们开玩笑，提请他们注意，他们所知道的那些人就是他们一直在谴责的"美帝国主义者"，他们向我保证说，那些人一个也不是。好久，我才离开了这种闲聊的友好气氛。

菲律宾的实验成功了；关于他，有人写了一本叫做《不体面的美国人》的书，畅销全国。陆军上校兰斯代尔稍加改装成了希兰代尔陆军上校(如果他在《不体面的美国人》一书中的角色是要表明怎样做一个好的美国人的话，那么有些人就认为，他并非自愿地就成为当代另一本令人寒心得多的书中的主角，那本书是格雷厄姆·格林写的《静悄悄的美国人》。在那本书里，这位新型的好美国人是个高尚的、有理想的年轻人，急于要为一个较古老的社会造福，不管它愿意不愿意都要把它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这是个好心好意但却是特别危险的人物)。兰斯代尔正是肯尼迪要找的典型的现代好人。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一直是无用武之地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资历！他是个懂得新式战争的中心人物，曾在菲律宾

帮助击败过一次类似的共产党叛乱(尽管很不同，比较简单而且远未成形)。他体现了美国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还没有多少人理解到：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的本性受到腐蚀，已经变成了强硬的反共主义。他是冷战时代的典型好人，是确实懂得当地周围情况和当地民族主义的美国人。因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而且不只是一个情报官员，他是具体执行任务、具体起着作用的人，是掌握计划并在那里进行操纵的人。据说兰斯代尔了解而且热爱亚洲人。对他那样一些人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再是什么对当地人民有好处这样单纯的问题，而是什么对美利坚合众国有好处而又可能为当地所接受的问题。亚洲人可以有民族主义，但必须是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没有革命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由我们为他们进行的革命——结果是没有革命的革命。

他对越南最近的事变过程的看法是令人欣慰的，他设法缩小越盟的作用和一场持久的独立战争的后果。越盟得到的群众支持比他们想象的要少，人民都站在双方之外，结果法国人被描写成为越南的独立而战。

越南人把他们的历史告诉我。简言之，这些精神焕发的人民 126
被中国统治了一千年，被法国统治了一百年，在那些年代里，差不多每个年头都标志着为独立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越南人宣布他们从维希政府的法国行政官员的微弱控制下取得独立。胡志明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参加者，他们着手在一场血战

中消灭他们的政敌，残存者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宽恕这场血战，虽然当时整个世界对此还一无所知。法国军队1946年回来的时候，共产党人正掌着权。于是在越南人和法国人之间发生了战斗。法国人攻占了城镇，胡志明带领他的部队上了山，开始同法国人进行"持久的斗争"。

大多数越南人仍然渴望独立，但是不参加任何一方。他们既反对共产党越盟，也反对法国人。当战争在他们的家园周围猛烈进行时，为了能活下去，哪一方在当地占统治地位，他们就向那方面口头上表示顺从。当法兰西联邦部队蹂躏农村试图摧毁越盟的游击队时，愤怒的人们为了报仇就参加了越盟一方。后来，法国人采取了增加越南人自治的措施，并允诺越南独立，于是民族主义者日益大量地开始参加反对越盟的战斗。1953年在我访问越南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都已采取了反对越盟的明确立场。

1954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行将最后完蛋，在那些日子里，兰斯代尔那伙人在河内到处奔走，将糖放入越盟卡车的汽油缸里，这简直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战争结束了，一个亚洲民族主义的军队战胜了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取得了独立；而美国高级的游击战专家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采用了最无聊的破坏形式——简直就象蚊子乱咬一样。在西贡，兰斯代尔协助扶植吴庭艳，寻找一个越南的麦格赛赛。为了说服疑虑重重的美国政府，使它相信吴庭艳是个值得试用的人物，兰斯代尔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吴庭艳上课，教他如何进行现代化领导，吴庭艳对于

这些课程一向是小心翼翼地、忠心耿耿地口头上表示同意。他教吴庭艳如何进行竞选反对保大，而吴庭艳这位高足坚持要得到98%的选票。兰斯代尔还搞了其它一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看起来总好象是过时的而不是现代的东西，例如他雇用了占相卜卦的算命先生——不三不四的封建越南过去的象征——预测胡志明今后灾难的年月和吴庭艳美好的未来。

兰斯代尔实际上成了在越南反对革命的人物。对于革命和土地改革在那里谈论得很多，但是美国人的出现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这些都没有影响兰斯代尔在美国的声誉，美国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国家；关于他作为一个半地下人物的神话继续传布，他是个对付非常规战争的非常规人物。他自己呆在幕后，他不出头露面使神话好象更为流传。他本人有时显得出奇地令 127
人失望，几乎是个凡夫俗子，特别是与肯尼迪时代其他人的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相比，更形成鲜明对照。他是那种专讲一些粗俗不堪、含糊不清的陈词滥调的人。他会说，你得深入民间，最好让娃娃自己学着走路，而不要教他太多。他之所以成为这样，一方面是他生来的作风如此，另一方面是他相信表露得太聪明并无好处。他的知心朋友可以看到他在私下交谈时有相当的洞察力，而当一个局外人参加进来时，他的谈吐就转为粗俗平淡。朋友们认为他在菲律宾和越南所取得的那种成功，一部分原因是

他同亚洲人打交道时，通常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不去作难也不去欺压他们。他是在海外的美国人中最少见的一种人，一个愿意倾听别人讲话的人。

在艾森豪威尔年代的末期，兰斯代尔回到了越南。因为他在国防部激怒了实权人物，所以他在寻找后台支持时遇到了困难，但是最终还是在政府内找到了一个朋友，委派他去越南。他发现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事实——正象在那里的记者们1960年也发现的一样：越盟的新名字叫做越共，在农村运用游击战的方式已接近于胜利，而美国军事顾问团却还在继续训练越南军队，准备朝鲜式的入侵。吴庭艳总统几乎完全孤立于他以前的朋友和盟国之外，日益依赖他那唯我主义的弟弟吴庭儒，吴庭艳同美国大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之间实际上连话也不说了。

兰斯代尔写了一篇冗长而又非常悲观的报告，批评美国人，也批评吴庭艳，但特别批评前者。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兰斯代尔是培植吴庭艳的一个人，你总不能打击自己一手培植的人。但是更有重要意义的是，这表明了兰斯代尔的观点，表明了其他好的美国人的观点，那些对亚洲人有同情心的人的观点。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引起这些问题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反对我们的历史性的力量，而认为是没有能提供恰当的人选和恰当的技术。兰斯代尔立场的含意是，他相信如果恰当的美国人恰当地

去影响吴庭艳，吴庭艳是会响应的。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万能主义”。他建议组织一支兰斯代尔式的反官僚政治的队伍：“我们在越南的美国队伍中应该有一个由有经验的美国人组成的坚强核心，这些人了解而且真正喜欢亚洲人，愿意为自由的理想而献身，愿意以我们的亲密的盟友关系所应该得到的那种热烈友谊和感情去影响越南人，并且引导他们走向美国的政策目标。我们应该打破调配人员的规则，如果需要的话，另派这样的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到越南去。”兰斯代尔所推荐的当然就是兰斯代尔。

兰斯代尔的一个朋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日子里读了这份报告，把它挑选了出来，并交给了新政府。不多几天这份报告到了罗斯托那里，他正期待着某种这样的东西。（兰斯代尔对罗斯托的影响是饶有趣味的：1954年，兰斯代尔到处奔走把糖倒进越盟的汽油缸里；1962年，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时钟一分一秒地记录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马上可能发生，罗斯托在华盛顿到处奔跑，大谈对古巴人的破坏行动，把糖放进他们的炼油缸里，这样就会使他们停止生产和运输……）罗斯托敦促肯尼迪读这份报告，但总统似乎有些勉强，他经常是没有多少时间的。他问：难道这份报告真是那样重要吗？罗斯托坚持如此。肯尼迪稍微翻了一下这份报告，罗斯托回忆当时总统说：“沃尔特，这可能是最糟的一份报告，” 128

又补充说："按照这个干吧。"罗斯托很快就干了。

至于兰斯代尔，他给总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就是肯尼迪所需要的那种人。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兰斯代尔被总统的一个电话叫醒，匆匆忙忙地被召去参加一次特别的白宫早餐会。当他走进去的时候，肯尼迪和蔼地接待了他，并指着腊斯克多少有点随便地说："国务卿有没有提起我要你到越南去当大使？"兰斯代尔受宠若惊，嗫嚅地说，这是个极大的荣幸，极好的机会。他深为感动，更为惊讶，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可这偏偏也是最后的一次。这项任命从未得以实现。兰斯代尔后来认为他被腊斯克卡住了，虽然他也知道国防部并不急于要他去越南。只是在五年以后，他才去越南；那时，反游击战已经过时了。兰斯代尔好象是个特别不中用的潦倒人物；这个懂得如何正确地反对游击战的创始人，成了对越南乡村使用大规模轰炸和炮火的庞大的美国顾问团的一份子。

兰斯代尔更为具体的建议捅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那里（意味深长的是，越南已被作为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这些建议本质上是反对官僚政治的；兰斯代尔反对作战行动完全按美国的方式进行，反对根据美国官僚政治的需要而不是越南的现实需要建立顾问团，他认为改变这些做法将会是不可避免的。1961年初，吉尔帕特里克计划领导一个特别工作组在华盛顿监

督这方面的工作，以兰斯代尔作为它在西贡的负责人；人员方面有小量的增加，一些兰斯代尔式的专门人材，当然是在兰斯代尔的领导下执行任务。这些建议最终是在4月底提出的，但马上由于官僚政治的需要而被撇在一边。这场游戏一开场，竞争着的各方都开始要求增加人员。这就象阿米巴虫的繁殖：各方要求使自己的人增加一倍；一变二，二变四。根据修正后的建议，当时共有六百八十五人的军事顾问团，在训练小组里就要增至三千人左右；其他各方的人员都将相应增加。 129

这些建议提到了肯尼迪那里，肯尼迪看了十分讨厌。他一点也不急于要送这么多的美国人到越南；他好不容易刚刚从猪湾事件里摇摇晃晃地摆脱出来。如果他小心谨慎地不致被看为在冷战冲突中表现软弱，那么要跳入另一场冲突，他也是小心谨慎的。数年后，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肯尼迪不愿增加任何人力或物资到越南去，特别是人员。甚至总统最终批准的小量数目也是极其勉强同意的。三千人的军事小组不成立了；虽然4月29日总统确实批准了一个四百人的特种部队执行训练使命，但这毕竟是总统特别得意的部队，他们被认为是进行这种战争的专家。但是他的态度实质上还是照章办事的；这项越南使命由正规的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职业官员以正常的方式来执行，而不象兰斯代尔所希望的那样，由那些反对官僚政治的专门人材接手。

那里不会有专门人材，也不会有兰斯代尔。

然而，继续卷入越南的第一项行动在这以前就早已采取了，甚至连政府都不知道它采取了一项多么严重的步骤。这样做为的是避免作出一项真正的决定，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1961年3月15日驻越南大使的调换，埃尔布里奇·德布罗为弗雷德里克·瑞尔汀所替代。德布罗这一任大使当得并不愉快，他看到了越共对吴庭艳施加压力的开始，同时也看到了吴庭艳在加速脱离现实、脱离朋友和盟国，他们的讨论变成了越来越冗长的单方面的独白。后来，德布罗坚持打断吴庭艳的发言，告诉吴庭艳说情况正发展得多么糟糕，于是他们之间的会晤就越来越不经常了。德布罗其实是个非常保守的人物，但是他奉命要对吴庭艳坦率，而他的坦率现在却越发变得不愉快了；最后，德布罗建议吴庭儒应该被送出国外去当大使。他要求吴庭艳进行政府改革，改善指挥官的素质，扩大政府基础，所有这些看起来活象史迪威将军要求蒋介石所做的一模一样，而且他们同样地都没有受到欢迎。德布罗在他任职的末期，事实上已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决定替换他之后，政策并没有改变。政府对德布罗上呈的报告的精确性并不怀疑，但是它经不起对
130 政策作一次严肃的重新估价，因为不论吴庭艳有多少缺陷，还得依靠他。因此政策中的改变是从坦率对待吴庭

艳变为以礼相待，希望这样总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信任和相互信赖的气氛。为了鼓励这种信任感，政府选中了弗雷德里克·瑙尔汀。

瑙尔汀的朋友是很多的，他们管他叫弗里茨。他是一个有着恰当经历的恰当人选。他曾一度当过大学教师，他出身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名门家庭，有过一段优秀的战争经历，当然是在海军里。他属于一批弗吉尼亚州比较保守的民主党人所组成的一个特殊的集团，这些人在对外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内部控制了大部分外事机构，他们认为外交事务是绅士的职业，而且以为他们具有特别优秀的绅士品质。这个勤恳、正直、不大喜欢提问题的人，非常好的阅历，他沉着、坚定，被每一个他为之工作过的人所推崇。在去越南之前，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公使衔担任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因此是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的首席助手。在越南，他第一次担任大使，以前他从未到过亚洲，他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完全是通过他在欧洲的经验形成的。根据既定的原则，那些最了解亚洲民族主义的人是不准到他们选定的地区去供职的（他们过去的经历把他们搞臭了）；如果他们还没有离开外事工作，至少也已经另调它职。因此，由于过去而付出的代价是把瑙尔汀这样的欧洲通派到亚洲去；这位对亚洲一无所知的新大使马上要求并得到了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的最高副手威廉·特鲁哈特充当他的使馆的

副职，而特鲁哈特也没有去过亚洲。特鲁哈特是瑙尔汀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曾一起在弗吉尼亚大学呆过，而且就是特鲁哈特说服瑙尔汀参加外事工作的。

瑙尔汀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象征着一种美国信念的连贯性：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武器顶住了共产党人；事实上，只要我们有决心，我们就能够作出我们的决定，而后在外国予以实施；世界欢迎我们的保护和我们的价值标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越南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在越南进行着一场反对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独立战争。（瑙尔汀在他到任后不久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作为防止公开袭击的一个壁垒而成立的，它已经坚持了十三年。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防止隐蔽侵略的壁垒。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就将在另一条战线上遏制住共产党人。"）

肯尼迪班子里没有人对瑙尔汀有多少了解，这项任命看起来似乎是他们一时的疏忽。只有一个人好象察觉了这项任命潜在的重大含意，这个人就是切斯特·鲍尔
131 斯。他早就一直主张对亚洲的政策要有个重大的改变，要使越南中立化。当时看来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了一场更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继续支持吴庭艳集团的危险性。他这个副国务卿是负责大部分的大使任命的，他强烈地认为，人员的调换意味着政策的改变。他只是在最后才听说瑙尔汀的任命，并打算予以否决。他觉得国务院里

的传统主义分子和强硬路线分子正为瑙尔汀的任命出力，考虑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来历，这也并不奇怪。鲍尔斯想到一个他认为去越南特别合适的人，一个名叫肯尼思·托德·杨的外交官，他过去曾在越南任职，对当地的问题和民族主义非常敏感，对此他享有名声。在杜勒斯的年代，他由于对美国政策的失望而感到压抑，因此离开了国务院。杨随着肯尼迪政府的出现而又回来，被派到老挝特别工作组去工作，在那里引起了鲍尔斯的注意。当时，在3月初，杨已经内定为驻泰国大使。但是，鲍尔斯当时就深信东南亚的主要问题将是越南而不是泰国，他希望在那里有个对一切事物最敏感的人。此外，他认为杨同肯尼迪在政治上比瑙尔汀更为合拍，他认为这对一个大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使所去的国家正在生死的边缘上作最后的挣扎。

因此，在这两个人都被批准去各自的岗位后——瑙尔汀去西贡，杨去曼谷，鲍尔斯想设法调换他们。他跟杨谈了这个问题，发现杨并不热心接受这一主张，因为杨不想搞掉瑙尔汀的职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不大愿意同吴氏家族打交道。他告诉鲍尔斯说，他要想一夜。

那天晚上杨对所有的问题苦想了很久。这个越南总统是杨的老朋友，因此杨深知吴庭艳的才干和缺陷；对吴庭儒夫妇的情况，虽然他并没有兴趣，但也是个权威。他认为他们简直就是祸害，只要他们在政府里，就不可能在

越南有所成就。如果想要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就必须把他们从吴庭艳那里分开来，而且要很快地分开来。只要这对夫妇还在国内，你就不可能希望在那里反对他们；他们会在每天晚上破坏你白天的工作。新大使必须同吴庭艳建立一种完全坦率的关系，一种完全基于彼此业务需要的关系，而不考虑过去个人关系的好坏。第二天，杨去见鲍尔斯，并说他愿意试一试。不久，兰斯代尔代表吉尔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叫杨赶快参加越南特别工作组的
132 会议。杨有点不解：为什么需要他？“难道你还不知道？”兰斯代尔问道，“总统已经同意你去西贡了。”因此，这好象已经通过了；可是后来这件事再次受到阻碍，外交礼节问题太复杂，而且瑙尔汀反应很坏，觉得这种调换对他是一种侮辱（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确是这样）。肯尼思·杨于是到泰国赴任，他在那里干得很好，受到的压力比如果他去越南要小得多。他在曼谷以日益惊恐的心情注视着西贡，因为那里一开始就很清楚：一切有关改革的要求都将放弃，吴庭儒夫妇将成为政府中的统治人物。在西贡的弗里茨·瑙尔汀发现他自己处于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最后不仅离开了越南，而且还离开了外事部门。

瑙尔汀主要是个浮在表面上的人物。如果吴庭艳能为他的国家、他的政权设计一个大使的话，他就会设计出弗里茨·瑙尔汀。他是只跟东道国政府和社会的上层打交道而不关心整个国家这样一种外交官的极好例子。如

果你同政府相处很好，把它对现实情况的说法向上报告，那么你就算做好了你的工作。他的工作不是提出问题，而是把事情做成功。无疑瑙尔汀对自己所做的和所说的是相信的。他也看了，也听了，最后断定吴庭艳是周围最出色的反共人物（当然再没有其他的人了；吴庭艳已经有步骤地清除了所有其他的反对者——共产党人、中立主义者、反共人物）。那些担心吴庭艳政府缺少号召力、担心政府越来越孤立的人们，用他的话来说，是眼睛没有看对地方。阻止共产主义才是眼睛看对了地方。如果在西贡的文职人员对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和压制有所议论，他就会向大家——包括华盛顿在内——保证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这当然也是真话，因为除了吴氏家族以外，没有越南人信任他。他禁止使馆成员同任何持有不同意见的越南人交谈。只要你没听见，它就不存在；只要你没看见，它就永远没有发生。

推动着瑙尔汀的是任务和职责而不是聪明才智。他在那里是为了守住一条线，而不是为了对这条线提出问题。他的政策是吴庭艳要求什么他就同意什么，以便同吴庭艳建立一种信用关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报答。这就需要经常退让，经常点头同意，以此不断地向吴庭艳作出保证。这种情况具有奇特的讽刺意味，因为美国人经常警告说，亚洲人会告诉你你所希望听到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位美国大使却告诉亚洲人他们所希望听到的东西。

但是弗里茨·瑙尔汀的特殊意义在于，正是由于选中了他当大使，由于他决定说："行，我们能同吴庭艳相处共事"，我们正使自己陷于承担一项旧的行将失败的义务，而我们自己对这项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却还没有真正懂得。

133 这项义务的束缚不久就进一步加紧。1961年4月末，肯尼迪在决定反对大幅度增加美国顾问团人员的同时，认为要用无形的援助而不是有形的援助来为吴庭艳鼓气。办法是利用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时他正没有多少事可干。于是安排了约翰逊出访一些亚洲国家，而关键的停留处是越南。奇怪得很，越南却不是副总统特别想要停留的地点。正象一年以后那样，总统要他去柏林作一次象征性的旅行，他抵制不干——他觉得他总有点被利用似的，他的事业（也许他的生命）可能受到损害——约翰逊对去西贡之行表现如此不热心，肯尼迪只得用好话劝他。他说："林登，不必担心，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故，萨姆·雷伯恩和我将会给你举行得克萨斯州奥斯丁①从未见过的最大的葬礼。"

不管怎样，此行对约翰逊来说来得正是时候，他那时既非肯尼迪政治上的局内人，又非肯尼迪的谋士，正处在

① 奥斯丁(Austin)是约翰逊家乡得克萨斯州的首府。——译者

他一生事业中的最低点。他有时会对他的知心朋友谈起他的司机曾如何劝他不要离开参议院去当副总统，他低声喃喃地说，他多么希望，当肯尼迪在洛杉矶向他作这个建议时，那位司机也在那里同他在一起。对于其他的人，他当然要竭力表示他同政府的内部决定深有关系，他是真正的局内人。1961年初的一天，当时《纽约时报》的国会记者、很了解约翰逊的拉塞尔·贝克，刚走出参议院，就被约翰逊一把抓住（“是你啊，我一直在找你”），就此拖进了他的办公室。当时贝克听了一个半钟头的高谈阔论，谈到了华盛顿，谈到了林登·约翰逊如何忙，事情进展得如何顺当。有谣言流传说他不是局内人物。好吧，就在前几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杰奎琳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对他说：“林登，你不会抛弃我们吧，会吗？”他们需要他。这是个道地的约翰逊，比现实生活表现得还要逼真的约翰逊，如果贝克不完全相信，至少当时约翰逊是相信的，这一事实使约翰逊其人更为出色。大约四十分钟以后，在谈话的中间，贝克注意到约翰逊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按了一下电铃，一位秘书走了进来，拿着这张纸走了，几分钟之后又回来了，把那张纸交还给约翰逊，他看了一下就把它皱成一团。而后这场谈话又继续了五十分钟。最后，贝克为这场表演搞得精疲力尽，他离开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名叫戴维·巴尼特的朋友，也是个记者。他们点头打了个招呼又各走各的路。

第二天，巴尼特又碰到贝克，问贝克是否知道约翰逊在那张纸上写了些什么。贝克说他不知道。巴尼特说："写的是：'我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约翰逊早期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是华盛顿最有
134 影响的民主党人，他的精力曾使整个华盛顿惊叹不已，而现在在这次旅行中他的这股精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了。他离开了华盛顿，有事可做了；他深入穷乡僻壤发表演讲，他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觉得同他们在一起，蹲坐在一起，发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根治疾病，大家有饭吃，得到电力），他是能够同这些人建立感情的。他在那里向村民进行宣传，越是农村的地方越好，他坐牛车，邀请一位巴基斯坦的骆驼夫到美国去。约翰逊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刚刚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写道："这些村民无疑是喜欢这些的，他们的笑容将在照片上表现出来。"）

作为一种总统的关怀姿态，约翰逊带着肯尼迪的妹妹琼和妹夫斯蒂芬·史密斯同行。约翰逊作为一个老练的竞选人，并没有忽视利用他们表现美国人对亚洲人的传统关怀的象征。每到一处，他都向人们介绍他们，宣扬他们的重要性，用典型的约翰逊式的夸张抬高他们的个人地位：琼·史密斯起初是"总统的可爱的小妹妹"，很快就成了他的"宝贝小妹妹"，而后又成了他的"小不点儿的宝贝小妹妹"了。斯蒂芬·史密斯恐怕是这个家庭中唯

一不在政府中工作的成员，而他却被介绍成“总统的妹夫，总统家庭中最亲密的成员之一”，而后被说成是“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然后是“国务院的一位重要官员”，最后被说成是“一位在国务院里担任一项最重要最敏感的职务的人物”。

约翰逊奉命去越南询问吴庭艳要不要军队，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派军队到越南去的问题都没有给予多少考虑，除非只是作为一个象征，象美国军队呆在西柏林作为美国意图的象征那样。这些军队如果被接受的话，也是呆在那里给人看的，而不是参加战斗的。有军队呆在那里就是向共产党人表明美国决心抵抗；这样就会使共产党人加以考虑。如果这不行的话，那么还可以有其它的姿态，这些姿态既是做给共产党人看的，也是做给美国人民看的。约翰逊会晤了吴庭艳，发现吴庭艳并不急于有白人的军队在他的国土上。吴庭艳知道，第一，他的人民对任何人在那里接替法国人的现象都会感到不满，因而可能会引起反作用；第二，如果他太仓促地接受美国军队，对广大人民来说，这将是他个人弱点的一种表现。他当时已经过分地依赖美国人。

吴庭艳给约翰逊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这整个插曲成了那个时期明争暗斗手法的一个范例。约翰逊在给总统的最后报告中写道，吴庭艳“是个为许多问题所缠扰的

复杂人物。他有可钦佩的品质，可是他远离人民，被那些
135 不象他那样值得钦佩的人所包围……”整个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公正的分析，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当时还没有人把吴庭艳面临的问题同法国印度支那战争所造成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如果那是约翰逊私下的看法（这种看法同当时美国记者所写的没有多少不同），那么他公开所说的就很不一样。在公开场合，吴庭艳被捧成“东南亚的温斯顿·邱吉尔”。这一比喻使得大家心惊肉跳，除了吴家的成员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最合适最恰当不过的了。在他旅程的下一段，当时为《星期六晚邮报》工作的斯坦利·卡诺问约翰逊，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吴庭艳是那样。约翰逊回答说：“屁！可是，老兄，我们在那儿只有他这么一个家伙。”（嗣后，东部报刊出现了一些批评，一般地批评了约翰逊的华而不实，突出地批评了他对吴庭艳的赞扬；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得克萨斯州的牛仔又忘乎所以、做得过分了，他不象肯尼迪那些人，没有巧妙处事的才能，他不懂外交事务。对此，约翰逊私下感到非常怨恨，他觉得他的行动和言论都是根据命令行事的。他告诉助手们，他对那种说他倒牌倒坏了事的指责非常恼火。他说他是根据命令行事的，“他妈的见鬼，他们还不知道我是带了一副做了记号的牌去那里的呢！”）。

约翰逊向总统报告说，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必须而且能够制止（在东南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必须以必胜

的力量和决心去参加)，就是越南也能得救（“只要我们迅速明智地行动。我们的国家工作委员会必须协调我们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目标。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军事援助计划要由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美国人来掌管”)。这是当时日益强硬的美国观点的一个极好典型，它是通过美国的经验、美国的需要和美国的能力的分光镜来看待越南的。只要美国人做得对，美国的目的就能影响那些人的命运。越南人民是次要的，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他们等着比较明智比较精明的外国人去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如果这又是一个“万能主义并发症”的例子，那么这同样可以是承担义务这套把戏具有危险性的一个例子。肯尼迪派约翰逊到越南去是作为一种亲善的表示，向一个软弱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保证他所承担的义务的一种措施。但是持久的影响不在受援国方面，而在施主国方面；在这一次的情况中，最重要的是在林登·约翰逊这个使者本人身上；他为我们许了愿。这不仅使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和越南承担更多的义务，使西贡更加牢固一点地粘在华盛顿手上，使豪言壮语升了级，而且也约束了林登·约翰逊本人。对他来说，讲话算数是重要的。他本人现在对这场战争和对吴庭艳个人都承担了义务。

承担义务这套把戏在南越的实施中，有特别的讽刺意味，伟大的口头保证替代了真正的军事援助，因为南越正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来加强军事 136

政治地位。美国没有直接干预法国印度支那战争，认定可能得到的好处不值得冒这场风险；嗣后，在1954年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之后，美国又打算让别人为我们真正地干而取得同样的结果：一个在亚洲共产主义边境上的反共国家。

一直警惕着法国这场殖民战争的美国人，看到他们对此的保留已被1949年丢失中国和国内反对任何类似的软弱表现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撇在一边了。这场战争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从一场殖民战争变成一场西方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争。同时，美国人在1950年开始在财政上支持这场战争。但是引起的变化不大。越盟几乎不受华盛顿的意志和美元的影响；到1954年，美国人已经比精疲力尽的法国更多地承担了印度支那事业的义务。当时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为法国人而进行干预——只有美国的干预才能使法国人继续留在那里。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反对这样做，实际上是说越南不值得美国在军事上承担义务。日内瓦会议后成立了南越这个国家，这实际上是事后才想到要成立的，这是个没有多少人对之抱有真正希望的脆弱的国家。

美国四年的援助，每年五亿美元，对这场战争没有起多少影响。它提高了暴力的水平，并曾一度提高了法国军方的希望，而正是在同时，法国人民的支持日益减少。

在法国，从政治上讲，这曾一度是场中间派的战争，而在1954年，左派和右派这两翼在国民议会中的势力都有所增长。战争经过八年以后成了一场行将完蛋的事情；随着战场上的失败开始出现了对这场斗争道义上的看法。1953年，法国方面要求美国公开进行军事援助的压力一直在增长，而且很快变得愈来愈强烈。法国指挥部在同一个经常看不见摸不着的对手进行打了就走的交战中受了挫折以后，在1954年初设计了一个陷阱，就是企图奇袭一批不会怀疑的敌人。马塞尔·勒卡庞蒂埃将军曾说过，既然越南人没有校官将领，不懂得高级复杂的战争，那就很容易哄骗他们。这个主意就是把一支法国守备队放在高地的一个前哨上作为诱饵，让越盟抓住它进行一场周密筹划的战役，让他们在周围聚集他们的部队。然后，当越盟部队聚集好之后，法国人就出击，打垮这支一直躲开他们的敌人，这样就可以在日内瓦和平谈判刚好开始的时候，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个陷阱所设的地方名叫奠边府。 137

只有西方的将军们才能在同越盟那样强大的步兵作战八年之后，继续保持他们的傲慢态度，而法国人正是以这种态度把他们的阵地都筑在山谷，而把高地让给越盟，这是违反经常占领高地这一战争的最基本规则的行动。就在这个战役开始之前，一个美国军官访问了那个地方，他注意到了这点，问道，如果越盟有大炮，那将会怎

样。啊，一个法国军官向他保证，他们没有大炮；就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用。但是，他们确实有大炮，他们确实也会使用。在这场战役的第一个夜晚，法国的炮兵指挥官大叫："这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于是自己扑在一枚手榴弹上自杀了。西方人在印度支那总是要吃到了苦头才吸取教训；对敌人的尊重总是在太迟了的时候才会出现。

法国国内的支持日益减少，这就宣告了这场斗争的结束；但是，那支守备队却掉在陷阱里了。越盟一天一天地接连打击法国防守者，要求美国人进入战争拯救这些英勇的法国人的压力日益增加。有意义的是，正如十一年以后发生的事一样，原来的想法只是进行部分的干涉，并不是真正地接过法国人的战争，在地面上替代法国人，而只是去营救那支守备队。用一点空中力量，单是轰炸就够了。论据是为尽可能的有限干涉而提出的，而且就象以后又发生的那样，也是在危急恐慌的条件下提出的。法国人当然会发现美国政府中的盟友急于要把美国卷入他们的这场战争中，在过去的三年里美国已不再把这场战争视为殖民战争，而现在，为了更加方便起见，已经把它视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

在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至少有两个人想去轰炸越盟，营救守备队。第一个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他已经成为一个热中于空中力量

的人。雷德福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政策的设计师之一，可能是总设计师。这项“新面貌”政策是：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更猛的火力；相信空中力量，航空母舰上带有核武器的空中力量，或者单是核武器的威胁，就将决定全球的平衡。一个新的光辉的但又是廉价的美国式的和平——还可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其他的参谋长认为，当艾森豪威尔作出他要到朝鲜去的有名的竞选许诺时，这一套想法就已经开始了。他和杜勒斯在檀香山找到了雷德福，这位海军上将在那里为这项新政策提出了论据，这项新政策将使空中力量在削减开支的情况下达到全盛时期，这样就可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在朝鲜进行的那种肮脏战争永远不要再去进行，特别是在亚洲，那里一大群一大群的黄种人使得一场完全老式的陆地战争根本不可能支持下去。根据“新面貌”政策，预算要削弱，但是我们仍 138
要象以前一样强大，或许比以前更为强大。杜勒斯当然是热情的，这符合他对美国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的观点，特别是要在亚洲起较大作用的观点。

“新面貌”就这样成了政策。美国的陆军十分懊恼，西点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正在缩减陆军的作用和使命。雷德福是个有力的人物，有信念，也坦率直爽，当时他是个参谋长，他的军事政策已成为政府在政治上的政策。有些人认为，这种政策中理论多于实际。现在，那支守备队陷在奠边府，雷德福已准备就绪，这是他考验“新面貌”政

策的第一个机会，他迫切希望前往。实实在在地给进攻者空中一击，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在他的陈述中，如果空中袭击不行，将会发生什么，是很少给予强调的。象许多高级的空军支持者和信仰者一样，他相信他的武器是不可战胜的；陆军军官是很少这样相信的。

第二个表面上想要去卷入的人物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里之所以用“表面上”这个字眼，是因为对雷德福的真正愿望是没有怀疑的，而对杜勒斯的则有些怀疑。公开的和私下的杜勒斯并不总是一回事。他是个伦理主义者，甚至比艾奇逊还要更加威尔逊化，艾奇逊是个真正的强硬派。尽管杜勒斯发表过不少指责民主党失败的竞选演说，他还是相信艾奇逊在欧洲取得了成功，但艾奇逊在两个方面遭到了失败：把守亚洲的阵线和同国会的交往。为了寻求同国会的谅解，他事实上讨好国会，向保安人员打开了国务院的大门，把他的亚洲专家交给了他们——这当然只是小小的让步，撤掉约翰·佩顿·戴维斯的职也不过是在人的方面作了个次要的牺牲，虽然他知道戴维斯是无可訾议的。

杜勒斯迫切地要使历史的发展符合他的心意，他敏锐地大谈共产主义的邪恶，特别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尤其是邪恶的中国共产党人。他的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告诉朋友们说：“杜勒斯还在梦想使中国的内战重新打起来。”但是，私下他有时还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他在

公开讲话中的那种高超傲慢的伦理主义形成对照（当被问及这点时，他会微笑着告诉朋友们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纽约要价最高的公司法律顾问的；他懂得怎样和何时去处理问题）。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卷入印度支那，现在还是疑问，可能他对陈述卷入的理由更感兴趣，这样就可以把不进行干预的责任推到盟国和国会的身上。这就是责任的分担（而艾奇逊在中国问题上就没有分摊责任）。他们毕竟还要照顾自己的豪言壮语。

艾森豪威尔本人更是模棱两可。原因之一是，他是作为和平候选人当选的，他特别不愿意卷入亚洲的陆地 139
战争。他之所以当选，大部分是因为全国对这种冒险行动感到厌倦。当有大量迹象表明他的政府中某些成员想要卷入时，却很少有迹象表明艾森豪威尔同意他们这种想法，或是充分运用他个人的力量和他的职位来说服立法机关和官僚机构的怀疑者。要说表现，却正相反：他鼓励周围所有的人行动起来，陈述自己的意见（他们的这种意见对干涉的想法是十分不利的），而他却象裁判一样坐在那里。

1952 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他首先在他新加入的政党中巩固他的地位，搞好同以塔夫脱为首的较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关系。塔夫脱对朝鲜战争深感忿懑，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场错误的战争，而是因为他感到杜鲁门篡夺了国会的权力。在 1952 年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一

再保证他将同立法机构协商，他将使国会在作出决定方面回到它应有的地位上来。此外，他对战争本身也是抱激烈的批判态度的。在大选中他说，“如果必须发生战争，那末，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我们支持自由的一边。”因此，艾森豪威尔一定要进行真诚的协商，他也非常反对在亚洲进行陆地战争。同时，他所属的政党是利用反共问题，特别是利用在亚洲没能顶住共产党的指责而得势的。现在，要求干涉越南的压力日益增长，使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党派的界线已经划清；也许红帽子谁都可以给谁戴上的。（当时负责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回忆他当时有一次离开众议院会议时，听到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詹姆斯·理查兹①说，“他妈的共和党人怪我们丢了中国，现在我们可以怪他们丢了东南亚了。”）

如果在1954年初，艾森豪威尔对国会关于美国干涉的态度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1954年2月，当国防部宣布派遣四十架B-26战斗轰炸机和二百名美国技术人员去印度支那时，这些怀疑就全部消失了。这是美国第一次派遣人员的援助，如果说这是个试探性气球，它马上起了作用。国会的反应迅速而猛烈。政府多少对这样激烈

---

① 詹姆斯·理查兹（James P. Richards, 1894—），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曾任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出席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代表。——译者

的反应感到吃惊，立即宣布这些技术人员将在6月12日以前撤回。但是，即使这个日期也被认为太晚。迈克·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提出询问，传闻美国打算派两个战斗师到印度支那去，是否确有其事。他得到多数党领袖威廉·诺兰的保证，诺兰代表政府发言说，没有这种意图。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警告说，这是个错误，会把我们一步步拖进战争。政府立刻决定后退，这次后退表明它认识到这个国家对战争多么厌倦。 140

尽管如此，来自法国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奠边府的守备队显然是掉在陷阱里了，对危机产生了感情上的因素，渴望拯救那些年轻人。雷德福海军上将表示同情。杜勒斯看来也是同情的。副总统尼克松据说是赞成干涉的。艾森豪威尔据报道说是模棱两可的，没有流露自己真实的情感。1954年4月3日，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建议，杜勒斯会见了国会的领袖们，包括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和军事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理查德·拉塞尔。意味深长的是，虽然会见是艾森豪威尔的主意，但是他却没有出席；他那天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和威望摆出来。他宁愿让他的国务卿去陈述看法，虽然杜勒斯由于过去发表过的党派言论，对民主党人的影响要小得多。

其实，杜勒斯在实际上也不过是以国务卿的地位出面，他本人并没有陈述意见。海军上将雷德福接过了这个球，而他既不代表美国全国的立场，甚至也不代表政府

对此事的立场，也并不必然代表美国军方的立场。这次会晤的用意很快就清楚了：政府想要国会作出一项决议，允许总统在印度支那使用海军和空军，特别是使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来解救奠边府的守备队。雷德福作了强烈而有力的说明：局势危急。如果印度支那失掉，东南亚也将失去。我们将被迫退回到夏威夷。他向参议员保证，海军已经准备好出发，两百架飞机已在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和“博克塞”号上。

参议员们开始质问雷德福。这是不是战争行动？是的，我们将卷入战争。如果第一次空中袭击没能解救那支守备队，将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将接着干。地面部队怎么样？雷德福给了模棱两可的回答。

参议员诺兰对同僚说，他是同意干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个公认的鹰派，一个中国院外集团的成员，喜欢在会议结束时使用国民党的祝词：“返回大陆。”不是所有其他人都那么乐观和热心的。肯塔基州参议员厄尔·克莱门特问雷德福，是不是所有其他的参谋长都同意干。雷德福说，他们没有同意。

又问雷德福：“他们有多少人同意你？”

他回答：“没有一个。”

“那你怎么解释呢？”

“我呆在远东的时间比他们任何人都长，我比较了解局势。”（这不是真实的，其他参谋长都在亚洲呆过同他差

不多的时间。）

这时，约翰逊把话接了过来。他曾在早些时候同拉 141
塞尔谈过——在他政治生涯的这个阶段，他仍然十分依靠拉塞尔给予的私下指导和忠告——他发现拉塞尔对整个这件事感到惊恐。拉塞尔事实上一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帝国的逐步扩张感到担心。他不认为我们的力量是无限的，他担心我们的计划将使我们走到力所不及的地步，我们将进入我们并不受欢迎的地方。他认为，印度支那就是这一切的象征，而且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陷阱。现在，约翰逊由于种种原因对雷德福所提出的呼吁的含意感到不安。他怀疑这个刚从朝鲜脱身的厌战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同时他也不愿意把拒绝进入战争的责难揽到自己和国会的民主党领袖的头上。如果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作出决议，那么约翰逊将肯定是众矢之的，而这正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一直对站在最前面感到不安。他肯定不愿意民主党人受到指责，为失去印度支那承担责任。

他对杜勒斯说，民主党人曾受到指责，说是进行了朝鲜战争，说是没有重要盟国，实际上是单干的。约翰逊指出，诺兰本人就批评过民主党人在朝鲜提供了90%的人力和金钱。民主党官员的爱国心受到了怀疑。而他现在竟这样受到尊重，被看成是一位爱国人士而要求他也参加他们一边，他受到感动。但是首先，他要提出一些问

题，因为他不愿重温最近不愉快的经历。他们有哪些可以对印度支那提供相当数量人力的盟国？杜勒斯同任何盟国商量过没有？国务卿说没有，他没有商量过。

到两小时的会议结束时，约翰逊揭露了政府立场的虚弱性。（这可能正是艾森豪威尔所希望的，把他的意见都陈述出来，让国会自己来批驳弱点。艾森豪威尔是个精明人，不是傻瓜，尽管他在追求目标时，不愿被人认为十分聪明，因为他认为十分聪明的人是得不到信任的。他没有出席会议不是偶然的事，而是要让杜勒斯去陈述意见。）在是否进行空中打击方面，军方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此外，如果进入了地面战争，美国可能不得不单干。杜勒斯被通知去招揽盟国，虽然大家都知道安东尼·艾登对此是有所怀疑的。这样，政府一直想轻巧地转移到国会的重担，现在又轻巧地转了回来，如果不是转到政府头上，至少转到了英国头上，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不热心的。

看来，没有人急于想承担起真正的责任。总统把国会再次用作进行试探的地方，并且迅速感觉到了深刻的保留。但是莫边府还在进行防守，压力并没有消失。

142 然而，又出现了一个可以阻止美国堕入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这场战争无人想打，但是豪言壮语却似乎使它成为必要。这次是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李奇微是位很有气派的人物，坚定而强硬。他是美国第一个

空运师第八十二师的组织者，他曾率领第一个美国空运部队进入西西里，然后又在诺曼底空降着陆，后来又在1945年任第八空运军的第一任指挥官。当战争快结束时，他被选在原定侵入日本的计划中领导全部空运部队。因此，战争结束时，他是一个盛享声誉的将军，精锐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然而他的生涯还没有到极盛时期。他是在朝鲜战争之前不久被派到五角大楼的，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继任参谋长的人。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奉命注意沃尔顿·沃尔克将军的第八军，如果沃尔克发生了什么事故，他要准备前去。沃尔克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去以后，他继任第八军军长。他意识到士兵们总是注意指挥官的，因此决定做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即使在朝鲜当了第八军军长后，他仍然穿着跳伞部队的着陆服装，以提醒陆军士兵们他曾在空运部队干过，服装上还配有他永不离身的两颗手榴弹。他接管在朝鲜的指挥后所采取的几乎是第一项措施，具有象征的意义：禁止所有部队乘坐有顶篷的吉普车，因为他感到这会使他们产生温暖和安全的错觉，因而更容易为敌人和寒冷所袭击。当杜鲁门最后将麦克阿瑟撤职后，李奇微代替了他，他有计划地把美国部队调回集中，这点使士兵和老百姓对他的名声更加敬慕。到1954年，他成为最有威望的穿着军服的美国人，一位老式的非常纯朴直率的硬骨头将军。

1950年12月李奇微去朝鲜时，他已担任了一年多

的副参谋长。在那段时期内，国务院曾数次要求为法国人增加军事援助，但是李奇微每次都表示激烈反对。对他来说，这象是把钱扔进老鼠洞，而且是个糟透的老鼠洞。他对法国的事业并没有多少同情，他们毕竟从来没有派遣过自己的现役士兵去印度支那——只不过是派些他所谓的雇佣兵而已。他的部分论据是非常老式的：他认为我们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而这是一个殖民主义战争，同我们说要维护的传统截然相反。如果雷德福认为，从政治上来看，我们必须阻止赤色中国席卷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李奇微则是一个抱有不同政治信念的人；他认为这个地区是重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相信多样化的力量。他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对如此多样的民族实行长期统治。他认为，他们尽管可以试试，但不会干得好的，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他的想法实际上是凯南的想法在军事上的引伸。

143 1954年4月，压力逐步上升，李奇微感到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轰炸将会导致使用地面部队。他知道雷德福想卷进去，他怀疑杜勒斯想试一试"新面貌"政策。李奇微一直认为"新面貌"政策愚蠢而又危险。战争是在陆地上解决的，而在陆地上的损失总是由他的部下美国步兵和海军陆战队来承担。保护他的部下是他的职责。因此他派了一个陆军调查组去印度支那，去确定在那里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会需要什么。他所想知道的是进行这样一

场战争的基本需要和后勤。他派去了电讯人员、医疗人员、工程师、后勤专家。港口、铁路和公路的设施怎样？气候怎样？有哪些地方病？需要多少士兵？

答复是吓人的：如果要肃清敌人，最少要五到十个师（在朝鲜是六个师），加上五十五个工兵营，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人之间，再加上巨大的建筑费用。南越在港口设施、铁路、公路和电话线路方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几乎要从头做起，所费不赀。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比朝鲜战争更广泛的动员，每月征兵十万人。这场战争也不会象在朝鲜那样容易；在朝鲜，南朝鲜人在后方对于部队来说还是一项资产。在越南这场政治战争中，人民更可能是帮助越盟的（李奇微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在1965年时人人都加以掩饰）。它不象朝鲜战争，却更象1899年到1913年的那场菲律宾叛乱，而规模更大，耗费更巨；那次叛乱是一场土著人反对白人的持久的游击战，从政治上来说也是非常糟糕的。陆军也不让白宫舒舒服服地认为我们只需要空中力量就行得通了。雷德福的空中袭击计划是以夺取中国的海南岛为条件的，因为海南岛看来保卫着东京湾，而海军不愿在中国空军基地正处于他们背后的情况下把航空母舰驶入湾内。但是，如果我们占领海南岛，中国人将全力以赴地越过边境，那么，不要多久，就不大可能仍然是小规模战争了。

于是李奇微提出了报告，没有人命令参谋长这样做，

但是李奇微感到他应该对他所指挥的部下和他所服务的国家负责。他的结论不是说美国不应当干涉，而是非常具体地提出为此而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5月7日，奠边府陷落。5月11日，李奇微向陆军部长和国防部长简述了他的调查组的报告。不久以后，他又向总统简述一遍。据李奇微回忆，当时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听着，提了几个问题。但是影响是不容轻视的。艾森豪威尔是个职业军人，后勤专家。涵意是很明显的。李奇微写道："干涉的主意被放弃了。"后来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写了他对雷德福空中打击的怀疑；这将会是一次很可能遭到失败的战争行动，从而使美国陷于进行了干涉而又遭到失败的困境。

144

即使在奠边府陷落之后，杜勒斯还在努力安排美国的干涉。但是高潮已过。当白种人陷于要塞而就要受到黄种人的歼灭时，感情冲动已经达到了最高点。这以后的压力就比较抽象了。杜勒斯仍然大谈参战，艾森豪威尔甚至还写信给英国，建议维护共同事业。英国对他们自己的能力有着比较现实的态度，根本不愿意干。为参战而随后进行的各种尝试是真心诚意的；但很难确定这些尝试在多大程度上是企图分摊不参战的责任。不过艾森豪威尔无意进行单方面行动，1954年他作出决定的方式同十一年后林登·约翰逊的方式形成尖锐对比。艾森豪威尔真诚地同国会协商，而约翰逊却是操纵国会，对真

正的协商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对这场战争的耗费进行了正视现实的、详尽的估计；而十一年之后，几乎每个有关的人都竭尽全力避免确定和预言进行干涉的后果。1954年真正地寻求了盟国的忠告；1965年美国认为自己如此强大，除了为显示有更多的国家的国旗使美国的事业能赢得道义上更多的合法性外，它不需要盟国。艾森豪威尔将陆地战争的开支估计交给他的预算人员，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而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则不仅对报界和国会封锁精确的兵力预计，而且也不告诉他们自己的预算专家。鼓吹空中力量的人们和他们的政治盟友幻想不用作战部队，轰炸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幻想1965年居然能够存在，而早在1954年却曾被李奇微和艾森豪威尔打消。

由于艾森豪威尔和李奇微的功劳，没有人想打的一场战争就此避免了，政府、军方、国会和盟国都愉快地分担了责任。艾森豪威尔本人值得称赞，但是总统借助李奇微的专家意见和他那老式的正直性格，也使这一切得来较易，李奇微是一位对于进行一场坏的战争并不热心的将军。后来，李奇微写道，在他一生的事业中——打过的战役，指挥过的部队，获得的勋章，授予的荣誉——他最感骄傲的是曾经出力使我们没有干涉印度支那。美国有李奇微是非常幸运的，但不是永远都这样幸运。十一年后，他愈来愈惊恐地看到，我们正在进行他曾尽力

145 避免发生的事情。1965 年他成了象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和参议员富布赖特等怀疑派的消息来源，但是多次让他公开发表他的保留意见的努力都失败了。他感到他很难去反对他曾一度领导过的威斯特摩兰那样的人。

如果说 1965 年约翰逊总统没有同李奇微商量过，这或许是因为他的观点早已尽人皆知。但是，1968 年 2 月，当是否要限制干涉的大论争激烈进行时，他被总统召去讨论这场战争。这个场合反映出了他和其他人在 1954 年所表现的坦率直爽和顽强固执，也反映出了 1965 年决策过程的含混马虎。李奇微正坐着同约翰逊和副总统汉弗莱谈话时，电话铃响了。约翰逊去接电话，李奇微对汉弗莱说，有一件关于战争的事使他不解。

汉弗莱问："什么事？"

李奇微说："我一直不知道威斯特摩兰将军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汉弗莱说："这个问题提得好，问总统吧！"

但是当约翰逊回来时，他立即滔滔不绝地大谈他的困难以及来自各方的压力，而那个问题也就从来没有提出来。

但是，1954 年仅仅是不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不等于撤出。在要求划分那个国家的日内瓦协议于 7 月份签字后，我们决定代替法国人留驻下来。胡志明在北方建

立了他的政权，因此杜勒斯决定这个国家在十七度线以南的其余部分应该成为反共的西方堡垒——我们认为，这也正是南越人所希望的：美国的保护，美国的自由。这其中既有傲慢自大，也有理想主义和天真的想法。我们以为既然西欧欢迎我们在那里，南越人也会要我们留在他们国家的，尽管在长期而严酷的殖民战争中，我们曾一直站在错误的一方。我们原以为，我们可以坐在一边，不去帮助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可以帮助殖民国家，而不必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幻想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个殖民国家。杜勒斯当时说过，奠边府"是一种变相的好事。我们现在可以不冒殖民主义之名而进入越南"。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杜勒斯。他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清白无辜和我们的高尚品德有绝对的信念，并且坚信，从政治上来看，我们进去比呆在外面要好。这主要是杜勒斯的倡议。杜勒斯决定，作为在南越的开端，我们将派两百名顾问去。当时的援外法案有一项规定，总统 146
有权将某项援外计划款项的10%拨给另一计划。这样做不需要国会批准，因此，在杜勒斯的敦促下，艾森豪威尔从留给其他国家的款项中，拿出了10%转用于越南。此外，在9月末作出派遣顾问的决定，当时是国会休会期间，但是总统和国务卿商定，为礼貌起见，应将决定通知国会领袖。

思拉斯顿·莫顿被派去通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拉塞尔，说总统将派遣大约二百人去南越，并对该国提供资助。拉塞尔回答说，这是个错误，不会只停留在二百，最后会达到两万，也许有一天会高达三十万。

莫顿答称他怀疑这一点，而且总统已经打算这样干了；他们不管怎样只不过是顾问而已。

拉塞尔说："我认为这是我国从未犯过的最大错误，我最坚决地反对。"

莫顿又回答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决心这样做了。

拉塞尔说："我知道。他说过他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告诉他，我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我将不发表意见。"于是，对南越进行干预就这样得到了批准。

然而，没有什么再比杜勒斯所谓美国现在可以不带着殖民主义的痕迹进入越南的说法更为天真的了。因为越南的双方已经划分清楚。越盟有完全的信心，他们能够通过选举，或通过颠覆和游击战，在南方占上风。他们代表现代的力量，而在南方反对他们的是封建势力。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他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赶走了法国人，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战争期间，越盟所做的事情远不只是赶走法国人。他们接过了在殖民统治下支离破碎、互相猜忌、只知忠于自己家族的越南社会，赋予它更宽广的目标和意义，以致把他们团结起来

的力量远远超过分裂他们的力量。这就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民族。

南方却相反。在南方组成政府的这批人是一些西方人能与之打交道的人，是一些正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为他们的国家做任何事因而比较保险的人；他们不是同法国人并肩作过战，就是发战争财，要不然就象吴庭艳一样，呆在国外不知选择哪一边为好。旧的封建秩序在南方依然存在，很快又为美国援助的守旧力量保留下来；在南方，分裂各种不同政治团体的力量要比团结它们的力量强大得多。旧越南的传统一直是只对家族尽忠；吴 147
庭艳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的政府，到他倒台时，他只信任他的家族。所以，从一开始，一个越南还生活在过去，一个越南却生活在现在。

这一点从领导成员上也反映出来。北方是由一个赶走外国人的人在领导，南方却是由一个被外国人扶植起来的人在领导。胡志明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最艰难的年代里流亡在外，因为留在越南他不能公开讲话；吴庭艳在最热火朝天的解放战争中逃亡在外是因为他不赞成越盟。胡志明不需要外援来维持政权，他在赶走外国人的农民社会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吴庭艳却是没有外援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他是为了迎合美国的而不是越南的政治需要和愿望、由美国人制造出来的。从越南人的标准来看，他也没有什么合法性；吴庭艳是一个佛教国家

中的天主教徒，一个在南方的越南中部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大官僚，一个已被革命推翻了的国家中的封建贵族的成员。

然而，如果吴庭艳不符合越南人的要求，1954年他却显然符合了美国的需要。他疯狂反共，但同时也反法，因此，从表面上来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常发表有关社会改革的演说，这点使美国自由派的良心得到安慰。如果说，他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专制的，那么他的演说却不是，在同他的谈话中，他令人感到别扭，但还不是不讲道理的。他的举止适当，正确；他是个冷酷的天主教徒，不象苏加诺那样追逐女人。当一个真正的亚洲激进分子或民族主义分子对美国的使节，或者更坏一点，对来访的国会议员，表现出无礼或傲慢时，吴庭艳则完全相反，他热心、认真、负责。对于一个仍然处于麦卡锡时期的美国来说，他是一个外国政府的理想工具，对保守派来说，他是个顽固而激烈的反共分子；然而，对自由派来说，却又是显然关心社会福利的，他们能够支持吴庭艳而不感到违背良心；这些自由派由于丢失中国和受到麦卡锡的攻击而处于守势。他是个十全十美的联合阵线的人选。他“是我们能与之相处的这类亚洲人”，这是吴庭艳的早期自由派赞助人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向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推荐吴庭艳时说的话。曼斯菲尔德在早期也成了一个支持者。

吴庭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笃信宗教，实际上是个和尚。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正直和公正；因此，如果他的态度正确，全体人民就有义务尊重和服从他。他是一个过去的人物，既非亚洲人也非西方人，他要比他被选中来保护的垂死秩序好一些，他是孤独的，古板地讲仁义道德的，不能适应远远走在他前面的世界。

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信任他。事实上，对南 148
越承担义务的整个决定几乎是马马虎虎未加考虑而作出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为什么不试试看呢。但是，从一开始，他的弱点，自以为是、顽固、对他家族的依赖等就已经很清楚了。美国第一任驻越南大使劳顿·柯林斯认为他完全无能，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对法国国民议会说："吴庭艳不仅无能，而且疯狂。"只有兰斯代尔真正为吴庭艳辩护。（兰斯代尔后来在描绘他如何第一次听说吴庭艳时写道："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认为吴庭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或许是当代最好的民族主义者，他有着作为英明能干的执政者的卓越经历；甚至有些人说他在越南人民中远比胡志明知名。"）正是兰斯代尔把吴庭艳兜售给他的中央情报局的老板艾伦·杜勒斯，因而也就兜售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正是兰斯代尔帮助指导吴庭艳在早期同各教派进行了斗争，这点加强了华盛顿对他的支持。

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这是极不稳固的，但是当时看

来并没有什么重大决定，也没有什么重大政策。当时的态度主要是：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只不过是少量的美元投资，几乎没有投入美国人的生命。最初，对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对这个国家或是对其能否生存下去，并不抱有多少幻想。但是，后来，这种幻想逐渐产生，因为承担义务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有它自己的命运，有它自己的规律。开始的时候，譬如在越南，当生存的可能性非常微弱时，承担的义务也可能非常微小。有个时候，嘴对嘴地吹入了氧气，用了很大气力，但费用不大；而后，正是这个供给氧气的人，拚命地要继续承担义务，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对病人的诊断是有希望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指责为没有尽力，没有给予急救；有一天在观察中发现确实有了一点微弱的脉搏，病人真的活过来了。但是在这个关头，他们并没有解除自己的责任；相反，承担的义务第一次真正开始了，他们现在被责成使病人继续活下去。这是一项责任，这是实实在在的。病人的死亡将会引起真正的政治后果。

1954年，日内瓦会议刚结束时，没有人真正相信南越存在。但是吴庭艳在其后的几年中还是成功了，这主要是由于河内正忙于巩固自己的基地，没有提出挑战。尽管法国和英国提出异议，杜勒斯还是鼓励吴庭艳按照他的本能不去举行原来规定的选举，这样生存下去的想法开始逐渐增长。如同水结冰一样，这种幻想也结晶了，变

成了现实，不是因为在南越存在的政府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在有势力的人物的头脑中已经成为真实的了。于是，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而且极为脆弱的政府变成稳固而坚实了。一个真正的国家，有真正的宪法。一支穿着 149
考究合身军装的军队，军官们佩带着一大堆勋章。一个最高法院。一个勇气十足的总统。文章也写成了。《生活》杂志称他为“坚强不屈的、奇迹般的越南人”。《星期六晚邮报》说这是“亚洲的光明之地”（吹捧这后一篇文章的广告说：“两年前在日内瓦时，南越实际上整个出卖给了共产党。今天，由于‘一位身穿鲨鱼皮衣服的官员打乱了赤色分子的时间表’，这个小而勇敢的亚洲国家又站立起来了”）。支持吴庭艳的运动开始出现。为他发表了很多演说。1956 年，杜勒斯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用谦逊的语言说道：“自由越南从八年残酷的内战和国际战争的废墟中，从日内瓦会议对这个国家的分裂中，从掠夺成性的共产主义的不断威胁中，惊人地振兴起来；取得这一成就的各种因素中，首先要归功于吴庭艳总统本人的献身精神、勇气和聪明才智。”在这一切中，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受援国并没有真正复活，复活的是幻想。这样，施主国开始有点象是在受援国的支配下过活了。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创建过程，而南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政治变化与此相配合，南越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吴庭艳被认定是一个反共的民族主义者，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他的政治基础一向很狭隘，这些年来，变得更狭隘了。面对着重大的政治难题，却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去应付，使他变得更加孤陋而沉默寡言。他变态地猜疑一切，对政府中他的少数同盟者疏远，更多地转向他的诡计多端的神经质的家族，起用警察力量和依靠日益增长的美援。他变得比过去更固执、更孤立，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却愈来愈多地对他承担义务。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对在南越的整个事业最初感到一事无成，而现在却一年一年地感到越来越有希望。到 1961 年，美国人已坚定地信任吴庭艳，相信他是合法的；他们把南越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有着真正的国旗。既然已经创造了他和他的国家，我们也就不再看到我们自己的作用了；我们的指印消失了。1961 年，肯尼迪可以悲伤地对白宫助手说："我现在经不起 1954 年式的失败了。"

困难的是，经过七年之后，美国的豪言壮语，美国为了使吴庭艳安心而作出的各种姿态，都没有对南越最重要的人们——农民——产生任何影响。越盟的继承人和直系后裔越共，很快就每夜采用越盟在对法国人作战中所使用过的那种熟练的游击战方法和农村征兵办法，利用当地人民对政府的种种不满，日益发展壮大。在战场上，一切都没有改变；越南共和国的军队（它的指挥官都是旧法国军官和军士），同法国军队一样，白天通过村庄，

超量地使用火力，盗窃和抢劫农民财物；夜间，越南共和 150
国军离开后，越共重新进入村庄，展开他们熟练的政治宣传，在这方面，吴庭艳是特别无能的。在一个长时期中，他甚至拒绝承认发生了重大叛乱，因为只要一承认就会表明他的政府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直公正的，因此，不可能有反对他的叛乱。

虽然压力来自南越人和南越农民，吴庭艳却转向外国白人要求帮助，要求更多的外援，要求空中力量，要求同美国人订立新条约，这是不足为奇的。不可能设想胡志明会需要俄国人或中国人的援助和保证；同样也不可能设想吴庭艳能够理解农民的需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 1961 年的大多数日子里，尽管有独立的记者和象兰斯代尔等人的悲观估计，美国顾问团仍然保持相当程度的乐观。吴庭艳有改进，还是跟着走的，越南共和国军也打得好些了。但是，不在指挥系统的其他一些人却比较怀疑。白修德 8 月间以个人身分对越南进行了访问，他写信给白宫说，越共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的南部，如果没有军事护卫，甚至在白天，也没有哪个美国人愿意驱车到西贡城外去。白修德记起了在中国发生过的情况，意识到历史即将重演。9 月，越共开始使用他们积聚起来的部分力量。他们把冲突事件的次数增加到三倍；并且在占领了离西贡五十五哩的一个省会之后，公开将省长斩首示众。这后一行动对西贡有深刻影响，那里对士气和信

心方面的问题是很重视的。

到月底时，在华盛顿产生了采取新军事行动的强烈要求。一贯热心而且随时准备采用武力（但对农村的现实情况并不特别了解）的沃尔特·罗斯托建议，在非军事区和柬埔寨的边界上派驻两万五千名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队，以制止渗透。（情报专家注意到，叛乱几乎全部发生在南方；全部越共军队都是南方人；武器是从政府哨所那里缴来的。但有些南方人是在北方受过干部训练后又被遣回南方的。这只是战争的一小部分；全国情报估计处 1961 年 10 月 5 日说，80—90% 的越共都是在当地征募的。罗斯托的建议使研究这个建议的军人感到寒心。这个建议表明对崎岖的地形多么无知；两万五千名士兵将被全部吞没掉而毫无效果。敌人完全可以选择，或是绕过这条薄弱的防线，或是有步骤地消灭它。10 月 9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罗斯托的建议提出反建议，派遣美国军队（两万左右，但将会增多）去越南。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军队驻扎在中部高原，并且警告说，如果按照罗斯托的建议，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队将很快就被吃掉。两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只需要四万名美国作战部队就能肃清越共；如果北越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干涉，就需要再加十二万八千人。

151

几乎同时，好象配合好似的，吴庭艳拍电报要求派遣

更多的战斗轰炸机、直升飞机民间驾驶员、更多的运输机以及在靠近非军事区执行“作战训练”任务的美国作战部队。他还要求美国人考虑要蒋介石派一个师来支援他。瑞尔汀大使建议对全部请求给予“认真而迅速”的注意。肯尼迪将不得不很快地采取他对越南的第一项行动。

这样，压力一直愈来愈重地加在肯尼迪头上。他和他的人马上台后决心维护美国的威力，他们将遇到充分的考验，受到重大的压力。不仅有来自共产党的压力，而且有来自国内的与此平行的政治压力。正当他即将对越南日益加剧的危急情况相应地采取首次重大行动时，他也类似地在他的政府的最高层提出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命，这项任命并不反映他能够控制政府，对采取的步骤有充分的把握，而是反映他缺乏控制、失去平衡。肯尼迪政府第一年的全部重大反应都基于两个大前提：首先，共产党确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劲敌（如果它已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仍旧是被当作铁板一块来对待的），只有政府证明它自己是强硬的，紧张局势才能得到和缓；其次，肯尼迪在国内的政治困难主要来自右派和中间派，左派是可以掌握的，因为他们确实别无出路，不得不接受政府私下里表示善意的谈话，等待自由派所主张的好事总有一天将会到来。这后一种态度，这种认为自由派左翼存在着基本政治弱点的信念，鼓励政府进行了一些强硬路线的活动，

同时也限制了它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寻找分歧的意愿。如果共产主义世界中发生了变化，华盛顿认为这也决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一眼就能看出的，而这点对政府来说，在政治上却是极关重要的。政府仍然感到压力，有必要对中间派和保守的美国人证明自己是强硬的，但另一方面，却认为自由派左翼的美国人只能接受肯尼迪的说法，即这个
152 政府已经是他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府。1961 年，肯尼迪采取的大多数主要行动都反映出这一态度，其中不仅包括泰勒和罗斯托越南之行后所做出的各项决定，而且也包括派遣泰勒和罗斯托这一决定本身，譬如说，派他们去而不是派施莱辛格和鲍尔斯。肯尼迪知道罗斯托对战争是抱积极态度的，泰勒是一向主张镇压叛乱的，因此，实际上，他从他们那里可能得到的材料将类似他已经收到的报告。如果他选择了对使用武力抱有更多怀疑的人，他就会得到一种不同的估计。事实上，在泰勒和罗斯托到西贡后不久，肯尼迪派他的新任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越南停留一下，并向他提出个人报告。加尔布雷思这样做了，他在对越南的一系列尖锐的预言性的估计中，最初一份估计就提出了同泰勒和罗斯托几乎完全相反的报告；他注意到了吴庭艳和美国在那里的军事行动的腐朽本质，看到了美国人可能代替法国人的巨大危险。更重要的是，他力主对问题进行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但是，象加尔布雷思这样的人仍然

属于肯尼迪政府的外圈人物，在那里主要是用来作为橱窗摆设的；他的报告在总统头脑中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但也只是如此而已。肯尼迪依然感到右派是他的难题；他渴望得到可敬的权势集团的支持，以保护他免受右派的攻击；他同保守派在一起感到更加自在；这一切都可以从他作出的另一项关键性的任命中得到证明。

1961 年 9 月 27 日，肯尼迪选择了极端保守、差不多是反动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百万富翁约翰·麦康来领导中央情报局。从年初猪湾事件开始，肯尼迪就一直想调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他认为艾伦·杜勒斯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但已是过时的偶像，名声太大，使政府中的年轻人很难向他提出异议。现在，到 9 月时，肯尼迪采取了行动。他已经就这项工作向克拉克·克利福德进行过试探，此人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时的交接中，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克利福德不感兴趣；也许他感到在情报局并没有足够的权力足以引诱他离开他的律师行业。下一个可能的人选是福勒·汉密尔顿，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属于权势集团的华尔街律师；当白宫事实上正准备宣布汉密尔顿的任命时，国际开发署出现了问题，汉密尔顿因而调到了那边。于是，肯尼迪在他弟弟罗伯特的敦促下，转向了麦康。

这项任命使政府的其他成员大为吃惊，肯尼迪班子里的自由派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总统甚至在自己的政

府中也这样保密(例如,他没有将他的意图告诉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也没有征求各成员的意见),原因之一是他
153 知道政府内部反对麦康的意见如此强烈,实际上会取消这项任命。自由派不喜欢麦康是有多种原因的。1956年,史蒂文森和艾森豪威尔竞选期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一批科学家出来支持史蒂文森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建议;麦康是这个理工学院的校董,他立即进行报复,声称科学家们上了俄国宣传的"当",指责他们企图"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的心目中制造恐慌,以为氢弹试验的放射性灰尘会危害生命"。除了这些相当刻毒的话以外,科学家们还有理由相信,麦康要把他们全部解雇(麦康否认这个指责,但不能完全令人相信)。自由派也没有在麦康的背景中找到什么令人安心的东西(例如,斯特罗姆·瑟蒙德在参议院作证时的证词,其中说他也不太了解麦康,"但是看了他的传记后,觉得它是美国怎样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缩影")。

麦康出生于旧金山的一个富裕家庭;战前他一直从事钢铁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成了筹组造船的一个新公司的主要人物。这项生意大赚其钱,很多同时代的人认为麦康完全是个发战争财的人(在1946年进行的一次国会调查中,国会的守卫机构总会计局的拉尔夫·凯西作证说,麦康和他的加利福尼亚造船公司的同伙投资仅十万美元,却赚了四千四百万美元。凯西当时

说："我敢说，在美国的企业史上，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从来没有过这样少的人赚上这么多的钱，而风险又如此之小，这完全是由纳税人承担牺牲，不仅是他这一代的纳税人，而且是今后若干代的纳税人"）。麦康曾当过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特别代理，同福雷斯特尔一起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后来在杜鲁门时期成为空军部副部长。他改信了天主教，他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予以制止——同克莱尔·布思·卢斯一起，他于1958年代表艾森豪威尔出席了庇护教皇的葬礼。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里，他以典型的强硬派著称，信奉大规模报复和核威慑政策。

因此，政府中的自由派对这项任命大为惊恐，他们认为这项任命比艾伦·杜勒斯还后退了一步。但是这项任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麦康是由罗伯特·肯尼迪鼓动出来的，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正奉行极端的强硬路线，并企图控制政府机构。罗伯特·肯尼迪需要行动的人、实干家和活动家，需要能突破这毫无生气的官僚机构的人，而麦康正享有这种声誉（这也是麦康想保住的声誉——他一到任，就召集了其他情报工作的头头，告诉他们说，他们最好同他合作，他准备当情报方面的沙皇，如果他们同他合作的话，他就会增加他们在政府中的权力）。但是，麦康之所以为肯尼迪所选中，特别是因为他对已经处于守势的年轻总统还可以起到一点保护作用；有麦康在中 154

央情报局就可以引开右翼对政府的压力。麦康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代价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尽管麦康在转报他的下属从战场上报回来的情况时是相当直率的，但是他主动陈述的自己的观点——他从不耻于主动提出自己的观点——却总是从极端强硬的路线出发的（他也不时用他的情报局的人员来推行不一定是政府所赞成的目的，诸如把中央情报局人员借给斯坦尼斯委员会①，帮助提供论据反对政府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同时，这也是肯尼迪的一个姿态，把他的政府中的主要部门交给并不属于他的国内政治支持者的人。（在肯尼迪活着的最后几个月中，肯尼思·奥唐奈②看到政府中最重要的职务都给了没有支持过肯尼迪政治候选地位的人，或者即使支持也只是在一旁表示同情的人，感到很懊恼，他极力主张一种新的任命办法。他想以约翰·康韦③来代替约翰·麦康主持中央情报局，康韦曾经是为沃尔特·路德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人物，在国内问题上完全支持肯尼迪，同时也是完全有能力对外交事务作出判断的人。如果肯尼迪没有死，并且作出这项任命的话，那将几乎是

---

① 指参院军事委员会。——译者

② 肯尼思·奥唐奈(Kenneth P. O'Donnell, 1924—)，美国民主党人，1961年曾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

③ 约翰·康韦(John Conway, 1917—)，劳联—产联副主席路德的助手，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政治官员。——译者

国家安全人员任命的全部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事，在很大的程度上打破阶级和观点的界限。）

第 九 章
泰勒—罗斯托报告

155 任命麦康这件事表明，肯尼迪政府的政治核心比他原来的政治支持者所期望的要右得多；现在，当他要对越南采取行动时，支持他的人对他的信任减少到最低的限度。1961年10月，总统决定派他的私人特别代表去越南进行一次实地调查。他亲自负责组织这个小组。这件事相当真实地反映出新政府对越南以及对当时实质上属于政治性问题的真实看法。没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同行。一方面是因为腊斯克不愿卷入越南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这并不是国务院特别该管的事。另一原因是，肯尼迪本人也没有坚持要求国务院派人参加，因为除了哈里曼外，他对国务院的其他人都不特别欣赏，而当时哈里曼还在日内瓦搞老挝中立化。

起初，这次出行是以罗斯托调查团的名义提出的，由罗斯托一人率领。但是，鲍尔斯竭力主张派一名国务院高级代表同行，以代表非军方的观点。鲍尔斯对罗斯托的好斗性早就很不放心（阿瑟·施莱辛格曾说罗斯托是“带机枪的鲍尔斯”），认为应当派一位真正有地位的人，

如鲍尔斯自己，否则，至少是一位助理国务卿，如哈里曼。但腊斯克不赞成。他仍把这件事看作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在这方面相当典型地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政府官员，他们把国务院看作是国防部的辩护律师；如果发生某种军事卷入，那首先是国防部的事。但是最后，作为对鲍尔斯的观点的某种让步，调查团中加上了总统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鲍尔斯感到放心了，因为他记得，泰勒1953年在朝鲜同他长谈时曾相当激动地说过，美国军队决不能在亚洲再打一场陆地战争，永远不能再打了。因此，鲍尔斯和其他一些人对泰勒的参加感到满意，认为是一种安慰，而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但是由此产生的泰勒—罗斯托报告使美国更深地卷入越南，从艾森豪威尔时代派少量无能的顾问（适合打传统的越过边界的战争，但这种战争再也没有出现）上升到肯尼迪总统被刺时在那里驻有近两万名顾问和后勤部队。这个报告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肯尼迪由于选中泰勒和罗斯托而押了赌注，因为这两个人对打一场有限的反游击战争早就怀有最大的兴趣。在西贡，美国驻越南大使对泰勒—罗斯托调查团的消息最初还是从收音机中听到的。

156

罗斯托1916年出生于纽约市一个俄国犹太移民的家庭。姓名的本身就表示激进派移民对美国有天真的喜

爱。这一家兄弟三人：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尤金·维克托·罗斯托，拉尔夫·沃尔多·罗斯托。沃尔特一向是个天才，无论干什么事，他总是最年轻的。中学毕业时他是最年轻的，注定必将有所作为。他是耶鲁大学的一名特别年轻的毕业生，一位年轻的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个选择轰炸目标的年轻人。他是冈纳·米尔达尔①的年轻助手。的确，由于他在战后的社会关系，他进入国务院被认为是国务院当时向左派人士开门。后来他成为在《生活》杂志任职的查尔斯·杰克逊②的朋友，然后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担任了一个不重要的职务。后来他到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教书，这个学院是竭力想罗致全国人材进行全球性反共斗争的某个组织的一部分。罗斯托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认识肯尼迪的，见面之后给予肯尼迪很好的印象。

罗斯托总是很热心的，埋头苦干。和邦迪不同，他非常关心别人。1968年，由于企图改变战争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斗争高潮。当时，尽管罗斯托是全面支持这项政策的最后几个人之一，但许多批评他的人都觉得，从个人来

---

① 冈纳·米尔达尔（Gunnar K. Myrdal, 1898—），瑞典经济学家，1947—1957年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译者

② 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D. Jackson, 1902—），美国出版商，《生活》杂志副董事长兼发行人。——译者

说，他是一点也不令人讨厌的。他看起来非常直率、友善，象天使一样和蔼。汤森·胡普斯说他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道理很简单：他自信心很强，非常相信自己，相信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可以宽容他的敌人。别人错误地认为他是因为失败而宽大为怀，实际上，在他看来，他是由于胜利而宽大为怀的。他胜利了，他的各项政策的后果都是他自己预料到的。 157

五十年代他是坎布里奇的一颗明星。他出版书籍，而且经常出版。他的书在《纽约时报》上有评论。他还给每星期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写过文章。他不仅在坎布里奇名声卓著，而且在华盛顿和纽约也很有名。这是有点令人奇怪的，因为，在坎布里奇，有些人觉得罗斯托夫妇在社交方面野心很大，也许太大了。坎布里奇是个非常因袭守旧、比较闭塞的城镇。而罗斯托夫妇请客时，总要把当时政界或文艺界的巨头名流请来作客。坎布里奇有一位夫人对一次宴会还记忆犹新，因为那是罗斯托夫妇为英国大小说家乔伊斯·凯里举行的。大家对罗斯托夫妇这样熟识凯里深为惊奇。但是，凯里很有礼貌地把这位坎布里奇的夫人拉到一边，对她说，“请你给我讲讲关于我们漂亮的主人和女主人的事，我对他们很不了解。”这时，这位坎布里奇的夫人就不再那么惊奇了。这种以宴请巨头名流来抬高自己的风气，在坎布里奇不足为怪，在纽约或华盛顿也是如此，但在这种场合被人抓

住，却是少有的。

五十年代后期，肯尼迪在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时特别赏识罗斯托，喜欢他的直率、精力旺盛，喜欢他的崇尚实际（这一点是与大多数书生不同的）和似乎比较了解华盛顿的工作方式，喜欢他的随和，能够同职业政客和睦相处。罗斯托去华盛顿后，多少引以自豪的是，他是个多面手的知识分子。他能同军人混得不错，和他们打网球，了解他们的观点，而没有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的那种强烈的反军人感。白宫其他助手在几年后还记得，轰炸波来古的那天夜晚，罗斯托在白宫里走来走去，拍着空军军官的肩膀，询问气象情况，告诉他们他也选择过轰炸目标，知道气象是很重要的。在肯尼迪当参议员时期，他一直是很得力的，工作中精力过人，随叫随到，起草文件、备忘录，出谋划策，真是一位大谋士。他为艾森豪威尔出过“开放空间”的主意，为肯尼迪出过“新边疆”和“让我们把这个国家重新推动起来”的主意。他反应快，这点很有用。当肯尼迪需要有关某个问题的备忘录时，罗斯托不象其他许许多多书生那样，请他去参阅早已写好的某个文件，或是他们一年前在某个委员会作证的证词。相反，肯尼迪从罗斯托那里得到的回答，又快又好，又尖锐又具体。

158 所以，肯尼迪和罗斯托的早期关系是很好的。后来，1958年至1959年，罗斯托当教授去了。他回来时，肯尼迪正在忙于竞选，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减少了。那时，肯尼

迪手下的人增多了，因而这位总统候选人同保持自由身分的谋士就更不容易见面了。有些人觉得，肯尼迪对罗斯托有点不如从前那样满意了，感到有点受他的压。肯尼迪1961年曾讽刺地说，“沃尔特写东西比我看东西还快”。现在肯尼迪的时间比从前少了，而罗斯托写的备忘录似乎太多了，他的精力太充沛了。再说，肯尼迪自己也变了。他已不是五十年代时候的年轻参议员了。那时，他研究深奥问题和听取情况汇报都要大力依靠坎布里奇出身的谋士们。现在他开始超过他们了。他们告诉他的事，越来越多地都是他已经知道的了。1960年大选期间，罗斯托仍是顾问，虽然在外围，他还是心甘情愿的。他的名字在支持肯尼迪的文章中出现，再次证明约翰·肯尼迪喜欢知识分子，同他们合得来。

尽管如此，罗斯托却作好了准备，带着银行里的大笔存款和当选总统一起进入新政府。他是一位真正有资格的坎布里奇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为肯尼迪争取更大荣誉，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肯尼迪圈子里有些人对他有保留看法。奇怪的是，这些人不是肯尼迪圈子里的职业政客，而是一部分坎布里奇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不是特别严重的事，他们当然不会对外人透露这种情绪，也不会公开说罗斯托的坏话，正如将军们决不会对外人讲他们所怀疑的某位将军的坏话一样。但是，确实有一种对罗斯托不满的感觉：一部分是对他个人，一部分是对他的

工作。这种感觉是，尽管罗斯托有才能，有智慧，聪明能干，但总还缺少一点什么。对他个人的不满是，罗斯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变化。他们中有一个人记得，罗斯托刚从牛津大学回来时，曾在华盛顿的一个招待会上一面弹吉他，一面吟唱着一首非常俏皮的打油诗。他唱得娓娓动听，逗人喜欢，而且英国味十足，然而它不象是罗斯托唱的，一点也不象。当罗斯托从几乎是一个共产党同路人变成一个好斗的反共谋士后，人们这种感觉就更加深了。他居然能够下意识地、轻而易举地适应潮流的变化，这是使别人感到不愉快的。后来，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罗斯托的一些同事发现他说话有点象总统的口气，又增加了对他的反感。下届政府期间，他又开始学林登·约翰逊讲话，使用农场上的粗鲁生硬语言，于是人们的不满情绪就更加强烈了。最后，他们感到在罗斯托那活跃、热情的一切背后，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他们认为，这个穷犹太移民的儿子渴望挤进上流社会，混入权势集团以至飞黄腾达，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权势集团是什么圈子，或者虽然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却总想忘掉这点。他确是兴高采烈地进入了权势集团，甚至当后者已经改变政策的时候，他还在越南问题上坚持到底。因此，《纽约时报》1971年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后，前两届政府中的许多人都显得好象是笨蛋似的，而沃尔特·罗斯托也决非例外。他对该报的一位编辑说，是的，他要给“读者

159

来信”栏写一篇文章。接着几乎很亲切地补充说，有一点他是担心的：不是这些文件的发表〔他可以理解这点〕，而是权势集团的分裂。权势集团人数很少，这是必要的，但它掌管着一个非常年轻的、自己又不能作出正确决定的国家，因此权势集团的内部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决不能分裂，美国需要《纽约时报》留在权势集团里面，这才是重要的，现在大家必须设法弥合裂痕，把《纽约时报》拉回来。

如果说，在工作上有另一点使罗斯托的同事们担忧的话，那就是，他坚信自己（一定时候）的意见，从不给予应有的怀疑；换句话说，缺乏深思熟虑和虚怀若谷的作风。他的大优点也是他的大缺点，这就是，他能在过去不存在公式的地方创造公式，能够把各种不同的想法和作法捏合一起，归纳成为公式和理论。这种能力使他在智力上引人注目，富于启发性，但同时也有危险性，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走得太远了，什么时候应该停住，什么时候某项公式比他想象的要软弱。如果说有些人怀疑他是否聪明，那么很少有人怀疑他是否热情洋溢和精力旺盛，是否真肯开动脑筋。他以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身分出访的头几天，是到拉丁美洲作一次短暂的旅行。他回来后，对着感到惊奇的听众说，现在懂得怎样去了解拉丁美洲的人民了，首先要懂得拉丁美洲人就是亚洲人。听众中有人对他嚷着，“沃尔

特，我的天呵，为什么讲那些你自己一点也不懂的东西！”

但是，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对的。那几年中他一直特别坚持的看法是：美国以它的技术和理想，可以在不发达国家以及在制止共产主义革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实际上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发动我们的和平革命。他没有考虑到穷人和美国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别，而是认为只要我们干得对，历史是在我们一边的，关键是实现现代化。他认为胡志明以及象格瓦拉一类的人是邪恶的，他们是出来压迫而不是解放人们的。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格瓦拉被
160 击毙的那天所召集的会议。罗斯托好象是在剧院里演戏似的。他说，“先生们，”然后停了一下，“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每个人都把身子往前移动。“玻利维亚人已经把格瓦拉干掉了。”为了让这种得意的情绪深入人心，他又停了停，然后接着说，“他们终于把这个王八蛋搞掉了，那些罗曼蒂克的游击队完蛋了。”大家发现罗斯托对这个消息很激动，几乎达到了感激不尽的地步。在他看来，这个消息证明，事情是很好的，正如他在自己的著作里预言过的那样，历史是按照预定的进程发展的，历史是公正的。

总统竞选快结束时，肯尼迪曾答应让罗斯托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看来对他是理想的。

对一个谋士来说，这是个好位置，离实际活动较远。但是腊斯克不同意，因为肯尼迪圈子里的政治人物他已经接受得太多了。其次，他讨厌罗斯托，因为他似乎太好说爱道，崇尚空论。腊斯克决定不要罗斯托。当时，罗斯托正在坎布里奇等待肯尼迪或腊斯克的电话，但任命一直没有来到。相反，腊斯克想让乔治·麦吉担任这个职务，罗斯托可以当他的副手。麦吉是腊斯克在杜鲁门政府时代的老朋友、老同事。担任副职的前景并没有使罗斯托感到苦恼，他打了个电话给肯尼迪。这位当选总统说，别担心，会想办法的。后来，1960年 12 月，肯尼迪去哈佛会见该校的名誉董事们。这在坎布里奇是一个轰动一时的礼节访问。肯尼迪单独找罗斯托共进早餐。这可是重大事件，闹得坎布里奇满城风雨，对肯尼迪议论纷纷。有人说，不管怎么样，这说明罗斯托肯定是肯尼迪圈内的人。肯尼迪善于利用他的职权，分给人们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抚人心。当他会见罗斯托时，他让罗斯托去担任邦迪的副手，罗斯托马上欣然答应了。

正因为罗斯托在坎布里奇曾以活跃著名，特别是以吹嘘自己的见解而著名，所以哈佛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两方面的人认为，他这次出任新职，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在宣布罗斯托任职那天，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有一位叫卢西恩·派伊的政治学教授走进教室，悉悉索索地翻了一会儿讲稿，看了看全班，最后说，“大家知道，听到

一些人要去华盛顿，想来想去，晚上就睡不好觉。”如果说，罗斯托在坎布里奇并不是以谦虚著名，那么不久在华盛顿他就更加原形毕露了。他用新官上任的口吻，对一个记者神气活现地描述了他的职务。（他把最近写的一本书题名为《经济发展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英国的出版者还恭维地写道，“本书提出了卡尔·马克思未能发现的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罗斯托在地图上指着苏伊士运河说，他和麦乔治·邦迪把世界瓜分了，邦迪取得苏伊士以西的全部地区，罗斯托取得苏伊士以东的全部地区。看来这样瓜分是公平的，因为邦
161 迪是一心一意注意大西洋的人，大西洋地区是适合一个严肃的人进行活动的严肃场所（在白宫里公开为黑人大声疾呼的罗伯特·科默，后来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把邦迪从直布罗陀调到丹吉尔去，那真会是个突破），而罗斯托却对不发达国家深感兴趣。他认为，这里才是对抗的主要新地区，而艾森豪威尔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罗斯托在越南问题上得出了肯定的、坚决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而越南正是那个地方。最初，他竭力主张采取行动。他推荐兰斯代尔将军主持越南军务，他要求增兵，要求采取更隐蔽的行动。他提出由副总统访问西贡的主张。他还谈到轰炸北越，袭击供应线。尽管他爱斗好战，但在内部还是有人开他的玩笑，说“沃

尔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第六号计划”，后来还有“罗斯托空军元帅”的笑话。罗斯托太热心了，也许劲头太足、太反共了，因此有点令人好笑。对游击队和共产党，他好象是真要那么干似的。肯尼迪对这点也感到好笑。他还感到好笑的是，尽管罗斯托是强烈反共的，右派和保安部门还是一直在挑他的刺，而且不断出现对他进行审查的问题，好象又回到了他作为左派的那些年代。肯尼迪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他们为什么老是挑沃尔特的刺，说他是软骨头？见鬼，他是我搞来的最大的冷战斗士。”肯尼迪挑选罗斯托去越南作实地调查，是选中了政府里一个真正热心于在越南对抗游击队的人。

罗斯托不怕在越南进行对抗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空军威力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相信，实际上他确信，我们有一件不可战胜的武器，一个我们总是可以依靠（即使不太愿意）的真正力量，那就是美国空军辉煌的战斗力和潜在力量。恐怕人人都会倾向于坚持某些看法，这些看法是由他们成长年代中的重大经历形成的。罗斯托在青年时代的重大经历之一，就是挑选过欧洲的轰炸目标。那是意气风发的时期，是他为国家作出伟大贡献的时期。他相信战略轰炸，相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取得胜利而发挥的巨大而无比重要的作用，相信它砸烂了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部分。对战略轰炸和他自己的作用的迷信，使他对后来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

告》中提出的全部情报不以为然(在参加调查工作的主要成员当中，有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乔治·鲍尔两个人，后来变成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鸽派人物，这不是偶然的)。那个报告无可争辩地证明，战略轰炸没有用处。
162 恰恰相反，它增强了德国人民进行抵抗的决心。后来在北越也是一样，轰炸使人民同河内政权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罗斯托对反对轰炸的意见一直是满不在乎的。如果说他在这方面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只是认为我们对德国的油库和电力网炸得还不够。后来他想在越南弥补这个不足。只有空军比罗斯托更狂热地相信，有了这种武器，我们就有了对军事问题的万应灵丹了。别人可能对真正同河内对抗产生犹豫，罗斯托却比别人忧虑少，信心比别人足。把轰炸作为一种可以依靠的武器的意见，尤其使他满意。尽管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轰炸是无效的，但一直到1967年他还坚持相信轰炸的作用。1967年他同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就轰炸无效的问题争论起来。事后，卡曾巴赫走出来，不住地摇头，对一位朋友说，“我终于了解了沃尔特同我的分歧。我是领航员，被打下来后在德国监狱里呆了两年，而沃尔特却是给我挑选轰炸目标的人。”当然，这一切，甚至失败，都是后来发生的。他这种出奇的狂热是出于他对轰炸的迷信，认为轰炸是有魔力的。在肯尼迪的班子里，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迷

信轰炸的人。

调查团的另一个成员是马克斯韦尔·泰勒。他是肯尼迪式的将军，口齿清楚，仪表堂堂。一位政府官员几年后曾说，即使泰勒穿便服，也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1955年至1959年，他是美国陆军参谋长，曾同艾森豪威尔政府斗争过。那几年采取的政策是大规模报复，这个政策大大削减了美国陆军的规模和作用。肯尼迪班子里的人对于国内事务总是粗心大意的。他们都认为，泰勒辞职是表示抗议。事实恰恰相反。泰勒虽然提出过完全不同的战略，但他还是能委曲求全，设法共处了四年，然后才退职。他在退职后写出了那本表示反对意见的书，强烈抨击共和党人，给人的印象好象泰勒确是辞职的。

他的形象相当高大，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将军李奇微的嫡系。他有显赫的战功，军民都认为他是一位英雄，人们似乎把他看作是李奇微第二。1960年，泰勒辞去了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主席的职务。这个职位增添了他的名望，使他成为一位有文化的战争英雄。他的听觉不好，但他不要助听器。他不仅对这一点相当自 163
负，而且对他的头衔也相当自负。政府刚组成时，对他的头衔曾有过一番争执：应当是他想要的“总统军事代表”，还是用肯尼迪取的“特别军事代表”？结果还是用了肯尼迪提出的头衔，因为这是总统的意思。

这位将军好象就是为肯尼迪时代而诞生的。他头脑冷静，看问题正确。他长得漂亮，身体健壮。在他当空降部队将军的时候，与其他将领相比，比较能用现代眼光看问题。他会讲好几种外语，还写过一本书。他看上去很有气派，总能克制自己。他当西点军校校长时，有一次去参加大学校长会议。他在会上从头到尾不用讲稿，作了一个有力的雄辩的发言。会后，另一位教育家祝贺他发表了一篇这样好的即席讲演。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搞什么即席发言。”最重要的是，他的战略观点完全同肯尼迪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把核武器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是不可设想的。他还认为，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发动核战争，而老一套的常规战争似乎越来越过时了。因此，他写道，今后的战争将是丛林战，而美国作为世界稳定和体面的维护者必须消灭这种战争。他好象是在谈游击战，而实际上，从游击战争的角度看，他其实是常规观念最强的人。他所谈的无非是在非常有限的战争中有限地使用高度机动的常规部队。这点当然说得很好，以后可以进一步发挥。但是在肯尼迪政府初期，人们还看不到这点。人们在那个时期对游击战和小规模战争极有兴趣，但了解得较少。

然而，在肯尼迪圈子里的人看来，泰勒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不同于艾森豪威尔的将军们。后者完全是军方的典型。（肯尼迪曾以为所有优秀的将军都彼此喜欢，因

此，他以为詹姆斯·加文将军一定是泰勒的朋友，因为加文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一位罗曼蒂克的空降人物。加文写过一些书，也是因为反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而中止了自己辉煌的前途。他还支持肯尼迪反对尼克松，这是对一位优秀将军的首要考验。"詹姆斯，詹姆斯，"肯尼迪曾经在白宫对正要离开的加文大叫，"泰勒在这里！泰勒在这里！"肯尼迪还以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了，但他从加文脸上看到的表情却冷淡到了极点。实际情况是，这两个人彼此讨厌，长期以来就是互相竞争的敌手。他们甚至在曼哈顿的战后游行由哪个空降师领先的问题上也发生过争吵。最后，两个人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此外，新政府成员认为，泰勒可以而且一定会成为肯尼迪的将军，他至少会象忠于他的军服和军队那样忠于肯尼迪一帮，但后来证明，这完全是两码事。在猪湾事件时，他曾很好地为肯尼迪服务，虽然他当时所写的报告充满了技术性的内容，而缺乏政治机智。但肯尼迪总统还是认为 164
泰勒沉着、理智，在新政府中可能除了邦迪外，确实比其他人更象自己。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似乎认为这样还不够，所以对泰勒恩宠备至，不断提拔。

这样，泰勒就被选中参加赴越调查团。他不一定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喜欢的人，但在肯尼迪看来，泰勒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有更大的独立性，更新式，官僚气较少。最重要的是，几乎十年来他一直告诫人们，世界重大的军

事课题不是核战争，而是灌木林火式战争。现在他就要到这样一个国家去了，在那里，如果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却存在着世界上最激烈的灌木林火式战。

于是，罗斯托和泰勒就出发了。他们相处得很好，两人都是活动家。有些人曾怀疑美国是否被软骨头掌了权。现在，当他们看到从西贡发回的泰勒和罗斯托同一些越南人激烈地打网球的许多照片时，他们就该放心了。肯尼迪也请兰斯代尔去越南作一次特别访问。兰斯代尔接受了。后来他才知道，他变成了泰勒调查团的一员。动身以前，泰勒要调查团每个成员列一个到越南后他要调查的问题的提纲。兰斯代尔是调查团中最内行的成员。他列了一长串调查提纲：他想进一步了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他想了解政府是否接近人民；应征入伍者有什么想法；哪些人可以在南越军队（越南共和国军）中当军官，哪些人不行；地方上对税务官员有什么看法；越共在农村得到多大的支持。兰斯代尔本来就不特别崇拜泰勒。1955—1956年，泰勒当参谋长时，兰斯代尔曾要求更注重发展特种部队和非正规战的部队。但是，泰勒不理睬这个意见，相反地却打算削减非正规战的部队的人数。现在他又发现，泰勒对他的提纲也不理睬，只是默默地把提纲收下了。两个人在调查中始终没有讨论过这个提纲，泰勒也从未问过兰斯代尔，他为什么想调查这些问题。

当调查团参加正式礼宾活动的名单草拟出来时，泰

勒在紧挨兰斯代尔的名字的上面划了一道“以下免除”的截止线，尽管兰斯代尔在越南是很有名、很得人心的。兰斯代尔对这点并不感到惊奇。使他比较惊奇的，倒是泰勒对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看法。泰勒给兰斯代尔一项任务，要他了解能否筑一条横贯全国用来制止渗透的巨大防线和筑这条防线要花多少钱。兰斯代尔同在越南的有眼光的美国人一样，多年来一直嘲笑法国远征军只想建立固定的前哨阵地，就是美国人认为的马奇诺防线思想。现在，当他从泰勒那里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不禁暗暗想到，原来我们到这里来是想筑起我们自己的马奇诺防线。随着调查团工作的进展，兰斯代尔想到泰勒要搞的一套就是想把常规战争的思想运用到非常规战争中去。兰斯代尔认为这等于率领一支战斗目标不明的军队，只是让它更为机动，而避免触及导致军事失败的真正社会、政治原因。但是，兰斯代尔不仅在礼宾活动方面受到排挤，而且在调查团的报告中也不提他的看法。 165

到越南去的不只他们这几个人。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之一约瑟夫·艾尔索普也去了。那时他仍是有影响的；后来，战争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声誉，逐渐缩小了他的影响。亚洲的反共斗争对他有巨大的利益。他始终对国务院不满意，因为当中国落到共产党手中时，国务院却让美国袖手旁观。尽管他提出多次警告，中国还是

丢了。但是，他仍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有力鼓吹者。他熟悉华盛顿的那一套，政界熟人多，交游又广。他虽然不想把自己降低到使用麦卡锡那样的手段，但是仍然暗示有缺乏丈夫气概的危险，以此说法来为守住战线的主张辩护。现在他就是这样做了。他于10月18日从檀香山发回一篇专栏文章，这篇文章说明，一位总统当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舆论和压力：

关于肯尼迪政府"不坚定"的所有议论是否确有根据？这些议论使总统非常不安，他差点要把最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演说作为对批评者的一个重要答复。但是，难道这种议论完完全全是政治上的空谈吗？我们正在前往麻烦的南越途中，美国政府的坚定性正在那里再次面临考验，这个问题的确显得十分重大。本记者作的回答"又是又不是"，这是很奇怪的提法，但它却是现代美国书生气政治的一个典型……

艾尔索普在那整个星期里一直主张出兵。最初他是在游击战的规模还相当小的时候提出的。越共那时还很少整连地出击，整营地出击更从未有过。据估计，在南越的越共人数也许不超过一万七千名。因此，艾尔索普发现北越的正规部队不是一个团，而是两个团；一个团在南越，另一个驻扎在分界线上，准备进来（其实他们是在大约四年半以后才进入南越作战的）。艾尔索普写道：

游击队干部和战士许多个月以来大规模地渗透到南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出现共产党北越正规军的正规部队却是

另一回事了。按照普通的提法，这就是入侵。

他还觉得，虽然这是“亚洲版的柏林事件”，必须坚决对付，但是对美国人准备进行的长期斗争，共产党并没有相应的准备。艾尔索普接着写道：“这一点清楚表明，共产党最高指挥部现在只作短期打算。他们只是调动一切有利因素而不考虑更远的未来，因为他们希望不久把战争推向高潮。”十一年后，河内在1972年发动了一次重大攻势。这时艾尔索普完全不顾对方的坚韧性，又写道，“这是他们的最后挣扎。”如果敌人证明他们能从废墟上恢复元气、卷土重来的话，那么，艾尔索普也是这样。 166

年初，南越的叛乱越闹越凶，越共逐渐更大规模地集结部队，而且越来越多地同越南共和国军交战并取得胜利。除了罗斯托建议的，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名义派一支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去守住连接老挝的边界外，还有人说，要派美国战斗部队去。参谋长联席会议想派一些部队到南越去，主要不是为了参加战斗，而是为了显示一下美国的坚定决心。当然，它不知道战争有其特定的规律。如果美国增加赌注，河内和越共也会这样做。虽然没有具体说，但大致上人数是少量的。奇怪的是，没有怎么谈论部队是否要参战，虽然人们的印象是不参战，是去制止战斗而不是参加进去，目的是向河内和共产党人表明

我们的意图，从而自然促使对方逐步降级。

这个建议实际上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其他地方的需要。那时联席会议想要加强武装力量，特别是加强虚弱的战略后备队。如果向东南亚指派部队而且确实加以使用，那就可以有力地证明国内需要更多的部队。此外，联席会议喜欢创立先例。它想在越南大门口插一脚，这样，万一战争扩大，它就有所准备，有一个后勤基地在西贡，还可为派遣更多的部队提供法律根据。开始的时候只承担少量义务，以后再增加总是容易的。这就象一个有机体要自动生存，要发展，要补充营养一样。一切机体都有自己的工作，对军方和将军们来说，扩充军队就是他们的工作。

到了秋天，参谋长们又来催促了。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费尔特海军上将前不久访问了越南，对那里农村的形势日益恶化大为震惊。越共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加紧活动。他们随便在什么地方同政府军交战，后者总是失败。越共部队领导好，坚信自己的事业。相反，政府军虽
167 然也同样是越南人，但领导很糟糕。率领政府军的师、团甚至营级军官从来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战斗，他们只是因为效忠吴庭艳便当上了军官。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许让部队受到伤亡，因为上面认为，部队受到伤亡就是反对吴庭艳本人的表现，证明他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受人爱戴、受人尊敬。而越共领导为了争取每次政治胜利，完全不

在乎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一名越共战士在日记中写道，“为祖国而献身是我们这一代的职责”。因此，结果几乎总象是早就注定了似的。情况正如过去在中国一样：一支现代的军队对付一支封建的军队，而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军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西方观察家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越南共和国军装备齐全，有无线电台、飞机、大炮和战斗机，而越共除了一些步兵轻武器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认为，越南共和国军是一支合法的真正的军队，而常常只穿黑色短衣，甚至还没有制服的越共是假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军队，嗯，好象连指挥系统都没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建立了一支酷肖自己影子的军队，一支基本上只在纸面上存在的军队，它只代表美国的目标和雄心，而一点也不代表越南人民。我们信任这支军队，越南人民却不信任它。我们把它看作一支真正的军队，只需稍加支持，有一两个顾问，有几个人帮助战士看地图，再加上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较优秀的军官组成更强有力的领导就行了。这种对于强有力的新领导的幻想在那几年里一直存在，所以到1967年初，罗斯托看到西贡发来的前景暗淡的报告后仍然十分乐观。他遇到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后者在越南呆了一年半后刚回来，情绪越来越悲观。罗斯托这时开始阐述他的新理论了。罗斯托说，我们必须摆脱美国自由派对南越军人政权的嫌恶。在不发达国家中，军人就是希望。应该

由文化高、有理想的年轻军官把民族主义的旗帜接过来。不要那些殖民时代的懒散疲沓的旧文官，而要那些了解当代世界的聪明人：剃小平头，会说英语，在布莱格堡受过训的。越南现在正是这样，由这样的年轻军官接管，象阮高其那样厉害的家伙。

“哼，沃尔特，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这样的，”埃尔斯伯格回答说，“但是，这种聪明的年轻军官和殖民军队一起为反对本国独立而作战，这样突出的荣誉倒只有在世界上极少数国家才能找到。”

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外，南越人也要求派遣更多的部队。这是一股新增加的压力。南越人自1961年秋季就越来越紧张了。他们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勾引美国人更深地陷入承担义务的圈套。一年前，吴庭艳甚至还不愿意承认越共是一支军队，认为他们是土匪、歹徒（蒋介石也用过同样的话辱骂中国红军。原因是一样的，一方面是狂妄自大，另方面是要保持唯我独尊的合法地位）。迟至1961年5月，他还告诉约翰逊，他不要美军。但是，到9月，越共的力量越来越强了，于是吴庭艳召见了瑙尔汀大使，要求缔结双边防御条约，因为他感到东南亚条约组织还不足以保护他。他猜想英法是不愿意援助他的。

168

当时日内瓦会议还在讨论老挝中立化问题。然而有

意思的是，吴庭艳已经在把这个问题用作对付美国人的武器了。他说，一个中立的老挝会使他遭到敌人更大规模的渗透（实际不然，敌人是能够任意渗透的；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能阻止渗透的话，那就是老挝王国军）。美国来访者不断同吴庭艳谈，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出兵，这肯定对吴庭艳是有影响的。现在他找到了把美国人同他的政府更紧密地拴在一起的机会。其次，他早已不相信美国人是坚定的。到了10月，压力更大了。代理国防部长阮廷淳接见瑙尔汀，要求美国出兵。可能除了吴氏家族外，阮廷淳就是政府里最重要的高级官员。瑙尔汀向华盛顿报告说，阮要求派一些"战斗训练部队"。这样，在十七度线附近就可以有一支象征性的美军，中部高原的几个主要省会也驻扎美军。阮廷淳强调说，时间是关键。

虽然预先了解到这一切情况，美国政府对出兵的要求还是感到有些突然。现在吴庭艳说的和过去不一样了，有人怀疑可能是吴庭儒放的试探气球。但是，泰勒和罗斯托去南越时，他们是带着调查使用战斗部队的可能性的明确任务去的。他们要调查三种具体战略：一、用美国三个师来打垮越共；二、派少量战斗部队，主要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做个象征性的姿态，让美国先在大门口插进一只脚；三、不派战斗部队，而是增加美国对越南人的援助，提供更多的装备，特别是直升飞机和轻型飞机，使政府军有更大的机动能力。

指示泰勒调查出兵的可能性，这在华盛顿是众所周知的。在前几周中，猜测和议论越来越多。尽管周围的人对他有压力，总统本人还是不赞成这个主张。他感到陷入了困境。如果人们都知道，泰勒的主要任务是决定169是否派遣作战部队，那么几星期后泰勒回来时，就该由肯尼迪作出这个决定了。在出发前的情况汇报会上，出兵问题被有意识地掩盖住了。当时《纽约时报》有一篇来自白宫高级人士的报道说，军事将领不愿出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文章还说，出兵问题是泰勒调查任务中最次要的问题。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总统已经感觉到他周围的人对他施加的压力，而且对此感到不舒服。

调查团离开越南后到了菲律宾。在那里，泰勒写了报告的主要部分。泰勒写的部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不仅因为这部分反映出他早在1961年对越南问题的看法，而且有助于了解他在危机加深后对这一问题的态度。1954年，泰勒在空降部队的前任李奇微当陆军参谋长时，曾为了使美军不介入印度支那战争而出色地斗争过。肯尼迪起用泰勒的部分原因，就是他想要有一个象李奇微那样的人。但是，单单这次调查就清楚地表明，李奇微和泰勒是不同的人。

由于泰勒—罗斯托调查团大大地改变并加深了美国

对越南的义务，由于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泰勒是反对出兵的，所以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个报告。事实是，泰勒的确是主张出兵的。泰勒是这次调查的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这个重要报告是他写给肯尼迪本人的。他建议先派八千人去，必要时再增派。最关键的是，他认为，不出兵是不行的。这个建议使肯尼迪大为震惊。所以，对泰勒的报告严加保密，还把发出去的有些副本收回来。连直接参与决策的人如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麦康瑙吉都不知道泰勒是主张出兵的。发表的只是报告的一部分，即关于调查团建议派顾问和后勤部队以及建议进行改革和扩大吴庭艳政府的部分。其实，泰勒实际发回的电报几乎没有提到改革问题。电报主要是谈军事问题，而且常规战争的观点极强。

泰勒在电报中还谈到了因越共的军力增强和美国推行老挝中立化政策而引起的“信任危机”。（在冷战的这个时期，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要开始制止冷战，每前进一步，必须至少后退一步。在老挝问题上软了，在越南问题上就必须硬一下。新政时期的律师本杰明·科恩是华盛 170
顿方面最早在越南问题上看出危险性的人之一。几个月前，他把老朋友艾夫里尔·哈里曼拉到一旁对他说，在越南的做法是灾难性的，是同哈里曼对老挝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哈里曼是个很忠实的政府成员。他抗辩说，没有那回事。五年以后，哈里曼在乔治敦举行的一次招待

会上把科恩拉到一旁沉痛地说："本杰明，在越南问题上你说对了。"）泰勒明确地规定了美军的任务：这主要是由后勤部队组成的特遣部队。这支部队驻在南越将使吴庭艳相信，美国准备"和他一起对越共或越盟摊牌"。泰勒的电报还概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后备兵力本来已经很少了，如果出兵就是把美国的威信孤注一掷。如果第一次出兵不解决问题，就很难"顶住要求增兵的压力"。如果最终的目标是封锁边界线和肃清叛乱分子，那"我们可能要承担的义务就将没完没了"，除非"我们袭击北方的策源地"。这就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甘冒在亚洲打一场大战那样的升级的风险"。

但是，泰勒报告说，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最能使南越政府和人民安心的，莫过于把美军开进南越。（在这里，报告的主要出发点，也就是美国人的假设，是以为南越的政府和人民是团结一致的，以为吴庭艳想做的事就是"人民"想做的事。这种过于匆忙提出的假设，在整个越南危机期间始终蒙蔽着美国的决策者。）派去南越的不一定非是一支很大的部队，但也不能只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而必须是一支有份量的部队。这支部队将有助于鼓舞南越士气，因为它表明，美国不答应共产党接管南越。它还可以做一些救济水灾的工作。根据当时那帮人爱好施展计谋以遮人耳目的情况看来，他们煞费苦心地想用帮助在湄公河三角洲抗洪救灾的名义，到南越去进

行军事行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估计舆论界将会誉之为一大善举。这支美军将不派到越南的丛林里去执行清剿行动，那个任务仍留给南越军队。但是，他们可以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的驻地而作战。他们还可以为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部提供一个先遣小组，去参加制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可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们作为总后备兵力的一部分，还可以用来对付越共主力。所以，如何使用这支部队，实际上取决于对方反对美军进驻的决心多大。

由此可见，泰勒建议的实质，就是使美军成为在越南的一个经常存在的因素，也就是我们摆出一副在战争中奉陪到底的架势，而由对方去决定把战争扩大到什么程度。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低估了对方的认真程度和决心，以为只要我们表示强硬，河内就不敢惹我们。(我们不断犯上述错误，从泰勒调查团一直到1969年入侵柬埔寨和1971年入侵老挝，都是如此。我们一错再错。敌人对自己的国家比我们对这个国家总是更认真些。)泰勒在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求我们表示强硬的建议。这个建议竟然出自肯尼迪政府认为是它最杰出的战略家，出自一个谨慎的、应该了解这类战争的人。泰勒的思想是建立在以下的荒谬看法上的：敌人在自己国家里进行的这场斗争，终归是要劲头越来越小的，因为这场斗争到那个时候已经以各种形式持续二十多年了。然而，河内最重要 171

的军事家，即泰勒的对手武元甲将军，毕竟毋需为柏林通道、裁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力、促使导弹撤出古巴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操心。武元甲将军即便是在泰勒将来离开他的国家后，也还将继续自己二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事业——使越南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起来。

泰勒承认，爆发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这种危险"不太大"（此言一出，悔之莫及）。北越"极其经不起常规轰炸。在外交上应该抓住这个弱点来压河内在南越罢手"。（即使有这种弱点，河内也并不如泰勒和罗斯托那样地意识到。）泰勒发回的电报说，河内和北京都面临着"在东南亚维持强大地面部队会产生的严重后勤困难。我们也有这种困难，但程度决不象他们那样大"。他认为，中国发生的饥荒使中国人不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冒险。至于美军将处境如何这个重要问题，泰勒认为，南越"不是一个作战十分困难或不愉快的地方"。电报中有一段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认为南越堪与朝鲜相比，"在朝鲜时美军很容易地就学会了生活和执行任务。在美军可能驻扎的南越高原和沿海平原，丛林是不太多的。沿海地区最讨厌的是炎热。在湄公河三角洲，洪水之后一片泥泞也很讨厌。中部高原对美军的驻防不产生特别的困难。"

泰勒电报的这一部分也许最能说明美国军事家，甚至第一流的美国军事家，是怎么看越南和这场战争的。

非常规战争当时在华盛顿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而号称这方面的专家的泰勒，却把南越比作朝鲜，说在朝鲜我们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克服了。在寻找可与越南战争对比的战例时，泰勒偏偏举了朝鲜的例子。但是，他只提可作比较的地形条件（实际上，朝鲜要开阔得多，而且从军事观点看，地形方便得多，大大有利于使用坦克和空军），而不考虑朝鲜和越南之间的根本不同：战争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常规战。穿着制服的敌军大部队以传统的方式越过边界作战。而后者是游击队依靠颠覆活动进行的一场政治战。根本找不到穿制服的敌人大部队交战。敌人主要是靠政治，就是说，靠老百姓的支持进行游击战。白人军队一出现，可能很快就会造成政治上不利的局面，即使军事上有任何利益也是得不偿失的。可作对比的战例是有的，那是当年法国进行的印度支那战争，或是菲律宾的起义。可是泰勒偏偏要同朝鲜作对比。这位将军素来享有盛名，他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常爱引证修昔底德①的警句。连他这样一个人都看不出这个重要差别，还有谁能看得出呢？ 172

泰勒在11月3日作总结说，美国出兵利大于弊，还说，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拯救南越。他报告说，“我不相信

①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400年），雅典将军，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为研究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文献。——译者

美国不出兵而能实现拯救南越的计划。”接着，他提出了肯尼迪早些时候提出过的同一问题：所建议的计划，如果不包括美国出兵这一条，能否制止南越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回答说，很值得怀疑。他说，要想提高士气，要想使对方相信我们说了是算数的，“要想使敌人清醒清醒，要阻止升级……”，除了出兵，别无他途。

接着泰勒提出了何时撤军的问题。有多种答案。一是在军事上速胜后，但速胜不大可能；美国兵也许还要留下维持局势，与此同时使南越军队壮大起来。为了作计划，姑且把撤军的时间定在1962年底。到那时吴庭艳的军队将达到二十万人了。

总之，泰勒—罗斯托报告是一个不寻常的文件。通过这个文件可以深刻地剖析当时的情况。这个报告表现出对越南战争的性质所作的完全错误的理解。泰勒的电报中没有谈到这场战争的严重政治问题。它对敌人傲慢、蔑视，而这个敌人不久前在对付另一个西方挑战者时有过出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写这个报告的将军在朝鲜看到过空军力量的局限性，而他现在却说，如果局势恶化，我们随时可以使用空军力量来制服河内。报告以为，南越的人民和政府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报告又写道，据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并得到了大量美援和物资的人民还需要别人的保证。报告认为，越南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缺乏自信的问题。1954年李奇微

调查美军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利弊时，他夸大了对危险的估计，而缩小了对利益的估计。现在泰勒正好颠倒过来。

不是所有同行的人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参加调查的两名国务院官员斯特林·科特雷尔和威廉·乔登，就比较怀疑能否成功。科特雷尔是国务院越南特别工作组的组长，他对美国出兵能产生什么效果是抱悲观态度的。他报告说，“既然南越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能否打胜还是个未知数，那么，美国承担无可挽回的义务进入南越与共产党作战就是错误的。”他确曾提出接近于罗斯托计划的建议，大意是，如果美国的一再努力失败，也可以通过轰炸北方来惩罚北越。乔登过去当过《纽约时报》记者。他报告说，反吴庭艳的政治情绪已接近爆炸点，南越政府已濒临瘫痪状态。他反对美国“同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政权”抱得太紧。大多数国务院官员对这种怀疑具有同感。泰勒的建议转发给了腊斯克。腊斯克当时正在日本参加一个会议。腊斯克回电表示，如果不能取得吴庭艳方面同意进行改革作为交换条件，那么他就不同意扩大美国的义务。腊斯克说，除非吴庭艳政权扩大基础，多吸收一些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分子进政府中来，否则他怀疑“少数”美军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 173

总的来说，反对出兵的意见是微弱的。11月8日，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这反映了他所主管的五角大楼内部对他施加了压力。在一个不寻常的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备忘录中(行文开头是:“参谋长们、吉尔帕特里克先生和我决定……”),他说,南越的陷落将导致整个东南亚的形势严重恶化。他同意,如果不派美国战斗部队去,我们就不能阻止南越陷落。他接受泰勒的看法,即如果美国不出兵就不能恢复吴庭艳的信心。然而,他写道,即使派泰勒所建议的八千人也不一定能使对方感到我们确实是说了算数的。要使他们相信,就必须明确地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兵力;如果河内继续援助越共,我们就要对北方采取惩罚性的行动。当然,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作最坏的打算(河内和北京可能直接干涉),我们必须考虑投入六个师(麦克纳马拉认为这是我们在不影响柏林的需要的情况下所能给的最大限度的援助)。他写道,“在东南亚,所需要的美国地面部队最多不会超过六个师,或者说大约二十万零五千人。我认为我们这样估计是不会错的。”麦克纳马拉的基本结论是支持泰勒的观点的。

在华盛顿有两个重要人物对美国出兵南越感到严重的不安。一个是约翰·肯尼迪;另一个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鲍尔即将接替鲍尔斯的职务。那时他正在走运,但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差一点没能进入肯尼迪的上层圈子。他带有史蒂文森的色彩,这对他是

174

不利的。早些时候，在1月份，当肯尼迪政府上层的职务接二连三地由共和党人充任的时候，眼见着鲍尔这个民主党人又要名落孙山了。这时鲍尔听说，肯尼迪和腊斯克想任命另一名共和党人威廉·福斯特来当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他便决定跑跑门路。于是他找史蒂文森帮忙。史蒂文森对肯尼迪的作用和影响比鲍尔要大。史蒂文森又找了富布赖特，同时表示了他自己也对把政府官职接连授给共和党人一事不满。富布赖特就对肯尼迪施加压力，告诉他，做事要有个限度。这才打消了对那位共和党人的任命。

福斯特落选后，鲍尔成了当然的人选。他是一个民主党人，是个律师，在麦卡锡滥施政治迫害的高潮时期愿意为受害者辩护。他在经济事务上有专长，是长期以来致力于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让·莫内①的门徒。他很自命不凡。在华盛顿他是唯一亲自起草演说稿的人。他是个颇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进入政府时可能被人看作是史蒂文森派，但上台后的表现却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派，就这一点来说是继承了艾奇逊的传统，但他不那么一味依靠军事力量。

出兵越南的主张使鲍尔很不安。在印度支那战争时

---

① 让·莫内(Jean Monnet, 1888—)，法国经济学家，曾任法国部长、欧洲煤钢联营高级机构主席，是西欧一体化和西欧共同市场的积极倡导人。——译者

期，他曾与法国人密切合作过。将军们虚假的乐观情绪、越盟的百折不挠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利用民族主义和使一个西方国家陷入泥淖的能力，以及战争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有害影响，等等，这一切他都看到过。他不希望美国重蹈覆辙。他读了泰勒的电报，其中要求承担一项小小的义务，还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仅仅八千人而已。他马上对邦迪和麦克纳马拉说，如果他们照泰勒的建议去做，那么这种义务就不会停留在小规模上。五年之内他们在那里就要保持三十万兵力（他稍微低估了一些；五年多之后驻南越美军已达五十万），因为，美国一出兵就改变了所承担义务的性质，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方是不会轻易放我们走的。而且，这正中吴庭艳下怀。美国出兵可以稳定他的政权，让我们替他打仗。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都同鲍尔争论。他们相信，有理性的人能够控制不合理性的义务。最后他们决定，即使要出兵三十万也是值得一试的。这时，鲍尔说，他们应该向总统说明，即使付出这么多的鲜血和资源也是值得一试的。邦迪和麦克纳马拉同意了。后来鲍尔自己用同样的话对肯尼迪说：不到几年之后总统将在南越投入三十万美军。肯尼迪笑了，并说，“乔治，你真是发疯了。”但是，这件事毕竟震动了总统，使他更感到前景实在曲折和暗淡。

175

其实总统并不需要这么大的震动才看出问题，他自己本来也有许多疑虑。他意识到这些建议所包括的危险

性，也意识到这些建议提得多么轻率。当时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他们想要派一支美国军队去。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为了保持士气，必须这样做。但是，肯定和柏林一样，军队开了进去，军乐齐鸣，群众欢呼，四天之后大家就忘了。随后人家又要求我们增兵。这象喝酒一样，酒劲儿过去了又得来一杯。"他说，这毕竟是越南人的战争，必须由越南人自己去取胜。他对其他人说，他对整个这件事情是怀疑的。当法国人投入了三十万大军仍不能控制越南的时期，他曾到那里去过。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怎么能比法国人更高明呢。这件事激怒了玛格丽特·希金斯女士。这位女士是又一个强硬派专栏作家，她是为表面上持中间立场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写文章的。她听到总统的怀疑后，在11月6日写道，他"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她辩解说，法国人并不是因为打败仗而丢掉印度支那的，他们是停战后放弃它的。

在政府内部，有些迹象表明正在形成一个派。这一派不认为越南问题主要是个军事问题（因而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腊斯克仍旧有点站在一旁不愿出头的味道。他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对吴庭艳政权及其不从事改革是经常不放心的，对出兵也感到可能带来危险；另一方面他又确信，必须制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并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人。在这个时刻，腊斯克理应

挺身而出，表示强烈反对出兵。然而，他只是稍稍表示不同意见。他看得出来，总统至少要派出一支相当大的顾问-后勤部队，否则就过不了关。所以他勉强同意了。国务院还有一些人表示怀疑。乔治·鲍尔认为，派顾问无非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是要失败的，接着必须走第二步。即将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哈里曼对越南问题并不熟悉。实际上，关于越南问题他所了解的极其有限。但当他听说，南越政府缺乏信心，士气低落，他就明白，这是说得好听些，实际情况一定严重得多。还有就是总统本人，他不想出兵去重蹈法国人的覆辙，但同时又怕别人指责他丢失一个国家、抛弃一个勇敢的盟友，从而在美国国内惹出麻烦，怪他不给更多的援助，怪他不试一试。

176 11月11日，也就是麦克纳马拉提出出兵主张的三天之后，麦克纳马拉又发出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他和腊斯克一起搞出来的，其中反映了总统的观点。它是对官僚机构，尤其是对军方的一个妥协，也是对反对丢失一个国家的压力的妥协，这种压力是不通过口舌和文字表示出来的。肯尼迪将派美国后勤部队和美国顾问，而不是作战部队。我们将帮助南越人自己干。如果南越的确还要成为一个国家，的确希望保持我们西方所理解的那种自由，那么我们就要支持它。我们将派我们最优秀的年轻军官去当顾问，一直派驻到南越营一级的部队里。我们将把南越军队运到战场上去打神出鬼没的越共。因为

我们是讲平权主义的，所以我们将对吴庭艳施加压力，迫使他改革、扩大他的摇摇欲坠的政府的基础，使整个南越社会现代化。

麦克纳马拉改变自己的建议是司空见惯的。在总统拿定主意以前，他的呈文一直是建议草案。然后根据总统的决定进行修改。这样，将来历史档案里就不会留有国防部长和总统之间有过任何分歧的痕迹，而这将说明他是多么忠心耿耿。肯尼迪一方面把住不出兵这条线，另一方面又叫参谋长联席会议继续作出兵的规划。这是他惯用的一手：如果不打算给人家所想要的东西，那就仍然给他一线希望。猪湾事件后，他也是让他们继续作入侵古巴的规划。有所予，又有所不予。在这件事情上，让参谋长们有机会作出兵的规划，实际上是推动了他们一下，使他们只展望未来而不回顾过去。在肯尼迪最后拿出来的一揽子决定中，相当强调南越的国家建设和改革问题，以为我们可以巧妙地使吴庭艳跟着走。我们可以用绕过吴庭艳政府的办法来做到这点，这就是建立战略村来保护人民免遭越共袭击(假定他们要求保护)。我们毋需吴庭艳的合作，也可以使南越现代化。

这种对改革和使南越社会自由化的强调与泰勒的电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泰勒的电报对问题的看法主要是着眼于军事。但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个自由主义的、反共的政府，用它自己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是很自然的。实行

自由化以及从上而下地进行政府改革（越共正在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革），便能重振一个病态的社会。从改革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想法是令人安慰的。不仅对肯尼迪政府自己来说，而且对政府的支持者来说，都是令人安慰的。对于一个反共的、自由主义的政府来说，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这将既有益于人民，又能制止共产党。然而，改革一事后来毫无下文。在公众眼中，这项政策的制订者是泰勒，他们从报上看到关于美国所承担的义务的报道，177 还以为他是改革政策的制订者而不是战争政策的制订者。这完全是误会。一年半以后，泰勒访问越南时，有个名叫斯坦利·卡诺的记者问他，广为议论、得到高度赞扬的改革现在怎么样了，因为没有看到改革的影子。泰勒很生气地回答："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理论家。"

当然，我们几乎就要出兵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政府对外讲的是：泰勒主张不出兵，他认为南越主要是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样，当然提高了他在文官中间的声望，又一次使人们以为他和别人不同，比别的将军好。这样，又一项重大决定几乎是偷偷地在政府内部轻易通过了。只请了极少数人参加讨论这项决定，也没有进行有分量的情报调查，以了解为什么越共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以及我们究竟能否用军事手段制止他们发展壮大。瑙尔汀大使在西贡听到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军援司令部后，大为生气，他极力反对。他认为，南越主要是政治问题。他不

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义务不断增加。他真想辞职。他对腊斯克没有更有力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感到失望。

在许多方面，泰勒—罗斯托报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完全按照他们的建议做了，而是因为他打了折扣做的，因而他还自以为是稳健、谨慎的。这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他顶住了。而实际上，他是在把我们更深地带入泥淖。当初往南越派了一支六百人的部队，失败后他没有撤退。现在他又要把兵力增加到一万五千人。这就是说，将来决定撤退时势必更加困难了。他不仅增加了军队的人数，而且正在改变一件更加微妙的事。过去，口头上的保证是比较低水平的——发表讲话、举行记者招待会、喊喊口号、说些漂亮话等等，而现在为了说明必须增加援助，政府只好使这种口头保证大大升级。同样，为了说明必须承担更大的义务，那么在越南也必须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共宣传运动。他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把美国的卷入扩大到何种程度，而且这种扩大是一个恶性循环。

要增加美援，就必然要增设美国军事机构。军事机构一多，采访新闻的人也就增多。所以，肯尼迪大大增加在越南的美国人，也就在各方面增加了越南的重要性，使美国国内更加注意越南。美国特派记者从两名骤增至八名。最可怕的是，其中还有带电视摄影机的美国记者。他们到处乱跑，把吴庭艳所不愿张扬出去的事情全都摄

178 入镜头。吴庭艳的政敌很多。他们从越南宪法和美国大使馆那里找不到申诉的渠道，而在美国记者那里却第一次找到了同情者。因此，扩大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意味着，越南内部的动乱必然要加剧。（吴庭艳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最后几乎神经失常了，他竟认为，第一个和尚自焚事件是由“全国广播公司”出钱预先策划好的，虽然在现场并没有电视摄影机。）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记者的到来，起了打开一个本来是封闭的国家的作用。这就是吴庭艳接受美援所付出的代价。同样，当美国在地面部队方面承担的义务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时，擅长于操纵舆论的美国政府马上加强宣传来为它的政策辩护。如果越南的形势不妙，办法就是多发动些人发表更多演说，这样就有更多的正面报道了。

肯尼迪承担的义务还带来了其他一些变化。总统自以为他约束了军方，其实他反而是让他们参加了决策。现在他们开始控制官方报告了，因而，发到华盛顿来的报告总带着他们看问题的色彩。现在他们是参加者了，在扑克牌桌上有了位子。今后如果采取任何带有鸽派味道的行动，都必须同他们打交道。肯尼迪把他们发动起来了，但同时给他们的又很少，所以他们老是对朋友说，上面一直不允许他们去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后来肯尼迪和约翰逊都发现，只要军方把脚伸进门内，以后同他们打交道就麻烦了。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一错再错，但他们毫

不在意。人们以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信誉就会下降，从他们那里来的压力从此会减轻些了吧。但结果并非如此，他们反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提出更多的要求，要求增兵，要求增加武器，要求批准更多的攻击目标。在同军方打交道时，除了核武器问题外，让步总是单方面的，文官方面向军方让步。因此，那些自以为打小规模战争时控制局势大有把握的文官们，应该记住一条经验教训，那便是如果想控制军方，就必须把他们完全控制住。一旦把他们放进来，那怕是进来一点儿，一切就开始对他们有利了。一旦让他们行动起来，即使起初是小规模的行动，他们也很快会左右局势。他们对国会和鹰派记者有特别大的影响，他们更善于运用鼓动爱国主义和丈夫气概的论点（在作出决策时，他们的立场是强硬的，而反对派的立场是软弱的、动摇的），他们特别自信。这一切使他们成为比那些怀疑论者远远强硬有力的当权派。人们一直以为控制政策的是文官。而实际上，政策、情报、目标、目的、手段等都受到军方愈来愈严密的操纵。正是那些自以为能控制军方的文官（他们私下对军方的观点常常是蔑视的）步步退让，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败下阵来。 179

肯尼迪在12月间作出的派一支庞大的顾问和后勤部队去越南的决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一个新当权派，一个重要的军事当权派，并让它主持设在西贡的庞大的美军司令部。肯尼迪刚上台时，压力还只来自吴

庭艳。后来，为了安抚吴庭艳并把他当作我们政策的工具，肯尼迪派了瑙尔汀去执行这一方针。没有多久，在很多人看来，瑙尔汀更象是吴庭艳的驻美国大使，而不是美国驻南越大使。现在，肯尼迪把保罗·哈金斯中将派去当这个新司令部的首脑，这就等于又派了一个将来同自己作对的当权派。后来，哈金斯把西贡及越南战争的利益置于肯尼迪政府的利益之上。因此，官僚机构内又增加了一个观点同肯尼迪不一致的重要当权派，结果培植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潜在敌对性的官僚集团。

哈金斯一开始就把上呈的情报搞得一塌糊涂。1961年以前，这种情报一直是比较准确明晰的，没有受到官僚野心的蒙蔽，如实地反映了美国对吴庭艳所承担的义务的矛盾。吴庭艳的弊端，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有所反映。后来，瑙尔汀改变了国务院系统的报告的客观性。现在军方也插了进来，而军方的报告信口开河，非常烦琐，错误百出，反映出这位新上任的司令官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形势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错。肯尼迪政府也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来辩论究竟是否打胜了，浪费很多时间来搞清事实，据以作出决定。这是由于肯尼迪政府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自己骗自己的局面。

泰勒和哈金斯的会见在当时似乎只是泰勒越南之行

的一个小插曲。泰勒从越南回来途中在夏威夷停留，拜访了他的老朋友保罗·哈金斯。哈金斯是一个三星中将，当时是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司令。当时在美国陆军里，人们认为中将一级比较弱。一些著名的上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提升的，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又提升了一批。其实，当肯尼迪物色最高军事官员时，加文将军早就劝他从较低级的军官中提拔较年轻的人来担任高级军职。

哈金斯问道，越南的形势有多糟？泰勒回答说，形势不好，很糟，他叫哈金斯要作好肩负重任的准备。几周之后，一如陆军圈子里惯常的作法，由泰勒夫人出面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哈金斯夫人，以聊天的方式漫不经心地暗示 180
哈金斯夫妇不要作长期呆在夏威夷的打算。1月1日，命令下达了。哈金斯奉命出任在西贡新设立的美军司令部司令。这个司令部是与众不同的，是非常规的。然而，在作战方面哈金斯比谁都遵照常规，他对游击战一窍不通。实际上他对基本步兵战术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如果对小兵团步兵战术略知一二的话，至少还能了解游击战，因为可以从步兵的角度看问题）。他是骑兵出身，马球打得很好。过去他在陆军里是一个名流。后来他进了坦克部队，但只是搞参谋工作。他之所以出人头地，用陆军的话来说，是因为他善于搞外交。他当过乔治·巴顿①的参谋，常为巴顿的一些粗鲁话打圆场。据说，他善于搞后勤计划。哈金斯除了是巴顿的部下之外，还是泰勒的

莫逆之交。他们俩在西点军校时期就很要好，而且一直保持联系。泰勒当该校校长时，哈金斯是训育长，后来泰勒当驻朝鲜第八军军长时，哈金斯是他的参谋长，这是很自然的。

陆军内部和官场中另有一些人，力主挑一名懂一点非常规战争的人出任此职，例如，布莱格堡特种战争学校校长威廉·亚巴勒少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雷·皮尔斯上校。但是，泰勒不要非常规的人。他完全用常规的观念来看这场战争。他要他的亲信，最重要的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所以他推荐了哈金斯。哈金斯本人没有什么真正的名气。他在越南工作几年期间所做的最突出的两件大事是：第一，他上呈的报告总是把美国总统引入歧途；第二，他同许多战地军官进行很激烈的斗争，因为他们想提出真实的（也就是悲观的）报告。但即使在这方面，也不一定是哈金斯一人的过错。在那几年中，他一直认为，他是完全遵照泰勒的指示办事的。不少情况说明确是这样的。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反映了泰勒给他的私下指示。总之，这件事再次暴露了那时的怪现象：一方面大谈非常规战，另一方面却挑了一个最墨守常规的人当司令。连肯尼迪也知道这一点。

---

① 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 1885—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派往欧洲作战的第三军军长，是诺曼底登陆的名将。——译者

肯尼迪在棕榈海滩休养时接见了哈金斯之后，有人问他对派到越南去的新司令印象怎么样。他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哎呀，那是他们派给我的啊！”

第 十 章
又一条腿陷入越南泥坑

181 在越南，虽然按照泰勒—罗斯托报告的建议提供了大量美援，但局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几年来，美国的情报一再提醒：越共所进行的战争，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吴庭艳政权本身有毛病，也许已经病入膏肓。在美国给予支持和派遣顾问的协议中，也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吴庭艳同意了改革，但非常勉强。他认为，美国坚持改革简直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敌人是共产党，又不是他和他的家族。美国人卷入越南内政，强迫他让一些不可靠的人进入他的政府，直接间接批评他的家族，美国人这样做究竟是在搞什么名堂呢？

在美国人决定增加义务之后，吴氏政权几乎立即就开始推翻自己答应过的改革诺言。美国人很快便默认了，他们从 1954 年开始同吴庭艳打交道以来一贯是那样的。瑙尔汀大使奉命告诉吴庭艳，美国不会派遣作战部队去越南。据瑙尔汀报告，吴庭艳是不高兴的，但是他“听了我们的建议，态度比我原先预料的要好”。然而，两天以后，瑙尔汀报告说，他通过高级渠道发现，吴庭艳绷着脸，

样子很不痛快。与此同时，吴庭儒控制的报刊发动了恶意的攻击，说美国人在越南的紧要关头不是给予帮助，而是干涉它的内政，说美国人对改革和共产主义的看法是天真的。事情很清楚，正如肯尼思·杨等人所预料的那样：吴庭儒夫妇支配着吴庭艳，要他提防美国人，提防美国人对他的政府的威胁；而吴庭艳当然是听他家族的话的。于是，1961 年 12 月 7 日，也就是说，在美国决定大大增加援助之后不到一个月（这种援助主要是以进行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华盛顿就不得不向使馆发出新的指示，放松了对政治改革的要求。这是一系列决定中的又一个决定，这些决定是要按照吴庭艳的条件进行合作，把这场战争主要作为军事问题来处理，而不再利用美国的影响来实现任何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从吴庭艳政权的本性来看，改革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就意味着清除吴庭儒夫妇，而吴庭艳并不愿意这样做。华盛顿再次后退了。这次后退的关键人物是瑙尔汀。他主张美国不要对吴庭艳施加压力，要信任吴庭艳，听信他的话，而不要强求他采取行动。美国人在改革问题上退让后不久，吴庭儒在一次酒会上把一个美国记者拉到一旁，大大夸奖了瑙尔汀一番。他说："你们的大使是最了解我们的人。"对瑙尔汀来说，要在南越存在下去，就要同西贡政府的最高级人物搞好关系，而不要强迫这个政府对非常严重的农村情况采取措施。华盛顿接受了瑙尔汀的主张。这

182

又一次表明，尽管美国人大谈其游击战和政治改革，他们还是满足于现状，贬低政治问题的重要性。

因此，越南的真正问题依然没有触及。问题是政治性的，解决办法却是军事性的。战略村计划是一项最重要的农村改革，目的在于保护农民并争取农民忠于政府，却交给吴庭儒去执行。不出所料，吴庭儒设法把战略村当作他的封建王国和权力基地。当然，吴庭儒不信任美国人，美国人也不信任吴庭儒。的确，新盟友之间总是不放心，他们之间究竟是否有过真正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是令人怀疑的。（1961年派去帮助西贡政府的美国专家中，有一个是测谎器专家。此人制订了一个周详的计划来为西贡政府解决一个大问题，要把高级官员中谁是越共奸细识别出来。这个计划看来非常之好，可是西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加以阻止，因为中央情报局官员担心西贡当局也可以用测谎器来识别哪些政府官员是秘密领取中央情报局薪金的。）但是重要的还是美援带来的整个后果。到头来，美援不是一个推动西贡政府开明化的药方，而是一个防止它垮台的药方。美国人不是在象罗斯托所期望的
183 那样使越南社会现代化，而是在事实上使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独裁化，更加不能接受意见。美援没有改变农村中的力量对比。如果说美援有什么用的话，那就是越共现在能够缴获更新更好的美国武器，而不是那些陈旧的法国武器了。（当时有一份越共文件非常恰当地说："吴

庭艳将是我们的供应大队长。”）

如果说华盛顿没有认识到美援并未改变这种政治力量的对比，那末，西贡方面，特别是南越军方，是有许多人知道的，河内的人当然更为了解。1962年初，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法尔得到一个难得的签证，到河内访问。他受到范文同总理的接见。他发现，美国给西贡的最新援助不但没有使范文同感到不安，反而使他感到好笑。范文同说：可怜的吴庭艳，他不得人心；因为吴庭艳不得人心，美国人不得不给他援助；而由于美国不得不给他援助，他就更加不得人心；又因为他更加不得人心，美国就不得不给他更多的援助……这时，法尔说，他认为这种情况听起来有点象恶性循环。范文同说：“不是恶性循环，而是螺旋形下降。”

在美国新的大规模卷入下，受到影响的不是越南，而是美国。美国的活动，并不是按照决定卷入的总统肯尼迪的感觉、态度和判断来进行的，而是按照那个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卷入的总统吴庭艳的感觉、态度和判断来进行的。美国的政策是信任吴庭艳，而不是反对吴庭艳。因此，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任务就是同吴庭艳搞好关系。他的报告成了我们的报告。他的统计数字成了我们的统计数字。最后，他的谎话成了我们的谎话。这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吴庭艳对越南战争和越南社会的看法。由于我们已经陷得这样深，我们就想得到同我们承担的

义务相称的成果。但是局势并没有任何改变，就是说，没有得到什么成果，美国政府为了替自己作出的决定辩解，就只好利用新闻报道和操纵新闻发布来窜改事实。最后，这样做也不灵，就不断攻击那些继续作出悲观报道的驻越记者。美国政府在战场上对付敌人时改变不了的东西，却想在对公众宣传中加以改变，其成效也大不了多少。

我们承担的新义务本身，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比我们的盟友优越。瑙尔汀不会比吴庭艳优越，哈金斯也丝毫不比吴庭艳任命为将军的那些政客优越。吴庭艳任命这些政客为将军，仅仅是因为他们忠于他。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哈金斯有某种相似之处。忠于某个人就是哈金斯获得他那个职位的原因。

保罗·多纳尔·哈金斯将军，当时五十七岁，是一个
184 极其庸碌之徒。他只有一个专长，就是会玩陆军那套把戏，会同人搞好关系，不得罪上级。很难想出还有什么人比哈金斯更没有资格来指挥游击战，而这场战争却关系到亚洲腐败政治的命运。要很好了解哈金斯这个人，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他不是一个约瑟夫·史迪威。二十年前，史迪威处于几乎完全同哈金斯一样的地位。他坚强、爽直、坦率，几乎以同人争论为乐。他喜欢同普通士兵来往，而不怕给最高级的文官、甚至美国总统制造困难。1942 年，他被日本人打败后，徒

步走出缅甸。当记者采访时，他说，他和他的部属刚吃了一场败仗，败得一塌糊涂，一定要打回去报仇。(不能想象任何一个当代的美国将军会承认自己败得一塌糊涂。大概会有一营拿两万美元年俸的新闻发布官和负责宣传的官员出来更正他的谈话，要使记者和公众相信，这位将军的谈话给别人断章取义了，他本来的意思是说：这场战争当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敌人虽然最后一定会失败，但这次却指挥得非常高明。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美国部队打得如何出色，证明美国人能够在亚洲的困难条件下打仗。)史迪威喜欢同爱发牢骚的人在一起，在大食堂吃饭，随着大家排队领饭菜而从不抢先。他因为感到士兵们喜欢他这个爱干架的"拗老头"而高兴。他是普通一兵，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是一个典型的司令官，亲临战地指挥，与士兵们一起经受最艰苦的前线生活，以军靴上沾上污泥为荣，而瞧不起后方的参谋官，那些满身香气的花花公子。(哈金斯刚到西贡时，一位名叫霍斯特·法斯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问他什么时候到战地去，因为美联社想得到几张他穿着普通军服和军靴在稻田里的照片。哈金斯告诉他："别想拍那种照片了，我不是那样的将军。")史迪威回到中国以后，首先要求的是让他多了解情况，了解他自己的部队和敌人兵力的情况。他知道，没有关于敌人的真实情况的真实情报，就会使他丧失士兵的生命。因此，他不但仔细地询问自己的军方人员，而且从驻重庆使馆中

挑选了那些年轻的最聪明的政治官员，如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拉登，因为他要找最优秀的人。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都听。消息愈坏，愈要听。如果情况很好，就不需要那么良好的情报系统了，因为可以听任事态自然发展。

如果说史迪威是典型的老式的指挥官，哈金斯正好185 就是另外一种将军——一个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战场负责的幕僚；一个新型的现代人物，遇事抚慰一下，八面玲珑，不惹起风波，但求息事宁人。（美国公众起初没有能够认识到哈金斯的能耐，并不是《时代》杂志的过错。1962年5月，这家杂志为了鼓吹越南战争，吹捧哈金斯是个"高个子，身材匀称，头发灰白，有一双严峻的蓝眼睛，威武的鼻子和强劲的下颚……看来是个地地道道的职业军人"。《时代》杂志甚至拿哈金斯同曾经是其上司的乔治·巴顿将军作比较："两人外表完全不同：巴顿喜欢装腔作势，刺人骂人；哈金斯则沉着、坚定，一贯彬彬有礼。但是一个同僚说：'我确实认为，他和巴顿本质上是一样的。'的确，两个人都有取胜的劲头，这点是一样的。"）

哈金斯同差不多所有来到越南的美国人一样，既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又不懂得他正在打的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就象许多美国人一样，对他来说，战争是在他到达时才开始的，过去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不必认真研究。如果说法国人打了败仗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打得不好；而

且，他们错在打的是殖民战争，打仗是为了赖在那里，而我们打仗则是为了回国。这一点，在我们头脑里是清楚的，对越南人来说也应该是清楚的。

哈金斯偶尔口头上也说这是一场政治战，但是他并不信以为真。美军司令部认为这场战争同其它任何战争一样：把敌人搜索出来，打败他，把他打死，然后回国。美国人衡量这场战争时唯一关心的是数量，而在数量上，美国有这么大的火力，这么多的直升飞机、战斗轰炸机和火炮，当然是很不错的。尸体数字不一定说明问题，但是美军司令部并不懂得。大批越共尸体的数字，被看作是胜利的标志。法国人的统计数字，直到他们1954年退出战争之前，也一直是很好的，这一事实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法国人打了败仗，是因为他们缺乏意志（法国人是以缺乏意志著名的），缺少火力。而美国人则既不缺乏意志，也不缺少火力。

在一次早期的政府部门联席会议上讨论心理战的重要性时，哈金斯的一个主要参谋人员杰拉尔德·凯莱赫准将，很快就说心理战没有什么用。他说，他的任务就是杀越共。一个名叫道格拉斯·派克的政治官员回答说：法国人也曾杀了许多越共，但是他们没有战胜。凯莱赫答道："越共杀得还不够。"这就是美军司令部的态度。尽管大肆吹嘘反暴乱那样的时髦玩意儿，一切还是按常规办事，主导思想仍然是，真正需要的是愈来愈多的武力。

而且，这场战争不是一场严重的战争，这个敌人也不是一个了不得的敌人。法国的将军曾经过度自信，因为根据他们所能理解的标准，敌人根本不在话下。而现在，美国186的将军们也同样过度自信。这个敌人，在攻占一个村庄之后，不在那里驻守，却在黑夜中偷偷地跑掉。对这样的敌人，谁会认真看待呢？

哈金斯刚到西贡领导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就对记者说，他是个乐观的人，他手下也将任用乐观的人。他信守了这个诺言。他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从头就叫作“进展情况报告”，令人毫无疑问地相信情况会变好。他的司令部很快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几乎是虚幻的地方。它脱离实际，直到与实际隔绝。在它看来，敌人是小个子，黄皮肤，不穿传统的军装，从来不据守地方，从来不在白天作战，据说杀害过无辜的小学教师。把这些人看成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敌人，显然把他们估计过高了。西贡美军司令部很快就反映了哈金斯的观点，充满一种空虚而愚蠢的自信。下属不会比长官强，哈金斯是一个愉快的爱社交的军官，并且是个马球运动员。他的才智不是没有边的。（后来，麦克纳马拉在谈到哈金斯时说：“这个人一点也不中用，所以撤换了。我们需要有才智的人。”当然，麦克纳马拉没有说明为什么哈金斯担任那个职位差不多有两年半之久。）他同另外一种将军正好相反。那种将军是毫不因循守旧，敢于打破常规取得成就的优

秀人物。后一种将军要在战争时期才能出人头地，前一种将军要在和平时期才能出人头地，因为战争中有各种无法预见到的情况，要求高度的才能和敢于独排众议的魄力。只有象马克斯韦尔·泰勒那样很不寻常的将军，才能够不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出人头地。

哈金斯那个摊子只考虑华盛顿的命令，而不考虑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他们总是按照华盛顿所希望的那样来上报。比方说，在正常情况下，G—2（情报处）同G—3（作战处）是分开的，可是在哈金斯那里不是这样。在他那里，作战处的人修改情报，总是低估、缩小越共的实力。营级兵力的进攻变成了连级兵力的进攻，连级兵力的进攻变成了排级兵力的进攻。下级关于越共补充兵力的能力的报告，一概置之不理。情报部门关于越共力量日益增长的报告，也一概置之不理。（这一切，如果认真处理的话，是会使哈金斯同吴庭艳发生冲突的，就象史迪威曾经同蒋介石发生冲突那样，会给华盛顿的泰勒将军惹麻烦。）这些都是把戏的一部分。哈金斯很和蔼，很友好；当然，遇有下级人员坚持上报坏消息时，则是例外。一位文职情报官员后来回忆起1962年这样一件事：他曾经试图引起哈金斯注意越共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威胁在日益增长。

哈金斯说："废话！我就要在雨季里粉碎他们。"雨季其实是有利于游击队的，因为他们在雨季可以得到比 187

旱季更好的运河运输条件，并且有多得多的隐蔽地点。

这个情报官员坚持说那里的局势将无法挽回时，哈金斯一下就把他岔开了。他说他自己的情报处并没有这样说过；恰恰相反，温特博特姆上校很乐观。

这个文职人员打断他的话说："哈金斯将军，你的情报处长根本不懂得这个威胁。他是个空军军官。他的专长是战略空军侦察。我相信，他选择核轰炸目标的本领是很好的。但是，他不了解这个战争，他根本不会帮助你了解这个战争。"

这个文职人员发现，哈金斯这时不再是那样和霭和友好了，也不再耐心倾听了。哈金斯斩钉截铁地对这个来访的人说，他的情报处长是个军官，是个很好的军官，是个专业人员，是他们在华盛顿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一个；而他哈金斯根本不需要任何一个文职人员来告诉他怎样打仗。事情就是这样。部下和统计数字使哈金斯高兴，哈金斯也使部下高兴。凡是拍哈金斯马屁和给了他想要的东西的人，都很快得到提拔。

1962年7月，哈金斯告诉麦克纳马拉部长说，他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唔，他承认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新闻界这个问题。1962年，战场上出现的问题和警报愈来愈多，哈金斯却一直置之不理。人们会很快想起一件事情。有一次哈金斯去战地视察，来到湄公河三角洲心脏地区的薄寮。情况汇报得很好。南越军官在学习

如何同越共作战方面也许是慢的，但是他们掌握讨好美国人的艺术却快得很，掌握汇报的艺术更不消说了。他们真是顶呱呱的汇报家，而这次总结又作得特别好，简直同美国布莱格堡那里作的一模一样，炉火纯青，而这位指挥官的布莱格堡口音使这一点更加突出。真叫人想到，我们输出了作汇报的艺术。

这个南越指挥官说，他们原先只计划建立多少战略村，但是居民都拚命要求参加这个全国性的革命，坚持要求进来。所以，他们已经建立了三倍于原计划的战略村。哈金斯十分高兴——更恰当的说法是，得意洋洋。他眉开眼笑。（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建立战略村愈多，省长和师长们贪污的钱就愈多。）他象满面红光的家长那样，祝贺这个指挥官汇报作得这样出色。他对旁边一个下属说：走出那个充满阴谋和流言蜚语的西贡，到农村里来，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这里是真正进行战争的地方，人们了解敌人和威胁，问题就不那么多。一切都更为健全。下属点头称是。这才是真正的越南。

几分钟后，这个师的顾问弗雷德·莱德中校求见哈金斯片刻。莱德是在越南的一个典型的最优秀的美国军官，这种军官都是精选出来送到我们现在唯一的这场战争中去进行锻炼的。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的父亲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是一个有才能、文雅而有头脑的军官，是一个大家都想认识、即将提升为将军的出色的军 188

官。莱德把哈金斯请到一旁，带点歉意地说，他并不要使将军扫兴，但是那些关于战略村的数字是大大夸张了的，真正的总数大约只有那个南越指挥官所说的三分之一。那时，不但没有博得哈金斯一个赏识的眼光，来一个“我们大家都懂得这套把戏”的会心微笑，相反，这个驻越美军司令恶狠狠地申斥了莱德一顿，因为他竟敢对一个南越军官的话提出疑问。越南人的数字当然是准确的！莱德瞅了他一阵，只说了一句：“我原先以为我们是作为美国人对美国人交谈的。”

哈金斯走了。但是那天莱德看得很清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要发生冲突，在这次对话中包含着的命令是很清楚的：不要制造风波。他知道自己将要遇到很多麻烦，也许会丢掉他成为莱德将军的机会。他想对了，果然发生了冲突，他没有成为莱德将军。

1961年10月下旬，肯尼迪想在越南问题上顶住压力，却批准了美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承担军事义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之后不过一个月，他又采取了一个会对这次承担的军事义务有深远影响的步骤。作为国务院重大改组的一部分，他提名艾夫里尔·哈里曼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们把这次改组称为“感恩节大屠杀”(其中一件事是解除了切斯特·鲍尔斯的副国务卿职务)。肯尼迪把哈里曼放到这个职位上，实际上引起了后

来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使哈里曼走上了同肯尼迪刚批准的军事义务相冲突的道路。西贡那边，瑙尔汀和哈金斯一心一意执行过去的政策。华盛顿这边，哈里曼却奉命更新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和人员。结果发生了无法避免的冲突，政府内部为越南战争问题进行了最猛烈的斗争，几乎搞到两败俱伤。

当哈里曼接管远东司时，这个司是国务院里最保守的部门。它在麦卡锡时代受到的伤害，比别的任何一个司都要大，因此，它还牢牢抓着杜勒斯时期的政策不放。仅仅几个月之前，有一次，切斯特·鲍尔斯手下一个年青助手詹姆斯·汤姆森奉命拿鲍尔斯打算发表的一篇关于亚洲问题的重要讲话稿去核对一下。他去找有关方面负责人——主管远东问题宣传的官员。这个官员看了讲话稿 189
以后指着一段说，这段一定要删掉。这一段谈到 1849 至 1949 年中国在外国人手里吃了很大的苦头，而鲍尔斯想为美国在中国人认为的这段痛苦与屈辱时期中所起的作用表示遗憾。

汤姆森本人是个中国问题专家，后来在哈佛大学担任亚洲历史教授。他问为什么这段话一定要删掉。

“因为这是共产党的说法，”这个官员说。

“这也是蒋介石的说法啊，”汤姆森说。于是，他开始为使讲话稿得到通过而进行别扭的谈判。要是鲍尔斯把中国首都称作北平的话，就可以保留触犯这个官员的那

段话。把中国首都称为北平而不叫北京，是中国国民党人的做法。北京，是中国政府的用语，从而也是国务院在正常情况下的用语。最后，讲话稿总算通过了。

这件事并没有使鲍尔斯和汤姆森感到意外，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些本来应该在远东司工作的人，如约翰·戴维斯、约翰·谢伟思和埃德蒙·克拉布，统统都在麦卡锡的审查下给赶走了。继任的都是些愿意按照杜勒斯规定的条件，即最僵硬的反共条件，来处理亚洲事务的人。他们的观点和言辞都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杜勒斯要讨好国会里那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他的确做到了；但是代价是损失了主管中国和亚洲那个部门的正直品格。在远东司，人们对中立主义皱眉头，因为中立主义分子有可能上台，他们会更多地同情共产党，而不是同情西方。在远东司里，忠顺比才智还重要。

哈里曼接管时，到办公室去同人们谈话，阅读电报，对看到的情况感到十分震惊。他说："一片荒凉。"他私下对朋友说："这是个死伤遍野的灾区。也许有少数几个人还能挽救。有些人已经被打得这样惨，没法挽救了。有些你想挽救的人，简直已经完蛋了。他们努力写报告，但是毫无结果。真可怕啊！"

鲍尔斯当副国务卿时，就已经开始试图改组远东司。但是腊斯克把自己的老朋友沃尔特·麦康瑙吉放到远东

司去阻止改革，对鲍尔斯的人来说，麦康瑙吉太死守杜勒斯的传统了。在任命大使问题上，鲍尔斯在非洲地区比在亚洲地区较为顺利（因为亚洲被认为更加重要，牵涉的利益比较多，不能冒那么多风险）。但是，在亚洲方面，他同长期主管驻外人员工作的那些人进行的斗争，也取得了一次显著的胜利。他要让杰出的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当驻日大使。国外人事处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却推荐即将卸任的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帕森斯，并且事实上伙同日本外务省右翼，声称如果让赖肖尔驻日，会使日本方面为难，因为赖肖尔的妻子是日本人。在任用赖肖尔问题上，更惊人的情况是连联邦调查局的旧材料也拿了出来，说赖肖尔是个危险分子，因为他同另一个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有联系，而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参议员麦卡伦曾称费正清为斯大林阵营的“自觉特务”。这时鲍尔斯发火了。他对保安人员说，“你如果想找个同费正清关系密切的人，他妈的，为什么不去白宫看看？他有个连襟在那里工作哩！”（当时费正清和施莱辛格是连襟。）赖肖尔终于得到了驻日大使的职位，但是得来不易。 190

因此，在肯尼迪当政的头一年里，远东司基本上依然如故。现在，哈里曼要马上动手改变它。他是国务院里肯尼迪集团中最年长的成员，但是很快就成了国务院内大多数青年人所拥戴的人物。他们向他寻求领导和新思想，寻求国务院里长期以来迫切需要的那个东西——老

老实实地发表新的想法。他毕生专长的是接近青年人。现在，他又开始这样做了。一个例子是已故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儿子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他在父亲自杀以后，实际上由哈里曼夫妇收养。他是肯尼迪应哈里曼的请求从华尔街弄来的，在白宫班子里搞越南问题。总统给他这样的指示："你是我派驻那个叫作艾夫里尔·哈里曼王国的特使。"还有情报和研究司司长罗杰·希尔斯曼，他是鲍尔斯的人。他对不发达国家的看法，似乎处于鲍尔斯和罗斯托之间。他主张在反暴乱方面采取攻势，自以为他在缅甸的经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但是他反对在亚洲进行轰炸和派作战部队，并且主张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比较新的观点。哈里曼委派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和詹姆斯·汤姆森去物色以前在远东司工作过而仍然有些能力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恢复工作——也要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回来再搞亚洲问题。爱德华·赖斯从政策计划委员会调来，他是一位中国通，他似乎背离了人们接受的那套蒋介石的方针。（在此之前，赖斯就已经引起鲍尔斯的注意，因为他从政策计划委员会给鲍尔斯写了一个报告，对中国问题有出人意外的灵活看法。鲍尔斯喜欢这种新颖观点，派了他的中国问题专家去见赖斯。詹姆斯·汤姆森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一个具有赖斯这样经历的人，曾经在四十年代最困难、最敏感的时期里在中国工作过，竟然能够在五十年代共和党搞大清洗的时

候幸存下来。答案是简单的。赖斯解释说，在中国问题成为敏感的问题之前很久，由于一个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帕特里克·赫尔利曾经在他的档案里放进过一份表扬信；赫尔利是许多政治迫害活动的头子，这就把想迫害赖斯的人吓跑了。）最优秀的印度支那问题专家之一保罗·卡吞堡，调回到越南问题工作小组。他在那里马上就起作用。另一个放逐了的中国通罗伯特·巴尼特，调到哈里曼的办公室去。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廷，从兰德公司到了情报和研究司。他是特别有名气的，因为他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在朝鲜参战的报告，很有见地。但是惠廷告诉罗杰·希尔斯曼，他不想参与越南问题，原因是，他认为如果政策（用霍默·比加特①的话来说）是“与吴庭艳共存亡”的话，我们就要完蛋了。 191

哈里曼要的人，首先是要讲话直率，不是机械地搬用过去留下的那套神话。他使用手下的人毫不留情。他在家里也工作。（当他听说惠廷那本关于中国跨过鸭绿江的书是本好书时，他没有找一个青年助手给他讲一讲书的内容，而是亲自读，然后把惠廷叫来，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日来研究它。）他专心致志，雄心勃勃，很少体贴别人，有时甚至凶狠，好斗成性。（在一次棘手的越南问题会议

① 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 1907—），美国新闻记者，历任《纽约先驱论坛报》战地记者、《纽约时报》驻国外记者等。——译者

上，他骂参谋长联席会议特派代表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是“该死的傻瓜蛋”，因为这位少将滔滔不绝地重复泰勒—哈金斯那种十分乐观的论调。）他这个爱动好斗的人，从不认输，成了政府机关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哈里曼当时七十岁。那年，一个友人告诉玛丽·哈里曼说：“艾夫里尔看起来真了不起啊！”她答道：“要是你四十岁以前除了打马球以外别的什么也不干，那末，你看起来也会是了不起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参与了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同过去的大人物有过这么多的联系，新当权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他会能够按他们的水平和速度来办事。过了不久，他们就发现，要按照哈里曼的水平、速度和强度来办事，感到吃力的还是他们自己。六年以后，罗伯特·肯尼迪认输了（他一度怀疑过哈里曼的精力）。他在希科里山家里为哈里曼举行一次出人意料的生日宴会。宴会的特点出现在最后一刻——拉开帷幕，露出灯光明亮的走廊，里面陈列着哈里曼过去曾经打过交道的人物的巨幅照片：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这个历史的讽刺：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约瑟夫认为长得最象他的那个儿子）在为哈里曼举行宴会。哈里曼是大战初期罗斯福派去英国的那个人，他去英国主要是为了抵消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悲观印象和悲观估计。哈里曼特使一再在公开场合站在邱吉尔身旁，作为美国承担义务和在场的具体明证。在北非那些

阴暗的日子里，他曾经把温斯顿·邱吉尔的信亲自带给魏菲尔将军①。信中说，哈里曼得到温斯顿的完全信任，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②最亲信的人，“没有别人比他更能帮助你的了……”

哈里曼并不是生来就有那些自由派的偏见的。要谈出身的话，他生在铁路大王的富贵人家。他是爱德华·亨利·哈里曼的儿子。爱德华·哈里曼就是兴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那个人（这家铁路公司并不以热心公益著名），是个残酷无情的一代大亨。他生于1848年，这似乎把哈里曼同另一个时代联系起来了。艾夫里尔·哈里曼是第二代，同那个残酷无情的第一代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知道这个名声，在公开场合摆出拘谨的、规规矩矩的姿态。由于没法在公开谈论中否认过去的事，他对他父亲的问题仍然很敏感。他不象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样不必因为自己的祖父而敏感，因为第三代洛克菲勒的形象，已经有意地而且成功地被描绘成为吃奶油干酪 192

① 魏菲尔(Archibald P. Wavell,1883—1950)，英国将军，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中东、印度英军司令，1942年一度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同时升任陆军元帅。1943—1947年任英国驻印度总督。——译者

② 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1890—1946)，罗斯福总统的智囊人物，二次大战期间曾多次作为罗斯福的特使出访英国和苏联。——译者

饼的与群众在一起的好人，而不再是掠夺钱财的第一代那种形象了。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哈里曼的父亲是个“坏财主”，这件事过了许多年，现代美国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哈里曼仍然耿耿于怀。老罗斯福的指责肯定有助于他转入民主党。

哈里曼是在格罗顿上的中学，然后进了耶鲁大学。他的父亲认为，对于一个高贵的青年人，特别是对一个身材高大的高贵青年，划船是最合适的体育活动。因此，他父亲每年夏季把锡拉丘兹的划船队教练请来，在奥兰治县巨大的哈里曼庄园里一个专用的湖上教艾夫里尔划船。结果是，艾夫里尔到格罗顿时，很容易就参加了划船队。他升入耶鲁后，本来也是要参加划船队的，但是因为发现了心脏有点杂音，只好改为划单人或双人小艇了。这对精力非凡的哈里曼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划船运动在耶鲁大学正在大大衰落。于是，他自愿出来当教练，先是教一年级生，最后是教校代表队。（他对友人说过：“华盛顿多数人认为，迪安·艾奇逊是杜鲁门手下的国务卿，是另一个时代的伟人。我则仍然把他看作是我在耶鲁大学教过的一年级划船队中的一个队员。”）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学划船——英国。因此，哈里曼自费到英国去，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学习牛津的划船方法。他回耶鲁后，耶鲁的划船队取得显著进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哈里曼的典型作风是：不管什么事情，只

要你对它感兴趣，就要追根寻源，排除一切障碍，尽可能学深学透。在相当晚的时候，他决定要学地球。于是，他在家里建造了两条滚道进行练习，一直练到相当精通为止。同样，他想学槌球时，阅读了有关槌球的每一本书，研究打法。到他打槌球的时候，他花二十分钟才打一下，把对手都气坏了。

他的童年是在最好的学校里度过的。他乘坐一节专用卧车车厢周游全国，上大学四年级时他就被选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他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尽管大战开始时他已经二十二岁，而当时与他同年 193
的人大多数都参战了。他没有去，当时的确引起相当多的闲话。那时候，他看来很快就要成为一位有权势的企业家了。（1920 年，他二十九岁时，对访问他的《福布斯》杂志记者说："一个拥有资金的人，如果不努力按照对国家最有利的方式来使用他的资金，是说不过去的，那就象一个劳动者拒绝工作和一个革命者在这个国家里使用炸弹一样。游资和使用不当的资金对经济的破坏性，就象游手好闲的人和扔炸弹的人一样。"）他把哈里曼帝国扩张到航运业去，立刻就成了美国航运业中首屈一指的经营者。他做生意喜欢冒险。1924 年，苏联在寻求外国资金时，愿意出让格鲁吉亚的锰矿开采权二十年。这一类安排，当时几乎所有资本家都感到震惊，因为，如果说苏联在五十年代看来象个敌人的话，三十年前就更是如

此了。那个时候，彼此之间的成见更加明显，资本家几乎都神经过敏地害怕共产党俄国。人们认为，哈里曼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即为取得锰矿开采权拿出约三百五十万美元——是不忠行为和过分冒险。但是，这件事却很可以使人看到，哈里曼这个人是无法预测的，尽管他看起来象一个拘谨的、传统式的企业家。这项交易没有做成。苏联人以更好的价钱同一个德国集团达成了协议。哈里曼干的笨事成为人们取笑的资料。他亲自到苏联去，为较好的条件进行谈判。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还是使俄国人宣布归还他原来的投资，并且附以一定数额的利息。他们最后照这样办了。这次经验使苏联官员和哈里曼都产生了不受当时某些成见限制的看法——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可以谈判的，可以打交道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哈里曼在1928年进入政界和民主党，很难说准，但是可以说，有好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其中之一是他的与众不同的姐姐玛丽·哈里曼的压力。她是弗朗西斯·珀金斯①的密友，比她弟弟远为关心社会。她进入了一个与她的出身很不相同的世界，感到有责任利用她的特权来做些好事。另一个因素是他同纽约州长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的亲密关系。史密斯促使

① 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1880—1965)，美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1933—1945年任罗斯福政府劳工部长，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女部长。——译者

哈里曼参加了民主党。他们之间保有热诚的私人关系。有些人认为，哈里曼对约翰·肯尼迪的特殊感情（肯尼迪被刺后，哈里曼看来好象老了二十岁），是他在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年轻总统的身上报答以前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候选人史密斯为他所做的事情和为他打开的天地。这个天地中，有很大一部分尚待攻取。在工商业界里，爱德华·哈里曼的儿子只能是爱德华·哈里曼的儿子。哈里曼帝国已经建成，高山已经越过（事实上，在哈里曼的庄园里真的一座山已经差不多削平了，为的是给他家盖房子找一块完美的平地），挑战大体上已经过去。金钱使他厌烦，他对金钱不感兴趣。金钱能给他办到的事情他都接受了，但是他不想再赚更多的钱，也不想花这些钱。他对别人指责他为“坏财主”这一点很敏感，他认为没有理由把自己的一生用来积聚更多的财富。但是，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方面，他却看到了挑战。这方面，有足够多的问题来使他那好动的性格得到满足，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当前的事业和任务。后来，乔治·凯南的《回忆录》里讲到哈里曼的专心致志，说他这个人没有一点虚伪和势利眼。（只有非常有钱、非常高贵的人才能够做到那样毫不虚伪和毫无势利眼。另一个友人说，哈里曼也有某种势利眼——对权力的势利眼，他只对掌权的人有兴趣。）

194

他的专心，他对每一个细节的注意，是有口皆碑的。他什么事都不叫别人代劳。他要年轻的助手努力工作，

但是他们在干什么他都知道，总是掌握着一切，甚至在助手们以为他心在别处的时候也是如此。得到过这个教训的人当中，有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954年，莫伊尼汉接受了哈里曼竞选活动中的一个职务。莫伊尼汉原先以为这个职务是他了解政治阴谋内幕、进行研究、发现问题的绝好机会，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工作只不过是用扩音器给哈里曼一行当播音员。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他们大清早就在长岛开始，莫伊尼汉照常干他的播音工作："来吧来吧，十分钟以后到格鲁曼工厂来见见艾夫里尔·哈里曼吧。下一任纽约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十分钟后就要到这里来了。来见见艾夫里尔·哈里曼吧……"他一站一站地这样广播，已经干了一整天，就象他三个月来所干的那样。现在，这一天临近结束，哈里曼将最后一次露面，正是这个服装业地区里熙往攘来的下班时候，莫伊尼汉控制不住自己了，所有抑制着的精力，所有原先打算在演说中使用的警句，统统倾泻了出来——攻击共和党打算实行的税法不公道，共和党对工人麻木不仁，共和党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基本福利保护措施，如此等等，以及别的罪过。他还在攻击共和党，忽然觉得那个与他一同坐在汽车上的警察轻轻地拍他的肩膀。警察说："嘿，老兄，哈里曼先生说：'只播音，不干别的，不要发表政策演说。'"

如果说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哈里曼对赚钱不是那

么很关心的话，那末，他对花钱至少是小心翼翼的。关于哈里曼吝啬的说法，流传很广。部分原因是，他从童年起就很害怕人们为了钱才讨好他，对这些人他决不鼓励。作为一个政客，哈里曼这样做，有时损害了自己。洛克菲勒为了自己的利益花钱是大手大脚的，他偶尔也为自己的党大手大脚地花钱，为的是搞好他和党的关系。哈里曼则节俭得多，无论为自己还是为党都很吝啬，为党花钱尤其如此。过去赫伯特·莱曼①竞选时，哈里曼作为一个知名的民主党人，当然捐献过款项。所以，1954年哈里曼决定自己竞选时，他手下的人就去见莱曼。他们立即讲明找莱曼不是随随便便要一点捐款，而是要一笔与莱曼家财相称的大捐款。莱曼倾听了一会儿，问他们到底心里想要多少。他们提出的数字是以千计算的，好几千块。莱曼记性很好，他问他们，要是他给两倍于过去哈里曼给他的捐款，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热情地回答：好。于是，莱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查看了档案，然后回来，把一张二百美元的支票交给他们。 195

哈里曼是罗斯福—杜鲁门时期民主党外交方面的完美人物。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得到本阶级的拥

① 赫伯特·莱曼（Herbert H. Lehman, 1878—1963），美国大资本家，曾任纽约州州长、参议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译者

护，而在国内问题上他是个有党派观念的人。他是民主党内最正统的资本家。外国政府（包括苏联政府在内）知道，他不是只代表一届政府说话，而是代表整个权力结构说话。（赫鲁晓夫1959年到美国来时，曾经要哈里曼给他讲讲美国真正的而不是纸面上的权力结构的整个情况。哈里曼正是这样做了，从而向赫鲁晓夫证实了，正确的不是那些自认为在美国掌权的人的看法，而是赫鲁晓夫对谁在美国真正掌权的看法。很可能是这样。）

哈里曼作为纽约州州长，是一个特别差劲的政客。他僵硬，骄傲，不听公众意见，私人生活的名声也很不好。他之所以在国内政治上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为自己而工作，拚命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尽管他在华盛顿时野心也是大的，但是因为这时脑子里有了国家观念，所以他那些明智、耐心、全局观念的优点就能够发挥出来。然而，他不但是个拙劣的州长，1958年同洛克菲勒竞选输得很惨，而且正如他的崇拜者白修德在《1960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所指出的，他几乎把纽约的民主党毁了。白修德先是着重说明，在过去二十年中，没有任何美国人象哈里曼那样为了使美国在全世界行使权力而出了那么多力。然后，白修德写道：

然而，在面对美国国内的权力体系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缺乏理解力了。他在1958年领导纽约民主党时的所作所为，不但
196 毁坏了该党领导和群众的信心和荣誉，而且可能使该党在今后

若干年内无法统治纽约。

这是1960年写的。1972年，洛克菲勒仍然是州长。纽约的两个参议员，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保守派。在最近两次纽约市长的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都被击败。

肯尼迪当政时期，哈里曼是从最低一级干起的。他没有及早看出肯尼迪拥有当选的力量。他对这个候选人有成见，这并不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而是因为对肯尼迪的家世不满。他出于多种原因不喜欢老约瑟夫·肯尼迪。从初期的情况看，他在肯尼迪政府中的前途是不妙的。在总统就职之前，他被派去非洲作了一次了解情况的旅行。非洲远不是重点地区。而当他到乔治敦肯尼迪家里向肯尼迪汇报时，总共只给了他五分钟的时间同当选总统谈话。然后，就要他急急忙忙去同一个名叫托马斯·法默的助手一起吃午饭，而法默是派来听取关于非洲和哈里曼的全部情况的。哈里曼得到一个巡回大使的职务，肯尼迪政府原以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了。但是，他在处理老挝问题上取得了总统的信任，升迁很快。后来，他告诉友人说，那是他历来接受过的总统指示中最简单的一次——接了一次五分钟的电话，总统在电话里说："军事解决不可能了。我要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哈里曼是肯尼迪一直在寻求的那种人。他既是权势集团的人，又是一个可以改为忠于肯尼迪的民主党人。他有办事能力，

又不是政敌攻击的好靶子。他不软弱。他一进政府就完全能够工作，不象肯尼迪政府中许多人初次当官那样。他对肯尼迪政府的问题判断很准，感觉到他们需要他，他可以起作用。现在，这正在成为事实。腊斯克有弱点，需要一个新的国务卿。国务院里只有乔治·鲍尔是这个职位的潜在争夺者（邦迪是共和党人，而且在白宫里太宝贵了。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干得不错，他没有当国务卿的智慧和政治头脑）。这样，哈里曼开始填补腊斯克在国务院里所制造的真空。

1962年末和1963年，哈里曼在国务院里俨然以公开向腊斯克的领导地位挑战的人物出现，显然是个国务卿的候选人。哈里曼这个人感情很少外露，但是有一次他也曾怅惘地表示过，国务卿是他唯一想得到的职位。想当总统，那是不现实的；想当国务卿，那的确是他的野心。虽然他从头就不是特别热烈支持腊斯克，他开始时
197 却把同腊斯克的关系处理得无懈可击。然而腊斯克的风格很快就使他生气，哈里曼周围的人都觉察出来他对这位国务卿有点瞧不起。（这在国务院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上显露出来。出席会议的有腊斯克、鲍尔、哈里曼，以及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对这个班子讲话。他说，哈罗德·威尔逊到华盛顿来了，看来他会在选举中得胜，当上首相，所以他们最好对他做点工作。有谁知道他住在哪儿吗？没有人知道。于是，腊斯克派鲍尔去打电话向英国

大使馆了解一下。鲍尔出去了，几分钟以后回来，脸色都变了，向腊斯克耳语说："他在哈里曼家作客哩。"哈里曼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日内瓦会议时，有一件事使哈里曼特别生气。他要腊斯克让他去见见中国在日内瓦的代表，腊斯克不同意，这可把他惹火了。

他开始愈来愈多地不请示腊斯克，并且鼓励别人，例如希尔斯曼，也这样做。他认为，他曾经顺从过腊斯克，但是如果这位国务卿不进行斗争的话，就没有必要再顺从了。他越来越明显地不尊重腊斯克。最后，他对朋友们说：你怎么能同一个象腊斯克那样整天只是保护自己的私处的人打交道？这时候，通常彬彬有礼举止得体的哈里曼，弯着身子模仿自己描写的那个样子。

哈里曼进入的这个机构，对时局的看法总是落后于形势大约十年。他感到，在政治上对国内外的变化比较敏感的这届政府，应该快些作出反应。如果这样，那末这个机构和它所作的报告都没有很好地为总统服务，应该受到比较年轻、没有沾染上官僚习气的人的挑战。这样，总统才能有选择的机会。否则，那些高级官员就会聚在一起，决定什么算是明智的和稳妥的，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写汇报。而事情恰恰就是这样。哈里曼对越南问题的想法，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他不象鲍尔斯那样，他没有带着一个宏伟的计划到外交工作中来。他这个

人完全超脱了本阶级的政治观点与偏见。更重要而特别了不起的是，他能够抛弃过去政治经历中的偏见，忘掉过去同苏联关系紧张的年代。哈里曼在马歇尔计划时期参与的对抗行动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对他来说，越南决不会是德国，老挝决不会是意大利，东南亚条约组织决不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时期里，许多重要人物似乎过分意识到自己在马歇尔计划中起了直接作用，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就是唯一的经验，既然在欧洲制止了共产党，就想再次运用遏制的经验。哈里曼则显然不同，而他同那
198 个时期的关系却比任何别人都密切。战争末期，哈里曼作为驻苏大使，与凯南一起，最先对未来的困难岁月发出了警报。他在影响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方面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福雷斯特尔后来把华盛顿的机器加速开动起来，使美国成为冷战的一方。在福雷斯特尔的《日记》中，1945 年 4 月 25 日那天写道：

> 我昨晚见到美国驻俄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说，除非我国对俄国的整个态度大大强硬起来，否则他对我国对俄关系的前途很担心。他说：俄国人把对德国的恐惧作为借口，继续推行他们的计划，在边界周围建立意识形态与俄国人相同的国家。他还说，共产主义向外推进还没有结束，我们很可能不得不对一种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一样有力和危险的意识形态作战。

如果说哈里曼曾经预报过苏联对欧洲的推进，那末可以说，他后来先后担任经济合作总署署长和共同安全

署署长时，对马歇尔计划也是十分关心的。然而，他看问题总是不脱离问题本身的范围。他很快就感觉出来，亚洲共产党人的动机，可能与欧洲共产党人的动机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人。这样，在越南对抗问题上他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办理政府事务的专门知识和顽强的精神。他本来对亚洲问题没有多少专门知识，但是非常善于学习和接受新思想。

哈里曼接管远东司后不到几星期，他手下的人就开始对西贡来的报告和乐观看法提出疑问。但是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有必要看一看这种挑战的局限性。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几个月里，哈里曼及其助手们攻击军方的报告和瑙尔汀的电报不准确，怀疑吴庭艳是否能维持下去，但是并没有对多米诺骨牌理论提出挑战，而这一理论正是美国在南越承担义务的基础。他们也没有向美国在全世界所起的作用提出疑问。实际上，他们提出的都是些小问题，而不是大问题。没有任何人想让那样大的问题在现在提出来，更不要说总统了。因此，这种挑战只限于当时的一些实际问题，并不涉及到我们是否应该在越南，而只涉及到我们是否正在打赢，只涉及到吴庭艳（而不是南越）是否能够生存下去。从广义上讲，哈里曼仍然是非常反共的。他是反叛乱小组的一个热心成员（好几年以后，当他的一个朋友轻微地嘲笑反叛乱时期的狂热和愚蠢时，他非常生气。他回答说：不，我们在整个拉丁美洲做了

各种各样的好事……)。实际上,他是对不合理的事情的表面现象挑战,而不是对不合理的事情的根源挑战。他的任务是使杜勒斯的亚洲政策现代化。但是,他和他的助
199 手做这个工作的条件,却比几个月以前更加不利,因为肯尼迪政府刚刚接过杜勒斯对越南的政策,并且加以升级。承担的义务更加大了,更加广泛了。美国又一条腿陷入了越南的泥坑。

第十一章
哈金斯报喜不报忧

肯尼迪政府派了大批军事顾问和后勤部队去南越，200
总数将达一万八千人左右，从而改变了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但并没有改变越南战争以及引起战争的那些问题。这个步骤并没有提高作战的效果，但这样做却给华盛顿带来了影响。这使政府更深地陷入越南，使越南显得是一个更重要的国家，使越南问题更为突出，而不再被看作是次要的危机。这个步骤还造成政府依靠军方的报告和估计，因为军方将控制形势的通报。问题已不在于吴庭艳的人望或施政效能。（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吴庭艳是不得人心的，但他是受尊重的。）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战争，在于战争是否正在走向胜利。答案是肯定的，战争正在走向胜利，战争进展顺利，一切迹象都很好。哈金斯将军是乐观的，他成了现在力主乐观看法的强大机构势力的首脑。他的上级马克斯韦尔·泰勒告诉他，要保持乐观，要尽量打掉悲观情绪。他对此完全照办。他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应该对美国总统负责任，更重要的是应该对泰勒和美国陆军负责任。他并不怀疑他正在做的

事情。约瑟夫·史迪威的耳朵倾听的是战场上的动静，而保罗·哈金斯的耳朵倾听的是华盛顿和五角大楼的声音。他向上级保证，一切都严格按照日程表进行，每个人都在按照计划行事。战争正在顺利地进行。他预见到胜利在一年之内就要到来。

但是，唯一不作美的事情是，战争并不是正在走向胜
201 利。事实上，战争甚至并不在进行着。越南共和国军是过去军队的翻版，它甚至比过去更加狂妄自大。在战场上，它正在重复过去的种种错误。军队仍以村庄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士兵偷鸡盗鸭，这种情况不断地激起人民的愤怒。这支军队仍旧拒绝在听说有越共集结的地方作战。他们仍旧在发动战斗以前仔细地选定时间进行出击前的炮击，这样，越共事先得到了警告，就能够按照预先计划好的路线走掉。吴庭艳担心他的军队遭到损失会使他丢脸，他告诉司令官们要避免冒兵力伤亡的危险。所以，他们尽可能地少参加战斗。为了搪塞责任，他们不惜伪造作战报告和编造假统计材料，而哈金斯居然把这些货色批准后立即转呈华盛顿。

1962年初，直升飞机的到达使越共措手不及，政府军取得一两次快速的胜利。但为时不久，美国的这剂强心针就不灵了。越共很快地懂得，遇到直升飞机时，与其逃跑而遭到杀伤，倒不如原地迎击。这样一来，美国提供的新的机动性便失去了作用。为时不久，美国大举增兵

的唯一显著的结果，是使越共缴获到更好的武器。政府的乐观情绪全都建立在假报告的基础上面。这种事情本身并不使人奇怪，令人奇怪的是，这类谎言不仅盖上了南越政府的印章，而且也盖上了美国政府的印章。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即哈金斯的司令部，对越南共和国军的战报不经核实即加以接受。美国军方和宣传机器也不加批判地把一个行将死亡的政府的这些谎言播发了。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的。在那里，美国军官对他们每天遇到的欺骗开始作出反应。坐在西贡的冷气房间里传送假报告是一回事，派遣年轻的美国顾问去参加战斗却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明知这是为一个实际上的骗局而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场无可避免的严重的大规模斗争发生了。

1962 年底和 1963 年初，当作战佈局开始崩溃的时候，驻西贡的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代表它在华盛顿的上级，开始对战场上自己的一些最优秀的军官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次重大的组织机构上的危机，但是在华盛顿的文职人员竟毫不知情。事实并不象是有两种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军情报告同时上呈华盛顿，使白宫能进行研究并对分歧作出裁决。驻西贡的军事援助司令部一贯压制来自战地的一切不同意见，军方的通报渠道不容忍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要是一个上校军官的姓名被作为一个悲观论者在报纸上出现，他的前途就算完蛋了。

1963年，当几个持不同意见、受到挫折的上校军官向报界发表谈话后，纽约各报馆的编辑电告其驻西贡的记者说，那些悲观的报道写得不错，但是否能提供几个郁郁不乐的上校的姓名呢？要是有些在中国问题上得到经验教训的华盛顿高级官员在遭到政治迫害后如今还幸存下来的话，他们马上就会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越南被一支现代游击队所抗击的封建军队正在崩溃，而一位高级外国将军正在企图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美国政府官员要么不了解当年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要么只有少数人了解，但他们极力想避免再次遭到政治迫害。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能够说穿的，只是没有人急于说穿罢了。

202

然而，哈金斯同他派驻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上校级和中校级高级顾问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存在的。这些军官在驻西贡军事援助司令部和战场之间担负着艰巨的联系工作。一方面是，军事援助司令部的头头们对战争抱有幻想，他们只想对其五角大楼的上司尽责任。另一方面是，在战场上的上尉、中尉下级军官发现他们的盟军不愿作战，而敌人正在取得胜利。有四个重要军官，冒着对自己前程的相当大的风险，开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不满。这四名顾问是第三军管区（西贡周围主要地区及其以西和以北地区）的威尔伯·威尔逊上校，第四军管区（湄公河三角洲其余地区）的丹尼尔·波特上校，第七师管区（三角洲北沿地带）的约翰·保罗·范中校和

第二十一师管区（三角洲南沿地带）的弗雷德·莱德中校。他们都是经历过其他战争的老战士，经特别挑选派遣到这些地方去的。他们既不是鹰派，也不是鸽派（当时还没有这些叫法）。但他们都想取得战争的胜利。直到那时，他们还是认为有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他们至少对越共所代表的一些政治力量有所了解。最后一点是，他们生活在战争的现场，而且他们认为把青年人派去送死，这是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做这种事的话，你也应该愿意为把青年人的怀疑反映上去而斗争，并且准备豁出自己的前程。对在西贡的司令部来说，在当时以及以后，越南和越南人从未真正成为美国思想和计划中的一部分。越南最多不过是美国的延长，他们自己的功名业绩的延长，他们自己的机构势力和自我形象的延长。对战场上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前途是否会暂时出现曲折，也不应该只考虑使自己的功名业绩免遭损害。

莱德由于从他所在的战区发出悲观论调的报告，不久就受到打击。范的处境更坏，这是因为他过去上送的报告已经引起一些问题。1963 年 1 月，范担任顾问的那个师，在北村战役中遭到惨败，而且这个师在作战时表现得非常胆怯。由于北村靠近西贡，所以记者们对北村战役作了大量的报道。因此，范现在面临着一场大的风暴。

哈金斯大发雷霆，但他并不是针对越南人或越南人的司令官，而是针对范，因为范认为北村战役是一次败仗，并
203 向美国记者谈论有关这一战役的情况。哈金斯当时想要把范撤职，但参谋人员加以劝阻，指出把范撤职会在舆论上产生更不利的影响。他们还警告说，顾问人员的士气实际上已经够低沉的了。哈金斯无可奈何，只好把范训斥了一通。从此范受到贬抑，不论他写什么或说什么，人家都不理睬他，也不让到这个国家来访问的重要人物前往他的驻地。

接着就轮到范的顶头上司波特。他在服务两年期满回国以前按规定要交上一份总结报告。他的报告写得铁面无情地坦率。他的助手们建议加上一些正面的话，使报告的语气显得温和些。但是，波特拒绝了。他对自己的部下所受到的那种待遇感到气愤和难受。他同莱德、范和威尔逊商量后，送上一份迄今为止关于战争情况最悲观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还谈到关于农民以及敌人和盟军的状态和特征。哈金斯看了报告后大发雷霆。在正常情况下，高级顾问人员的总结报告都要分发给所有其他高级顾问看，但哈金斯把波特的报告扣下了。他告诉其他军官，该报告需要消毒，如果其中有什么有益的东西，以后还可以发给大家看看。但后来再也没有人见到这份报告。此事并不使波特感到奇怪。但他已经受够了，决心脱离陆军这个行业。

参加这场斗争的，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约克的将级军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团长，立过很卓越的功勋。目前他正在越南从事有关游击战争的专门研究工作。马来亚游击队起义战争期间，他在马来亚担任武官，所以他对游击战争有所了解。他不事张扬地到各处农村访问，不象哈金斯那样摆出一副国家元首的派头，出去巡访时在省长官邸出席十七道菜的午餐会。与此相反，约克不佩戴他的将军星徽，事先不打招呼，不引人注意地来到南越部队当中。因而他能够看到战争和盟军的真实情况。典型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在北村战役进行时，哈金斯乘坐直升飞机前来狠狠地对范进行训斥，而约克却正在战场上，由于一位省长所指挥的大炮乱轰不停而动弹不得。1963年初，约克刚被提升为准将之后，他决定豁出自己的前程，呈上一份关于这场战争的详细而悲观的报告。但是，他从未从哈金斯那里听到对这份报告的反应。他的司令官的唯一反应是在报告的空白地方批了“瞎说”，“还是瞎说”，“范”，“波特”，“又是这个范”，“又是这个波特”。这是西贡同战场现实之间存在分歧的反映；司令部的观点是那些抱着和平时期态度并具有和平时期军人架子的人的观点；而战场的人们却是实际参加战斗的人们。

在这些人当中，范是最积极、最富于献身精神的，他成了对哈金斯及其上司泰勒将军进行斗争的代表人物。

范于1963年6月回国时，是最了解南越情况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统计学家，能运用一种新式的统计方法。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统计材料仅仅反映了更强大的美国火力，以及美国人愿意按其表面价值接
204 受的被夸大了的关于南越军队击毙敌人的数字。与此相反，范设法编制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统计材料。譬如，他用材料证明南越军队不参加作战。(他所在战区的政府方面一年内死亡一千四百人，其中南越军队只死了五十人。)这并不象哈金斯所暗示的那样，表明南越军队很善战。这证明他们根本不作战。作战的重担是落在装备很差的地方民团肩上了。团丁常常是在自己的防御阵地内睡觉时被打死的(范也证明了此事)。他能证明，吴庭艳给南越司令官配备兵力，并不是根据越共的压力大小，而是根据私人关系和他们保护吴庭艳防止政变的能力。

范回国后，发现西贡方面曾发出命令，不让他在华盛顿向有关方面汇报。他感到非常气愤。因此，他把自己的汇报材料交给五角大楼的朋友们。这的确是一种专业人员的汇报，与通常从西贡发来的汇报材料大不相同。它引人注意之处是，它不是光凭印象，而是看来有十分确凿的事实作为根据。范开始得到五角大楼越来越高级的人员听取他的汇报。最后，陆军副参谋长巴克斯代尔·哈姆雷特将军听取了他的汇报后印象深刻，准备安排范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去汇报。几个高级军官告诫范，切勿

显示出他是在批评哈金斯将军，因为哈金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亲自遴选的，所以，泰勒对有关哈金斯及其报告的事似乎特别敏感，对哈金斯总是要加以庇护的。他们还警告他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让克鲁拉克将军看到汇报材料。克鲁拉克是国防部长的游击战争特别顾问，此人已经以坚定乐观派的面目出现。他刚从西贡访问回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汇报，说战争进行得很顺利，这同哈金斯所说的完全一样。

范的情况汇报会定于1963年7月8日下午两点举行。他于上午九点四十五分把一份汇报稿送到克鲁拉克将军的办公室。过了一会，范显得心情急切，态度拘束，想着自己的意见终于即将获得听取，来到陆军参谋长厄尔·惠勒将军办公室外，等候有事时随叫随到。当他坐在那里时，惠勒的一个副官接到一个电话。副官问："是谁要取消议事日程上的这一项目？"有人在电话的另一端讲了几分钟。"是国防部长办公室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又讲了一会。"这是命令呢，还是请求？"然后又讲了一会。"让我把这一点弄清楚。你是说主席要求取消这个项目。"副官转身对范说："老兄，看来你今天汇报不成啦！"他走进惠勒的办公室，不一会出来，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号码，然后讲："参谋长同意从日程上取消这个项目。"

就这样，由于泰勒的阻挠，一种重要的不同观点得不

205 到最高级官员的听取，从而使军方关于战争如何顺利进展的看法受到保护(假如范汇报成功的话，高级军方人士去总统那里开会时就很难再说战争正在顺利进展)。这个事件是高级军方人士压制不同意见的一个小小的例证。他们唯恐最高当局不采纳军方有抗菌性的观点，唯恐最高当局感染了怀疑的病菌，所以他们在军事报道中一天接一天地采用无数小动作来隐瞒真相。这件事使五角大楼内很多人明确地认识到，哈金斯式的乐观看法及其对怀疑论者的横加压制，其根子不在哈金斯一人身上。其实，哈金斯是泰勒所操纵的一个傀儡，哈金斯的行动反映了泰勒的决定，了解这一点才能懂得为什么陆军内部如此重视由特殊渠道传送的消息和非正式的“命令”。原来，传给哈金斯的非正式命令是来自泰勒那里，而哈金斯和泰勒之间的信使则是克鲁拉克将军。

自从1962年中期以来，美国军方开始对付在西贡的为数不多的美国记者，把这些记者当做出气筒。军方这样做倒不是经过特别细心考虑的。但是，要记者把他们的怀疑隐藏起来也是不可能的。由于记者经常到乡村去，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就能看出，整个军事行动是多么虚假，谎言是多么多，战争是一场多么大的骗局。美国报刊上开始登载对战争及南越政权的远为悲观的报道，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华盛顿和西贡两地立即把这种

情况硬说成是新闻界挑起的争论。实际上，这反映了官僚机构内部的一场重大的斗争，并且反映了一种正在破产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现在要依靠政府方面的宣传才能维持下去，还要看政府在内部和吴庭艳那里能否兜售这种虚弱和破产了的政策，因此，在国内和在南越的记者就成为政府的攻击对象。在西贡，美国记者是当局唯一不能加以控制的一种人。吴庭艳控制了他的报纸、他的军队、他的立法机关；哈金斯控制了军方的报告渠道，瑙尔汀则控制了使馆的报告渠道。只有美国记者才能说真话。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曾对美联社记者马尔科姆·布朗说："要同我们合作！"瑙尔汀大使训诫记者说："不要吹毛求疵！"中央情报局驻西贡的头头约翰·理查森用羡慕的口吻对他的同僚谈论共产党人如何控制他们的记者。瑙尔汀对记者的报道越来越感到恼火，他命令他的新闻官约翰·梅克林给华盛顿写了一份重要报告说，"不负责任的、不符事实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严重干扰了现行政策"。克鲁拉克将军比较善于耍政治手腕，他决定攻击新闻记者胆小和没有种。他对他所喜欢的新闻界朋友们说，西贡的美国记者看到尸体竟然哭起来。他们发动受宠的杂志如《时代》，或者受宠的记者如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玛格丽特·希金斯，写更多讲好话的报道，而他们也欣然照办了。 206

在西贡的记者，看来成了容易受到攻击的众矢之的，

他们都年轻，还没有成名。因为他们年轻，所以他们对世界和对战争的看法，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观点约束。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有妻室，所以他们没有因老婆的压力而卷进西贡的社交漩涡里，去同瑙尔汀一家或哈金斯一家人来往。而在华盛顿，正是这种暗中施加的压力使记者难于据实报道。与在华盛顿的许多同行不同的是，驻西贡的美国记者采访新闻时无需看那边当局的负责人的眼色行事。他们的朋友和同时代的人都在战场上，战争就在那里进行着。他们关于西贡政治上瘫痪的报道，关于吴庭艳假许愿的报道，一贯是切中要害的。他们的战地报道比军方的报告远为诚实和准确。①

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比较小的。他们也并没有对现行政策提出挑战，而他们既然接受这种政策，也就不能抓住要害问题。假使他们向这场战争的前提本身挑战的话，毫无疑问，第二天他们就会被遣送出境。只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初，他们才开始感觉到，问题不只是出在吴庭艳身上，吴庭艳只是一场更大的失败的征候。在法国人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的时期就种下了问题的真正根子。如今为时已很晚了。十五年前在中国，一些心怀忧虑的年轻的国务院官员曾扮演过现在这些记

① 八年之后披露的五角大楼文件内所包括的五角大楼自己专家的分析后来证明了这一点，这对记者来说是一种过时的然而具有很大讽刺意味的称许。——作者

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报告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而没有冒失掉工作的危险。现在，这种报告不能通过国务院来做，而必须通过客观的的报纸来做。可是，从前那批国务院官员是对该地区有研究的专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表面现象下面的根源，而在越南的年轻的美国新闻记者却缺乏这样做的专门知识。他们与官方人员不同的是，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行不通，但他们比不上以前国务院驻华官员，他们未能回溯到足够早的时期来找出这个计划失败的原因。当年国务院驻华官员从自己的悲观看法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即美国不应该卷入中国的事情。而这些记者在1962年和1963年初的时候尚未看出越南的问题也是如此。象在西贡所有的事情一样，美国报界所起的作用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然而，它确曾向现行政策所依据的情报提出了挑战，使美国自以为不可一世、无所不能的时代逐渐结束。它揭示，美国及其政府的摊子铺得太大了，这正是一种"远程预先警报线"① 的警报讯号。

政府迅速地采取了对策。如果记者不肯写捧场的报道，那么，很有办法并且特别善于操纵舆论的肯尼迪政府 207
就自行炮制正面报道。因此，乐观情绪和乐观言论成了现行政策精心策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舆论进行

① "远程预先警报线"是美国在北美洲建立的雷达网。——译者

战争，这是肯尼迪时代的又一特点。美国高级官员出访，不是为了熟悉越南，不是为了观察越南，也不是为了改正人们私下认为站不住脚的政策，而是去为这一虚弱的政策打气。他们的讲话稿和声明稿在出发前就准备好了。这些讲话和声明，通篇都是对吴庭艳的吹捧，满口谈的是民族革命，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将结束，胜利已经在望。一天，在西贡机场上，当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走下飞机开始念声明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时，当时的合众国际社记者、二十五岁的尼尔·希恩说："啊！又一个愚蠢的西方人跑到这里在胡志明面前出丑了！"

美国的政策越来越是为了装潢门面，越南的现实是无关重要的，但是装潢越南的门面却是重要的，因为它对美国的现实会发生影响。精力越来越多地花在舆论方面，因为装潢门面和拟声明稿比改变战场现实情况要容易。当局同美国记者之间的争论变得如此尖锐，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只顾装潢门面的美国使团开始感到记者的威协。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记者报道中指出某种事情有严重错误的时候，美国使团就本能地跳出来攻击记者，说记者的话不足信，而不是去调查这个报道是否确实。佛教徒危机之所以引起不安，不是因为它暴露了吴庭艳政权的愚蠢和残暴，而是因为它打破了安宁的门面。美国无视日内瓦协议原先规定的选举，而其后的南越选举，从

一开始，其目的绝不是为了表达越南人的愿望，而是为了把美国的那一套价值标准移植到越南人身上，为了使美国人放心。一直到1967年，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当时兰斯代尔将军以文职官员身分回到南越来策划一次选举。尽管越共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他仍希望这次选举是诚实的。但他的想法得不到大使馆其余官员的支持。所以，当他的老朋友理查德·尼克松于1967年中期访问西贡时，他灵机一动，想利用尼克松来为选举制造声势。他说，这次要搞一次真正诚实的选举。尼克松说："好哇，那当然，是应该来个诚实的，诚实的，对！只要你赢就行了！"说完，尼克松使了个眼色，用肘捅了兰斯代尔的臂膀一下，又拍了拍自己的膝盖。所谓选举就是这么一回事，象所有其他事情一样，都是为了批准美国的决定和粉饰美国的政策。

当然，也有一些美国公职人员不甘受政府当局的摆布。1962年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应肯尼迪的要求来到西贡。曼斯菲尔德在过去曾多次访问过越南。他是最早支持吴庭艳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之一。208
（那些赞助在西贡建立一个天主教自由政权的美国天主教自由派人士曾把吴庭艳看成是他们的希望。）由于他知道很多背景情况，所以，吴庭艳处境的恶化，此人的日益孤立，吴氏总统府给人的不真实的感觉以及吴庭儒夫妇的专权，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震惊。曼斯菲尔德取消

了瑙尔汀为他安排的几次官方汇报会，而同美国记者一起进行了四小时的午餐会，这个午餐会证实了他自己的疑团。第二天当他在机场准备离开时，大使馆交给他一份为他草拟好的声明稿。这是大使表示的一点小小的殷勤，以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不知道该讲什么的时候采用。可是曼斯菲尔德拒绝了这个稿子，他自己发表的告别辞中毫无捧场的话，这反映了他的失望情绪。回到华盛顿后，他交给肯尼迪一份供公开发表用的措词温和而谨慎的报告，但他私下里给肯尼迪的材料是直言不讳的，是对整个局势感到悲观的。肯尼迪把曼斯菲尔德召到他的“霍尼·菲茨”号游艇上去，那里正在举行一次社交活动。总统阅读报告时，越读越生气，脸色越来越红，最后他转脸望着曼斯菲尔德，望着这位可以说是他在参议院里最亲密的朋友，怒气冲冲地说，“难道你要我完全相信这份报告吗？”曼斯菲尔德回答说，“是你要我到那里去的。”肯尼迪又看了看他，这回冷冰冰地说，“好吧！我把报告再看一遍。”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因为这次谈话发生在泰勒—罗斯托调查团去越南约一年之后，发生在推行这种故意表现乐观的政策一年之后。这件事说明，如果说这种政策没能使别人受骗的话，却使骗子们自己受了骗。

但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加上象曼斯菲尔德这样的人提出的报告，逐渐对总统产生了影响。肯尼迪因为不同

来源的报道大有出入而越来越感到烦恼，他便派遣两名哈里曼的人于12月底去作实地调查。这两个人是国务院的罗杰·希尔斯曼和白宫的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他告诉福雷斯特尔，他需要得到一种新鲜的看法，以便掌握真实情况，并要他注意不要同那里的记者过多厮混，看问题的时候不要受他们观点的影响。他嘱咐福雷斯特尔应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南越人民对战争是怎么看的。

福雷斯特尔过去专心研究老挝问题，没有搞过越南问题。他听了总统的话，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到达西贡之后，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发现只有美国人还相信吴庭艳政权。他还发现这些美国人对该政权的相信程度，是与他们的职位的高低成正比例的，而越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对这个政权或对战争努力能否坚持下去就越缺乏信心。他于2月初向肯尼迪提出报告说："没有人真正知道，去年被杀死的两万名所谓'越共'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本来是无辜的或至少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农民；没有人知道，战略村计划是否向老百姓提供了足够的国家援助以补偿人们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没有人知道，广大沉默寡言的农民对有关吴庭艳独裁和重用亲属的指控有些什么反应。"福雷斯特尔预计战争将是长期的和代价高昂的，并报告说，越共在南越境内的征兵工作是如此卓有成效，即使没有来自北越的渗透也能够把战争坚持下 209

去。这一看法使西贡和五角大楼以及某些文职官员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华盛顿方面的大部设想都是建立在北越入侵这种假定的基础上的。

1963年初，总统对他在西贡的班子已感到不满，他特别对来自西贡的报告感到不满，他觉得报告太简单化、太自信、太缺乏有层次的分析，而且很少反映对居民的关怀。但是，使肯尼迪懊丧的，与其说是哈金斯和瑙尔汀的简单化报告，不如说是战争本身以及越南的种种问题使他感到（如福雷斯特尔所报告的）事情很不妙，使他直觉地认识到我们将越陷越深。在私下里，他开始对我们所走的方向表示不安。他觉得哈金斯和瑙尔汀并不具有他的这些忧虑，特别是觉得瑙尔汀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总统在南越的代表，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选。也许对别的总统说来他是一个好的人选，但对他肯尼迪说来并非如此。这样一来，控制军方这个任务越来越落在他自己的白宫班子的肩上，而不是落在总统派驻越南的大使肩上了。美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真相及其给农民造成的后果暴露得越多，肯尼迪就越感到不安。但是瑙尔汀并不感到不安，他已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吴庭艳政权。总统十分不愉快地得到的教训（这又一次使他想起猪湾事件，那是他的第一个教训），也就是他的继任人林登·约翰逊经过一番周折后所发觉的这样一个教训：凡是牵涉

到军事方面的政策，在实施以前加以控制的余地是最大的，但是政策一旦付诸实施以后，不论最初迈出的步子如何小，这项政策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和冲力，变成一种活的东西。而且，它的冲力和推动力可能完全不符合制订这项政策的总统的愿望。这种政策付诸实施之后就会不断地产生压力，要求更多的东西，如更多的武力、更新的战术、更放宽使用武力的权限。

从1962年中期开始，在越南已出现上述情况。不久，美国军方（以及西贡）同政府之间在关于使用凝固汽油弹、落叶剂、自由投弹区及使用喷气式飞机以代替过时的螺旋桨战斗轰炸机这四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喷气式飞机问题上，军方的要求很快就被驳回。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兄弟两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支持美国军方，并实际上推动着美国军方。这对他们是一次很大的暴露，说明他们对本国农民的态度，说明他们毫不顾念自己的同胞，毫不为农民着想。吴氏兄弟特别是吴庭儒，认为必须使用这类武器，因为它们有助于支撑西贡政府，而 210
不管这类武器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死亡。事实上，吴氏兄弟就是喜欢过多地行使权力。他们仍然抱着老百姓有责任服从政府的那种官老爷思想。例如，他们有这样一种理论，说老百姓对政府的屠杀和官兵的强暴会感到如此的恐惧，便会自动地更敬畏政府而反对越共。这是一种陈腐不堪的想法，因为二十年来，印度支那经历了

越盟和越共领导的翻天复地的革命风暴，他们不是宣传象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共产主义，而是教育农民说，他们将来有可能获得许多新的东西，其中包括尊严和正义。

吴氏兄弟的上述态度，集中反映了他们同社会上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老百姓根本就不是那样反共的，他们憎恨政府对他们的横暴更甚于对敌人的恐惧，尽管据说政府是想把他们从这个敌人那里拯救出来的。几年以后的美莱惨案使阮文绍政府在政治上很狼狈，因为阮文绍也采取了同吴庭艳一样的态度：为了保卫西贡政府的生存和保卫美国的反共主义，而毫无节制地使用火力去杀害不积极合作的越南人民。

虽然军方使用喷气式飞机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但它力争在其他问题上满足它的要求。当初，越南问题中的这个方面是肯尼迪唯一真正注意到的事情。1962年初，越南问题被列在议事日程上的次要地位，但是这类杀人问题是特殊的问题，因此总统专门责成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两人在这些问题上监视军方，以免出漏子。他深信军方经常企图绕过他而自行其是，这倒是事实。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发现麦乔治·邦迪第一次在越南问题上真正给予协助，这反映了总统的确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邦迪让他们两人随时可以到总统那里去请示，即使有些问题按那个时期的标准看来是小问题，或者甚至是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全球性问题。凝固汽油弹

是第一个这样的问题。哈金斯喜欢凝固汽油弹，吴庭艳和吴庭儒也喜欢凝固汽油弹。哈金斯说，凝固汽油弹会使越共害怕上帝。这位将军又说，这不过是军火库中的另一种武器罢了。也许他说对了，其他武器同样是会置人于死地的。哈金斯竭力要求几乎无限制地使用这种武器，但它是一种折磨人的武器，这使肯尼迪感到恐怖。这种武器似乎特别惨无人道。肯尼迪很讨厌看被凝固汽油弹杀伤的人们的照片。但是他往往带着某种程度的宿命论的心情，同他左右的人谈到军方为了要求使用凝固汽油弹而对他施加的压力。他常说："他们现在又要求在农村使用它。他们对我说它不会伤害任何人，但如果它不会伤害任何人，那末他们为什么又要用它呢？"

其次，军方要求使用落叶剂，于是又展开了一场斗争。他们要求广泛地使用落叶剂，要求用它来毁坏庄稼。但是肯尼迪不答应，他不让人毁坏庄稼，不管是谁的庄稼。军方只好要求有限制地使用落叶剂，只在交通线上使用。他们要求在公路上使用它，以使敌人更难于伏击美国部队，这样我们的士兵就可以得到保护。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说，让我们试一下吧，只小规模地搞，它会起作用的，会有助于我们取得战争的胜利的。肯尼迪无可奈何，想部分地予以同意。但是国务院的法律部门告诉他，使用这种东西是违反关于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的。于是他说，好吧，他们要试验，为什么不 211

找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巴拿马或者泰国、或者另外什么地方，难道非要在越南人口众多的地方试验不可？最后，象他曾经批准在附近没有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有限制地使用凝固汽油弹一样，他批准了有限制地使用落叶剂。

随后，哈金斯又力争要有自由投弹区，以便扔掉飞机上没有用完的炸弹，因为如果把这些炸弹带回来，在飞机着陆时会引起危险。肯尼迪问他左右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把剩下的炸弹扔到海里去？反正美国有的是炸弹，扔掉一些在南中国海里对美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海洋也不见得会造成多大的破坏。但哈金斯要求把炸弹扔到铁三角地区，那里没有老百姓，当然他指的是没有对我们友好的老百姓。最后，军方争得了很有限的一些自由投弹区。

肯尼迪逐渐对这种事情感到厌烦，他左右的一些人也开始感觉到，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日益失去了控制。他们必须经过很费力的斗争才能取得温和一些的折中办法，他们感到仅仅是维持现状也不容易。军方可以在没有作出决定的问题上擅自宣布自己的政策，而文职官员只好在事后反击。更糟糕的是，军方往往开头要价极高，然后，象一个会讲价钱的精明商人一样，稍微降低一点价格便成交，从而总是占上风。例如，他们要求广泛地使用落叶剂，从而获得了落叶剂的使用权；他们要求无限制地使用凝固汽油弹，从而取得了有限制地使用它的权力。这对军

方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白宫里的那些小子们不会坐在每架飞机上去监督每次任务的。

白宫开始注意到，负责驻西贡使团的那些人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开始有所自作主张。他们比华盛顿更好战，他们向吴庭艳承担的义务比华盛顿承担的更多。至于哈金斯，他采取的立场是，他所反映的看法毕竟不是他自己的看法，而是驻在国政府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帮助这些小人物，既然他们要这些武器，而他们又比我们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就应当问他们需要什么武器，然后把所要的武器给他们。瑙尔汀不愿同军方对抗。其实他是一贯顺从吴庭艳的要求的。因此，当肯尼迪一再催促福雷斯特尔推动瑙尔汀对军人施加压力时，福雷斯特尔发现瑙尔汀进行某种程度的抵制。他不愿同哈金斯作对，因为同哈金斯作对就意味着同吴庭艳作对。显然，瑙尔汀并不是名副其实的总统驻西贡的代表。然而，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呢。 212

肯尼迪当初作出承担义务的决定时是有很多顾虑的，他并不是很热中于这样做的。他作出承担义务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这样做。但是，他对这件事从来不是真正具有信心的，而在西贡的哈金斯和瑙尔汀却真正具有信心。他们相信自己关于胜利的声明，而他们是郑重其事的。但是，关于武力的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还有另外一层重要

意义。越南问题在官僚机构内部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分化为两派：一派认为越南问题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须用武力来解决；另一派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凝固汽油弹、落叶剂、自由投弹区以及喷气式飞机等问题，早已是政府中各色人物选择哪一边的试金石。

美国在南越承担的义务已经开始执行了，而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和个人的野心又加快了执行的速度。受命在西贡和华盛顿担任职务的那些人，从来也不问承担的那件事做对了或做错了，也不管它是否行得通。在政府中，硬性试图推行一个行不通的计划，总比完全停止执行这一计划或承认失败要容易一些。约翰·肯尼迪很快地懂得，他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利益，同数以千计的在政府里工作的人的利益，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的。

第十二章
麦克纳马拉其人

在西贡，军事援助司令部现在已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机构执行任务。它能够掌握下属人员的忠诚，并能编造材料、统计数字和计划来迎合五角大楼里上级的喜好。它压制了最优秀的人员的反对意见，并断定事情进行得很好，过去是乐观的，将来也会是乐观的。后来在1963年4月檀香山会议上，哈金斯几乎是得意洋洋。他不能提供任何保证，但是他认为到圣诞节的时候，事情就会全部结束。麦克纳马拉听了哈金斯的意见大为高兴——麦克纳马拉还特意提醒希尔斯曼说，希尔斯曼过去在那里的时候，一切看来都是漆黑一团，那只是十八个月以前的事。因此，在1963年初，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比那里较为脆弱的文职机构有力量得多。这曾使瑙尔汀大使一度感到烦恼。但后来他就不再烦恼了，主要是因为他同意了军方的结论，他也是通过军事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在华盛顿，掌握越南问题的人物不是迪安·腊斯克，而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他决定要在越南取胜的行动、策略和条件。当 213

文职人员同军事人员在越南问题上的分裂日益增长的时候，麦克纳马拉被认为是一个裁判员。另一方面，国务院里对军方的估计提出异议的那些人，如哈里曼，却处于对手的地位。

麦克纳马拉扮演的是主要角色，他由于国务卿未尽到职责而篡夺了国务卿的大权，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他这个人机智、有力、勇敢、正派，简直具备一切条件，就是缺乏智慧。只要总统遇到问题，他就挺身而出，要更好地保护他的上司，为上司顶住压力。他在越南问题上所以要向前猛冲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在猪湾事件上表现不好而经常感觉烦恼。几年以后，这仍然是肯尼迪核心人物中间的一个笑柄。爱德华·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桥上驾车出事之后，在奔赴海恩尼斯港的肯尼迪乡间寓所的许多人之中，就有麦克纳马拉；在那里，那些核心人物把他作为伙伴来欢迎，并开玩笑说，负责处理猪湾和越南两件大事的那个人光临了。

214

1962 年，他成了主管越南问题的首要官员，因为他觉得总统需要他的帮助。他对亚洲、贫困、人民和美国内政都一无所知，但对生产技术和行使官僚权力却懂得很多。他是一个典型的公司经理人。如果是美国同河内进行竞赛，看哪一方能够为南越农民生产更多的货物，我们显然是会胜利的。如果只是把合适的货物送到需要的农村去的话，我们也是会胜利的。不幸的是，我们所推

销的并不是他们要购买的东西。这个人最不了解和最不会分析一个正在寻求解放的民族的问题，他的唯一真正经验是处理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汽车帝国的事务，生产西式的巨型车辆。然而他却是一个道地的肯尼迪政府的人物。他代表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能够用智力和推理来驾驭和控制局势的发展。对付一场游击战争，就象购买一个赔钱的外国公司一样，你得把你那套办法搬过去。他给人的印象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忠诚，在1963年那些平静的日子里，当他的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他主持的任何事情竟会出岔子。他是一个令人放心的人，不仅对他所服务的两个总统是如此，对华盛顿那些善良的自由派来说也是如此。如果麦克纳马拉负责一件事情，他会正确地处理它；如果是一场战争，那就会打得好。

麦克纳马拉能够管住军方。这当然就是传说他很了不起的由来。华盛顿到处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说麦克纳马拉能够压住军方迫使他们重新考虑问题，打消他们得意的计划。后来当他的声望下降，国防预算增加（不只是在越南，其他方面预算也增加）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肯尼迪政府的一些人就怀疑，麦克纳马拉其实并没有管住过军方，相反，他使他们在拚命大吵大嚷和不断抗议中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至少，后来表明，只有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投入战争的时候，他才管得住军方，而文官驾驭将军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卷入战争。这点智慧是后来才有的。

215 当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参加政府时，他让他的副手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掌管越南问题，这无疑是表明越南当时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当越南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开始变得明显的时候，他亲自接管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要保护总统，并且确信自己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其后，他开始了一系列飞往西贡的旅行，进行寻求事实的现场视察。一个活跃的、有信心的麦克纳马拉展开了活动：他出现在电视萤光屏上，他接见人们(持反对意见者被谨慎地排斥在外)，囫囵吞枣地接受当时那些虚假的统计数字。他的信心变成了华盛顿的信心。首都的人们知道这个能干的、有活力的人能够掌握这场战争，能够掌握军事机器。事实是，他只有一种设想，只依靠一个情报来源。他虽然具有理想主义，但是他并不比他所领导的机构强，而且由于他的傲慢，也许比他的机构还差一些。但如果在1963年说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邪说，因为那时他的声望是无可非议的。

他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为人严谨、克制，有干劲——爱爬山，能驾驭将军，头发光亮整齐，象是格兰特·伍德①所描绘的人物。从他的神态看得出他的干劲。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正如很难想象他

① 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 1891—1942)，美国名画家。——译者

是一个胖人一样。他戴着一副神气十足的平光无框眼镜。你看到他的眼镜，就得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竭力争取把事情办好。罗伯特能把事情办好。他是生活在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和无所不能的社会里的无所不能的人。没有人会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误作欧洲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具有美国人的活力、美国人的自以为是和美国人的信念。他对每个人，特别是对他自己，都要求不断前进到新的极限，长时间地干，边早餐边工作，早起早睡，饮酒适度，不参加鸡尾酒会。他始终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清教徒，但并不是一个假装正经的人。当然他不是一位白璧德①——尽管他放弃了早年要搞学问的选择而经营工商业，他至少也不会是个白璧德。他坐在那张大办公桌后面，态度严肃，神气活现。美国的国防部长，掌握着八百五十亿美元一年的预算，更不用说还控制着大量核弹头储备，总是要显得十分神气的。

他总是注意节约时间，很快地说完话就走，来来去去都有目的，按照安排好的时间做事。一点五十分吃午饭，最多也就是吃到两点为止。他最不爱参加那样的哲学讨论，象"好吧，罗伯特，我对历史的看法是……"不容

① 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对政治、艺术、哲学等没有兴趣的资本家。——译者

许任何人浪费他的时间。他告诉他的部下说：不要人们向我作口头汇报。如果他们要陈述什么事情，要事先弄清楚，让他们写成书面报告。一个部下问他："为什么？"他冷冷地盯了一眼说："因为我阅读起来比他们说的要快。"在这方面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1966年，他对在越南设置电子屏障来阻止渗透的办法感兴趣（以便打消主张轰炸北越的论据）。突然之间，这件事取得了最优先的地位。负责这项工作的艾尔弗雷德·斯塔伯德将军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并且总是向他作口头汇报。他在参谋长们每周一次前来见他时所表现的厌烦，和他在同斯塔伯德将军谈话时所表现的兴趣，形成鲜明的对照。对那些浪费了他的时间的人——当然除了他的上级以外——他都以冷眼相待，这几乎包括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肯尼迪执政年代之初，泰勒第一次去见麦克纳马拉的时候，到得早了一点。他在部长办公室门外站着，而麦克纳马拉却在等着约见的精确时间。当约见的时间到了，泰勒由于接白宫的电话而耽误了几分钟。于是麦克纳马拉等候着泰勒。最后是泰勒再等了麦克纳马拉一些时间才得以进去，受到了他一生中一次比较冷淡的接待。

216

时间是最重要的，应当加以安排和节省。时间不只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行动、决定、成本核算和权力。五角大楼私下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如果你真的要找麦克

纳马拉阐明一个论点，最好的办法是在他飞赴西贡或檀香山的长途旅行中去找他，因为他在飞机上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着，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不等待任何约会。有人记得1966年10月间的一个情景。当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已经反对战争，他在飞机上把麦克纳马拉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他向国防部长挤过去，把他所写的并积存起来的所有鸽派主张的文件塞给麦克纳马拉。有一个人看了这种情景感到有趣，因为他看到埃尔斯伯格这个陀斯妥也夫斯基①式的人物表现出一副着魔的神态，而麦克纳马拉却无处可藏。

麦克纳马拉经常处在这样重的压力之下，但总是竭力掩饰，保持冷静，克制自己，虽然不一定经常做到，并且还得付出一些代价。例如，他在底特律时，常常在睡梦中磨牙，损坏了牙齿的珐琅质，直到玛格丽特·麦克纳马拉发觉了才让他到牙医那里去补牙。而且是一个纽约牙医，这样在底特律就不会引起闲话，否则可能贬低他的名声，从而降低他的权力，因为他的名声就是他的权力的由来。

有时在他周围的人看来，他的理想主义似乎达到了天真的程度。他从不谈论权力，似乎并不贪图权力。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喜爱权力，并竭力追求权力。在牵涉到权力的问题时，他是一个凶猛的争夺者。他不

① 陀斯妥也夫斯基（Feodor M. Dostoyevsky, 1821—1881），俄国小说家，这里指不拘小节、不守纪律的人。——译者

容许任何人位于他和美国总统之间，除非那个人可能成为总统。因此，他在1967年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当时他在效忠约翰逊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问题上弄得很苦恼。虽然他看起来是天真的，但他在底特律汽车业剧烈的政治斗争中曾经得到胜利，他十分懂得如何取得权力和掌握权力。但是他这种性格并不是经常地表现出来的。他之所以有力量，一部分原因似乎就是他能够表现得对权力问题好象漠不关心，几乎是天真的样子。国防部一个官员曾经把麦克纳马拉看成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官，而当他窥见麦克纳马拉的另一面时，就弄得目瞪口呆。曾经有人提出请这位官员去白宫担任一项职务。当他告诉麦克纳马拉这件事情时，麦克纳马拉建议他拒绝接受。麦克纳马拉说，虽然那个职位会给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和荣誉，但没有实权。麦克纳马拉接着对政府各个部门一一作了惊人的精采的分析：哪个部门的哪些职位有权和为什么有权；哪些职位看起来似乎有实权，而实际上却没有。看来麦克纳马拉并不象那个官员曾认为的那样天真和理想主义。

217

麦克纳马拉在华盛顿享有那样好的名声，并不是完全偶然的——他知道舆论的重要性，并以惊人的手腕玩弄它。当麦克纳马拉发现国防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头头阿瑟·西尔威斯特的辩才和能力都有限的时候，他很快就懂得如何利用这个人在国防部长和一般记者之间起避雷

针和滤波器的作用，最主要是挡住新闻界，避开新闻界的压力。许多记者曾经感到诧异，为什么麦克纳马拉那样能干的人会任用象西尔威斯特那样迟钝的人当新闻官。答案是，那是有意安排的。同时，麦克纳马拉任用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同自由派关系特别密切的亚当·亚莫林斯基来承担一个更为严肃的任务——同大作家和专栏作家一道保护国防部长的形象。在出现各种批评文章之后，就是由亚莫林斯基写信给编者来恢复麦克纳马拉的名声的。

麦克纳马拉的生活是紧张的、忙碌的，但头脑是数学的、有分析的，能够从混乱中求得秩序和理智。他总是讲理性的，并且是有事实和统计数字支持的理性——他能够用事实来证实他的推论，把别人唬住。他在图表和统计数字方面有惊人的才能。有一次，他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部坐了八小时，观看数以百计的幻灯片在银幕上闪过，这些幻灯片说明在通往越南的补给线上有哪些物资，哪些已经运到了越南。他在看了七小时之后说："停止放映，这张八百六十九号幻灯片同十一号幻灯片矛盾。"十一号幻灯片当即再映了一遍。他说得对，两张幻灯片是互相矛盾的。每个人都得到深刻的印象。许多人有点吃惊。无怪乎他的声望提高了，其他人都感到敬畏。这是因为当那些人，那些只有初等数学水平的善良的自

由派社会科学家都感到茫茫然的时候，麦克纳马拉的思想却仍能继续依靠他的数学式的正确判断投入官僚的斗
218 争中去。但是到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的数学方法判断已经失灵，计算机并没有提供正确的答案，而且过低地估计了远方那些矮小、奇怪、穿着破旧衣服的人们的力量，这时他就被一种深刻的失败感所折磨，并且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一个心力破碎的人。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似乎总是能掌握局面的。林登·约翰逊说，你几乎能听到计算机滴嗒滴嗒地工作的声音。约翰逊曾一度钦佩他，并在许多场合向人们夸耀他。但是当事情变得不顺利，约翰逊感到麦克纳马拉也有所怀疑时，平时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挖苦使他失望的人的约翰逊，这次也没有放过他这个得意门生。他会对周围的人说："我忘了，他在福特公司只当过一个星期的总经理。"然而即使在那时，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将要结束，并且知道自己的政策已经失败的时候，也并没有真正放弃对自己那种推理方法的信心。这场战争是人类的浪费，而且它再也不划算了。我们为空中力量花费的钱从它造成的破坏来看是得不偿失的。我们每投入十美元，只破坏了一美元的东西，而且那一美元还是苏联提供的，不是北越自己的。

麦克纳马拉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最后一次参加五角大楼举行的仪式时，竟然哭起来了。他的朋友们在这最后的时刻，担心他的身心健康，担心战争会影响他

的道德观念。特别是肯尼迪那伙人对他感到担心。他是肯尼迪兄弟的亲密朋友，在宴会上表现快乐和爱交际，虽然他不以机智而闻名——没有人曾指责他对人过于冷嘲热讽，因为那种情况毕竟主要存在于被历史击败的人民和民族之中，而麦克纳马拉并没有失败。他具有某种令人高兴和迎合人的美好姿态，具有谈论本行以外各种问题的能力。罗伯特·肯尼迪曾问道："为什么他们都叫他'计算机'呢？他是我所有的姐妹们在宴会上都想紧挨着坐的一个人啊。"他对肯尼迪一家的忠诚是从1961年开始的，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在查帕奎迪克翻车事件发生后，埃塞尔①对麦克纳马拉说："罗伯特，到我们这儿来吧，这里没有别的人，只有女人。"

六十年代后期，当凯米洛特幻想②日益破灭时，肯尼迪核心集团里的人想挽救麦克纳马拉，这是不奇怪的。到那时，他们很想摆脱这场战争以及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们。至少麦乔治·邦迪是不会得到宠爱的。虽然邦迪在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被刺后曾送给肯尼迪的助手以补助金，但是肯尼迪一家对于他在1964年副总统候选人问题的争吵中充当约翰逊的联络员一事仍然有恶感。约翰逊并不是肯尼迪一家喜欢的人，他们从不对他宽大为怀，不

① 罗伯特·肯尼迪的妻子。——译者

② 凯米洛特（Camelot），是六世纪前后传说英国国王阿瑟建筑宫廷的地方，这里指肯尼迪一帮人上台时的幻想。——译者

论他做什么事，都不会使他们高兴。马克斯韦尔·泰勒曾经是一个宠儿，并且仍抱有一些个人的忠诚，但是泰勒直到1968年还顽固地坚持战争，因此要挽救他是困难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情况则不同，他仍然能够到希科里山肯尼迪家去玩。他们想帮他解脱责任。如果麦克纳马拉参加了1965年大规模战争升级的策划——他们甚至对此也表示怀疑——那么大概是林登·约翰逊把他拖进去的。他们认为麦克纳马拉总是有点过分讨好于人。其实在战争升级发生的时候，乔治·鲍尔已经一再告诉自由派的朋友们，他们上了麦克纳马拉的当；鲍尔对这件事已经讲得厌烦了。麦克纳马拉在华盛顿的自由派人士中间也许会唱鸽派的调子，但是他在那些会议上的态度却是强硬透顶的。他在1965年总是站在另外一边。

219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的不平凡的人物。如果开始时他似乎具有这个时代的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优点的话，最后他却似乎象征这个时代的伤感、弱点和悲剧。没有人怀疑他的善良愿望、能力和对公职极端认真的态度，但是他也有一些事情使他的许多同事感到厌烦。不只在越南问题上，在他的整个作风上都是这样。他办事有效率是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坚决要排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具有勇往直前的性格，从而排斥别人（有时是比他聪明、克制的

人)。例如，他会撒谎，弄虚作假，不仅对公众如此(他们对公众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样干的)，而且在内部，在高级会议上，也是如此。他总以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利，有正当理由，是为了对总统尽职。麦克纳马拉知道怎样做对事业有利，但有时要牺牲他的同事。的确，那些熟悉麦克纳马拉的人，那些喜欢他的人，完全有把握说，他们知道麦克纳马拉在什么时候撒谎——在他声音高起来，说话快起来，更坚持他的主张的时候。

他具有美国人始终尊重的那些优点：苦干，自我牺牲，正派，忠诚。他就是那样的忠诚，也许是过分的忠诚，是公司经理人心中那样的忠于职务，而不是忠于自己。他身上还体现了那个时代自由派的矛盾，即善良的愿望同掌握和使用权力的欲望之间的冲突（包含我们大部分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杰斐逊式的民主国家居然变成了超级大国)。在他的身上，总是存在这个矛盾。麦克纳马拉玩弄手腕，进行欺骗，既是为了做好事，也是为了掌握权力。后来，在他的职务快结束的时候，他来到哈佛大学。如果是在另一个比较和缓的时候，他在那里可能受到尊敬，但当时他几乎被激进的学生们围困住，差一点逃脱不出来。那天晚上，当他向一群教授讲演时，有人质问他关于两个麦克纳马拉的问题——一个是数学专家，他为我们创造了在越南清点尸体的办法；另一个是热情的哲学家，他在蒙特利尔发表了一篇人道主义的演说，似乎

对美国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国防政策表示怀疑。(约翰逊知道这篇演说后大发雷霆，要求知道是白宫里什么人批
220 准了这篇演说。后来发现是比尔·莫耶斯，这就加速了莫耶斯的离职。)他答复说："我在蒙特利尔发表那篇演说是因为，我不这样做我就没法继续担任我的职务，从良心上说活不下去。那篇演说使我多维持了十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为此而在国会和白宫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人们认为我一直是个主张和平的人。如果我必须再干一次，我是不会发表那篇演说的。"

1968年，他进入世界银行——这个职务同他过去担任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首脑，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人看来，这一行动似乎带有一些悔过的色彩。他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回忆在国防部的年代，但有一个问题从不谈及，那就是越南问题。这个问题仍然使他感到痛苦，并且不会离开他。到处都有些事情使他想到越南战争意味着什么。他的家庭发生的分裂，在美国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这说明越南战争对美国每个家庭所产生的影响：在麦克纳马拉家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制造这次战争的大人物之一，而在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年轻儿子克雷格。克雷格到处参加集会，是一个激进的献身的领导人。

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那帮人中间相处得很好，因为

他们都是唯理主义分子。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年代的做法并没有真正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上台时曾保证要使新政府更有效率。他们要使政府工作得更快更好，砍除不得力的机构。对于这个冷静的、具有英国人味道的年轻总统来说，麦克纳马拉是一个理想的国防部长。他不象邦迪那样属于权势集团，也不象迪安·腊斯克那样为权势集团服务过(腊斯克先在国务院工作多年，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底特律汽车工业并不是权势集团的一部分，而是它的执行机构的一部分，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它的数字都由权势集团仔细地审查过，以确保它在重型车辆生产方面仍然能够超过莫斯科和柏林。

尽管他不属于权势集团，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罗伯特·罗维特手下的空军中服务得很好。麦克纳马拉在那时就是一个受到注意的人。毫无疑问，他将会再度为人们所注视。他具有不平凡的条件：熟练的技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杰出的才能和忘我的精神，这些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十五年以后，罗维特拒绝当国防部长，当人们要他推荐一些人选时，他立即提到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的光明前途是大家早已看到的。他的地位一直在上升，进入福特公司后干的事业愈来愈大。他们刚刚请他担任总经理。实际上，他在1947年就已经第一次受到社会上的注意。当时《幸福》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罗维特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吹嘘了他的成

221 就。当凯泽①要用飞船把所有的物资运到海外基地去的时候，罗维特判定需要一万零二十二架飞机和十二万零七百六十五名飞行员，才能把十万英吨物资从旧金山运到澳大利亚，而这个任务正在由三千二百名海员驾驶的四十四艘水面船只来完成。文章指出，由于战争中伤亡人数增加，罗维特设置了一个统计管理处。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报道机构，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一些机器组成。它对每个飞行人员的寿命作了估计。这种办法是向飞行员证实，当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他有50%的可能回家，有80%的可能活着。后来这种办法具有那样高的效能，以致能预测每个战区每天能有多少飞机供每次作战之用。《幸福》杂志说：这是"把已证实的企业方法应用于战争的超级办法。因为它获得的成就很大，所以在停战后几个月，福特汽车公司就雇用了它的两个主要工作人员。"麦克纳马拉就这样进入了舞台。他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机器中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能干的齿轮，他把企业的方法应用于战争。

在1960年总统选举之后，为总统物色人材的人员向福特汽车公司发出了召唤，要从该公司推荐人材到政府中去。实际上，他们早在竞选中就已有接触。那时密执安州民主党主席尼尔·斯特布勒向肯尼迪的妹夫萨金

① 凯泽（Henry J. Kaiser，1882—），美国企业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组织生产大批舰只、飞机和军用车辆。——译者

特·施赖弗建议，请麦克纳马拉担任为肯尼迪—约翰逊竞选的企业界委员会主席。没有太多的人要求干这个职务。斯特布勒指出，麦克纳马拉是新型自由派企业家的典型，有较广阔的视界，在全国同行中有相当高的威信，过去投民主党的票，而且来自有名望的福特公司。施赖弗这个要猎取大猎物的人，至少赞同从福特公司调人这个主意，但他想，如果我们要用福特的人，就应该用他们的首脑亨利本人。可是这种想法不可能得到亨利的同意。

调用麦克纳马拉的念头暂时消失了。但到12月，负责遴选人员工作的施赖弗再一次去找斯特布勒谈话：

“你的朋友麦克纳马拉是怎样投票的？”

“我想他是投了肯尼迪的票。”

“你能查清楚吗？”

“为什么要去查？”

“因为我们要他参加政府。”

斯特布勒告诫施赖弗说，麦克纳马拉不会接受这个职务。斯特布勒说，他是一个最有责任心的人，现在刚刚接管了一个特意围绕他而建立的体制。这不仅仅是找一个人接替另一个人的问题。

在斯特布勒看来，麦克纳马拉和汽车业的其他高级行政人员是不同的。他们是共和党的坚固堡垒，住在优美的郊区，到同样高雅的乡间俱乐部去。但麦克纳马拉却

222 有点与众不同，他有意住在安阿伯①的学术环境中，远离底特律。他的生活作风是不同的。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他常常支持民主党人，如参议员菲利普·哈特和众议员詹姆斯·奥哈拉。但他没有支持而且明白地讲不支持“肥皂大王”威廉斯州长，他不喜欢威廉斯同劳工组织有密切联系。的确，底特律有些人发觉，麦克纳马拉反对威廉斯的强烈程度是惊人的，简直象是要急切地抓住一个机会去投共和党人的票而成为一个正统派。他对许多问题，如民权问题，采取自由派态度，但对劳工问题（威胁汽车工业的怪物），他的观点却是惊人地强硬，因为劳工方面不断地干预他的成本核算，对汽车工业经常施加压力。麦克纳马拉和他的民主党朋友斯特布勒常常辩论劳动生产率问题，说美国劳工成本太高，我们正在失去竞争的有利条件。麦克纳马拉毕竟是一个统计学家，他认为，甚至在空军里，人力也只是函数中的一个因子，而不起人的作用。

斯特布勒查明麦克纳马拉投的是肯尼迪的票。这时，肯尼迪的人开始同他们在底特律的人员进行核对，看看麦克纳马拉的政治背景是否能起用。他们的头头是约翰·康韦。他是联合汽车工会的政治工作人员，沃尔特·鲁瑟手下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在康韦看来，麦克纳马拉是

---

① 安阿伯（Ann Arbor），是密执安大学所在地。——译者

最合适的人。麦克纳马拉没有参加过同劳工每年一次的薪金谈判(他在另一个部门任职),但他们两人在1959年和1960年密执安州税收制度大改革期间一道密切地工作过,当时民主党和工会力图在密执安州征收州所得税。最初,福特公司和麦克纳马拉都强烈反对这项税收。但在经过委员会六个月的工作之后,麦克纳马拉改变了看法,反对福特公司的正式主张。这个转变使他在汽车业的统治阶层中得不到多少朋友。康韦认为他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容易合作的人,他的头脑是第一流的,智能方面的训练令人敬畏;而且还有,你即使不同意他的意见,仍可以任用他,你甚至可以使他改变想法,因为他原先的主张不是从个人出发的。对麦克纳马拉来说,他最后对工会人员的公正立场有深刻的印象。康韦离开时对麦克纳马拉有强烈的好感,认为他是一个有很大才干的人,准备在这一年晚些时候帮助使他得到审查通过。麦克纳马拉同样对康韦印象深刻。他接受国防部长职务时曾问肯尼迪,能否请康韦担任国防部负责兵员的助理部长。但是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并不喜欢鲁瑟,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脾气,制止康韦担任这个职务,结果同麦克纳马拉有了隔阂。

麦克纳马拉被召到华盛顿会见肯尼迪。肯尼迪立即赏识他,请他担任财政部长或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的职务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向肯尼迪班子中的一个成员

223 问道：财政部长是干什么的？那个人告诉他，财政部长是规定利率的。他回答说："见鬼，我在福特公司对规定利息起的作用比财政部长还大得多。"他对为搞财政而搞财政感到讨厌，而对国防部更有兴趣。在国防部，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他来说，国防部长这个职位更有吸引力。如果需要一个为国家服务的立足点，那末在一个积极有为的总统手下担任国防部长就比担任福特公司的首脑更好。那是一个更好的行使权力的地方，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有更广阔的眼界，特别是对一个在汽车工业里心中始终有些不安的人来说是如此，他一直感到过意不去。

第一次会见进行得很好。麦克纳马拉的清教徒性格促使他问肯尼迪，《勇敢者的素描》是否真的是肯尼迪所写。肯尼迪向他保证说，是他写的。麦克纳马拉对自己所受的训练能否胜任这个职务表示怀疑。肯尼迪回答说，他也没有上过训练总统的学校。麦克纳马拉要求肯尼迪让他自己挑选他手下的人，肯尼迪表示同意。（这对想当海军部长的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猛烈攻击休伯特·汉弗莱缺乏勇敢和爱国精神，以自己的名望来支持肯尼迪的事业。他向记者透露了麦克纳马拉在华盛顿的住址，希望他们去询问麦克纳马拉时，会发现他自己将担任什么职务。于是记者们去问麦克纳马拉："我听说你要提出富兰克林·

罗斯福担任海军部长？”麦克纳马拉回答说：“见鬼，我才不干呢。”记者坚持说：“可是，他是总统的朋友啊。”“我告诉过总统，我要选用我自己的人，我不准备选他。”或许他也不能总是用他自己的人，因为海军部长这个职位后来给了副总统的亲密朋友、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康纳利。）

麦克纳马拉接受了国防部长职位之后，回到底特律要求他的上司亨利·福特第二同意。福特让他走，但对此不是很高兴的。福特请这个善于搞制度和会计工作而不是传统汽车行业的麦克纳马拉来担任总经理后，就围绕着这个有高度专门技能的人建立了一整套生产制度，而这个制度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个人。现在他失去了这个人，但保留了这个制度。与此同时，麦克纳马拉同前几任的国防部长及其他专家进行了谈话。一星期以后，他在华盛顿露面时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在那个短时间里，他掌握了他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选定了主要的工作范围。他对形势的理解，他的克制、锻炼和精力，似乎已经表现得很突出。肯尼迪一帮人正面临着从追求政权转入接管政权通常所遇到的困难，他们对这个新任的部长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当肯尼迪这些人刚刚站到起跑线上，他似乎早已开始奔跑了。他在福特公司锻炼出来的那种本领，使他能够在那个复杂难懂的领域里有这样充分的准备，惊人地掌握着最抽象的数字，使一般

人很快就对他有深刻的印象。

224 麦克纳马拉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敏捷的、有分析力的、有自信心的不平凡的人，他们参与把我们引入越南战争。但是不象华盛顿官僚机构的其他一些人那样，麦克纳马拉一伙人后来会改变主张，帮助领导使这个国家摆脱这场战争的斗争。据说在肯尼迪—约翰逊年代里，拥有最能干的人的三个机构是：邦迪领导的白宫，罗伯特·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和麦克纳马拉领导的国防部。

麦克纳马拉从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要做什么事，需要用什么样的人。当亚莫林斯基领导下的物色人材的一些人在推荐各种人材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到赛勒斯·万斯的纽约律师事务所拜访了万斯，因为万斯就是他们要推荐进入新政府的那种优秀可靠的律师。他问万斯是否愿意到国防部去工作。万斯说好。事实上，他愿意进国防部。“赛勒斯，担任什么职务呢？”“我想想，当一个军种的部长吧。”那人问他：“哪个军种？”“我想是海军。我在大战期间曾在驱逐舰上干过。”这样就决定了将让万斯担任海军部长。麦克纳马拉翻阅了他的履历档案后说：是的，这个人具有很好的资历，但是我属下的各军部长必须有某种行政领导能力，而这个人缺乏这种能力。因此万斯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律总顾问。当政府其他所有的人仍在学习的时候，麦克纳马拉似乎已经懂行了，已经有了信

心。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积极果断的国防部长。这是不会不引起约翰·肯尼迪的注意的。

他们之间继续保持着相互尊敬和融洽的关系。麦克纳马拉是跨越了他们之间的巨大距离进入肯尼迪的社交圈子里为肯尼迪服务的少数人之一。在肯尼迪政府的中期，一个记者在为杂志撰写文章时曾问麦克纳马拉，他有哪些朋友。麦克纳马拉回答说，他有许多朋友。"但是当你想轻松轻松，谈谈天，或者喝杯啤酒的时候，你去找谁呢？"麦克纳马拉回答说："肯尼迪一家人——我喜欢肯尼迪一家人。"他尽管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是离开了底特律。损失也许高达三百万美元。他去华盛顿时，在他的名下只有不到一百万美元的财产。当时有一批股票的购买权在几周内就要到期，亨利·福特善意地建议他等两周再卖出去。但这样就会妨碍他去就职，麦克纳马拉照规定办事，把股票卖了。再说，他对权力的兴趣比对金钱的兴趣总是大得多。当然，掌握权力是为了做有益的事，而不是为掌权而掌权。

他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也是令人羡慕的。他有好父母，好品德，好教育，好成绩。他于1916年出生于旧金山，是罗伯特·J·麦克纳马拉和克拉拉内尔·斯特兰奇的儿子。（斯特兰奇这个姓成了他的姓名中间的名字：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后来批评他的人非常 225

喜欢利用这个名字①。）父亲结婚很晚，五十多岁才生罗伯特。他是旧金山一家皮鞋批发公司的销售经理。父亲是天主教徒，母亲是新教徒，麦克纳马拉本人是新教徒。（后来在林登·约翰逊对麦克纳马拉的宠爱达到顶峰时，总统认为这位国防部长可以当副总统，并把这一想法告诉民主党的政客们。白宫的一个官员说："你们甚至可以想象林登想出这个主意的景象——新教徒将认为他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将认为他是天主教徒。"）

他和他的姊妹年幼的时候，他的家迁到了旧金山湾对岸奥克兰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学校特别好。他们住在安纳利，是一个美好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四十多年以后，他的老师们仍能愉快地记得他：罗伯特总是行为端正，从不性急，你问到他时，他总是把功课准备好了。他备有关于外国的美丽的书籍——如果有更多象他那样的学生就好了。接着，他进了皮德蒙特高中，这是一所很有名声的学校。他在那里获得优秀成绩。他是一个实干的人，从不神经紧张。他参加了各种恰当的俱乐部、荣誉学会，编过校刊，还参加过合唱队。他是一个献身于教会事业的秘密兄弟会的主席。他是一个好学生，但还不是非常突出的；在早期的智力测验中，他超过一般人，很聪明，但不算非常突出。

---

① "斯特兰奇"(Strange)的意思是"奇怪的"。——译者

他从皮德蒙特中学来到伯克利上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时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①正在使它成为一所非凡的大学。麦克纳马拉非常钦佩斯普劳尔。有些朋友认为，他的秘密志愿之一是，如果离开福特后不是去担任政府职务的话，就去伯克利担任大学校长。在伯克利，人们记得，他是一个学习面很广、兴趣很广的学生。他的数学专长开始表现出来。他轻而易举地取得好成绩，所以还有时间看别的书籍和选修别的课。教授们认为他会成为一个教师，因为他似乎不具有人们认为企业界人士所具有的那种干劲和忙于奔走的精神。他似乎学者气味更多一些。那是他的宝贵的年代，夏天去开金矿（没有成就），去爬山（他很快就喜爱爬山）。他以典型的麦克纳马拉作风来学滑雪：找出你的弱点，克服它，不断地努力克服它。人能够用刻苦锻炼、意志和理性来征服一切。

他从伯克利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在那里他立即成为一个杰出的学生。他在会计管理方面的独特能力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开始把这种才能应用到企业管理技术上去。他毕业后回到旧金山湾地区，为普赖斯·沃特豪斯服务。他在1939年开始同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克雷格的旧相识来往。当他被聘请回哈佛商学院教会计学时，他和玛格丽特结了婚。大家都认为她对麦克纳马拉的性

① 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1891—），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译者

格有好影响。朋友们认为，麦克纳马拉具有的好品德有
226 许多来自玛格丽特的宽厚的天性。他在哈佛是一个特别好的教师，教学组织得很好，很能掌握他讲授的课程，对工作热情。但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想尽他的天职，但由于视力不好，海军拒绝接受他。当哈佛商学院投入战争时，他试图参加陆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飞行员的罗伯特·罗维特，停战以后留在欧洲。他患有胃病，吃的主要是婴儿饮食，因而放弃了他的大部分社交生活，这种社交生活是一个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年轻银行家所能够享有的。他转而致力于对腐朽的欧洲进行政治研究，同时还进行军事研究，研究希特勒扩张军备，特别是扩张空军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看到法国内部的腐败，正确地预计到法国的垮台，并觉察到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没有人能加以遏制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大战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空军将会变成决定性因素。他于1940年回到美国。当这个国家其余的人还在沉睡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分参观了美国所有的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场，以便弄清楚美国空军的需要和能力究竟有多大。他对看到的落后情况感到震惊。他预见到美国空军在我国的工业基础上会有巨大的发展前途；美国工业能够显示出它的威力，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这个空军能够对敌人的工业

力量进行大规模的饱和轰炸。他通过银行界的关系，会见了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当时担任海军部副部长的福雷斯特尔派他去见陆军部助理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罗维特很快就在陆军部担任特别助理，继而担任负责空军的助理部长。他自己制定的计划为国家节省了十分宝贵的时间。这个国家在最后进入战争时总算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这些进步是得来不易的。罗维特甚至不能弄清楚全国究竟有多少飞机。罗维特的助手之一查尔斯·桑顿记得，他们在1940年开始工作时，罗维特要求看看空军的计划。他们受到了许多阻挠，但桑顿坚持要看这个空军计划，包括全国的防空计划以及空军的进攻计划。军事人员一再拖延，最后拿出来一个盖满灰尘的纽约市防空计划，显然是用来对付"红色男爵"①而不是对付现代战争中空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击波的。

桑顿是一个立即得到罗维特喜欢的人。他来自得克萨斯州一个小市镇，是一个雄心勃勃、聪明并且具有令人愉快的外向性格的人。他很快成为罗维特的高级副手之一。他们共同决定，为了把美国的工业用于巨大的战争努力，他们首先最需要的是一个庞大的统计机构，以便知道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227

① "红色男爵"(Red Baron)，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空军著名飞行员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的绰号。——译者

们请最合适的单位——哈佛商学院来训练他们所需要的管理统计的官员。这个智囊机构将把恰当的人员和恰当的物资送到恰当的地方去，并且保证做到，飞行人员到达一个基地时，将会有足够的教练员。这是美国从一个多少处于沉睡状态的国家变成超级大国的一个有象征性的步骤（加速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将使这一步骤完成）。我们已经如此强大，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力量，并且谨慎地和精确地显示出我们的强大力量。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以后，当我们已经被公认是超级大国的时候，当肯尼迪要找一个国防部长的时候，他找了一个实际上不是搞生产的人，而是一个超级会计师。他确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他的这个特点比旧式专门搞生产的人的特点更为重要。旧式搞生产的专门人员只懂得推动生产计划的完成，他们凭本能办事，对体系控制学毫无所知。

哈佛大学商学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遴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年轻教师。麦克纳马拉本来就渴望参加军队工作，他同意在这个计划当中担任教师。他表现得如此有效率，如此突出，使桑顿不久就把他从哈佛抽调出来，让他到陆军航空兵去工作。麦克纳马拉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寄托他的精力、干劲和他那奇特的镇静的热情的地方。那些特点将终于成为那时开始出现的关于他的传说的一部分。在这以前，他只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机智、苦干。

现在他有了一个事业和工作领域。桑顿记得，最初那些日子里的年轻的麦克纳马拉和成熟后的麦克纳马拉惊人地相似：同样地守纪律，全神贯注，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桑顿说："我可以肯定，现在他既然在世界银行，对他来说就只有这个银行存在，国防部已经抛在脑后，正如他在国防部时把福特公司抛在脑后一样。而当他在福特公司时，除了他的工作以外，就真的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了。"）

桑顿最初派他去英国解决B-17轰炸机计划的问题，后来又委派他担任陆军航空兵的临时上尉。但在研制B-29轰炸机时，又把他从其他计划中抽出来。研制B-29将成为空军的主要计划。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种远程轰炸机证明是极其重要的，但当时首先需要组织起来加以系统化。其他人都曾从B-29的研制中得到声望，但是据桑顿后来说，干这项工作最出色的是年轻的麦克纳马拉，他把无比复杂的材料加以综合，对计划及其执行作出分析，把大量事实加以整理（这些工作会吓倒那些没有受过那么严格的训练、不那么全神贯注的人），从而确保飞机和飞行员能够在大约同一时间都准备好。这一切 228
都发生在真正的计算机时代到来之前，所以他必须自己动手干这些工作。他是这个计划的智囊，他把整个工作统一起来，把各方面的时间配合好，一切都按预定的时间表进行。这对一个不满三十岁的人来说，是一种令人敬

畏的表现。

麦克纳马拉曾经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哈佛大学去。各种机遇吸引着他，但是他并不追求财物和利润本身。为什么不回哈佛去呢？去讲授心爱的统计学。统计学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设想一下它将来可能取得什么成就，那更是了不得的。坎布里奇的生活方式对他是有吸引力的。他在那里可以享受大学的气氛，可以同研究其他领域的人交谈，而自己仍然可以搞统计学。但是桑顿有另外的想法。他的性格比有点含蓄的麦克纳马拉较为外向，更富有企业家头脑，更富有想象力。在桑顿看来，空军不只是巨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时企业的一部分，而有更深的意义——它是公司企业迅速取得成就的范例。空军白手起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最复杂的工业力量。它在珍珠港事变前的一年训练了二百九十五名飞行员，到事变后的一年就发展到训练了九万六千名飞行员。制造的飞机和培训的机上人员，都获得了相应的增加。那是一项惊人的事业和巨大的成就。它不是由负责战前公司企业的那些没有干劲的老年人完成的，而是由桑顿和罗维特培养的那批有才干的青年人完成的。他们具有年轻人的新思想，掌握现代技术，没有受到过去那些神话、迷信和企业偏见的束缚。

现在桑顿知道，将会出现一个从军事生产回到民用

生产的转变，而企业界将会有许多新的机会。他估量了一下他这个班子：他们无疑是本世纪中一个最有才干的经理人员的班子。这些年轻人在四年之内取得了二十五年的经验。在企业界的正常条件下，他们要达到这样有权势的地位，不到五十来岁是不大可能的，而到了那个年纪他们也就染上了前辈所有的各种旧的偏见和恶习。当时三十岁的桑顿，是年纪最大和资历最高的。这些青年当中没有人同他们过去的工作有很深的关系；如果现在要他们恢复原职，就好象一个将军降为下士一样。

桑顿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把这批人，连同他们的丰富经验、管理才能，一揽子推销出去。这不仅因为作为一帮人价钱可以高一些，而且对桑顿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如果要有所作为，真正能够在企业界里创办一些崭新的惊人的事业，那末，把他们一揽子推销出去，他们成功的机会就要大得多。他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你只有一两个人参加进去，那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会被吞掉；如果要使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有所改观，那就需要一帮人去干。"当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他这个班子时，大家都兴 229
高采烈，只有麦克纳马拉坚决反对，他要回哈佛去。从事工商业的想法并不使他感到激动。但他存在着经济问题：他患有轻度的脊髓灰白质炎，玛格丽特患有更重的病，需要相当大的医疗费用。桑顿说："我说，'罗伯特，你收到医生开来的账单吧？你在哈佛一年只拿两千六百

美元，可不能回哈佛去。'麦克纳马拉想了想，说道：'我想你说得对。'他就加入这一伙了。"

眼前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投靠铁路老板罗伯特·杨，另一个是到福特汽车公司去。桑顿前往会见杨。杨请他担任一项职务，并说他可以带两三个人来。当时福特公司似乎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它需要重新装备和调整。他们知道该公司在财务上没有搞好，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公司在过去二十年当中经营得多么糟糕，从1927年以来，只是在1932年有盈利。当时老福特的老伙伴哈里·贝内特刚被撵走，而由亨利·福特第二亲自管理。他是他们的同辈，二十八岁。他非常需要把他的祖父创立而后来逐渐衰落的公司现代化。桑顿他们给亨利·福特发了一个电报，大意说：有一个聪明的、年轻的经理人员班子，管理过空军，随时可以工作。桑顿很快就进行了联系，八个人到那里去，使亨利·福特得到深刻印象，这笔交易就做成了。福特要桑顿确定他们的薪金，结果定为从一万美元到一万六千美元不等。桑顿使麦克纳马拉获得第二名最高的薪金。这批人得到一个著名的称号，叫做"精明的小伙子"，其成员是：桑顿、麦克纳马拉、阿杰·米勒、伦迪、查尔斯·博斯沃思、约翰·里思、吉姆·赖特、本·戴维斯·米尔斯、威尔伯·安德森和乔治·穆尔。这是年轻的福特作出的一个不寻常的决定。然而，他正处在他的公司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时刻，不得不改弦

更张了。他任用这批非汽车业出身的人，从而打破了这个通常不让外人进入汽车业的界限。这批人所掌握的经验，不是打败仗和打赢仗的经验，而是战争技术方面的经验，并且是成功的战争技术经验。他们的主要经验是，把丰富的事实和数字变成有意义的材料，然后应用到工业生产上去，这样你就能控制一个机构。这些人是美国工业采用新管理艺术的探索人。

在他们看来，福特公司在生产和人事方面的做法几乎是中世纪式的。在老福特和哈里·贝内特的掌握下，公司的政策是非常古板的。买主是个问题，工会是个问题，资金也是个问题。福特制造出一种汽车，买主喜欢不喜欢是他自己的事。该公司没有训练出一个现代化的经理人员班子，而且借不到资金。老亨利·福特的独生子埃德塞尔曾经试图同这些古板的政策作斗争，但是贝内特打击了他。福特家族经过激烈斗争，终于把贝内特撵走了。小亨利继承了福特公司的空架子和名称；其实这个名 230
称也已经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当时通用汽车公司似已采用最新式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小福特迫切需要马上就能起作用的行政管理人员，因为公司每月亏损九百万美元。但是正象他的一个朋友所说的，福特需要两类经理人材。一类是眼下急需的，另一类是为了将来发展的。他雇用这批“精明的小伙子”是着眼于将来，最近的将来，但无论如何总是将来的事情。他很精明，为了万无一失，雇用

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这些人都在五十岁上下，可以立即开始工作，并为他训练汽车行业内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就是后来汽车行业中众所周知的以厄尼·布里奇为首的布里奇—克鲁索—哈德集团。布里奇当时四十九岁，他的大部分成年时期是在通用汽车公司供职，当时他担任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本迪克斯公司的总经理。他带来通用汽车公司另一个已退休的高级行政人员刘易斯·克鲁索，还带来通用汽车公司生产部的前主任德尔马·哈德。

"精明的小伙子"并不知道通用汽车公司这批经理人员的到来。他们的到来有碍于小伙子们对福特公司的接管(桑顿因而不安于位，他在一年半以后辞职，到休斯飞机公司任职，因为他觉得那里有更大的前途。他最后到了李顿实业公司)。但是这套制度为亨利·福特工作得很好。这批年轻人分散在公司的各个部门。(麦克纳马拉和阿杰·米勒负责财务，后者继麦克纳马拉担任福特的总经理。)他们把老福特公司那种陈旧不堪、乱七八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为象通用汽车公司采用的那种新型的、第一流的公司形式，各单位高度地分工负责，公司里各部门自负盈亏，由各单位的经理人员直接负责，遇有差错或失败，就会很快发现。通用汽车公司在战后时期大大地领先了。福特简直不象是个工厂，它的机器极其陈旧，很难重新装配。通用汽车公司虽然曾经改装来从事

军用生产，但是他们有准备，早就在工厂和生产线上建立起一种能够很容易地转入和平生产的体制。因此该公司的雪佛兰牌汽车遥遥领先。本来这种汽车的定价可以低得多，但是如果把价格压低，就会把克莱斯勒牌汽车置于死地，并且会引起国会的愤怒而采取反托拉斯的措施。（尤金·麦卡锡是批评麦克纳马拉最严厉的人之一，他后来曾这样评论他："永远不要从汽车业雇用任何人。他们玩弄的那套欺骗手法，使得任何人在那里都不会干不好。"）因此雪佛兰牌汽车维持着较高的价格，而质量比福特好得多。当时福特同雪佛兰的真正差距反映在旧车市场上：一辆已使用了两年的雪佛兰牌汽车在旧车市场上比同样一辆福特牌汽车售价约高二百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

福特公司两个新的经理班子的主要目标就是消除这个差距。在这方面，布里奇和麦克纳马拉两个班子的才能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必须筹划如何生产一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同雪佛兰牌竞争的汽车，同时攫取足够的利润，能给公司建立迫切需要的厂房提供资金。他们不能通过向银行借款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福特的信用简直不行。因此，他们主要是在汽车内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降低质量以削减成本。福特通常是以车型和速度而著名的。他们继续保持这两个优点，并且设计了一种新型轻便车，在市场上为年轻人所喜爱而获得畅销，尽管这种车

231

的车架不耐久，有时不要多久就损坏了（这也反映在旧车市场的价格上）。福特车的买主似乎知道这种情况，但奇怪的是，他们继续购买福特车。通过这些办法，布里奇获得了购买厂房和使厂房现代化的资金。麦克纳马拉的特殊才华表现在能提高车的质量而没有增加成本，这是用最低成本获致最大效果的无与伦比的措施，这当然是麦克纳马拉的专长。他设置了一项奖励制度，对改进汽车而不增加成本的式样设计师和工程师给予奖金。麦克纳马拉在会议上象讲解圣经的真理那样反复申述的一句话是："增加车的价值而不增加车的成本。"他和布里奇慢慢地弥合了旧车的差价，同时使公司逐步现代化。

在福特公司的这段时期，麦克纳马拉从一个聪明的、刻苦奋斗的青年统计专家发展成为一个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实实在在的麦克纳马拉，既令人尊敬又令人害怕。他奖励在工作中能完美地达到他所定的标准的那些人，而冷酷无情地排斥不能达到他的标准的那些人。

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里同麦克纳马拉一起开车外出，他就会注意到：麦克纳马拉一面开车，一面却专心致志地在想着汽车的前栅；他一心只想着那些便宜的、昂贵的、华丽的或是简朴的汽车前栅。别人乘车疾驶而过去午餐或者回家的时候，麦克纳马拉脑子里却只琢磨着前栅，不注意迎面来的车辆，把他的同伴吓坏了。他的同

伴对他说：罗伯特，注意路上。如果他情绪好，他可能对他的心不在焉表示道歉。麦克纳马拉从不停止前进。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直注意雪佛兰——雪佛兰怎么样了？每年在获得第一辆雪佛兰牌汽车的夜晚，大家聚集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把它逐一地拆成几百个部件，把每个部件放在预定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研究它——没有一个作大脑手术的医生比他们更聚精会神了。每一个人都嘟囔着，捉摸着雪佛兰怎样为了节约一厘钱而制定这一部件或那一部件，并轻声地诅咒着——原来他们是这样搞的！

当桑顿离开福特公司时，人们都很想知道谁将成为这批“精明的小伙子”的头头。不久就清楚地看到，是麦克纳马拉。他代表美国企业一种新型的经理人员，后来一个朋友称他是“美国新的一代公司经理的头头”。他们不是在企业界成长的，不属于企业界，但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化的技术人员。他们引以自豪的是，他们不受过去的束缚，而把最先进的分析方法带到现代企业中去。他们使用计算机来了解顾客的需要，运用统计学来分析成本和生产。在福特公司，使麦克纳马拉获得声望的是，他给这个简直完全混乱的公司建立了一套周密的财务制度。他是非常善于建立制度的，为福特公司的人们带来了预见性。他建立了公司的会计制度，使公司减少了业务上的意外事件。他为降低成本而设立的奖

232

励制度是有鼓励作用的，虽然在批评他的人看来，这个制度有时会弄巧成拙，得奖的人和得奖的建议往往只在短时期内起作用。

由于他简直是在真空的地方前进，因此上升得很快。亨利·福特是个新手，对自己没有信心，特别在财务制度方面是没有把握的。麦克纳马拉使这位忐忑不安、没有把握的福特感到有保证。当发生问题时，麦克纳马拉似乎总是能够提出解决办法——不是含糊的估计，而是确实的答复，是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虽然批评他的人可能怀疑他是否知道公众的喜好和需要，但他对福特这一方面总能提出精确的预测。他不大尊重他周围的许多人；当他拿出大量统计数字来时，这些人声称，汽车业的人一向是采取另一种方法来办这种事的。这些向他提出责难的人后来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他逐渐地在周围全都任用了符合他的标准的人，这些人对面临的问题作出与他同样的反应，并抱有同样的信念，而他则尊重他们的判断。这成了他一生的经验。若干年以后，当怀疑越南战争的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最初往往是那些同他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们同他任用的那种人迥然不同，不是从统计数字或使制度合理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是用他所知道的事实来支持他们的判断，而是说这件事情味道不对头，或者干脆就是感到不对头。他相信自己的材料、统计数字和直觉，而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正如他

过去在福特公司对怀疑他的数字和图表的那些工商业者所采取的态度一样。

在底特律，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同环境不协调的人。汽车业社会是美国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部分。这里的人对事物的吹嘘、夸大比一般美国人还要厉害。底特律象一个小型的得克萨斯州。它是一个关闭的世界：汽车业的人同汽车业的人交谈，汽车工业的传统在汽车业家族中世代相传。福特公司的人生活在福特公司的人当中，通用汽车公司的人生活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人当中。有一个福特公司的郊外俱乐部。也有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郊外俱乐部。在鸡尾酒会上谈论的都是汽车和公司方面的事。在宴会上 233 谈论的也是汽车和公司。他们有一种自信，认为他们所做的事不仅有益于美国，而且本身就是美国。在这种气氛中，麦克纳马拉是唯一的清教徒。他来到这个汽车世界，按照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的标准来对待它。他用地地道道的数学和技术能力来征服这个世界，上升到最高的职位，在公司里赢得了登峰造极的胜利，迫使公司的头头依照他的方式来调整整个制度。麦克纳马拉从来不是属于底特律的人，从来不是真正属于汽车业的人。底特律汽车业的人喜欢互相拍拍肩膀，称兄道弟，而他一向不喜欢拍肩膀，不管是他的肩膀还是人家的肩膀。当别人闹着玩的时候，他却认真地在阅读未加节略的托

因比①的著作。连他任用的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别的负责宣传工作的人都擅长于安排由公司开支的午餐和舒适的旅行，并且惯于用酒席来笼络和欺骗新闻记者。麦克纳马拉却用很高的薪金聘请了一个名叫霍姆斯·布朗的人来负责宣传工作，因为布朗很能干，对汽车工业的知识很丰富，并且消息灵通。布朗对待记者的方式，按照底特律的标准是异常简朴的。麦克纳马拉宁愿住在安阿伯，同知识分子们在一起，其中许多人是自由派和民主党人。在福特公司的行政会议上，亨利·福特有时提到给共和党捐钱，并随即以某种不愉快的口吻说："这里的罗伯特大概会把钱捐给民主党人。"麦克纳马拉看书，买画。每年当经销商带着夫人来厂时，福特公司的头子照例要陪他们到处参观，他的妻子则整天照顾他们的夫人，通常是去看陈列貂皮大衣的时装展览。但是在玛格丽特·麦克纳马拉的带领下，她们却参观密执安大学的回旋加速器。据说当亨利·福特夫妇为女儿举行盛大招待会时，麦克纳马拉夫妇故意避开到别处去。

他不仅在作风上和底特律的人不同，而且有更深刻的不同之处。在从事企业的哲学以及私生活方面，麦克纳马拉是一个清教徒，而汽车业并不是一个适合清教徒

① 托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十卷《历史研究》，有节略的两卷本。——译者

的地方，也不一定适合那些永远抱着下述信念的人，即认为人是具有理智的，人的行为也是有理智的。购买一辆汽车不一定是一种有理智的行为，销售一辆汽车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运输工具来销售。底特律的人能蒙骗有潜在购买力的顾客买下比他所需要的更多的东西（镀铬、硬顶、软顶、气温调节器、话筒、额外的马力）时，总是感到非常高兴。麦克纳马拉却不同，他认为买主应当有理智。在有些同事看来，更为糟糕的是，他认为买主就是有理智的。汽车界基本上认为，购买一辆汽车是出于一时的冲动，麦克纳马拉却坚持说那是一种理智的决定。使麦克纳马拉感到痛心的是同意制造敞篷车，因为这会使一个买主多付二百美元购买一辆耗损得更快的危险的汽车，一想到这点就使他感到恼火。在他离开福特公司之后，他们按照他喜爱的福尔肯式轿车式样造成一种敞篷车。他为此写了一封少见的信给福特公司的一个朋友说："你们一定是发疯了吧。"他一贯主张设计一种简朴而实用的汽车，一种简单而能用的汽车。他认为人们寻求的是效率 234
最高的汽车，而根本不用考虑美观和心理上的感受。他在汽车工业里的反对派争辩说：世界不是这样的，特别是汽车工业不是这样；人们经常想到的是舒适和讲究身分，很早以来就在相互炫耀漂亮的马和马车。

但是麦克纳马拉好象认为某些东西对人们是好的，另一些东西是坏的，而他是一个裁决者，他比别人懂得

多。一个朋友指出，这是一种不露声色的傲慢。他的一个同事认为，他应当担任苏联莫斯科汽车厂生产部的主任，一个实用主义的人为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生产实用的汽车，不必为车上的装饰而操心。另一个人认为，如果他没有去福特公司工作，他仍会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书，也许会更加高兴；他会驾驶一辆大众牌汽车去工作，而对他周围那些驾驶自动上档的宽大轿车的蠢货大肆嘲笑。一个朋友认为，他不仅相信理性，而且喜爱理性，这是他仅有的一种强烈感情。“如果你在会议上触犯了它，你不仅是错了，而且触犯了更严重得多的东西——你破坏了他所意识的理性秩序，就象触犯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表现有一点不合理性，或者是支持错误的主张，他就会改变语调，说得更快，那声音就象机关枪，打断你的讲话：瞧瞧瞧，这里估计错了。瞧，你那里漏掉了。瞧，你忽略了这一点。瞧，因此你错了。瞧瞧瞧。

他在那些会议上就象是一座动力站，经常发号施令，强使一些事情得到通过，并且事先作好准备。他不尊重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后来他在五角大楼时，一个将军在一次会议上对一个问题回答不出来，转而问一个上校，这样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个将军出现在麦克纳马拉身边了。他的力量就是事实，没有人比他掌握得更多，也没有人比他更善于使用事实。他把事实一个接一个地摆出来，摧毁他的对手，虽然有时朋友们会感到他缺少一些什

么东西，有时他的卓越的推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上的。总之，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紧紧地控制着会议，使其他的人感到抬不起头来，受到压抑。对他不怎么友好的人看来，他的会议有时是装样子的。例如，在召集一次会议来讨论一辆汽车的设计、式样、质量和将来的价格时，麦克纳马拉会带着他准备好的材料和已经作出的决定来参加，因此他是带着确定不变的主张来的。他看起来似乎要听从别人的意见，询问别人是怎样考虑的，然而他具有压服人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他也许并不真的要那样做，但是尽管表示要同人商量，整个事情仍是一种虚假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哈佛商学院的做法加上欺骗的手法。

参加会议的人学会了怎样玩弄这个把戏；他们不认真看待麦克纳马拉要他们自由发言的要求。麦克纳马拉在谈问题时，多半是不自觉地通过表达的方式来透露出 235
自己的观点，特别是采取威胁性的口吻来进行总结，逐点加以概括，必要时使用字母从 A 到 J，而他的主张似乎总能在总结中获胜。如果你不同意或者偏离了他的观点，他倾听着，但你几乎能听到他的指头要在桌上敲。如果你同意并提出赞同的证据，他就会热情地响应，用赞许的口气讲话。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逐渐地从中得到他们的教训。与此同时，他逐渐依靠那些象他那样的人，直到他的周围全都是那种人。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能够

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发怒，什么时候快要发作了。每逢他紧张起来，如果你往桌子下面看，可以看到他开始扯起裤腿。这是一种神经质的习惯。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把双手放在桌上的话，他就不能控制它们。他越是坐立不安，他的对手越是刺激他，他的裤腿就会越扯越高，露出毛茸茸的双腿。在厉害的时候，裤腿可能扯到膝盖上，突然间他讲起话来：砰、砰、砰！由于这些原因，你错了！他伸出指头：一，二，三……他的指头常常是不够用的。

尽管他常常为了埃德塞尔牌汽车的问题而受到指责（特别是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指责过他），其实他同这件事简直没有什么关系。搞这种汽车和他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福特公司那帮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老伙伴们，长期以来就想要在汽车式样上同通用汽车公司竞争，要在每个不同的市场上，每个不同的汽车陈列室摆出一种不同的汽车（福特牌、谋克利牌和林肯牌是并在一起经销的，而通用汽车公司的车辆则单独分开来出售）。最后，他们看到了机会：提高谋克利牌的等级，而把埃德塞尔牌汽车下降到中间等级。这个决定是在汽车获得畅销的1955年作出的，但到1958年才投入生产，那是在苏联发射卫星之后，是汽车销路较差的一年，而对别克牌来说则是销路最差的一年。当埃德塞尔牌汽车销路不佳时，刘易斯·克鲁索得了心脏病，由麦克纳马拉总管福特公

司所属各汽车部门。他合并了一些汽车部门，而停止生产埃德塞尔牌汽车。

他在那些年代里，没有去迎合消费者的爱好，而是为降低价格和生产简朴的汽车而奋斗，同福特公司其他的人们进行斗争，并同经销商进行斗争。他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经常要同这些人讨价还价。经销商想要更多的装饰；他们想要在前窗的透风小窗上装上一个曲柄。麦克纳马拉说，好吧，你可以装，那我们就不给汽车镀铬了。有些人力争汽车要宽大一些。汽车更宽一些就可以装硬顶，也就需要更宽的车身。麦克纳马拉倾听着，告诉他们（人们在很久以后仍会记住这些话）："如果你坚持这个要求，我就不给你汽车了。"他身边的人同他谈话时开始把事情加以掩盖，不是真的说谎话，只是为了掩盖某些事物的真相而使他高兴。例如，麦克纳马拉要制造一种自动上档的两速轿车，因此他鼓励设计一种在运行时象三速轿车一样好但成本较低的两速轿车。人们非常怀疑两速 236
轿车能同三速轿车一样好，但最后他得到保证说：行。工程师要这件事行得通是因为麦克纳马拉要它能行得通，因为这样就可以获得奖金和赞许的笑容，但可惜结果还是不行。正如批评麦克纳马拉的人所预料的那样，它耐用，但是不灵便。

然而，他在福特公司干得很好，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他给这个衰落的帝国及时带来了他的一套制度，使这个

帝国站住了脚，没有象本来可能发生的那样衰落和崩溃下去，并且最后再度获得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麦克纳马拉顽强的推动和努力以及他的实用主义观点，而这些东西可能完全适合当时福特公司的需要，同时也是当时该公司所能做到的。他的最大成就是制成福尔肯牌轿车。这是他在福特那些年代里取得功绩的明证。这种汽车是直接从T型汽车发展来的，是实用汽车的典范，是他用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效果的卓越贡献。这种汽车价格低廉，足以同进口的汽车竞争，而且非常宽敞，足以供一家美国人乘坐。麦克纳马拉不想设计某种彻底革新的汽车，而是设计一种标准的、简便的汽车。福尔肯牌虽则没有取得麦克纳马拉所期望的那样大的成就，但还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曾设想第一年生产一百万辆，结果生产了六十万辆。在他行将离开福特公司之前，福尔肯牌汽车获得畅销，这使他得到总经理的职位，并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这个公司。但在他离开之后，后来担任总经理的李·亚科卡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大量生产福尔肯牌这种过于简便的汽车，为公司获得的利润太少，几乎毁了福特公司。亚科卡在汽车行业中正好代表麦克纳马拉的对立面。例如，他在福特公司开始制造赛车，亨利·福特就喜欢这样。亨利·福特在欧洲基本上买下了勒芒这个城市之后，同他的漂亮的新夫人在那里拍了照。购买勒芒是美国力量和工业对欧洲的入侵，是一个

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登陆欧洲的入侵。麦克纳马拉讨厌这一切，讨厌赛车。而现在，公司却用亨利和福特的名字刊登赛车广告。亚科卡创造了马斯坦牌汽车；为美国顾客设计的这种汽车，恰恰是麦克纳马拉所不赞成的。亚科卡这些人看到这种汽车的设计，心里想，我们的设计多么漂亮呀，顾客会买这种车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来造这种汽车。亚科卡喜欢更宽敞、更舒适、更华丽的汽车。在他看来，福尔肯牌汽车会使人们联想到福特公司可能在为通用汽车公司招徕生意，这种汽车先把人们带进汽车消费市场，而当他们逐渐富裕时，就转而购买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在生产中等汽车方面是比较强的。因此亚科卡批评麦克纳马拉，亨利·福特有时也批评麦克纳马拉。亨利现在有了更大的信心，更多地自己作主了。他有时也讲一些话表明他不大喜欢麦克纳马拉的影响。他说，也许汽车业的老手比新来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好一些。

在一个繁华的世界里做一个清教徒是不容易的。麦克纳马拉在福特公司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过着清教徒的生活，而白天却同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竞相追求利润和发展。如果他在大学里呆下去，本来会是一个单纯的人——他在那里教书，生活，把他的学生送入社会，学生们在同他经历过一段时期之后会成长得比较好一些。 237

那时麦克纳马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却不同了，他虽则不怎么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却在一个追求利润、没有节制和实在贪婪的世界里专心致志地追求物质方面的东西。（要掌握权力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而他的权力来自他完成任务、排除困难和获取利润的能力。）

因此，底特律这个凶猛的企业家就是安阿伯的那个有人情味的公民：他阅读该读的书，参加安阿伯当地艺术展览会的开幕式，资助经常需要捐款的当地文化事业。玛格丽特参加了当地的联合国协会。麦克纳马拉和玛格丽特都是一个读书会的成员。这个读书会每月开会一次，每个会员为每次会挑选一本书，然后大家阅读和讨论这本书（在会上饮酒不超过两杯）。麦克纳马拉选的是卡米①的《叛逆》一书。他在学问方面即使在那时还是有点自卑感的。与其说他是一个有哲理的人，不如说他希望成为一个有哲理的人；他希望提高自己。他非常重视自我修养。他读一篇论文是因为这篇论文是应该读的。他在五呎高的书架上摆满了名著。后来他来到华盛顿，他的智慧和力量使首都一些比较抱怀疑态度的人感到他在寻求知识当中有一种自感不足、惊叹不止的性质。麦克

① 阿尔贝·卡米（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叛逆》是他的一部散文，1951年出版。——译者

纳马拉在寻求知识方面是有点自卑感的。他是一个爱读名著的人……麦克纳马拉和玛格丽特都要求提高……他刚刚同巴巴拉·沃德①谈过话，沃德说了这个那个。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希科里山家里举行的学习会上，麦克纳马拉是一个经常出席的十分认真的学生。这种学习会是被人过分吹嘘的"新边疆"文化的一种体现，华而不实，到会的妇女必须是很漂亮的，或是象朗沃思夫人②那样的人。麦克纳马拉比其他人都更认真地参加学习会，总是事先作了准备，经常认真地提出问题。

正如后来在华盛顿那样，这个人在底特律的年代里，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格，每天在下午六时半以后转变。白天，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无情、追求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的福特公司经理人员。晚上，他是一个居住在安阿伯的哲学家。一个是冷酷的，有效率的；另一个是热情的，几乎是爱交际的。他似乎把脑子分成几个部分。深奥的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这些哲学思想不属于范围更广的人生观之内。假使他想坚持企业界的一些好的方面，他

---

① 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 1914—)，英国女作家，曾获美国哈佛等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著有《改变世界的五种思想》、《富国与穷国》等。——译者

② 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夫人（Mrs. 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美国参议员尼古拉斯·朗沃思的夫人，老罗斯福的女儿，在华盛顿社交界颇有名声。——译者

也要在控制福特公司之后去做。首先推翻他们，然后再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如果后来他的自由主义本性和越南战争之间的巨大矛盾使他感到悲伤，那末他的社会良知和大工业的巨大需要之间的差别，同样在以前就曾经
238 给他带来了问题。他的身上好象存在着我们时代的一切矛盾。他在福特公司可能是消费者权利的维护者，憎恨那种让经销商把零件强加给消费者的推销方式（经销商当然是喜爱这种制度的，因为他们能够从中索取高昂的修理费用）。虽然麦克纳马拉鄙视这种制度，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推行了这个制度，因为这样的确能够做到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赚取很大的利润。在那些年代里，经销商除非能把必需数量的零件推销给顾客，否则就不能从底特律获得上等的东西。几年以后，他在五角大楼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图：一面控制军备竞赛，同时成为世界上向外国出售军火的大军火商之一。这样就能减少五角大楼的开支，对预算有利，让国会看来是好事，并使总统眉开眼笑。

麦克纳马拉主张汽车要讲究安全，认为安全是重要的。但在1956年福特牌汽车被雪佛兰牌汽车完全击败之前，他并没有在这方面积极倡导。1956年是福特在三年周期的最后一年，当时雪佛兰厂出了一种畅销的新车，装有V—8式发动机，福特公司则是气息奄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由于福特公司的人们理解到没有什么其

它可供选择的余地，他们决定在安全方面大肆宣传。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这倒是很少有的机会，既忠实于上帝，又能赚取利润。这是麦克纳马拉的想法和决定。他长期以来就关心汽车的安全，要把汽车制造得具有安全的特点。但这也是在最后一分钟作出的、进行挣扎的决定。他们在车上设置了安全鞘，凹进去的驾驶盘，在前端设置防撞垫，并请沃尔特·汤普森负责宣传。宣传的主题是：福特车行驶安全，安全正是你所需要的。这在外行人听来是温和的，但当时是具有很大革新意义的。然而，当汽车生产出来时，雪佛兰车不出人们所料获得巨大成功，而福特车则遭到全盘失败。麦克纳马拉的职位似乎是岌岌可危了。

其后他患了感冒，去佛罗里达州休养。他离开后，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些经理人员以及他们在福特的老朋友们试图对麦克纳马拉发动一次政变。显然，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人员曾拜访亨利，对亨利说：看，这是严重的，你是在毁坏汽车工业，你们简直是在宣传坐汽车就会送命，这种形象真是糟到极点。汽车毕竟是为了享乐的，给人带来舒适。在电视的商业广告节目中，漂亮的年轻男人驾着新车去会见年轻漂亮的妇女。在亨利的同意下，一批老通用汽车公司人员接管了麦克纳马拉的一些职务。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接管。事实上，麦克纳马拉已经接近于被撵出。然而他又死灰复燃、重整旗鼓，但拯救

他的不是福特的宽宏大量或福特的权力机构，而是1957式的福特车和那些颇受鄙视的经销商。那些经销商知道福特公司有一种畅销车（这一年是麦克纳马拉在福特任职期间福特车击败雪佛兰车那两年当中的一年）。他们愿意保留1956年的车，以便得到1957年的车。因此福特决定削减1956年的车，以减少损失。新的广告改为宣传车型、性能，同时带上一点"安全"。麦克纳马拉在福特公司以及后来在国防部所遇到的情况可以说是带有典型
239 性的，即他开始时抱着善良的愿望（掺有某种权宜和一些欺瞒的手法），但结果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而是得到更坏的结果——以致在汽车工业中流传这样一个荒诞的说法：安全是吃不开的；注意安全会有坏的效果，会损害生意。直到十年之后，才有一个名叫拉尔夫·纳德的汽车业以外的人，他用不着掩饰自己的意图，也用不着顾虑在企业界里向上爬的问题，因此可以对汽车业施加全部道义压力，要求在安全方面和有利于消费者方面实行一些改革。

当麦克纳马拉去华盛顿时，他在安阿伯的许多朋友感到他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认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喜爱过汽车工业，他的愿望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满足（他们还认为，玛格丽特总是感到销售汽车有点不体面，有点令人不快）。看来似乎是，他一旦在福特公司得到满足，赢得胜

利，他对汽车业和那些只会谈论汽车的人就感到厌倦。他似乎是遇到了一种挑战，战胜它是为了使自己在企业界获得信誉和尊敬(按照这个想法，如果你在企业界取得成就，能够支付薪金，赚得利润，你就是一个重要人物，你对社会和其他问题的看法就会显得更有份量一些；你就不是一个单纯做好事的人，这种人在现实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他为亨利赚钱，并不是因为他对利润感兴趣，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他同亨利的关系上；亨利要他这样干，因此他的责任就是赚取利润。(1955 年，他应邀要去阿拉巴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他写了一篇演说稿，该稿的最后部分中说，对一个企业家，必须有比单纯赚钱还要高的要求。福特公司的一个负责人看到他的预发稿，坚持要删去这一段。麦克纳马拉感到十分恼火，想取消这次演说。他对朋友们说："真见鬼，我为他们赚的钱比他们过去历来赚的钱还多，他们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事情呢？"但是朋友们告诉他，福特公司的人并没有说他不能这样说，他们只是不同意在预发稿中这样写。因此他去参加了毕业典礼。当他讲到这段有争议的话时，他就放开嗓子大声地讲，为的是使一直到底特律的人都能听到。)

当麦克纳马拉被请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时，他的一些亲密朋友们觉得，如果他接受这个职务，他们的确不会感到奇怪。他们认为他一直在寻求一个更大的、更能使他

满意的舞台。唯一使他留在福特公司的原因是他对亨利的责任感，而不是出自对他自己的责任感。福特公司里，有些人对他的离开感到高兴。他们觉得，福特公司在这个冷酷的、努力工作的、高效率的人的领导下，未免过于
240 沉闷了。在安阿伯，他的读书会中那些愉快的自由派，看到他们那么钦佩而具有人情味的人担任象国防部长那样重要的新职位，也感到高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罗伯特·安吉尔是大学里的社会系主任，麦克纳马拉读书会的成员，对麦克纳马拉思想的开阔一向钦佩。他在那天早晨到班上去没有讲授通常的课程，就激动地谈论起麦克纳马拉来了，说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人担任那么艰巨的任务是多么幸运，说他远远不只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位具有良知和人情味的真正的哲学家。后来，当猪湾事件发生时，安吉尔和其他那些人都感到震惊——麦克纳马拉怎么会卷入这类事情中去？安吉尔是一个很文雅的人，他在同麦克纳马拉的其他一些朋友交谈时，断定那是别人使麦克纳马拉那样干的。其后麦克纳马拉去越南并从那里回来，安吉尔打开电视机，看到麦克纳马拉在谈论把南越人民送到战略村去。安吉尔觉得诧异：罗伯特究竟是怎么搞的？他的话听起来完全不同了。他在安阿伯的朋友们看着他手上拿着一根指向地图的小棍子，明快地讲解丢炸弹的地方。1965 年，安吉尔积极地参加了密执安大学举行的反对战争的第一次课余宣讲会。他和其他一

些朋友总是怀疑，麦克纳马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听说玛格丽特患病了，战争把麦克纳马拉弄得焦头烂额。但是，由于麦克纳马拉没有回来看望过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同他谈论过这些事情。

第十三章
国防部同国务院的矛盾

麦克纳马拉是迫不及待地上台的。他在宣誓就职时，已经事先了解了国防部那些千头万绪的问题，并组织了一些小组和委员会进行研究。他的工作人员不是从大学里，就是从兰德公司①以及其他智囊机构的影子政府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冷静、清醒，是在冷战气氛中成长的，是研究核力量及其均势和部署方面的学者，具有数学般的精确性；他们的职业本身对人道主义者说来往往是不文明的。麦克纳马拉是为这样一位总统掌管国防部的，这位总统所根据的假定是：我们的力量和勇气正在消失，对方有更多的导弹；因此他在竞选时许下诺言要把美国重新发动起来（有人描绘他们老是不穿大衣，不戴帽子，在人群中迅速地又推又挤，不停地前进；肯尼迪有一次对《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个记者罗伯特·伯德很生气，因为伯德曾这样写道，这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所以 241

① 兰德公司(Rand Cooperation)，原为美国空军的兰德计划部，1948年改组为兰德公司，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军事研究机构。——译者

能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寒冷中不穿大衣进行竞选，是因为他穿了保温内衣）。麦克纳马拉原以为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加速生产和消除导弹差距，但他很快就发现并不存在这个差距。大选后不久，麦克纳马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五角大楼的记者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共和党人中间，他们在大选中失败的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导弹差距。有多少惧怕上帝、惧怕俄国的公民为了消除导弹差距和过一种更
242 安全的生活而投了票，结果却发现他们一直是安全的。第二天，肯尼迪打电话给麦克纳马拉，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麦克纳马拉否认他已消除了导弹差距，这使那些亲耳听见那次讲话的五角大楼记者们不敢再相信他的话。

然而确实没有导弹差距，因此麦克纳马拉不是去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使之与俄国人并驾齐驱；而是着手驾驭这支军事力量，对它加以控制，为它建立某种秩序，使它合理化，更重要的是很快就对核武器的使用加以限制。他的时间和精力都贯注在控制、限制核武器并制定合理化的程序上；而越南，这块地平线上的小小乌云，似乎是遥远的、无足轻重和易于对付的，决不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麦克纳马拉在担任国防部长的年代里的许多具有讽刺意味的小事情之一是，一方面提出强烈和坚决的反对核武器的论点，同时又不得不提出相反的论点来为常规部队辩护，以加强常规部队。反正我们总

得有一种武装力量，因此他为常规武器提出了充分而有效的论据。既然他发展了这一理论，即找到了具有新的机动性的常规武器能够做些什么的奥秘，那末，如果参谋长们要求在越南使用常规武器，派遣不配备核武器的美国作战部队，他就不得不同意。他为发展常规武器制定了理论根据，因为他最关心的事情是迅速限制核战争的可能性和控制核武器。

紧接着艾森豪威尔下台后的几年，是一个很不同的时期。参谋长们都是从上届政府继续留任的（那些主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比较平衡地发展的将军们，如李奇微和泰勒，不是被撵走了，就是或多或少地不被重视）。他们相信核战争是一种可以站得住脚的军事格局。的确，整个美国军事部署实质上是以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有些人想摆脱它。如当时哈佛大学的亨利·基辛格，就是作为一个战术核武器理论家（即在毁灭世界和表现软弱之间寻求某种可取办法的理论家）而获得了颇有才智的名气；接着就出现了一阵子对战术核武器的狂热。但在五角大楼的战争计划中，战术核武器似乎一直是个问题：不管哪一方先发射，另一方一定要报复，而且必然是每次都要向战略核武器方面接近一步；谁在小家伙方面落后，谁就会发射大家伙。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一次午餐会上同麦克纳马拉讨论过核武器问题，后来他回忆起这位部长对这个问题

的强烈情绪。麦克纳马拉反对使用战术核武器，他说：
243 “它们都一样，没有区别，一旦你使用了，你就会使用所有其他的东西。你无法加以限制。你将会毁灭欧洲，毁灭一切。”埃尔斯伯格曾听说麦克纳马拉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感情的人，但现在断定这是一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而且是一副有效的姿态，用以掩盖真正的感情。他想那是一种动人的表演，这不仅是因为麦克纳马拉几乎是在感情上厌恶核武器，而且还因为他了解自己处境的危险：即他必须把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因为如果参谋长们或者国会发现他是怎样想的，他的国防部长职位就完蛋了。美国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核武器上，而且我们还把核报复的概念推销给了欧洲人；如果把这位部长的相反态度传出去，那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解除了武装，因而他自然也就当不成部长了。

午餐后不久，曾出席那次午餐会的亚当·亚莫林斯基给埃尔斯伯格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一定不要对任何人提到这次午餐会。这极为重要。不要对任何人谈。决不能散布出去。”埃尔斯伯格同意了，接着埃尔斯伯格提到一个谣传说，总统本人对核武器有同样的想法。亚莫林斯基回答说：“他们的看法毫无不同之处。”熟悉五角大楼情况的一些人们当中盛传着一个故事：肯尼迪是靠不住的，他对核武器的态度迹近软弱；他被带去参观一个战略空军基地，当他看到一个两千万吨级的核弹时，他

的脸色明显地变白。他问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炸弹呢？"这在战略空军圈子里成为一件笑料，因为这不过是一颗标准的核弹，所有的核弹都同这一颗一样。

麦克纳马拉极力想改变西方对于核政策的想法。他不仅着手教育五角大楼，而且也同样教育他的欧洲同事们，为欧洲盟国的国防部门成立了核计划小组，他的欧洲同事们首先是些政客而不是经理，因此感到特别需要依靠他们的将军们。他迫使他们设置一张只有各国的国防部长可以坐在那里的会议桌。不允许事先拟好文件和讲稿，因而他们就不能回过头去问将军们，再由将军们回过头去问校官们。开会时，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人出席会议；此外，整个会议室只有四个工作人员。他讨厌房间里坐满人。起初效果并不太好，因为有麦克纳马拉这样威严的人出席，别人都感到受压。但他逐步地迫使他们一方面对国防形势承担起政治责任，一方面培养了一批熟练的专职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在较低一级对军方在技术问题上的想法逐点提出意见，以免最高层被迫在这些问题上作出盲目的选择。

麦克纳马拉为取得对整个核系统的更大控制而积极努力。他就任时发现核系统的情况十分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军方建立了一种制度，其首要考虑不是控制，而是先想方设法把核武器弄上天，其次才考虑到控制和 244

安全问题。甚至核武器本身的安全装置似乎也是很马虎的。麦克纳马拉断定在发生坠毁事件时十分可能引起核弹爆炸，因此他坚持增加安全装置。他制订了一种会签制度，这最初是一种把所有不是在美国控制下的核武器（即放置在其他国家的核武器）锁起来的技术措施。他从这一思想出发并加以发展，其理由是：我和别人一样喜爱核武器，但是如果我们让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拥有它们……从技术上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就不能使用美国境内的任何核武器；而实际上，如果参谋长们感到通讯联系出了毛病，他们可以根据他们认为最有利的判断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麦克纳马拉从这个理论出发，不允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非盎格鲁—萨克逊人染指核武器，最后终于偷偷地控制美国的核武器。如果军方确切知道麦克纳马拉的意图的话——当然他们是意识到的，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阻止他了。他们到最后才进行了斗争，并且坚决地斗争。结果，战场司令的权力被削弱了。军方认为，延误反应时机的危险性，远比让一个疯子接管基地的危险性要大得多。

麦克纳马拉感到非常孤立，他在前进的过程中，被敌对势力所包围。他在国会里没有追随者，但觉得反对他的人却有追随者。因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对总统十分忠诚，现在是加倍忠诚了。总统是他唯一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是

他的力量的源泉。可是如果总统对他有了怀疑，那么在这个他正在进行战斗的残酷的世界里，他就失去了力量。他的处境是不利的。他正在为人类的最高利益而斗争，想方设法反对官僚政治，掩盖他自己，但他所作的一切让步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他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过错。美国正开始脱离一个旧时期，在那个时期里，一方面由于冷战的缘故，政治上和文化上极为僵化（它实际上已成为木乃伊），另一方面科技力量又有了很大的跃进。随着武器日益向尖端方面发展，以及武器价格的剧增，使得五角大楼的权力也有了相应的飞跃。它同国会的关系一直是巩固的，但过去主要是从爱国主义和一些比较小的分摊油水措施出发，现在由于一种新的效忠关系而加强了，其基础是把钜额的国防订货巧妙地分配给那些最 245
有权势的委员会主席的后台。

他能在多少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呢？譬如，他如果试图改变美国在化学和细菌战上的想法，参议员拉塞尔一定会召开意见听取会。你要在一切问题上争吵吗？在撤销任何人都不需要的B—70轰炸机的问题上，他几乎造成了一场宪法上的风波，国会通过了拨款，而行政部门不想花费它。他不断地同参谋长们争吵，并衡量每个争论点究竟有多大价值。麦克纳马拉为了在禁试条约上同参谋长们斗出个结果来，竟同他们开会争论了一个星期

之久。他使他们答应一旦他驳倒了一个论点，他们就不得再回到这个论点上来，因为他觉得同参谋长们争吵就象同丈母娘争吵一样，你在一个问题上取胜了并准备进行下一个时，却发现他们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了。因此在一个星期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他对他们所持的各种反对意见通盘争论了一番，并逐点地把他们驳倒。最后他取得了胜利。他认为这次胜利是把将军们转变过来了。然而他的助手们却不这样想。他们觉得他曾经明白地表示过禁试条约对他是何等重要，正如一个助手后来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个要末顺从他，要末辞职的问题。可是有多少问题值得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呢？特别是其中有许多争吵在传统上并不是他份内的事。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本应由国务卿而不是国防部长来进行斗争的。

然而，他是当世界正处在变化的时候就任的。苏联的威胁不一样了。共产党不再是铁板一块了。（例如，参谋长们对中苏分歧的承认远比华盛顿大多数人要慢得多，最后当俄国人在中国边境上集结了大量部队时他们才相信。）看来他周围的官僚机构常常是更为顽固，而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那些人要求给北约组织更多的导弹，要求拥有更多的部队和更大的轰炸机。他好象是处在历史上的一个严峻时刻，他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及某些神话的破灭，并为纠正它们作出很大的努力，然而最终似乎还

是无能为力。甚至他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记录也是不成功的。那些人到底是缓和了军备竞赛，象他们本应做到的那样，还是促使苏联进入发展导弹而相互升级的另一个回合呢？

在那个时期里，他在华盛顿的成绩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是一个吃得开的人物，一个品质出色的人。一个华而不实的政府是很强调风格的，麦克纳马拉在这方面很在行。他在福特公司人员中一直是讲究风格的，不仅看他们说些什么，而且看他们是怎样说的。他在宴会上是受人欢迎的；他谈论核弹头而不使妇女们讨厌，这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他是约翰·肯尼迪夫妇的朋友，又是罗伯特·肯尼迪夫妇的朋友。他依然生活得很简朴，多半是自己开汽车，一辆用旧了的老福特汽车。在需要愉快的场合，他是愉快的；在需要清醒的场合，他是清醒的。如果说他在国会里树立了敌人，那么，他们至少是正好合适的敌人——如文森、斯坦尼斯、里弗斯等——一些在华盛顿的社交界和文化界几乎不受尊敬的人。他在国会作证时颇引人注意，他胸有成竹、态度严肃、不苟言笑。麦克纳马拉在国会作证时态度平和，但他坚持己见，应对如流。这是国会所不喜欢的。他也许有点太机灵了，当南方人说某人机灵时，他们未必是赞誉。他的副手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劝过他，建议他最好到国会去走走，偶

246

尔喝上几杯，同那些议员们熟悉熟悉，使你自己和你的意图有点人情味。在政府机构里不请客喝酒就办不了事。但麦克纳马拉一点都不沾这些东西。他已经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如果他做好了工作，并且准确地和机智地提出实际情况，那么议员们也会接受他的准确性而完成他们的任务，因此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做说教的工作。他有他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认识不到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他不认为用喝酒的办法就可以说服他们。也许他是对的。

就是他的敌人也有助于提高他的声誉；他们是正好合适的敌人——将军们和国会的保守派。尽管人们怀疑他对某些政治问题的敏感性，甚至他的自由派的批评者也发现他有某些令人敬佩之处，如他能适应变化，尊重证据，不固守成见。因此当肯尼迪政府向前进的时候，他似乎也开始朝着一个最优秀的国防部长——特别是为一个更明智的、政治本能更好的和更老练的美国总统而工作的国防部长——的前程迈进。肯尼迪—麦克纳马拉搭配得似乎很协调。总统能够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和怀疑眼光来考虑问题，麦克纳马拉有真正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处理并解决复杂的国防问题的本事，这些问题的错综复杂程度几乎象数学一样；这两方面的特长配合得很好。肯尼迪了解麦克纳马拉的缺陷；尽管他才华出众，但不明智。如果肯尼迪要他就某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麦克纳马拉

会勤恳地工作，然后回来交出答案。如果肯尼迪表示这不是他所要的答案，麦克纳马拉马上不见了，再次回来时就带来了恰好合适的答案。麦克纳马拉一直是重视成本的，1962 年他急忙跑进白宫，准备关闭某些海军基地，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预算。全部数字一应俱全。关闭这个基地能节省这么多美元。关闭那一个又节省那么多美元。都陈旧了，都是多余的了。每个基地都计算到几角几分钱。肯尼迪打断了他说，罗伯特，你要关掉布鲁克林海军 247
船厂，那里的两万六千人就要失业，就要上街去，要求领取失业救济金，而你最好把这个也计算在成本之内。那将使我们付出一些代价，他们将对我万分恼火，因此我们最好也把这个计算在内。这样肯尼迪制止了那次关闭。但 1964 年在约翰逊领导下，麦克纳马拉立即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约翰逊是喜欢节约的，特别是小地方的节约，关掉电灯之类的节约，他对这个意见较感兴趣。直到肯尼思·奥唐奈指出那些船厂总是在一些重要的众议员如约翰·麦考马克和约翰·鲁尼的选区之内的，虽然节省了几百万美元，但可能失掉程序委员会。肯尼思·奥唐奈是政府内部经常批评麦克纳马拉的人们之一，奥唐奈后来同罗伯特·肯尼迪大声争吵说，肯尼迪时期的错误大多是麦克纳马拉搞出来的。

当麦克纳马拉开始负责越南问题时，文官和军方在

对越南问题的估计上的分歧日益增长。麦克纳马拉，一个领导军事部门的文职官员，现在势将成为一个关键人物、这场争论的实际仲裁者、一个具有文官立场而对军方压力和军方估计负责的人(一个朋友后来指出，麦克纳马拉关于战争方面的一个难题是，虽然他以为军方对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一无所知，但他确信他们在打仗上是颇为内行的)。当他接管越南问题时，一反在许多别的问题上的做法没有让国防部里那些有才干的青年文官，那些“精明的小伙子”来帮助他。过去他对他们是放手的，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独立的情报来源，用以对抗正规的情报体系。相反他接管时就象是个主管科长一样，后来由约翰·麦克诺顿作他的助理。(在 1965 年他终于派了第一个“精明的小伙子”到越南担任美军司令部的文职官员。这个青年的悲观态度同西贡的乐观态度针锋相对，并对麦克纳马拉本人所抱的怀疑态度也有重要影响。这个青年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由于麦克纳马拉把这些青年都放到国防部其他方面去了，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前进；而在这个领域里要对付这些问题，他所具备的条件是最差的，他的素养也不适用了。他是一个数量专家，力图用数量来解释不能用数量解释的问题。过去曾经那样有效地为他服务的人，即那些只忠于他和自己的专业并敢于向现有事实和成见进行挑战的那些文官不在他身边了。麦克纳马拉没有足以同军方情报竞争的独自的情报；

当然他有新闻报道，但新闻记者不是严肃的人们，即使在五角大楼，他们也好象生来就是冤家对头一样，总是站在对立面。

因此，麦克纳马拉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在对付越南问题。他没有依靠他的文官的原因很复杂。第一，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参谋长们对于使用体系分析局①已经有些神经紧张，他们颇为准确地意识到这样将使这个机构实际上成为一个能作出独立判断的文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科技方面，在数学和军事装备方面使用体系分析局是一回事；而在判断战争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实际情况方面同参谋长们进行较量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会立即招致斯坦尼斯和里弗斯对麦克纳马拉的攻击。第二，尽管在他的领域里（即管理方面的决策、理性论和成本核算），他不怎么尊重军方，但他的确认为，别的且不论，他们在一个方面是专家，那就是他们知道如何打仗；因此没有人会在军方的专业领域里进行干预，这首先是由于那是很棘手的，其次是因为这同他们主张的专业化思想有矛盾。他还有一种近似狂妄的信心，即相信他掌握得了。也许，军方毕竟并不是全都那么好，但他们能提供原始资料，而麦克纳马拉是精通资料的，他会仔细加以研究，从杂乱中提炼出真理。因此在那几年里，麦克

248

① 体系分析局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一个直属单位，由一个助理国防部长负责。——译者

纳马拉的形象；在办公桌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在西贡也好，都是在一页一页地阅读资料，每一个排的、每一个班的资料，研究所有那些统计数字。全是胡说八道。他同新闻记者谈论并告诉他们所有的指数都是正确的。他大错而特错了。他得到的完全是错误的指数，在亚洲政治革命中去寻找同美国生产指数类似的东西。

在他的越南之行中，可以看出一些典型的东西。他代表蓬勃发展的美国科技成就，他在越南匆匆忙忙地巡视，寻找他想看的东西，而他从未看到，也未嗅到，也未感觉到就在他眼前的那些真实情况。他深受他的成见积习的束缚，他完全无法使他的标准和要求适应越南的现实，他本人如此，他代表的国家也是如此。关于战争的任何真实数据和真实估计都会立即揭示这场战争的破产，因此麦克纳马拉的视察旅行成了一个无意中精心设置的大迷宫中的一部分，用来把一个绝望的骗局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那些视察旅行看来都是愚蠢和绝望的表现，特别是如果麦克纳马拉代表这个社会的最优秀的人的话。现在人们对他记忆犹新：麦克纳马拉在1962年去视察“日出行动计划”，即第一个重新定居的村庄，村民们明显地充满了辛酸和仇恨，可以看得出他们准备杀掉第一个能抓到手的西方人；但麦克纳马拉没有理解这一点，而是天真地抛出他的问题：这样有多少？那样有多少？他们愉快吗？麦克纳马拉在这些精心安排的访问当中，总是扮演

着这样的角色，哈金斯将军替他安排这些旅行，而且一直随侍在侧，以保证旅行的成功。几年后，当麦克纳马拉转而反对这场战争时，他同约翰·范谈过话，范是因抗议哈金斯政策而脱离了陆军的那个中校，他曾通过统计数字指出战争进行得如何糟。麦克纳马拉问为什么他受骗了，范直爽地告诉他那是他自己的过失，他应该坚持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视察，而不应该让大官陪着他旅行，同时要用一些时间去发现谁是掌握正确情报的人，并学会如何同他们谈话。

哈金斯的汇报当然都是很久以前就策划好了的；那实际上是一种洗脑工作，但这种洗脑工作被那些耸人听闻的陪衬弄得格外有效和扣人心弦。偶尔群炮齐发。摸摸一支缴获的步枪，看看一个俘获的倔强的越共。在那些旅行中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对那个国家的真实了解，而是认识上的幻觉。麦克纳马拉所得到的是在华盛顿也可以得到的同样的情报。现在它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出来，以致使他觉得他了解越南了。后来，他的新闻官阿瑟·西尔威斯特对记者们说，他曾飞行那么多哩，视察那么多个越南军部，那么多省、县的指挥部，接见了那么多不同级别的军官。记者们坐在那里记了下来，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都合乎麦克纳马拉对越南的看法。越南的假象证明了麦克纳马拉的先入之见和他设想的各种细节。

有一次视察似乎最能说明问题：麦克纳马拉是怎样

设法使这场战争符合他的标准和定义的。1965 年他到岘港去检查海军陆战队的进展。越南第一军区的一个海军陆战队上校用沙盘示出地形并耐心地作汇报：友方形势，敌方形势，主要问题。麦克纳马拉注视着，实际上并没有听进去，他双手交叉着，微微皱着眉头，最后打断了汇报。麦克纳马拉说："嗯，让我看看，如果我想的不错的话，这就是你认为的形势"，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讲出自己的见解，全是数字和统计。这个上校很机灵，对他的意图立刻心领神会，就象一个人破了密码一样，连站的位置都没有变就继续汇报下去，只是改换了名词，一切都数字化了，一切都加上了数字和百分比；增加的百分比，下降的百分比，如此丑恶的表演，活象一场闹剧。《纽约时报》的杰克·雷蒙德笑出来，因而他不得不离开那个帐篷。当天晚些时候雷蒙德去看麦克纳马拉，并评论了岘港形势如何恶劣，但是麦克纳马拉对越共不感兴趣，他想谈论那个上校，他喜欢他，那个上校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说："那个上校是我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军官中的一个。"

他就这样创造了第一手的基本认识，他将据此作出判断和建议。那全是以那些可怕的旅行为依据的，不愿采纳他的文职助手对军方报告的异议，不愿修订他自己的标准和规范。在他一生中重要的中年时期里，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声望寄托在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和希望上，使自己在越南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并且大大地限制了自己

未来的行动。这在他的一生中不是怎么愉快的一章，他没有很好地为自己和为国家服务；他是一个笨蛋，除此之外，找不到更厚道和更雅致的字眼了。 250

到1963年春季，看来战争暂时停顿下来了。越南共和国军停止了主动行动。华盛顿的某些文职官员对军方从西贡发来的报告越来越怀疑。而哈里曼，这个在国务院势力日益增长的人物，告诉罗杰·希尔斯曼不要过多依靠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报告。他可以依靠中央情报局和新闻报道作为自己判断的基础，他也可以利用军方的某些事实而不用他们的结论。

在政治方面，西贡政府似乎仍停滞不前，不能够也不愿意同城市里怨声载道的民众接近，而且也不能够反击越共在农村时而隐蔽、时而凶猛的挑衅。在春季，还没有明显分歧的迹象。然而在1963年5月初，佛教徒在越南的故都顺化庆祝释迦牟尼的诞辰，政府军队叫他们解散。当他们拒绝散开时，装甲车就开了火，打死九个人。政府不能接近民众，不能承认错误，而把这整个事件归咎于越共。这样，那旷日持久的佛教徒危机就开始了，它最终导致了吴庭艳政府的垮台。它演变成一次全面的政治危机，因为那些有战斗性、训练有素的青年佛教领袖，在吴庭艳政府统治下，第一次给民众指出一条成为潜在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出路。这些佛教领袖对新政治势力是敏感

的，对二十年来革命战争带来的心理上和立场上的变化是很了解的。因为受美国人保护的吴庭艳和他的政府，就象他们之前的法国人一样，代表着外国货币、外国语言、外国风格，而吴庭艳军队的军官们也沾染了西方的习气。现在由于佛教徒的兴起，第一次出现了越南人担任领袖的前景，这样的领袖同美国人没有联系，不拿他们的钱和奖学金或者拜访他们的大使。这样的领袖是真正有才华的、土生土长的和民族主义的，而且决不听命于美国大使馆。这对民众的影响是强烈的：佛教徒成了各种各样广泛的反对派的先锋，而且由于他们势力强大，相形之下，这个僵硬、顽固、狭隘的政府就显得很愚蠢。在佛教徒反抗的压力下，吴庭艳政权所有的裂痕、所有的缺点、所有的狭隘性都暴露无遗；同样，美国人的无能也暴露无遗，美国人不能影响这个政权，尽管他们同它有很深的关系。眼看着这个政权在历时五个月的危机中倒台，就如同眼看
251 着它自杀一样。这证明了它的反对者是先知，它的支持者是笨蛋。

1963年5月末，西贡美国新闻处处长、国家工作委员会①的成员约翰·梅克林，同两个新闻记者坐在一起谈话。梅克林在担任这个职务以前是《时代》杂志的一个有

① 国家工作委员会(Country Team)，是由美国大使、美国驻当地其他机构的负责人、三军武官和其他重要官员组成的机构。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设有这种机构。——译者

经验的记者。他因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受到鼓舞而接受了这个职务。他满腔热情地到了西贡，下车伊始就要大家给越共另起一个名称，指明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匪徒，而不是正统的游击队。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做法，只是它太短命了。随着佛教徒危机逐步发展成为一次全面的外交政策危机，梅克林自己的怀疑也日益增加。他终于变成一个重要的反对派。但是现在，当他同那两个更年轻的记者坐在一起的时候，他正在施展他那新闻记者的故伎来预测事态的发展。

梅克林说，随着事态压力的增长，要注意的人不是瑙尔汀和哈金斯；他们太老，时代观太陈旧，他们过去公开和私下关于吴庭艳政权的言论太过头了，总之他们过于为这些东西所束缚。不，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个副职，使团副团长威廉·特鲁哈特和哈金斯的新参谋长理查德·史迪威准将。梅克林说，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他们都是四十出头的人，似乎都有远大前程。但现行政策显然已遭到抨击，实际上是濒于失败。而随着压力的增加，他们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上司，也许还反对现有的老框框。梅克林的论点有一定的根据，乍看起来，史迪威更有可能是接替的人选。别的姑且不论，没有人认为哈金斯是有才华的，但史迪威却以才华知名，他是陆军知识分子特殊圈子中的一员，圆滑、持重、老练，是一个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是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主持希腊军事援助时手下

的一名参谋。史迪威很博学，常常提到一些他刚读过的书名，一些同他熟识和刚同他一起吃过饭的作家、记者和发行人的名字。他善于做汇报，熟练、灵巧，不随便谈论死亡的人数，他很熟悉有关叛乱问题的词汇，几乎是太熟悉了。他了解各种背景和势力，因而在西贡很快就传开了：找史迪威去，史迪威最了解情况。一个吃香的将军走运了，哈金斯走后可以松口气了，总之对他寄以莫大希望。他们的希望有几分实现了，史迪威的领章上添了第二颗星和第三颗星，步步高升，但是他从未向哈金斯的路线挑战。这可能是军队等级制度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向上司挑战是不可想象的。他成为哈金斯的刀斧手，他亲自砍掉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上校的报告，他压制所有的不同观点，虽然他不属于情报机构，但所有的情报他都要过目，并加以挑剔。

252 特鲁哈特，从表面上看，比起史迪威来似乎更没有可能成为同这条路线决裂的候选人。这不仅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忠实地追随官方路线，而且他还是瑙尔汀的人，他是应大使的私人要求调到西贡来的。他两人是老朋友，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瑙尔汀是特鲁哈特两个孩子的教父。特鲁哈特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都似乎比瑙尔汀还瑙尔汀，乍看起来有点更顽固。他是同一所弗吉尼亚州贵族式的外交学院培养出来的。他早些时候在西贡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们要求他对驱逐《新闻周刊》记者弗朗索

瓦·萨利提出抗议，而他却回答说，那不是一个大问题，萨利不过是一个“黑脚丫子”（一个形容在阿尔及利亚的下层法国人的名称，就象叫美国人“红脖子”一样）。

可是在1963年6月末，心力交瘁的瑙尔汀不顾日益严重的佛教徒危机，长期地离职度假去了。瑙尔汀乘船去游览爱琴海，在那里很难同他联系上（这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觉得特鲁哈特没有想一切办法同他联系，因此是对他不忠诚；别人觉得曾想尽了办法，可是他使得别人无法同他联系上）。虽然危机继续发展，特鲁哈特还是紧跟瑙尔汀的路线。可是过了一些时候，由于吴庭艳拒绝谈判和满足佛教徒的任何要求，由于反抗加强并日益向社会纵深发展，由于军方不安的加深，以及由于吴庭艳政府继续蒙蔽美国人，使美国人不了解它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特鲁哈特扩大了使馆报告的视野。特鲁哈特同政治官员梅尔·曼福尔一起，开始同反对派和佛教徒交谈，大使馆官员们更多地接触了社会，报告的调子改变了。从盲目支持转变为在估计上持怀疑、冷静和打破框框的态度。怀疑增加了，问题提出来了。大使馆开始怀疑吴庭艳政府是否能控制佛教徒危机，并作了报告，指出佛教徒已成为各种反对意见的核心，政府已完全孤立。它还对吴庭儒是否神志清醒发生怀疑。怀疑是对的，吴庭儒在其最后几年里鸦片抽得越来越多了。大使馆发现，吴庭艳完全变成他的家族的俘虏。可怕的是，大

使馆在那次危机中所听到的关于吴庭艳政权的流言蜚语竟然都是真实的。

特鲁哈特的转变是具有关键性的，他的报告与其说是反对吴庭艳的（反对派后来就是这样指责他），不如说是分析性的和客观的，不再盲目地支持吴庭艳；它打开了怀疑的闸门。美国人从西贡发出的报告第一次可以同美国当年从中国发出的外交报告相比拟。五个月以前，只有美国新闻记者对这场战争及其前景持悲观态度，现在在西贡的国务院人员悲观了，中央情报局悲观了，搞战略村的人员悲观了，他们同新闻记者们一样都悲观了。只有军方继续忠于这条乐观主义路线。这些对西贡的怀疑和分歧在华盛顿得到了反映，在那里肯尼迪面临着一个有分歧的政府机构。1963 年初，他对哈里曼一伙的不同意见似乎是持鼓励态度的，即使不是完全站在这伙人一边，最低也是逐渐地向它的方向靠拢，但靠拢得很缓慢，力图避免他的政府公开分裂，并防止把军方推到国会右翼一边去。

253

到 1963 年夏，肯尼迪是一个大不一样的总统了，对他自己的信心和能力的感觉大不相同了，他对自己更有把握了，他对在世界许多地区动辄用武的传统观念更加怀疑了。他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这件事使他早期在猪湾事件中失去的威信全都得到恢复。他冷静地掌握

自己，压服了俄国人。尽管象迪安·艾奇逊这样一些人认为他还不够强硬，但全国又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和幕僚把这一切视为他的黄金时期，全国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想的。只有激进左翼认为这是小题大作，而极右翼则认为是大题小作。所以现在，采取更新的、更温和和更有理性的做法是可能的。古巴导弹危机造成了一个关于核死亡的如此真实的前景，这个危机当时曾使美苏双方所宣传的、所用以威胁对方的前景几乎都成为现实，这样就产生了真正解冻的可能，而这正是肯尼迪所追求的。他为寻求平衡和建立信心而发表的演说和提出的主张，在1961年是不可能的，现在则可能了。6月10日，他在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也许是他执政以来最好的演说。他不仅呼吁缓和紧张局势，并对控制和限制毁灭性武器作出更大的努力，而更重要的是要求美国人调整他们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某些态度。

这是一篇带有里程碑性质的演说，是经过大约十七年的时间之后才出现的一篇演说。过去十七年来美国政府所信奉的路线一直是：冷战是由于苏联的态度，而且只是苏联的态度和行动所引起的，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无辜的配角罢了。有人认为这是肯尼迪政府第二阶段的开始；到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为止是第一阶段。由于那次行动，他似乎从他头两年的不安定中解脱了出来，而今他对自己更有信心了，对全国对他的反应更有信心了，他就是

总统。全国都信任他，威信空前提高；他就可以开始（当然是缓慢地）对政府内冻结了如此之久的一些观点和态度进行挑战了。人们认为，他执政的第二阶段有这样一些标志：他力求同苏联达成一项禁试条约；他在演说中提到冷战时，调子更为温和、更为宽容；对越南问题的怀疑增加了；他对一个历史时期行将结束有了全面的和日益深刻的认识；他要对出现的变化加以因势利导，既不驱之太快，跑在变化的前面，也不行之太慢，使认识落后于变化的形势。因为他有一个感觉，并曾告诉他的一些助手，即整个国家走在华盛顿的前面，华盛顿现在比全国更多地生活在冷战之中；这个国家并不要战争，不想同苏联保持一种持续的核紧张局势。肯尼迪开始感到这一切，并在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全国旅行中，不出所料地发现那是真实的。因此，在1963年夏，肯尼迪便推动达成一项禁试条约，并谋求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越来越被越南这个次要问题弄得坐卧不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现在已成了次要的问题。而越南问题却很棘手，正如他设想的那样，现在它老是纠缠不休。

254

肯尼迪面对着一个意见分歧的政府，他对周围的人表示，他对使用武力感到不安，对报喜的报告有怀疑。他也对改变做法的问题，对抛弃吴庭艳的问题感到不安。他似乎与怀疑者的步伐协调。越来越悲观的白宫幕僚人员正在寻求一项代替的政策，他们发现自己受到肯尼迪

的鼓励，但不是太大的鼓励。一切仍然是在小心谨慎地进行着；他们觉得，肯尼迪想推动政府机构快一点前进，而其中的关键人物显然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仍在继续作他的越南之行，这种视察旅行越来越频繁了，而每次回来时他都是极其乐观的。越南战争开始被看成是麦克纳马拉的战争，这一点他当时并不在意。政府里某些人反对他的那些视察旅行。罗杰·希尔斯曼被提升为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以接替即将被提升为副国务卿的哈里曼。他向总统抱怨说，麦克纳马拉每次去越南以后都进行大量宣传，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关心，并突出美国在越南承担义务的事实。当时各大广播公司在越南还没有常驻记者，因此麦克纳马拉的越南之行带去了庞大的电视记者组，扩大了新闻报道。肯尼迪回答说，是的，他知道那是个问题，但是他有困难，要使参谋长们跟着一道走的唯一办法就是使麦克纳马拉也跟着一道走，而要使麦克纳马拉跟着一道走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去进行视察。

希尔斯曼态度的变化和地位的升迁是总统对越南问题感到厌烦和失望的一个标志。在肯尼迪年代里，不论是在耀武扬威还是矛盾重重的时候，希尔斯曼都是一员干将。他是作为一个镇压叛乱和对越南承担义务的热情拥护者起家的。由于鲍尔斯的离去和史蒂文森的失势，255
他同时还是政府里主张改变对华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他

仍然对反游击战保持着热情，但是当那些令人沮丧的消息由西贡传来时，他开始怀疑吴庭艳政权是否有能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战争，并对现行政策以及使用更大的武力深为疑虑。

希尔斯曼在政府机构里升得很快；肯尼迪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敢于向军方挑战。有一次挑战特别令人不能忘怀。在关于老挝问题最初的几次紧急会议上，有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为了向总统汇报来到白宫，但在白宫大门口受到一次小小的侮辱。因为那里的警察没有得到关于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来参加会议的通知，不让他的助手们进门，于是他就不得不自己提着图表和公文包很吃力地走进去。更大的丢脸的事还在后面。兰尼兹尔开始汇报，形势图挂好了，拿着示意棍站好了姿势，首先是谈大的形势：这是湄公河流域。示意棍的尖儿落在地图上。希尔斯曼注视着，发现了点问题，示意棍的尖儿不是在湄公河流域上而是在长江流域上。希尔斯曼站起来，走上讲台，拿过示意棍。他说："将军，你错了，湄公河流域是在这里。"把示意棍换了一下位置。但兰尼兹尔受的侮辱还没有就此完结。希尔斯曼没有坐下来而是接着进行汇报，指出了这个流域的一些主要特点，直到最后总统说："希尔斯曼先生，你让我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里听听军方的汇报好吗？……"后来朋友们就这件事取笑希尔斯曼时，他坚持说："可是，他把河的

位置搞错了嘛……”

正是这种大胆的作风，也就是想把军方整一下的念头，使肯尼迪感到高兴。在希尔斯曼被提升为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司司长时，腊斯克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向军方的观点挑战。他回到办公室后，接到白宫打来的一个电话。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祝贺他的高升，并指出国务卿可能已经告诉他不要去惹军方，但他不必理会最后那点劝告；他被提升正是因为他整了一下军方，他应继续向他们挑战。他正是这样做的，先是在情报和研究司，后来在他担任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他的升迁和哈里曼的升迁似乎同肯尼迪的怀疑是步调一致的。肯尼迪经常在早晨找希尔斯曼，抱怨军方一再企图对战争作出他们自己的乐观估计（肯尼迪的宣传计划是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直到最后肯尼迪命令希尔斯曼拟订了一份国家安全文件，指出任何将官非经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书面批准不得前往越南。

1963年夏，政府机构内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战争的认识和解释上。在目标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争论，虽然某些文官内心对它的怀疑日益增加。分歧是在更低的水平上。如果很快就能达到目标，为什么还要对它提出异议呢？如果军方是对的，如果战争是在取得胜利，那么文职官员所报告的问题就是过甚其词了。那些谨小慎微的文官，过分地夸大了越南知识分子中间一些小的争吵。 256

于是在夏季，希尔斯曼（那时仍在情报和研究司）开始极为频繁地向军方的估计挑战，这也同样是对麦克纳马拉的攻击，因为麦克纳马拉仍抱住军方的数字不放，对他来说，坚持那些统计数字是很合适的，因为这是他唯一最熟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由于坚持那些数字他就不致因为现行政策失败而同他的将军们发生争吵，也不致因此而受到一项新的、扩大了的政策的压力。他干脆把自己的态度冻结起来，认为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里有数字可以证明。对于为什么有两套不同的情报，分歧的背景是什么，他没有兴趣去探讨。在那个时期里同他一起去西贡巡视的文官们，发现他顽固得令人吃惊；他们试图同他讨论他们对战争的怀疑，但他听不进去。他们说，由于佛教徒危机吴庭艳政府在农民中间日益失掉人心。他问道，那末，失掉的是百分之几，政府保有百分之几，它正在失去的是百分之几？他要事实，要统计数字，要一些可以通过他的资料库来运用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胡诌的诗篇。要是有人指责他的资料库是靠不住的、片面的，只反映了站在既得利益立场的西贡政府和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乐观主义，他就会说，什么话，文官们的资料库同样是靠不住的。他们现在只听取那些持怀疑观点的人的话，而不听任何抱乐观态度的人的意见。

这里麦克纳马拉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了。不论在福特公司还是在五角大楼，他总是喜欢统计数字和事实，特

别是那些能证实他要证明的东西的统计数字和事实。而现在他却对政府中的反对派进行以牙还牙的指责。他对反对的主张不作认真的研究，因为他不愿走这条路。然而，几年之后一旦他转变了立场，他就很善于找到支持反对意见的统计数字。那时他自觉地利用中央情报局，而不是他自己的国防情报署（这是他创立的），来解答他的鸽派气味的问题。而当一个中央情报局人员表示出悲观态度，麦克纳马拉就会用很长的时间来听取意见。可是在1963年他经常顶回对军方估计的不同意见，特别是他同希尔斯曼交锋很激烈。当佛教徒危机继续发展时，希尔斯曼把它抓住作为另一个手段来表明西贡政府无能，来表明危机必然会影响战争行动，因为虽然越南共和国军的军官是天主教徒，而士兵却是佛教徒。当希尔斯曼 257
提出这些论点时，麦克纳马拉立即反唇相讥：你的数字在哪里？你作了调查研究吗？

这样，希尔斯曼就委托他的情报和研究司的一个副手刘易斯·萨里斯，就这个问题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萨里斯成为越南问题上的重要人物，与其说是因为他起了什么作用，不如说是因为他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直感完全是政治性的，而且是真实的。他确切了解美国所能参与的限度怎样，以及战争进行得如何糟。后来他准确地预言轰炸是行不通的。然而他的观点算不了数，他是一个纯粹的情报人员，而不是采取行动的人员。他从来

没有能进入内层。越南越来越成为一个沽名钓誉的地方，他却没有能够升官；在一个充满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的世界里，他却没有捞到什么功名。然而，在1963年他暂时重要起来了，这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希尔斯曼为他和他的观点进行了斗争。因此，在希尔斯曼的鼓励下，萨里斯认真地编写了一份重要报告。他使用了国务院的一些材料，一些新闻报道，以及大量来自军方的报告，综合出一个估计，说明战争行动正在下降，佛教徒危机无疑损害了战争行动（他把佛教徒危机和战争行动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错了；佛教徒危机和战争行动的下降是同时出现的，但军事上的失利可能是由于一些更为根深蒂固的问题所造成的）。萨里斯很懂得从军方的报告中取用什么样的数字（实际上是取用其中大部分材料，就是不用它的结论），结果成为一份关于战争进程具有毁灭性的报告。

军方对上述做法极其愤怒；当希尔斯曼在几次高级会议上提出这个报告时，麦克纳马拉和克鲁拉克将军进行了猛烈反击。三军参谋长非常气愤。他们说，国务院的人提出吴庭艳不得人心和谈论政治问题是一回事（尽管军方经常插手政治事务，争辩说吴庭艳是有效能的，他的指挥官们是合乎要求的，体制是好的），但国务院对军方的估计提出挑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断言，萨里斯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质问国

务院是否有权发出这样一份报告。国务院决不能侵犯军方的职权。

在军方这次特别猛烈的攻击之后，麦克纳马拉掌握了主动，而希尔斯曼却没有得到上司的支持。这份报告很明显地使腊斯克感到为难。这时，麦克纳马拉潦草地写了一个条子给腊斯克说："迪安，如果你答应国务院今后在没有得到三军参谋长的同意时，不再发布任何军事上的估计，我们就让这件事过去了。罗伯特。"(这张能如此深刻反映那个时期的条子，被当时的一个反对派装上镜框挂在他的客厅里。)腊斯克对这类估计当然是不安的，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这份报告是悲观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严重的怀疑，而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严守领导体制的 258
人，他不喜欢国务院干预国防部的职权；在涉及军事的问题上，他的直感是让国防部主办，而不要制造麻烦。

从麦克纳马拉这一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手腕是何等狡猾，因为这样一来，今后国务院在分析形势时就被缚住了手脚。它只能报告那个国家的政治，而政治形势是不好的，它很糟而且越来越糟。但如果战局维持原状，如果战局进展得顺利，正如军方一再声称的那样，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严重问题。这是麦克纳马拉的一个狡猾行动，旨在一定程度上有计划地从他所不能控制的人们手中，把一些重大决策权夺取过来。由于他处在总统和参谋长们之间，他成了一个核心的文职官员。遇到一个具体问题

时，由他决定什么是总统所需要的，什么是参谋长们所能同意的，然后由他居中进行斡旋。此外，麦克纳马拉这一着的目的在于压制批评，这倒是暂时做到了。可是在整个的西贡军事和政治结构日趋崩溃的过程中，他在政府中的对手哈里曼继续提出了同样的文件和估计，并要求政府其他部门都能看到。他说，这里有希尔斯曼的文件，特鲁哈特的电报；还问：麦康看过这一份吗？麦克纳马拉看过吗？吉尔帕特里克看过吗？

这次特殊的交锋无助于萨里斯的前程。从那以后他作为“政变策划者”而闻名于军方，而且他在国务院一直没有被提升。1969 年，一个记者去国务院访问萨里斯，想了解 1963 年期间的情况。他碰到一个因越南问题而发迹的聪明的年轻官员。这个官员说：“萨里斯？刘易斯·萨里斯？为什么要找他呢？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倒霉的家伙。嗯，他还坐在他那个办公室里，干他 1962 年干的那些事。”情况确实如此，几年之后他还是坐在那里，还是搞同样的估计，这些估计仍然遭到否决和驳斥；别的人进来了，看法常常是错误的，而他们提升了；萨里斯是正确的，却仍留在原处不动。至于希尔斯曼，他还是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可是，坐在那里观察麦克纳马拉和军方面孔的人会发现，希尔斯曼是一个聪明而自命不凡的青年人，但为他着想，希望他的保护人留在那里保护他。至于麦克纳马拉，他还是抱住统计数字不放；虽然很久以后，在

1967年他改变了，转而有点鸽派味道。当他转变时，他经受了一次个人危机。他对朋友们吐露，如果当初他们对敌人了解更多一些，对社会了解更多一些，如果有更多关于对手方面的知识和情报，也许这场危机就根本不会发生。其实，正是因为他本人一味顽固地阻挠展开辩论，259
所以才对敌人和对手了解得很少。

1963年7月初，华盛顿知道它面临着一次重大危机。尽管吴庭艳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在6月中旬同闹事的佛教徒达成一项局部协议，但没有多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吴庭艳政府无意履行它作出的让步。一两个星期后，情报圈子里的人预言吴庭艳不会履行协议的条款，而且非常可能，不是发生反对他的政变，就是发生暗杀。西贡充满了关于政变的谣言，而在7月初至少有三起密谋开始形成，这反映了不同年代的人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在西贡，特鲁哈特对吴庭艳政权越来越失望。特鲁哈特往往发现，如果吴庭艳对他答应了什么，第二天的英文报纸《越南时报》就会加以否认。那是吴庭儒夫妇控制的一家报纸。更坏的是，在一段长时期里《越南时报》那些悲观的预测比吴庭艳的官方承诺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政府的政策。因此，一方面吴庭艳答应美国人的要求，一方面又在他的家族私下会议中回到他弟弟和弟妇推动的强硬路线。如果吴庭艳答应在佛教徒问题上采取

安抚的行动和调子，《越南时报》就立即指责第一个焚身而死的佛教法师是事前有人给他吃了麻醉药的。（肯尼迪问希尔斯曼，这是真的吗？希尔斯曼回答说，不，这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狂热和激情。）在华盛顿，肯尼迪再次同顾问们探讨使吴庭艳摆脱吴庭儒夫妇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逗弄着美国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想法，但得到的回答是悲观的。这确已为时太晚。与此同时，特鲁哈特对吴庭艳提出了美国方面的各种各样开明的建议，如吴庭艳应接见佛教徒领袖，应在佛教徒占优势的陆军里任命佛教法师（那里只有天主教神甫），并就宗教自由问题作一次热情的安抚演说。特鲁哈特从吴庭艳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过分客气的微笑和感谢，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特鲁哈特开始尝到德布罗①的教训。

7月初，当瑙尔汀离职度假时，总统决定需要换一个新大使。尽管肯尼迪对瑙尔汀不满意（瑙尔汀由于家务缠身也想辞职），不信任瑙尔汀对事态的看法，但他也认识到瑙尔汀的问题一部分在于政策本身，在于美国直接对吴庭艳承担义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华盛顿作出的；因此总统本人就不只是负部分责任了。这一政策已行不
260 通，现在是寻求替换人的时候了，需要这样一个大使，他不应同吴庭艳有过多的感情上的牵连；而在越南人眼中，

① 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 1903—），1957—1961年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即瑙尔汀的前任。——译者

他不应成为美国直接对吴庭艳承担义务的象征。白宫和国务院某些人极力推荐埃德蒙·古利昂，他是肯尼迪多年的朋友。他们十年前在印度支那首次相识，那时古利昂是法国乐观主义的重要反对者；从那时以来，古利昂在严重的刚果危机中，成了肯尼迪政府最成功的大使。在那儿他用当地民族主义情绪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掩盖美国的政策，从而表现出卓越的能力。但古利昂并不太想再回到西贡去，而腊斯克也不大愿意他去那里。于是在腊斯克的坚持下，肯尼迪选定了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是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是肯尼迪本人在1952年击败的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也是肯尼迪一约翰逊竞选班子击败的副总统候选人。任命这位贵族使政府内的自由派感到不安。但是腊斯克和军方是高兴的。肯尼迪选择他的理由是明显的。如果越南问题变为一场灾难，有一个重要的共和党人的名字同它联系在一起是再好不过了。某些上层共和党人由于同样的理由而对这项任命感到不愉快。

由于洛奇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准备，必须接受反叛乱训练①，瑙尔汀于7月中旬回到西贡。这是他最后一次当驻越大使了，那一段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瑙尔汀发现

① 根据肯尼迪指示，美国驻外一切机构的高级官员都必须接受反叛乱短期训练。华盛顿还设有反叛乱特别小组，由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任主席。——译者

吴庭艳不愿会客，无所反应。瑙尔汀在那么多的事情上迁就了吴庭艳，无非是想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有本钱说话，现在才发现自己对吴庭艳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吴庭艳同他疏远了，那么，他在自己的大使馆里也同样是孤立的。他指责特鲁哈特不忠诚，而且不只特鲁哈特，还有负责战略村计划的鲁弗斯·菲利普斯、美国新闻处的梅克林、国际开发署的人以及许多中央情报局人员。现在他唯一的盟友是军方的人。大使馆的其他人员对瑙尔汀是同情的。他们从个人角度上喜欢他，他们了解他是怎样努力工作的，了解他遇到的麻烦和作出的个人牺牲。这一切虽然曾经起过作用，现在却再也不管用了。现在大势已去，除瑙尔汀之外大家都承认这一点，他们看到瑙尔汀至今不甘心下台，也不免有些难过。

瑙尔汀在那里的最后几天是特别痛苦的。吴庭儒夫妇利用他的忠诚，把他拉去参加一个虚伪的纪念仪式，企图表明他们同美国人是一致的。这活象奥韦尔①著作中的一个幻想场面。全国所有的战略村都煞有介事地竞相争取以瑙尔汀来命名的荣誉。他们写文章描写这位大使怎样为南越作出贡献。结果选出了获胜的战略村，要求瑙尔汀前去访问。他力图避开这件事，但后来中了圈套，同

① 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小说家，著有《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年》等反动幻想小说。——译者

意了；而当记者们说他的同意是无可奈何时，他又大怒。261
当时他在一群板着面孔、沉默的越南人面前，担任一个虚伪的纪念仪式的主席。不久越共就摧毁了那个战略村。

由于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他把愤怒转到老朋友特鲁哈特身上，指责他破坏了他曾经那样谨慎地建立起来的信任。特鲁哈特申辩说，他曾经忠诚地执行这个政策，但自5月以来的几个月里才看出了这个渺茫的希望终于破灭。瑙尔汀对这些申辩置若罔闻。瑙尔汀越是认识到特鲁哈特的报告是确切的，他就越加谴责特鲁哈特没有努力维持局面。如果瑙尔汀是无能的，那是特鲁哈特的过失，而不是历史或政策的过失。因此他回国后写了关于他一度信任过的副手的最后考绩报告，并把这份对他的前途最有毁坏作用的鉴定放进特鲁哈特的人事档案里。它指责特鲁哈特对上级不忠诚，说瑙尔汀把这个特鲁哈特带到西贡，给他以信任，而特鲁哈特却辜负了这种信任，并把瑙尔汀的一切努力都破坏了。这是很有份量的材料，并几乎毁掉了特鲁哈特的前程。希尔斯曼、哈里曼和其他一些人写了辩护信，说特鲁哈特曾忠实地执行了政策，但当政策失败了的时候，他曾如实地报告，并继续维护美国的最大利益。尽管如此，特鲁哈特又等了六年才当上了大使（在尼日利亚），而到那时约翰逊已不再是总统，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也都不是部长了。在特鲁哈特就职仪式上，乔纳森·穆尔——在那些年份里他

一直担任威廉·邦迪的副手，他了解特鲁哈特是怎样经历过来的——对特鲁哈特的儿子查尔斯说，任命他父亲当大使的事拖迟了，拖得太迟了，很久以前就应该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事态已无法控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瑙尔汀说，只要人们注意正题，只要人们不再被这些政治活动分散注意力就行了。这一切都是枝节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打赢这场战争。然而他动摇了。一个到他办公室进行访问的电视工作组看到他把杰斐逊的像取下来，换上了一幅华盛顿的像，他解释说，华盛顿不喜欢与人争论。一切都终于过去了，8月15日瑙尔汀颇为孤独地在机场上，谈论两国的共同传统是"谦恭和容忍，尊重别人以及具有深刻的社会正义感"。第二天又一个佛教徒焚身自杀，不到一个星期吴庭艳和吴庭儒镇压了佛教徒，在午夜对他们的寺院进行了一次血腥的袭击，让自己的私人保安部队伪装成正规部队，企图嫁祸于陆军，从而在一场政治斗争中，使社会谴责和反对陆军。

大使馆被这次对寺院的袭击弄得不知所措，包括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在内都感到震惊。因为许多越南人想，既然是吴庭儒发动了这次镇压，既然理查森同吴庭儒关系很深，那么这次袭击是得到中央情报局同意的。编造的故事很快就戳穿了，它蒙蔽了大使馆和华盛顿四十八个小时，但美国新闻记者从它发生的时

262

候就看对了。这一事件结束了一个时代和一项政策，后来约翰·梅克林在描写那些事态时写道："这就是吴庭艳政权对弗里茨·瑙尔汀的临去秋波：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它对这位高尚的人物作出的最后的庄严保证，而他为维护吴庭艳政权不惜葬送他的前程。"

在华盛顿，哈里曼一伙人几个月来一直在促成一项使美国摆脱吴氏家族的政策；他们仍然认为在这场反对越共的政治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但感到靠一个为全国民众群起反对的政府是办不到的。在7月和8月，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事态的发展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而拥护吴庭艳的派别是错误的。这个政权一直顽固不化，一直不愿扩大它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它无力对付自己的民众。最后一点是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不在于佛教徒的行动是否完全有道理，而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对付他们（一个年轻的佛教法师说："我们要把香蕉皮扔过去让他们滑倒。"这一语道破佛教徒的计划和政府的反应）。现在任何解决的机会都被那次镇压破坏了，它也粉碎了瑙尔汀之流的幻想，他们认为美国对吴庭艳是有影响的。与瑙尔汀的乐观主义相反，哈里曼一伙人曾预言吴氏家族要镇压和尚。因此在政府机构内，他们的估计和预测大部分是准确的，而泰勒和瑙尔汀的预测则越来越显得不准确。

在美国，佛教徒危机对这位年轻的天主教总统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棘手问题。士兵们用棍棒打佛教徒的照片剪辑排在头版上，并附了美国青年军官丧命的故事。如果说过去肯尼迪曾担心右翼要反对失掉自由世界的这一部分，那么，现在他正在担忧自由派要反对美国人为一个小小的独裁家族而流血。在袭击寺院事件之前，肯尼迪对吴氏家族已打定主意，他对这次袭击行动内心感到愤怒，认为完全是针对他的，迫使他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因此当洛奇到达南越时，肯尼迪就决心扩大美国的政策，至少也要使美国的政策摆脱吴庭儒夫妇；如不成，则连吴庭艳本人一起摆脱。

263 由于越南军方催逼美国人解除陆军进行镇压的罪名，不久美国之音开始广播公正的评论，谴责吴庭儒夫妇。此外，洛奇收到华盛顿一份电报说：吴庭儒夫妇必须滚蛋；考虑更迭领导人的可能性；并通知越南军方，美国不再支持一个包括吴庭儒夫妇在内的政府。这实际上是为搞政变开放绿灯。在华盛顿或在西贡都没有人认为吴庭艳会扔掉吴庭儒夫妇；如果在那次镇压之前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就更加不可能了。

这份电报是哈里曼、福雷斯特尔、希尔斯曼和乔治·鲍尔8月24日星期六在总统的授意下拟定的。虽然腊斯克不在华盛顿，也曾同他正式磋商过，而他是支持的。他甚至加强了电报的语气，补充上一条，如果那些将军的行

动受挫而被围困时，就向他们提供物资。有意思的是，这是腊斯克的一个军事上的建议，这位中缅印战区的老参谋还在继续起作用。麦克纳马拉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在外度假，泰勒在一个饭馆里吃晚饭，联系不上。由于麦克纳马拉不在华盛顿，吉尔帕特里克负责国防部。他说这份电报看来很好，是可以接受的，他没有异议。在中央情报局，理查德·赫尔姆斯对越南问题的怀疑一直很大（反映了纯粹情报方面的估计，而不是行动的目标）。他说，现在是他们这样行动的时候了，首先他们为什么拖了这样久呢？福雷斯特尔同克鲁拉克商量过，克鲁拉克的任务是征得泰勒将军的同意，他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实际上是在电报发出之后（泰勒不知道电报已经发出，但他没有不同意之处）。

后来，当这些主要人员集中在华盛顿时，他们当中某些人又产生了新的考虑，特别是由于每个人知道其他一些人有疑虑（这是多米诺骨牌原理如何起作用的一个绝妙例子，如果说，骨牌原理没有在东南亚国家中起过作用，那么在政府高级官员中肯定是起过作用的，他们要看风使舵，不想逆风行走致遭孤立）。泰勒对于这样搞法特别恼火。他以为其他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但他们其实并没有同意，因为当时他们都不在华盛顿。有人开始对友好的新闻记者透露小道消息，说这是希尔斯曼搞的鬼。他已成为政府和新闻记者中的保守派在华盛顿攻击的目标。

哈里曼当然不是目标；没有人会轻率地攻击总统；福雷斯特尔是一个不爱招惹是非的人，而且享有他父亲的伟大冷战名声。只有希尔斯曼多嘴饶舌，得意忘形，几乎是大胆妄为，是一个可爱的避雷针。总统原来已经被政府内部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来自华盛顿和西贡的强调政府分歧的新闻报道弄得烦透了；现在电报问题上又出现混乱，就更使他火上加油，怒不可遏了。这时西贡又传来尤为严重的报道，说那里整个使团已经分裂了（他在看到一条关于政府分歧的独特的新闻报道之后，对一个助手说："这些狗屁必须停止"）。

264

现在当肯尼迪的某些亲近的官员开始否认他认为他们已经同意了的一份电报时，肯尼迪气炸了。他对他们当中一些胡说八道的人大怒，也对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大怒，因为他们如此粗枝大叶，以致留下了一个产生分歧的漏洞，肯尼迪懂得把一个官僚机构推向一项既定的目标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既然已开始做了，就要做到底。肯尼迪大骂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无能。总统真正大发脾气，这是罕见的。冷静的麦乔治·邦迪是这场争论的局外人，他说："教训是永远不要在周末办事"。可是，如果说肯尼迪对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很恼火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出尔反尔的人更加恼火（他们在他面前从来没有流露过这么多的怀疑）。这样，他们再一次被召集在一起时，肯尼迪盯着他们，语调十分冷漠地说：听说有

人对这份电报有怀疑，认为是操之过急的；幸而现在要改变还不晚。腊斯克先生，你要改变吗？回答是：不。麦克纳马拉先生，你要改变这份电报吗？回答是：不。泰勒将军，你要改变这份电报吗？回答还是：不。麦康先生，你要改变……

美国很明确地对西贡军方表示它已决心搞一次政变。8月29日洛奇发给腊斯克的电报称：

我们走上了一条不能体面地后退的道路，即推翻吴庭艳政府。不能后退是因为美国的威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一目的公开地联系在一起；而当事实泄露出去时，它将更加如此。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不能后退是因为，在我看来，这场战争不可能在吴庭艳政府领导下取胜……

西贡和华盛顿之间的电报川流不息：对政变的可能性做出安排，同哪一个越南将军接头，怎么进行，美国插手的程度。甚至直到最近还同吴庭儒很密切的中央情报局站长约翰·理查森，对政变也特别拥护，并且预言政变一定会发生，而且会很快发生。他说："即使吴氏家族现在获胜的话，他们和越南还能拖一个时期，但最后还是会败在他们自己的人民和越共手中……即使将军们不行动或行动失败，我们相信，而且不夸大地说，越南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整个儿丢掉。"

但是那些暗中同美国人会面的将军没有采取行动。

265 吴庭儒夫妇利用袭击寺院的事件使他们陷于被动，此外还加紧了对西贡周围的部队的控制。美国人长期以来告诉这些将军只支持吴庭艳，现在转变了，但转变得如此之快，以致将军们毫无准备。他们怀疑美国人是否真有此意。当哈金斯将军同越南将军们联系并暗示可以搞政变时，他不会仍然是吴庭艳的代理人吗？当中央情报局人员提出后勤供应时，这不意味着理查森会把这一切反过来向吴庭儒告密吗(吴庭儒告诉人们正是这样)？西贡一直是谣言充斥，阴谋迭起的。将军们没有采取行动。国务院打电报问洛奇，他们为什么没有行动？洛奇对一个朋友说，“也许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怕死。”

可是，即使不搞政变，这也标志着我们的整个信念的结束。这个信念认为，只有吴庭艳可以充当美国政策的工具，并对一个毫无理性的家族盲目承担义务。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斗争中，目前似乎文官力量占优势，尽管文官之间对政变是否能搞得成，还有不同程度的怀疑。象福雷斯特尔，还有在更大程度上的罗伯特·肯尼迪这样一些人对这件事越来越犹豫，而腊斯克和洛奇等人则认为推翻吴庭艳政府是有利的，是打赢战争的一种手段。

第十四章
在南越问题上的激烈争吵

越南的将军们不采取行动，丝毫没有结束美国政府 266
内部的争论；而实际上只是使争论回到镇压佛教徒事件以前的状态，那次事件曾加深某些人的怀疑，也改变了某些人的立场。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都曾一度稍许有所改变。但是，既然将军们未能行动，这三个人又要求恢复老样子，把仗继续打下去。因此他们原一致同意必须来个改变，可是过了不到一星期，又放弃不干了。在8月31日的一次高级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强调，当务之急是重开与吴庭艳政府联系的渠道；腊斯克则又谈论要使反共力量重新团结起来，要去掉吴庭儒夫妇以及防止吴庭艳打击他的高级军官。在会上，反对吴庭艳政府的论点是由保罗·卡吞堡提出来的。他是国务院的年轻官员，五十年代时曾在越南工作多年，此时是越南问题部际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比华盛顿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越南。在他的估计中，越南人民占有重要地位，他对那里的社会结构也有真正的了解。他曾经一度认为总有一个正确的途径能使美国的政策获得成功；但现在他已感到吴

庭艳无可救药，而且开始怀疑美国政策是否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当腊斯克提出目前不存在政变可能时，卡吞堡
267 不那么肯定，认为由于过去对越南的政策太不灵活，马上搞政变未免太急，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预先作出种种姿态。他援引洛奇的话说，如果美国继续容忍吴庭艳政权——也就是洛奇所形容的那个予人虚假希望但街头布满刺刀的政权，那么不出六个月美国就将被迫撤走。卡吞堡总结道，他认识吴庭艳已有十年之久，此人就是那么一套，一次次地令人失望，老是使人希望落空，越来越固步自封，不敢面对现实。他断定吴庭艳不会改变，希望他改变的想法只是美国最悠久的一个幻想。他也不会与吴庭儒分手；对他的支持将和过去一样继续下降。卡吞堡说，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办法是体面地离开越南。这是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有人在高级会议上提出谁都不敢设想的主张，尤其有意义的是，这个主张出自最了解越南社会结构及其缺陷的人。

卡吞堡马上受到马克斯韦尔·泰勒的诘难，卡吞堡所谓“不出六个月被迫撤出越南”倒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六个月内西方越来越明显地要被打败，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越共。（由于麦克纳马拉制定的规则，他无法说出他的真正想法：战争也许早已打败，军方的乐观估计只是幻想，时机已晚，局势的严重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是国务院是不好出来反驳国防部的估计的。）

瑙尔汀也跟卡吞堡争论起来，虽然他承认卡吞堡熟悉越南城市。不错，许多城市举行了政治性的抗议示威，吴庭艳在城市知识分子中的威信日益下降，但战争是在乡村进行的，在那里抗议示威的影响很小，在那里人们面对着现实，而且在那里，我们正打着胜仗。这时，腊斯克插话说，卡吞堡所说的只是一种推想，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胜利结束这场战争之前，我们不能离开越南，美国也不能支持搞政变。麦克纳马拉同意这个观点。

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腊斯克的任务主要是预测政治事件的发生，考虑政治方面的微妙之处和政治方面的限度。但这时他说不管有什么困难也要完成任务，不惜压制他自己部下的意见。（过了几年，五角大楼文件发表后，他对记者说，他犯了错误，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因此这次会议有着一种按照老一套办事的感觉。政变的时机得而复失，过去的政策一向是在华盛顿坚持既定计划，在西贡设法掩盖真相，眼前的趋势仍是如此。不论什么问题我们都可凑合过去，继续干下去；但当前的问题是，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掩饰的了。这一点他们很快也了解到了。

虽然瑙尔汀参加了那次辩论，但他作为一个参与者 268
的地位几乎已经结束，因为他不再是大使，而且他那一任大使并没有为他留下多少信誉，使他能够作为见证人而参加会议。他如果享有任何信誉的话，那也已被哈里曼有

计划地摧垮。哈里曼毫不留情地要去掉瑙尔汀合法地位的任何残余。瑙尔汀批评卡吞堡时，哈里曼插了话，激烈得使满座为之瞠目，他怒不可遏地说："我们并不特别重视你所说的，因为你有两个月在度假而不知去向，而且正是由于你的许多报告有毛病，才使得我们为情报问题受罪。"攻击是如此激烈，以致肯尼迪不得不抑制一下哈里曼，中止了他的发言，说他作为美国总统要让瑙尔汀把话说完。但瑙尔汀离开会场时，气得脸色发白，混身颤抖。他在政府中的最后几个月过得十分凄惨。他成了个局外人，坐在中央情报局一间小办公室里，眼巴巴地看着政策的解体，终于离开政府去当摩根银行的驻外国代表(而且为各报撰写吴庭艳逝世周年的纪念文章，这个日子在瑙尔汀声言爱慕的那个国家，成了个全国性的节日)。但是，即使瑙尔汀下了台，仍然存在着该怎么办的激烈辩论，焦点集中在对情报的估计上，究竟战争是在胜利还是失败。

正当官僚机构内部严重分裂之际，马克斯韦尔·泰勒转到了舞台中心，他在1963年夏天矛盾重重的几个月里的表现，足以使人看清他在未来的有关越南的斗争中将采取什么态度。象先前一样，他感到的压力反映了两种非常强大而又对立的忠诚感：其一是对总统，其二是对军方。他是个具有两面性的人物。随着越南的继续解体，

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正如他参与发明的承担有限义务的办法越来越无法维持，他本人的地位也是如此。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泰勒曾强烈坚持某些以需要打灌木林火式战争为基础的基本军事政策，因此与当时的政府步调不一。虽然他没有辞职，但至少抗拒了屈从的诱惑。（某些朋友认为，如果他当时屈服的话，他就会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不过要付出不忠于陆军的巨大代价。）他就象在走钢丝，既没有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满意——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他已到了不忠诚的边缘（未予公开的不同意见）；也没有满足他自己的参谋人员中年轻校官的要求，他们希望陆军能起更大和更现代化的作用（殊不知泰勒不愿在别人占据战场时进行战斗）。269 在他担任陆军参谋长四年期间，他尽可能巧妙地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政策，有时通过国会作证，有时通过对适当的新闻记者故意透露消息。由于他一贯反对他所认为的行不通的政策，他从未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他带着这种又克制又温和的将军形象回到华盛顿。这时，他的书刚刚出版，叫作《音调不定的号角》。（书皮上写道："我们有能力进行一场总体战争，按动电钮使对方濒于全部毁灭，但是我们能保卫柏林—南朝鲜—越南—伊朗—泰国—美国吗？"）对肯尼迪来说，他是个适宜的人，正如肯尼迪对他来说也是个适宜的人，彼此适宜于

对方的目的。肯尼迪也希望摆脱掉大规模报复的理论。肯尼迪还希望由比较年轻的军官重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人即使不直接效忠于他，至少能比较适合他的性格；泰勒也愿做同样的事。（当时泰勒和麦克纳马拉正主张提拔比较年轻的军官，修改提升的标准，在此过程中，毁掉了不少人的功名地位。有些人过去由于过于年轻而不适宜担当某项新的任务，突然发现要去担当同一任务年纪已经太老了。）现在他既重回华盛顿，就面临着要在忠于军政两方面取得平衡的微妙工作；即使对泰勒这样政治感觉灵敏的人，这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他是文官所喜欢的那种将军，他们觉得他容易相处，可以信赖。文官们认为其他将军所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泰勒却能看到更广泛的利害关系，他能理解文官们的希望及其原因，也了解到他自己的功名地位有赖于他们的促进。他不盲目依附于军方；他是通情达理的，尤其对事物的态度是文明的。文官们在寻求朋友时总瞩望于他。

现在他面对着两个难以调和的利害方面：肯尼迪一帮人，年轻，野心勃勃，咄咄逼人，高谈反共主张，但反共并未注入他们的血液中，那不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愿意不时鼓吹反共，但本质上还是致力于合理的秩序。与此相反，军方特别是高级将领完全不同。冷战是他们的使命，要防御富于侵略性的敌人。由于他们准备为此而献出生命，因此也必须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共产党人是富于侵略

性的敌人，反共便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政治中心要比肯尼迪的右得多。要在肯尼迪政府中飞黄腾达，就必须善于领会世界局势的复杂变化以及政府对此的反应；要在军队中升官晋级就必须会巴结上司，了解他们之所好，而他们所好的却浸透着冷战。但偶尔也会有戴维·肖普将军那样的例外，他哀叹反共竟然在美国军事理论中占那么大的分量——仇恨太多了；他也不赞成那些创立对 270
抗共产主义的学说的企图。他不相信魔鬼学。他说，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不是反共，而是等候总统命令，当总统提出"上马出发"时，就立即上马出发。当然，泰勒还必须抗衡空军和海军中特别强烈的一种本能，他们要求不论情况如何都要使用武力，在第一次使用武力失败后，要求增加武力，然后再增加武力。

有时，这些不同的压力并没有造成什么问题。在猪湾事件上，泰勒对那次灾难曾经提出很好的批评；而在肯尼迪试图限制核试验和控制军备竞赛方面，他又完全忠于政府。他认为核战争是不合理的解决办法，核竞赛扭转得越快越好。然而，这一向是陆军方面的主张。现在由于越南败局日益逼近，下一步怎么办已急不可待，他的处境就很不相同。当时越南战争反映了他的军事战略(不管怎么不完全)，这就是进行一种新型的有限战争的试验。如果泰勒—罗斯托战略失败了，下一步又怎么办？其他将军可能接管，他们可是不那么文明，不那么听从政

府，不那么害怕使用核武器。例如，空军就很相信它的武器、炸弹、核弹头能够完成一切任务，并随时准备使用。因此，空军本身及其在国会的朋友们（在三军中，空军要求最多的装备、最大的合同，与工业界关系最密切，因此在国会中的关系也最多）把争论的中心往右移动，以致象泰勒这样的将军认为，当他们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作些让步时，重要之处不在于他们勉强同意了什么，而是他们正守住一条不把事情弄得更糟的界线，使我们不受空军的核武器和导弹之害。

因此，如果越南垮了，势必提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如果有限的武力失败了，是否会有更大的压力要求投入更多的武力？泰勒为了试验他的理论——通过有限卷入的办法制止灌木林火式战争——派了保罗·哈金斯去越南。不是因为哈金斯是周围最能干的将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泰勒的人，能为泰勒所控制。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国务院的人对吴庭艳以及对战争的进程感到绝望，泰勒就要守住界线，维持门面，避免他们的试验失败。在斗争继续进行中，他管住了克鲁拉克，管住了哈金斯，并推迟了麦克纳马拉本人向另一边摇摆的倾向。

泰勒在其后几星期里表明他是个出色的官僚政治能手，就象约翰·范等人已经了解的那样。在对情报问题激烈辩论时，他决心尽可能控制军方对局势的估计。9月间，由于政府内部仍然分裂，肯尼迪决定提出一系列具体

271

问题要求洛奇和哈金斯汇报看法。这个要求主要是总统自己提出的，由希尔斯曼执笔拟定。这个电报本身反映了对战争进展的很大怀疑。答案终于从两人那里来到了：洛奇的报告完全是悲观的；哈金斯的则非常乐观，充满信心，但也令人感到离奇，因为它好象是基于华盛顿的辩论而不是基于西贡的形势来写的。困惑不解的白宫助理发现哈金斯报告中提到泰勒先前给他的一份电报。他们查出泰勒电报的号码，但在白宫找不到它的档案。有个白宫助理感到事有蹊跷，便打电话给五角大楼要一份泰勒电报的副本，还提出了电报的号码。电话是慎重地打给一个低级办事员，而不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什么人，以免把戏被看穿。年轻的下士很合作，提供了白宫助理所要的答案，这是泰勒给哈金斯的一份十分说明问题的电报，其中解释了政府内部如何分歧，斗争的焦点何在，还说希尔斯曼的电报并不反映肯尼迪的要求，与其说是肯尼迪的不如说是希尔斯曼的，然后扼要指明哪些问题要回答以及如何具体回答。

这份电报正好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前被揭露出来。白宫人员非常气愤，认为泰勒已完全不忠。肯尼迪本人对此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而不是气恼不安，也许因为他更多地察觉到泰勒忠诚的两面性。但在会议结束时，肯尼迪要求泰勒到他私人办公室去，在场的一些人认为，就象一个小学生被召去校长办公室一样。如果说

肯尼迪对泰勒的尊重有所减损，对哈里曼则有所增添。哈里曼并不知道泰勒的秘密电报，但不喜欢哈金斯的答复，在开会前曾对肯尼迪说：此中必有文章，有人在跟你捣鬼。事后肯尼迪说，“哈里曼真是个精明的老混蛋”。在紧张的辩论中，这个插曲很快过去了，但它使白宫人员中的某些人确信了他们一直怀疑的事情，那就是哈金斯的答复和态度几乎完全由泰勒控制，克鲁拉克象是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络员；麦克纳马拉本人则由于必需适应号称为军事实际的报告而受到限制。后来，文官们要求在白宫设置一套无线电收报机，以便监听这类问题。军方欣然同意，第二天就搬了十四台机器到白宫地下室，每天发出几百万字的例行公事，文官们了解到他们被这庞大的数量打倒了，不可能监听一切。于是他们让步了，机器又
272 搬走，几乎象搬进来时一样快。至于泰勒，白宫有些人认为他不忠于总统，但显然他自认为是为总统利益而行事，以免肯尼迪上他自己以及周围那些人的当。他，泰勒，是文明的，如果事情搞得不好的话，坏得多的人正等在一边准备接替，因此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肯尼迪本身着想而干的。

在危机的情况下，肯尼迪政府这才忽然发现它面对着几乎早在两年前就应该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当时它仓促地扩大了对越南承担的义务。现在越南的政治问题看

来非常现实了，因为它们越来越带有美国问题的色彩，而且这些越南问题并没有自行消失。国务院的人员第一次多少承认了战争的基本政治性质。过去德布罗和肯尼思·杨等许多人关于吴庭儒夫妇的议论现在看来完全正确。目前鉴于国际舆论纷纷，政府不得不作出回答。政府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的种种希望已经暗淡，但还存在把吴庭儒夫妇从政府中弄出去的老幻想。9月2日总统本人与沃尔特·克朗凯特①进行电视对话中，试图使美国摆脱同那个政府的粗暴行为的关系，还谈到美国在一场游击战中作用有限。他说，这种战争"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战争，胜败都取决于他们自己"。然后又谈到政策和人物的可能变化，以便有助于打好仗。正好与此同时，在西贡，洛奇会见吴庭儒，试图使他离开政府或让他出国。事情似乎有些进展：或许可以宣布，由于抗击越共已取得如此重大进展，吴庭儒可以退休。但四天之后，吴庭儒却发表了长篇的激烈演说，说他不会出国，虽然可能离开政府。在西贡和华盛顿，有经验的美国人都知道，这同样是个骗局，只要吴庭儒还呆在越南，就谈不上退出政府的事。根据这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于9月6日开会，会上又听到同样的两派意见，又是以同样的否定的政策观点而告终。文官说吴庭艳毫无希望，军方说没有吴

①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1916—)，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记者。——译者

庭艳也一样毫无希望。麦克纳马拉力主军方意见，说现在是洛奇与吴庭艳开始会谈并恢复正常关系的良机。罗伯特·肯尼迪列席会议听着两派互相抵销对方的论点。他提出了早在两年前就应该提出的问题。

也许没有一个人能象罗伯特·肯尼迪那样，反映出
273 政府和美国人中对冷战态度刚刚露头的变化，即从强硬和进攻的反共转为对美国的作用比较谦虚的一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力量有其限度和危险的感觉。在1963年夏，在他自己一生旅程的中途，他的态度还在不断变化。他进入政府时，也许是整个核心集团中持最强硬路线的成员。他本来想进的是国防部而不是司法部，到那里去当第二把手，特别是负责消除他以及肯尼迪集团其他成员认为存在的导弹差距。他告诉朋友们说，如果他到了国防部，就可以施加压力，推行更新更强硬的计划，并可作为他哥哥的把关的人。同时他也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外交方面的宝贵经验；而且这样就可以不去司法部，他担心在那里他那肯尼迪家族警察的名声将长存下去。

这种担心老缠着他，担心不论干什么或替他哥哥和国家怎么效劳，公众都将把他看成无情的警察。因此他向哥哥说项，约翰·肯尼迪真也同麦克纳马拉商量过这事，提到国防部如果需要一名副手，肯尼迪家族有个非常合适的人选。麦克纳马拉笑了笑；这位已当选为总统的人连忙表示罗伯特·肯尼迪确实非常能干。麦克纳马拉点

点头，说他从没怀疑这一点，但如果总统能稍稍多想一想——假如他是个参议员并要求国防部做些什么，他是找国防部长呢，还是找总统的弟弟？总统明白了。第二天罗伯特·肯尼迪跟一个朋友聊天，谈起去国防部的事。他说："算啦，已经吹了。如果你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你希望总统的弟弟经常在你背后监视吗？"

因此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进了司法部，但他在外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罗伯特·肯尼迪首先要对反叛乱的狂热负责。强权迷了他的心窍；他不愿看到美国表现软弱。国内外敌人都已下定决心，我们必须有同样的决心。有时他工作到午夜，驶车回家，看到在詹姆斯·霍夫货车司机工会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就转过头来再驶回自己的办公室。他评判别人的标准是看对方多么强硬。在他参加政府后的初期，请他做报告的要求蜂拥而至，他几乎全都拒绝了，有一次接到波兰集团的一个请柬，却马上拿起来说："这个我要去，我喜欢波兰人，他们很强硬。"罗伯特·肯尼迪是提拔马克斯韦尔·泰勒、贬抑切斯特·鲍尔斯的主要人物。他跟泰勒的关系同他跟政府其他成员的关系很不同，向其他人提出问题时总是很厉 274
害，不讲情面；他并不真正尊重年龄或头衔。但他对泰勒却显然不吹毛求疵，泰勒不论说什么，他几乎从不提出异议。他真心敬重泰勒的战争经历，泰勒曾跳伞空降到诺曼底并率领特别小组到意大利防线后面为艾森豪威尔执行

任务。对罗伯特·肯尼迪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信任状。

他在性格上有几个不同于其他在职人员的特点。第一，他对于同总统的关系完全有信心；第二，几乎绝对地坚持要人家很好地、如实地向他反映情况；第三，主要不是从全球一大棋局的角度，而是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大事的能力，或甚至是本能。这样他就保持了他的良知良能，它至少跟他的信仰一样坚强。在导弹危机期间，当别人谈论对古巴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时，他很简明扼要地说，他不希望他的哥哥成为六十年代的东条。从这一切中产生了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能成长、变化和承认错误。

1962年在西贡机场停留时，他利用这短暂时间说明我们要呆在越南直到胜利。但他这次还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官方报告大部分是不可信的。他根据原定计划在机场听取顾问团高级成员的简要汇报。他们相继向他保证一切顺当，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问道："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一致回答说没有，没什么问题。他多少对这答复感到震惊，于是看着他们说："没问题，你们真的没什么问题吗？是不是有人想私下跟我谈谈？"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跟他长谈，吐露了一大堆问题。一个简单而有益的教训是：人们在有案可查的报告中说的是一回事，在私下说的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到了1963年，随着他理解事物能力的提高，他不再

仅仅是到处施加压力的总统的小弟弟，不再仅仅用简单的强硬路线观点来观察世界事物；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声，如果有任何与众不同的见解要向政府中的人提出，他是最合适的人。有些在哈里曼手下工作的人，如福雷斯特尔和希尔斯曼，对政策有所怀疑时，受到了罗伯特·肯尼迪的鼓励；他们认为在政府上层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把越南战争看作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人民要付出特别高昂代价的战争。他在会上提出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越南的人民：所有这一切对人民有什么影响？他对所谓战争进行得很顺利的说法日益怀疑，他问："你认为那里的人民真希望我们在那儿吗？也许我们想干的是错事。"所谓战争顺利的说法，违反了他的敏锐感觉，特别是他的良知良能。

如今在1963年初秋，参加这些会议，听着一派人说有吴庭艳就干不成，另一派说除了吴庭艳就找不到别的 275
人了，他真感到不寒而栗。他说，也许这是考虑撤出的时候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时刻，但他却把焦点集中到了中心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其他所有人出于各种原因都有意避开的。过去总是辩论些外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由于那样做更安全些。比如把辩论集中到吴庭艳问题上，自由派可以攻击政策而又未必受到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指责。吴庭艳本身已证明是不开明的，这就是政策失败的原因；要再深谈下去就很可能出问题，可能引起相当强

烈的反对。官僚机构里心存疑虑的人保持忠诚的办法，唯有说他赞成战争，支持南越，只是反对吴庭艳。对整个政策表示怀疑的头一个高级官员是罗伯特·肯尼迪，这也许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他在政府中地位完全稳固，而且他还有稳固的反共信誉。他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讨论；因为这仍旧是个大家不敢碰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他的原意，提出问题作为一个开端，作为一个新的想法的试探，同时也使这个问题多少具有一点体面的地位。

由于两派意见仍然互相否定，由于华盛顿的每个人仍坚持己见，在9月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们决定再一次由西贡提出特别报告。于是各方都鼓动它自己在西贡的代表回华盛顿汇报，同时鼓动自己在华盛顿的人访问西贡，回来报告。麦克纳马拉要克鲁拉克去，而在内部斗争中同样强硬的哈里曼则坚持要一个相当地位的外交官员与他同行。结果选上了约瑟夫·门登霍尔，一个在越南呆过而又对吴庭艳感到无法继续容忍的高级官员。此外，哈里曼还获悉，美国驻西贡顾问团中两个关键人物改变了观点，便为他们游说，要他们同克鲁拉克和门登霍尔一道回来向白宫汇报。这两人一个是鲁弗斯·菲利普斯，他掌管关键的战略村计划，这个计划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军事性的；另一个是约翰·梅克林，西贡美国新闻处负责人。菲利普斯对哈里曼及其集团来说是张王牌。过去，只要文官提出悲观的估计，顾问团的高级官员

就用战略村计划作为反击的论据：战略村计划是美国承担的义务在乡村成功的关键，既然这个计划执行得这么好，远远超过了预订的日程，怎么能说政治形势不好呢？要是菲利普斯愿意谈谈战略村的失败——它同时反映出军事失败，那就事关重大，其重要性将远远超过门登霍尔所能说的话。近几星期，哈里曼看到了一些菲利普斯的非常悲观的报告，他很高兴地使它在华盛顿流传。他告诉福雷斯特尔说，一定要让麦克纳马拉看一看。9月1日，报告送到麦克纳马拉那里。这位国防部长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但哈里曼已经准备好要下更大的赌注。 276

对军方来说，克鲁拉克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当时军方在华盛顿最会耍官僚政治手腕的人，是在越南问题的经常斗争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叛乱特别助理，虽然实际上并没有游击战经验。他真正干的是充当西贡和五角大楼的联络员，代表军方出席政府部际会议，在会上，他的特殊任务是摧毁任何文官对于战事的悲观估计，甚至不让文官享有讨论军事进展与否的权利。

他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暴躁的一个人，这使他得到野兽的绰号。他的强硬、名气和绰号投合了肯尼迪对魄力和活力的爱好。他是个汇报能手，不落于陈词烂调，能以有力而令人信服的语言表达他的论点，这博得麦克纳马拉的赏识和欢心，麦克纳马拉讨厌大多数将军的汇

报。在克鲁拉克参与向总统严重谎报情况的事实查明以后很久，他还一直是麦克纳马拉的宠儿。他很讨人喜欢，很世故，本身的参谋工作也干得不错，如果有谁要一份有关越南情况的报告，克鲁拉克办公室交卷比国务院无能之辈要快得多。他也不忽视社交，他驶车经过司法部，拉罗伯特·肯尼迪搭车去开会，尽力讨好他；同约翰·麦康在打猎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等等。他强悍、凶狠，但尽管如此，他也十分敏锐精细。象迈克尔·福雷斯特尔那样对政策抱怀疑的人，对克鲁拉克私下同意他们的观点时如何敏锐精细深有印象——是的，他克鲁拉克不是瞎子，他知道有问题——但到开会的时候说的自然又是另外一套。尽管他聪明、讨人喜欢，却是彻头彻尾的“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哈金斯”路线的支持者，反叛乱特别小组在这关键时期的官方记录说明了这一点。（1963年2月7日，克鲁拉克说斗争已取得真正进展，越共士气正趋低落……1963年3月14日，克鲁拉克说越共的活动水平比去年低50%……1963年5月9日，克鲁拉克在檀香山会晤哈金斯回来后说，所有的趋势都是有利的……5月23日，澳大利亚游击战专家弗朗西斯·瑟朗上校对战略村计划表示怀疑，认为计划过于铺开，为越共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大片地区，克鲁拉克立即予以强烈驳斥……）

此时克鲁拉克要跟门登霍尔一道旅行，以便向总统

提出特别报告。他本来应该充当总统的耳目，但一点也没有那样做。他和门登霍尔一起在西贡呆了些时候，然后各走各的。门登霍尔所见所闻肯定了他原先的怀疑；克鲁拉克则到战地去。但他在走之前，拣起了哈金斯和 277 史迪威特别为他准备的长篇报告，里头充满了所有的有利统计数字。这个报告现在已不是哈金斯的报告，而是克鲁拉克的报告了。当他们结束为期四天旋风式的旅行到机场准备回华盛顿时，西贡美国新闻处副处长戴维·谢泼德问门登霍尔有何观感。门登霍尔答道："正象你们所报告的一样，只是更糟，我要把这些告诉总统，但我想，要叫克鲁拉克同意我的意见，恐怕会有困难。"

这是一个低估了的说法。他们在下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两个报告真是天壤之别，差别不可能更大了。对于克鲁拉克来说，重要的是实际战争打得很好，正按计划进行，特别是在农村。如果说对政府有什么不满，那是针对吴庭儒夫妇而不是对吴庭艳。吴庭艳是好的，是我们的人，值得尊重。我们只要继续执行计划就行了。由于门登霍尔不能反对军方报告，他描绘了民心涣散和每个城市中恐惧和仇恨的气氛。他说，是的，政府终于成功地团结了群众——可是是把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自己。他说农村中的战争同反对政府的运动相比，现在已经变成次要的问题了。

门登霍尔说完后，总统看着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人

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吗？”克鲁拉克说，是的，这很容易说明白：他曾到农村跟部队在一起，那里正在打仗；而门登霍尔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这时瑙尔汀责难门登霍尔，说谁都知道门登霍尔反对吴庭艳，而且已经好多年了。至于说现在的政府瘫痪了，那么过去也有过政府瘫痪的情况，例如1961年，但我们克服了那次困难。只要我们专心致志不为枝节问题所干扰，我们也能克服这些困难问题的。

麦乔治·邦迪对整个形势已经越来越不满意，他看到吴庭艳政权的混乱和自我毁灭的性质，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政府用美国的武器打自己的人民；他说，须知1961年的恐惧和瘫痪是由越共造成的，我们当时通过加强对越共的战争克服了它，现在却是政府自己造成恐惧和瘫痪，要加强反政府的战争总有些困难吧。

约翰·梅克林接着发言。他是法国进行印度支那战争期间驻当地的记者，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他起初也曾经试图把吴庭艳推荐给美国人和越南人，现在他连自己都不要这个政权了，他说看样子一切都完了，该是美国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促其变化的时候了。由于这将带来内战，他建议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去打越共。如果说卡吞堡早先建议撤出越南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派遣作战部队的想法也是一样——这整个混乱毕竟正是由于极力避免投入作战部队而产生的一种后果。

278

轮到鲁弗斯·菲利普斯发言了，他的报告加倍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正面攻击军方报告的知情人，又是一个在越南特别有名望的人——兰斯代尔自己选择的继承人。兰斯代尔是五十年代美国“好人”哲学的主要人物，菲利普斯非常象他。菲利普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从耶鲁校园招来的，是兰斯代尔集团的早期成员，曾经负责要越南星相家卜算越盟的黑暗日子和吴庭艳的得意时光。1963年初，他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下级向他报告那里的战略村计划破产，他接受了他们的警告，亲自访问那个地区后，感到毛骨悚然。这次到了总统面前，他承认自己掌管的计划失败了，这种行为在美国官僚政治中本身就是异乎寻常的，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诚实作风。他说他认识吴庭艳和吴庭儒已有十年，他们逐渐失去了同群众和现实的接触。越南人现在认为他们的政府必须改变，他完全同意。至于克鲁拉克将军刚才所谓政治问题尚未触及越南军官的说法，根本就不真实，因为美国军官奉命不得同他们的越南同行谈论政治问题，而越南人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在战场上的美国军官关于越南政局的证词必然带有局限性。这时，克鲁拉克打断他的话说，战场上的美国人也许不懂政治，但他们知道仗是打胜还是打败，他们说战争进行得很好。

于是菲利普斯直接攻击了军方报告。是的，在西贡以北地区战争进行得相当不错，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什

么战斗。但在三角洲一带——绝大部分战事在此进行，却非常糟糕，越共正不战而胜地取得这一地带。过去几星期里，有五十个村庄被占领。他说，更糟的是，这还是佛教徒危机没有延及到那儿时的情况。菲利普斯说，这也不仅是他的下级的观点，许多陆军军官也有同感。菲利普斯带来了隆安省顾问的一份报告，该省是越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菲利普斯是偶然发现这个报告的：他手下在那个省的一个文官厄尔·杨曾报告说，越共控制了这个人口稠密省份的80%。杨告诉菲利普斯说，不仅他一个人作这种悲观估计，该省顾问，一个派去充当省长顾问的美国陆军少校，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这位顾问一直把这一观点上报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但
279 始终未得上级回音。因此他把报告转给厄尔·杨，杨又转给菲利普斯；菲利普斯对军方战地报告的原有印象，由于这个事情虽小但给人印象很深的例子，而进一步加强了。

斗争于是白热化了。克鲁拉克向菲利普斯暴跳起来。菲利普斯怎么能把他的意见置于哈金斯将军之上呢；哈金斯是一位多谋善断的高级军官，有更多的人为他工作，有更多的情报来源，他知道如何评价军事报告。他，克鲁拉克，任何时候都愿意相信哈金斯将军而不相信菲利普斯。（其语调的含意是，菲利普斯非常年轻，才三十三岁，大不了是个上尉，上尉是不该冒犯将军的。）由于克

鲁拉克进逼菲利普斯，哈里曼也就进逼克鲁拉克。哈里曼说他对克鲁拉克跟哈金斯站在一起并不奇怪——确实，如果不是这样倒奇怪了。他认识克鲁拉克已经多年，知道他总是错误的，他很不愿意说出口，但他认为克鲁拉克是个该死的傻瓜。'这场风暴过后，菲利普斯结束了发言：他要说的是，不管克鲁拉克怎么想，战争并没有在军事上获胜，而是越来越糟，况且，根本谈不上军事获胜的问题，它主要是一场政治战。

因此，政府还是象过去一样严重分裂，会议就此结束。但军方的估计被狠狠地戳穿了。而且，菲利普斯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这也是兰斯代尔一类人物转变的象征，过去捧出吴庭艳的人，现在正带头攻击他。同样，这也是一种标志，说明那些“好人”，那些过去认为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计划、做正确的事情，就会有正确的方法、中间的方法来处理越南问题的美国人，那些相信越南人希望我们呆在那儿的美国人，现在已经开始感到绝望。如果他们失败了，而且他们是在很快地失败，在八年以后的今天正急不可待地寻找一个吴庭艳的替身，那么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就可能由另一些人来决定，这些人认为，不管越南人要不要我们留在那儿，也不管我们对越南人究竟有所帮助还是有所伤害，我们都要留下；他们认为，答案并不在于由正确的人来执行正确的计划，而单纯在于使用更强大的武力。

军方的估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被菲利普斯戳穿后，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官员存心要使那些戳穿者后悔莫及。理查德·史迪威将军本人随后领导了一次调查，其目的不是要弄清菲利普斯的指责是否属实，而是要查明菲利普斯和杨如何取得隆安省的报告。有一个时期，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最高层官员曾经郑重考虑要控诉菲利普斯和杨违反保密规定；在洛奇大使为他们辩护后才打消此意。但那个写报告的少校还是受到申斥，被
280 评为工作能力低下，立即调离隆安到最不吸引人的岗位上去，那恰好是个国民自卫队的空缺。这样，赌注越押越大，赌法也越来越粗暴了。

而且，陆军越来越象个独立组织似地行动，只顾它自己的机构需要、优先权、虚荣和野心。它回答外界和文官指摘的办法是保护自己的那些高级军官。

8月间，本记者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对恶化的军事形势作了一次广泛调查。有两位朋友要求我去，他们是越南师部的高级顾问，对越南共和国军的瓦解，对强大的、新的越共整营部队几乎不受阻挡地席卷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的情景，十分惊恐。我的通讯发表了，讲到用缴获的美国武器很好装备起来的拥有六百和一千人的新的加强营。通讯中提出，战争正在失败，高级官员对三角洲的乐观可与法国人在奠边府惨败前的乐观相比。这篇通讯使总统大吃一惊，他是报纸的热心读者，对记者们很重视。

他要求军方对此作出评论。从泰勒到克鲁拉克再到哈金斯，一层层地传话说，这件事特别重要，本来由于那个佛教徒危机而受到的压力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如果总统真的感到战争也进行得很差，那么这场戏也可能就算结束了。(《纽约时报》的这篇通讯同约翰·范陆军中校当时正向五角大楼作的汇报是如此相似——虽然范已离开越南好几个月，也没向我谈过——以致有人郑重考虑要对他进行军法审判。)军方评论的任务不是交给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情报单位，而是给它最能干的将军理查德·史迪威。他不跟在三角洲的高级顾问商量，就准备了一大堆文件，其中充满了图表和统计数字，它对通讯中的报道逐字进行反驳，每一个字至少有一段反驳。史迪威的说法是记者的报道不准确，他说“情况恰好相反”。但正如后来五角大楼文件所表明，报纸的报道是正确的，史迪威—克鲁拉克的说法是错误的。精通打假报告并没有妨碍史迪威或克鲁拉克的官运。(他们的肩章上又增添了几颗星，克鲁拉克差一点就当上了海军陆战队司令。)但人们从假报告中却可以生动地看出军方如何行事：他们不是忠于美国总统、真理或正义，甚至也不忠于冒着生命危险的部下；而是忠于军队，更确切地说，忠于顶头上司和升官。这就使人看清，为什么在西贡的军方人物始终保持他们的乐观主义，尽管战场上有着一切相反的证据，尽管来了象理查德·史迪威那样聪明的军官。在越南的

281 美国人长期以来对越南共和国军中同行人物的愚蠢，以及惟其愚蠢才得以加官晋级的事实，感到懊丧，他们编出如下的格言来形容越南共和国军的晋升制度："越会巴结越得提拔。"他们没想到目前这个格言也已经适用于他们自己的陆军了。

第十五章
推翻吴庭艳的政变

克鲁拉克一门登霍尔的旅行实际上未曾解决任何问 282
题，它只不过向总统证明他的政府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然而菲利普斯的归来使总统确信，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军方的报告是不能相信的。这时肯尼迪很灰心丧气，他对助手们说，军方告诉他的话一句也不能相信，说他不得不从报纸上去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可是他看的报刊越多，就越使他意识到他的政府分歧之深，以及他的政策在越南的失败，因而又转过来大骂在越南的记者。到9月中旬，他已经断定，问题不仅在于战争是否正在取胜的消息来源和报道，而更在于逐渐改变政策，同时又保持住他的政府的团结。

9月17日，麦克纳马拉要求再去一趟越南，但洛奇和其他一些国务院官员强烈反对。麦克纳马拉过去的越南之行并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而总是强调把军方置于文职官员之上，并把统计数字和现实看作一回事。而且，文职官员发现麦克纳马拉在越南问题上特别顽固，尽管他们本来对他是有好感的。但是肯尼迪坚持让他

去，白宫有些人甚至怀疑，这次旅行的主意就是来自肯
283 尼迪的。关于麦克纳马拉的越南之行，虽经洛奇提出异议，但结果还是宣布他是应洛奇的要求去西贡的。麦克纳马拉同泰勒将军于9月23日启程前往西贡。他们要调查的事情之一，就是看是否有削减某些援助计划的可能，以作为对吴氏家族疏远的一种表示。由于官僚主义的疏忽，有些援助计划早在无意之中停止执行。某些文职官员，包括洛奇在内，曾主张停止这些援助，但是肯尼迪不同意；除非他确信南越军方至少会比他先走一步，准备搞掉吴庭艳，否则他还不打算首先采取这个步骤。但在9月初举行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主要官员谈论是否要断绝商品援助的时候，作为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的负责人戴维·贝尔(他通常并不是参与高级决策的人)在会上若无其事地说，关于切断商品援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因为他早已把它切断了。

大吃一惊的美国总统问："你干了些什么？"

贝尔回答说："切断了商品援助。"

总统又问："哪个混蛋叫你这样干的？"因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行动，它很可能使一个政府垮台。

贝尔说："没有人要我这样做，这是一项自然而然的政策。只要我们同一个受援国政府有分歧，我们就这样干。"

总统坐在那里一面摇头一面看着贝尔说，"我的上

帝，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但是，政府里有些人怀疑，如果没有国务院内的上级批准或授意，贝尔是不会这样做的。）

麦克纳马拉一到西贡就发现那里有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对战争有一致看法的哈金斯—瑙尔汀班子已经不存在了。他发现，洛奇和哈金斯相互之间几乎是不讲话的。事实是这样，正当麦克纳马拉从飞机上下来时，洛奇就派了两个官员去阻拦哈金斯将军，以便他可以首先去迎接麦克纳马拉，让愤怒的哈金斯留在后面，一面推撞那堵人墙，一面叫喊：“让开，先生们，让我过去见部长。”

这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军方控制了麦克纳马拉的日程安排，但洛奇把他作为他家里的上宾。洛奇力图利用这个机会改变麦克纳马拉对战争的看法，在吃早饭时，让带着悲观统计资料来自各省的官员拥了进来。洛奇占用的时间完了，麦克纳马拉按照哈金斯—泰勒安排的日程出去巡视，早就预先组织了一些青年军官，图表和乐观资料等一切准备就绪：是的，部长，所有的计划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正在使计划取得进展，部长。青年军官们向泰勒和麦克纳马拉汇报，哈金斯站在他们背后不远，笑逐颜开，因为所有图表里指示进度的曲线都是上升的。

象这样的情况进行了好几天，最后他们到达湄公河 284

三角洲的一个省。鲁弗斯·菲利普斯手下的人曾经反映过越共在该地区的巨大进展。在这次军事汇报开始的那天早晨，麦克纳马拉得到一份菲利普斯的书面报告。泰勒神气地站在那里，提出一些带有启发性的问题：少校，我们知道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局势已经控制住了，你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情况？……麦克纳马拉过去曾试图弄清这些汇报的真相，没有取得多大成果，但是这次他有了准备，他已看到一份关于这个省份的悲观形势的文件。因此，看来文职官员和军方的全部分歧终于归纳到一点，即：一个战争，两种看法。麦克纳马拉问，少校是否看过他的文官同事所提出的关于战略村计划的报告？看过了，部长。那么，少校同意文职官员的估计吗？少校停顿了一下，最后说，是的，他同意。接着，麦克纳马拉问，那为什么你自己不报告呢？少校说，因为他的文官同事已经汇报过了，而他自己按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规定，只报告了军事方面的形势。

这时，泰勒将军非常冷漠地注视着那个军官，并说，看起来，他的报告是弄虚作假。青年军官说，不是这样，将军，我的报告本身是准确的。他们随即转移到下一个地点，但麦克纳马拉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的怀疑增长了，他已透过军方报告看到了一些真相。

在归途中，两人从不同的理解和信念出发，提出在越南问题上分歧的看法。一个报告里会有两种不同的见解

拙劣地混淆在一起，象过去常常发生过的那样，今后甚至会更多地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反映了麦克纳马拉同泰勒之间在不少事情上达成的交易。麦克纳马拉同意洛奇的估计，认为同吴庭艳搞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在报告中对这个政权提出更多的怀疑并要求对它施加更多的压力(在麦克纳马拉离开的那天，洛奇说："有一个象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样有气魄和远见的人当国防部长，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麦克纳马拉听到这种奉承的话，不禁眉开眼笑)。泰勒则坚持军方的估计和乐观的看法，因此在报告一开头就讲，军事计划"已取得很大进展并将继续取得进展"。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仗打得漂亮，到圣诞节时可以撤出一千名美军，到1965年底美国承担的全部义务就将结束。尽管要求从越南撤退的呼声越来越多，这个报告却重申了国防部的意图，要呆在南越不走：

南越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坚持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制止这个国家陷入共产主义，并尽可能迅速地把越共叛乱镇压下去。(镇压叛乱的意思就是要把叛乱的规模减少到南越政府国家保安部队可以对付的程度，而不需要派美军协助。)…… 285

泰勒和麦克纳马拉在报告中接着说，他们发现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虽然越南军方"对越共的敌视仍然超过

对政府的敌视”。该报告在提到美国政策时有一句话很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的政策是促使吴庭艳放弃对人民的压制，因为这种压制要影响到人民抵抗越共的意志。”（为压制而压制是允许的，但压制如果损害军事行动，那是令人遗憾的。）该报告建议，继续切断商品援助；此外，还要暂停一些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对吴庭艳和吴庭儒私人的总统府警卫队的资助（除非把警卫队用来对越共作战）。在美国同吴庭艳之间应维持“正确的”关系，同时寻求同所谓“可供替换的领导”进行接触，这件事是洛奇迫切要求的，并早已着手准备实施。这种要求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政策及其带来的沮丧、分歧和自欺欺人。这实际上是说，即使战争正在取胜，美国也应摆脱吴庭艳，另外扶植一个领导，并认为战争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这种对形势的估计，会使这些文职官员终身引以为憾的，因为事后看起来将会是这样：他们替换了政府，帮助搞垮了一个仍在赢得战争的政府。他们知道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但从未对它提出过异议，因为他们自己过去就有这样的主观愿望，因为他们无力控制自己的官僚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他们——肯尼迪兄弟、腊斯克、洛奇、哈里曼、希尔斯曼、特鲁哈特、福雷斯特尔——都知道这场战争正在失败，但他们从没有在文件上，在他们发表的声明中，或是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时，承认这件事。谎言变成了真

理，制定政策的人已作茧自缚；他们的政策失败了，而他们又不能承认这一点。

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回到华盛顿，到白宫去宣读那份报告。某些文职官员对报告中仍然流露的乐观情绪感到不安（哈里曼手下的人威廉·沙利文，在回来的飞机上，曾反对过这种看法），他们尤其反对撤出军队。麦乔治·邦迪应某些助手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他问："这样做明智吗？我们是否在自找麻烦？"但文职官员看不到对方有任何改变的意思。有人就文件中的措辞和其中包含的危险，询问当时还在国防部工作的威廉·邦迪。他耸耸肩说："我是奉命行事的。"威廉·邦迪曾告诉别人，泰勒在报告中留下撤军这个伏笔是作为推动越南人的一种手段。希尔斯曼问及麦克纳马拉关于报告中使用的某些措辞，感到他的态度傲慢，甚至是粗暴的。后来，希尔斯曼说，在麦克纳马拉公开宣读那个声明时，好象他是在宣读一项最后通牒。总统本人对这件事也是不高兴的，然而 286
他听天由命；他或许可以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多做一些，但他感到整个事情很微妙，他已经通过这次任务把主要角色麦克纳马拉向前推进了很多，而麦克纳马拉又把泰勒向前推动了一点（虽未真正改变他或使他开窍，但在态度方面，麦克纳马拉似乎已拖着勉勉强强的泰勒前进了几步）。肯尼迪知道，假如他推动下级向前走几步时就会在他的官僚机构中遇到麻烦，那么他的下级这样做也

会在自己的官僚机构中遇到麻烦。

有关越南的每一件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解决的，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报告也是如此，但肯尼迪对此并不那么担忧。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妙并逐渐在恶化，快要成为他的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可是他感到他能够对付得了，他还有时间，时间对他似乎是有利的。他可以从容不迫地慢慢地推动他的班子，推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作用。当时正是1963年末，而1964年是选举年，在重要决策问题上拖延一下是有好处的；假如越南人能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坚持。此外，其他一些事情开始稳定下来。他已同苏联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向华盛顿的民权运动进军已经过去了，并没有损害他的政府；相反，由于进军的庄严、宏伟和激情，以一种伟大的精神反映出美国贫苦人民的愿望，这或许对他的政府起了帮助的作用。肯尼迪觉得国内对他本人和他能否胜任总统职务的怀疑正在减弱；他感到他的真正声望，不是表面的而是比较深远的声望，正开始形成；他作为总统的观念也开始定型。因此他不想太草率从事，不必要地造成他的政府分裂。时间总是有的。麦克纳马拉—泰勒报告的日期是1963年10月2日。

几乎在同一时候，南越最受尊敬的军人杨文明将军同他的一个老朋友卢·科奈因进行联系。杨文明早年在

协助同类似土匪的平川派作战时，是接近兰斯代尔集团的。他问卢·科奈因，他们是否可以谈一谈。科奈因在越南呆了十八年，大部分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第一批空降到越南的美国人之一。他熟悉那些非共产党的越南军人，因为如他爱说的，是他把他们征募到部队里去的。他很机灵，玩世不恭，有些江湖气，看上去好象是个大胆的法国伞兵的美国翻版，活象低级惊险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他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他以冒险为儿戏，只有冒险才使得生活更富于刺激性。他有一只手掉了两个指头，而关于这些指头是怎样弄掉的，究竟是由于高尚的原因还是下流的原因，这样一些故事传遍了西贡。有些新闻记者很了解科奈因并且很喜欢他。由于这些记者的电话经常被窃听，他们在提到他时就用自己的暗号"三个指头的布朗"来称呼他；这个浑名是从垒球运动员莫迪凯·布朗来的。西贡美军司令部的人都看不起他，认为他呆在那里的时间太久，越南色彩太浓了；认为他反复无常，靠不住，好玩弄那种最危险的冒险家的把戏。然而他却是越南军方信得过的极少数美国人当中的一个。越南军方藐视哈金斯，把哈金斯看作是吴庭儒的代理人。后来，由于同越南将领们打的交道越来越复杂，白宫打电报向洛奇建议，最好能找到比科奈因更受尊敬的人。洛奇回答说，是的，他同意，但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代替，而且陈文敦将军曾"表示很不愿意同

287

任何旁的人打交道”。

经洛奇批准，科奈因10月5日同杨文明将军见面，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杨文明将军说，这场战争正在失败，所有越南高级军官（他自己、陈文敦和陈文金，他们都是受尊敬的，但没有一个在指挥军队，吴庭儒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部下）认为，必须来一个改变。他想了解，究竟美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他不要美国的协助，但是他也不要美国人阻碍他们。他说，他们必须行动，并且迅速地行动，因为团和营一级指挥官现在十分不满，迫切要求发动政变（这证实了一个月以前希尔斯曼—萨里斯的估计，除非受到下面低级军官的推动，将军们不会立即行动）。科奈因说，在他没有同上级谈过以前，他不能答复他们。杨文明说，这一点他了解。他提到推翻现政权三种可能办法：暗杀吴庭艳兄弟；军事上包围西贡；或是反叛部队同忠于现政权的部队公开地打一仗。科奈因说，哪一种计划最好，美国不会表态。杨文明还想了解，如果将领们掌管政府，美国的援助是否会继续。洛奇立即回答：美国不会阻碍政变，它将研究除暗杀计划外的其它计划，并将向将军们保证，美国将继续援助新的反共政府。

这样一来，吴庭艳政权的结束为时不远了。洛奇，这个在西贡左右全局的角色，是敏锐、有魄力和很坚强的，他不相信当地政府所说的话，也不大相信美国军方所讲

的。洛奇对哈金斯封锁了许多来往电文，认为这个将军在华盛顿和西贡都是个麻烦，可能把消息泄露给吴氏家族。有讽刺意义的是，哈金斯是来自波士顿洛奇老家的一个世交，这一点使洛奇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批评这位将军的报告，只采取避开他的办法（哈金斯在10月30日致泰勒的一封电报中气愤地说："大使和我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但我们相互的交往够不够是另一回事。我不得不说，洛奇的工作方法同瑙尔汀大使是完全不同的……"）。洛奇在去西贡之前，曾在华盛顿作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同吴庭儒夫人的父母长谈，他们对女儿的政治主张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庭儒夫人的父亲陈文章，是驻美大使；在镇压佛教徒事件后，他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一道辞职）。洛奇感到，所有反对吴氏家族的谴责都是有根据的，而吴庭儒同吴庭艳是不可分的，这场战争正在失败，既然政变总要发生，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既不鼓励它（或许稍加鼓励，也就是不对它泼冷水），也不阻碍它。他准确地向华盛顿预报，吴庭艳会向美国求援，美国对此应采取的态度是，美国的能力远不及吴庭艳自己的大。 288

到10月中旬，洛奇已使白宫确信，除非美国人公开出卖将军们，否则他们领导的政变即将发生，当时白宫对这个意见是易于接受的。洛奇认为，一切总会变得好些，一个远比旧政府更有效率的新政府取得成功的机

会至少是一半对一半。这一点他是对的；在西贡至少有三起重要阴谋正在酝酿，此外，吴庭儒正在策划一个反政变的阴谋。问题不在于是否将有政变，而是哪一方面的政变。10月6日，肯尼迪电告洛奇，虽然美国不愿鼓励政变，但也不愿去阻碍它，要洛奇同将领们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计划是些什么。不过，美国扮演的角色应该是隐蔽的、可以否认的；洛奇应把肯尼迪的指示口头传达给当地中央情报局代理站长（约翰·理查森应洛奇的要求已被召回国，因为他是美国同吴庭儒有直接关系的太引人注目的象征），这样没有旁的人会知道内情。

在西贡，10月份的几个星期是在政变热上升的气氛中度过的。吴庭艳和吴庭儒在佛教徒事件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它不过是一次短暂的行动，只是使得反对力量起初混乱了一阵，从长远看却加强了这些力量，使它们团结在一起了。西贡似乎笼罩在一种疯狂的气氛中。在打垮佛教徒之后，政府采取措施对付大学生，并把他们镇压下去，接着又去对付中学生。在镇压中学生以后，政府在小学里又发现叛乱，加以镇压，同时封闭了这些学校。在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家里，许多青年男女被逮捕了。在西贡，一个天主教杂志的记者，在此以前一直是吴氏家族极其热情忠实的支持者，把美国记者拉到一边，告诉他们关于吴庭艳过去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不义行为。他这样讲是为了把天主教同日益疯

狂的吴氏家族区别开来。

洛奇一面等待时机，不让吴氏家族摸到他的意图，一 289
面开始同吴庭艳打交道，他发现吴庭艳同过去一样顽固。吴庭艳问及恢复美国援助的问题，洛奇则以要求释放数以百计的被捕的佛教徒和学生进行搪塞。洛奇后来报告，吴庭艳提出一大堆借口。最后洛奇说："总统先生，我所提的每个具体建议，你都拒绝了。你是否想起有哪一件事是在你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而它又会使美国舆论产生良好的印象呢？"据洛奇讲，吴庭艳愣了一下，就改变了话题。它实际上是过去行之有效的一种策略：至多给美国人含糊的许诺，而指望美国人对他承担很多义务以致无法脱身，以致凡是同他打交道的美国人，会由于害怕面对国内的反响而不敢背弃他。

随着政变的迫近，哈金斯于10月末发觉，他被排除在一些重要决定之外，来往电文也看不到；而且，洛奇对军事形势的悲观估计也使他很恼火。他在10月30日向泰勒报告，他不相信政变即将发生。陈文敦将军曾告诉科奈因，在11月2日前会发生政变。但当哈金斯问到陈文敦时，他说他对政变毫无所知。此外，哈金斯报告，在上一周周末，他曾同陈文敦、杨文明一起会谈了两小时，谁也没有提到过政变。那当然是确实的，两位将军把哈金斯看作是在越南最忠于吴庭艳的人。

哈金斯的电报，使得早就忧心忡忡的华盛顿更加惴

惴不安。那天稍晚一些时候，邦迪向洛奇发了一封神经紧张的电报说，不管洛奇怎么说，美国对政变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他要求更多的军事情报：将军们准备怎样搞法，已有哪些部队，还缺少哪些部队。洛奇回答说，政变实质上是越南人的事，当然有可能把科奈因从将军们那里得到的情报交给吴庭艳，但这样做就会把美国置于出卖者的地位。他警告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背弃将军们而后退，那就保证吴庭艳和吴庭儒决不会有所改变，再想动他们就不可能了。他继续说，美国正试图"把这个中世纪的国家带进二十世纪……我们已经使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要获得胜利，还必须把他们从政治上带进二十世纪……"

邦迪仍对洛奇的回答不满意。他再次打电报建议，美国应控制越南的事态，他并非建议出卖密谋者，而是建议推迟一下，等到有获得成功的更好机会。但这个建议太晚了，政变的最后计划正在付诸实施。在驻西贡大使
290 馆和中央情报局以前给华盛顿的报告中预报，11月1日那天就会发生政变。对越南军方行动本来应该是最知情的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不同意这个预报，打电报说不会发生政变。（当政变真的爆发时，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打电话给大使馆，要求取消那份电报。）

下午一点多钟，忠于将军们的那些部队开始接管西贡各重要地点。在此之前，吴庭儒曾经从一个军官那里

得知，政变快要发生。当时他没有打算把这个政变打掉，而是按照他一贯的做法精心设计了一个大规模的反政变计划，想引蛇出洞，把阴谋者一网打尽，把佛教徒和所有美国的同情者打得粉碎，造成重大混乱，到那时美国人就会乐于要吴庭儒夫妇回来掌权。事变开始发生时，吴庭儒满以为是自己的反政变计划正在开始实施。到他看出自己搞错了，已经控制不住局势的时候，他和吴庭艳都已经实际上被包围了，只有总统府的警卫队仍旧忠于他们。鉴于自己已经陷于几乎绝望的境地，吴庭艳和吴庭儒要求将军们住手，进行谈判。但是，这样的事情，过去在1960年也曾发生过，那时吴庭艳利用这个办法来争取时间让忠于他的部队开入西贡，粉碎了一次政变。现在，吴氏兄弟想再次试用这个办法。可是，这次已经没有忠于他们的部队了。下午四点半钟，吴庭艳终于打电话给洛奇。大使馆保存了这次通话的记录：

吴庭艳：有些部队叛变了，我想知道美国的态度。

洛　奇：我觉得，我了解情况不够，没法告诉你。我听到枪声，但是不了解全部情况。而且，现在是华盛顿时间凌晨四点半，美国政府不可能有一个看法。

吴庭艳：可是，你大体上总会有个看法吧？不管怎么样，我是国家元首。我已经试图履行我的职责。现在我要按照我的职责和良知的要求来办事。我相信职责高于一切。

洛　奇：你当然尽了你的职责咯。我今天早晨才告诉过你，

我钦佩你的勇气和你对国家的伟大贡献。没有任何人能够抹煞你的全部功劳。现在我为你的人身安全担心。我听说，那些负责目前行动的人提出了，要是你和你的弟弟辞职的话，他们可以让你们安全离开这个国家。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吗？

吴庭艳：没有。（稍停一下）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吧？

洛　奇：有。要是我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事的话，请打电话给我。

吴庭艳：我正在设法重新建立秩序。

战斗进行了通宵，一直打到早上。叛军打下总统府时，吴庭艳和吴庭儒已经走了。他们从秘密地道逃走，逃到郊外的华侨居住区堤岸，在那里继续同将军们保持联系。据说他们终于接受了让他们安全出国的建议，但是291 后来叛乱者把他们逮住，按照新政权的命令，在一辆装甲的载人卡车后面把他们枪杀了。吴庭儒死后，尸体还被人用刀戳了很多次。

一切都过去了。曾几何时，不但到处有吴庭艳的照片和雕像，而且有他的弟妇的照片和雕像，搞他们的个人崇拜。可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完了，雕像打碎了，张贴的照片撕破了，吴庭艳的肖像只留存在硬币上。大街上市民成群地向将军们欢呼，给军队献花环。一位来自湄公河三角洲的作战军官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历来第一次感到乐意当军人，第一次感到在老百姓中得人心。洛奇本人在街上走时，人们象对总统候选人一样对他欢呼。这是

美国人的黄金时代。但是紧接着到来的却是黑暗。吴庭艳之死打开了封锁消息的闸门，军官们也可以讲真相了。这就使美国国内知道了战争打得多么糟糕的现实。还有，在非共产主义南越九年历史上曾经短暂地存在过的那个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唯一因素（尽管是非常微弱的），即反对吴氏家族的这个因素，也消失了。吴庭艳担负的责任对他来说是过重了。他是个封建头目，是个想用过时的方法和依靠白种人的外力支持来维持统治的旧人物。他死后的几个星期里，人们为他写了许许多多挽词，但是最好的一篇却在约八年以前就已经由格雷厄姆·格林①令人惊奇地、未卜先知地写下了：

吴庭艳应该不带警卫在稻田里走动，通过艰苦的途径学习如何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服从（两者是不可分的），但是天主教会的主教，呼啸而过的警车，以及外国顾问，把他同人民隔绝了。人们描绘他在诺罗敦宫里坐着，阴郁的双眼在茫然若失地凝视着。他这个人廉洁，固执，听信谗言，每周去教堂忏悔，从上帝总是支持天主教这个信念中得到鼓舞，在等候着奇迹发生。我想在他这幅画像下面写上："一个给西方毁掉了的爱国者"。

在华盛顿，几乎每个有关的人都认为这次反吴庭艳的政变是多少有点不可避免的。泰勒考虑到他自己和哈金斯所采取的立场，非常不乐意看到这次政变。但是，

①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著有《静悄悄的美国人》等。——译者

还有一个人强烈反对这次政变。他嘟嘟囔囔，不喜欢这个政变。假如他行使了职权的话，是可以为反对搞这个政变而进行斗争的。但是，他没有行使职权，也没有人认真看待他的反对意见。在牵涉到国会立法或者得克萨斯州政治斗争的问题上，别人也许会认真注意他的不同意见，但不是在外交方面，因为人们认为他在这方面特别愚钝。他的名字是林登·约翰逊。他从头就憎恶这个反吴庭艳的政变，憎恶所有那些关于政变的谈论。他说，政变和暗杀，就象警察和强盗那一类的玩意儿。是呀，在得克萨斯州，他同拉尔夫·亚巴勒①也有分歧，但是他们没有彼此搞阴谋暗杀。"奥托·帕斯曼②同我有分歧。上帝知道他会把造福人类的许多好事推迟的。但是，我并不打算推翻他。"那年夏季，约翰逊偶而出席一些会议，当别人反对吴庭艳政权时，他为西贡政权辩护。他说，重要的事情是，设法把战争打赢。他确实钦佩吴庭艳这个人。他说：吴庭艳当然有他的问题咯；但是，"我们得克萨斯人说，同你认识的魔鬼打交道总比同你不认识的魔鬼打交道好。"约翰逊 1961 年去越南时，他本人就成了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他忠于吴庭艳，部分原因就是美

292

① 拉尔夫·亚巴勒(Ralph Yarborough, 1903—)，美国参议员，得克萨斯州人。——译者

② 奥托·帕斯曼 (Otto Passman, 1900—)，美国众议员，路易斯安那州人。——译者

国对吴庭艳的承诺是通过他作出的。因此，反对吴庭艳的议论，就成了反对约翰逊的议论。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朋友就是真朋友，他们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比方说，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就是个朋友。他和我们有共同语言，保证同我们站在一起，愿意进行战斗。约翰逊对那些他怀疑是亲印度的人往往抱怨说，“你们的印度人现在在干什么啦？”有人争辩说，阿尤布成为美国的朋友是因为他要利用美援来反对印度而不反对共产党；印度人口五倍于巴基斯坦，应该得到更多一些的考虑。他对这些议论无动于衷。阿尤布是个朋友。而印度人呢，他们从来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契约总归是契约，交易总归是交易。你伸出手来，他们伸出手来，这才是做成交易的办法。甚至冲伯，约翰逊也不太掩盖自己对他的钦佩，认为不管怎样，他是所有那些非洲人中唯一愿意说出喜欢我们而不喜欢共产党的人。

要推翻吴庭艳的议论，引起约翰逊很大反感。约翰逊不喜欢这些跑来跑去制造麻烦的年轻的外行人。反对吴庭艳最激烈的人，似乎往往也是反对约翰逊的人。他们是白宫的那些人，而不是象腊斯克那样老练的专业人员。这种情况不会使约翰逊喜欢他们。结果是，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他认为是策划对吴庭艳施加压力的那些人，就是说，白宫那些年轻人，那位莽撞的“无所不知的”希尔

斯曼，以及在越南的那些年轻的记者。约翰逊说这些记者是卖国贼。他说，所有这些年轻人，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经历过，竟然向长辈挑战。他一般对约翰·肯尼迪不加批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例外。他认为肯尼迪在整个事件中起的作用太大，所以几个月以后，在肯尼迪被刺后，约翰逊用带点神秘的口吻对朋友说，肯尼迪遭暗杀是暗杀吴庭艳的报应。因此，1963年那几个月里，当肯尼迪小心翼翼推动他的官僚机构的时候，他却没有对这位副总统做工作，而通常他对约翰逊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在忙着别的事情，忙着推动主要角色，忽略了做
293 约翰逊的工作。就是忽略了，没有别的词儿。不过，在当时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9月和10月，对约翰·肯尼迪来说是非常好的两个月，不仅本身内容丰富，而且充满对未来的希望。首先，在这个期间里，冷战中特别僵硬的时期开始(也许仅仅是开始)结束。这还不是整个冷战的结束，因为双方的问题都太大太深了。有些竞争是非常实在的，而且会一直这样进行下去。但是，冷战所造成的那种破坏性极大的影响也许是减退了——这种影响曾使一个国家几乎处于神经紧张状态，为国内所掀起的普遍恐惧情绪所驱使去做不符合本国真正利益的事。在古巴导弹事件以后的解冻中，机会开始出现。肯尼迪探索了这个机会——小心翼

翼地探索，步子还是不太快。

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说，要重新估计对共产党的态度。他鼓励并且派遣艾夫里尔·哈里曼搞了个部分核禁试条约。这对冻结得几乎象冰河一样的冷战是头一次突破。它是来之不易的。官僚机构本身对改变现状没有真正的准备，政府内部阻力很大。参谋长们是反对的(他们最后同意搞部分核禁试条约，目的是要打消搞全面禁试的压力)。泰勒支持这个问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打核战争。麦克纳马拉起初持怀疑态度，但是后来成了肯尼迪的真正同盟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手下约翰·麦克诺顿的压力和说服。麦克诺顿是政府内力争限制军备竞赛的那两三位主要人物之一。而麦克纳马拉任用麦克诺顿这个行动，实际上就在国防部里造成了一个推动裁军的集团，这是腊斯克在国务院里没有做到的)。麦乔治·邦迪对这个问题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他没有进行推动，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使它加速进行，但是他使赞成禁试条约的人中凡是有需要会见总统的，都能得到总统的接见。

对裁军问题，腊斯克是最不热心的。事实上，早在肯尼迪就职之前，白宫一个官员就已经首先觉察出，腊斯克本质上可能比肯尼迪班子中的其他人更保守。当时，腊斯克曾经把这位官员拉到一旁问道："这些关于裁军的议论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不会是真心要裁军吧，是吗？"与

其说腊斯克反对禁试条约，不如说他是个维持现状派。在他看来，世界是静止的，变化很少，而且很慢。分歧和分裂都有真实的、正当的原因。这些分歧和分裂会一直存在下去。不要去推动变化。无论是对国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或者是对美国外交系统里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来说，推动就意味着冒险。要缓慢行动，对微小的变化感到高兴。象裁军这样的事情，应该让史蒂文森他们去干，应该在联合国里辩论，在美国国内则应该让那些自由派分子去考虑，反正不是什么应该认真看待的事情（但是后来，当约翰逊表明了想要一个防止核扩散条约，而这类问题又已经不再是什么破天荒的创举时，腊斯克为此而工作，比谁都更加努力而有效）。

294

就是这样，政府内部因各个单位和个人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对禁试条约看法上的分歧，同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分歧相似得令人惊奇；总统对搞一个禁试条约特别感兴趣，哈里曼远比腊斯克愿意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冒政治风险。哈里曼同俄国人进行过艰巨的谈判，他比政府里其他任何人更相信时机已经成熟，认为这个条约可以搞成功；虽然也有象威斯纳那样的少数人，他们认为过去同俄国人的谈判中早就有可能谈成一项条约，只是美国的谈判者太保守了。这并不是说官僚机构和国会已经对军备竞赛问题上的变化有所准备，远不是这样。国会似乎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别是它的军事委员会。官僚机构内

部，潜在的反对者是很多的。例如，1963年春天，当人们还没有真正知道禁试条约即将搞成的时候，有消息说，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将要就美国的战备状况举行意见听取会。在此之前，同俄国人进行的谈判已经出人意外地接近于缔结一项条约，人们感到事态可能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斯坦尼斯意见听取会的威胁却是严重的。举行听取会时，保守派把将军们召来，而将军们总是要求加强战备，对美国当前的孱弱表示叹息的。他们制造一个更加敌对的气氛，使参议院不安，使总统不安。总而言之，他们搞出一个使反对禁试条约的人可以利用的记录。白宫有几个代表去见麦克纳马拉，提醒他这一发展。麦克纳马拉起初觉得无所谓。他认为条约并不是那样接近于谈成。不管怎样，如果他过早为禁试条约辩护的话，那就会便于反对派采取反措施。他说，让斯坦尼斯搞他的听取会吧，我们等一等再说。白宫那些人听从了他的高见。

几星期后，他们听说约翰·麦康把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核武器问题专家借给斯坦尼斯，帮助斯坦尼斯搞反对禁试条约的材料——麦康一直是反对这个条约的。白宫的人觉察到，情况可能比原先想象的严重，而上述这件事实际上证实了斯坦尼斯和麦康认为条约可能已经接近于谈成。于是，麦乔治·邦迪的副手卡尔·凯森，国务院法律顾问艾布拉姆·蔡斯，以及军备监督问题专家麦克诺

顿三人在一起商量，断定他们感到担心是对的。他们又
295 去见麦克纳马拉，详细说出他们的疑虑。麦克纳马拉留心听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同意，你们对了，我错了，事情是比较严重，现在你们就作为负责政府论点的委员会，麦克诺顿当头头，你们要把我们的论点准备好，搞清谁是证人，使意见听取会的记录取得平衡。

就是这样，斯坦尼斯的意见听取会给抵销掉了。夏季结束时，成问题的是要参议院批准条约。政府对于是否能够得到国会支持是远没有信心的（后来的八十票对十九票使人以为国会批准一直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当初力量对比似乎是相当微弱的，而一个接近于批准条约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的表决实际上不算胜利，因为它虽然意味着冷战的变化，但是也会给予敌人以激励）。由于参议院的表决日益逼近，肯尼迪政府决定先在自己党内作些试探。他派代表去见迪安·艾奇逊，了解一下艾奇逊对禁试条约怎样看。这个任务是微妙的，因为艾奇逊虽然是个民主党人，但是他的主张比当时在政府里掌权的大多数年轻人要强硬得多。而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表示反对，就会发生危险的影响，会使参议院里的民主党议员分裂，而鼓励人们反对这个条约。但是，他们出乎意外地发现艾奇逊是同情他们的。不过，他也的确讲到他反对一件事情，那就是，艾夫里尔·哈里曼想利用谈判条约来使自己当上国务卿。他们不能对艾夫里尔做点工

作，使他的行为同他的年龄相称一点吗？于是这个信息带回白宫，然后，他们在国会里慢慢地把他们的力量组织了起来。这本来不是一件一直都很有把握的事。但是，表决结果很好，比他们原先预料的好，总统感到高兴。这是他个人的巨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并不是由于国内存在着一些推动总统前进的松散力量，而政府在最后一刻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加以利用（象在民权问题上那样），而是政府先承担了责任，然后努力搞成的。他对朋友们说过，他把禁试条约作为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石，即使他因此而在1964年竞选失败，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那年秋天，肯尼迪总统根据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倡议，按预定计划周游西部几个州。这次旅行，主要是谈资源保护问题。旅行中，他要赞美广阔的大地、高峻的山岭和清彻的河流。他对这个题目并不特别感兴趣（资源保护当时还没有成为环境保护学），但是乐于离开华盛顿。这个旅行开始时搞得并不好。他出场了两次，都不怎么成功。其后，按照日程，他又要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市发表一篇令人厌烦的演讲——他自己厌烦，听众也厌烦。这次讲话当中，他提到禁试条约。他一讲到这里，听众立即作出有力的反应。这是一种真正的共鸣，而不是那种政治演讲中常见的为博得掌声所精心雕琢的词句，那些硬插在演讲里的号召对党和国家效忠的陈词滥调，听众听到这种陈词滥调时忠实而漫不经心地鼓掌叫好。

296 由于政治是肯尼迪最擅长的行业，他耳朵非常灵敏，善于觉察听众的情绪，因而立即调整话题，继续大谈和平问题，越讲越起劲，越慷慨激昂。听众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讲到过去两年间的核对抗——先是柏林问题，后是古巴事件。他说："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减少两个核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两个核大国加在一起，能够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杀死三亿人。这是我们寻求避免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支持禁试条约的理由。不是因为它会使我们生活好过一些，而是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免于葬身火海。"

从那时起，他在整个西部地区的旅行中都是这样，越来越离开资源保护的主题，而大谈禁试条约。他所到之处，群众反应都很好。最后一夜，他去盐湖城，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当他走进原先据说是属于敌对营垒的摩门教堂时，受到了群众站立起来持续五分钟的热烈欢迎。也正是在这个人们称为"伯奇①的国家"、"戈德华特的领土"的地方，肯尼迪向极右派的论点挑战，谈到在一个复杂世界里生活的问题。他早就怀疑，在美国，右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被过高估计了，右派力量中有种讹诈的成分。现在，他深信，美国正在超越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的顽固恐惧心理；在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的意愿方面，美国国民大概已经走在华盛顿当局的前面（即使

① 指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美国极右组织，鼓吹种族主义，主张核战争。——译者

没有走在华盛顿当局前面，至少也比华盛顿原先所想的要远得多）。他觉察到，人们深切盼望有一个健全的和平和健全的世界。他知道戈德华特将是他1964年竞选的对手。现在他感到，他能够把戈德华特打得一败涂地，并且能够消除冷战加剧以来一直笼罩着美国政治的某些恐惧心理。这个问题，加上他本人的声望，和他已经不算太年轻这个事实，使“十几万票微弱多数”①成为已经过去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托姆·威克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白宫记者桑德·范诺柯特意去找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提到这次总统西部之行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新问题。塞林格说：“对的，你们说得对。我们发现和平是个新问题。”因此，在肯尼迪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总统地位有了转机，这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同离开那条毫无意义的冷战道路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同时出现的。同苏联达成诸如禁试条约之类的事情作为冷战解冻的第一步，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政治风险比较少。对违约事件可以查核，作现场视察，这些都是条约内容的一部分。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要为自己辩护的是反对条约的一方——你为什么反对禁试条约？拿出理由来！但对一个国家是否会转向共产党的问题，风险 297

① 肯尼迪在1960年大选中，同尼克松各得三千四百多万选票，只比尼克松多得十一万多张选票而当选总统。——译者

则比较大，要为自己辩护的会是政府一方而不是右翼反对派方面。人们提出来的问题会是："你为什么把那个国家丢了？"而不是："是否值得为那个国家的丢失进行一次核对抗？""美国是否值得为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因此，第一个突破是在禁试条约问题上出现的。从历史意义上说，突破虽小，但却是个开端。功劳归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二人。由于这个带讽刺味道的事实，1961年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萦绕着肯尼迪脑际的那些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对他来说，那些已经不成问题了；无论是他对自己的看法，或是赫鲁晓夫对他的估计，而首先是美国国民对他的估计，现在对他来说都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肯尼迪是把越南战争作为使共产党人确信美国有力量和决心而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尽管美苏间的平衡局面似乎趋于稳定，越南却在瓦解之中。

吴庭艳死后，有一个短期间，越南军官们可以老老实实地报告战局情况。战地来的报告，使美国使馆大吃一惊，因为局势比原先预期的糟糕得多，甚至比一些原来就比较悲观的人所预期的还要坏得多。事实证明，在湄公河三角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战略村计划。在许多原先美国使馆认为相当可靠的地区里，情况原来是这样：过去之所以很少发生事件，正是因为越共控制了整个地区，用

不着发动进攻。(随着这些报告的到来，哈金斯和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马上改变说法来适应这些报告的消极方面。他们硬说，政变之前，情况本来是很好的；政变以后，政府完全瓦解了，战局就开始变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政变后两星期，我到西贡以南不远的湄公河三角洲第七师防区去。当时一位名叫范文董的新的将军正在那里指挥作战。范将军谈到谎报的问题时，指着一位县长说，这位县长是他的老部下，会讲真话的。

将军问县长："你的县有几个乡？"

县长答："二十四个。"

范问："你管辖着几个？"

县长答："八个。"

范咧嘴笑问："那末，以前你告诉西贡你管辖着几个乡？"

县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二十四个。"

11月21日，亨利·卡伯特·洛奇飞到檀香山。檀香山是他去华盛顿路上停留的第一站。他打算去华盛顿向总统汇报，局势比他们想象的糟糕得多。洛奇本来就一直在宣传战争打得不好的看法，而即使是他这样的人，对战争的真实情况如此令人沮丧，也感到震惊。他想向肯尼迪汇报，无论是哪个政府，究竟能不能继续把越南战争打下去，都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他这个汇报没有作成， 298

因为他在旧金山就听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约翰逊宣誓就职的消息。洛奇请示新总统，他是否应该直截了当地回西贡去。约翰逊说，不，反正得谈谈。于是，他们会面了。他向刚上任的新总统报告：越南局势糟糕得很，必须作出严峻的决策，而且不能拖很久。这位新总统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他手下的班子没有信心，对他同国民的关系没有信心，对国民是否接受他也没有信心。他特别是在外事方面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对他周围的世界和对敌人都比他的前任有更大的怀疑。几星期后，一些记者同约翰逊一起在约翰逊的老朋友《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家吃饭时，记者们向约翰逊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位名叫拉塞尔·贝克的问约翰逊，当枪声打响，鲁弗斯·杨布拉德①扑在约翰逊身上时，约翰逊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约翰逊说："共产党干的。"贝克后来想起这件事时说，他对这个回答感到震惊，似乎太幼稚了。

洛奇说，如果要挽救越南的话，就需要约翰逊作出严峻的决定。这位新总统回答说："我不想失去越南。我不想当这样一个总统：眼看着东南亚走上中国走过的那条路。"洛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支持。约翰逊说："我

---

① 鲁弗斯·杨布拉德（Rufus Youngblood），肯尼迪政府的特工人员。肯尼迪被刺时，杨布拉德同约翰逊坐在一辆汽车上。——译者

认为国会是不会让我们允许共产党人把越南拿过去的。”这是第一个迹象。在一段时期里，是暂时不会有更多的迹象的。但是，这是个当场的反应，是个重要的反应。然而，立刻对越南问题作出严峻的决定，却是约翰逊最不想立刻就干的事情。他首先想干的是，帮助全国（和他自己）从刚经受的那个心理冲击中恢复过来（他通过一阵旋风般的活动这样做了），尽量保持各方面的连续性，把肯尼迪班子的人维持下来，不但是首先维持那些大人物，而且把肯尼迪的整个班子包下来。（他硬逼软拉地要他们留下来，对他们说：“我比肯尼迪更需要你们。”他邀请白宫那些人午宴。不但请邦迪，而且请了他们许多人。午宴前，他首先请他们来一次友好的游泳，于是每个人都被拉到游泳池去。在一个小小的更衣室里，衣服脱得光光；结果，罗伯特·科默由于神经过分紧张，带着眼镜跳入水里。后来，所有的游泳时间都用来潜水为科默找眼镜。）他想确保肯尼迪的遗产，力求国会通过肯尼迪的立法，以此来证明他的确配作肯尼迪的继承人。然后，他将在 299
1964 年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最后，在依靠自己的努力当选为总统后，要有一个约翰逊式的总统时期，一个伟大的时期，一个完全是他自己的政府。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开始的时候，他要暂时把整个世界撇在一边，他不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节外生枝的问题，特别是从越南来的问题。

因此，约翰逊周围的人差不多立刻出动守住防线，保护总统，尽可能推迟对越南问题作出决定，尽可能使越南消息不上报纸头版，尽可能多拖延时间，少作决定。但是，越南问题还是他要管的问题。几天以后，他走到国务院去，把这个庞大机关的先生们召集起来开会，提醒他们，他是他们唯一的总统（为了保证使他们明白这个意思，他把众议院议长约翰·麦考马克那位虚弱得发抖的老头子带去，作为他的生动的活见证。众议院议长是法定的下一个总统继位人）。约翰逊对他们讲了些打气的话，着重说明他们的工作如何重要，进行这些工作如何困难，工作成绩如何得不到承认。约翰逊说，他是完全了解这些情况的（这是假话。在政府各部门中，国务院是约翰逊对之最不表示同情的一个。他的看法与老肯尼迪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他们都是些胆小怕事、谄上傲下、庸碌无能、不肯牺牲个人利益、把自己看得比国家还重的人）。他的结束语，使哈里曼手下搞越南问题的那几个怀疑派不寒而栗。他说："我要求你们晚上睡觉之前为我做一件事：问一问自己……"他稍停一下，然后，为了加强语气，缓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今天为越南做了些什么事？"他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差不多三年以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同约翰·肯尼迪谈论亚洲今后的问题时说过，肯尼迪以后要吃苦果的。然而，实际上，吃苦果的将是林登·约翰逊。

约翰·肯尼迪死了。他的遗产是个混合物。他在冷战后期登场。起初，他并没有向冷战挑战，尽管他在他的政府后期开始使冷战缓和。在越南问题上，他的表现是模糊暧昧的。他比政府里任何其他人都更懂得美国深深卷入越南的危险，白人军队在越南土地上能够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然而，他却使美国的卷入大大地加深了。他去世时，美军人数已经逐步增加到一万六千九百名，死亡七十多名(每死一个美国人，都增加一条要更多的美国人送死的理论根据)。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呆在越南的豪言壮语和理论根据显著地升级了。尽管他认真地怀疑过美国在越南承担作战责任是否明智，对反叛乱方案是否站得住脚，对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到越南去，也都有过严重的怀疑，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他那总统宝座的讲坛上公开表示过他的怀疑。他唯一表示过怀疑的，不过是对吴庭艳政权，只此而已。他的继承人所必须处理的主要不是肯尼迪那些非常小心谨慎地表达出来的内心怀疑，而更多地是要处理肯尼迪那些公开讲话——全都是强调越南的重要性的。肯尼迪的讲话和计划，使美国人更加重视越南。由于政府的大量宣传，肯尼迪承担的责任显得格外重要，从而又导致了许多新的讲话，许多新的新闻报道，许多新的亨特利—布林克利①电视节目的内容。

300

① 切斯特·亨特利(Chester R. Huntley)和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都是美国电台、电视的新闻评论员。——译者

当然，肯尼迪在最后几个月里曾经私下不断提出疑问：能行吗？值得这样干吗？他对派遣作战部队的想法一直感到害怕。他一再说：法国人用三十万军队也对付不了越南人，我们能对付得了吗？这是个政治战，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对整个问题，对于西方为了呆在亚洲而必须使用武力的效果，越来越感到怀疑。为了继续呆下去而那样做，似乎是弊多利少。他死前不久，曾经把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叫到身旁说，他要福雷斯特尔专门去柬埔寨跑一次，去见西哈努克亲王。福雷斯特尔的具体任务是：转达肯尼迪个人和政治上的热烈致意，说明肯尼迪信任西哈努克所奉行的那种中立主义，说明我们现在对他已经比较了解，祝他取得伟大成就。这个做法，标志着一个变化。过去，华盛顿不得不接受南越那种实质上是反柬埔寨、反西哈努克的态度，对柬埔寨的态度是比较敌对的。肯尼迪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曾经同手下几个人（如肯尼思·奥唐奈）谈过，想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敷衍掩饰的办法，混过1964年大选，使美国在越南承担的责任不致成为戈德华特攻击的目标，然后设法谈判解决。他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谈过类似的话，但是没有提1964年选举，而只是谈论逐步降级，谈出了他对我们卷入越南的不安。白宫里接近肯尼迪的人，都感到他这种不安与时俱增。他过去是吃过苦头的。他懂得，武力能做到的事情有一定限度，将军们的建议有一定限度，

政府的智慧也有一定限度。在处理老挝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对哈里曼说的：这是个政治问题。既然他们不要我到离我们只有九十哩的古巴去打仗，那末，我怎么能够到一万二千哩以外的地方去打仗呢？可是，可是……在越南问题上，尽管他内心里比他的公开讲话有更多的怀疑和更复杂的考虑，但是他并没有把越南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他对越南问题的反应，虽然不是派遣作战部队，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行动的，起作用的，有计划的。他曾经力图向公众隐瞒越南问题的真相，显著地增 301
加了美国承担的责任，他严重地束缚了一个新上任的缺乏自信的继承人的手脚。他把他那个出色的、积极的、“无所不能”的肯尼迪班子遗留给这位继承人。这个班子，过去多少受过一些肯尼迪本人的怀疑态度的感染。现在，这个班子配置给了一位典型的“无所不能”的总统。肯尼迪使美国更深地陷入越南，而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比较了解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他曾经在书里和演讲里口口声声宣讲政治勇气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政府却相当缺乏有勇气的行动，例如，扭转荒唐的对华政策。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它的表现基本上是胆小怕事的。

第十六章
看风使舵的国务卿

302 林登·约翰逊在最初那几个月里好象老是在活动；他东奔西跑，进行工作和说服别人。虽然到后来，国内有许多人由于痛恨美国走上似乎前途渺茫和不负责任的东南亚的旅程而起来反对他，对他当政的年代表示深恶痛绝，但在当时，全国却对约翰逊表示感谢，而且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任务是要使全国团结一致，继续勉励他周围的人去尽最大的努力，来治愈创伤和不和。肯尼迪是一个喜欢进行试验的人，他闯入了新的领域——民权的领域，而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分歧和痛苦。他把我们带到了我们不打算去的地方，使我们精神上很不痛快。如今约翰逊所要解除的，不只是肯尼迪被刺所造成的痛苦，而且要解除执行某些肯尼迪政策的冒险日子里所造成的紧张情绪。他是个神医。后来国内的批评者对约翰逊的力量发生了怀疑，而力量是约翰逊的特性之一。然而，他在初期力量的充沛——那种善于辩护、威吓、乞求和恳请的巨大本领，那种在他看来是为了他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驾驭人们的本领，正是这样使他受到热烈喝采。当时

并没有人责骂他是幕后操纵者，那个名词是后来才有的。他有一种可以驱使人们违背他们本人认为是明智的态度去推行某种计划和政策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财富，因为他所驾驭的那些人大多是年老、疲乏和保守的南方国会议员，他们主持着国会的各个委员会，从而阻碍了进步。在那个时候，大家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问题在于国会的权力太大而行政部门的权力太小了，这恰恰是那个新近从国会里转到行政部门的人——林登·约翰逊的想法。 303

在那最初几个月里，方针是要在越南问题上顶住，压下来，推迟作出任何决定。有那么多的其他事情比越南更为优先。就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而论，越南问题一向总是反映美国形势的发展而不是反映越南的事态。（佛教徒危机是稀有的情况之一，主要是越南人的危机，并且同美国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尽管那里的政府连续垮台，还是迫切需要保持越南的平静。约翰逊周围的人都是些喜爱危机的人，是对重大国际危机兴高采烈的人，因为这种危机立刻就使白宫成为一切活动——会议、决定、紧张、权力——的中心；他们才是推动者和实干家，这正是他们到华盛顿来的目的，来接受和对付这种种挑战。虽然如此，但在 1964 年，他们却故意在越南问题上避免造成危机感，只有东京湾事件是例外，它成为一次事件，主

要是因为他们需要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因此，有些事情本来可以大肆渲染的，却尽量不事声张。对方的挑衅，也就是1965年那种完全同类的所谓挑衅，在我们准备好要行动起来的时候（就是说，总统竞选搞完了，总统选出来了，就职典礼举行过了），就会使我们先在口头上，然后在行动上采取措施，进行报复和升级。可是这些挑衅在1964年却都被置之不顾。

在西贡，为了制止搞政变，制止这种破坏行动作了努力。这些政变的消息经常在美国报纸上传播，越来越难以使美国公众相信在越南的斗争是必要的。于是在1964年越南问题就不能再当作次要问题来看待，那儿的局势把越南、它的全部弱点，暴露在美国人民面前；然而这一年里，美国最高的决策者们不想作出重要决定，试图往后推迟，来给总统多赢得一点时间。此外，林登·约翰逊还喜欢有挑选的机会。因此，那是白白度过的一年；争取进行政治谈判的机会错过了，重新考虑美国态度的机会错过了，也许能使美国公众相信不值得卷入越南、相信越南人并不那么在乎战争的机会也错过了。相反地，他们却不采取行动。他们并不认为时间对他们不利，从而决定在1964年不去处理越南问题，而留有将来选择的余地。他们不愿落入圈套，他们要谨慎地有充裕时间来作出决定。他们主要是一些搞具体工作的和搞策略的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搞策略的人想的是如何选择，而知识

分子不大这样想；知识分子想的是历史潮流，并不认为在越南问题上，十二个月会有多大变化，而如果1964年 304
历史的潮流是糟的话，那么1965年只可能更糟得多。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而这全然是一种幻想。在1945和1946年，美国假如从实力出发来打交道，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一种政治解决，一种有利的解决；但自从那时以来，时间无情地把选择的机会快要封死了。由于对方——越南共产党的军队逐步壮大起来，而美国则日益陷入那种认为越南问题是生死攸关的看法（那时还不是它的全球观点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断减少了。

因此，过去的几年已经表明，时间越往后拖，选择的机会就越少，这在1964年也是如此。一年以后，共产党人将相应地强大起来，西贡政府将相应地削弱下去，而美国既已在东京湾使用了武力，将相应地承担更多的义务。1965年，即一年以后，乔治·鲍尔在他那份试图让我们从越南脱身的最后和最重要的文件中，一开头就引用埃默森①的名言写道，局势成为主宰，势将驾驭人类。当约翰逊他们要作出最后的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有选择的，但是真正的选择权却早已丧失掉了；他们在1965年所作的选择却是虚假的。有了他们那种观点、有了他

① 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诗人、评论家、哲学家。——译者

们那种对于国家和对于他们自己政治前途的概念，他们就必然会作出某种不可避免的、完全可以预测的决定，可是他们仍然抱着那种幻想，以为他们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他们自认是有理性的人，那是最主要的。他们不是理论家。理论家的行动是可以预测的，而他们的行动无法预测。因此，认为象他们那些有知识、有理性、有教养和文明的人到1964年初就落入了可怕的陷阱，认为他们度过了在陷阱里越陷越深的整整一个年头，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会第一个出来加以否认。如果在那些日子里，有人把他们叫到一边，对他们说，他们那些善良的、有理性的人已经拴在一个荒唐透顶的政策上了，这个政策看上去十分合理，却是以几个极其错误的假定为基础的，并且由一个极不诚实的汇报制度支撑着，这种汇报制度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虚假材料的仓库。如果有人这样说，他们一定会严加驳斥，说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在走向何处。

然而，印度支那这一进退维谷的老难题，现在终于要得出不合逻辑的结论来了。作为善良和正派的人，他们不能使用核武器，至少不能首先用来进攻，虽然也许可以用来进行报复。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国家的政策制订者，然而他们又不能使用核武器——的确，他们私下的防务政策是以不愿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特别是不能用来对付一个打游击战的小国。可是，由于冷战遗留

下来的影响、由于丢失了中国，他们决不能把更多的地盘（争夺中的地盘；不在争夺的地盘是另外一回事）丢失给共产党人了。然而我们又不能打一场长期的有限战争。朝鲜战争已十分不得人心了，而现在对于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南越政府能够和急于为它自己的主权而战的幻想，正在最终地破灭。我们不能罢休，然而我们又不想陷进去。 305

领导者自然是很好的。肯尼迪的去世受到人们的哀悼，然而约翰逊，这位新总统呢……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推动者。他奉行着肯尼迪所要的同样的纲领，但更为有力。麦乔治·邦迪隐约感到他的白宫班子对于约翰逊有严重的怀疑，因为班子里的人同肯尼迪的私人交情很深，他们都有几分象是肯尼迪和邦迪两人的化身。邦迪曾告诫其中一些人，叫他们不要对约翰逊摆出那种东部绅士瞧不起人的架子，叫他们抛掉那种狂妄自大的习气。也许约翰逊没有他的前任的优雅风度，但是他能把事情办好；也许他在外交方面不大在行，那么他就更需要他们，而他们就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因此有些人认为，那将是一个最理想的结合：外交上是肯尼迪的人员和作风，内政上是约翰逊式的劲头。如果说他们对约翰逊印象很深，那么，约翰逊对他们也是印象很深。约翰逊不仅有力量，而且尽管他喜欢自吹自擂，他的粗中有细却出乎

人们的意料，好象他有些粗鲁的作风和语气是故意想掩饰他对事物的敏感性似的。在约翰逊方面，他从来不曾有过象这样一些人为他工作。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麦克纳马拉，约翰逊称他是“我曾碰到过的最能干的人”。才华横溢的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邦迪，现在给出身于圣马尔科斯市的州立师范学院的约翰逊工作了。约翰逊并不真正喜欢邦迪，虽然偶尔也十分喜爱他，他总觉得在邦迪的作风中有时态度傲慢。邦迪介绍情况，把复杂的问题讲得井井有条，那末熟悉业务，那末干净利落，约翰逊脸上不觉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好象一个板球教练观看一个优秀的击手，或是一个鉴赏家观看一个芭蕾舞名演员一样。邦迪在跳舞，并且是为他而跳的。那是一种艺术。至于腊斯克呢……腊斯克本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腊斯克学问渊博而小心翼翼，是一个聪明人。

约翰逊敬畏象这样的一些人，他是根据他们的名气来判断他们的。过去为他工作过的其他人也同样能干，但他了解他们的底细，了解他们的缺点和弱点，已经给他们打上了他的印记。可是现在这些人却是不同的。他们本来不是约翰逊的人，他还没有给他们打过印记，最后使他们驯服，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他们的缺点。那是后来的事，只有腊斯克得以幸免。麦克纳马拉将成为一个“在福特公司只

领导过一个礼拜工作的总经理”。邦迪“只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家伙。如此而已”。可是现在约翰·肯尼迪搭起来的这个出色的班子正在为他林登·约翰逊工作，要是在过去的年月里，连投他的票他们都不会干，更不用说为他工作了。林登·约翰逊知道国会里某些显要人物的一切弱 306
点，现在却对这个班子明显地缺乏批判能力，接受这个班子所作出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如果是他自己的人作出的话，他是会表示怀疑的。几年后，在战争问题上曾经同约翰逊进行斗争而失败了的乔治·鲍尔（他对约翰逊倒还相当有感情），在谈到那个时期以及约翰逊同肯尼迪班子的有名人物的关系时说，约翰逊并没有吃他受教育少的苦，他是吃了自以为他受教育少的苦。

1964 年，领导班子对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专业能力满怀信心，推迟了对越南问题作出决定，同时允许政府有关部门去策划战争。同年年初就有了这种迹象。回过头来看，种种迹象合在一起表明在越南问题上是无所作为的。然而那是后来才比较明显的，在当时还是掩盖得很好。当时，总统周围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忙于计划竞选活动和制定将来的“伟大的社会”的宏图。他们确信，越南问题似乎是一块绊不倒他们的绊脚石；用正在起草的讲演稿的话来说，约翰逊不想扩大战争；他是想同对方讲道理的。可是，即使在 1964 年初，处理越南问题的圈子也

越来越小了。参与者和决策的人越来越少，抱怀疑的人都慢慢地被排斥出去了。那些负责这件事的人是按照非常刻板的原则办事的，情报机关的各种预测都被扔在一边。尽管这些情报估计仍然十分黯淡，但是那些人还是按既定计划行事。

麦克纳马拉经过了许多周折才了解越南问题。当他在1963年12月到越南去的时候，他开始懂得在现场要找的是什么。他仍然不知道对方的恢复能力是多么强，而南越的结构是多么脆弱。他在发现对方更强大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对比实际上是扭转不过来了；他以为更大的作战努力、正确的计划和更多的物资是可能扭转局势的。他也学会了如何看透哈金斯的汇报；他对于过去哈金斯告诉他的情况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这次表现出来了。有一次开会，当他询问一个下级军官并隐约感到那个军官快要讲实话的时候，哈金斯和理查德·史迪威将军却一直在打断他，企图辩解和制止那个青年军官回答问题。突然，麦克纳马拉怒不可遏地转身对着他们，脸色胀得通红地说："我是向那个少校提问题，我要得到他的答复。"那是一个极其紧张和严厉的场面。他回到华盛顿以后，就跟麦康一起商量。麦康也为西贡发来的汇报而烦恼，感到在过去几年里太多东西被滤过而没有报上来。他们觉得形势很坏，决定对局势进行一次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联合情报调查；他们至少应该让总统

知道一个尽可能诚实的估计。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让 307
这样做，他们要控制他们的情报系统；汇报和对汇报的重新估价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个拟议中的调查可能对某些很重要的将军不利，也可能由于调查小组对越南局势前途的预测，会从军方手里夺去一部分权力。（调查小组不仅会指出局势多么糟糕，而且可能预测对方也会增加兵力。）调查小组对战局提供的估计，可能远比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所提供的更为悲观；后来它确是这样。

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调查的事搁置起来了，可是中央情报局却决定无论如何要进行这桩调查，并派出了一个约十二人的小组，全都是专家，每人都在越南有过五年左右的经验。他们的官方名称是“联合小组”，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特殊渠道发给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电报却说，别去相信它。军方又一次得以坚持它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这一次是顶住了国防部长的最大努力。那个特别小组的报告是十分悲观的，但它对军方的总的估计却毫无影响。

最主要的是，对于同河内和越共可以达成什么样的妥协，中立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没有真正的调查。因此，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探索的一年白白过去了，其原因要从美国国务卿的性格和观点中去寻找。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相信武力，他相信承担义务，他相信国务院的恰当作用是在军方已经扭转战局以后去负责谈判一个靠得住

的和平，他相信国务卿应当听从总统，而他本人不应当表现太突出。一个哈里曼或是一个鲍尔可能采取主动，从事他自己对和平的探索，得出结论，认为越南问题在政治上是毫无希望的，从而在军事上也是毫无希望的。可是腊斯克却宁愿等待，让事情来找他。他确信军方的估计是准确的，确信将军们可以获得他们自称能够获得的成功。他是负责美国政策的政治方面的一个个性坚强、工作勤恳、学识丰富的人，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国防部长——这对他是一个天生合适的职位。他在那个时期没有推动谈判是因为他不相信谈判，他还担心就连谈判这个想法也将使软弱的西贡政权变得更加软弱。

迪安·腊斯克不愿对军方的需要和要求提出疑问，因为他担心发生象迪安·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之间存在过的那种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分裂，他不惜一切来避免这种分裂。特别是，他不喜欢在政策问题上跑在别人前面，他宁愿让麦克纳马拉一马当先，填补
308 领导真空，甚至侵入他的地盘。这一切都使他在国务院的下属非常苦恼，他们在听到国防部策划对越南问题采取某一种政策时，一再跑到腊斯克那里表示抗议，试图使他进行干预，加以限制。他们很少成功，甚至连让腊斯克打电话给麦克纳马拉把问题提出来也不行；即使腊斯克打了电话，振振有词和富有自信的麦克纳马拉也照例不

加理睬。例如在1965年，当国务院听到军方准备用巨型B—52轰炸机空袭越南的时候，下级官员到腊斯克那里恳请他阻止轰炸，说轰炸对越南不会产生什么作用，而它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应却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和腊斯克进行了有力的争辩，最后腊斯克才拿起电话筒来同麦克纳马拉通话。

腊斯克转达他们的怀疑时他们都在听着，他说："罗伯特，这里有些人对轰炸感到不安。"他问道，这是真有必要吗？他本来不想在这种问题上麻烦麦克纳马拉的……然后，腊斯克沉默了，他们几乎可以想象麦克纳马拉在电话那一头干脆叫腊斯克放心的情景。麦克纳马拉讲完了，腊斯克又讲了起来："好吧，罗伯特，既然一毛钱已经赌上了，那么一块钱也得赌下去。"于是他把电话挂断了。

迪安·腊斯克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人。他不留下任何个人文件，也很少给别人留下可以回忆的东西和印象。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了解他，他是一个摸不透的人；他首先把自己和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各种各样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他的好朋友。他们是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亲密的老朋友，已经认识他好久了。在有人想要了解腊斯克时，他们说，他们很高兴、很愿意谈谈。是的，迪安是一个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们谈来谈去，结果总是一样的，总是谈了一些对迪安的初步看法：他是一个好人，

有责任心，工作勤恳，学识丰富，严肃认真——如此而已。也许最后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从来就是老成持重的。最后他们支支吾吾地承认，仔细想起来，他们对他了解很少。

他爱当国务卿，爱这个头衔和它的排场以及它所意味着的东西。他知道自己担任这个职务有多久了，连日子都计算得一清二楚，他会这么说："我现在是世界上第二个担任外交部长最久的人了"……"今天我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二名资格最老的成员。"他所向往而从未获得的一项记录，是象科德尔·赫尔在美国保持的那样长的任期；腊斯克成了历史上第二个任期最长的国务卿。很不错了。在历史书里占上小小的一个角落。许多批评他的人——那些肯尼迪政府里的人们，谈到过他的下台迫在眉睫，而且诋毁他，可是他们在任职两年后就离职去写他们的书了，有时是自愿的，有时并不那么自愿，而腊斯克却留了下来。他始终是专业人员。外交是一种专业，而他是一个专业人员，一个认真的人办认真的事，309 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本色。他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外交，在马歇尔、艾奇逊、罗维特这样一些大人物的手下当过门徒，在国务院里努力往上爬；他在那里的晋升简直象流星一样。诽谤他的人忘记了，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里，在国务院里的竞争是激烈的，而腊斯克却升得比国务院里任何人都快。后来他短期内脱离

了政府，进了被看作是影子内阁的基金会，然后又回到华盛顿，回到他所热爱的职业上来，有机会接过那个与其说是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传递下来的，不如说是马歇尔、艾奇逊和罗维特传递下来的火炬，举着它，并在八年以后又把它传给了别人，而世界形势则依然如故，也许不比过去好多少，却也幸而并不比过去更坏；他会说，他的希望不过如此，不好也不坏。

他是在一个不以谦虚著称的政府里的一个谦虚的人，是在一个不以礼让著称的政府里的一个讲求礼让的人。他讨厌他周围那些外行的人、好事之徒、知识分子，他们把权力看成儿戏，拿他们的理论在世界上做试验。他们是围着乔治敦鸡尾酒会转的一些聪明伶俐、夸夸其谈的人，象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古德温、凯森之流。他们给总统直接打电话，用打电话和走捷径来打断正规的渠道。

他对自由派感到烦恼，他本人就是一个自由派，虽然不是怎么道地的一个。自由派真正了解共产党人吗？他们到华盛顿来呆的时间又不长，不是很可能在外交事务方面多管闲事和上他们自己的良好意图的当吗？外交事务是有些特殊的，对于好心肠的理想主义者充满陷阱。下面就是这样简短的一幕：1962年，苏联人显然恢复了核试验，肯尼迪正在决定是否再进行试验。艾德莱·史蒂文森问道，如果美国不试验，会发生什么事。杰罗

姆·威斯纳回答说，美国的核武器比苏联的好，因此如果美国推迟恢复试验——他称之为一种表示善意的推迟——也没有太大关系。然后，史蒂文森(想当国务卿的人；腊斯克在1960年曾作为斯卡斯代尔地方“争取史蒂文森当选公民委员会”主席曾为他效劳，这是到那时为止腊斯克担任过的最高政治职务)说，也许美国在这样的问题上，该冒一点战略平衡的小小风险，它应当努力争取道义上的领导权。这时腊斯克突然插入说：“我才不愿为了道义上的领导权而作半点让步。把道义上的领导权看得太重要了。”一位年轻的白宫助手记得那次使他大吃一惊的谈话。从那以后他想到腊斯克时总是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他想，在腊斯克去世的时候，那句话应当刻在他的墓碑上，作为他的墓志铭。

腊斯克是一个自豪的人，一个贫穷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贫穷而自豪，他对贫穷是敏感的，但那种敏感表现在他的自豪上。(在那个时髦的、平等的肯尼迪时期，他们一伙人致力于改进公共教育，想使一项教育法案得以通过，那时候还有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吗？)他因贫穷而感到的自豪几乎达到蔑视一切的程度，常常向他的国务院的助手们提到，他那个国务卿的差使使他赔了不少钱。1960年第一次要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他对哈里曼说，他认为他无法担任，因为这个工作需要他在钱

310

财方面作出很大牺牲。哈里曼叫他别着急，在他卸任的时候将会有许多职务等着他，而且是油水很多的职务。可是哈里曼错了。两个人都没有预料到越南问题及其对腊斯克产生的影响：使他几乎找不到职业，而且由于他决定在越南问题上干到底，使他成了越南政策的批评者的头号靶子、或者是仅次于约翰逊的第二号靶子。他后来遭到诬蔑，可是他是高傲的，拒绝对那些攻击和批评进行答辩；他是不屑于此的。朋友们竭力劝他答复某些批评、进行反击。可是他认为这样做不合适，这倒不是因为考虑他自己，而是因为考虑他的国务卿身分。

他是一个善于克制的人。始终沉得住气。他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外交家，至少在有限的意义上是如此，也就是说，他对别人很讲外交。他每年都要到联合国去同一大群来参加开幕会议的外交部长们接触，他同每一位外长会见，善于应付他们。他的助手们认为这种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应当交给下面的人去做，腊斯克觉得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正如他在 1962 年认为他们是错误的一样，当时他拒绝放弃主持每年国务卿举行的两次盛大的外交宴会之一而到拿骚去；肯尼迪那时正在拿骚会见哈罗德·麦克米伦，讨论美国和欧洲的核防务体系。腊斯克没有自己到拿骚去，没有让乔治·鲍尔处理外交宴会的事，却派了鲍尔代表他到拿骚去，这就给麦克纳马拉一个机会，在拿骚起了太大而又太笨拙的作用。那些了解国务卿作

用的人们相信，第一，这是腊斯克屈从国防部的最典型不过的例子；第二，他比麦克纳马拉更小心谨慎、更深思熟虑，本来是可以防止在拿骚作出的决定的，那些决定鼓励了戴高乐在欧洲独行其是，并把英国排斥在共同市场之外。）腊斯克会见各国外交部长时，给每个人一样多的时间，表现了一个辛辛苦苦工作的人的耐久力、巨大的忍耐能力和始终如一的那种克制力。只要有可能，他从来不把他自己、他的情绪或思想公开或者私下暴露出来，即使是在许多人认为是他的巨大胜利的时刻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一个审议民权法案的众院委员会上发言，他用十分强烈的证词（“假如我是一个黑人，我想我也会起来斗争的。”）使每个人吃了一惊。那是他的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委员会喝了采，报界喝了采，他的下属感到骄傲和得意。在他离开委员会的会议室时，他转身对一个朋友说：“你不认为我走得太远了吧？”克制是重要的，那是你的锻炼、你的态度的一部分；它是和一个人的地位相称的。如果你缺乏克制，你的下属怎么会有克制呢？
311 如果腊斯克正在看一份文件时有一位助手来到他那里，这位国务卿仍将继续看下去，即使那个助手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这是一种十分令人狼狈的习惯，而腊斯克却只是解释道，多年以前，他曾发过誓：他要是拿起一份文件来看，就一定要把它看完。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他。他周围的一些人有时把他那种有意识的克制看成至少部分

是为了防止不安全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手段；他依靠严格保持克制来保护他自己，不让自己忘乎所以。

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克制，知道生活中有逆境，需要严格的自制来应付生活的逆境；在个人作风上，他是一个过去时代的象征。你处世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而规则是十分严格的，你不能随心所欲地照你自己的想法办，你要按照你上司的想法和意志来为他们服务。可以说，迪安·腊斯克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个人的。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和一种严峻的教养的产物，在那里，受到尊敬和珍视的行为恰恰和一般的相反：为了别人的利益、为了一种更大的势力的利益而放弃和牺牲你自己的意志、愿望和成见。牺牲是重要的，而牺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报酬。这一切都是他的性格的组成部分；他周围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①新教徒。几年后，当尤金·麦卡锡怀疑腊斯克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否真实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这些看法确是真实的，腊斯克完全是同杜勒斯一个传统，一个出来制订政策的加尔文。可是，爱把神学和政治混为一谈的麦卡锡摇摇头说，不对，不是加尔文，加尔文只不过写下了他的

---

① 加尔文派是基督教中由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所创立的一派，它反对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治理教会。——译者

哲学，他没有强加于人。麦卡锡说，腊斯克和杜勒斯的关系，犹如克伦威尔①和加尔文的关系。腊斯克是一个佐治亚州的穷孩子，上帝赐给了他好使的脑子、强壮的体格和过人的精力，他的义务就是去发挥这些特长。这些都是林登·约翰逊完全能够了解的；约翰逊也具有那种同样的观念和相似的出身。在腊斯克方面，他有点象政府机关的一个雇工。他所受的教养曾教导他去服务而不要怀疑。这立刻就使他同许多肯尼迪的人分道扬镳了，他们是从善于怀疑周围的一切中得到推动力的。有一次，在佐治亚州的记者访问中，腊斯克谈到了他的加尔文派父亲给他灌输的某些信念。这些信念是：一种"区别是非的重要性的观念，那是始终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认为，有一种礼义的观念、一种遵守固有秩序的观念、一种在总的格局中各尽本份的观念，满怀忠诚和信心，对教育具有强烈的兴趣……"他对这些传统和制度毫不怀疑；它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有智慧的人经过长期思索，使之形成的；他也并不认真地怀疑这些制度当前的表现，那也不是碰巧发生的；确实，他觉得，同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着的混乱对比起来，

---

①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将军和政治家，他在1648年清洗了议会中长老会的势力，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公"。——译者

美国和西方的制度是令人赞佩的。

他是属于安份守己的那一代的人物，这是一代的特点。他的看法是同上一代相近的，而在迪安·腊斯克的家庭里，道德准则却起了变化，变得不那么保守：一个儿子为城市联盟①工作，并成为“反对怀特尼·杨②运动”的一员，因为杨过于稳健了；一个女儿嫁了黑人。在腊斯克的家庭里，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儿女们都更为自信，更愿意向当前的秩序挑战。有一位很了解他、喜欢他和尊敬他的白宫人士说：“腊斯克和我们其余的人不同。他出身贫苦，而我们不是这样；他确实要算是我父亲一代的人了。他们不露感情，不发牢骚，工作勤恳，地位上升；人们感觉到，腊斯克的脑子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不允许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相反地，想什么都有种种限制。有严格的范围。” 312

家乡的土地是坚硬而贫瘠的，人们从中得出很严峻的教训。大家仍然笃信《圣经》所教导的关于德行和罪孽的概念。谁也不曾指望能过舒舒服服的生活。对于过错是毫不宽容的。这里没有任何享受行为，在这里长大的

---

① 城市联盟，全名为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是黑人组织，1910年成立。——译者

② 怀特尼·杨(Whitney Young)，是全国城市联盟的执行主席。——译者

人不谈论生活的风格，他们谈的是上帝，是服务；是干上帝要他们干的事。利用上帝赋予你的东西和服从权威，就很受人称赞，否则就会警告你前途不妙，至少认为你刚愎自用。人人把感情藏在心里。这方面腊斯克自己说过："我们是相当安静的一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表达我们的感情。我想这是我们沉默寡言的一部分。也许它是和加尔文派的教义相符合的。也许它是从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来的。也许它是从我们家里同土地作艰苦斗争中产生的，因为家里不得不在屈罗基县的不太肥沃的土地上勉强过活。"腊斯克记得他幼年时参加他祖母的丧事的情景。在那时，有些人家的丧事是件吵吵闹闹的事情，用大声嚎啕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感情和痛苦是以哭泣的多少来衡量的。腊斯克的一家却与众不同；它叫吊丧的人不要哭，那些邻居们大惑不解，问他们为什么，腊斯克家里有人回答道："我们的感情藏在心里。"我们的感情藏在心里。大约五十年以后，也许并不令人奇怪，迪安·腊斯克打电报告诉他的大使们，要他们在电报里不再用感觉这个字眼；他对于他们如何感觉是不感兴趣的。当他受到肯尼迪的人、自由派和知识分子攻击和公开嘲笑的时候，他总是逆来顺受。我们的感情藏在心里。忍受痛苦，忍受屈辱，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忠于你的信念和你的传统，那么一切都将自动改正。腊斯克和杜勒斯
313 两人都是道学家；杜勒斯是公开地、几乎是肆无忌惮地把

他的道德信条讲得天花乱坠，从他的国际讲坛上来鼓吹；而腊斯克也许对道德信条感情更深，但把感情藏在心里。

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师，是在一个产生和尊敬传教师的地区中的传教师，如同纽约市后来将产生和尊敬精神病学家一样。严格的教养，辛勤工作和态度虔诚。在星期日早上来到腊斯克家的其他孩子们是准许看滑稽画报的，而腊斯克家的孩子却不行，他们可不准享受这种轻浮的乐趣。这是上帝的意旨。后来，父母稍稍放松了一点，允许他们偶而也看一下。虽然腊斯克的父亲罗伯特·休·腊斯克是一个穷苦的白人，他却不是无用的人；虽然他们收入有限，他们一家却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一种教育万能的信念，这象迪安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狂热。再往西去，在得克萨斯州，在差不多同样的环境里，一个年轻的林登·约翰逊将成长起来，对于教育的无所不能怀着同样近乎神秘的信念。

罗伯特·腊斯克是他父母的十二个子女之一，他读完了南方最好的学校之一——戴维逊学院；他从那儿升入路易斯维尔神学院，在那里成了一个授职的牧师。他后来由于一种喉症而不得不放弃牧师的职务；也许这样一来，作为声带失灵的一种赎罪，腊斯克一家信奉加尔文派教义就比传教师家庭还更虔诚了。他的妻子是弗朗西斯·伊丽莎白·克洛特费尔特，腊斯克提到她时说："我相信她是洛克代尔县最漂亮的姑娘"，这位严肃的、野心

勃勃的青年传教师就获得了这个最漂亮的姑娘。“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人，就象那时候穷苦家庭或者小康之家的主妇那样。我们的衣服大都是她做的。自然，我们的衣服自己洗。在我的门廊里我现在还有那个黑色的洗衣盆，我那时在盆下面生过几百次火来烧热家里的洗衣水。她自己进过师范学校，教过书，并大大加强我父亲对书本和学习的兴趣。她还是一个在长老会教堂里虔诚地做礼拜的人。”三个儿子全都干得不错。一个在政府里飞黄腾达，地位确是很高；罗杰成为田纳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老大帕克斯由于不得不多干些体力活而上学不多，也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新闻记者。1912 年，迪安三岁的时候，严重的水灾使腊斯克家的收成遭受了损失，他们迁到了亚特兰大市，孩子们是在那里带大的。罗杰说：“土地不要我们。”

年轻的迪安是十分向往教会的。他的一个姊妹记得他曾绕着房子走，大声朗诵《圣经》。他们一家都把《圣经》背得烂熟，而熟记《圣经》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大声朗诵。他是基督教励志会的积极分子，那是一种青年的课余小组，他们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对基督徒的生活进行研究。他经常每星期上两次教堂，至少到他在中学读了一半以前，他一直想当一名牧师，可是那时候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展现出来了。

314

那是一个良好的童年时代，那么单纯而朴实，以致腊

斯克在一生的很长时间里相信（事实并非如此），是一个兽医给他接的生。艰难困苦经常发生，但是都可以对付过去，因此在他长大成人时就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任何障碍都可以克服，认为辛勤工作是可以战胜任何挑战的。他第一次上学是在亚特兰大的一所简陋的小学里，校舍有一半是没有屋顶的，下雨时就拉开帆布把房子的一部分盖起来。因此他上的是露天的学校，冬天提着羊毛织的袋子，早上带着热砖头到学校去，把砖头放在袋子底下取暖。迪安在六年级时开学那天，老师对他说，明天一定要穿着鞋子来，因为他们在努力消灭钩虫。迪安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鞋子在腊斯克家是不多的，腊斯克太太就写了一张字条说，老师该管她那一头的事，就是教育好孩子；而腊斯克太太则将管她这一头的事，就是把孩子喂饱穿暖。迪安第二天光着脚到校，并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认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典型地说明美国是充满机会的国家，认为美国人腊斯克的经历对其他人也有教育意义。他后来常说，过去屈罗基县是一个不发达地区，有伤寒症和其他问题，可是它一切都改变了，并且现代化了。“我在一生中看到了我童年的环境是如何由于教育、工业技术、县里的官吏和电力彻底改观的——所有这一切使那里的人解除了压在身上的重担。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可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发生的，我不听信那些说什么

不发达国家还需要两三百年才能发展起来的人们，因为我知道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已经亲眼看到了事实。”

迪安在小学里很不错，虽然他有一次在拼字比赛中输了，因为他拼“女孩”这个词的时候用了粗俗的写法，把“girl”拼成了“gal”。还能有一个在出身和传统方面同林登·约翰逊这样完美地合拍的国务卿吗？在1964年那个时期，他们两人的关系跟几乎任何其他人都不同，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彼此交往中感到十分自在，如果他们同坐在一架飞机上，他们就兴高采烈地谈得没个完，好象两个小学生在放完了暑假后重聚在一起一样。腊斯克周围的人这样想：腊斯克在肯尼迪手下时讲话带一点斯卡斯代尔的口音，现在又变成更带佐治亚州的口音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有一次，林登和迪安在约翰逊牧场上散步，后面跟着一批华盛顿的高级助手，约翰逊自豪地让他们看各种简单的用具。有一件特别使他得意，那是一件旧物；他指给那些莫名其妙的东部人看，并说：“你和我知道这是什么，不是吗，迪安？”从迪安脸上浮起了表示会心的笑容，使他想起了许多年以前的事。那是一个在屋里用的旧尿罐。

315

腊斯克还在童年的时候就有过一些越出屈罗基县的梦想；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被军人吸引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迪安还不满十岁，罗杰把报纸上的士兵照片剪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罗杰记得有几千张。罗杰和迪

安挖了三十呎长的战壕，演习了所有的战斗计划。罗杰·腊斯克说："在城里的有钱人的孩子，谁也没有我们那么多的士兵。"又说："人们对迪安不了解的是，他对军事的爱好有多深。这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一部分。南方一向有尚武精神。"这种传统是十分真实的。南方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军事学校，并产生了百分比高得异乎寻常的职业军官和荣誉奖章获得者。这个传统也是腊斯克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在南北战争时期打过仗，尽管是在南部同盟方面；后来要他填忠诚调查表，列举任何试图推翻美国政府的亲戚时，他就把他们两人的名字都填上了。

他是在那个时代少有的人，一个青年人念完了中学，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受过八年预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因为他除了宗教课程之外，还发现了别的吸引他的东西：军事训练。他在亚特兰大男子中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呆了四年，升到指挥亚特兰大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所有部队，是一个学生上校。"唔，当然咯，在南部，我们成长起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发生什么麻烦，如果国家要打仗，我们就要参加，这是理所当然的。南北战争的传统在我们身上仍然很强烈……我们都假定要去履行一种军事义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天职。"他把宗教和军事义务感融合在一起，而且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矛盾。那个地区的道德准则仍

然同边疆的道德准则十分接近；那是一块有许多敌人的艰苦的地方；那里的道德准则告诉人们，假如邪恶横行，对此决不能容忍；你如果软弱或者容忍邪恶，它就要把你吞噬掉。

腊斯克曾受到一个在牛津大学留过学的中学教员的鼓励，要他去争取罗德斯奖学金。他是一个真正不同一般地勤奋和克制的、有出息的青年，全校最聪明的学生，他不用别人帮助就能对答如流——为什么在罗德斯奖学金审查委员会他就不能表现得很出色呢？严肃而专心致志的腊斯克在中学时已经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对他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一个法律事务所当过两年办事员，挣了钱去进戴维逊学院。在学院里，不论学习还是预备军官训练团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他都又一次表现出众，他在那里积累了一个足以成为罗德斯奖学
316 金的有希望的候选人的出色的履历。他是法埃·贝塔·卡帕荣誉学会成员和预备军官训练团的上尉，他还是篮球队和网球队的队员，这些都是对于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极其合适的，因为西塞尔·罗德斯喜欢在健全的高加索种人的体格上培养健全的思想。罗德斯奖学金的委员会由当地权势集团的要人组成，极善于挑选未来的优秀公民。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作为一个集团来说，学识是丰富的。他们是受人尊敬的，而不是不守本分的；是建设者，而不是批评者。当面口试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表现

出做好事的倾向的人受到赞扬，这种品质受到尊敬和鼓励，而对于一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则有所怀疑。

腊斯克象可以预见的那样，顺利通过了口试。主考人问，既然他对国际问题有兴趣，为什么又在预备军官训练团呆八年？他的回答（使人联想到后来他在富布赖特委员会①的答问）说，美国国徽上的鹰一只脚爪里有几支箭，而另一只脚爪里有橄榄枝，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他获得了这个奖学金，这对他是决定性的环节，很大的推动。在这么广大、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里，测验智力、成就、能力的办法很少；因为少，所以现存的一些办法的作用马上就被夸大了。头衔变得特别重要；所有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都变得出类拔萃了，就象所有前海军陆战队员都是顽强不屈的一样。在美国，要成功，要飞黄腾达，必须依靠某种推动力；才干本身有用处，但除了极少的例外，光靠才干是不够的。金钱有用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有用处；对于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来说，成为权贵的道路看来就太远、太渺茫了。罗德斯奖学金往往是进身之阶。那是一个青年不是不知道的青云直上的途径，它将使得他们今后的生活顺利得多。别人的大门将为之大开，请帖将纷至沓来，电话的铃声将响个不停。因此，有一个被带到罗德斯奖学金委员会那里去的年轻的申请人在口

① 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富布赖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新任国务卿须经过该委员会确认。——译者

试的末尾，问到他在他的墓碑上的铭文要怎么写的时候，他迅速地回答道："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于是他就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从那时起，腊斯克成为一个有点名气的人了；在任何申请书上，头衔会跃入眼帘：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他在大战期间当了一名参谋军官，他的意见是有份量的；他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因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军人兼知识分子。后来，对于一个因其越南政策而挨了知识界批评的美国总统来说，似乎很可以自慰的是，我的国务卿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他的成就使得他的谦虚和对别人的宽容更加令人赞美：迪安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他却连一点架子也不摆。于是，罗德斯奖学金，加上腊斯克的才智，他的勤劳、干劲和雄心，使他一帆风顺，并为他打开了那个东部的伟大权力中心的大门。迪安·腊斯克，他是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啊！

317 那些年正是发生经济大恐慌的年代，可是对腊斯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在那个时期从南方农业区来的其他人，也许会受到他们所目睹的普遍贫困的影响，但腊斯克关心的却始终是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在他留学牛津大学的两年中，即使按照那时的标准来看，他也被认为是极端用功和勤奋的；他在英国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奖赏，并象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很尊重英国人那种含蓄的幽默

的特性。在他轻松并同知心朋友在一起而感到很自在的极少场合，腊斯克的确是可以很爱开玩笑的，但这方面他不喜欢公开表现出来，好象太随便会有损于他的身份。只有跟那些他知道早已尊重他的身份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随随便便。他还在德国读了一个学期书，看到了希特勒上台。他在牛津的几年最难忘怀的是这样一个信念：英国最有学问和最优秀的青年以及他们的牛津大学辩论会给了德国一个错误的印象，他们表示英国不愿意打仗。他后来对朋友们说，那是糟糕透顶的表示；要是那种表示能够多少反映比较接近于普通工人的感情和决心，那末这会对英国有益得多。他得到的教训是：上层阶级有点娇气和不够坚定，对知识分子和优秀人物不应当信任过分，而在为数众多的国民中往往有更大的机敏和智慧。

他在1934年回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密尔斯学院担任了教政治学的职务，写了一些东西，提升得很快，三十岁就当上了教务长。1937年，他同他的一个学生弗吉尼亚·福瓦西结了婚。1940年，由于他在预备军官训练团承担的义务仍然有效，他被召去服现役，当了指挥一个步兵连的陆军上尉。不久以后，正巧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他被任命负责英属东南亚地区的军事谍报工作。腊斯克上尉，腊斯克少校，最后是腊斯克上校。这是他一帆风顺的年代。他参与一个重要的小组的活动，干的事是

重要和有价值的，利用他所受过的训练完成任务；最主要的是，他成了某种重要事业的一部分。凡是认识迪安·腊斯克的人都不会怀疑那些年是他满意和兴奋的年代。有些人觉得仗打得太多了，打得不称心，丢开的东西太多了，只望一旦战争结束就把军装脱掉，能早些更好；但对腊斯克来说，那是一个心满意足的时期，他对当前工作是有充分准备的，而且干得挺好。他远离了屈罗基县，这在一定意义上使人心胸开朗；不象生活中很多事情那样，现在干的是有意义的事。社会学家劳埃德·沃纳所作的研究表明，美国人从来没有过象在战时有过的那种目的明确、大有作为和受人重视的感觉，而腊斯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起初在华盛顿、然后到中缅印战区的新德里分部
318 工作，他在分部里当了副参谋长。他也是一个参与作战计划的人，他的智力和极端勤奋使他比他周围的人高出一筹。他的两个特长初次显露出来了，促成他以后更高的晋升。第一个特长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这在德里的那种紧张和常常是爆炸性的气氛中是特别重要的；在那里，一个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它的最后的偏见、它对印度人民最后的欺压也即将告终。诚然，英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需要他们，可是美国人是理想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看不起英国的殖民主义的。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帮助建立的新秩序，不喜欢英国人对待

印度人的那种态度。在那里的多数美国人对那种态度都有反感，而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反感最为强烈。他是典型的反帝的美国人，是站在小人物一边的人，本能地同情穷苦的人。用哈罗德·艾萨克斯①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不耐烦的清教徒似的人，他痛恨说谎者、贪污分子和穿条纹衣服的高级官员”。他天生痛恨英国殖民主义，他摔了不少杯盘碗碟，在总部里伤害了一些敏感的人的感情；他不是一个呆在总部里的人，而腊斯克则是这样的人。在容易使人发脾气的新德里社会里，我们既需要英国人又讨厌英国人，腊斯克在那里是个好人，是能够应付火爆脾气的人；他圆滑，而史迪威容易伤人。你跟腊斯克谈一谈，就知道他的主张和你不约而同，他讨厌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盛气凌人，但在一个意见分歧的气氛中，他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谈得来的人。他是优秀的军人，同时又是优秀的外交家，而这些品质并没有被那个最高级的军人兼外交家、公仆化身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所忽视。

谁也没有象马歇尔那样深刻理解战争的极端复杂性，以及有关的政治问题；他也认识到美国即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出现，认识到英国即将衰落，在发挥英国人的

---

① 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R. Isaacs, 1910—)，美国作家、教授，曾当记者、编辑多年，著有《中国革命的悲剧》、《美国黑人的新世界》等。——译者

潜力的同时，需要了解他们的局限性而又不得罪他们。他从下面选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同时是最敏锐的政治家——来当他的欧洲最高司令，决不是偶然的。艾森豪威尔善于综合别人的工作，使他们发挥所长，而且善于克制自己的怒气。（事实上，他在必要时即使发怒也不露一点声色。几年后，当约瑟夫·麦卡锡诽谤乔治·马歇尔并骂他是卖国贼的时候，这位优秀的外交家、出色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为了共和党以及党的反共运动的利益，竟不顾自己的自豪和忠诚，从他的演说中删掉了批评麦卡锡和为马歇尔辩护的话。）正是这些相同的品德引起了马歇尔对腊斯克的注意——知识丰富而不狂妄自大，受过优良的教育，一个优秀的人。

腊斯克的另外一个特长也开始显露出来：他的写作能力。对于一个能够写出近乎经典式的说理文章的人，可不可以用“说理文作家”这样一个字眼？如果可以，腊斯克便是一个出色的说理文作家；他有一种写作简明扼
319 要、逻辑严密和有说服力的散文的才能，这在政府里是难能可贵的。凡是他给那些早已被各种文件负担压得太重而时间太少的人写的东西，都是简洁、尖锐的关于作战行动的电报，而不是文采华丽的描写文章。人家实际上是通过从那个战区发回来的电报，才发现他是一位作家。不久，在五角大楼那一头的神经中枢里，人们就开始谈论这个在国外的青年军官。西点军校出身的乔治·林肯

将军也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他是军界知识分子那个特殊的无形圈子里的关键人物，这些人在西点教书，发现人才，把人才提拔到重要职位上去。林肯将军对腊斯克的电报有深刻印象，他问一个朋友这个腊斯克是谁，说他好象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不认得腊斯克吗？”那个军官回答道，“我还以为你们在牛津是同学呢。腊斯克也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啊。”于是，替马歇尔寻找才能之士的林肯，就开始更加密切注意腊斯克了，把他单独挑选出来。林肯不久就决定，腊斯克的报告是所有报告中最好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因为这方面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比德尔·史密斯毕竟在欧洲替艾森豪威尔写东西呀！

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林肯认为他们需要腊斯克来处理某些即将面临的政治问题，因此他说服了德里总部，让腊斯克回来参加一个很特殊的军政小组，这个小组是要决定如何在政治上划分战后世界，它在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林肯担任联络官。由于大战期间国务院已经奄奄一息，所有的人才都被吸收到军事方面去了，这个小组便成为一个新的临时的国务院，拥有那些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必须对战后地图的画法作出迅速决定，要由哪个国家去受降，不同的国家将在哪里划分为两半。小组还要准备好日本的投降条款。这意味着拟出合适的条款，使蒋介石、麦克阿瑟和英国人都同意，并且迅速完成工作，因为否则将损失成千成万的生

命。这是性命攸关的、十分紧迫的工作，但是同时人们也认识到：犯一个错误，划错一条线，错放弃了一个岛屿，几年以后问题还要出现，缠住你不放。这个小组实际上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先驱，它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要不要让一些荷兰的海军陆战队回到印度尼西亚去？鉴于俄国人正在长驱直入，在哪儿划分朝鲜？——正是腊斯克，他查对了旧地图，挑选了三十八度线。而在大战将近结束的时候，它决定屈从英国和法国的压力而让英国人在印度支那接受日本投降，就越南问题而论，这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约翰·麦克洛埃是这个小组的组长，这个组里还包括：一位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也是五角大楼的知识分子之一的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将军（他象林肯一样，将成为腊斯克的一个知心朋友——腊斯克的老朋友从军人中来的居多），詹姆斯·皮尔庞特·摩根·汉密尔顿，还有安迪·古德帕斯特，他是一个聪明的崭露头角的军官，也是一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后来林肯对所有这些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他的这批人将以"林肯工作组"闻名。）

320

在这个掌握大权的小组里，腊斯克上校同四星将军们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人物们平起平坐。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他受到马歇尔的青睐。腊斯克打算留在陆军里；那几年是他同军界关系极好的幸福的年代。他喜欢他工作地方的气氛，他认为新的陆军将需要象他那样的人。

他的前途看来是稳当的，第一颗星已经在望，而有了腊斯克的特殊履历和现在表现出来的智力，第二和第三颗星也就不远了。他不是西点出身的人，也许他永远当不上参谋长，但他肯定将当上一个首要的参谋部成员，而这是一个良好的和有发展的前程。

正是在这个时候，马歇尔请他到国务院去。马歇尔在提拔陆军里聪明的年轻人和加快他们在军界的晋升方面是做得十分出色的，如今要想纠正一下不平衡的局面，把人才调回到国务院去。他说服了腊斯克，腊斯克也就勉强同意了。腊斯克曾和国务院里一些筹建联合国的人一起工作过，现在大战既已结束，他就到国务院的联合国司去工作，后来当上了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

如果马歇尔要他干点什么，腊斯克就干什么。马歇尔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一切优秀品质的化身、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化身。二十年以后，腊斯克还经常提到马歇尔——马歇尔曾这样说过，马歇尔曾那样干过。他赞赏地引用马歇尔关于如何对付军方的话（“总是给他们的要求打个对折，而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而且他遵循了马歇尔的工作方法。马歇尔这位退职将军是重视参谋人员的，腊斯克也就重视参谋人员；马歇尔这位退职将军是始终品行端正，通过正当途径办事的，腊斯克也就通过正当途径办事，而对不这样做的人感到震惊。马歇尔不屑对批评答辩，高傲的腊斯克也不屑对批评答辩。正如马

歇尔赞赏最优秀的军人的服务热诚和智力一样，腊斯克也是如此。他还赞赏地引用马歇尔关于现代美国陆军的话，特别是那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崭露头角的人。这些新人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一些超群的人物，知识丰富，聪明过人。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有充裕的时间，他们进了专门的学校，博览群书，到过很多地方，充分利用了那些闲暇时间，超越了他们的工作和经历的狭隘范围。他们是超群的人，比和平时期工作中所能碰到的人要来得优秀，后者的服务精神较差。因此，他和马歇尔一样，对军人十分钦佩，从不怀疑在另一个时候，是否同样适用。

321

他钦佩马歇尔的美德、文质彬彬、谦恭有礼；那是个弗吉尼亚州的绅士，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即，从来不和别人深交，从来不写什么回忆录，除了总统以外不向任何人吐露机密，始终把任务和国家放在自己个人之上。马歇尔放弃了统率大军进攻欧洲的机会，因为罗斯福需要他留在华盛顿担任不那么显赫的职务；大战后，他为杜鲁门承担了到中国去的使命，力图在毛同蒋之间谈判一个协议。他利用他的巨大威望来保护总统，使总统在这个容易引起感情激动的问题——在蒋同毛之间进行调停——上不致立即陷入政治上的争吵。腊斯克从副国务卿帮办降职到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因为那个司已变成了一个马蜂窝；腊斯克甘于承受对越南战争的一切严厉的批评，因为

他承受得越多，越能保护总统。腊斯克在卸任后所以感到苦恼，不是因为对越南问题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而是因为他担心这种批评正在使美国偏离他所深信不疑的外交方针，而这一点要比对他个人的批评重要得多。他认为这种新动向对于美国和全世界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美国和世界都是靠那个外交政策团结起来的。（遏制政策的最大组成部分——马歇尔计划，正是用他的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有什么奇怪吗？）

马歇尔称赞别人的时候，用词是简朴、严肃、字斟句酌的。好多年以后，腊斯克把那些日以继夜地工作的助手们拉到一边，对他们讲了马歇尔讲过的名言："我永远不会忘记乔治·马歇尔在当国务卿时有一天说过的话。那天我一直工作到清晨，已经长达十四个小时了，在我要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说：'腊斯克先生，你今天总算挣得了你一天的工资了。'于是我从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人物那里获得了这样的教训：如果你手下有很好的人，不需要恭维他们。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有多好。"马歇尔是斯文的，始终是个绅士，从不斤斤计较，从来不在琐碎小事上争吵不休。腊斯克在1952年脱离政府的时候，他避开了混乱的商界或政界，要在这些地方既取得成就而同时又是一个绅士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在不那么野蛮的基金会的天地里找到了慰藉，在基金会里，你可以坚持旧的道德准则而仍能飞黄腾达。作为国务卿，他把这种观念、这

种不愿参加尖锐斗争的习性带回到了国务院，他不愿跟肯尼迪的尖酸刻薄的年轻人或哈里曼或国防部、或任何其他势力作斗争。他的一个聪明的助手记得政府上台初期在人造卫星公有的问题上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国务院的头头们开会决定，国务院赞成人造卫星公有，于是在一些新来的人中间引起了一阵激动，他们刚刚看到了政策的制定。可是，国务院虽然采取了这项政策，却没有运用力量和影响予以推进，而是把问题交给下级助手们去
322 办。这些助手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政府机关中只有国务院主张这一政策。在象人造卫星一类的事情上，如果你要那样办，你就得全力以赴，否则你干脆别去管它。

马歇尔又是超越群众的，他信任的是总统和少数一些人，腊斯克亦步亦趋。同二十九岁的好勇斗狠的人和聪明的科员们（他们似乎要向所有的上司进行挑战）发生冲突，对他来说是有失身分的。因此这个国务卿只是向美国的总统提供意见，使得国务院的人十分恼火，而且的确使得总统本人也感到不高兴。腊斯克在各个方面都想学马歇尔，但两人之间有一个差别，而且是决定性的差别：马歇尔是在一个全盛和显赫的经历之后当上国务卿的。他不用提高嗓门，他就是乔治·马歇尔。他可以穿着便服，但在他内心和所有人的心里，他那将军服上的几颗星还在那里；他的朴实使得他的成就看来更为伟大。相形之下，腊斯克则是一个成就小得多的人。他的上升是

静悄悄的，不论在态度或信念方面，他留下的印象很少，除了几个局内人，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或听到过他的脚步声。他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更为出名的人们留下了记录，记录也许是好的，然而记录本身和所处的时代却使他们遭了殃，他们便销声匿迹了。腊斯克想学马歇尔。腊斯克想当马歇尔。一个没有马歇尔的马歇尔。

后来，在肯尼迪的亲信中间，把腊斯克描写成一个庸才变得时髦起来了；许多肯尼迪政府的局内人普遍认为，腊斯克在那几年的最大问题就是脑筋不灵，他就是没有聪明的邦迪一帮人那么精明。他们有一种傲慢的神气，谈到腊斯克时大家挤挤眼睛，意思是说如果到国务院里去找能办事的人，不要找腊斯克。然而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许多熟悉国务院情况的人却认为，腊斯克是国务院里业务上最内行的官员。在艰苦时期比较困难的环境中，他上升得比谁都快；在五年内他从陆军部借调来的一个助理升到国务院负责联合国的司长，又升到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又升到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帮办，这是职业官员中最高的职位。最惊人的事情是，他同任何一个特定的政策或观点都毫无联系。他是聪明而能干的，然而腊斯克这个不出头露面的人的特点是：他既能步步高升，又不和任何政策联系在一起，他后来可以是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人、联合国的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马歇尔的人、杜勒斯的人和史蒂文森的人，而并无

明显的矛盾之处。那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稳定世界和抵挡极权主义敌人的政策已经确定的时期，那些政策是腊斯克深信不疑的；在别人的指导和掌握下，他可以使出他的全部精力。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他的青云323直上似乎并没有引起周围的人的反感；别的有家族亲戚关系或上层背景的人如果提升得这么快，早已成为风头人物，会使同时代人十分恼火，但腊斯克却不会。他是他们所看不见的。的确，当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由于腊斯克同联合国的特殊关系，派他到纽约去谈判成立联合国军部队。他秘密地亲自办了这件事，没有对联合国里的任何一个美国人讲过；有一天他在美国代表团里露了面，跟人们点头打了招呼，后来就不吭一声地走了。他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连一个手指头印、一张纸片都不留，给代表团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真象个中国人。

他从来不拿他的问题去麻烦上司，也不对他们的判断提出怀疑。事实上，罗维特记得，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有一天精疲力尽地来了，他的脸色都快变青了。罗维特大吃一惊，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腊斯克的一个孩子得了猩红热，全家被防疫隔离，腊斯克大半夜都在洗床单，没有睡，却毫不抱怨，也没有要别人帮忙。罗维特惊讶地说："天哪，迪安，我们国务院里有好多人就是用来干这些事的啊！"

那时，他是马歇尔的、罗维特的、最后是艾奇逊的宠

儿，冷静、能干、从容不迫、专心致志地执行他们所制定的政策。那些年代正是奠定重大的冷战政策的基础的年代。在这些政策的设计师们看来，世界似乎是同大战以前相似的；一种极权主义势力正在威胁着西欧，必须确定防守的界线，只有武力才顶事。慕尼黑的教训是非常真实而记忆犹新的。依靠美国的武力、指导和领导下的共同安全，西方将提出对策，这种对策在1939年应当是适用的，但当时却被忽视了。这回我们已接受了历史的教训，错误将不会重犯。美国将取代英国的地位；它将安定、稳定和保护世界。因此，对于青年迪安·腊斯克来说，教训是一清二楚的：无论美国准备干些什么，它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在美国有一个伟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公正和自尊的民主国家的实力和决心时，世界上的极权主义势力将不得不尊重那个强国。

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腊斯克避开了当时最危险的争论问题，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算得上是一个专家。这个争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世界上这个重要的地方，共产主义同民族主义掺杂在一起，并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丢失中国使美国的政策——先是国内政策，然后不可避免地是外交政策——陷入一场危机和持续二十多年的痉挛状态，使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失去理性而又顽固不化。 324

许多正直而有才华的优秀人物的前程给毁掉了。腊斯克心目中的圣人也遭到了诽谤。马歇尔遭到麦卡锡的侮辱，那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元老受到了谴责。在国务卿任内制订遏制政策的艾奇逊，竟也因中国而大触霉头，说他犯了窝藏卖国贼和同性恋爱者的罪行。早在那时就善于讲挖苦话的理查德·尼克松，就称之为"迪安·艾奇逊怯懦的遏制共产主义学院"。国务院的其他显要人物也受到打击，他们的前程受到挫折。例如象乔治·凯南，还有象查尔斯·波伦那样一个无懈可击和科班出身的人在1953年也要经过一番周折才被批准出任驻苏联大使。

一小批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看到自己的前程全给毁了。他们被驱逐出国务院，身上被烙上红字①。但迪安·腊斯克不在内。腊斯克是清白的。所以肯尼迪一帮人就放心了——要感谢他们小小的宽容——其实腊斯克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受到株连，火没有烧到他身上，对这种情况早就应该引起他们的警惕了。在那个时期，他当上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而且他是自告奋勇地干这个差使的。他是自愿从副国务卿帮办的官职降一级而来当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而那个职务当时被人看成是一个自杀的位置；其时国务院早已处在右派和国会的可怕的压力之

① 源出于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名著《红字》，身上佩着红字是罪人的标志。——译者

下。他对艾奇逊说，总得有人干这个差使，而他是合格的。他说："我干这个合适。"艾奇逊回答道："为了这件事应该同时授给你紫心勋章和国会的荣誉奖章。"他就这样跳进了这个坑。但令人奇怪的是，到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候，尽管任务极其繁重，却已不再是危险的差事了。

那些受了打击的人，真正的专家们，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经历了中国的暴风雨时代，他们在四十年代后期目睹了旧秩序的崩溃、封建中国的灭亡。由于他们观察了新中国的兴起，他们认为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样说了，后来就由于自己这些预见而横遭打击。埃德蒙·克拉布在中国当了二十年外交官，早在1931年就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发生兴趣，甚至在那时就由于他对这方面的钻研而遭到过攻击。人家说：既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那么感兴趣，不就说明他喜欢它吗？他的人事档案材料里有一张单子，列出人家对他提出的非常荒唐的各种疑点，都是早期某些人讨厌他如此热中于分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而告他的状。戴维斯和谢伟思一直在说，共产党人将要赢得胜利，他们建议美国应作好同新中国打交道的准备。戴维斯写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最好还是承认它。当然，戴维斯和谢伟思是正确的，结果不出他们所料，中国丢掉了。蒋介 325
石把摊子铺得太大，而没有保存他的兵力和资源，使用于比较有限的地区，以迫使共产党人来对付他（象戴维斯等

人所建议的那样)。但当时美国国内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蒋介石必然垮台之说。(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尤其如此,但他们正竭力要求加快复员的速度,让美国士兵回家,而在那时,美国方面唯一能扭转中国局势的办法,就是派遣几十万美军去中国拯救蒋介石。)后来,需要找一些替罪羊,于是,上述的那些在华盛顿和在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便成了这种替罪羊。

但腊斯克是在中国丢失了以后才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那已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与他毫无牵连。他本人是坚决反共的,是一个拥护遏制政策的人,事实上他似乎使他周围的人们感到,共产党征服大陆,从道德上讲也是一件坏事,一个真正的敌人在中国执政了,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由于他抱有这个观点,国会当然不会找他的麻烦;在国务院同国会的关系极坏的时期里,这种观点有助于腊斯克同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共和党上台前影子内阁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向是善于揣摩国会里的气候变化的,他认定腊斯克是一个有前途的人,要同他交朋友,而腊斯克自然懂得要经常同在野的人搞好关系,于是他就悄悄地同杜勒斯结交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因此,腊斯克以清白之身担任了这个职务;他同过去没有牵连,他在那场大争论中两方都不沾边。(要是他那时站到了亲蒋的一边,以后就不会为民主党所接受了。)接着,在他就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不

到两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这更不会使他成为引起争论的人物，反而使他更加保险了。如今是大敌当前，大家都在国旗和现行政策之下团结一致。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面对着一个真正的敌人，气氛大变了，人人都同仇敌忾。国务院的任务是同军方合作，保证把事情做好。他的官职的事务性变得更突出了；既然盟军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腊斯克由于对联合国的情况熟悉，就特别有用了；他在为联合国军征集兵力方面出了很大的力。在国务院里，关于以前在中国问题上持何态度这一复杂和破坏性的问题没有人提了；现在是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时候；而腊斯克就在这里起着他的作用。他效率高，工作努力，是国务院里为军方工作的人。

对腊斯克来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困难而往往痛苦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在亚洲打一场有限的地面战争中所遭受的挫折，使他感到的痛苦正和美国军方感到的一样。他是参与决策的文职官员之一，那个决策对战争作了特定的限制，这就在实际上给敌人建立了庇护所——这样做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这却使美国士兵们在极度艰 326
难困苦的条件下作战，而这是有点难以解释的。这就是说，作为文官的腊斯克在限制着作为军人的腊斯克。在那个时期熟悉他的一些人觉得，在越南战争之前，朝鲜战争也许是他生平最痛苦的经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美国军队在不得不受到限制的条件下作战，他觉得

自己至少要负一部分责任；第二，由于他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参战，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关于这一点，他同他的亲密朋友们谈得很多。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些人，想要把他推向鸽派一边，想要使他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转过来反对军方时，他们晓得能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抬出来，对他说：啊，要是我们的升级在某方面超过了某一点，万一引起中国参战怎么办？这些人很巧妙地采取这种策略，把中国抬出来以达到较广泛的鸽派目的，这是因为别的理由人家是不听的。后来，关于战争升级问题，腊斯克可能老是感到有些懊丧，倒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干了，而是觉得我们也许是干得太慢了，觉得我们太缩手缩脚了。腊斯克在1965和1966两年对于使用武力的意见，与其他一些认为我们已经使用太多武力的文职人员的观点不同，却几乎和高级军界人士的意见完全一致，即认为我们武力用得太少了。但由于腊斯克当年没有向我们预告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事，所以朝鲜战争后来的几个阶段深深使他感到内疚。

有时腊斯克好象是承认自己在中国问题上有错误似的，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如果说越南问题象是一出大型希腊悲剧的话，那么，它也是由许多小分幕合起来才成为伟大的史诗的。其中一幕的场景是1950年的国务院远东司。在那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颇以自己熟悉中

国问题而自负。（但后来他当国务卿的时候，有一位熟悉他的属员说："在中国问题上他实在是一位摩西①的老奶奶"，因为他每年都向中国科提出一张关于中国问题的详尽而有点过时的问题单子，其中包括诸如某些地区从中国分立出来的可能性、回到军阀割据时代的可能性等问题。）当时他下面的中国科的科长是埃德蒙·克拉布。此人有见识，坚韧不拔、文笔稍嫌迟钝，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一个真正的专家——不仅是关于新中国而且也是关于苏联以及满洲边境一带的专家。按照他的一些同辈的看法，他的文笔不如谢伟思优美，处世不如戴维斯老练。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他在侨居中国的老一辈比较守旧和富有的美国社会（那是外国人小天地里的美国上流社会）里树敌很多。当他在三十年代初期着手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引起了怀疑：他不是太看重这些人了吗？他们无非是一帮土匪。他不是太同情他们吗？在那乌云压顶、中国问题专家们当众受辱的时候，克拉布也在挨整之列。加在他头上的十大罪状之一，是说他1931—1934年在汉口曾同共产党人有联系。 327

朝鲜战争爆发时，克拉布已回到华盛顿当了中国科

① 摩西(Moses)是《圣经》故事里古代犹太民族的领袖。这里讽喻腊斯克对中国问题的了解陈腐不堪，却要摆出老资格。——译者

科长。实际上，在6月下旬，他正在度假，但鉴于朝鲜局势的发展，他中断了假期。他了解中国人，了解他们将极严重地看待关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从7月中旬到10月初曾先后上呈了三个正式的备忘录，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介入的危险。但尽管他是主管地区的专家，却没让他出席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举行的重要会议，他的警告被置若罔闻。多年后，他猜想他的官僚机关中的上司们那时已知道国务院的忠诚安全调查委员会即将对他进行彻底的安全审查。因此，他非但未能在最急需的时候专心致志地运用他的专门知识，反而把1951年耗费在应付安全审查的激烈而痛苦的斗争上了。到了1952年初，对他的指控撤销了，但同时他被调到历史研究室去了。他知道自己前程已遭到严重的打击，就退出了外交界。为此，美国政府丧失了一个十分难得的专家，而在这时，迪安·腊斯克却青云直上了。

腊斯克结果成了在新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派，而朝鲜战争一发生，他就心安理得了；同共产党人打仗和较量几乎成了道义的问题。美国是守法的；共产党人是违法的。我们戴白帽子，而他们戴黑帽子；我们的士兵不奸淫妇女，而是请人吃口香糖。他在那个时期发表的一篇演说确实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因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人们便信以为真：

我们的外交政策已在下述各方面反映出来：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我们愿意遵守国际法，我们对因战祸而缺吃少穿的人们给以救济，我们支持自由选举和民主政府，我们建设工厂、水坝、发电厂、铁路、学校和医院，我们改良种籽、畜种和肥料，我们繁荣市场，我们用种种办法来帮助别人提高技能和技术。让这些事情来同另一种外交政策对比一下吧——他们企图扩大暴政，利用谎言、破坏、猜疑、暴乱和暗杀作为工具。美国的巨大力量致力于我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和人类的正当主张。但是任何政权或几个政权的集团，想无法无天和进行侵略活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要遭到美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不幸的是，按照一般规律，破坏法律的人总是掌握主动权的，但争取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能够而且必将使他们自己强大得足以维持和平……

这是腊斯克的很典型的话，而他也是相信这些话的。328 腊斯克的这些话表达了他真正的观点。1965年，腊斯克接见了一批中学高年级学生，并向他们谈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的理由；当时在场的他的一个属员觉得他虽然振振有词，但无非是一些强词夺理的话。可是，第二天当他看到腊斯克就同一个问题上呈总统的一份“绝密件”——最高一级的保密文件——的时候，他目瞪口呆了，因为文件内容同他与学生的谈话逐字逐句地毫无二致。

腊斯克的演说极有助于人们研究他的思想；此人相信自己的出身和经验——他认为民主国家自然就是好的，极权主义国家自然就是坏的。这种观念有助于说明

他的立场为什么那么强硬。但它也表明他的信条具有某些危险性，因为象他那样死抱着某种概念和事实不放的人一旦持有这种信条，便不会去考虑历史具有变化多端的特性；不会去考虑历史的力量可以同样容易地使民主国家带有侵略性；不会去考虑在一些小国眼中，大的民主国家显得是霸道的；不会去考虑所谓正义和正当立场在世界不同地区是有不同定义的。讲那些话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只管鼓吹他自己的概念，而不管这个世界能否接受得了。全世界都得顺从他的意志。然而，他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却又是他的最大优点；他相信自己的想法，决不模棱两可。他对美国的力量和正义性都深信不疑。他从未处理过国内事务，对之不加批评；他乐于按照中学公民课里学来的理论接受这方面的现实。假如美国既有尊严又有力量，并把它的强大的力量用于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在战后时期已确定为对极权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那么，我们方面就会胜利。也许并不轻而易举，也许斗争是长期的，但到头来优秀的品德一定会起决定作用。在 1965 和 1966 年，当越南战争开始看来愈来愈困难，乔治·鲍尔等人把他们的疑虑告诉了他，认为大势已去，腊斯克则一再说，当一个象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伟大的国家全力以赴的时候，是无坚不摧的。他说：不错，我知道法国人曾经在那里失败过，政局是糟的，而且也许比你们说的更糟，但是我决不相信，当一个象美国这样伟大的

国家全力以赴的时候……真是超出了信念，而成为一个信仰问题了。

他反复地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者说，他以前也经历过这一类的斗争，听到过这一类的怀疑。那是在1950年12月，中国人参加了朝鲜战争，打得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打垮了一个整师，随即乘胜追击已溃不成军的美国部队。这时麦克阿瑟惊慌万状，发回了被罗维特称为旨在开脱自己的“遗书”的电报，说什么中国人已倾国而来同他作战。他的电报在联合国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内产生了令人震惊的作用，有人发出了撤出朝鲜、甚至撤出日本的议 329
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复电麦克阿瑟说，最要紧的是保住他的部队，必要时可象他所建议的那样，占据几个滩头阵地固守。在这个时刻，腊斯克叫大家要镇定。他表现很有把握地说：情况并不真是那么糟；中国人所能做的毕竟有限度，美国的威力也不是完全不行的。也许在中国人参战时我们铺得太开了，但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处于目前的时刻，大家都应该镇定下来，不要太看重麦克阿瑟电报中的语调，要设法衡量一下敌我双方拥有的各种有利条件。由于李奇微将军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们两人终于使华盛顿情绪稳定了下来。后来迪安·艾奇逊说，那是腊斯克一生中表现得最好的时刻。

后来当政府内部对释放朝鲜战争中的俘虏问题发生很大争论时，腊斯克的强硬立场也使艾奇逊留下深刻印

象。数以千计的中国和北朝鲜战俘不愿被遣返；急于使美国战俘回国的五角大楼，愿意接受一种简单的“一个对一个”的交换办法。由于军方竭力主张这一方案，并十分急于把美国的战俘要回来，政府似乎准备照办了。可是腊斯克却有力地并以巨大的热忱把他们说服了。他争辩道，强迫战俘违反自己的意愿而回国，这几乎违反了美国所主张的一切原则。那是不人道、不道德的。他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立场，终于获得了胜利；自愿遣返成了我们的政策。

然而，那几年在美国人和国务院对中国和亚洲问题的看法上也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全国现象的一部分。中国，一个可爱而有些神秘的盟国，已经赤化了。更糟的是，那个新政权同我们打了一场残酷的地面战争。面带笑容的、恭顺的、忠诚的中国人一夜之间竟变为黄祸，而成为没有头脑的、盲目执行任务的一群共产主义蚂蚁，简直象是刚刚发生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轮回转世一样。这给美国带来了可以说是一场国内危机似的东西，它加速了约瑟夫·麦卡锡的登台和得势，并导致了政界和政府对亚洲问题的态度强硬起来；特别是，国务院和它的亚洲司采取了坚决反共的态度。多年以后，民主党人特别乐于责备杜勒斯要为那些政策和那种僵硬态度负责。杜勒斯由于他自以为主持正义，由于他喜欢教训别人，由于他

对保安人员开放了国务院的门，所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虽然杜勒斯由于同意搞掉原有的人员，从而帮助改组了国务院的班子，可是政策上的改变，早在艾奇逊任职的后期就已经开始，那时腊斯克正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国务院的一些年轻官员们竭力要使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较少依赖法国外交部，而较多地对当地的民族主义表示支持，但他们发现腊斯克毫不表示同情。（事实上，在美国决定干预朝鲜战争的第二天，腊斯克曾提出过一张单子，上面列举对越南采取新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大大增加对法国人的军事援助。）相反地，他们却发现他对政治问题上的微妙的区别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感兴趣，更无意去考虑朝鲜和印度支那之类的战争有什么区别。那是“照章办事”的态度，使得负责欧洲事务的人员占了上风。在那几年中，美国对法国的支援大大增加了，而我们过去老是加以嘲笑的、法国人所谓他们在越南是为了自由世界而作战的那种论调，竟然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论调，并通过国务院高级官员之口讲了出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法国人对越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仅仅作了最微小的口头许诺的时候，他在1951年11月发表的一篇关于亚洲问题的演说中说：

330

印度支那真正的争端在于，是让那里的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呢，还是听任他们沦于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之下，被用武力纳入苏联共产帝国的新殖民主义体系里。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一致认为我们应当支持和协助法国军队和联系国① 的军队来对付在印度支那的武装威胁……我们在致力于建设，而敌人则进行破坏。要组织一个自由人的宪政社会是困难的，而要把一种恐怖统治强加于人是容易的……

真实的情况是：尽管民主党人想把对东南亚承担义务、搞出一个南越和扶植吴庭艳等等，全部归咎于杜勒斯，但美国政策的改变，其根子实际上是在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前种下的。真正关键性的决策是在杜鲁门任期的末尾作出的，其时艾奇逊在当国务卿，而腊斯克是他在亚洲问题上的主要副手。正是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政策从对印度支那战争中的双方保持中立转到向法国人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对越南承担义务、把遏制政策带到那个地区、把西欧的观念套用于不发达国家，所有这些做法的真正祖师爷并不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而是迪安·艾奇逊。

艾奇逊是一个英俊的人物，他的英俊很得体，不象舞台小生那样英俊，而是庄重英俊兼而有之。他的模样长得恰好就象一个国务卿；事实上很难设想他会是别的什么人物。假如他是一个银行家，那么他的堂堂仪表使人不相信他仅仅是一个理财的人；他的长相比一个单纯跟金钱打交道的人更为豁达和潇洒。他成了五十年代民主

① 指当时受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三国的傀儡政权，它们当时称为法兰西联邦的“联系国”。——译者

党的一个英雄，这是因为他曾遭到麦卡锡的恶毒攻击而能无畏地顶住（就涉及他个人而言，不是就他的职务而言），还因为他没有对阿尔杰·希斯①落井下石。当然咯，希斯是权势集团中很有地位的一员；而艾奇逊在很大程度上是忠于这个权势集团的核心层的。在五十年代，由于麦卡锡那几年的折腾，使艾奇逊莫名其妙地享有了温和派的盛名，而杜勒斯却被当作是强硬派。这实在是历史在开玩笑。事实完全相反。倒不是说杜勒斯比较温和，别看他演讲起来其势汹汹，在公开场合正义的话不离口，其实他在私下里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这位大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辞之后，可以在法官的内室里进行比较微妙的秘密交易。相反，艾奇逊却是一个强硬派，他觉得杜勒斯的政策是极端危险的，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预算太少了。艾奇逊一直是真正的干涉主义者，他深信极权主义者可能利用民主国家的弱点。这位艾奇逊并不温和，他从来不是温和派。他是威尔逊②式的人物，是新的一代的威尔逊，他这个威尔逊要用新的工业和技术威力来强制推行旧的理想，他这个威尔逊的手伸得更长。 331

艾奇逊的父亲是一个英国陆军军官，曾奉派去加拿

---

① 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曾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1948年被诬控叛国，1950年被判处徒刑五年。——译者

②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1913—1921年的美国总统。——译者

大镇压曼尼托巴①的一次混血种人的叛乱，后来当了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最后当上了康涅狄格州的主教。迪安·艾奇逊从小受到严格的教养。（事实上，他一度曾想当美国总检察长，罗斯福政府推荐过他，后来却被原籍康涅狄格州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卡住了，原因是：老艾奇逊曾因卡明斯离婚多次，而不让他再在教堂举行婚礼。）艾奇逊出身于牧师兼军人家庭，因而是很守旧的；象其他名门子弟一样，他进了格罗顿中学。（后来他写文章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说："他比我大十岁，在我入学时他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但他由于我曾在格罗顿读过书而器重我。"）他从那里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成绩平平，后来转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他在那里才初露头角。他受到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赏识，介绍他当了路易斯·布兰代斯②的书记官，从此他就青云直上了。

青年艾奇逊是一个非正统的民主党人，有点不象一个民主党人。他很佩服西奥多·罗斯福，但对塔夫脱感到讨厌，最后被伍德罗·威尔逊带进了民主党。威尔逊是一个质朴的、几乎是严峻的道学家，他对大西洋国家和

---

① 曼尼托巴(Manitoba)，加拿大中西部的一个省。1869—1870年当地居民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和土地权利而同当时的自治领政府进行了一场战斗。——译者

② 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1856—1941)，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译者

对全球主义有同样的爱好。艾奇逊是一个保守而正经的青年。1925年，在他毕业十年后的耶鲁大学校友节的集会上，他居然发表了一篇演说，主张对一个权力日大的政府要重新加以控制，并批评政府干涉人民的事务太多了。他差不多可以说是典型的权势集团内的人物——出身于良好的家庭，毕业于名牌学校，参加了重要人物的俱乐部，有显赫的社会关系。的确，他在1933年参加罗斯福政府，是完全符合权势集团内互相荐引的传统的。（"1933年5月，有两位老朋友——即将卸任的共和党人财政部副部长阿瑟·巴兰坦和也即将卸任的助理部长詹姆斯·道格拉斯请我同他们共进午餐。他们说，新任部长威尔·伍定是合乎我们心意的人，他需要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们问我愿意跟他在午餐桌上见见面吗？那顿饭是愉快而无拘束的……我刚刚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接线生就喊，伍定部长来电话了。他在电话中问我是否同意当财政部的副部长"。）

332

他在罗斯福政府里第一次任职期间关系没有搞好；艾奇逊在财政政策上比罗斯福保守，而且对罗斯福的松散的、缺乏条理的个人作风感到不痛快；他认为那种作风是"神气十足、令人难堪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出自内心地对总统表示最大的尊重和敬意。但象一位大老爷那样对一个有出息的马伕随便打一个招呼，扯一扯他的头发，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心里是不会痛快的。"他终于辞了

职，只是在大战即将爆发前才又重返政府，因为他自己的强烈的干涉主义是同罗斯福的需要吻合的；1941年他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

虽然他在个人关系上或政治上一向同罗斯福相处不融洽，后来他同杜鲁门却感到很合得来，权势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后来都和他有同感。罗斯福这个人物政治气味太重，因而也太任性，而杜鲁门则更尊敬权势集团的意见。他们两人的一个区别是：罗斯福自己就出身于那个特殊阶级，所以对权势集团不是那么敬畏，无论是在外交事务或别的事情上都是如此。他非常了解那些人的底细，他觉得自己比他们更高明。艾奇逊，以及象艾奇逊那样的人们，之所以欣赏杜鲁门，部分原因是由于杜鲁门对他们很放手，并很轻易相信他们的话；可是在最初的时候，这些人有些看不起杜鲁门：约翰·卡特·文森特记得艾奇逊最初曾说过："约翰·卡特，马路对过的那个小人物①要比你所想象的还好得多！"约瑟夫·艾尔索普是艾奇逊式的新闻记者，他曾对另一个记者说："斯图尔特〔他的弟弟〕和我当时对杜鲁门还是不放在眼里的，因为我们认为，他的政府之所以取得很大成绩应归功于他的内阁里的大人物——马歇尔、福雷斯特尔等人。可是，一般来说，一个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最后都应归功于总统，而

① "小人物"是对杜鲁门的蔑称，因为杜鲁门身材较为矮小。——译者

它遭受的一切失败最后也要算到他的账上……我们在专栏文章里多次承认过，我们曾把杜鲁门估计过低，因此几年前我们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歉意。艾奇逊说，那封信会使那老头儿高兴的，我相信确是如此……”

要说大人物，艾奇逊自然是杜鲁门时代的大人物。马歇尔开始上了年纪；战后去中国执行那次使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而那次使命也没有搞好。当他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似乎一直没有抓起来，好象总是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国防部在四十年代后期不象国务院那么有影响，因为它被本身的问题和改组缠住了。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艾奇逊是国务院的一个步步高升的人物，他从 1945 年到 1947 年任副国务卿，从 1949 年到 1953 年担任国务卿。他把他的回忆录题为《创建战后新世界亲历记》，这决不是偶然的。 333

1947 年，国会对于援助土耳其和希腊的问题正在犹豫不决。英国人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搞得民穷财尽而不能再起西方主要大国的作用，这时，火炬传给了美国，而帮助把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安定和秩序火炬接过来的人，就是艾奇逊。英国人说，他们无力挽救希腊的濒临崩溃的经济，也无法承担使土耳其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当时近东和非洲司的司长洛伊·亨德森一面看电报，一面想：“在这一小时内英国已把领导世界的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荣誉都交给美国了。”

这时国会的领导人员举棋不定，是艾奇逊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了；他描绘了一幅世界被共产主义慢慢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传染的图景，象一个烂苹果污染一整桶苹果一样。只有美国才能维护自由，对付极权主义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这种最新威胁。如果美国不挺身而出，全世界便将陷入黑暗时代：俄国人将控制地中海，接着是非洲，然后是亚洲。在欧洲，我们的朋友将感觉到这一冲击。艾奇逊大声疾呼地讲了这些；这都不是骗人的观点。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说，好得很，可是"如果杜鲁门想干的话，他就应该亲自出马，把全国吓得魂不附体才行"。

这就是杜鲁门主义的来历。受命把全国吓得魂不附体的杜鲁门，的确那样做了，而且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杜鲁门主义的咨文提交国会的时候，它把当时正飞往莫斯科途中的国务卿马歇尔吓了一跳。马歇尔对于它的那么高的反共调子感到不安，就打电报给杜鲁门，对那种提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认为杜鲁门的话讲过头了。杜鲁门复电说，在同参议院领袖们商谈以后，他确信这是使他的咨文能得到通过的唯一办法。可见，艾奇逊比马歇尔更不愧是遏制政策的制订者、是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反共立场的制订者。（人们不能在欧洲对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对亚洲的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却加以容忍。现在不是讲究细微差别的时候。谁要讲究细微差别，谁就倒霉。）

但艾奇逊不是一个关心亚洲或者对亚洲感兴趣的

人；他是一个欧洲派，他认为欧洲具有西方的、基督教的、民主优秀分子的道德准则，这才是值得重视的世界。其实并不是整个欧洲都具有他所说的那种道德准则，而只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欧洲才是如此；越往南，那里的人肤色黑一些，地中海的味道浓一些，他们就不那么有价值和靠得住（只有葡萄牙的萨拉查① 是例外）。但是欧洲就是 334
世界：必须在欧洲堵住俄国人，使英国人团结起来并给以休整时间，对法国人进行鼓励，使之能对得起我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把德国人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加以改造。法国人也许是最麻烦的，他们作为一个主要的欧洲强国，却出奇地不稳定，他们总是坚持法国人那一套。不发达国家无须加以认真对待。虽然艾奇逊是在殖民地世界发生大动荡和大变革并渴望着一个新秩序的时刻当国务院的首脑的，可是他在回忆录里并没有谈到这些问题，而只提到，尼赫鲁访美时对他艾奇逊待客的潇洒风度和机智未表示欣赏，因而他对尼赫鲁感到有些不满。相反，他的回忆录却是一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回忆录，谈的主要是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火炬的事。

艾奇逊对不发达国家漠不关心，认为它既不太重要，

①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889—1970），葡萄牙独裁者，1932—1970年任葡总理。——译者

又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他不愿动摇任何欧洲殖民国家。正是这一基本立场，日后使得美国和民主党（如果不是艾奇逊自己的话）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自食其果，大伤脑筋。1949年10月，已经当了国务卿的艾奇逊同尼赫鲁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尼赫鲁那时对法国在那里的试验（即当时所谓"抬出保大作为代替办法"）表示了极悲观的看法，尼赫鲁列举了保大的缺点，并称法国人决不会给保大以必要的自由来争取人民对他寄以希望和拥戴。艾奇逊答称，他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可是他认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一个古怪的回答，因为他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死抱住一个绝望的政策不放。尼赫鲁象亚洲其他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们一样，是拒不承认保大的，他对艾奇逊说，胡志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是共产党人。尼赫鲁争辩说，欧洲人对人民阵线的失败所下的结论，是不符合亚洲实际情况的。艾奇逊回答的时候还是谈论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但就是在那个很早的时期，艾奇逊已经知道法国对越南的政策既是错误的，也是无望的。

就连那样的态度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也发生了变化。倒不是因为印度支那的事态有何变化，而是受到中国形势发展影响的美国国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将不再那么不偏不倚（如果这个字眼贴切的话）。仍在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任上的沃尔顿·巴特沃思，直到那时还在勇敢地反对法国人要使我们通过

提供援助和军火而卷入这场战争的一切企图，可是事情的发展很快使他无法控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后，原先答应给蒋介石的大量金钱没有用完，这时有人提出从这笔钱中拨出一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美国巡回大使菲利普·耶塞普将肩负一项特别使命到印度支那去，他的任务之一是去正式承认保大政府（以前我们认为它是毫无价值的）。在得到美国承认之后，保大政府将可能取得一部分援华余款。同行的有雷·福斯迪克①和埃弗雷特·凯斯②。自然，美国的选择余地正在不断缩小；到了这时，最有希望的对象就是保大，因为选中胡志明的可能性早已一去不复返了。1949年之前，我们在没有国内压力的情况下尚且不能支持胡志明，现在就更谈不上了。要是法国人采取合作态度的话，保大可以成为一种虚弱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权宜人选，但法国人是不大可能合作的。 335

耶塞普带去艾奇逊给保大的一封信，信上说，美国人对保大膺选为越南领导人表示高兴。耶塞普是一位国际法的权威，他认为这封信就是表示承认。他结束访问后

① 雷·福斯迪克（Ray Fosdick, 1883—），纽约律师，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著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故事》、《约翰·洛克菲勒画像》等书。——译者

② 埃弗雷特·凯斯（Everett Case, 1901—），纽约斯龙基金会成员，曾任国务卿远东事务顾问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等职务。——译者

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赞扬自己这次访问成功，说美国对于法国允许越南独立一事极为高兴。巴黎闻讯哗然，于是耶塞普奉华盛顿之命举行了第二次记者招待会，这次他小心翼翼地声明，他上次说的是指越南在法兰西联邦之内的独立，于是我们又一次对法国屈服了。我们同保大合作的框框本来已很狭小，也许毫无活动余地，现在美国又接受了进一步的约束。这分明不是什么美国加强支持越南民族主义的标志，而是反映了美国对其欧洲盟国又作了一次让步。总而言之，耶塞普此行是不愉快的；在回国途中他获悉，麦卡锡已指控他“同情共产主义”，他将不得不为此提出答辩。

这样一来，美国对保大的承认变得毫无作用，而美国对法国的事业照旧要给予援助，速度还要加快。艾奇逊紧接着又派出了一个调查团，由一个名叫艾伦·格里芬的加利福尼亚出版商担任团长。它的任务是确定要不要给法国人运送军火和其他军事装备。在华盛顿，一向反对这种想法的巴特沃思察觉到，这是艾奇逊放出的一个信号，表示有一项政策不行了，需要加以改变。他心中明白，这是国务院的一贯做法，在有关的人员还在任的时候，上面想改变政策，便派出一个独立的调查团，有关的人事先已知道将要有一种新方针。进行一次专门调查之后，就将采取一种新的立场。巴特沃思的任期毕竟也快要满了。他初上任时显得那么清新而精神饱满，因为那时他

的前任约翰·卡特·文森特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如今他也搞得焦头烂额了。正如提名文森特出国当大使一事因参议院不予核准而告吹一样，巴特沃思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国务院本来想派他到瑞典去当大使，却在参议院的压力下不得不撤销这个任命，而改派他一个较低的职务。

果然不出所料，格里芬调查团认为共产党对印度支那的威胁非常严重，它建议国务院集中搞短期援助，以便帮助法国人迅速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稳定。不出所料，那是因为它的论证方法是与众不同的：它的任务并不是要弄清援助法国人是否明智、法国人是不是正确的一方，而是要弄清法国人是否需要援助。法国人当然说他们需要援助。这样，美国就开始执行一项重大的新政策：援助法国人打这场殖民战争。由于这项政策，美国最后几乎负担了全部开支，总值达二十亿美元，而到了1954年，华盛顿竟比巴黎更迫切地要法国人继续打下去。 336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是交给法国人呢，还是交给保大政府？法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美国的意图有疑虑，认为美国人急于想取代他们在西贡的地位。巴黎盛传着这一类的谣言。格里芬调查团是否包含着那种意图？1950年3月，当格里芬调查团还在返国途中的时候，法国驻印度支那部队司令马塞尔·勒卡庞蒂埃中将在一篇反映了当时的愤慨情绪（而且对法国何以打输这场战争很有洞察力）的谈话中说：

“我决不同意把装备直接交给越南人。要是这样做的话，我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辞职。越南人没有能有效地利用这些装备的将官校官和军事组织。这些装备将全部被浪费掉。美国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法国人自然是需要援助的，因为他们正在被越南人打败。）

勒卡庞蒂埃的顾虑是多余的，美国全面退让了。每当它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共主义之间发生冲突时，它总是这样做的。美国的装备运到了，是交给法国人的；越南人站在一旁，他们是一个幼稚的民族，产生不出将官和校官的。格里芬建议我们向法国人提供军事援助，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美国应该要求取得什么样的控制手段？艾奇逊曾同菲律宾的政治家卡洛斯·罗慕洛谈过此事，罗慕洛是少数几个在华盛顿和在亚洲都受尊敬的亚洲人之一。罗慕洛警告他说，把援助给法国人的麻烦在于，你给了他们援助之后，你就失掉了一切控制手段和影响。

1950 年 5 月，艾奇逊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仍然不是根据对越南人有何好处或当地局势的需要而作出的。那是一个双重的决定：第一，它反映了普遍加剧的冷战形势，因而更加不可能对共产主义世界中任何两个部分加以区别对待；第二，就艾奇逊来说，这点也许更重要，正如当年的波茨坦协定一样，它把印度支那看成是一个边缘地区，从真正的世界观点和同欧洲盟国的关系的观
337 点看来是无关重要的。在这个当口，美国人正在大力扶

助西德复兴经济，想以此作为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强大的亲西方的和反共的新铁锚来稳定欧洲。英国人对美国的意图感到不安，而法国人则公开表示抗拒，因为法国人有充分理由担心，随着德国强大的经济力量而来的，必然是德国的强大政治力量，法国人害怕这个幽灵不下于害怕国际共产主义的幽灵。后来，法国政府中欧洲统一的主要鼓吹者之一的罗贝尔·舒曼提出了一项计划，把欧洲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管制之下，这种安排容许德国人的煤钢产量大大增加。这样，法国人就顺从了美国关于欧洲安全和重建西德经济的要求。但是需要给法国一点补偿。法国的经济正陷于困境。旷日持久和遥远的印度支那战争使法国的国防开支不断增加，已经不堪负担了，所以法国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来进行印度支那战争。1950 年 5 月 7 日，就是艾奇逊获悉舒曼计划的同一天，他同意为这场战争提供军事援助。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一场交易，虽然没有公开这样说。（后来，艾奇逊在私下曾对自己的朋友们承认这是一场交易。）我们想加强西欧来反对共产党，所以我们就帮助一个西方国家去进行一场殖民战争。

第二天，美国给予法国援助一事宣布了，这是战后历史上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将开始资助一场殖民战争。可是，既然这场战争要我们出钱，就不能再把它叫做殖民战争，而要把这说成是一场争取自由的反共战争

了。关于越南人的言论自由突然成了一个问题。以往，国务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声明都小心翼翼地避而不用法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提法；现在，这点也要改变了。5月8日，艾奇逊同舒曼达成了交易后宣布："美国政府确信在苏联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任何地区，既不存在民族独立，也不存在民主演进，因此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应该向印度支那各联系国和法国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以便协助它们恢复稳定，并使这些联系国得以致力于它们的和平和民主的发展。"

稳定，这是关键性的字眼，要使越南获得稳定；然而我们所讲的稳定，在越南人看来，就是殖民主义。而他们认为是自由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便是不稳定和闹革命。由于政策已经完全改变，用词也完全改变了；由于我们的政策已经失常，我们用的语言也失常，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年之久。然而，艾奇逊的决定当时并未引起很大的注意，人们并未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了的事情，并未看出这是一个转折点。相反，在那个时刻和在那个时代中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五十年代不是讲究区别对待的时候。在这项决定宣布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不能要求法国为印度支那作出牺牲，而后又要它放弃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法国，因为我们并不准备介入印度支那。印度支那是事关重大的——如果它失陷了，整个东南亚就岌岌可危。"所有这一切当

338

然都是朝鲜战争以前的事情。

在1950年6月，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在共产主义世界内寻找差别（人们认为那种差别正在急剧消失），在6月25日北朝鲜人越过边界侵入南朝鲜后，就更没有人再提了。两天后，杜鲁门宣布了美国的反应；朝鲜战争打起来了。后来，中国（由于美国的估计错误）参战了，这样一来，越南便完完全全地成了全球性大斗争的一部分。朝鲜战争爆发后，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马上拟定了准备在亚洲采取的步骤；其中规定要优先采取的一项行动，就是急剧增加对法国人的军事援助。在华盛顿，美国的声明反映了法国的声明。艾奇逊曾一度把胡志明看作某种民族主义者，现在却成了积极支持法国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的强硬派。霍默·弗格森和西奥多·格林这两位参议员在亚洲旅行归来后，对于那里的局势非常不安。他们发现，不论他们到那里，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人是在支持一场殖民战争。这对美国一向主持正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声誉极为有害。艾奇逊竭力让参议员们放心：他说，他们把一切都弄颠倒了，他们完全误解了。那里打的仗不是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他说，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真是一个绝妙的、明确的答复，它反映了美国人、

特别是艾奇逊一类的人惯于用我们的眼光看问题，而不管别人是如何看的。既然局势对艾奇逊说来是清清楚楚的，对越南人也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在这个问题上把他蒙蔽了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在他面对批评者的时候始终对他很有用；他并不缺乏自信。可是他那时对世界的看法实在是有一点天真。1951年，艾奇逊会见了著名的法国驻印度支那部队司令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此人是一个法国的麦克阿瑟。塔西尼谈到了在一场没有战线的战争中同一个神出鬼没的敌人作战中的一些问题。接着，他对艾奇逊说，他最感到需要的是培训越南籍军官，因为越南人不愿在法国军官指挥下打仗。艾奇逊慨然建议让美国军官来搞培训工作；他说，美国已经在朝鲜证明它懂得怎样训练亚洲籍的军官，而法国人不懂。他以为，印度支那和朝鲜的战争和问题都是相同的。

339 这时候，国务院里一个重要的少数派乔治·凯南提意见了。凯南竟然提出了反对意见，使人觉得有一点讽刺意味。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从莫斯科使馆发回来的电报颇受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赏识，从此他便平步青云，扬名天下。但是凯南对于别人歪曲利用他的思想是很不满意的。战后随着美国外交政策日趋强硬，他感到他的思想被上司歪曲利用了。他们从他的很广泛的思想体系中抽出一点来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

而那个目的却不一定是他的。他所论述的是一件很复杂的课题，而那些人对复杂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凯南对于苏联战后的意图是不抱幻想的。他知道，苏联人将采取一些他们认为符合他们民族利益的行动，而我们必须对这些行动有所准备。可是他没有预见到、也不赞成那随着冷战升级而产生的、螺旋形上升的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到了 1948 年，他已变成了在他所谓美国外交政策日益军事化问题上地位最高的反对派了。他反对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他认为有了马歇尔计划就够了。他认为，如果当真发生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入侵，那也将是从西方内部进行瓦解，而不会采取苏联坦克长驱直入法国的形式。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同艾奇逊争辩说，这不是一次苏联的进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苏联人是把这次战争看为朝鲜内战的。

到了 1950 年，凯南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军方影响的增长、对于人们本能地把共产党人当作铁板一块的简单化的态度，感到十分忧虑，对于要把我们对欧洲的政策套用于亚洲的苗头感到不安。鉴于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他曾上书艾奇逊，充分说明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不可能取胜，换上美国也不可能取胜，然而不管我们是否已经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在取代法国人的地位。他写道，如果越盟取得胜利，最初看起来好象是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但到头来当地的力量将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当地的人民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办事。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将用种种方式来表现自己，那里的人民是不会受莫斯科或北京的统治的。他实际上在说，这是大势所趋，是人民的民族演进向前迈出的一步。

凯南并不是轻易地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是被政策计划委员会里他的一位下属所说服的。此人就是约翰·佩顿·戴维斯，他已经由于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先见之明而遭到迫害了。凯南基本上象其他一些人一样，是一个欧洲派，他以前也反对越盟，但戴维斯促使他转变了。戴维斯坚决主张，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必须摆脱那种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道德问题的习惯。他说，当某个地方一支
340 当地力量由于种种原因有可能形成一次叛乱的时候，宗主国的政府是无法打败它的。戴维斯对于美国把受过训练的人送到战场上去应付这种极其复杂的问题能否奏效，是极表怀疑的，因为他曾经目睹美国在中国就是这样干而失败了的。戴维斯说服了凯南，使他看到，在这样的地区，西方国家实在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他又指出，那里的局势对西方的危险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举例说，当地的力量仍须把传统的原料卖给西方国家，一如过去一样。这种观点当然是同戴维斯对中国的看法相似的。在中国问题上，他认为蒋介石政府从来就谈不上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因为他的中国人的立场太强了。所以蒋介石同我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同样的道理，毛泽东政府也谈不上是莫斯科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听天由命而已。有些力量往往是我们无力控制的。如果我们硬要控制他们的话，不但起不了作用，倒反会促使他们反对我们。

凯南借助戴维斯的思想和实例所作出的出色论证，并没有改变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想法。新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是非常遵守传统的人，他认为政府必须团结一致，决不能表现摇摆不定。凯南一戴维斯的观点始终居于少数，在那国内紧张局势和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时期，根本被置若罔闻。只是事过整整十六年之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才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追究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种地步，这时凯南的上述观点才得以重见天日。

既然路线已经定了，凯南上书在那时候也不起作用。我们把法国人的战争连同他们的臆想都接了过来。以后四年印度支那的军费是我们出的钱，我们把这场战争看做是我们全球战略宏图的组成部分。促成这一大转变的，是民主党和艾奇逊，尽管他们是在右翼的压力之下干的。1952年，民主党政府因大选失败下台，新上任的共和党政府的国务卿立即以自己的威望大力支持法国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的确，随着战争的发展，随着巴黎痛感自己

陷进了越南泥淖，美法两国好象互换了一下位子。法国人本来是热中于战争和渴望美国支持的，却越来越犹豫起来了，似乎美国人倒反比法国更热中于战争了。形势的发展表明，我们自己对法国的小小妥协会把我们推上多么奇怪的道路上去。迪安·艾奇逊本来一向以为法国的事业是错误的，他曾把胡志明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当初作出给法国军援的决定时是有所踌躇的，后来竟不由自主地被自己所采取的行动带着走了。他卸任后，在1953年和1954年经常同他的国务院老同事们在普林
341 斯顿大学会面。而在奠边府战役期间，他和他的助手们（凯南除外）还一致认为，美国当时如果不去挽救法国人并投入战争，它就要犯一个很大的或许是致命的错误。好一个温和的艾奇逊！好一个温和的民主党！

那个时期是艾奇逊在主持国务院，所以改变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不是腊斯克，但他肯定是默认的，而且对此并未感到不安。他还成了这种政策的有力的阐述者。国会和《时代》杂志的那些要求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的人们，发现腊斯克是一个他们完全可以接受的这种政策的鼓吹者，在政策转变时期，他们很满意有腊斯克这样能干的人主管其事。其实当腊斯克开始接管远东事务的时候，他是遵循当时的方针的，即认为国民党中国的垮台只怪国民党自己；而且在1950年6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

夕，他还把中国的叛乱比之于“美国人抗击英国的起义”。事实上，腊斯克在1951年5月向中国研究会发表的一篇论中国问题的演说，似乎是一个更强硬的新政策的标志。他说，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蒋介石，不是共产党，毛泽东政府代表的是外国主子。《时代》杂志大加赞许地说：“直截了当的演说！”这篇演说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在全国各报上，并被各大新闻杂志转载；但它却惹起了英国人的一次抗议。国务院否认那篇演说代表一种新政策。最后，艾奇逊举行了一次颇费唇舌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说，那篇演说没有陈述任何新东西——但是总比旧政策要强硬些，难道不是这样吗？

腊斯克在那篇演说中说：

……例如，我们和中国人对于太平洋的和平都有切身利益。我们双方都要求确保各自的太平洋侧翼的安全，并希望看到大洋彼岸的伟大邻国是强大、独立和具有善意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不可避免地迟早要使中美两国团结起来反对它，正如四十年前我们毅然维护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反对来自欧洲的威胁一样。同样的问题现在又提出来了——而且变得更难于应付了，这是因为现在有一批中国人引狼入室，这帮人爱他们的外国主子甚于爱中国。

* * *

中国的独立正受到严重威胁。共产主义世界的人们眼里只有一个主子——这是一个嫉妒成性和毫不容情的主子，只有对这个主子百依百顺，才能博得他的欢心。有多少中国人由于他

们爱中国甚于爱苏联而正在一批又一批地被消灭；能有几个中国人来得及回想到拉伊克、科斯托夫、彼得柯夫、克利门蒂斯①以及别的卫星国家的一些人的下场？那些人发现，当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家来说还是不够的。

中国人民正在丧失各项自由权利。在暴民面前举行公审，集体屠杀，流放到满洲、西伯利亚或新疆去服苦役，任意没收财产，
342 破坏家庭内部的忠诚，压制言论自由——这些就是被游行、庆祝会和空洞诺言所掩盖着的事实。

中国的领土完整如今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字眼。苏联军队开进新疆，莫斯科和北平"共同开发"新疆的真相，内蒙古被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以及在侵略朝鲜的战争掩护下苏联不断扩大其在满洲的势力，凡此种种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广阔的北部地区正在落到那个一百多年来一直把它的贪婪的魔爪伸向那里的欧洲帝国手里。

* * *

几十万中国青年正被投入一个熊熊烈火的炉里白白牺牲，他们用人海战术来对付现代武器的火力——他们没有重型装备，没有充足的给养，也没有最起码的医疗照顾。除了朝鲜战争以外，中国人还被迫在其他地区进行侵略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

---

① 拉·拉伊克(László Rajk, 1909—1949)，曾任匈牙利外交部长。特·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 1897—1949)，曾任保加利亚代理部长会议主席、保共中央书记。尼·彼得柯夫(Nikola Dimitrov Petkov, 1891—1947)，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右翼分子。弗·克利门蒂斯(Vladimir Clementis, 1902—1952)，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译者

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和精力，使他们不去注意苏联帝国主义对中国本身的侵占。

* * *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定要引起世界各地——包括福摩萨、在大陆上和在海外各地的中国人的关注。只有中国人才能救中国——这个任务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以及大无畏的勇气，这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几十年来长期奋斗中所显示出来的气概。我们外国人无法确切地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我们无法提供一种公式来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力量统一起来。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说的：当中国人民行动起来争取自由，并按照他们的历史任务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可以指望世界各自由国家人民的大力支持……

腊斯克这篇演说是非常强硬的。就在同一天晚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发表了一篇演说，相形之下比腊斯克的要温和得多。然而，迪安·腊斯克那天晚上反毛泽东的调子比杜勒斯高些，并没有损害他的前程。无论如何，腊斯克任助理国务卿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共和党人即将东山再起，他们将指责国务院对共产主义软弱无能，以此作为重新执政的主要武器。在那个时期，国务院里很多人要大大倒霉，唯独腊斯克安然无恙，这部分地是由于他自己的观点确实是属于强硬派的，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有在纷争中逢凶化吉的高超本领。在麦克阿瑟被撤职回国发表“老兵坚贞不屈”的演说以后，国务院知道国会将对麦克阿瑟事件进行调查。后来腊斯克却没有

随着艾奇逊去国会受质询，本来他作为主管亚洲事务官员是应该去的，结果是国务院法律顾问艾德里安·费希尔去了，而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叫这样的人去应这种差事的。由杜勒斯带头，共和党人大肆攻击过去的政策，攻击民主党实行不道德的妥协和软弱的不图取胜的遏制政策。腊斯克是这些政策的次要制订者之一。可是，不要紧，腊斯克同杜勒斯的关系很好；他们曾在对日和约谈判中一起合作得很好，以后一直保持联系，而且腊斯克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显然是可以接受的。

343

共和党在1952年大选上台后，原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杜勒斯出任国务卿的新职；他一面着手为国务院网罗一批新人，一面物色一个他所喜欢和信任的人来接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他推荐他的年轻朋友迪安·腊斯克担任此职。这样，迪安·腊斯克又一次得到了提升。那些曾经正确地预见丢失中国的优秀人士将看到自己的前程即将完蛋，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参加朝鲜战争的腊斯克，反而飞黄腾达起来。由此，他必然得出一条结论：只要站在鹰派方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如若站在鸽派方面，即使对了也要倒霉。腊斯克表面上的身份是民主党人，但他却同杜勒斯继续保持着极亲密的友谊。几年后，当杜勒斯的女秘书碰见腊斯克时，她说，她觉得同他很熟。杜勒斯先生曾那么喜欢他，常谈起他，还嘱咐过，无论何时腊斯克先生从纽约来电话，都得让他

直接通话，因为腊斯克先生不是一般的人。她说杜勒斯先生绝少对别人如此重视。杜勒斯手下的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罗伯特·鲍伊也证实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腊斯克来到华盛顿，杜勒斯就会打电话给他说："腊斯克来了，我要你同腊斯克一起过一天，告诉他我们正在干的一切事情。"

因此，把腊斯克涂上中间派色彩，或者唯唯诺诺的色彩，或者强硬派色彩，都无不可。那么他是个什么人，他究竟站在哪一边呢？他离开国务院后，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差事——当一个重要基金会的头头，这时他才四十三岁，还非常年轻，真是前程远大。它安然无恙地渡过了近代国务院历史上最复杂和政治上最危险的时期，他离开国务院时比他当初进去时地位更强（同双方的关系）。此人八面玲珑，一面同罗维特、艾奇逊及其一伙保持着旧谊，一面同杜勒斯及亨利·卢斯有了新交，而且还向民主党的自由派频送秋波，表示自己站在他们的一边。与此同时，他在基金会里发放亿万富豪的免税的钱，抱住这个风险极少而非常安全稳当的职位。他对不发达国家的兴趣比过去多了一些，给非洲和亚洲多拨了一些钱。在五十年代的岁月里，他结交纽约的有财有势的人们，从不树敌，等待着下届总统来电话。他决不树敌。

可是，在肯尼迪政府里的那些年头并不是非常容易渡过的。腊斯克发现他周围尽是些他认为是外行的人，

这些人视规章制度为儿戏，并且干扰认真办事的人。腊斯克是个非常重视规章制度的人；事实上，他在为了向下
344 届总统毛遂自荐而于1960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曾说过，规章制度比人更重要。可是，肯尼迪政府却是重视人及其看法的。在这一点上，腊斯克同哈里曼恰巧是针锋相对的。哈里曼认为，你改变了人就能改变政策，应当同官僚制度作斗争；而腊斯克则认为，应该适应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存在，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的。肯尼迪的作风使腊斯克很恼火，因为白宫的那帮年轻人老想插手外交政策，随便乱搞一气，他们在国务院里到处物色聪明的年轻朋友，把他们带来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以致有时国务卿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竟遭到一些狂妄的国务院科员的反驳。这种情况一再发生，腊斯克认为这简直是侵犯他的职权，从此他只跟总统直接打交道的自然倾向更加明显了。碰到这种情况，他更加不轻易开口，只是在纸上涂鸦。熟悉他的人们可以从他信笔乱涂的东西上觉察出他心中激愤和厌恶的程度，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员们越年轻、越直言无忌，腊斯克就乱涂乱写得越厉害。

腊斯克自己一定已经感觉到白宫里的人们对他的蔑视。有一回，腊斯克为高级官员们组织一次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情况介绍会，他认为他们需要多了解一点核武器能起或不能起什么作用的情况——结果使他很寒心。格